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序言

丁守和

1991年初，河南人民出版社李铁屏先生同我联系，提出该社准备组织编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希望我能主持其事。在我的印象中，长期以来，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又引人入胜的优秀著作，成为我国较有影响的出版单位之一；同时这又是一个好题目，很有意义，于是便答应下来。然而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很复杂困难的大课题，使我不能不认真考虑一些问题。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人们创造历史，而创造历史的各个人群、阶级、国家或民族又各有其不同的意向，因而历史发展总是充满着矛盾、冲突和斗争，而又互相影响、激荡和交融，循着螺旋式的路线演进的。

20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翻天覆地、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其斗争之激烈、变化之迅猛，较之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更为引人注目，令人惊心动魄。

从世界范围看，在世纪之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其特点是，对内加强统治，加紧压榨，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加深，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对外加强侵略，增加资本输出，掠夺、瓜分或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和表面化。在3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于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地方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一批国家的革命成功，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随后，在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兴起民族解放运动，并相继获得独立。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因此而崩溃，仍然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在经过一次次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之后，也在总结经验教训，并经过自身机制的调节，反而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重新获得活力。虽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严重犯罪、贫富悬殊等等，但经济毕竟得到稳定和较快的发展。尤其经过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技术革命，愈加繁荣，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社会福利有所发展。而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试验，虽然也有发展，但由于思想脱离实际、经济和政治体制僵化不变、破坏民主和法制、严重脱离人民等种种原因，并未取得应有的成就，终于在80和90年代之交发生巨变，抛弃社会主义旗帜。世界风云之变幻莫测，使一代代人瞠目结舌，预料所不及。

从中国情况看，变化之频繁、剧烈，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刚跨入世纪之门，即发生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打进北京的残暴战争，侵略者的铁蹄任意践踏我神圣国土，屠杀掠夺我人民，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于半殖民地的深渊。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分子奋起抗争，抛头颅，洒热血，终于发动辛亥革命，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及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使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马克思主义开

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国共合作形成革命新形势，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给多灾多难的中国带来一线光明；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于 1927 年发动政变，建立国民党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长达 22 年的统治。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强占我半壁山河，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斗争，演出一幕幕威武壮观的活剧。敌人的野蛮残暴，斗争的曲折复杂，革命者的悲壮英武，视死如归，真是感天地泣鬼神。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恢复了惨遭破坏的国民经济，使中国呈现一片新气象。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民主革命胜利后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待条件具备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建国前后，中共领导曾设想进行 15—20 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一步实行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尤其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后，为避免新的阶级分化，于是“趁热打铁”，从 1953 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并批判了刘少奇等提出的颇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原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左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实际上只经过不到 4 年的群众运动就超前完成了。建立起新型社会主义制度，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而遗留的问题却很不少。在此后 2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接连出现“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不断的批判斗争等重大失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 10 年之久的严重错误，致使经济建设停滞不前，人民长期处于困境，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中国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邓小平说过，是我们自己耽误了 20 年。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本来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开辟了广阔的远景，何以又出现 20 多年的停滞状态呢？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观武断，好大喜功，理论脱离实际、脱离中国国情，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则有促进或阻碍作用。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发生变革或革命，改变这种生产关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以为只要不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样会阻碍或破坏生产力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建立社会主义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理应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立稳定的基础。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过粗带来的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就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推行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甚至要取消工资制度和按劳分配，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认为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试图用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发展生产，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宣传，造成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穷过渡”等严重错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造成“天

下大乱”，却未能达到“天下大治”。因而对政治、思想、教育、科技和文化、文艺、道德等都造成严重破坏，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这不但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民主科学精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认我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87年4月，邓小平就曾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建设对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同时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大胆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有益经验，大量引进外资和科技，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焕发青春活力。这都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决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和完整无缺的，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不断革新、完善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继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是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根据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必须不断地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吸收人类创造的新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国两制等等，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实践证明，这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是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当苏联解体和东欧变色，都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时候，而我国却依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为全世界所瞩目。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进一步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认为区别“姓社姓资”，主要看能否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些，要“换换脑筋”，抓紧时机，把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正如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者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无疑，这对我们正确认识20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也有重要意义。

研究和编写20世纪中国史纲，当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思路或不同途径和重点，提出不同问题进行论证和阐述。例如近现代部分可以着

重从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进行研究，也可以着重从现代化或发展道路进行探讨，或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等，但都必须重视历史的客观发展。有人曾提出 19 世纪以来的中国发生社会动荡（往往以“革命”的名义）的频率最高、最密集，战争、革命一直不断，结果导致中国现代化的滞缓等。是否这样？当然可以讨论，但总应该尊重历史事实。

事实上，从 19 世纪中叶列强侵入那时起，中国就面临如何回应，以适应时代潮流发展的问题。林则徐首倡“开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制夷”，冯桂芬主张“采西法”，“制洋器”，到洋务派提出“借法富强”，创办军工和民用企业及新式学堂，试图从船炮工商科技等方面进行变革。这些并不是什么“革命”，也不是“激进主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人们认识到不仅应发展船炮工商，还必须改变专制制度，乃兴起变法维新运动，主张君主立宪，从上而下改变社会制度。这样一种温和的改良也遭到专制统治的镇压，将一次现代化机会扼杀。接着八国联军入侵，签订《辛丑条约》，民族危机更为严重，促使许多爱国分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推倒清政府，建立民国，但仍未改变被压迫奴役的命运。列强侵略未已，北洋军阀统治及军阀混战频仍，于是兴起新文化启蒙运动，宣传民主科学，唤起国民觉醒，探讨新的出路。这样的历史发展是很清楚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社会危机，在西方国家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欧洲文明破产”。这也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资本制度产生怀疑。如李大钊说：“此次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由对国内假共和的不满，进而产生这种怀疑，加上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因而倾向社会主义，兴起马克思主义思潮，并成立共产党。东方文化派也受到西方国家动乱、危机的影响，而提出用中国固有文化救治西方文明。他们也著书立说，但实际影响不大。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是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国民革命打倒北洋军阀，而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然是内战不已，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至进行了 8 年抗战，接着又进行 3 年多解放战争，争取独立和解放。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近现代史上革命、战争确实很多，但这决不是哪些人或党派制造的，而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因此，我们只有循着历史的客观发展，对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才能阐述清楚。离开历史发展，用主观设想如何如何，那是不符合实际的。至于建国后我们在建设中的错误和曲折，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才能得到正确认识和有益的教训，以便更好地前进。

我们编写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就是依据历史本身的发展，既有救亡图存的论述，也有对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以社会政治变革为主，兼顾经济和文化等，并讲到国民党避居台湾后的情况，试图把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至于是否能做到这点，那就很难说了，只能说我们是力图这样做的。

我在接受这项工作后，便找陈文桂、唐宝林、鲁振祥、郭德宏等同志商谈过几次，确定按 20 世纪经历的四代不同性质的政权分为四编，由该四同志分别撰写，并就提纲进行了讨论。为统一掌握要求，我又写了编写意见供参考。提出：本书是史纲性质，既有重点，抓住主要问题，作深入论述，又要

概括性强，涵盖面广，包括尽量多的内容，主要事件和问题不要遗漏；既要概括，又要有具体内容。本书是综合性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方面，又要联系国际形势，列强侵略动向等，都要交待清楚，要分析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基本上是史的叙述，但也不完全按时间，尤其章下面的小标题有些要集中写；同时也要有分析论说，但又不宜多，点到为止。还要求文字简练，又要生动具体。这些要求看来简单，而做起来是相当难的。

我在修改提纲时就感到，写作这样一部著作困难是很多的，而自己却不量力，承担了这样的大题目，是有些后悔的。但已经答应下来，只有勉强为之。原计划1991年交稿，未能做到，直到1992年上半年才陆续交来，有的部分仍未完。我将交来的部分看过一遍，分别提了意见，并交谈过。到今年上半年又相继交来，有的部分7月才交来。我因有他事，只是看了一遍，提些意见，委托唐宝林同志仔细看看，并作修改和压缩，有的部分郭德宏同志作了修改，最后我又看过，有些修改。所以拖到现在。

写作这部史纲，参加工作的同志是作了努力的，可谓数易其稿。但由于我的水平所限，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盼读者批评指正。

在出版学术著作很难的情况下，河南人民出版社提议出这样一部书，足见其扶植学术，致力于基础文化建设的魄力，令人感动。李铁屏先生精心策划，多次催促和提意见，我们深为感谢。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在这时，我们回顾20世纪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展望21世纪的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回顾过去，放眼未来，我们更加充满信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本书各编的撰稿者分别是：

第一编 陈文桂、黄春生、杨群、郭德宏

第二编 唐宝林

第三编 鲁振祥

第四编 戴鲁鸣、周承恩、席宣、郭德宏、李松林、李雅儒

1992年11月一稿

1993年8月二稿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第一编 祖国在危机中

引论近代中华民族的灾难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各国的先列。汉、唐、宋、明等朝代的完备的封建社会制度，给了周围国家重大的影响。先进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璀璨的思想文化艺术，更是名家辈出，声名远播。到明末，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正如《大国的兴衰》一书所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但是，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渐渐地落伍了。当清王朝在中国大地上确立封建专制统治，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英国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又发生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随后，美国开展独立战争，法国进行资产阶级大革命，一大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到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年，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清王朝却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盛世”之后，逐步衰落，东西方的差距拉大了。

落后是要挨打的。西方列强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极力向外扩张，进行掠夺，而落后的中国经不起西方列强的一击。于是，中国被迫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大片的领土被侵占和瓜分，大批的财富被掠夺，主权受到侵犯和削弱，沦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一、列强对中国领土的大量侵占和瓜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从16世纪开始就陆续来到中国。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左右，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作为他们的居留地。17世纪初叶，荷兰人两次强占澎湖列岛，并一度占领台湾。

英国崛起以后，很快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于1840年悍然发动肮脏的鸦片战争。从此，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大量侵占和瓜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璦琿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夺取了中国黑龙江北岸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区”。“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恩格斯也指出：俄国在这次战争中“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在这之后，俄国这个穷凶极恶的强盗，又派兵侵占伊犁九城，强迫清政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同上书第2卷，第41页。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37页。

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边界议定书等，侵占了中国斋桑泊东南、霍尔果斯河以西、伊塞克湖东南和阿塞克河源等 7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萨雷阔勒岭以西 2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逼迫清政府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后被迫归还中国），并把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或租借土地，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

1896 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夺取了在黑龙江、吉林境内修筑、经营东清铁路的特权；1897 年，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第二年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域租与俄国。不久，又把长城以北包括整个东北、内外蒙古等地，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德国于 1897 年强占胶州湾，并于第二年强迫清政府把胶州湾租与德国，同时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及在铁路沿线 30 里内开矿的权力，从而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在这同时，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得到从越南到昆明铁路的修筑权，逼迫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两广租与他国，从而把云南和两广的大部分地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

英国更不甘落后，接连向清政府索取了津镇（天津到镇江，后改为津浦线）、广九、浦信（浦口至信阳）、苏杭甬以及从山西经河南到长江沿岸等五条铁路的修筑权，强租威海卫和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及大鹏、深圳两湾。随后，又与俄国签订协议，把长江流域包括云、贵、川、湘、鄂、赣、豫、皖、苏、浙 10 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

除以上国家外，意大利也要求割让浙江沿海的三门湾，并想派一支舰队到中国海面。

美国虽然没有单独划分势力范围，但于 1899 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使它能够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利益均沾”，享受了与其它国家一样的特权。

从以上可以看出，短短 60 年间，中国大片的国土被强占，许多海湾被“租借”，几乎全国都被划为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被瓜分的危机，日益深重。

二、列强对中国经济的疯狂掠夺

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经济的手段是多方面的。

首先，通过一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大量倾销商品。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同意英国商人的进出口关税由双方“议定”；废除行商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可与任何人自由贸易，并有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和基地的权利。随后，美、法两国通过《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获得了同等权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又被迫增开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汕头、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为通商口岸，外国货物一般只抽 5% 的进口税，入内地只抽 2.5% 的子口税。俄国还获得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的权利。

1876 年，通过中英《烟台条约》，清政府又被迫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减低外货税率。以后，英国又通过《藏印条约》和续约，逼迫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进口货物 5 年不纳税的特权。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又被迫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

口岸，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销往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允许在内地设栈寄存。

大量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协定关税原则的确立，为外国货物的倾销创造了条件。从 1871—1873 年，中国年平均出口 11 亿元，进口 10.6 亿元，出超 4000 万元；到 1881—1883 年，中国年平均出口 10.8 亿元，进口 12.6 亿元，入超 1.8 亿元；到 1891—1893 年，中国年平均出口虽增至 16.7 亿元，但进口骤增至 21.9 亿元，入超达 5.2 亿元。又如煤油，美国于 1878 年向中国输入 1570 万公升，到 1891—1893 年，已增加到年平均输入 17600 多万公升，从此中国开始了使用所谓“洋油”时代。其他如“洋漆”、“洋钉”、“洋火”等输入，也逐年递增。这些洋货大量输入，使得中国的白银源源外流，加剧了中国财政的枯竭和群众生活的困难。

其次，勒索大量赔款。

巨额的赔款，都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确定的。例如《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偿鸦片费、军费 2100 万元；《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分别赔偿白银 800 万两；《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 2 亿两。后来归还辽东半岛时，又勒索白银 3000 万两。

除以上主要赔款外，各强国还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地进行勒索。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广州勒索赎城费 600 万元，在宁波勒索犒军费 120 万元，在江宁勒索犒军费 300 万元，另外还勒索赔偿英人损伤费 66 万多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分别勒索抚恤费白银 50 万两和 20 万两。1874 年日本派兵侵扰台湾，还向中国勒索赔款白银 50 万两。

随着传教士的增多、教堂的建立和各地反洋教斗争，列强还从所谓“教案”中勒索了大量赔款。如 1870 年“天津教案”发生后，英国勒索赔偿费白银 48.7 万多两；1886 年“重庆教案”，英、法、美三国勒索赔偿费白银 23.5 万多两；1891 年“宜昌教案”，英、法、美三国勒索白银 17.5 万多两；1897 年山东“巨野教案”，德国勒索赔偿费白银 22.5 万多两。

在 1842 年以后 60 年间，仅中国对各强国的主要赔款，就约折合 195300 万银元，相当于 1901 年清政府国库收入的 16 倍、全国工矿总资额的 82 倍。这样巨额的赔款，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沉重负担，而给列强增加了巨大财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赔偿的 23000 多万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库收入的 3 倍。如按当时日本 1 亿人口计算，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白银 2.3 两。日本正是利用这一笔巨额赔款，加速了军事和工业的发展。后来它在中国设立的许多工厂，也是利用这笔赔款创办或发展起来的。

其三，控制中国的海关。

在鸦片战争后，除粮赋和盐税两大项外，海关税收越来越成为清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这项收入很快为西方列强所把持。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捣毁了清政府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海关。由于列强的阻挠，这个海关恢复困难。苏松太道兼上海海关监督吴健彰，第二年与英、美、法领事签订协定，聘请外国人担任上海税务司。按照这个协定，由英法美各一人组成上海的关税管理委员会，开创了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殖民地制度。几年后，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原任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1863 年，由英国人赫德继任，他担任这一职务 45 年之久，一

直到 1909 年。

西方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中国的对外赔款要从海关收入中扣交，外国的各种勒索和清政府向各国的借债，一般要由关税收入支付。因此，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实际上起着监督中国海关收入，以保证对外赔款、借债及各种勒索如期偿付的作用。

赫德及其任命的各个海关税务司，由于把持了中国的海关，不但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清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还在很多事情上左右了清政府的外交、军事、政治及人事。正如改良主义者陈炽在《庸书》中不指名地批评所说：“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资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

其四，建立银行，高利借贷，控制中国的金融。

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不平等条约上并没有规定，因此并没有条约根据，完全是它们凭借在中国的特权设立的。这些银行主要有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等。

这些银行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中国发放高利贷款，操纵中国金融。如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上半期，汇丰银行先后对清政府贷款 2900 万库平两，占 1894 年以前清政府全部外债 4600 万库平两的一半以上，其中百万两以上的大宗借款，即多达 14 起。甲午战争后，各国银行为了从经济上控制中国，争相向中国发放贷款。在《马关条约》订立后的四年间，清政府为交付赔款七次向外借债，其中数额最大的有：1895 年的俄法借款，1896 年的英德借款和 1898 年的英德续借款，每次借款额都是白银 1 亿两。

外国银行从这些对华贷款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如俄法借款到 1934 年还清时，银行所得利息超过所付本金 130.2%；英德借款到 1934 年还清时，银行所得利息超过所付本金 152.7%；英德续借款到 1934 年止，所得利息已超过所付本金 164.8%。仅这三笔借款，就使对日 2.3 亿两的赔款，一下子变成了对俄、法、英、德的 7.5 亿两的外债。这样，西方列强就通过开设银行和借款，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其五，在中国开设工厂，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

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外国资本就开始在中国设立工厂。开始主要是船厂，后来逐渐扩展到各个领域。据历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统计，在 70 年代上半期，外资在华企业有 340 余家，洋商 3000 多人；到 90 年代上半期，外资企业已增至五百数十家，外商增至九千数百人。在甲午战后的 5 年间，各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达 933 个。这些工厂，掠夺了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

列强在中国设立的这些企业，垄断了很多行业，如进出口贸易、航运和某些制造业等，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例如航运业，美国 1862 年在上海设立的旗昌轮船公司，很快垄断了长江上的航运。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后来居上，成了垄断中国沿海和内地航运业的主要力量。在这些公司的垄断下，中国的民族航运业始终没有得到发展。

其六，疯狂地进行抢劫和掠夺。

陈炽：《庸书外编·税司》卷上，第 14 页。

徐义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7 年第 4 期。

直接进行抢劫和掠夺，也是各国侵略者搜刮中国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就在厦门掠夺官库 2 万元，还变卖其它财物；在舟山变卖财物 3.5 万多元；在镇海变卖财物 6.5 万多元；在宁波掠夺官库银元、铜元共值 28 万银元，变卖财物近 1.6 万元；在镇江掠夺官库 7 万元，只此 5 处就抢走 63 万多银元。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更是大肆烧杀抢掠，仅在圆明园抢走的财富就不计其数，其中一个法国团指挥官抢走的珍宝，值 80 万法郎以上。法军统帅葛罗供认：他手下参与掠夺的士兵，每人“口袋里都有 2 万、3 万、4 万，甚至 100 万法郎”。后来他们在天津拍卖的一部分贵重物品，高达 3000 万法郎以上。英国陆军军官赫里斯抢到的珍宝，装满 7 大筐。英军头目戈登供认：他们离开圆明园时，军中每个人都获得 45 磅以上的掠夺品。英军运载掠夺物品的车队，足有两法里（法国里程）长。对于拿不走或来不及拿走的贵重物品，他们竟全部毁坏。据在场的英军书记官斯文侯回忆说：“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这些强盗在大肆抢劫和破坏之后，竟放火焚毁了这座人类艺术的宝库——“万园之园”。当时一个参加焚园的侵略分子记载说：大火点起之后，“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及其中收藏的“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物杰作，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

随着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他们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落后的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是，它们对中国的疯狂压榨和掠夺，也使中国的财政经济更加困难，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并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使大批群众破产失业，流离失所，生活更加穷困。

各国列强勒索的大量赔款等，清政府都把它们转嫁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头。早在鸦片战争后，马克思就在《中国的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在 1840 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

这种情况，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深，越来越严重和突出。例如山西省从 1896 年开征烟酒税，到 1900 年，全省人民每年负担的这两项捐税达 20 余万两。四川巴县新增加的苛捐杂税即所谓“新捐输”，每年 1.9 万两至 3.3 万两，加上“常捐输”岁银 1.5 万两至 1.7 万两，“较正供几近十倍”。山东巨野县的赋税，到 1900 年间便增加两倍。因此，清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外国列强的税吏；而中国人民则成了供养列强的纳税人。

外国货物向中国的大量倾销，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成批设立，还使无数的中国人失去了传统的谋生之道，许多行业纷纷破产。例如外国轮船公司对航运的垄断，就使许多船夫和与此有关的人失业。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光绪元年（1875 年）就说：外国“轮船入中国，而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

之红单船全失其利。侵寻而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逾半。”又如大量洋货的输入，使中国的传统手工纺织业等逐渐减少，甚至废弃。正如郑观应所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工生计，皆为所夺矣。”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灾荒，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无法生活下去。在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许多省份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 1896 年湖北发生大水灾后，张之洞在电奏中说：灾民“饥寒交迫，……多食草根、树皮、观音土，惨不忍睹，以至饿殍枕藉”。1897—1898 年江苏北部发生大水灾后，“饥民数十万，灾区数十县，颠沛流离，死亡枕藉”，“沿途售儿女者纷纷”。

从以上可以看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除了侵占和瓜分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列强还一步步侵犯中国的主权，使中国逐渐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首先，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和依据自己的法律审判外国人的权利，而且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按照国际公法，各国的关税完全由各国自己决定；对于违犯法令的外国人，各国政府完全有权依据本国法律进行处理；至于给各国的待遇，亦由各国自己决定。但《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的进出口关税由双方“议定”；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犯罪也不能由中国人处理，须交给英国人处理；以后中国若“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样，就使英国享有了所谓关税互议、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所谓关税互议，实际上是由英国人自己决定。

这些特权，在 1844 年的《望厦条约》中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使中国完全丧失了自主决定关税、审判外国人及给别国什么待遇的权利，而且这些规定从此都成了惯例，成了任何一个强国到中国后都可以享受的特权。

其次，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以至内河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

按照国际公法，外国船只到一个国家的沿海特别是内河航行，要经过该国的批准；外国人到一个国家活动，也要经过该国的允许。可是《南京条约》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每一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停泊一艘“官船”，从而开创了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可以自由进入中国领海以至内河的先例。1844 年的中法《黄埔条约》则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中国政府必须加以保护，从而又开创了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的先例。

这些特权，在后来的不平等条约中又进一步扩大。如《北京条约》规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1 册，第 138 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第 7 卷，第 20 页。

《张文襄公全集》第 79 卷，第 8 页。

《湘报》第 7 号，第 28 页。

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可在各通商口岸及长江一带自由往来，外国人可在内地自由游历、通商和传教。《马关条约》则规定：日本人可以在各通商口岸自由设厂，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这样，中国对领海及内河航行、限制外国人随意活动的主权完全丧失了。

其三，在各大城市设立租界，使它成为“国中之国”。

租界是在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重要特征。最早设立租界的是英国。1843年，英国领事巴富尔到上海，经道台同意租了城外黄浦江边的130亩荒地，设立了英国领事馆。1845年，英领事与上海道台订立《上海租地章程》，使租界成为一种永租制，成为独立于中国法权之外的独立王国，并承认了英国在这个王国中的最高权利。1846年，英租界扩大到1080亩，后来又扩展到2800多亩。1848年，美国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扩展到近8000亩。1849年，法国也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扩展到1200多亩，最后竟扩展到2万多亩。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扩展到8万亩以上。第二年，公共租界内出现一个被称为工部局的机关，设立各种机构管理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等，还设有法院，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市政府。这个政府不受中国人的管辖，完全维护外国人的利益。1869年成立的“会审公廨”，就是专门袒护外国人的审判机关。上海领事团曾明确指示：“凡与外国个人、外人团体或外国商人有关的案件，判决都必须与外国人有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承认：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杀死了中国人的外国人被租界法庭判过刑。

后来，这种租界陆续在中国的其它大城市设立。在中国设有租界的有16个国家，其中以英、俄、日三国所占的最多。仅在甲午战争以后的数年间，日本就在天津、重庆、杭州、苏州、沙市、汉口、厦门、福州、沈阳、营口、安东设立了11处租界。

外国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租界，实质上是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略据点，向中国当地政府发号施令的基地，进行走私鸦片、拐卖人口等罪恶活动的渊藪，各国冒险家的乐园。走私鸦片利润高、赚钱多，各国商人和冒险家竞相从事。特别是上海的法租界，一度成为走私鸦片的黑窝。法租界当局开始每月可从烟土中征收12万元的特别税，后增加到18万元。贩卖人口，也是在租界内经常进行的无耻活动。有报道说，当时外国“水手每于傍晚时登岸掠人”，遇到少数中国人即用“布囊连头一罩，即肩荷而去”，有时人口贩子还窜到附近城市乡村捉人，或用诱骗方式拐卖。

其四，践踏中国人的人权，任意欺凌、奸淫、贩卖、残害、屠杀中国人民。

各国列强侵入中国以后，把中国人视为“东亚病夫”，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甚至视中国人连猪狗都不如。如上海法租界公园章程第一条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而第二条规定“有人牵着或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园”。1885年，工部局花园管理委员会竟在公园门口，公开树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列强还利用各种手段贩卖中国的人口。在《北京条约》中，就强迫清政府写上了准许外国人招收中国人到外国的规定。特别在沿海各省，勾结当地的地痞流氓，成立专门的贩运机构，以拐、骗、绑架等各种手段，大批地把中国人当作“猪仔”贩运到国外当奴隶。19世纪70年代，仅从香港运出的华工就达50万人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各地的华工达到2200万

人。在运送这些“猪仔”的密不透风的大船即“活动地狱”里，很少给饭吃和给水喝，“猪仔”们“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运达目的地后有的死亡率竟高达 45%。他们被送到国外后，都是“做一生奴，永无脱身之日”。

不仅如此，各国侵略者还与清政府一起，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血腥地屠杀中国人民。1853—1855 年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就是西方列强协助清政府一起镇压的。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美国流氓华尔和法国军官勒伯勒东分别组织了“常胜军”和“常捷军”。据英国人呤喇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所作的统计，仅在江浙部分地区，外国人和清军就屠杀了近 40 万人，死于饥荒者达 250 万人以上。仅外国军队单独对太平天国规模较大的屠杀就有：1861 年 12 月华尔洋枪队在松江打死太平军 2000 多人；1862 年 3 月 1 日英法联军在闵行打死太平军 1300 多人，5 月 20 日又在柘林镇打死太平军 3000 人。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在谈到失败的原因时，就曾说：“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以后，在外国侵略军占领的地方，这种大屠杀更是到处发生，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占领旅顺后进行了 4 天大屠杀，仅剩下最后用来掩埋尸体的 36 人。

四、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在疯狂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各国列强还加紧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首先是广泛传播西方宗教，企图假“上帝”之名征服中国人心。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基督教的三个主要教派，即天主教、新教（在中国称“基督教”）、东正教，都派来了不少传教士，在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开展传教活动。

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些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善的，做了一些有利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好事。但总的来说是作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工具被派来的。他们传教的直接目的，是征服中国的人心，麻痹中国人的斗志，为其扩张和侵略服务。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曾说：“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为此他们极力宣传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博爱”思想，说“爱”是永恒的，人不仅要“爱”自己人，还应该“爱”自己的敌人。为了让中国人接受这些思想，他们援引中国的儒学经典，传播一些科学技术，以作为掩护。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一书中，就援引孔夫子“仁”的思想说：“仁则无爱不爱，善我者固爱之，恶我者亦怜而爱之”，要以仁德化人，“欲人无报仇之心，不记仇敌之犯我”。在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国的时候，宣传这种超阶级的“爱”、对敌人的“爱”，只能起到为侵略者服务的作用。

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有的传教士还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如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等。这些“慈善”事业有些起了好的作用，但有的只是以“慈善”为名，虐待病人和儿童，甚至拿他们像老鼠、兔子一样作为试验品，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就是一个虐待、残害儿童的机构，它收养的大部分儿童都没有能活着出来。

有些传教士名为传教，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的间谍。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就是一个典型。从 1831—1838 年，他到中国沿海进行了 10 次间谍活动，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1832 年，他甚至潜入上海吴淞炮台，详细了解炮台的结构、武器性能、守军素质等等，从而得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结论。

他的同伙胡夏米据此直接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建议。当英军攻占宁波、舟山后，郭士立还担任舟山民政官，直接指挥英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南京条约》签订的过程中，他还为英国尽力敲诈勒索。这样的“传教士”，完全是赤裸裸的刽子手。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也是它派到山东的传教士安治泰的主意。德皇曾满意地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天主教士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做我的宾客，他以中国各项的重要事情报告我。”

其次是推行奴化教育。

在西方传教士所办的“事业”中，学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十分看重教育的作用。早在1836年，他们就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鸦片贩子颠地被推举为会长。该会通讯秘书、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说：“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业刺激以及任何其它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在各地创办教会学校。1877和1890年，他们在上海举办了两次全国性会议，强调学校教育要为传教事业服务，培养对他们有用的人才。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认为：“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们的光走”。从此之后，教会学校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专科、大学的完整的教育系统。

在教学过程中，这些学校通过各种活动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传播奴化思想。他们十分重视英语的作用，认为用英语教学可以排除学生排外的成见，增进东西方人的情感等等。与此同时，极力削弱甚至取消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磨灭学生的民族意识。有的教师，甚至公开教学生不要爱国。广西梧州建道学院的美国教师便在课堂上说：“我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其它中国学生往来，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来爱我们的美国。”上海一所大学的美国教师也说：“你们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绝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的余地。”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在传播文化知识方面起了好的作用，但也向学生灌输了不少奴化思想。

另外，他们还出版各种报刊，宣传“种族优劣论”、“侵略有理论”等，为其侵略中国制造理论根据。硬说白色人种最优秀，而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有色人种视为劣等民族，认为有色人种理应由白色人种统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中，公然说什么印度由于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才使“弱者转为强，贫者转为富，愚者转为明”，出现“太平盛世”。中国要想富强，就应走印度的道路，接受英国人的统治。具体办法是先在东南部选两个省租给英国治理，然后再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国，这样用不了50年就可成为富强发达之国。这是多么赤裸裸地“侵略有理论”！

五、清朝封建统治者逐步变成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清朝封建统治者开始还是想尽力抵制外国侵略的。在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曾派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在战争过程中，也指示各地进行抵抗。但是，由于阶级本质所决定，他们不敢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而本身又已腐败不堪，因而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就妥协了，不得不被迫签订一个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后来，西方列强来打中国，清朝封建统治者又是这一套，始而想抵抗，很快又妥协，于

是再签订一个个更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例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一会提出要“决战”，一会又说“断不可轻于一试”，要“反复开导”，以“暂时羁縻”。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咸丰立即委曲求全，说列强“业已入城，一经驳斥，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妥协态度，更加涣散了民心 and 士兵的斗志。焦裕瀛在奏报中就指出：“抚议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无斗志，亦复民无固心”。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妥协退让，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妥协退让的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者看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虽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但也不想把它的统治推翻，相反可以利用、依靠西方列强的力量，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又转而投靠西方列强，主动与西方列强相勾结。1861年，慈禧发动政变时，加给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罪名，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当时，奕訢还提出要“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在此前后，各地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也起而组织“湘军”、“淮军”，坚决向农民起义军进攻，并与西方列强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从此，清朝封建统治者逐渐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但是，地主阶级的开明派却坚决主张抵抗西方侵略。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等就既不同于妥协派，也不同于昏聩而又妄自尊大的顽固派，一方面坚主抵抗侵略，一方面又睁开眼睛看世界，承认西方技术和武器比中国先进，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及某些变法改革的进步主张。

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技术落后，要适应“古今中外大变局”的形势，需要进行经济、军事的变革，于是提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兴办军工和民用企业以“自强”的主张，搞起了洋务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民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开始建立发展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和西方列强联合镇压了各地的农民起义，洋务派的活动又给封建统治注入了新的力量，因而封建统治者不仅渡过了内外交困的危机，而且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

洋务运动虽然在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促使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起过开拓作用，但由于它并不改变而是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中日甲午一战，新崛起的小国日本，一举摧毁了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和陆军，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不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只靠兴办一些新式工业和采用一点新式武器装备，要达到独立和富强是不可能的。

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朽和腐败，因而就更加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即使中法战争中本来中国打了胜仗，却仍然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更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两亿数千万银两的赔款，全都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于是加赋、加税、加捐，各种苛捐杂税一下子增加到数十种之多；而贪官污吏又诛求不已，借机中饱私囊，就愈加重了劳动人民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66 卷 14 页。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60 卷 25 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2 卷 9 页。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79 卷 17 页。

的负担，再加上水旱灾荒，人民难于生活下去，出现卖儿卖女、饥荒遍野的惨状。康有为、梁启超号召救亡图存，发动变法维新运动，遭到残暴镇压，谭嗣同等被杀害，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拒绝任何改革。列强的贪欲有增无已，在中国任意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矿藏，争夺在中国的开矿和筑路权。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冒险分子也到处进行敲诈勒索，或鼓动教民闹事，欺压百姓。清政府对广大人民的痛苦悲惨生活毫不顾惜，而对人民稍有不满或反抗，则立即施行残暴镇压。在教会、教士或所谓教民与中国民众的纠纷中，清政府毫无例外地偏袒洋教洋人乃至所谓教民，而迫害百姓，更增加了他们的横行。列强侵略不已，清政府的压榨和腐败不已，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自发的反抗斗争不已。整个中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六、人民的英勇反抗与资产阶级的维新

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清朝统治者逐步变为他们的统治工具之日起，中国人民就一面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面反抗清朝的封建统治，开始了两方面的英勇斗争。

在鸦片战争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爱国将士，就不顾武器的落后，奋起迎敌。在爱国将士中，有保卫虎门、定海、镇海、吴淞等地，英勇献身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副将陈连升，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江南提督陈化成，以及汉、满、蒙、藏、羌、彝、土家等民族的英勇士兵。对于镇江守军的英勇抵抗，恩格斯高度赞扬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 1500 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除此之外，英国侵略者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地，也遭到了广大群众的反抗。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斗争，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们“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致使英军伤亡甚众，“乞命之声震山谷”。这些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为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斗争，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为了付清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于是，人民群众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1851 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发动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并于 1853 年占领南京。在 14 年的斗争中，太平天国涌现出了林凤祥、陈玉成、李秀成等一大批杰出的将领，给了清王朝及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与外国侵略者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的生死搏斗，体现了中国人民勇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口号，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理想，表达了广大农民推翻封建统治的决心。这次农民起义，把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的斗争推到了最高峰。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各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反抗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在淮河流域，发生了张洛行等领导的捻军起义；在上海，发生了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在广西，发生了吴凌云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朱洪英、胡有录领导的“升平天国”起义；在广东，有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在福建，有黄得美领导的“双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红钱会”起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189—190 页。

《夷氛闻记》，《鸦片战争》第 6 册，第 43 页。

在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在云南，有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回民起义，李义学领导的哀牢山彝民起义，蓝大顺、李永和领导的昭通各族人民起义；在山东，有白莲教起义，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起义；在西北，有陕甘回民起义……这些起义此伏彼起，遍及各地，与太平天国起义相呼应，形成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反封建斗争的高潮。

但是，太平天国和各族人民的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都先后失败了。这说明，仅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的。

在此之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加深，中国人民在坚持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又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外国侵略者，在各地发生了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如“天津教案”、“重庆教案”、“宜昌教案”、“巨野教案”，以及四川大足起义、安徽芜湖起义、热河朝阳起义等等。在反侵略斗争中，广大爱国将士也继续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奋勇破敌，黑旗军领袖刘永福援越抗法，取得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等爱国将士壮烈献身；为保卫台湾，徐骧等领导的义军浴血奋战，也大部牺牲。

在广大人民坚持英勇斗争的同时，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则顺应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逐步提出了实行变法的改良主张，企图通过政治的革新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达到“救国自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1875年就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洋的轮船枪炮，还应学习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他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未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第二年他出使英法，认真研究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进一步宣传这种主张，有的人竟骂他是“汉奸”，“有二心于英国”。在他之后，宋育仁、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改良主义思想。宋育仁批评洋务派说：“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主张从制度上进行改革。1893年，陈炽在《庸书》中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实行议院制度的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面对全国被瓜分的危险，康有为提出了更为明确而激烈的变法主张。在上皇帝第三书中，他尖锐地指出：“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讷，祸在旦夕，而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若非大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宣传进化论和民权思想，在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民族工商业，以使国家独立富强。但是，戊戌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说明，不根本推翻封建统治制度，想通过改良的道路以实现救国自强，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孙中山于1894年成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138页。

《时务论》，第1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资料》第2册，第166—174页。

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并于1895年准备发动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虽因事泄而失败，但革命力量正方兴未艾。它代表了新兴的阶级力量和新的正确方向，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正在到来。

与此同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也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它虽然一时还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它的出现，已显露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丝新的曙光。

灾难深重的中国，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清朝统治者更加腐朽，完全变成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广大农民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斗争风暴，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斗争方向；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已经失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工人阶级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艰难地步入了20世纪。

19世纪中国的所有灾难、矛盾和斗争，都被带进了20世纪。这预示着20世纪的中国，斗争将更加波澜壮阔，变化将更加迅速和巨大，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正在到来。

第一章 清政府的朽败

一、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当 19 世纪历史的帷幕即将落下、20 世纪历史的纪元就要揭开的时候，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旧式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尽管它发生于 19 世纪最后几年，但却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行程，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强、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形势下爆发的。它是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的一场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也是 19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的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

义和团运动首先发生在山东，这决非偶然。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侵略权利的斗争，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个瓜分狂潮首先就是由德国在山东掀起的。1897 年 11 月，德国利用两名传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杀一事，派兵在胶州登陆，并于次年 3 月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强占胶州湾，将山东变成其势力范围，攫取了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特权。英国则起而效尤，强占了威海卫。山东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帝国主义分子在修路和勘矿中，大量侵占农田，破坏水路，拆毁房屋，造成数以万计居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因而激起人民群众广泛的不满和愤怒。这种不满和愤怒，在朴素的农民群众的心目中，便被简化为对“洋人”的仇恨，而当时充当帝国主义侵华急先锋的教会和传教士，首先成为攻击的目标。

就山东而言，到 19 世纪末，全省 108 州县中，共有教堂 1300 多处，教士 150 多人，教民 8 万人，有教会活动的州县达 72 个。这些教会和传教士并非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有的是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甚至出于人道主义办医院，建学校，但确也有些教会和传教士为非作歹，纵容教民，欺压百姓。但是，当时的中国农民和市民没有科学的理论政策指导，对此不可能区别对待，一概将他们作为“罪恶的洋人”予以打击，带有排外主义的色彩。1898 年 10 月 25 日的山东冠县梨园屯有些教民依仗教会势力和官府的庇护，企图强行拆除该村玉皇庙以改建教堂，于是引发了一场当地人民反教会的斗争。这一斗争在赵三多、阎书勤领导下，联合周围 18 村乡民，第一次公开采用义和拳名义，并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啸聚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首先焚毁境内天主教教堂，从而揭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第二年 9 月，由朱红灯领导的平原人民反教会斗争，同样也是由于当时恶霸教民欺压村民而引发的，他们率领义和拳群众，竖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大旗，活动于恩县、平原、茌平、高唐、长清一带，焚烧教堂，惩处欺压村民的恶霸教民，还在杠子李庄和森罗殿两地，武装抗击前来镇压的清军，因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此后，山东省的群众纷纷投身到义和团运动中去。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山东的蓬勃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们的恐惧。他们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要挟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于 1899 年 12 月 6 日，下令罢免山东巡抚毓贤，以袁世凯署理。袁世凯抵达济南后，即发布《查禁义和团拳匪告示》，并派兵残酷镇压义和

团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于是，从 1900 年春起，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就逐渐由山东转移到直隶。

直隶义和团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发生在涞水县。1900 年 5 月，涞水县高洛村村民不堪教士教民欺凌，“飞帖啸聚定、新、涿、易、涿各州县拳民”，焚烧教堂和数十家教民房屋，并惩处作恶教民，后又“转往定兴县仓巨村，烧教民房十数家”。5 月 12 日，清军分统杨福同率军前来镇压。涞水县石亭村义和拳传帖邀约新城、定兴、容城、房山、涿州、易州各地拳民共数千人，反抗清军镇压，并设伏刺死杨福同。这是义和团运动发生以来影响较大的一次击毙清军将领的事件。5 月 27 日，义和团群众约 3 万人又乘势占据涿州，涿州知府龚荫培，束手无策，遂绝食自毙。于是，义和团运动迅速蔓延到广大地区，甚至向大城市发展。5 月 28 日，义和团还张贴告示，宣称“义和神拳”的宗旨是“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1900 年春，天津城内已有义和团活动。他们“痛诋洋人，仇视教民”，张贴匿名揭帖，号召群众抗击洋人，并有“定于三月初一起事，攻打外国租界”之说。5 月，张德成在静海成立“天下第一团”，随之率团进入天津。此后，天津义和团迅猛发展，各处纷纷立坛。

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周围地区的迅猛发展，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惧和震动。如何对待义和团，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军机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封疆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则主张镇压义和团，以免引起外国干涉；而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刚毅等人，则主张利用“扶清”的义和团，作为报复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由于戊戌政变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支持光绪帝，反对西太后废帝立储，乃至扬言要西太后归政，因而西太后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所以，主抚派的意见迎合了西太后的心理倾向，得到了她的支持。6 月 9 日，西太后召集亲信密议，基本上确定了招抚方针，并调遣董福祥甘军进驻北京城。6 月 10 日，西摩率侵略联军 2000 人左右，不顾清廷抗议，自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此后，在西太后默许下，大批义和团群众涌入北京城。由于先前入京护卫使馆的侵略军在各国使馆官员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蓄意挑衅，乃至驱赶、枪击、炮轰义和团和中国居民，激起群众愤慨。于是，从 12 日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居民支持下，开始焚烧城内教堂、洋楼和教民房屋。天津的义和团也焚烧城内的天主教堂和洋房。6 月 13 日起，天津义和团攻打租界。6 月 15 日起，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是日午夜，天津义和团也焚烧望海寺旁教堂及马家口教堂。清政府见义和团已成燎原之势，既不能解散，也不能剿杀，只宜招抚，于是，下令对义和团“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并责成刚毅、董福祥负责此事。于是，义和团纷纷“至庄亲王府挂号，报到”，“听候转牌调遣”，并在团旗上大书“奉旨”字样，自动接受清廷指挥。6 月 17 日，列强侵略军进攻并占据大沽炮台。消息传到北京，进一步激怒了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6 月 19 日，西太后召集的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并下令各国使臣“于 24 小时内下旗出京回国”。6 月 20 日，义和团配合董福祥所部甘军及武卫中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同日，清军虎神营士兵在东单牌楼处，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6 月 21 日，清政府正式发布对外宣战诏书，同时明令嘉奖义和团为“义民”，并下令各省督抚“招集成团，藉御外

侮”。在北方各省份，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顶峰。但必须指出的是，从此以后，义和团运动便开始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尽管它在配合爱国的清军官兵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壮史诗，但同时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清政府的工具。其次，自从义和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随着其人数与规模的急剧发展，其自身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上至王公贵族、富豪仕宦，下至帮会、流氓头子，争相立坛练拳，挂起“义和团”的招牌。他们逆义和团宗旨行事，或挟嫌报复，对其仇人“任意妄拿”；或借机抢劫烧杀，借端勒索，尤其是利用“灭洋”之旗号，肆无忌惮地摧毁一切外来的近代文明事物，从而把义和团运动中本来就存在着的愚昧落后的一面推到了极端。因此，可以说，清政府招抚的决定，既把义和团运动推向顶峰，又把义和团运动纳入死胡同。第三，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招抚义和团，只是为了利用义和团声势以发泄其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怨恨和不满，并非真有实力和决心与列强周旋到底。“宣战”诏书颁发后，即遭东南督抚的强烈反对，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拒不奉旨派兵，公开宣称那是“伪诏”，且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互保章程。而护卫京津的清军装备窳劣，素质极差，在侵略联军的攻击下，望风溃逃。在内外压力下，阴诈的西太后很快就转变态度，由“宣战”走向求和。于是，剿灭义和团，便成为她开脱自己、讨好列强的第一步骤。9月7日，出逃中的西太后正式发布“剿团”谕旨，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结果，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悲壮地失败了。

二、八国联军的野蛮侵略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因而引起他们极大的恐惧和仇视。当义和拳在鲁西北的活动刚刚展开时，当地的传教士就纷纷要求英、美、德、法等国公使胁迫清政府对地方官吏施加压力，镇压义和团。清政府顺从他们的要求，撤换了镇压不力的原山东巡抚张汝梅及其继任者毓贤，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后，即对鲁西北义和团实行血腥镇压。

当义和团运动在直隶迅猛发展起来后，1900年5月31日和6月3日，帝国主义列强以护卫使馆名义，调遣在大沽的海军426名，分两批进入北京。列强的这一行径，自然激起群众的强烈反感，北京城内形势益发紧张。6月4日，外交使团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直接出兵镇压义和团。6月8日晚，各国驻京公使得到各自的政府授权后，分别致电驻津领事，请求火速调兵进京，保护使馆。各领事连夜举行会议，决定组织联军北上，并推定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统帅。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为副统帅。6月10日，西摩率英、美、奥、意、俄、法、德、日等八国联军2000人左右，不顾清政府阻拦，强行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发，从而揭开了帝国主义列强大规模武装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序幕。6月16日，驻津各国海军军官会议，决定向驻守大沽炮台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威逼清军于次日凌晨2时前“交出炮台”，遭拒绝。侵略军即于凌晨进攻大沽炮台，罗荣光组织守台清军英勇抗击，坚守6小时，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清德宗实录》，卷468。

因守军伤亡过重，援兵又不至，炮台失守。侵略军随即占领附近的塘沽、新河等村镇，并大肆烧杀。他们还多次派兵向天津租界开进，企图与驻守租界的侵略军会合，但遭到围困租界的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直到 23 日才闯入租界。此后相继进入租界的侵略军达万人以上。7 月初，天津义和团配合清军与侵略者展开激战。9 日，侵略军派重兵进攻城南海光寺一带，聂士成率部迎战，虽多处受伤，仍持刀督战，“奋不可遏”，后中炮阵亡，壮烈牺牲，所部溃散，侵略军乘胜由海光门冲入市区。

与此同时，7 月 12 日，俄国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在天津主持列强司令官会议，决定次日分左右两路攻打天津城。13 日凌晨，各国侵略军按计划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清晨 5 时，侵略军向天津城猛烈炮击。侵略军左路自东及东北方向，右路自西、南方向，夹攻天津城。守城清军与义和团群众对侵略军进行顽强抗击，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正当义和团及部分爱国官兵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天津之际，原直隶总督裕禄等军政官员却仓皇率队逃离天津，退驻北仓。结果，“城内各官俱行逃避”。7 月 14 日，天津沦陷。

侵略军占领天津后，一面对义和团群众及居民进行疯狂的屠杀，一面则肆行抢劫。李然犀在《庚子沦陷后的天津》中记载：“拂晓天津城破，居民争向北门逃走，多被洋兵打死街头。洋兵大肆抢掠，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是再抢其它商店和大户人家，各衙署也都被捣毁，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带，如城北的估衣街、锅店街、竹竿巷、肉市口都遭洗劫。城东的官南、官北、小洋货街一带，尽被抢光。同时奸淫妇女，整整闹了 3 天。”

天津陷落后第二天，阿列克谢耶夫召集各国高级军官开会，提议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后来加上德国）各派军官一名，组成委员会，对天津城、天津县、宁河县全境以及塘沽和北塘地区进行统治，直到 1902 年 8 月，这个殖民统治机构才撤销。

侵略军占领天津后，由于日军大量补充进来，其总数达 2 万人，于是分左右两路沿运河北犯。沿路清军曾进行抵抗，均因兵力和武器悬殊而失败。8 月 7 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命即日与各国电商和议，先行停战，但遭列强拒绝。13 日，联军抵达北京城下。是日，联军头目在日军司令部会议，决定 14 日进攻北京城。

13 日晚，俄军为“攫取先入北京所带来的一切荣誉”，乘夜率先向北京进军。其它各国侵略军闻讯后也争先恐后连夜向北京进发。14 日凌晨，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英军攻广渠门。由于东便门守备薄弱，上午 11 时被攻破；广渠门也于下午 2 时被攻破；东直门、朝阳门的进攻，受到守城清军的顽强抵抗，直至晚 9 时才被攻破。但内城大部及紫禁城，仍在清军据守中。是日晨，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只有少数王公大臣并兵勇千余随从护驾。西太后一行经居庸关逃到太原，后又逃到西安。16 日，北京陷落。

联军攻陷北京后，公然“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后又以搜查义和团名义继续抢劫，北京城遭到一场空前浩劫。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事后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也供认：“联军占领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 3 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的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

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日夜包围各坛口，仅在庄王府一处，就屠杀和烧杀 1700 余名义和团民。有一次，一队法国侵略军用机关枪把一群逃难群众逼进一条死胡同里，然后进行扫射，“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在杀戮抢劫的同时，又纵火焚烧。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也承认：“城里的寂寞和荒凉，也正和城外一样，除了残毁、残毁、残毁之外，是再没有其它的东西了。”“一座昔日充满着辉煌的金漆房舍的北京城，现在可只是一片罗列着萧条残物的荒野”。

自视为先进文明国家的联军，来到被称为野蛮落后的中国，干的却是人世最为野蛮、残忍、卑劣的烧杀淫掠的强盗行径！侵略军的野蛮侵略和强盗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直隶全省几乎全遭蹂躏，在行军线上或者靠近行军线的村庄以及很大一部分较为重要的城镇，完全被摧毁了。北京大片大片的地区成了瓦砾堆。人口超过 75 万的天津，有 1/3 被烧毁了。在通州这个有 8 万人口的、有城墙的城镇，几乎没有一座房子是完整无损的。”

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实行军事占领，划区管理。12 月 10 日，在瓦德西倡议下，各国联军头目又组成“管理北京委员会”，名义上是负责管理北京城的治安、卫生、民政、财政、税务等，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机构。

联军占领北京后，还继续派遣军队，四出攻掠，残害人民，蹂躏地方。瓦德西统率德军 2 万名到华后，任联军统帅。10 月 12 日，他派德、英、法、意等国侵略军约 1 万人，从北京、天津两地出发，四出侵扰，西至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抵直鲁边境，所到之处，无不焚烧掳掠，对中国人民又犯下滔天罪行。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还通过“中外互保”形式，在南方进行侵略活动。东南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在英国的策动和美国、日本等的支持下，由大买办盛宣怀撮合，指定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于 6 月 26 日邀上海各国领事在会审公廨开会，将预拟的《中外互保章程》9 条和《上海城厢内外章程》10 条，提出来讨论。随后，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保证维护“秩序”，保护洋人生命财产。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代表各国领事宣布不向长江进兵，不在上海登陆。双方都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先后参加“互保”的，除两江和湖广总督管辖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 5 省外，还有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四川、陕西督抚也表示支持。这些省份联成一片，反对并镇压义和团运动，抵制清廷宣战诏书，这不仅削弱了反帝斗争的力量，也进一步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加重了清王朝分崩离析的局面。

三、《辛丑和约》的签订

《义和团》（三），第 31—34 页。

《义和团》（五），第 358 页。

绿蒂：《到北京去》。《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第 1118 页。

汤姆逊：《中国与列强》，第 131—132 页。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的西太后于10月26日到达西安，建立了流亡的朝廷。与列强议和，即彻底向帝国主义屈服，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成为西太后心目中唯一关注的问题。

李鸿章与各国谋和失败后，8月27日，清廷按列强的要求，授奕劻“便行事”的全权，令其“即日驰回京城”，“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8月31日，又下令添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随时函电会商”。但列强对是否与中国开议，由于各自利益不同而意见分歧。各国公使及中外双方经过近4个月的争斗和磋商，12月20日，列强才提出包括惩凶、赔款、谢罪、在天津至北京一线驻兵等12条内容的《议和大纲》。1901年1月6日，奕劻、李鸿章致电军机处，拟顺应各国公使的要求，对议和大纲先行画押，细节“于画押后从容计划。”1月10日，清廷复电同意。1月15日，奕劻、李鸿章正式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2月14日，清廷发布“悔过”“自责”的上谕，表示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公开宣示中外，它决心充当帝国主义列强驯服的奴才。此后，帝国主义列强便就具体细节，进行了长达8、9个月的争论，其焦点是惩凶与赔款两个问题。

关于惩凶、当时以俄、美、日为一方，从各自利益出发，坚决主张免去“懿亲”死刑，法国追随俄国，也表示赞成。而德、意、奥、英4国则主张重办，凡列入名单者均应处以极刑。英、俄两国在惩凶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实际上是为了挑选各自的代理人。俄国极力保全西太后，甚至建议清政府迁都盛京，就是为了把清政府控制在自己手里；而英国则企图废后立帝，把光绪帝扶上台，还曾考虑挟持清廷迁都南京，使其成为自己控制的傀儡政府。后来，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发布“罪己诏”，表示愿意充当列强共同的工具，这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才告一段落。最后，列强达成妥协，一面同意“懿亲不加刑”的意见，同时又规定，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定为死刑，由皇帝酌情宣布减刑，流放新疆，永远圈禁。其余因主张招抚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而被指定为祸首的王公大臣，由清政府以各种方式处死，已死的追夺原官，撤销恤典。

关于“赔款”，列强都想乘机大发横财，但各自在华利益的考虑不同，主张又相异。德、俄、法在华商业利益较少，因而主张最大限度地勒索；而英、美、日在华拥有较多的经济利益，因而他们虽也进行勒索，同时又主张赔款要保持在一定限度内，以免过分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而损害他们在华贸易和其它经济利益。当时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十分困顿。因而，列强推定英、德、日、法4国公使组织中国财政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财政情况，确定赔款总数，指定赔款的财政收入保证以及各国之间的分配比例。实际上，列强主要是参考赫德以及汇丰、道胜、东方汇理等银行负责人的书面报告，根据赫德提供的数字，认为中国能够负担的赔款为4.5亿两。

赔款总额确定后，如何分配又引起激烈争夺。各国竞相提高要求，在原拟的勒索基础上加码。如俄国，因中国拒签交收东三省约稿，恼羞成怒，把赔款增到1.3亿两；德国原拟索取“远征军”费用3亿马克，此时骤增到4亿马克。英国也把海军费加上，把赔偿要求从480万英镑增至650万英镑。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13—514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65页。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谕，《清实录》（58），第292页。

连一直主张从轻赔偿的美国，所提出的赔偿要求也比其实际的“损失”约高一倍。这充分反映帝国主义贪婪的本性。在列强的胁迫之下，清廷于 1901 年 5 月 16 日发布谕旨，宣布“各国偿款 450 兆，4 厘息，应准照办”。

1901 年 9 月 7 日，英、俄、德、法、美、日、意、奥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 11 国公使与奕劻、李鸿章在《最后议定书》（即《辛丑和约》）上签字。这个空前的屈辱条约除正约 12 款外，还有附件 19 个。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款，对德使克林德被杀事，派专使赴德致歉，并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第二款，惩办“首祸诸臣”。第三款，对日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事，派专使赴日致歉。第四款，“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第五款，禁止向中国运入军火。第六款，赔款银 450 兆海关两，分 39 年还清，年息 4 厘。第七款，设立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永久驻兵，而中国民人概不准在使馆区内居住。第八款，拆除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炮台。第九款，各国可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驻军地点为：黄村（意大利），廊坊、杨村（德国），军粮城、塘沽（法国），芦台、唐山（英国），滦州、昌黎（日本），山海关、秦皇岛、天津（国际军）。第十款，在中国全境张贴清廷历次颁布的关于禁止仇洋的会社、停止科举、保护洋人的谕旨。第十一款，商改通商行船各约。第十二款，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变通各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

这个条约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凭仗手中的武力和实际上的军事占领，强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极其沉重的镣铐，也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向帝国主义列强立下的一纸卖身契。它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

从《辛丑和约》签订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到，所谓议和，不过是一场骗局；所谓签约，无非是为自己的侵华暴行披上一层合法外衣。对此，荣禄在一封家书中曾说过：“庆、李名为全权，与各国开议，其实彼族均自行商定，是日交给条款照会而已，无所谓互议也。”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曾一再发出瓜分中国的喧嚣，并在 1898 年前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但在《辛丑条约》中却采取了“保全”清政府的政策。这个政策首先是从 1901 年 10 月 16 日签订的英德协定中引申出来的。联军占领北京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华政策上意见纷纭，英、德两国经过月余反复磋商，签订协定 4 条，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其内容是：“第一，将中国之江河及沿海各口岸各国贸易及其它正当经济活动，自由开放，毫无差别。此为列强之共同永久利益；两国政府相约凡其势力所能及，对于一切中国领土均应遵守此原则。第二，德帝国政府及英女王陛下政府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其政策应以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为指归。第三，若他国利用现时之纷扰，无论用何方式，欲获得领土时，两缔约国关于保护本国在华利益所采之步骤应保留初步之谅解。第四，两国政府应将本协定通知其它关系列强，如奥、法、意、日、俄、美等国，并请其接受本协定所采之原则”。俄、美、日、意、法、奥各国先后表示赞同。

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政府签订和约过程中，要推行“保全主义”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 37，第 21 页。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142 页。

《德国外交文件》，第 232 页。

政策呢？首先是义和团群众顽强英勇的反抗斗争，深深地教训了侵略者，打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9月27日抵达天津后，在德国领事馆向德侨演讲中曾指出：“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当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职务的英国人赫德也曾论道：“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他认为，目前最佳选择，就是“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法国一个议员也指出：“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劲”，如果强行瓜分，“但见其徒事流血于亚洲大陆，反一无所有”，故“瓜分之说，不啻梦呓。”总之，在帝国主义列强看来，如果采取直接瓜分的手段，势必遭到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义和团运动就是明证。既要避免与中国人民发生直接对抗，又可以从中国榨取最大限度的侵略权益，最佳的办法就是扶植并改造清政府，使其成为自己驯服的工具。这就是“保全主义”的本质。

其次，用“保全主义”替代直接瓜分，还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俄国乘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东北，并企图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承认其对东北的控制权。这一企图，遭到其它列强的强烈反对，英国尤为恼火，两国关系尖锐到“业已趋到彼此相见以兵之可能”；而英国企图趁机独占长江流域，同样引起各国不安，表示“势难坐视”；日本借本愿寺事件出兵厦门，企图占据福建，也遭到各国的反对。这一切都表明，直接瓜分不可避免会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引起一场分赃的内讧。为避免内讧，各国才先后接受了英德协定所提出的“保全主义”政策。

尽管《辛丑和约》是在“保全主义”基调下拟订的，但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就敏锐地指出，其实质是“托保全之名，行灭国之实”，是“不劳兵而有人国”。在中国海关供职多年的马士，则说得更为透彻明白：“现在，当中国作城下之盟的时候，它通过《辛丑和约》和1902年与1903年诸商约的规定，变成了它的主人的主人”。

四、清政府的“新政”

义和团运动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一进入20世纪便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1901年1月29日，清王朝还在西安流亡中便迫不及待地发布了变法上谕，宣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

《义和团》（三），第244页。

赫德：《中国实测论》，引自杨度《游学译编序》，《游学译编》第1期。

《义和团》（四），第245—246页。

《义和团》（三），第40页。

《义和团》（三），第85页。

铁崖：《警告全蜀》，《四川》第1号，第15—16页。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32页。

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又称：“法令不更，辍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4月21日，清廷还成立了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顿时间，维新变法之言谈，“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侈谈维新变法为时尚。

历史真是喜欢作弄人。就在两年半以前，即1898年秋季，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曾经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扼杀一切改革事业，而今却又摇身一变，高唱起“改弦更张”、维新变法的调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从总的来说，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迫于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应付危局、摆脱困境的举措。

西太后镇压维新运动后，把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再次出掌朝政，依靠的主要是顽固守旧势力。但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那些支持西太后推行顽固守旧政策的首要分子，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中利用义和团进行仇外排外活动，因而被列强指名为“祸首”，逼迫西太后严惩，西太后虽不忍也不甘，但在列强军事压力下，自身且难保，岂能有力保护他们？结果，这些对西太后忠心耿耿的顽固守旧分子，或被处死，或被废黜，其势力有很大削弱，这就为清王朝推行“新政”廓清了障碍。而在义和团运动中因参与东南互保而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青、后又为西太后所倚重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他们本来就是主张变革的洋务派人物；尽管他们曾抵制（如刘坤一、张之洞）或破坏（如袁世凯）过戊戌变法，但他们并不反对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变革。因而，流亡西安的西太后一颁布“变法”上谕，他们便纷纷条陈上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南互保”的倡议者刘坤一、张之洞的会衔上奏三折。第一折是兴学育才，办法是：1.设立文武学堂；2.酌改文科科举；3.停罢武科；4.奖励游学。第二折提出中法应行整顿变通者十二事，即：1.崇节俭；2.破常格；3.停捐纳；4.课官重禄；5.去书吏；6.去差役；7.恤刑狱；8.改选法；9.筹八旗生计；10.裁屯卫；11.裁绿营；12.简文法。第三折又提出西法应兼采并用者十一事：1.广派游历；2.练外国操；3.广军实；4.修农政；5.劝工艺；6.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7.用银元；8.行印花税；9.推行邮政；10.官收洋药；11.多译东西各国书籍。这就是当时名噪朝野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西太后阅后，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于是，它便成为当时“新政”的范本。

清王朝内部各派势力的消长进退，固然是清末“新政”出笼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势来看，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是清政府决心实行“新政”的决定性因素。列强在确定以“保全主义”作为对华基本原则的同时，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01页。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维新图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55页。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4。

就通过各种渠道，频频向清政府传递及早“变革”的信息。早在10月10日，日本天皇在致清皇帝的国书中，就明确提出要求，希望清皇帝“断不举用守旧顽固之人，亟应简选中外重望有为者派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总税务司赫德表现得更为热心，他不仅“忠告”清朝亲贵大臣“认真改革才是最好办法”，并且还写了一份《更新节略》，就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武备、商务分别拟出更新方案。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政治界和舆论界还不断发表谈话、文章。必须指出，列强各国推动中国变法，并非希望中国富强，而是要使清政府成为他们压榨中国人民的更加驯服的工具，首先是保证《辛丑条约》的履行。

另外，西方列强在酝酿《辛丑条约》过程中，曾有一股强大的呼声，主张惩处皇太后，支持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复辟。西太后闻讯后十分恐惧。但西太后毕竟是久经政坛风云的人物，她精明善变，有极强烈的统治欲、权力欲，为了保住自己最高的统治地位，她深深懂得目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迎合列强的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历来就主张改革的人物。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她在流亡地西安发布了变法上谕。这道上谕除向中外宣示变法决心外，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反复强调她与光绪帝之间是“母子一心”，没有分歧的，并辩说过去镇压康梁变法是“剪除叛逆”，并非反对变法。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中外日报》当时就刊文指出：“朝廷之变法，并非实有生死肉骨之决心，不过以此为媚外之品物耳。”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新政”推行的结果，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覆亡，反而为清王朝的覆亡准备了思想、物质条件。

为了偿付巨额的赔款，解决财政上“库储一空如洗”的局面，清政府急需开辟财源，于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便成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902年11月，奕劻奏请设立商部，“以为推兴商务之地”。次年3月，商部正式成立，此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振兴商务和奖励实业的章程。同时还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并命令各级官吏“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力除留难延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此外，还提倡“振兴农务”，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业，设立农务学堂与农事试验场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20世纪有了较快的发展，5年中新办企业119家。1904年1月，又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各城镇商人纷纷成立商会。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就为埋葬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准备了客观物质前提。

筹饷练兵是清末“新政”的又一项重要内容。1903年12月4日，在北京成立练兵处，作为练兵总汇之所，以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帮同办理。在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仿照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新军。1904年9月，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以及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定以镇为经常编制，下设协、标、

《光绪朝东华录》（四），总4553页。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九），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47—49页。

《论中国宜注意精神教育》，《中外日报》1904年4月5日。

《清德宗实录》，卷506，第5页。

营、队、排、棚。合计一镇将弁兵役共 12000 余人。原计划全国编练陆军 36 镇。但实际上到清廷灭亡前，仅编练新军 14 镇，18 个混成协，4 个标，还有禁卫军 2 协，兵力约十五六万。清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按照西太后在密谕中的说法，主要是为了“防内乱”，即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但由于新军是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编练的，具体主事的又多为留洋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这些人较易于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又注意对新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因而，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除袁世凯直接编练和控制的北洋几镇外，其它省份新军纷纷转向革命，成为颠覆清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

清政府为了举办“新政”，急需军事、警务、政法、教育人才，而陈腐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培育新式人才的需要。于是，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就成为“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从 1901 年起，清政府就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4 年 1 月又批准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便是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癸卯学制”，清末民初学校教育制度，主要是以此为依据的。这个学制自成系统，将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与此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种专科学校。同时，清政府还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学习，他们或官费，或自费，人数逐年增加。1905 年 12 月设立学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还改革科举制度。从 1901 年起，科举考试便改八股为策论；1905 年 9 月，又批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决定自丙午科（即 1906 年）起，废除科举，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这就宣告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清政府实行这一切改革，主观上是为了培养忠于自己的人才，以维护其统治。但是，广派游学与兴办新式学堂，客观上无疑加速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这就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的发展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

必须指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历代统治者，以及有些贵族绅士和资产阶级学者，都夸大义和团愚昧落后和排外的倾向，这是极不公正的。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高度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英勇不屈的精神，最后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灭亡中国的图谋。至于运动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运动本身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后代先进的中国人，及时地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时，更加重视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从而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应该从成功的事件中学习历史经验，而且善于从失败的事件中学习历史经验。这是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正确态度。

五、自发的群众斗争

尽管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引起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更为加深。列强通过《辛丑条约》，把清政府变成“洋人的朝廷”，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极大地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又需费浩繁。这些赔款和新政费用，都以名目繁多的捐税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人民的负担骤然加重。有的地区

“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农民“一身而七八捐”，商民“一物而六七税”，迫得农民“弃田潜逃”，商民闭门歇业。1904年，清政府也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于不免。吾民有限之脂膏，岂能堪此剥削？”

人民群众为了生存，纷纷进行反抗，于是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一有首倡发难之人，即成星火燎原之势”的群众斗争局面。

首先是反抗教会压迫和赔款的斗争。

尽管《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进行反洋教斗争，清政府也颁布“严禁仇教灭洋”的上谕，但由于教会侵略势力依恃条约的不平等规定，不法活动更为猖獗，又借端在地方上勒索赔款，因而在中国许多地区仍然发生反抗教会压迫和“赔款捐”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公开提出反列强反清政府的口号。

1902年发生在直隶省广宗县的景廷宾起义，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活动省份，遭受八国联军的蹂躏也最为惨重。全省除大赔款摊派的80万两外，还要缴纳地方赔款上百万两。广宗一县，就要缴纳地方赔款两万串京钱，合纹银万余两。每亩摊派，每亩要缴纳“赔款捐”40文。这不仅引起广大农民的愤怒，中小地主也普遍不满。东召村联庄会首领景廷宾首先倡议抗捐，声称“中国人不拿洋差”。他的倡议不仅得到本县各乡联庄会的支持，也获得邻近各县人民的广泛响应，抗捐斗争迅速兴起。直督袁世凯闻讯，立即派兵前来镇压，并于3月3日攻占东召村。景廷宾率众转移到钜鹿县厦头寺，树起“扫清灭洋”大旗，自号“龙团大元帅”，宣告起义。义军“一唱百应，不期而至者三四万人”。起义军攻占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神父罗泽溥，随即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一带。

列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扑灭。袁世凯为瓦解分化起义队伍，软硬兼施。他一面宣布豁免广宗及邻近各县“所摊捐款”；一面派遣自己心腹段祺瑞、倪嗣冲率新练军2000多人，由保定南下，同时派遣马龙标率武卫军先锋队数营由山东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合围广宗。5月初，清军围攻件只村，起义军及当地群众虽奋起抗击，但终因力量悬殊而遭受重大伤亡。景廷宾率部分队伍突围，逃至成安县，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但于7月被清军捕杀，余部四散，起义失败。

与此同时，直隶朝阳县爆发了邓莱峰领导的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1902年初春，朝阳县松树咀教堂无理“增索赔款”，霸占附近群众的田产，激起民愤。当地民团团团长邓莱峰在花子沟地方聚众万余，捉拿2名天主教徒为人质，要求“教堂退还地契，不取赎银，并退出平民房屋”。是年10月，袁世凯派提督马玉昆率兵弹压，群众沿沟设卡，节节抵抗。11月初，邓莱峰驻守的卧佛沟被攻占，邓逃往义州，旋即被捕杀，村民逃散，斗争被残酷地镇压了。

《天讨》，第49页。

《御史胡思敬奏折》，《宣统政纪》卷11，第25页。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251页。

《中外日报》，1902年5月28日。

1902年3月，河南泌阳县人民聚众2000余人又掀起抗摊派赔款的斗争。他们组织“齐心会”，痛殴下乡催款差役，攻打泌阳城，夷平西关等数处教堂。这便是震动一时的“泌阳教案”。

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在南方各地也蓬勃开展。1902年9月，湖南邵阳爆发的贺金声领导的反教会斗争，声势最大。贺金声在邵阳蛇林桥竖起“大汉佑民灭洋军”的旗帜，并以灭洋军大元帅的名义刊布告示，指出：“各国迫我太甚，滋酿祸端太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灭洋军还派人分赴衡州、郴州、永州各地招兵。各地哥老会群众闻讯，纷纷前来投效，数日间聚众数万人。贺金声还派人前往省城长沙，致函湘抚俞廉三，希望他支持群众的反教斗争。但俞却派人将贺诱骗至省城杀害，并将灭洋军的骨干分子栗道生、赵学奎等投入监狱，致使这次斗争失败。

四川人民的反教会压迫斗争，则是在秘密结社红灯教、顺天教的组织下开展起来的。红灯教、顺天教继承义和团的反帝传统，组织群众练习“神拳”，并把反帝与反清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人民群众打教堂，“杀洋人，杀贪官，抗粮抗捐”。在1902年间，四川的安岳、永州等十几个县普遍发生群众打教堂、抗官军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月发生在资阳的由李冈中领导的斗争，他们聚众800余人进攻资阳城，与前来镇压的清军激战竟日；李冈中被杀后，他们又复聚千余人，于6月间捣毁天鼓桥教堂。7月间由红灯教首领曾阿义和廖九妹领导的群众聚集在成都附近龙潭寺、石板滩宣布起事，大败清军于清江镇，乘胜攻占金堂县苏家湾教堂，杀教士、教民数百。此后，红灯教声势大振，上万人在成都近郊一带活动，甚至持械入城，袭击督署，引起清政府恐慌。为此，清廷于是年8月，撤换川督奎俊，改派岑春煊督川。岑软硬兼施，一面派兵捕杀拳民，一面宣布暂时停止征收部分苛捐杂税，才将事态平息下来。

在反抗教会压迫的同时，各地人民还纷纷开展抗捐抗税斗争，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朝统治者。参加斗争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广大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工人参加。

如1902年5月，江西德化县行商反对苛征厘金，聚众捣毁卡局。是年冬，赣州商人也掀起砸厘卡的风潮。安徽芜湖、铜陵等地商人，为抗议政府加征酒捐、米捐、房捐和肉捐，举行罢市。福建漳州、仙游等地商人、手工业者也举行斗争，反对设局抽捐。

1903年，广东省的佛山镇、三水县、清远县、新会县、广州市商人，为反对增设屠捐和酒税而罢市。江苏扬州商人为反抗税吏勒索举行罢市，淮安商人为反对抽收房捐而罢市。

1904年，广东省惠阳商人为反对征收房捐而罢市，广西省梧州商人为抗议举办统捐而罢市，四川省成都商人为抗议抽收厘捐而罢市，重庆商号为抗议厘局差役敲诈勒索而罢市。

1905年，江苏、安徽、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许多市、县、镇的商人，又继续为反对苛捐杂税，纷纷举行罢市。

上述表明，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抗捐罢市斗争，连年不断，此起彼伏，成为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条新战线。

当然，抗捐抗税斗争的主力还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进行的抗捐抗税斗争往往发展为武装斗争，甚至于武装起义，因而给清王朝的打击也特别沉

重，在全国造成的影响也尤其重大。其中，规模较大、斗争较激烈的有：

1903年5月，为反对法国修建滇越路，云南个旧锡矿工人周云祥率领会党矿工数千人起义，占领个旧。他以“拒修铁路仇洋”相号召，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即富绅“亦从而附合，甚且助械捐资”。半月间义军即占领临安、石屏两城，聚众万余人。附近许多州县的会党游民纷纷响应，引起清政府震惊。云贵总督调集各地兵力，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1904年江西乐平知县杜璘光串通劣绅，借口筹集学堂经费，抽收靛捐，引起靛农的强烈不满。东北乡会党首领夏廷义遂乘机发动抗捐，率领数百群众冲进县城，夺取保甲局枪支，捣毁小学堂，还拆毁统捐局、厘卡、教堂以及教民房屋，抗捐群众骤增至3000多人。江西巡抚夏时闻讯，派朱子春带兵前往镇压。8月26日，夏廷义率领3000余人再次冲进县城，杀伤官军60余人，朱子春化装逃跑，所部四散。群众烧毁县署，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一度控制了乐平县城。西乡、南乡的地主团练也卷入抗捐斗争。周围地区也准备响应乐平群众的抗捐斗争。巡抚夏时十分惊慌，急调九江道瑞澂带兵千余人，进攻乐平。10月间才把这场斗争镇压下去。

广西农民起义。这是一场由秘密会党天地会领导的反清斗争。1902年，上思县天地会首领谢三首举义旗，百色、柳州等近10个州县约十几万会党群众纷纷响应。起义持续3年之久。到1904年，起义队伍逐渐形成两大支。以陆亚发为首的一支，曾大败广西提督丁槐率领的清军，攻占数个城池，最后逼近省会桂林城。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亲率重兵征伐，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才把这支队伍镇压下去。另一支是以黄五肥、王和顺、关云培为首，活动于隆安、武鸣、上林、宁明、上思、宾州、扶绥等地，曾屡次击败前来围剿的清军。1904年春，丁槐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分化瓦解起义军，结果，义军被各个击破，黄五肥、关云培战死，王和顺率部3000余人退入十万大山，继续坚持斗争，后来投奔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队伍。

广西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不仅沉重打击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而且还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鼓舞。孙中山在1904年秋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曾以广西起义为例，论证清朝统治是一定会被推翻的。

义和团运动后，以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广大群众自发的反帝反清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清朝统治力量的削弱，为新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运动，奠定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由量变到质变，一场根本改变几千年封建统治秩序的伟大的革命风暴，终于酝酿成熟了。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辛丑和约》的签订，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自由进出、任意掠夺的半殖民地；清王朝完全向帝国主义列强屈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成为列强共同控制下的“守土官长”。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而首先肩负起救亡历史重任的，就是20世纪初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所谓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是相对于旧式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尽管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社会就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其中有些人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有少数先进分子也开始宣传民权和进化论思想，主张“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但总体上看，在20世纪以前的60年间，他们所接受的主要还是几千年来相沿习的封建传统教育，受着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把“忠君”与“爱国”视为一体，而把“犯上作乱”的革命视为“大逆不道”。所以，他们尽管对日益衰亡中的祖国有着满腔悲愤，但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他们最壮烈的举动不过是“公车上书”；他们所能成就的最辉煌的事业只是拥护光绪皇帝而进行的戊戌变法，而未能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之后，反清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来说，除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立宪派外，又涌现出一大批主张倾覆清朝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个群体，主要是指那些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化思想而又服务于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和新式教育、文化、出版、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体成员是教师、学生、留学生、医生、记者、编辑、作家、翻译以及工矿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职员。这批人员的出现，是清政府推行“新政”，采取“兴学堂，派游学”政策的结果。

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如上所述，目的是培育举办新政人才，以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书院。尽管在课程设置上，读经、讲经仍占很大的比重，封建主义色彩仍很浓厚。但是，它毕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教师队伍中，虽然从人员上看，大多数还是旧式士大夫，但已有一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活动能量很大。他们在课堂上或课余时间，向学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迎合了青年人趋新的心理，因而极受青年学生的欢迎。而学生们又以自己所学到的那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去影响各自周围的青年人。这样，就在国内出现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崇拜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开始把爱国与忠君区别开来。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国势岌岌，是由于清朝政治腐败、黑暗所致，因而纷纷走向“离经叛道”、“犯上作乱”的道路上。如安徽省巡抚诚勋在奏折中就指出：新式学堂中，“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有人在奏折中参劾：湖南省“近年以来士风日变，往往鼓其血气之勇，而不顾义理之安，甚至轻视礼

法，荡轶范围。若竟敷衍因循，流弊不堪设想。” 1907年，清廷也在一道上谕中哀叹：“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由此可见，新式学堂的创办，确实对20世纪初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广派游学”。出国留学在19世纪为数还很少，20世纪初人数陡然增加。这一变化，是与清政府的提倡分不开的。1901年9月，清廷在各省大吏要求“广派游学”的奏折基础上，正式颁布上谕，宣称：“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要求各省督抚选派“心术端正、文理明通”的学生“出洋肄业”，“如果学有成效”，可“考验奖励”，“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于是，在此之后，出国留学遂掀起一股高潮。这大批留学生中，出国留学的动机固然多种多样，但他们中间的有志者，身处异国，对中外之间差距的悬殊，了解得更真切，因而感觉也更强烈，特别是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体会更深切、更强烈。因而，一般说，这些留学生与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比较，思想转变要快些，政治觉醒要早些，思想认识要深些。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初年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先觉悟的部分。如日本留学生，“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卢骚、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诸伟人相期许。”他们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产生强烈的救亡图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自负而又自豪地宣称：“祖国之前途，其安危悉系乎留学生，夫人而知之矣。是留学界，对乎以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无有过于者是者。”他们不仅努力学习新知识，还组织各种爱国团体，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名著，出版多种刊物，宣传救亡图存的主张，揭露列强侵略罪行和清王朝残民媚外的行径，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爱国团体有1900年成立的励志会，1902年成立的青年会，1903年由留日女学生成立的“共爱会”；影响较大的刊物和书籍有《国民报》、《游学译编》、《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长期努力也是分不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历来重视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制订兴中会章程时就明确提出“立学校以育人才”。横滨中西学校的兴办，则是革命派自筹办学以培养革命人才的最初尝试。到20世纪初，革命派对革新教育更为重视，他们强调指出：“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政治，无法律；无政治，无法律，则无武备，无实业。学问、教育者，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在当时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3，学校10，第8617页。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5806—5807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总4720页。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第46页。

《江苏》第4期，第36—37页。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8页。

《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7期。

情势下，鼓吹教育救国论，固然没有抓住根本，但毕竟是民族觉醒的开始。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积极鼓吹革新教育，而且努力于革新教育的实践。1901年9月，清廷下令将各省书院改办学堂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官立和私立的学堂。它们迫切需要适应新式教学的教科书。1902年4月，倾向革新的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等商议成立中国教育会，专门从事教科书的编订工作。中国教育会在章程中宣布其宗旨是：“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何谓“恢复国权”？会中激进分子稍后作了明确的说明：“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这就鲜明地揭示了中国教育会的性质，即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兴办教育。它在成立时并没有准备直接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只是想改造教育，培养“共和的国民”，也即“从国民做起”。但时局的急剧发展，使它甚至连一本教科书都还没有编出来，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1902年夏，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慑于留日学生中蓬勃开展的爱国活动，电请清政府停派留学生；又勾结日本政府禁止中国学生学习陆军。这不仅激起留学生的强烈不满，也激怒了国内的爱国知识分子。稍后，上海南洋公学爆发学潮，反对学校当局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迫害，有200余名学生愤而离校。为了支援国内外学生的正义斗争，中国教育会于11月19日决定成立爱国学社，专门接收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和上海、南京等地退学的学生。爱国学社推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教师由教育会选派。爱国学社的学员还编辑《童子世界》，每周周末组织张园集会，公开鼓吹爱国革命的道理。它还积极参加拒法、拒俄等爱国革命活动，它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学校，“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革命大本营。”

中国教育会还在上海创设爱国女子学校，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还为在职人员开办补习性质的“通学所”，表面上是补习文化，暗地里则进行革命宣传，还派遣会员分赴江浙各地兴办学校，“规模悉仿爱国学社”。

其它省份的革命派和爱国分子，也群起效尤兴办学校，并以学校为基地，灌输进步思想，掩护革命活动。著名的有长沙私立明德学堂、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上海中国公学、安徽公学等。在这些学校里，学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批评时政，“持论皆甚激烈”。

总之，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接创办或影响下创办的新式学堂，在培养新式知识分子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还必须指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20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关系。在1900年以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外国历史著作译成中文的，总共只有60多种，小说只有3种，而到1904年，前者增加到250多种，后者增加到20多种。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对我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对于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对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对

《选报》第21期，1902年7月。

《选报》第35期，1902年12月。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127—128页。

同上，第118页。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兴起高涨，也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辛亥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反清革命斗争，还是立宪活动，其中呼风唤雨的活跃分子乃至领袖人物，大多数是从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出来的。

二、爱国运动的高涨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和中国人民民主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初爱国运动的高涨。

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报道，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叛乱，请求驻扎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并允诺“平乱”后用全省铁路矿山等权益相酬谢。这一消息首先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激愤。于是，由留日学生发起，上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响应，波及杭州、广州等城市的“拒法运动”，勃然掀起。爱国民众举行集会、发表宣言，要求清廷惩处王之春，拒绝法兵干涉，保卫国家主权。不久，因查实所谓王之春向法国借兵借款是误传，运动才平息下去。但此事件却表明：处于严重民族危机下的中国人民，政治警觉性是何等明快，爱国热情又是何等高涨。

与此几乎是同时，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拒俄运动爆发了，并迅猛遍及全国。按照1902年签订的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从东北撤军，但到期它不但不撤军，反而提出7项新要求，企图永远“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并增派军队来华，进行武力恫吓。俄国的侵略行径及其嚣张气焰，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抗。4月27日，上海千余群众在张园集会，抗议俄国侵略。会议还致电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还致电各国外交部，申明“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留日学生立即响应，并组织义勇队准备赴东北抗俄。5月3日，义勇队编队，改名为学生军。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5月8日，因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干预，又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叶澜、林长民、秦毓鎏、黄兴、杨毓麀等参与领导。会员达208人之多。接着进行射击，体操等训练。与此同时，上海群众由蔡元培倡议，亦成立中国国民总会，以议论国事，并响应东京留学生的行动，建立了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开展救国活动。

东京和上海各界的拒俄行动立即得到北京、武昌、安庆、广州、杭州、福州、南昌、长沙、开封等地学生和爱国群众的响应，开展各种形式的拒俄斗争。其中陈仲甫（1914年起又名陈独秀）在安庆领导的运动，影响较大。5月17日，他与潘璠华等人发动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校学生及爱国群众300人，集会藏书楼。陈仲甫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强烈谴责沙俄侵略东北的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爱国会，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他们还计划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成立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袭”。

这次拒俄斗争，主要是由新型知识分子发动的，学生、教师以及其它从

《安徽爱国会拟章》，《苏报》1903年6月7日。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

事新文化事业的人士起了领导作用。由于拒俄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因而，参加运动的阶层相当广泛，其中还有商人、资本家，清朝中小官吏和满族人士，甚至连两江总督魏光燾对拒俄义勇队也“深为赞美，以为中国国民犹有生气也。”

拒俄斗争基本上还是一次以合法方式进行的运动，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上海义勇队中激烈分子林懿均、章士钊等也表示：“义旗所指，志在勤王，与从前各省团练之兵殆无二致”。所以，各地爱国者除集会演说外，一般是采取上书或致电，希望清政府拒绝签约，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由于爱国群众的反对和斗争及国际上日、英、美等国干预，清政府始终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两国谈判毫无结果。然而这样比较温和的爱国运动，也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就在东京拒俄义勇队成立后，清公使蔡钧即密电北京外务部，指责留学生“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请速电致湖北、直隶、两江督抚，严密查办”。留学生闻讯后极为震怒。《游学译编》宣称：“满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之人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满政府宣战。”军国民教育会于是决定改变方针，以“实行民族主义”的宗旨代替原定的“实行爱国主义”宗旨，由拒俄爱国团体改组为反清革命团体，其活动也逐渐转向秘密。而在上海，清政府镇压的主要目标是爱国学社，制造了轰动中外的“《苏报》案”：查禁“爱国学社”和《苏报》，捉拿并审讯章炳麟、邹容。但镇压遏阻不住革命潮流的发展，只会使革命者受到教育和锻炼，而激起更大的反抗。

继拒俄运动后，1905年又掀起了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反美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由于美国政府推行种族歧视、迫害华侨引起的。1894年3月31日，美国与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条约，把美国排华合法化，使去美华工受到极大限制和侮辱。因此，当1904年条约期满时，华侨报纸和国内爱国报刊纷纷著文，要求废约，并揭露美国政府虐待华侨。美国十来万华侨联名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要求废约。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指示梁诚与美国政府谈判修改原条约，但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消息传出，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商务总会于1905年5月10日召开各帮商董集议对付办法，决定发起抵制美货运动。随后，上海各界及北京、天津、广州等160多个城市纷纷响应，先后成立了“拒约会”、“争约会”、“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声援函电交驰不断。一时间，拒约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

这次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其目的是为了谋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为自己政治经济发展开拓道路。他们公开宣传抵制美货可鼓民气，结民力，兴商业，联络全国，为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还公然主张“不必依赖政府”，“专恃民气”，由国民“自

《苏报》1903年5月14日。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大公报》1903年5月30日。

《陆师退学生与陆师毕业诸君函》，《苏报》1903年5月3日。

《大公报》1903年6月28日。

《满洲问题》，《游学译编》第9期，1903年7月。

力抵制之”；甚至还鼓吹“信官不如信商”，由商人创办“实业大公司”，对外“实行永久之抵制”。

这次运动尽管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和清政府的压迫，以及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妥协，到1905年底就转入低潮，但它终于迫使美国政府和清政府不敢签订限制华工的续约。

在抵制美货运动兴起的时候，一场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也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开始觉醒而持续展开，时间达数年之久。1896年，清政府设立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督办大臣，负责铁路修建事宜。帝国主义列强趁清政府财政困难，争先恐后输出其过剩资本，以攫取在中国的铁路建筑权。从1896—1903年，盛以督办名义，与列强订立了一系列的借款合同和草约。路权的不断丧失，利权的不断外溢，自然引起中国人的严重不安。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开始觉醒，要求自办铁路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反对列强夺取路权和清政府卖路政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这场运动首先是由1904—1905年的收回粤汉路的斗争揭开序幕的。粤汉路是1898年由盛宣怀卖给美商合兴公司的，但该公司资本有限，到1904年初即将2/3股票卖给使用法款的比利时人，公司董事也改由比人担任，路权实归比、法，芦汉路即是如此。法是俄的盟国，若“法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因此，消息传开，粤汉路所经过的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商官吏纷纷上书清廷，要求赎回自办。留日学生也组成“三省铁路联合会”，主张废约自办，并决心与路共存亡。而当时英国与法、俄矛盾尖锐，也支持中国收回粤汉路自办。经过一年多交涉，美商被迫同意赎路。张之洞出面向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借款100万英镑，于1905年将粤汉路赎回。这次斗争的胜利，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从而有力地鼓舞各省人民收回路权的斗争。

继之而起的是直、鲁、苏三省绅民要求废除津镇路借款合同的斗争。这个合同是1899年清政府在英、法两国威逼利诱下签订的。1903年勘路完成，英、法两国便催逼清政府改订正约。消息传出，直、鲁、苏三省民众包括留日学生和绅商立即发起运动，要求收回津镇路权自办。这场斗争持续近2年，斗争的目的——收回自办虽未达到，但还是迫使帝国主义作出了让步，即在与清政府签订正约时，规定不拿路权作抵押，改为用三省厘金作担保；不称“外国代办”，而称“中国自办”。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掠夺中国路权，还大肆攫取中国的矿权。他们从1895—1912年间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有关矿权的条款、协定或合同，重要的就有40余项，涉及中国几乎所有富饶的矿区。因此，这时期各省人民还不断掀起收回矿权的斗争，并取得了一些胜利。如1903年10月浙江人民反对浙绅高尔伊盗卖衢州、严州、温州和处州四府矿产的斗争，持续2年，终于取得胜利。1905年福建人民要求收回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权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1904—1905年发生的收回利权运动只是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起始阶段，规模和声势都有限，但它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力图发展自己政治经济力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愿望，因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爱国行动。这些斗争显示了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壮大和政治觉悟的增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东方杂志》，1906年第2期。

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82。

强，同时又吸引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参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动员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国内的开展，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革命小团体的纷起与同盟会的成立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最早建立的革命团体是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建的兴中会。其入会秘密誓词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发动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但它充分表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革命党人坚持武装反清斗争的不屈不挠的奋斗和献身精神，因而赢得了国内外先进分子的同情和景仰，使孙中山成为时人心目中“革命党”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国内人民群众日益觉醒，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清政府媚外卖国、残民祸国面目的进一步暴露，国内各阶层人民反清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因而在1904年前后，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批反清革命的小团体应运而生。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

（一）华兴会。1904年2月15日成立，黄兴任会长，章士钊、刘揆一、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等人参加。11月，该会与湖南哥老会联络，发动长沙起义，后因事机不密，为清政府发现，遭到镇压，大批会党首领被捕杀。但华兴会元气并未受到损害，其骨干分子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逃亡日本，后来都参与同盟会的筹建工作；而留在国内的华兴会成员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日后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准备条件。

（二）科学补习所。1904年7月3日成立，是由胡宗畹、张难先等发起组织的湖北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它的工作重点是运动新军，工作方式一是大量介绍青年知识分子入营当兵；一是招徕会党分子，加以训练，使其接受反满革命宗旨，然后介绍入伍。

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曾筹划配合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和暗杀清廷兵部侍郎铁良等活动，均未成功。后来，其成员与梁耀汉为首的革命团体群学社合并，在武汉地区特别是新军中积极活动，发展革命力量，终于在辛亥年夺取首义之功。

（三）光复会。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江浙地区的革命团体，它的前身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团长杨笃生，曾策划暗杀西太后，始终没有机会。由于暗杀团是个秘密组织，难于适应日趋高涨的革命斗争的形势，因而，蔡元培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将暗杀团扩大改组为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陆续加入光复会的著名人物，有赵声、吴春阳、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章炳麟等。

光复会成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暗杀活动的各项准备上，然而，蔡元培毕竟是一介书生，虽思想激进，擅长于宣传鼓吹，在革命党人中素负重望，但是，工作上缺乏魄力，短于策略，尤其是不善于联系下层群众，因而，经营数月，始终也没有组织过一次暗杀行动。而且，光复会尽管组织较为庞大，成员较多，活动区域较广，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因而组织比较松散，其成员各自为战，难于统一行动和开展重大斗争。

（四）岳王会。1905年春由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等在芜湖筹建的安

徽地区反清革命团体。1904年3月—1905年9月，陈独秀在芜湖曾利用自己主办的《安徽俗话报》，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以及清政府媚外卖国的行径，号召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拯救即将“国亡家破”的中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该报在安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1905年春，陈独秀约同安徽公学的体操教员柏文蔚、学生常恒芳等集会于芜湖关帝庙，成立了“岳王会”，以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反抗清廷统治和外国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后来，岳王会在南京、安庆设立了分会，会员遍及江淮地区，“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而且涌现出一批坚贞不屈的革命骨干，如熊成基、倪映典、方刚、吴旻谷等，为后来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上革命小团体的纷起和展开活动，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五）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由于中国内外矛盾的激化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从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感到小团体兴中会已经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计划建立一个新党，尤其是在1903年前后，他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招集同志，合成大团”。1903年8月，他在东京青山创建革命军事学校；1904年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军，后又在美洲致力于改组致公堂，所标示的革命宗旨，已经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作为誓词。1904年底，他离开美洲赴欧洲，积极在欧洲留学生中开展“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曾同留学生就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辩论，认识到过去革命主要依靠会党力量的局限性，同时又了解到国内以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反清革命运动兴起的情况，于是决心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发展革命势力，联合各地革命分子，开始进行组织政党的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另一领袖人物黄兴，自1904年11月长沙起义事泄而失败后，也开始致力于联络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于12月在东京组织了一个跨省界的“革命同志会”，参加的除湘籍留日学生外，还有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等地的同志百余人。黄兴在回忆中也说：长沙起义“失败，死者数人，逃至上海，与杨笃生、杨哲子组成爱国协社。会万福华刺王之春案起，兴及同志多被捕，赖江西巡抚夏时电致工部局，同获放，遂至日本，思结合革命团体。”

正是因为孙中山与黄兴都有组织全国性革命团体的想法，因而，当孙中山于1905年7月重返日本时，宫崎滔天即介绍他会晤黄兴，筹备同盟会。经过二人在东京的革命志士中多次联络和酝酿商议，到8月20日，同盟会的会员已发展到百余人，包括14个省籍的人士。于是，就在这一天，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宅所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会上，首先由孙中山说明开会宗旨，黄兴代表起草员宣读章程草案，经讨论修改后通过。接着，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同盟会章程共30条（1906年5月6日修改为24条），分别对会名、会址、宗旨、会员、本部机构和职员、分支机构、会费、会章的修改等问题，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9页。

上海《申报》，1912年9月28日。

作了具体的规定。章程确定，同盟会本部暂设于东京，本部机关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是本部各部中权力最重的机关，负责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由总理直接管辖。它下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六科中庶务权责又最重，庶务职能相当于协理，如总理他适时，可代行总理职权。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指定黄兴任此职。

章程规定：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皆直接受东京本部管辖。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东部支部设于上海，西部支部设于重庆，南部支部设于香港，北部支部设于烟台，中部支部设于汉口。国外设4个支部：南洋支部设于新加坡，欧洲支部设于布鲁塞尔，美洲支部设于旧金山，檀岛支部设于檀香山。

最后，由黄兴提议，把由湖南留日学生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后因该刊载文抨击日本侵华政策，被日本政府没收停刊，因而改名为《民报》。

同盟会总部成立后，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指导中心，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同盟会章程中，明确地将同盟会成立时会员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规定为同盟会的宗旨。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指导思想概括为“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同盟会的宣传家随即将这“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政治宗旨。三民主义内容，以后有发展变化。同盟会成立初期，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是：

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即推翻满族贵族当政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但是这决不是民族复仇主义，民族革命的目标只是少数满族当权者。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民国”。孙中山认为，中国仅仅有民族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他在《军政府宣言》中指出：“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这是20世纪初孙中山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孙中山在游历欧美各国时，注意考察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对西方社会不断爆发经济危机和罢工浪潮，印象深刻。经过反复研究、探讨，到1903年12月，他在复友人函中，首次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纲领——平均地权。他认为，“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关于“三民主义”，孙中山总结说：“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

美的国家。”

这就是同盟会时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尽管其中有主观空想的成分，但他那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却闪烁发光！

四、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黄兴领导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宣传同盟会的纲领、政策和方针。二是组织领导反清武装起义。

《民报》从1905年11月26日创刊到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共出24号。它是孙中山和同盟会从事宣传活动的主要阵地，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章太炎等。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揭橥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来又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的演讲，详细阐述了三民主义。因而，宣传三民主义，成为《民报》的宗旨。在第3号上，《民报》还提出“六大主义”为其办刊方针，内容是：1. 颠覆现今之恶政府；2. 建设共和政体；3. 土地国有；4. 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5. 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6. 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从内容上看，所谓“六大主义”，不过是在“三民主义”之外，加上同盟会的对外政策。《民报》把同盟会的对内对外主张，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公诸于世，对于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认识，增进国内外舆论对革命事业的了解，是有作用的。但“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则反映了大多数同盟会会员对帝国主义存在着幻想，因而更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这是《民报》宣传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或不足。

革命党人在同盟会成立后开展的宣传活动，影响最大、声势最壮的是开展与改良派的论战。从《民报》创刊后，革命派宣传家就针对《新民丛报》上宣扬的改良主义论点，开展批评。《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于1902年2月创办的宣传改良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其创刊号《本告白》宣布办报宗旨三条：“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新民丛报》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客观上进行了大量的反封建思想启蒙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坚持渐进改良的政治主张，反对革命宣传和激烈行动，尤其是1903年11月梁启超游美回日本后，政治态度和言论大变，公开宣称：“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对于革命，他公开表示：“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为不可、期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

期以为不可也”。从此以后，他就成为反清革命的坚决反对者。所以，在1903、1904年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就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但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则是在1905年11月《民报》创刊以后全面展开的。革命派的主阵地是《民报》，改良派的主阵地是《新民丛报》，双方投入这场争论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种，包括在日本、香港、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等地出版者。

《新民丛报》自1906年1月73号起，连续登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后又将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单行本，刊印1万册，广为散发。这两篇文章，竭力反对革命，鼓吹中国目前只能实行“开明专制”，然后再实行君主立宪。为此，《民报》第3号特发号外，题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两方在12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其要点是：《民报》主共和，《丛报》主开明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革命，《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专制；《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民报》以为革命以求共和，《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氓之具。并公开宣告：“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从此，论战全面深入地展开。

这场大论战，主要围绕三民主义展开的，即：第一、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对于这三个问题，如前所述，革命派的回答是肯定的：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实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社会革命，平均地权。但是，改良派的回答却是相反的。

第一、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

改良派认为没有必要，其理由是当时中国不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举国人民，在其法律上本已平等”，光绪皇帝是“圣主”；只要实行立宪，就可以改变中国状况，逐步使国家富强。只要实行立宪，就不会有“种族之嫌贰”，满汉就平等了。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鼓动民气，进行革命，其结果只能引起“暴民骚动”，“杀人盈野”，招致帝国主义干涉，那就要亡国亡种。

革命派则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清王朝是一个残民以逞的反动政府，是一个认贼作父的“洋人朝廷”。指出它“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它使得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东割一肠肺，西断一咽喉，四分五裂，鲜血淋漓”。因而，革命派坚决主张采用革命手段，推翻这样的“恶政府”。

关于排满。当时革命派中确有人在宣传中存在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复仇情绪，鼓吹满汉之间“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仇满是汉人天职，否认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但这并不代表革命派的主流。孙中山就明确指出：“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12页。

未助：《论国会之趋势》，《南洋总汇新报》，1908年8月3日。

吴魂：《中国尊君之谬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3页。

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关于帝国主义干涉。革命派认为：革命只要加以控制，使之成为有秩序的革命，而不像义和团那样“野蛮排外”，而是“善守国际法”，排满而不排外，那么，列强是会保持局外中立，不会干涉革命的。革命派为了避免列强干涉，甚至表示凡清政府和列强订立的条约、债务、义务，都可以根据国际法承担下来。可以看出，对帝国主义列强心存畏惧是双方共具的心理。

关于革命流血。革命派理直气壮地指出，要革命，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即如英国、日本那种所谓“和平革命”的国家，也不免杀人流血。革命派进而论证说，不革命，每年被满族统治者残杀的同胞也在数百万之上，其它死于租税捐输、脂膏告竭的人更不可胜计。因而，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第二个问题，即：是建立民主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改良派认为，中国不能建立共和政体，理由是中国人“民智不逮”，没有做共和国民的资格，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他们将开民智寄希望于清政府和所谓“圣君贤相”。革命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民智未开，程度不逮”问题争论的症结，就是改良派把开民智的希望寄托于清王朝实行“开明专制”，但那只能是“求鱼于樵，求木于渔”，继续愚弄人民；于是，提出开民智的唯一办法只有实行“国民革命”，“民智未开，以革命开之”。

改良派还根据德国波伦哈克的“国家客体说”，论证中国若实行共和政体，必然造成阶级争夺，大乱不已，结果，人民不得不将政治自由交给一个人，梁启超称这种情况是“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革命派批判波伦哈克的国家学说，指出，君主只是构成国家“最高总揽机关”的一个成员，决不能等同于国家；“国民”具有独立的人格，是国家的“构成分子”，既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也不是为人所有的“物”；“国民全体”才是国家的“最高总揽机关”。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君主为统治权主体的谬论。革命派还阐明代议政治和三权分立学说是摧毁专制政体、保证民主共和政体必须具备的东西，它可以实现社会的法治而防止内乱。尽管革命派坚持的国家学说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具有很大局限性，但在当时仍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即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改良派感觉特别恐惧和憎恨。他们污蔑革命派宣传的土地国有和“社会革命”是煽动“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起来“荼毒一方”。为此，他们宣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

蛰伸（朱执信）：《论满洲政府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号。

《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

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

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

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他们甚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革命的必要，宣称中国“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净”，“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

革命派坚决予以反驳，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中国虽然不像欧美那样贫富悬隔，但仍存在贫富之分，仍埋藏着第二次革命的伏线。为使中国将来免受第二次革命的惨祸，“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而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他们强调指出，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将是“富者愈富，贫者亦富”，“无有不平之阶级”。当然，革命派关于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的宣传，尽管主观愿望是善良美好的，但却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它实际上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至于土地国有也不是社会主义。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这次论战，是一次争取群众的思想斗争。革命派在论战中，系统地宣传三民主义，从而有力地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通过论战，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逐渐靠拢革命派。所以，革命派作的宣传和论战，不仅扩大了革命思想的传播，还壮大了革命派的队伍，从而有力地推动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开展。

五、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在与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还积极筹划、组织武装反清斗争，从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一步一步地推向新的高潮。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就离开日本，赴越南、南洋各埠建立同盟会分会、筹款和策划武装起义。留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黄兴，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方面。他首先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丈夫团”，将留日学生中学习军事的学生组织起来，以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又在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还陆续派人分赴东北、江苏、湖南、湖北各省，策划武装起义；派刘揆一去上海设立“交通机关”，联络湘、鄂、江、浙一带的反清革命力量。

1906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回到日本，与黄兴、章太炎等共同制订了中华国民军政府《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队之编制》、《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15个文件。这是一个指导各地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开展革命斗争和组织革命军政府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在同盟会的领导或影响下，国内武装反清斗争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从1906年起，各地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有力地打击清朝反动统治，加速其覆灭的进程。其中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有：1906年12月，刘道一、蔡绍南发动的湘赣边界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武装反清起义；1907年5月，邝敬川、胡毅生、王和顺发动的广西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5、6月，许雪秋和邓子瑜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12月，孙中山和黄兴亲自发动并参加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黄兴组织的广西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

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

钦州、廉州和上思起义；1908年4、5月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发动的云南河口起义等。

这六次由同盟会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共同的特点是：开始时准备不足，起事仓促；接着遭到清廷优势兵力的镇压，起义军虽流血牺牲，英勇反击，终因兵员和粮械得不到补充而失败。

另外，这几次起义，基本上是靠会党发动的。起义的不断失败，使同盟会一些会员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战斗力不强，于是便将工作重点转向运动新军，企图争取经过一定作战训练又掌握新式武器的新军作为发动起义的基本力量。发生在1910年2月12日、由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便是同盟会领导人在起义依靠力量问题上思想认识发生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到1909年冬，广州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同盟会的已达到千余人，约占广州新军一半以上。同盟会南方支部认为由新军发动起义的时机成熟，决定于庚戌年正月元宵节后举事。后由于新军士兵与警察发生冲突，2月12日起义提前发动，参加起义的约3000人，倪映典被推为司令。起义军夺取讲武堂枪械，分三路向省城进攻。起义军推进到牛王庙时，与清军相遇；清军派人诱降，遭拒绝；又施诡计袭杀倪映典。起义军在失去指挥的状况下，仍坚持战斗到深夜，后因弹尽援绝，遂溃散败走。起义又告失败。

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许多成员灰心丧气，“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鉴于此，孙中山遂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城召开会议，“决定以新军为骨干，组织五百选锋（敢死队），”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会议还计划广州得手后，由黄兴统一军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北伐。对于此次起义，孙中山极为重视，他在一函中称：“此次之动，乃因日俄协约，时势甚急，岌岌不可终日；而内地革命风潮亦已普及，军心民心皆同归向；加以吾党久困奇穷，不能稍待。有此三者相迫而来，不得不发。故主动各人，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若事不成，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弟亦决意到时潜入内地，亲与其事。”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各地“选锋”陆续到香港，在广州设立的秘密据点也达38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也大致联络就绪。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会议，预定4月13日起义，分兵十路袭取广州城，由赵声、黄兴担任革命军正、副总司令。但由于温生才于4月8日枪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清吏加紧戒严，起义未能如期举行。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建立起义指挥部。因内奸告密，清吏在全城搜捕革命党人，秘密据点多处被破获，起义准备再次延期，不少“选锋”也陆续离开广州转赴香港。后又得悉调入城内警备的巡防营中多有革命党人，因而又仓促决定于4月27日下午举义。原定10路攻城改为4路，由黄兴、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分任指挥。届期，陈炯明畏葸不敢动，胡毅生借故出城不归，姚雨平逃避，只有黄兴率领“选锋”120余人猛攻督署。总督张鸣岐闻讯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攻占督署并将其焚毁，后又冲杀出来，与李准卫队遭遇，激战中，黄兴右手受伤，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2页。

同上，第1卷，第498页。

仍坚持指挥，直到剩下最后一个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逃往香港。许多革命党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一部分被捕后英勇就义。

起义失败后，广州人民收殓此役牺牲的烈士遗骸 72 具，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红花岗为黄花岗，因此，此役后亦称“黄花岗起义”。

应当指出，同盟会领导的上述历次起义，革命者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和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表现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贵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纪念的。但也必须承认，这几次起义，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军事冒险的成分；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中，尤其是在孙中山身上，始终存在着不切实际的侥幸取胜的心理。因而，这些起义虽然轰动一时，但总是旋起旋灭，屡战屡败。

起义尽管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是重大的。它用行动教育人民，唤醒人民，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动摇了清朝反动统治的根基，从而大大加速清王朝覆灭的进程。

除了以上同盟会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之外，这时期还有光复会和岳王会发动的起义，也发生了很大影响。

光复会在浙江的活动是从联络会党入手的，联络会党的中心是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这所学堂是徐锡麟、陶成章等在 1905 年 9 月创办的，办学目的就是训练各地会党成员，使之成为革命骨干。1906 年徐锡麟赴皖，先后担任安徽武备学堂副总办、巡警处会办、巡警学堂监督，他利用职务方便，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骨干，策划起义。从 1907 年初起，秋瑾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力加强对会党的训练和改造工作，将分立的会党纳入光复会组织系统，编组光复军，拟定起义计划。她还和徐锡麟约定 1907 年 7 月 6 日（后改期 7 月 19 日）浙皖同时举义。

由于绍兴方面会党分子过早暴露形迹，清政府于 6 月间就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危急，徐锡麟遂于 7 月 6 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机，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起义。徐率陈伯平、马宗汉及巡警学堂数十名学生进占军械所，旋被清兵包围，激战中，陈伯平死难，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后壮烈牺牲。

安庆起义失败后，浙江巡抚张曾敷得安庆方面提供的情报及绍兴劣绅胡道南密报，派兵包围大通学堂，拘捕秋瑾。7 月 15 日，秋瑾被害于绍兴轩亭口。

1908 年 11 月，清政府调集南洋各镇新军于安徽太湖进行秋操。11 月 14、15 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清统治集团“群情震惊”，人心惶恐。岳王会成员熊成基、范传甲、薛哲等 10 余人遂于 11 月 19 日乘机发动安庆起义，并推举熊成基为总司令，约定破城之后，“再行推举总统”，要求各国承认；然后赶赴太湖，控制参加秋操的清军，攻夺南京，以为根据地，而后进军北京。但是，由熊成基掌握的马营、炮营在城外举事，成功后攻城时，城内义军因受到清军钳制，没有接应，城外起义军围攻一日夜不能破城。接着，清军大量援军赶到，义军寡不敌众，只得撤退，抵达庐州时，余部不满百人，只得宣告解散。熊逃往寿州，后出亡日本。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大肆搜捕，全省因此事而受牵连被害者约 300 余人，范传甲、薛哲等被捕后也遇害。这是清末第一次由新军发动的武装反清起义，不仅在安徽省，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产生巨大影响。

1905 年以后，广大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日益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05

年 103 次，1906 年 199 次，1907 年 188 次，1908 年 112 次，1909 年 149 次，到 1910 年增至 266 次。斗争形式多种多样，诸如在许多地方发生的抗捐抗税、抢米骚动，反对厘金和反对贪官污吏。在一些城市还发生过多次数工人罢工，反对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反对资本家的封建式剥削和工头的各种虐待，工人还参加革命党人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广州起义等。不少地方的商人、企业主也参加了反对增加税收和各种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教会压迫的斗争仍然彼伏此起，相当活跃。这些反抗斗争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互相交错，彼此影响，使清朝统治更加动荡不安。所有这些，都显示各阶层人民的日益不满和趋向革命化，一场民主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

第三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

一、宪政团体的出现

清政府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十分恐惧，觉得再不进行政治上的改良，只会助长革命势力的增长，从而加剧统治的危机。从 1903 年起，追随康梁的改良派就顺时应势，把立宪作为政治目标，在国内外同时发起攻势，广为宣传，要求朝廷实施宪政。鉴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为了维护已经动摇的中央统治地位，对付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于 1905 年 12 月 2 日诏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等五大臣出使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这一事件揭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

1906 年 9 月 1 日，在经过朝廷内部激烈辩论之后，清廷颁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规定首先要改革官制、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以及普及宪政教育等等。等这些预备立宪基础完善后，再根据各国成法以及中国进步的迟速，“妥议立宪实行之期”。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使立宪派欣喜若狂，因为这道上谕为立宪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信就说：“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改良派一直宣传和要求立宪，此时则更积极为实施宪政作准备。宪政团体纷纷成立，全国竟达 70 多个，并出版报刊，进行宣传鼓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于 1906 年 12 月 16 日，会址设在上海，它是江浙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团体，并得到某些督抚的支持或资助，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

预备立宪公会是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代表，成员中很多人便是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人。郑孝胥（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曾入李鸿章、张之洞幕，任驻日总领事，江南制造局督办，并创办制呢厂。张謇，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致力于教育和实业，开办大生纱厂等企业和通州师范学校；以鼓吹立宪而闻名，成为江浙立宪派的巨擘，主张以缓进方式实行立宪。汤寿潜（字蛰仙，浙江山阴人），进士，选庶常，官至两淮盐运使；后倡筹款筑路，并总理筑沪杭路事，力主实业救国。普通成员中像朱福诜、王清穆、周廷弼、许鼎霖等人都是工商业界实力雄厚的资本家。据统计，在 358 位列名成员中，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及在各种工商企业任职的有 84 人，约占会员总数的 23%，成为会内的主导力量，影响着团体的政治倾向和活动内容，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值得指出的是，该团体会员中，有 77 人曾经做过知县以上的官职，约占会员总数 21.5%，这反映该团体同统治集团有一定的联系，因而又有浓厚的妥协性。除上述之外，会员中供职于文化、教育、新闻界的人数也不少，使其容易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

预备立宪公会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出版机关刊物《预备立宪公报》及《宪志日刊》和大量书籍，宣传宪政；编纂法律草本；办讲习所，宣讲宪政学理；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等。他们的活动，一直持续到

《光绪朝东华录》第 5 册，第 5563 页。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69 页。

1911年。

政闻社，是由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立宪派人士发起组织的一个资产阶级宪政团体，1907年10月17日在日本东京成立。该社成立前，康有为曾感奋于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整顿组织，以图再举。但由于康有为没有提出足以动员会众的新纲领来，梁启超感到不满意，于是决定另组新团体。

政闻社政纲规定：（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该社宗旨是：（1）确定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与国政之权；（2）对于内政外交，指陈其利害得失，以尽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3）唤起国人政治之热心，及增长政治上之智识与道德。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还郑重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的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该社采取了如下几种活动方式：（1）编撰杂志日报及适用之书籍。（2）“交通各内地，输入政治上之学识及通告政治上之利弊，又调查其关于政治上一切之事。”（3）建议及警告：关系国家重要之事向政府提出建议和警言。

为争取合法地位，政闻社虚社长、副社长之职，由马良（字相伯，江苏丹徒人）任总务员，徐佛苏、麦孟华为常务员，徐公勉、张嘉森、隆福等6人为评议员。1908年1月，政闻社本部迁回上海，便积极投身速开国会的宣传和请愿运动。该社参与发起了国会期成会，派人分头联络政府王公大员及各地立宪团体，广设分支机构，发展会员，最多时达千余人。7月，以该社全体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限期3年召开国会。但当时清廷对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极为不满，于是便从政闻社开刀，指责3年召开国会的主张是“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于8月13日下令查禁政闻社。政闻社遂遵命解散。

宪政讲习会，由杨度、熊范舆于1907年夏在日本东京成立，又名宪政公会，熊为会长。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曾一度追随革命，结识梁启超后，便放弃其自由、平等、独立三大主义。清廷预备立宪开始，因曾为出洋五大臣撰各国宪法比较，赏四品京堂。该会以“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为宗旨，主张实行责任政府，设立民选议院为中国由弱变强的转捩之机。

宪政研究会十分注意在国内各地发展会员，加强实力。湖南是宪政研究会最早发展的地区，不久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分会。“以学会形式充实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其讲习会势力范围。”在当时众多的

《政论》第1号。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三日《时报》。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967页。

《东京宪政讲习会意见书》，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立宪团体中，宪政研究会的主张颇具特色而独树一帜。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该会也多方奔走联络，不过，当杨度成为官方人物后，立即失去“民间势力”的色彩，熊范舆离湘，宪政讲习会便衰落了。

当时出版的《时报》、《外交报》、《东方杂志》及《扬子江》等大型报刊，在立宪派改良派人士的参与或影响下，都进行了要求立宪、反对专制的宣传。其他各地的立宪团体，特别是四川、湖北、两广等地的立宪组织也都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和活动。

二、国会请愿运动

清末立宪派的主要政治活动是为争取参政权而发动的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这场运动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 1907—1908 年间，首倡者是宪政讲习会的杨度、熊范舆等。杨度在 1906 年冬就在《中国新报叙》中提出：“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恃吾民自任之”。1907 年春，又提出应把国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请开国会这一目标上来。是年秋，熊范舆和沈钧儒、雷光宇、恒钧等人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指出中国正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外部列强环逼，内部革命蜂起，如不赶紧实行立宪，“恐三数年后，燎原莫救”，要求一两年内开设国会。

这份请愿书在报纸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响应。一些海外华侨、留学生等也相继上书或致电清廷，要求速开国会。在国内，宪政讲习会的据点湖南首先派出代表赴京上请愿书，由此带动各省立宪派陆续发起请愿签名运动，于是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从 1908 年 3 月以后，河南、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也陆续有代表赴京上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当时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还在上海联合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在此情势下，连清政府的某些督抚、驻外使臣也上奏朝廷，请开国会。

清廷对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持抗拒态度，并对其发展深感不安，伺机镇压。于是以政闻社社员陈景仁（法部主事）电奏朝廷要求 3 年召集国会以及吁请把主张缓行立宪的于式枚革职为煽动，下令将陈景仁革职，接着又下令查禁政闻社，迫使请愿代表各自回省。这次请愿运动遂告失败。与此同时，清廷根据其预备立宪的步骤，批准各省成立谘议局，并谕令各省督抚实力奉行，限一年内办齐。因而各省立宪派的主要精力都转向谘议局议员的选举活动方面，请开国会的事暂时沉寂下来。

1909 年 10 月，各省谘议局开幕，许多立宪派分子成为谘议员，甚至议长，在各省取得了较稳固的地位。于是，要求参政权的欲望便更强烈地倾泄出来，由是发生了由各省谘议局发动的新一轮国会请愿运动。这一轮请愿运动，前后共进行三次，较上一阶段的请愿运动，声势更为浩大。

第一次请愿国会运动，是由江苏省谘议局局长张謇领头发动的。1910 年 10 月 13 日，张謇同江苏巡抚瑞澂商议、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谘议局，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分别请求朝廷速开国会和速设责任内阁。11 月 27 日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大会，正式推定各省谘议局赴京代表，组成请愿代表

团，并公推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请愿书是由林长民起草，经张謇修改定稿的。提出内政外交危机严重，非速开国会不足救急，强烈要求“速开国会”，为主朝廷“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

1910年1月16日，请愿代表团将请愿书呈递都察院。不久，清廷颁发上谕，拒绝“速开国会”的要求。请愿代表即开会决定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并致书各省团体，请组织分会，以便各省代表到京后再上请愿书。京师还成立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会期成会，以为请愿团的后援，还致书各省谘议局、教育会、商会团体，以及海外各埠华侨，希望各举代表。这样，参加请愿活动的社会成分更为扩大，除谘议局外，还有商界、学界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参加。6月16日，请愿代表80多人前往都察院呈递请愿书10封，请为代奏。6月27日，载沣召见诸王公大臣，议定必须俟9年后筹备完全，方可召开国会。“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再一次被清廷所拒绝。但请愿代表决心继续请愿，并扩大请愿规模，造成更浩大的声势，要求签名须普及农工商各界，人数每省至少须百万以上。各地各团体也纷纷致函，表示声援。

国会请愿代表团复于8月15日召开评议会，决定通过谘议局联合会提出：（1）国会不开，则应实行不纳税主义；（2）各省谘议局今年通常会应只要求速开国会一案，不达目的各局同时解散。并鉴于资政院将于10月3日开院，遂决定第三次国会请愿提前举行。

10月7日晨，请愿代表乘车往摄政王府，向摄政王载沣上书请愿。临行时，奉天留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各割股血书，“以表示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决不似前之以文字购国会”。但载沣避驻三所。各代表表示：须待监国回府，亲自谒见，否则决不离去。民政部尚书善耆亲来商议，各代表才同意将请愿书交其代转。

8日下午，孙洪伊等赴资政院呈递请愿书，请于明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10月22日，资政院讨论陈请速开国会议案，气氛异常热烈。最后由议长、副议长即时上奏。议长即宣告用起立表决法，全场三次全体起立，三次高呼国会万岁、大清国万岁、大清国立宪政体万岁。一时欢声雷动。同时上奏要求“明降谕旨，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以维危局而安群情。”

可以说，当时全国上下，是一片沸沸扬扬的速开国会的请愿声。就请愿运动的主导力量立宪派来说，他们是希望借此获取部分参政的权力，并以此阻止革命的爆发。他们固然对清王朝不满，但亦惧怕革命。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请愿运动，固然是有感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最使他们忧心的还是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然而，垂亡的清王朝并不感悟。他们关心的，仍然是如何维护手中的大权，使其不致旁落。11月3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稍作让步，提前3年，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第二天，清廷颁布此谕，同时“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剴切晓谕”，令“所有各省代表人等”，“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对于这道上谕，多数立宪派是不满意的。但诚如国会请愿代表团通告各

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820号《政治官报》，折奏类。《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期。

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中外日报》。

宣统二年九月十四日《申报》。

《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1期，《谕旨》。

省同志书所说：“朝命既下，度非复挟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非复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惟诸父老实图利之。”这样，在无可奈何之中，代表团奉命解散，第三次请愿运动也宣告失败了。

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使立宪派中的许多人，终于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逐步走上同情或参加反清革命的道路。

三、收回利权运动

资产阶级立宪派在政治上积极推动、领导全国立宪运动的开展，在经济上则强烈要求收回被列强所攫取的各种利权。因而从20世纪初年开始的收回利权运动，到1906—1911年间达到了高潮。所谓收回利权运动，主要是收回矿权和路权的斗争，并由此发展到保路运动。

（一）收回矿权的斗争。影响较大的有：

山西收回福公司霸占的矿权。福公司是1897年由英、意两国商人合股成立的专门揽办中国路矿企业的公司。1898年，它与山西商务局签订承办晋矿合同，获得在盂县、平定、潞安、泽州、平阳等州县的开矿权，限期60年。然而福公司一直没有进行勘查开采。山西绅商为挽回利权，多次与福公司谈判，均遭拒绝。1905年，绅商在巡抚张曾敫等支持下，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但是，遭到福公司和英国公司的拒绝。于是激怒了山西人民，绅商学生各界纷纷集会、上书，要求政府废除与福公司的合同，主张筹款赎回矿权。其中留日学生的行动最为激烈。1906年10月13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愤而蹈海自杀，在绝命书中说：“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力也”。留日学生创办的《晋乘》杂志，还将收回矿权作为该刊的“六大主义”之一。山西绅商为收回矿权，一面与福公司谈判，同时设立了保晋矿务公司。1907年，山西绅商学生各界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一致主张抵制福公司开矿。会议决定，如福公司拒绝“赎矿自办”要求，则有矿地之家不准售地，附近之人不得为之做工，不得与之贸易。有违背此决议者，开除其山西籍。在人民不懈的斗争下，福公司无计可施，被迫接受赎矿的原则。经过长期交涉，1908年1月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以银275万两赎回盂、平、泽、潞各属矿权。

安徽收回铜官山矿权的斗争。1902年2月，英商华伦公司与安徽商务局签订了勘查歙县、铜陵、潜山等处煤铁各矿的合同，规定期限8个月，逾期不办，原合同作废。然经多次展期，直到1905年5月又届满期，它仍未进行勘矿，安徽各界人民遂提出收回矿区自行勘矿。但该公司故意拖延时间，进行抵制。1907年，妄图以中英合办名义长期霸占矿权。1908年又私招日本三井洋行商股，并由英、日驻华公使照会外务部，施加压力。此议传出，遭到安徽绅商各界一致反对。安庆绅商集会，决定一面派代表赴京，要求外务部“抵死力争”，并与英商直接谈判，坚持无条件废约；一面筹组全省路矿公会。各界民众踊跃支持。尽管英国公司毫无道理，清政府还是屈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的压力，于1911年春议定以5万英镑赎回，由安徽绅商筹资组成“泾铜矿务公司”自行开采。

山东争回茅山等5矿矿权的斗争。1899年德商德华公司攫取沂州、沂水、

诸城、潍县、烟台等 5 处 10 余万平方公里地区的勘矿权。到 1907 年，原定勘矿期限早已逾越多年，但该公司借词“实未探竣”，要求延期。是年 8 月，山东巡抚杨士骧派员与该公司谈判，同意展期 2 年。消息传出，群情愤激，纷纷成立保矿会，要求收回 5 矿矿权，并呼吁保护津浦路沿线各矿区的矿权。各界人士还联名公呈，声明签订茅山 5 矿合同时，“东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如不废约，“当限制开矿，抵制德货，以为后盾”。山东籍旅京官商也屡次集会，成立路矿研究所，并联络各省有关团体，协力抵制德商开矿。德商迫于山东各界反对，乃通过驻济南领事向山东巡抚提出“让归中国自办”，但又索“赔偿银 80 万两”。此举遭绅商一致反对，而新任巡抚惧怕引起外交纠纷，最后奏准由山东省库分期拨付赎款，了结此案。

云南收回澂江等 7 府矿权的斗争。1900 年，法国以云南发生教案为由，勒迫赔偿，并乘机攫取了澂江、临安、开化等 7 府的铅、锡、锑、汞、铜、锌等矿的开采权，由英法隆兴公司承办。1902 年该公司又与云南地方政府签订《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规定公司可在上述 7 府开矿，若 7 处无矿可采时，可移至其它地方，另行开采。这样，云南境内的矿权则完全被隆兴公司所攫取。1906 年滇省绅商就纷纷要求废除 7 府矿约，1910 年收回 7 府矿权的斗争进入了高潮。云南留日学生倡议“保矿会”，力请废约。云南群众不顾官府压制，成立“矿务研究会”，连日集会，要求废约保矿。陆军小学学生赵永昌拔刀断指，杨越割臂血书，并沉痛呼吁：“七府矿约不废，则我等命脉已亡，死期近矣。”云贵总督李经羲迫于舆论，只得上奏清政府撤销合同。1911 年，经交涉，由中国出银 150 万两，赎回 7 府矿权。

在收回矿权的高潮中，由于各省人民的斗争，四川省于 1906 年相继收回了法商利华公司揽办的巴县、万县煤油矿权，法商福安公司承办的重庆等 7 府矿权，法商福成公司开办的天全、懋功 2 县五金矿权，英商开东公司攫取的勘办四川煤油各矿的权利，英商华英煤铁公司占办的江北厅煤铁矿的开采权。此外，奉天省收回锦西暖池塘煤矿开采权，黑龙江收回都鲁河及吉拉林河砂金矿开采权，湖北收回阳新炭山湾煤矿开采权，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还赎回原属德商占有的股份，收归华商自办。

（二）收回路权的斗争。在收回利权斗争中，收回路权的斗争表现得尤为激烈。

当时的爱国人士对路权丧失给国家民族所带来的灾难，认识深刻，反映强烈。他们指出：“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论，则关乎财政；从调运上论，则关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也就是说，开展收回路权的斗争，不仅是一个经济权益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四川》杂志则载文明确指出：“铁路亡，川省亡，我七千万人的生命财产随之以亡。”

收回粤汉铁路的斗争。这是当时开展最早的一次收回路权的斗争。1898 年美商合兴公司同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路的建筑权。1900 年又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合约》，规定粤汉路工程应在 5 年内修成。并规定合兴公司享受的权益不得转让给他国。但到 1904 年初，不仅铁

《矿务档》，第 1201 页。

《滇中争废矿约纪略》，《云南》杂志第 20 号。

路干线尺轨未铺，而且还将 2/3 股票私自卖给受法、俄支持的比利时银团万国东方公司。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的违约行为，使两湖、广东的绅商极为气愤。湖南绅商首先提出废止合约，收回自办的倡议，湖北、广东的绅商立即响应。从 1904 年开始，一场主要由 3 省绅商领导的收回粤汉路的斗争便迅速展开。

由于 3 省人民坚持斗争，使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感到：“现在三省绅民志坚气愤，其势汹汹，若此路不能收回自办，必致酿成事变，地方官无法弹压，以后诸事更难办矣。”于是也主张收回自办。但他惧怕引起外交纠纷，因而又主张改废约为赎约。1905 年 8 月，中美两方经过谈判，订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以 675 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路赎回自办。这次斗争的初步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收回利权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收回苏杭甬铁路的风潮。苏杭甬铁路是 1898 年英国政府逼迫中国政府同意准许英商承建的 5 条铁路中的 1 条。但合同签订后，铁路勘测工作一直没有进行。1905 年，江浙两省绅商分别成立本省的铁路公司，修建铁路。英驻华公使闻讯后，即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要求签订正式合同。浙江绅商致电外务部，极力反对与英国签订正式合同，坚决要求废约自办。1907 年，江浙两省绅民不顾英国的恫吓，正式动工修建苏杭甬铁路的苏杭段。

英国驻华公使要求清政府“请饬停工”，并指责清政府是“有意失和”。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脆弱的清政府被迫屈服，同英国政府订立了《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向英国借款 150 万英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聘用英国总工程师，将苏杭甬铁路的起点改为上海，与沪宁路相连。这就是所谓“借款筑路”，其实质仍是将沪杭甬铁路的主权出卖给英国。

英国的贪婪与清廷的媚外，激起江浙人民的愤怒。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而死。铁路业务学校学生邬纲也为此气愤吐血身亡。这两起事件引起江浙两省社会的震动，学界纷纷举行追悼会。反对“借款筑路”的斗争进一步趋于高涨。1907 年 10 月 22 日，杭州首创“国民拒款公会”，声明坚持拒款到底，并将主持此项借款的汪大燮等 4 人开除浙籍。江浙各界纷纷响应，相继成立拒款会或拒约会。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还上书揭发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请求予以查办。但是，清政府却发布上谕，申斥汤寿潜，并将其革职。浙路全体股东召开特别会议，公开抵制清廷这一上谕。由于江浙拒款斗争的开展，盛宣怀只得把沪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铁路借款，并企图把沪杭甬铁路“收回部办”，实行“铁路国有政策”。

在粤汉、沪杭甬两路保路斗争的鼓舞下，四川、直隶、山东、江苏、安徽、云南等省也相继开展保路斗争。这些斗争的蓬勃展开，成为辛亥革命前夕保路运动全面高涨的前奏。

保路运动是由于清廷皇族内阁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悍然宣布“铁道干路国有”政策，将已准归商办的粤汉、川汉两路抵借外债所激发起来的。

1911 年 5 月 9 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谕令“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并声言“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实行官办铁路，如果是为了发展交通事业，加速国家经济建设，这本来

也无可非议。但是，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却是为了接受四国银行团奴役性贷款，将路权出卖给列强，以争取帝国主义支持，挽救行将崩溃的封建政权。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它一出笼，理所当然地遭到各省绅商及民众的强烈反对。

湖南首先爆发了抗议铁路国有的运动。5月10日，谘议局致电各有关省谘议局，请求一致行动，抵制铁路国有；接着，各界连日集会，痛诋朝廷及盛宣怀拍卖国权的行为。14日，抗议达到高潮，数万人聚集在教育总会开会，与会者义愤填膺，有的当场断指以表愤懑。大会决议：全力推进湘路商办的进行；召集正式股东会，分段开工；继续筹办租股；概行抵制来湘强事修筑的督办或外国人；商办不得见准，则实行闭市、停课、抗租等办法。16日，长沙各团体代表往抚署请愿，铁路公司长沙株洲段工人万余人也停工进城游行。6月初，各学堂相继罢课，谘议局议员纷纷辞职。湖南巡抚杨文鼎严令禁止集会、散发揭帖，取缔印刷店，并出动警察、巡防队，沿街巡逻。

湖北闻知铁路国有上谕后，谘议局立即召集数千人参加的大会，商讨反对铁路国有办法。留日学生江元吉洒血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存国”，在场的人情绪激昂，“大呼救国”，一致反对借款，力争商办。

广东省各界在6月6日举行股东大会，1000多名股东通过了“仍援原案，坚请商办”的议案。总督张鸣岐派兵到会场弹压，并勒令决议无效，另期再议。股东们又于9月3日在香港成立广东保路会，与会者近万人。商定以“破债约，保路权，维持完全商办，联合川湘鄂三省，一致进行”为宗旨，通过保路会章程、通告会情于中外、设海外分会等决议。海外华侨热情支持广东保路运动，越南等地华侨团体致电声援，表示“商办铁路，铁案如山，万不能归国有”。

四川人民的勇猛斗争则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清政府1911年5月9日关于铁路国有的上谕传到四川，立即引起川人的强烈不满。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了临时股东准备会，商定由公司董事局和驻省各法团请川督代奏，请求朝廷暂勿派员收路。不久，即遭清廷上谕申斥，并宣布处理川汉铁路股款的办法是，除公司在上海倒折之款不予承认外，对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还现款。如果要还现款，则必须以本省财政作抵押，向外国借款。同时，拒绝川人自办支路和开矿的要求。朝廷的决定使立宪派走投无路，不仅亏空无处填补，就连所存现款也要被朝廷劫去。过去曾主张保存路款，承认国有的邓孝可，这时才如梦方醒，叫苦受了朝廷的骗。6月13日，同英、美、德、法签订的4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看到条款，人们如同撕肝裂胆，痛诋“盛大臣卖国奴”。

6月17日，保路同志会成立，蒲殿俊与罗纶任正、副会长。从此，各阶层各业的保路同志会纷纷建立。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去府厅州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宣传保路救国的道理。

但是清政府绝不让步。8月，盛宣怀、端方收买了川汉公司驻宜昌总理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52页。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7号，《报告》。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

李稷勋。在盛的授意下，李不顾总公司“坚持破约”、“拒绝交待”的指示，呈请接受国有；盛宣怀则以上谕的方式，让李用川款续办宜昌段铁路。这一阴谋不啻是把川路公司推上绝路。保路同志会决定自8月25日起罢市罢课。9月1日，四川铁路公司在成都举行股东大会，又通过了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的决议，并由咨议局呈报资政院。这一决议一宣布，全省响应。一时间，“十余州县地方，并相约不纳钱粮，不上捐输，学堂停课，商民罢市”。

各地人民抗捐抗税、罢市罢课斗争迅速发展，使统治者惊恐万状。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蒲殿俊、罗伦、邓孝可、张澜等人。全城震动，数万人直奔督署要求释放被捕诸人。赵尔丰竟下令屠杀徒手无辜的请愿者，当场打死32人，伤者无数，酿成“成都惨案”。统治者的暴行，激起四川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当时四川同盟会正联合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并将同志会改为同志军。成都惨案后，保路同志军各路直奔成都城下。不多日，围攻成都城的同志军有10多县，每县都不下数千或几万人。城内清军惊慌失措，但由于同志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各自为战，又加上作战经验不足，武器陈旧，攻城未下。同志军转而攻略各州县。回师荣县，同志军首领王天杰接受革命党人吴玉章的建议，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由革命党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

保路运动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和组织的一场爱国运动。它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保路运动的深入发展，不仅粉碎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幻想，还一步步地把一些立宪党人逼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尤其是四川保路同志军在武昌起义前夜发动的四川民众反清大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序曲。

第四章 清王朝的覆灭

一、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爆发了武装反清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

湖北的革命团体除较早的日知会外，又相继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自治团、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数学研究会等约30个。后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大都归入共进会和文学社中。共进会成立于1907年8月，是由一部分同盟会员和旅日留学生在东京成立的，其宗旨与同盟会一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第二年，推刘公任会长，居正任参谋，孙武任军务部长。为准备回国组织起义，又推举刘公为湖北大都督。1909年春，孙武代刘公回鄂活动，发展会员，设立联络机关，开展革命活动。共进会成员起初主要为会党和市民，以后又吸收学生参加，特别是把发展重点放在新军。到1911年10月前，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会员约有1500人，学堂中发展会员约有200余人，其他社会阶层入会者约200余人。

1908年7月26日，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革命士兵成立的军队同盟会，不久因领导人离鄂入川而无形解散。是年11月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人心震动。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钟琦等发起，于12月中在武昌小东门外金台茶馆成立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并通过宣言、简章，推钟琦任庶务。1909年11、12月间，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相继加入群治学社。该社以四十一标为基地，积极在湖北新军中发展社员，势力发展很快，因而引起清官方的注意。为避免暴露目标，先后改名为振武学社和文学社。1911年1月31日在黄鹤楼的风渡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它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掩护，揭橥“推翻清朝专制”、“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的宗旨。蒋翊武被推举为文学社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该社建立5个月，在新军中发展的社员就将近2000人，到9月份已达3000多人。

1911年8月，文学社《大江报》接连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文，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此时非有极大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这些犀利如剑的语言惊撼人心，催人奋起。清政府企图遏止革命思想的传播，立即查封，逮捕了总编辑詹大悲等人。但处在革命风暴的前夜，任何企图都难以挽救清王朝奄奄一息的命运。

1911年9月14日，共进会、文学社领导人达成联合协议，拥护同盟会革命纲领，要求两派成员“一律以革命党人身份，与清王朝拼死活”；一致同意派人赴沪与中部同盟会取得联系，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主持举义大事。然而，受命赴沪的居正、杨玉如没有能使黄、宋立即返鄂指导起义工作。

9月24日，两派领导人以及各标营文学社、共进会代表在武昌胭脂巷11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25页；1912年10月7、8日《民立报》。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516页。

号召开会议，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确定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参谋长孙武。下设军务部、参谋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调查部、交通部。并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

会后，各种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进行。不料，清政府发现革命党起义迹象，加紧搜捕党人，不得不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辛亥八月十八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内检验炸药，炸药突然遇火爆炸，孙武受伤。俄巡捕闻声赶来，从柜中搜出旗帜、袖章、名册、文告和盖印纸钞，并逮捕了熟知内部情况的刘同叔嫂等人。

面对严重的意外变故，刘复基、蒋翊武等人决定当夜发动起义。

入夜，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带兵弁亲往革命党人总机关小朝街85号搜捕，逮捕了坚守在领导机关的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并于次日凌晨将3人杀害。同时湖北当局严令各部门加强防范，关闭城门，城内戒严，按搜查到的革命党人名册到处搜捕，形势处于非常危急之中。于是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第八营驻扎在中和门内，紫阳湖旁，楚望台军械库就在它的东南侧。这里建立了完备的革命组织，士兵中有四成加入了革命党，已经形成强有力的革命基础。10月10日晚8点半，第二排排长陶启胜率护兵巡棚查哨，见士兵金兆龙、程正瀛推弹上膛，持枪而立。陶厉声斥问，并欲上前夺枪。金借机大喊“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便向陶连开两枪，将其打死。闻声赶来镇压的工程八营代理管带、右队官、司务长等被群情激愤的士兵击毙。熊秉坤集合队伍四五十人立即奔向楚望台军械库，与驻守军械库的工程八营左队义军汇合，共有400人左右。接着，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二标和马队八标、炮八标等大部分标、营、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以及测绘学堂的学生，纷纷投入起义行列。起义人数达3000人左右，控制了城东南的保安门城楼、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要地。

革命党人抓住时机，迅速推举曾参加过日知会的工程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出任临时总指挥，担负主持攻取督署的任务。接着，在炮队炮火的配合下，革命军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长驱直入，攻克第八镇司令部，进而直逼督署。躲在督署里的湖广总督瑞澂仓皇穿洞逃往“楚豫”兵舰，张彪逃往汉阳。督署被革命军占领。

经过一夜的鏖战，革命军的红底十八星大旗高高飘扬在黄鹤楼上，武昌城已掌握在革命军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进行了历时16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第一次成功地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驻扎在汉阳、汉口的是二十一混成协的步队四十二标一营、二营。11日下午，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文学社阳夏支部支部长兼标代表胡玉珍遂决定当夜起义。入夜，胡玉珍的枪声一响，起义部队立即集合，管带汪炳山仓皇逃走，队官宋锡全被举为指挥。驻兵工厂的左队占据龟山，架炮待敌。接着又击溃日前由武昌逃窜而来的清军辎重八营残部。兵工厂等地守军驱散厂警，缴得厂中大量快枪、过山炮、钢炮、炮弹，为装备革命党人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11日傍晚，二营代表赵承武在汉口居仁门发动起义，并与汉阳革命党汇合。至此，武汉三镇除汉口刘家庙外，都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

革命起义成功，迫切需要革命党人建立起一个统帅全局的领导机关，以利乘胜进击。当时，共进会、文学社两团体的领导人或被捕或转移，而发动

起义的成员大多为士兵，只有少数中下级军官，他们没有认识到应当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反而认为自己位卑而号令不行，希望推举军队中或社会上有资望的人出来组织政府，以便号召群众。10月11日下午1时召开的由首义的革命党人、谘议局议员及绅商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组织革命军政府问题，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立宪派首领汤化龙被推举为民政总长。

军政府的建立，一方面象征新政权的诞生；另一方面，这个新政权一开始就被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所控制，特别是将黎、汤抬上军政府最高领导层，这就种下了革命失败的祸根。

然而，新政权成立初期，由于最后的胜负形势还不明朗，黎元洪表示消极，汤化龙亦暗地里致电清政府，表示“决不从逆”。因此，负责处理军政府军政大事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手中。这一点，从军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文告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军政府成立后，发布了《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电》、《宣布满清罪状檄》、《致满清政府电》等一系列文告，向全国各界人士庄严宣告，贯悉满盈的清朝统治已到非推翻不可的地步；号召人民披坚执锐直捣龙廷，“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并敦促清廷认清时势，及早削号归藩，向军政府降服。军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向人民昭示自己政权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宣布湖北各州县一律改制共和，清吏呈缴印信，由革命政府重新任命官吏；要求各地自治团体速筹自保，守卫乡里，各地巡警坚守职事，维持治安。文告的发布，起到了稳定人心，号召民众，镇慑和瓦解敌人的积极作用。在经济方面规定：废除苛捐杂税，稳定金融和物价，整顿财政，为满足人民的日需，设立平糶所，准民贩盐，并浚修水利。在司法方面，设立江夏裁判所和临时上诉审判所，颁布审判暂行条例、上诉暂行条例，依法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并准民上诉、公开审理。在外交方面，向各国驻汉口领事馆发布《照会》，指出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军政府希望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照会》颁布后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任何条约、取得包括债权在内的任何权利，军政府一概不予承认。社会生活方面，规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支月薪20元，班长12元，士兵10元；使官兵薪俸不至过分悬殊。军政府还颁令严禁吸食贩卖鸦片、蓄辫、缠足等恶习，倡导使用文明称谓等。这都表现出革命之后武汉出现的新气象。

军政府颁布的《鄂州约法》共7章60条。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都督、政务委员的权限，立法与司法机关的职能等内容。约法遵循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和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勾勒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部重要文件。它为各省独立后纂订大法 and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拟定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部约法存在某些缺点，如在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和如何贯彻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它在当时紧张的战乱中能及时制订出来并且体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实属难能可贵。

为将革命推向湖北周边各省，应付清政府的反扑，军政府成立后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扩军备战。10月13日，军政府布告募兵，暂编步兵4协，马队1标，炮队2标，工程辎重各1营，军乐、宪兵各1队。各界踊跃报名，

不到3天就满额，于是又增设第五协和两个敢死队。同时还努力恢复汉阳兵工厂的生产，赶制军火，并鼓励工人革新创造，以备战事急需。这表现了起义领导人军事上的远见。

面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力量迅速发展的局面，清政府惊恐之余立即调遣海陆军队向武汉进犯，企图一举扑灭革命。于是义军进行了武汉保卫战。

当时，革命军计划消灭汉口周围的清军，以图向四周发展。18日凌晨，革命军1300人向刘家庙发起攻击，首战告捷，占领了刘家庙车站，敌人2000人四处逃散。24日，清军水陆进犯汉口，革命军奋力抵抗，牺牲500多人。经过几次拉锯战，刘家庙得而复失，革命军受到严重损失。

10月28日，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黄兴由上海到达武汉，与黎元洪会晤后，即毅然承担汉口军事指挥重任，连夜亲赴汉口指挥战斗。

但是，一是由于清军援兵大量到达，在数量上很快大大超过因各地起义而缺少援助的义军；二是清军使用火攻战术，残暴地焚烧街道的市廛民宅，汉口的商业繁华区、居民密集区被烟火所淹没，焦土遍地，遭难者“狼狈不堪，情形极惨”。革命军被迫节节败退。11月1日夜，汉口失陷。27日，汉阳又陷落。

当晚，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报告了汉阳战事失利的经过及情况，并主张放弃武昌，挥师东下，攻占南京。由于当时清军主力麇集武汉，他处如南京等地空虚，因此，黄兴之议不失为可取之策。但由于与会者多数反对，黄兴遂于次日搭日轮“岳阳丸”赴上海。而清军方面，由于全国革命蜂起，更因袁世凯乘机逼宫和镇压革命派，亦暂停攻击。武汉保卫战暂告一段落。

武汉保卫战，前后历时近2个月之久。尽管汉口、汉阳最后都被清军攻占，但它在近2个月的时间内，拖住清军的主力，使其无暇他顾，这就为各省的光复，争取了时间。到汉阳失守时，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福建、广东、四川等10多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汉阳失陷后5天，南京也宣告光复。因而，武汉保卫战虽然失利，但全国的局势已经改观。

二、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在湖北革命党酝酿武昌起义的同时，湖南、陕西等省的武装起义也在积极筹备之中。革命党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给各省革命党推翻清朝统治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从此，拉开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的序幕。

（一）湘赣起义

湖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1911年9月底，两湖革命党人即约定，起义后10天内响应支援。10月21日，共进会湖南领导人焦达峰宣布次日起义，颁布16条命令。22日，焦达峰和新军四十标排长、教官陈作新率起义军占领了军装局、谘议局，并指挥队伍进攻抚署，巡抚余诚恪化装潜逃。起义军占领抚署后，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当晚，各界代表集会，焦达峰被举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长沙起义胜利后，湖南各地揭竿而起，至30日，除湘西外，全省均归附革命，并立即组成援鄂军6万人，乘轮北上，有力地支持了湖北革命党人的斗争。

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在起义胜利后，千方百计抢夺军政大权，力举谭任参议院议长，并控制了都督属下军政、民政两部的重要部门。10月31日，谭延闿勾结旧军官和政客，策动兵变，将焦、陈杀害，谭出任都督，立宪派夺取了军政府及各属的领导权，湖南开始陷入军阀统治之下。

地处长江中区的江西九江积极响应武昌举义。10月23日晚，革命党策动新军第五十三标、第五十五标炮兵营官兵起义，向道府两署进攻，清官吏闻风溃逃，革命军占据九江，并成立九江军政府。众推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都督，湖北军政府派到九江策动革命的蒋群帮办军务兼参谋长，实际掌握军政府大权。数日后，同盟会骨干李烈钧来到九江，蒋群主动让位，李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24日，驻守湖口和马当炮台的清军与革命军作战失利，守兵投诚。同时，增援湖北清军的海军水师3艘巡洋舰和8艘炮舰、2艘鱼雷艇在海军司令黄钟瑛率领下，由武汉驶往九江，参加革命。九江起义和海军归附，是对武汉湖北军政府的重要支持，对江西南昌及安徽的光复也影响重大。

10月30日夜，南昌革命党发动新军第五十四标举义，陆军小学堂和测绘学堂学生响应。31日清晨，起义军占据南昌城。11月1日，九江派来的蒋群率部来到南昌，各界集会，公推原新军协统吴介璋为都督，江西宣告独立。接着，驻袁州、萍乡新军于11月3日宣布反正，推第二营管带胡谦为都督；赣州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推巡防营统领刘槐森为都督。鄱阳起义后，推黄金台为都督；宜丰起义后，革命党人蔡锐霆自任都督。这样，江西全省光复，却出现5个都督分立、政争不断的局面。鉴于此，江西省临时议会请率军援鄂的李烈钧回省出任都督。南京临时政府遂任命李烈钧回省任职。李受命回省改组政府，整编军队，镇压会党，遂使政局逐步稳定下来。

（二）秦晋独立

陕西是北方第一个举义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1907年，同盟会员井勿幕由日本回到西安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西安成立。1910年，陕西革命党人感到同盟会在南方起义屡遭挫折，决定改变方略，由关中首先发难。他们一面派人赴日购置武器，与上海中部同盟会联系；一面加紧运动新军和会党，积极准备起义。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西安革命党立即响应。10月22日，同盟会员、新军一协参谋官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翔为首领，一标三营督队官钱鼎为副首领的起义军，迅速夺取城内军装局、巡抚藩台衙门和制高点鼓楼，西安将军文瑞逃往满城。次日，革命党直捣满城，清军溃败，文瑞投井自杀。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推举张凤翔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军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人民安居乐业，恢复经济；组织革命军回击清军的进攻。至此，全省大部分地区归附革命党。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已基本控制了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除协统谭振德外，多数官佐俱系同盟会会员或同情革命者。武昌起义爆发后，山西巡抚陆钟琦则加紧对山西新军的控制，并以防堵陕西革命军的名义，将驻太原新军调往风陵渡，而将驻扎外县的巡防营调进省城警卫抚署。革命党人决定，在开拔前得到弹药后，立即起义。10月28日，八十五标二营四个队官和管带姚维潘商议，决定率众起义，姚被推为总司令官。次日，起义军兵分三路，进攻太原城，经过激烈的战斗，革命军击溃抚署卫队，击毙巡抚陆钟琦和协统谭振德。这时，驻扎城内的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觉清军大势已

去，便率各营响应起义，与八十五标起义军会合，太原光复，阎锡山被推为军政府都督，山西军政府宣告独立。

（三）上海和江浙皖起义

上海是革命党活动频繁，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地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部设在上海，其主要负责人之一陈其美直接领导了上海的独立工作。光复会在上海的机关部锐进学社在李燮和主持下，也积极开展工作。他派人去杭州、江宁、苏州等地运动起事，以求与上海声连气合，并在上海亲自组织敢死队和光复军，利用湖南同乡关系争取吴淞巡官和巡防营、巡防水师管带等人，支持革命，“静待后命以应起义”。

根据宋教仁“以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的意见，沈缙云、叶惠钧等人去做上海自治公所总董、上海商团主要领导人李平书的工作，使其转向革命。武昌起义后，商团领导人并不想固守一隅，而求急起响应。经过陈其美、沈缙云向李平书等人反复陈说革命宗旨，使李平书等人由立宪倾向革命，共同商定了起义行动方案。

上海起义原定11月5日发动，但由于11月3日发生上海闸北巡警与长官冲突，警官陈汉钦率众首先起事，与商团一起接管沪宁车站，占领巡警总局，宣布闸北光复。于是，起义提前发动。陈其美率敢死队队员进攻江南制造局，首攻失利，陈其美被俘。李燮和、李平书等闻讯率护军营和巡警前来支援，各路起义军也纷纷赶来，再度围攻制造局，次日拂晓一举攻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上海光复。宝山、松江等地也宣告独立。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推举陈其美为都督，李燮和等人为参谋，建立起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政权。

地处长江出海口和近代经济重要发展地区的上海，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都居于全国举足轻重地位。上海光复，就使清政府失去了向南图谋的中转站，围困武汉、援助清军的海上通道被截断，促成南北对峙格局。

江苏由于立宪派力量强大，巡抚程德全又相机善变，与张謇等立宪派人物过从甚密，因而其“独立”带有不同于各省的特点。

程德全与清廷结有宿怨，鄂、沪事变，他感到清廷难以久持，又风闻新军不稳，便于11月5日策动新军马、步、辎重队袖缠白布，开进苏州城。新军占领各机关后，径诣巡院请求程宣布独立，并出任江苏都督。程接受新军的请求后，即在抚署设立江苏都督府，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自任都督。其下属州县，或者由革命党发动新军宣布独立，或由民团据城宣布独立，但政权依然被地主绅商和旧官僚所把持。

南京是两江总督的驻地，为江苏的政治中心。革命党在驻守南京的第九镇中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苏州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对新军严加控制，并增加在南京的兵力。由于受到总督的猜忌，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附和革命”，并在革命党新成立的江浙联军中担任总司令，向南京清军发起进攻。11月23日，革命军占据了乌龙山和幕府山，12月2日占据南京全城，张人骏和守将张勋逃窜。克复南京使革命军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稳定了武汉战役失利后的局面。正在汉口筹组中央政府的各省都督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首府。

革命党在浙江有着良好的基础。驻扎杭州城郊的第二十一镇第四十一协的官兵，有很多是同盟会、光复会的会员，巡防营、警察也多半赞同革命。11月3日上海独立的消息传到杭州，革命党人便决定11月4日举义。是日

夜 10 时，驻杭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以及上海赶来的敢死队与城内警察营、工兵营中革命党人里应外合，攻下抚署和旗兵据点。驻防将军德济以举汤寿潜出任都督为条件，同意投降缴械。杭州光复。11 月 7 日，各界代表大会正式推举汤寿潜为都督。浙江军政府宣告成立。是年底，汤被确定为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即辞都督职，次年 1 月 11 日，同盟会会员蒋尊簋由广东归来，继任都督职。

武昌起义爆发，皖籍革命党纷纷回省发动起义。原定 10 月 30 日晚起义，因谋划不周而失利。革命组织信义会先后攻取了寿州、六安、凤台等县。尔后，合肥、芜湖、颍州连连为革命党所占有。在革命潮流汹涌之际，立宪派人士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于 11 月 7 日在谘议局开会，决定次日自行宣布独立。朱家宝在形势的逼迫下，又接到袁世凯希望他“顺应时势”的来电，便于 11 月 8 日同意独立，出任都督。11 月 11 日，革命党人召集军学界代表会议，重新宣布独立，并拥立由武昌奉命前来的王天培任都督，但朱家宝煽动巡防营反对，迫走王天培。革命党人向九江马毓宝求援，马派黄焕章率部抵安庆，赶走巡防营，黄又自命都督。但黄部入城后大肆劫掠，军纪极坏。李烈钧奉命率兵来皖查办，被推为都督。后李烈钧率兵赴援武昌，同盟会会员孙毓筠被推举为都督。安徽政局渐趋稳定。

（四）两广、福建独立

广西是革命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革命党人在新军、会党和绿林中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10 月 31 日，革命党人刘峴首先率 2000 余人在梧州宣布独立。各地党人纷起响应。巡抚沈秉堃见大局难改，接受立宪派建议，于 11 月 7 日宣布“独立”。次日，立宪派又在谘议局开会，推沈秉堃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和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并通电全省，号召反正。但沈、王非广西籍人士，无法驾驭局面，借北伐之名离开广西北上，地方实力派、副提督陆荣廷乘机攫取了都督之位。

广东是革命党活动的重要地区，经过历次武装起义的锻炼和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革命思想的传播较于他省更为广泛和深入。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加紧筹划布置，胡汉民、朱执信等计划分兵四路举义。10 月 24 日，化州革命党人组织的拜兰团联络会党首先举义，攻取州城。随后，各地响应，汇聚广州郊外。城内革命党人策应，于 10 月 25 日炸死甫抵广州的新任将军凤山。两广总督张鸣岐见清廷大势已去，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说合下，同意广东独立。11 月 9 日，各界代表集会谘议局，通过决议，宣布独立，张鸣岐、龙济光被推为正、副都督，广东光复。张鸣岐、龙济光与革命党历来矛盾，不敢接任，后推举胡汉民为都督。胡就任后，又增选陈炯明为副都督。

福建革命党在同盟会成立后就创立了汉族独立会、体育会等组织，积极培养骨干，在新军和会党中发展力量，并通过彭寿松发起组织军警同盟会，加紧争取新军，军警同盟会发展到近万人。武昌起义后，新军将领也纷纷入盟，第二十协协统许崇智和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相继加入同盟会。11 月 9 日，新军发动起义，经过激战，清军溃败，闽浙总督吞金自尽。福州光复。11 日，改旧督署为福建都督府，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五）云贵川独立

云南革命党注重从联络哥老会首领入手，开展争取新军的工作；同时还通过由同盟会会员李根源任总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把培养清军下级官佐的学堂变成培养革命骨干的基地；通过它向新军陆续输送了 800 多名下级军

官，成为日后武装起义的基干力量。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来的同盟会员唐继尧等人在新军中任要职，掌握了驻滇第十九镇的大部分军权。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调任驻昆明的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蔡虽在政治上追随康梁，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一切，都为起义成功创造了条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昆明，革命党人多次集议，决定于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举行起义，并推举蔡锷为总指挥。10月30日夜，驻昆明的第七十三标排长黄毓英率人打死反动队官，管带李鸿祥立即集合队伍，攻破北门，进攻军械局和五华山。蔡锷闻讯，急率队响应。经过一天多的激战，革命军歼灭负隅顽抗的清军，占领昆明城。11月1日，成立大汉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举为都督。

贵州的辛亥革命与上述省份和地区不同，领导者不是革命党人，而是由原主张立宪后转向革命的自治学社。自治学社1907年成立，主要领导人是张百麟等人。1910年前后，该社积极开展争取新军、陆军小学堂和会党的工作，从事起义的准备。1911年9月，成立了以张百麟为首的总揽起义计划的十人委员会。滇省起义消息传来，自治学社领导人于11月3日由陆军小学堂学生首揭义旗，各支起义力量纷纷响应。巡抚沈瑜庆被迫交出政权。11月4日，起义军进入贵阳城，宣告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推举教练官杨荃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总揽政务。不逾月，全省均告光复。

四川的革命党人在吴玉章、王天杰领导下，乘保路运动的气势，于9月28日实现荣县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11月22日，重庆革命党人发动政变，和平接管重庆，建立蜀军政府，同盟会员张培爵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府的权力。全川各州县在重庆光复前后，也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致使成都成为一座孤城。革命形势的高涨，使赵尔丰十分惊恐，他被迫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经谈判，签订四川独立条约，赵尔丰同意将四川政权交给谘议局。11月27日，由赵宣布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四川军政府，由蒲殿俊任都督，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军政府无力弹压，蒲、朱潜逃。尹昌衡率新军入城平息兵变，被推为都督，罗纶任副都督。他们改组军政府，镇压了阴谋复位的赵尔丰，使局势逐渐稳定。1912年2月2日，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为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罗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

（六）直鲁豫革命党人的起义

直隶地处近畿，清政府的统治十分严密，北洋六镇又受袁世凯的严密控制，由日本和保定军校毕业的革命党人很难在清军内积累力量，而且直隶革命党缺乏核心领导，组织上散漫，因而与南方各省比较，直隶革命党人的活动要困难得多。1911年10月27日，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北方将领蓝天蔚、卢永祥等人发动滦州兵谏，以武力逼迫清廷实行立宪，抗拒清廷南下镇压革命的调遣，并致电声援武汉革命政权。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有着明显的革命倾向，又得革命党人拥戴。山西光复后，清廷命其率第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吴抵石家庄后，即揭起反清义旗，下令扣留运送军火南下的火车，电请汉口停战，自己则赶赴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协商，准备会攻北京。吴的活动对怀有篡权阴谋的袁世凯，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于是袁便派被吴撤换的原十二协协统周符麟潜回石家庄，联络反动军官多人，于11月7日凌晨把吴禄贞刺杀。同时，又下令撤去张绍曾的统制职务。这样，革命党人会攻京城的计划便中道夭折。此后，革命党相继组织了石家

庄、北京、任邱、雄县、滦州、通县、天津起义，均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山东受到清政府特别是袁世凯的严密控制，地方上各界人士与北洋集团关系密切，政治上历来保守；同盟会在山东的活动范围没有超过学界，影响有限。因而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独立，而山东却保持旧状。这时盛传清政府以山东全省为抵押，向德国借款购械以镇压革命，致使民情激愤。11月5日及13日，各界代表连续举行大会，并议决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推派代表向巡抚孙宝琦请愿，要求独立，孙被迫同意，并出任都督。山东形式上宣布独立，但军政大权均控制在孙宝琦手中。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组成后，即要求孙取消独立。11月24日，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为时12天的山东独立宣告失败，革命党人惨遭捕杀。

河南与其它省份比较，革命党力量要薄弱得多。他们多在开封和一些州县的学堂中任教，传播革命思想，而没有注意在新军和会党中工作。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才着手做独立的准备。10月13日，革命党人商定运动新军起义，不料被河南巡抚侦知而早做防备。革命党人改在外县联络秘密会社和农民武装，分兵三路于11月下旬分别袭取洛阳、鲁山和开封。但由于革命党仓促上阵，缺乏部署和装备，致使三路均遭失利。革命党计划再次攻取开封城。计划未及实施而泄露，革命党张钟端等11人遭清政府杀害。河南独立最终未能成功。

（七）东北、内蒙古和西北各族人民的起义

东北是清王朝贵族的发源地，在战略上则是清王朝的大后方。革命党曾在新军中活动，组织力量，并与地方的联庄会和绿林建立联系。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曾策动起义，但均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所镇压，革命党人惨遭杀害。

内蒙的革命党主要活动在归绥道和土默特旗地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联络军队在绥远和归化一带，陶林厅、丰镇、包头等地发动起义。由于义军没有互相接应，又缺少周密的筹划和坚强的领导，终被清军各个击破。

在各省起义、独立的同时，西北地区也予以响应。西北各省中以新疆革命党活动最为显著。直到1911年底和翌年初，武昌起义的消息才传到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利用在军队中的哥老会组织，联络各界力量，在维吾尔人民的支持下，于1912年1月7日发动起义。首先占据弹药库和将军署，处死将军杰锐，组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成立都督府，推举已卸任的伊犁将军广福任都督。新疆的迪化和甘肃的西宁、宁夏、秦州等地革命党人也发动过武装起义，影响较大的有宁夏会党首领刘华堂领导的起义，革命党人黄钺在秦州发动的起义。

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予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影响，1911—1915年的4年间，连续爆发了9次规模较大的武装反日斗争。辛亥革命前后，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是互相支持，战斗在一起的。

武昌起义和全国革命浪潮的掀起，说明一个腐朽的政权不可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政权的更替如同事物由量变到质变，政权腐朽到一定程度，将不可救药，必定灭亡。同时又说明，任何反动势力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反动的暴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摧毁，只有通过革命党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并作出巨大牺牲，才能推翻一个已经腐朽透顶的政权，实现历史的转变。

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武昌起义后 14 省纷纷光复独立，在短短的几十天里革命形势以及革命党与清朝统治者斗争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使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人们在摧毁帝制、建立共和的大目标下动员起来，而且，集聚起来的力量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为了推进革命的进程，立即成立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央政府的呼声愈来愈强烈。然而，由谁来组织中央政府，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等问题，在革命党、立宪派和旧官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革命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人十几年来致力于武装推翻清王朝的事业，但他们并没有预料到武昌起义能在这时爆发，并且立即以摧枯拉朽之力掀起各省革命的浪潮，因而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建立中央革命政府的种种问题，对于不同利益集团就政权问题而展开的矛盾斗争也没有思想上的警惕和组织上的对策。

在孙中山回国前，关于组建中央政府的争论已经开始。10 月下旬，宋教仁、于右任拟订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建议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办法，并请各省举派代表莅沪集议。上海立宪派人物林长民闻讯后，赶紧致函时任湖北军政府民政部长的汤化龙，提议用谘议局联合会体制，将易帜各省联合组成统一的临时政府，准备在革命党无暇顾及之时，抢先建立以立宪派为主体的中央政权。上海独立后不久，沪督陈其美在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说合下，联袂倡议在上海设立临时机关，特邀各省旧时谘议局和现时都督府举派代表各 1 人，驻沪开会，商讨组织临时政府。11 月 12 日通电发表，立宪派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与革命党共同组织中央政府的地位。与此同时，武汉方面也在积极从事组建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在上海方面发出通电的前 3 天，即 11 月 9 日，黎元洪已通电各省，速派代表来鄂商组临时政府。这样，关于商讨组织中央政府的各省代表会议地点问题的争执，便形成了以武汉和上海为核心的两个不同的集团。经过多次磋商，最后决定各省暂留 1 人驻沪以通声气，其余均赴武汉。

11 月 30 日，鄂、湘、闽等 11 省代表 23 人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湖南代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接受袁世凯提出的继续在全国范围停战 15 天的建议，同意袁所派代表唐绍仪与黎元洪或其他代表进行和谈，并议定和谈的 4 项条件：推翻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对待满人。会议期间，正值汉阳失陷，武昌告急，而南京光复的消息传来，代表遂议决会址由鄂迁宁，各省代表赴宁继续开会。在此期间，上海集团曾召开留沪代表会议，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武汉集团则坚持黎为元帅；章太炎亦支持黎。黄兴本人也坚辞大元帅职。上海选举无效。

12 月 12 日，抵达南京的 15 省代表即行开会。14 日，会议选举浙江代表汤尔和任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任副议长，并决定 16 日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因传来讯息：袁世凯表示主张共和并以胁迫清帝逊位而与革命党作交易。于是许多代表因选举事争论不休，遂同意缓举总统，而将总统一席留待袁世凯“反正”，归附共和。于是，代表会议于当日议决，缓举临时大总统，虚位以待袁。

孙中山在海外一直密切关注并指挥着革命运动的发展。12 月 21 日，孙中山由美国取道欧洲回国。回国之前，孙中山已深刻地看到，武昌起义后革

命党所面临着两个严重问题：一是财政困难；二是“满清遗留下来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势力依然潜伏”，成为将来民国的无穷祸患。显然后者是更为长期和艰巨的任务。这些恶势力混入革命营垒，攫取权利，已经引起孙中山的警觉，对黎元洪和袁世凯都认为不可信。决心亲自组织中央革命政府，建立民国。

为此孙中山首先批驳了革命党内妥协退让的观点，坚持在尽快结束战争、建立共和国家的基础上进行南北议和。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受到黄兴等的热烈欢迎。他在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26日，同盟会召开最高干部会议，孙中山被确定为大总统人选。在讨论组织临时政府方案时，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孙中山反对。他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除宋教仁外，大家都赞成孙中山的意见。

12月29日，有17省代表参加的各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致各省代表和都督、军司令长的电文中表示接受，准备赴南京就职。次日，代表会议决请各省选派参议员3人赴宁组织参议院。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在总统府举行了就职典礼，并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表示将尽全力“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对内方针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对外方针是务洗去“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与友邦增益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月2日，由各省都督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通过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讨论了孙中山提出的9名国务员人选，其中有些人员争持不决。孙中山同黄兴协商，黄兴认为，在此新旧交替之时，“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孙中山基本同意。最后定为：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芑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辰组；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革命党人实际上构成政府成员的主体，基本上掌握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它是以铲除封建专制制度、确立民主共和制度，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革命宗旨为职志。

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废除延续中国2000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

1912年1月28日，成立临时参议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参议员3人组成。然后，参议院制订了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大纲，以美国国会为蓝本，

《孙中山三赴纽约》，《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期。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采取两院制。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宪法未施行前，代行宪法，以此巩固资产阶级的国体和政体。

《临时约法》共7章56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并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还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这些规定出现在国家根本法中，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对于启发人民的民主意识，摆脱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观念的束缚，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临时约法》还规定了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职权，实行“三权分立”、“代议政治”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的原则。

尽管这些还不够完善，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事，较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开创了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的新局面，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以后的独裁者准备了一个紧箍咒。虽然这些原则和制度由于以后统治者的破坏都未能实行，但正是在这种破坏中暴露出他们独裁者的嘴脸，一个一个被唾弃，历史也由此不断地前进。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诸如建元改历，限期剪发，废止肉刑，保障人权，禁止买卖人口，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成立实业部，制定工商章程和条例，鼓励发展工商业；在教育、新闻、人事制度和社会习俗等方面除旧布新，进行改革，向封建专制政体和社会陋习冲击。这些都表现了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和革新精神。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改革也有其弱点，最突出的是对农村、特别是对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没有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所以无论辛亥革命中或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广大农村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豪绅的统治依旧存在，农民没有发动起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和主力军，这就大大限制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而且由于农村生产力没有解放，也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当中外反动派向革命反扑时，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垮台了。它的一系列改革法令，也都成了一纸空文。

四、南北议和与清政府退位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各国采取了敌视态度，以不同方式进行干涉。但革命如此迅速地在各省蔓延开来，又使他们感到“任何想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成为泡影”。于是，为了维护各国在华的利益，尤其是商业贸易，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急切地与各国磋商，决定联手扶助清政府，胁迫革命党停止继续攻击清政府的一切行动。居于清政府要冲地位的袁世凯在忙于剿抚革命党之中闻此心领神会。他于11月中旬派人到武昌求见黎元洪，对革命党进行诱降活动。这一举动立即引起革命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

以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家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矢志奋斗的目标，原计划北伐北京，彻底推翻封建王朝，但在军事实力上难以实现。因此，虽然一致不同意袁世凯提出的以君主立宪为基础实行两军息战的前提条件，但对袁世凯抛弃清廷、归附革命却抱有希望。当时，清军围攻湖北革命党，

武汉形势十分紧急：11月初，反攻汉口战败，下旬，汉阳又失守。因此，他们渴望挽回败局，早日结束战争，同意在坚持共和、推翻清政府的条件下进行和谈。这样，他们就把实现共和的砝码压在了与袁世凯的和议上面，并以黎元洪的名义，许诺将来大功告成，便首选袁为总统。革命党的软弱给袁世凯以可乘之机。

袁世凯迫使革命党接受君主立宪的企图没有得逞之后，便一面请来英国公使朱尔典向革命党施加压力，一面下令清军攻破汉阳，企图以武力迫使革命党就范。但是，革命军攻克南京却获得了成功，震动全局。于是，在列强调停下，双方终于停战。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推翻清政府的军事行动。

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商议了停战、国体以及国民会议问题。双方商定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问题。12月29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向世人坦诚相告：就任大总统只是暂时的，如袁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就全力举荐袁任总统。袁听说孙已就任临时大总统，便耿耿于怀，电告孙中山“国体尚待公决，不愿预闻临时政府之事”。并以唐绍仪同伍廷芳签订的各项协议未与他“商明”遽行签订为由，准唐辞职，由他自行与伍交涉。

袁世凯为了迫使清皇室接受退位的事实，鼓动报刊发表言论，促使清廷退位，同时通过列强之手向清皇室施加压力。朱尔典在袁世凯的请求下，授意英驻上海领事促使上海外国商会，以恢复在华贸易为由，敦促清帝退位。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1月12日清皇室召开第1次秘密会议，讨论议和的前景。会上，奕劻将袁所拟退位优待条件和盘托出，立即招致亲贵们的反对。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良弼等人恨之入骨，筹组“宗社党”，企图进行垂死前的挣扎。1月16日，袁世凯谒见皇太后隆裕，没有任何结果，归途遇革命党炸弹袭击，险些中弹。于是借故不参加17日召开的御前会议，而派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赵、梁在会上提出袁世凯拟在天津另立政府的建议，对清廷施加压力；同时，袁又电告伍廷芳，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在清帝退位两天后，自行解体。

孙中山看透袁世凯的阴谋，指出，“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他要求袁世凯按新拟5项条件去做：第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第二，袁必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第三，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后，他即行辞职；第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第五，袁须信守参议院所订的宪法。如果袁不遵守5项条件，“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遭到孙中山严辞驳斥的袁世凯，绝不想由此而放弃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统治权的企图，为了使清帝早日退位，他鼓动亲信纷纷上书请求退位，造成舆情难拂的征象。1月26日，他又唆使段祺瑞率领46名北洋将领联名奏请朝廷接受共和政体，放弃治权。

南北双方经过多次磋商，最后拿出一个以袁世凯的提议为蓝本的优待条件，主要内容是：清帝逊位后，“尊号仍存不废”，“岁用400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暂居故宫，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

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保护”，“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同时公布的还有《关于清皇室待遇之规定》、《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1月26日，宗社党骨干良弼被革命党炸死，这一事件在清廷内部荡起一片波澜，往日极言主战的宗室贵族纷纷逃逸，隆裕确感朝廷不可久持了，于是，在1月30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上授袁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酌商退位条例。

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对清皇室优待条例。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优待条件，并于当天颁发皇帝退位诏书。就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它也标志着延续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制的终止。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世界最良的政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荐袁继任，并提出辞职条件3条：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得更改；第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与国务院乃行解职；第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的一切章程。孙中山想用这3条条件和即将公布的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目的是为保卫甫建不久的民主制度不至夭折。但是，一旦政权落到怀有帝王野心的阴谋家手中，这些不过是一纸空文。15日，袁世凯由参议院选举为第2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就这样，袁世凯依靠北洋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革命派的软弱，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16年北洋军阀的统治。

革命党的步步退却导致封建势力的步步紧逼。从议和到孙中山辞去大总统，革命党内和社会舆论一直对革命党的妥协持不同意见，但始终不足以改变革命党大退却的趋势。所以如此，除了当时力量对比，革命党不足以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抗衡之外，革命党领导人对敌对势力、革命任务和目标的模糊认识对革命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主要表现在：第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很多革命党人判别是否赞成反清共和的标准，而不注意考察阶级本质和政治态度，致使许多人相信袁世凯也会赞同共和；第二，把共和形式的建立误以为革命成功，把皇帝制度的摧毁误认为封建势力将不复存在；第三，以议和的方式与封建势力妥协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偏离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这一点革命党也没有清醒的认识。直到后来，孙中山才认识到只清除地面不行，还要挖掘除掉封建的基础。

第五章 经济文化的变动

一、社会经济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以农立国，农耕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辅以手工业；是以家庭为单位、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加紧以及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走向瓦解。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变动的这一基本状况并未改变，只是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变迁，这种变动较之以往更为剧烈、更为复杂，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形式也由以往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控制亦随之加深。

设厂开矿是这一时期西方各国大规模投资活动的一个重点。在此之前，西方列强尽管利用其军事政治特权，无视清政府的禁令，在中国开设了一些厂矿企业，但数量与规模均有限，主要是一些修造及加工工业。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被迫取消外国资本在华设厂的禁制，而资本主义各国又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而开始了外资在华大规模设厂浪潮。据统计，1895—1913年间，外商所设工矿企业资本在10万元以上者共166家，设立资本总额达10956万元。这些外资企业主要是资金周转快、利润丰厚的纺织、食品工业及机器制造、采矿等工业。在166家企业中，纺织及食品工业即为85家，设立资本3607余万元；造船及采矿业共39家，设立资本5286余万元。两者合计共124家，设立资本达8893余万元，占全部166家企业设立资本总额的81%强。另外，外资企业一般规模较大、资金雄厚，如外资耶松船厂，资本总额达557万两，而当时中国两家最大的机器厂上海求新轮船制造厂和汉口扬子机器厂的资本总额只有85万两，仅为耶松的1/7。

这一时期的外资企业，凭借其政治上的特权和雄厚的资金，利用中国廉价的人力物力资源，由过去以修造和出口加工为主，改变为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为主，并在许多生产部门占据主要地位，形成垄断局面。这不仅为其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而且严重冲击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据统计，曾是华商占较大优势的纺织业，外资厂的纱锭数由1897年的160000枚上升到1914年的464976枚，所占华洋纱厂纱锭总数的百分比也由40.6%上升到46%，华资纱厂的优势逐步削弱。再如1913年全国煤产量为1288万吨，其中机械采煤量为767.8万吨，而开滦等7大外资煤矿的产量为602.3万吨，分别占煤炭总产量及机械采煤量的46.8%和78.4%。如果加上其它外资煤矿和中外合资、实际为外方控制的煤矿，则1913年外资控制的煤产量达713.7万吨，占当年全国煤产量的55.4%和机械采煤量的93%。

金融业的扩张，是甲午战后西方各国关注的另一重点。虽然在此以前，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548页。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548、554页。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551页。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3、124页。

外资银行即在中国出现，但其数量与活动范围均有限，而此后外资金金融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1895—1914年间，仅新设的外资银行就有10家，分支机构40余处，此外尚有日本在华银行及中日合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近30处。外资金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也大为扩展，除原有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国际汇兑业务外，主要转而经营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广泛吸收存款，放款于企业，并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争揽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据统计，从1894—1911年，仅英国汇丰银行一家，就单独或与其它银行一起向清政府提供29笔贷款，总额达库平银2.06亿余两。通过承揽对清政府的贷款，外资银行不仅以利息、折扣、经理费等名目获取巨额利润，而且通过对作为借款抵押的关税、盐税等清政府财政收入源泉的控制，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此外，外资银行还凭借其雄厚的资金与政治特权，大量放款于中国旧式钱庄，操纵金融市场，并公开在中国发行纸币，吸收大量资金。据记载，1900—1911年间，共有9家外资银行在华发行自己的纸币，其流通范围或数省市或全中国，有的发行总额中部分在华流通，有的全部在华流通。1912年，在华流通的外币（包括从国外流入的），总计达4390余万元。

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是列强大规模投资活动的又一关注点。鸦片战争后，列强即以其军事政治特权，攫取了在华内河航运权，并陆续建立起一些轮船公司，经营中国内河航运业务。甲午战争后，列强又掀起攫夺中国铁路权的浪潮。通过所谓投资承建权、优先权、承建承办权、建筑权等，列强在1900—1911年间先后攫取了粤汉铁路、沪宁铁路、汴洛铁路、安奉铁路、新奉铁路、南浔铁路、吉会铁路、湖广铁路、正太铁路以及正定至德州、开封至兖州等铁路权，并进一步将铁路附近区域划入其势力范围。由于种种原因，帝国主义所攫夺的这些路权并未全部实现，但即便如此，到1914年，在中国实际筑成的9568公里铁路中，外资直接投资筑成的铁路计有中东铁路、胶济铁路、滇越铁路、南满铁路以及广九铁路英段等5条3772公里，另有利用外国投资而实际为外资控制的铁路4846公里，两者合计达8618公里，占铁路总里程的90.07%。外资航运业在这一时期亦进一步扩展，其中又以日本航运势力的拓展最为引人注目。在东北，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新设航运部，垄断了南满内河及沿海航运业。在关内，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航行权，从而使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上游。日本大阪轮船公司、邮船公司分别于1898、1899年开辟长江航线，并经营中国沿海航运。据统计，到1914年，仅在长江航线上，日资日清轮船公司、英资怡和、太古等三大轮船公司所拥有的船舶总吨位达61682吨，远远超过中国招商局所拥有的18704吨而占绝对优势。伴随铁路线的延伸，外资轮船公司在中国内河航线的扩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如蜘蛛般地伸向中国城乡各地，贪婪地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

作为鸦片战争后首先侵入中国的外国商业资本，在20世纪初期仍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据统计，1895年外资在华设立各类商行约为603家，1901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90、530页。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献可：《近百年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543、547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54页。

年增为 1102 家，1911 年则达到 2328 家。商行的业务范围日趋扩大，门类日益增多，并呈专业化、小型化的趋势，而原来那些包办贸易、运输、汇兑的大洋行如英国的怡和、太古等，亦纷纷加强内部分工，组建专业机构，从事专门业务。同时，这一时期一些世界性的垄断组织亦开始在华设立分支机构，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推销其产品，如通用电气公司于 1908 年、美国钢铁公司于 1909 年、美孚油公司于 1904 年、英资亚细亚火油公司于 1907 年等分别在华设立机构，从事商品推销工作。这些大垄断公司的一个共同做法，就是利用中国传统的商业流通网络，来推销其产品，如此一直将销售网点延伸到城乡各地，使得无论中国沿海通商大邑、内陆都市，还是广大乡村乃至穷乡僻壤，无不充斥洋货。

随着外资贸易业投资的扩展，商品输入日增，中外贸易额迅速增长。据统计，1900—1911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370067174 关两增长到 848842109 关两，其中进口由 211070422 关两增长到 471503943 关两，入超由 52073670 关两增长到 94165777 关两。另外，在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的殖民地型贸易结构，在这时并没有因贸易额的增长有所改变。据统计，在 1910 年进口总值中，生产资料的进口仅占 17.6%，消费资料的进口却高达 82.4%，同年出口总值中原料出口占 39.8%，如加上半制成品则为 64.8%，制成品仅为 35.2%。这种由于外国商品大规模侵入所造成的巨额入超及出口农业加工产品及原料、进口外国消费品的殖民地型贸易结构，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其次，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经济变动的另一重要现象，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起自洋务运动时期官办的军事、民用工业，以及同一时期出现的民族工业企业。甲午战争的战败，标志着洋务派自强运动的失败，而其所办企业亦因腐败的官僚经营体制，发展亦多陷于停顿。为维系统治，清政府一方面对原官办企业加以整顿，改变经营方式，引入市场机制，或招商合办，或官督商办，或干脆转为商办。另一方面被迫放松对民族工业的压迫限制，于 1898 年正式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民族工业的合法地位，从而使民族工业企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情况下，甲午战败的惨痛教训与近代工业优厚利润的交互作用，使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及买办将大量资金投入近代工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进入 20 世纪，在八国联军之役中惨败于西方列强的清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于 1901 年发布上谕，宣布“变法”，其后陆续颁布一系列上谕，推行所谓新政。尽管清政府的“新政”带有很大的虚伪性，但其有关社会经济的举措，如设立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公布奖励公司章程，颁行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设立户部银行，在京师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以及派人至海外劝导华侨归国投资等，对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客观上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此外，20 世纪初年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立宪运动，促进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加深了对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及其严重性的认识，从而先后掀起了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及提倡国货的爱国主义浪潮，这无疑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 20 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518 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2—73 页。

发展出现一个新的浪潮。

据统计,1894年以前中国资本所创办的厂矿企业,包括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及商办的全部新式采矿业及资本万元以上的制造业共有72家,资本总额约2090多万元,其中商办53家,资本总额约470多万元。而到1911年新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达491家,资本总额高达10855多万元,其中商办416家,资本总额约8277多万元。可以看到,1895年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较为迅速的,无论是企业数量或其资本额,较之1894年以前,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商办工矿企业的发展尤其迅速。

在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产业结构,纺织及食品等轻工业仍居主要地位。据统计,1895—1913年间设立的纺织业企业共有160家,设立资本总额3024多万元;火柴业共有64家,设立资本总额约360多万元;榨油业约50家,设立资本约850万元;1900—1913年间设立的面粉厂计58家,设立资本总额890多万元。四者合计共设厂332家,设立资本总额达5124多万元。另外,这一时期水电等公用事业亦有较大发展,共设厂约57家,设立资本总额约2720多万元。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发展仍很迟缓,除个别企业外,一般设立资本很小。据统计,1895—1913年上海虽有86家华资机器厂,但其总资本亦只有87060元。这一时期,电力、建材、制皂等业也有一定发展,且出现一些较大的企业。如1904年创办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创立资本均超过300万元;190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创立资本100万元;1904年创办的耀华玻璃厂、耀徐玻璃厂创立资本分别为50万两和140万元。耀徐厂聘用英国技师生产平面玻璃,首创中国自己生产平面玻璃的历史。

一批投资于几个企业、个人资本累积迅速的大资本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买办出身的祝大椿,从1895—1911年,其创办或参加投资的企业共8家,资本287.5万元,投资范围有缫丝、纺纱、碾米、面粉、造纸、水电等,分布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广大地区。张謇从1899年创办南通大生纱厂起到1911年,已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于27家企业(其中自办18家,投资9家),资本额高达900多万元。再如著名实业家宋炜巨,先后创办了汉口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汉口扬子机器制造公司,资本总额达342万元另40万两,其中汉口扬子机器制造公司创立资本40万两,为当时投资最大的华商机器厂。这些大产业资本家的出现,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紧,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规模拥入,以及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突出表现在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及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据统计,1913年全国进口机制纱及国内机制纱的总量约436万担,除一部分非织布用纱及机制棉布用纱外,尚余384万担,其中一部分用于城镇手工织布,约374万担用于农村家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45、661、663、668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68页。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第196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68、669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91页附录、第1069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68、669页。

庭土布织造，占到当时全国农村土布织造用纱量的 72%。机纱代替土纱以及农村家庭纺织业中“纺与织”的分离已十分明显，相当多的农户已不再购买棉花、自纺土纱，而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机制纱来织造土布。这一时期机布排斥土布的程度亦很明显。据估计，1913 年进口及国内机制布的总量约为 3288 万匹，折算成土布的匹约为 27117 万匹，而同年全国棉布供应量约为 77859 万匹，机制布占 34.83%。机制布已大量涌入农村，其数相当于整个市场上机制布的 70%。尽管机制布在农村市场上所排斥的主要是土布的商品布部分，而较少触及自给布，但这一变化仍反映出农村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分解的深化。

随着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不断破坏，棉花商品化的程度亦随之加深。据统计，1894 年全国商品棉总量为 199.6 万担，1913 年则为 367.8 万担，增加了 84% 强。这中间除少量出口外，相当部分为国内中外纱厂所消纳。此外，这期间国内主要农产品如粮食、大豆、蚕茧、烟草等商品值都有大幅度提高。

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是西方列强的商品入侵及出口贸易的增长所造成的，并不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被动的分解。甲午战争后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促进自然经济瓦解的重要因素。然而传统的自然经济有其深厚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加之中国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近代工业虽已起步并有一定发展，但水平仍是很低的，且地域分布有很大的局限，因此自然经济的瓦解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虽然加快，但就社会经济总的发展水平来说，传统的自然经济在全国经济生活中仍占主要地位。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前工业化社会。

二、思想文化

鸦片战争后，伴随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西方文化亦挟列强坚船利炮之威蜂拥而入，同传统的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发生尖锐撞击。面对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从救亡图存出发，在痛苦反思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终于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从而开始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从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宣传，到康梁的变法维新，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由最初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的船炮科技工商即物质文化，逐步进到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论学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发展到一更高层次，一部分先进之士逐步认识到，不仅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有其高明之处，西方的思想文化亦有其可取之处。简单地引进西方的器物文化、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行的。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反思与对西方思想文化探索学习的新进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掀起的西学传播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中西学之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20 世纪初年出现的西学传播浪潮，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西学，尤其是有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954 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956~957 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第 954 页。

关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哲学等方面的名著纷纷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据统计，作为 19 世纪后期中国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在戊戌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译书 434 种，而 1902—1904 年 3 年时间译书即达 360 种。再就译书的品种看，1902—1904 年全国共译书 529 种，而其中反映西方文化思想流变与现状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著作达 278 种，占总数的一半强。这种大规模的翻译介绍活动在其后一直持续并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西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一时人们竞相谈西学、议西学。尽管对西学的真实内容并没有透彻的理解，但士人见“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麇集蚁聚，争购如恐不及”。更有一些人“得鱼目以为骊珠也，朝披夕哦，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由此可见人们追求西学之热烈及西学传播之广泛，同时亦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认识，对西学之真谛还缺乏全面、完整的理解。

随着大规模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思想著作浪潮的不断发展，这时陆续出现了一批致力于传播、宣扬西学且有较全面理解的著名西学传播者，严复即是其杰出代表。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生于 1854 年。早年就读于福州船政局所设之海军学堂，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后被选派留学英国。在英学习期间，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对比使严复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逐步对国人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产生疑虑，而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钻研中西文化问题。归国后严复任职于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对中西文化的研究。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给严复以极大的震动，使其认识到简单地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是不行的，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弱贫穷的困境，必须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从思想文化上进行创新。由此他更致力于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探索，并以极大的兴趣与精力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化名著。1895 年严复着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系统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该书 1898 年春出版后，很快风行全国，“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警句一时成为有识之士议论的中心话题，而进化论思想亦成为维新派变法的理论基础。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倾全力于西学的介绍与传播，力图汲取西学之精华，唤醒国民，富强国家。到 20 世纪初，他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以及甄克思的《社会通论》等。这些书及前译《天演论》，被后人通称严译八大名著，它们的被译出版，对于西学的传播和人们更深入完整地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大量翻译出版西学论著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专门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思想著作的刊物。如由留日学生杨廷栋创办的《译书汇编》，以翻译介绍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学著作为主，曾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即《法意》）、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尔的《代议政体》等。再如由留日学生杨笃生等创办的《游学译编》，亦以介绍传播西学为主要内容，曾译载了大量有关近代西方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论著，影响很大。特别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广泛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说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发生广泛影响。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 1032、1034 页。

冯自由：《政治学》序言，广智书局 1902 年版。

20 世纪初年西学的广泛传播，是与反对封建时代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在介绍和传播西学的同时，许多西学传播者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尖锐抨击。严复曾指出，“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明确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八股文、宋明理学对人们思想言论的禁锢。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西学传播也很重视，他们创办的许多报刊都介绍西方学说，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君主制度，鼓吹建立民主共和。

西学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伦理道德是很大冲击，而给沉闷的中国思想界带来清新的空气，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变革。然而西学的宣传者亦有诸多不足，其中突出表现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主张彻底输入文明。此外，他们所介绍传播的西学还缺乏系统性，较少加以选择，去粗取精，亦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正因如此，西学宣传者遭当时许多人的反对，不仅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反动政权的需要而反对他们，就是有些知识分子也反对他们如此传播西学，甚至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有些人反对“醉心西化”。反对者在诘难、批驳西学的种种“不是”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加赞赏，称之为“国粹”，声言要“存国粹”。这里，由于反对者的政治立场的不同，对于“国粹”的理解，或者说“国粹”一词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存国粹”的目的也有原则差异。如张之洞之言“国粹”，是因为“道微文敝，世变愈危”，因而要“存国粹”以“息乱源”。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章太炎、黄节、刘师培等宣扬国粹是试图从“国学”中的“夷夏之变”来寻找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思想，宣传“排满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

由于动荡的政治环境，有关中西学的论争没有能够充分展开，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的认识亦未深入，因而论争本身在当时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但问题既已提出，尤其是中国文化思想未来发展取向问题，无疑对以后的中西文化之争有所启迪。

以西学的广泛传播为背景，20 世纪初年中国思想文化界诸领域都呈现出丰富多采的变化，而文学、诗歌、史学等领域的所谓“革命”，尤为引人注目，并对以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新文学、新史学之先声。

早在 19 世纪末年，针对诗坛形式陈旧、内容空虚等弊端，黄遵宪首倡“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诗界革命”口号，梁启超、夏曾佑等起而响应，推波助澜，梁启超甚至断言“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从而掀起了 20 世纪初年“诗界革命”的浪潮。所谓“诗界革命”，照梁启超的解释，就是革除旧诗陈腐空虚的内容，而在旧诗的形式下表达新的精神，“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它并非是要破除旧诗的形式，或简单地使用新词句，而着重的是新意境，即思想内容和艺术境界的革新。梁启超还进一步强调新意境“不可不求之于欧洲”，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综观诗界革命之成果，其中不乏立意清新、内容丰富的好作品，如黄遵宪、蒋智由等人的叙事诗、言志诗等，但总的说来成绩

《法意》上，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71 页。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 208 页。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51 页。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89 页。

平平。由新内容来改造旧形式的目的并没达到，相反旧形式往往束缚了内容的创新，同时单纯追求新名词。然而从诗歌发展的趋向看，其“在观念上”对于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902年底，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首倡“小说界革命”。还在1898年，严复、夏曾佑就曾在《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强调小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兀兀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克为说部之所持”，并指出小说写“人心所构之史”，而历史则写“人身所作之史”，区分了小说与历史的不同。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其对小说之社会功用的认识较严复等人又深了一层，他将小说摆到了启蒙的高度，将小说与社会改良结合起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对于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术、人格等均有强大的支配力，从而把小说推为“文学之最上乘”。由于强调小说的教诲作用，梁启超又特别重视“政治小说”之功用，认为欧美诸国的变革，“政治小说为功最高”。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小说阵地空前扩大，继《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专刊相继问世，其它一些刊物也竞相刊载小说，同时专业小说作家队伍迅速扩大，小说作品数量大增。据阿英《晚清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成册的创作小说即达400余种，翻译小说600余种，并且出现了一批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重要文学作品。就其内容说，这一时期，批判旧中国，呼唤新中国；批判奴隶精神，歌颂新人格；批判旧风尚，歌颂新风尚，成为一些文学作品的显著特点，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亦为大多数小说作家所认同。

然而在小说被誉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同时，小说革命亦存在过分强调其教诲作用而忽视其审美品性的弊病。黄遵宪即曾致信梁启超，诚恳地指出“政治小说”之致命短处，即在于缺乏“小说中之神采之趣味”。对于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反对将艺术仅作为政治教育之手段，而忽视其自身的价值，强调创作者鉴赏者均应超越现实的功利，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显然，王国维在批评梁启超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同时，也走向另一极端。然而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对于纠正当时单纯注重文学之社会价值而忽视其自身特性与美学价值的普遍偏向，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正因如此，在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还是有相当影响的，它与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相对立而互补，从不同的角度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封建文学观发起冲击。

在上述两种对立的文学观之外，鲁迅的“立意在反抗，主归在动作”的文学观，在当时亦有相当的影响。在弃医学文、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他是抱着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之目的，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梁启超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影响。当王国维起而反对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时，鲁迅亦受其影响，对于文艺自身特性与其审美价值加以肯定，强调“由

黄遵宪：《致梁启超》（1902年11月），见《梁启超年谱长编》。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

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以后经过鲁迅的独立思考，选择改造，逐步消失，最终他在吸收梁、王文艺观之合理、正确的内容基础上，形成自己“为人生”与“改良这人生”的文艺观，并在这种文艺思想影响下，从改变国民精神出发，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素材，创作出如《阿Q正传》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文艺作品。

“史学革命”的提出与新史学的兴起，是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思想界变化纷呈的另一重要现象。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大声疾呼，声称“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同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史学通论》一文，亦提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由此，“史学革命”的旗号正式打出。

“史学革命”的提出是针对封建旧史学的积弊，树立“新历史旗帜”，以振奋国民精神、发扬民族主义，从而为“救国”、“兴国”服务。它的主要内容是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和分析封建旧史，重新认识和编写中国历史。20世纪初年“史学革命”的积极推进者，主要是通过翻译日本史学家的有关论著来学习和吸收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根据日本著名史学理论家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并参照其它日本史学家的有关论著，编译发表了《史学概论》一文。在其译述中，汪荣宝首先阐述了历史的意义与研究历史的必要性，一个社会，“现在优于其过去，方来者又优于其现在，则其社界必胜，若从来之思想，以历史先哲之真似而读诸，则知识凝滞，而终亦与古人同灭而已”。这里汪明确地对封建旧史学展开了批判。西方史学思想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创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学而著称的法国学者基佐与英国学者巴克尔，其生平与思想，也在这时被介绍出来，巴克尔的代表作《英国文明史》还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翻译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纷纷提出新的修史方案，并开始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新的方法编写中国历史。1900年，章太炎修订《榷书》时，曾作《中国通史略例》一文，提出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意见与方案。1901年梁启超在写《中国史叙论》一文时，作为其计划编写的中国历史的叙言，对中国史研究的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代划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陈黻宸、马叙伦等亦对编写新的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早以新的理论为指导并运用新的方法编写和出版中国历史的是曾鲲化和夏曾佑，他们先后在1903—1904年、1904—1906年分别编写了《中国历史》（上、中卷）和《中国历史》（1—3册）。作为“史学革命”的直接成果。这两种书的出版发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受到学术界与出版界的高度重视与评价。它们不仅对当时“史学革命”的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对以后的历史研究及中国历史的编写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此为起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科学技求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译书汇编》第9期，1902年12月。

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明清以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却逐渐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到了近代，当西方先进国家陆续建立起近代科学技术门类，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已远远落在后面。

在鸦片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大清帝国饱尝战败之屈辱。科学技术之重要性在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到升华，落后所造成的苦痛终于使有识之士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要求学习、效法西方列强之先进科学技术。以此为起点，中国人民开始了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新攀登。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的是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本知识，使西方科学技术的主要门类及其主要内容，相继传入中国。如在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等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下，陆续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西方数学研究的新成果。其它如西方近代物理、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等基础学科的主要论著，也都有译著出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也很快被介绍到中国来。如 x 射线是德国科学家伦琴于 1895 年发现的，3 年之后，在美国人赫士与我国科学家朱葆琛、周文源合译的《光学揭要》一书中，即对其发现经过、特征等作了简要介绍；1 年后，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又专门刊印了英国人傅兰雅与我国学者王季烈合作编译的专门论述 x 射线的论著《通物电光》，对 x 射线的有关情况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这些说明，尽管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很落后，但我国的科学技术人员对于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还是有一定了解，并能很快理解、吸收过来。

应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它不仅需要译者本人对所译论著的内容有相当的了解，而且为使人们能够准确地理解，还必须使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概念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概念准确地对应起来。在后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广泛的译书活动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许多西方近代数学原著中的名词与术语，在我国数学大师手中得到了精确的转译，他们创造性地构造了许多意义极为贴切的汉语数学名词和术语，如代数、微分、积分、函数，等等。这些名词和术语，不仅在国内沿用至今，而且流传到日本等国，从而为西方近代数学研究成果在东方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成果被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到国内，这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范畴，同时也开阔了我国学者的科学研究视野。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就是在融会贯通旧学新知的基础上，撰写出《考数根法》等一系列数学研究专著，不仅证明了法国数学家费马于 1640 年提出的、长期困扰国际数学界的著名“费马猜想”，而且还提出了闻名于当时国际数学界的“李善兰恒等式”，独树一帜，为世界同行所重视。

在大规模翻译出版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论著的过程中，形成了几个著名的翻译出版机构，如鸦片战争后不久创办于上海的墨海书馆，1868 年开设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以及京师同文馆、上海广学会等。这些机构所翻译出版的许多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论著，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即翻译出版了 126 种各类近代科学技术著作，对近代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及工程技术在中国

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以此为起点，到 19 世纪末，各类以传播近代科学技术为主的学校已相当多，讲授内容几乎已包括近代科学技术的各主要门类，其中较著名的有：福州船政局所设马尾船政学堂、上海格致书院、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天津中西学堂，等等。这些学堂、书院所讲授的内容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书院，而主要为近代科学的基础学科及工程技术，如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以及机械制造、冶金、医学、电气、电信、采矿、土木工程等，其教学形式亦大有改变。另外，还创办了专门刊物，如《格致汇编》、《农学报》等。对于科学知识的普及，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近代第一批科学技术人才逐步成长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其中较著名的有徐寿(1818—1884)、华衡芳(1833—1902)、詹天佑(1861—1919)和李善兰等。他们分别在化学、工程技术、数学等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就。如华衡芳在 1887 年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个氢气球，并在以后与徐寿一起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机推动的汽船。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京张铁路及天津至沈阳铁路工程中，以其突出的智慧与熟练的技艺，获得优异的成就。在洋务派创办的企业里，开始是聘请洋人设计、管理，仿制西方的船炮机械，以后是中国科技人员利用西方的科技成果，自己设计和管理，自己制造和生产，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进入 20 世纪，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内容，除了继续引进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外，并在前期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近代科学技术各基础学科，并在各级学校系统内开设相关科目，使近代科学技术得以形成系统、普及性的传播网络。同时，这时开始出现中国人自办的传播、介绍近代科学技术的刊物以及科学技术团体。

翻译仍然是介绍、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手段。但不同以往的是，这时的中国学者已不再仅限于简单地转译西方有关近代科学技术的论著了，开始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编译。如日本学者所著《物理学》一书，是近代物理学重要著作之一，其内容几乎涵括近代物理学的各主要领域。以前国内曾有日本人翻译的中译本，但语句不通顺，许多地方难以理解，且有讹误。我国学者王季烈以其系统、渊博的物理学知识，对其进行重译，不仅语言简明练达，易于理解，且对其内容作了一些调整，订正了讹误，使其成为一本真正全面系统的近代物理学著作。参考国外有关论著，编写近代科学技术各学科的教科书以及普及性读物，在这时也开始出现。如我国著名地理学专家张相文，在参考国外有关地学论著的基础上，陆续撰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地文学》以及《中华本国地理教科书》等，开创了我国教育界自编地理学及地质学教科书的先河。

近代科学技术的各学科成为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的必修课目，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大事，它不仅反映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已走上正规化和系统化的轨道，亦标志着近代科学技术之各学科在我国已经形成。如京师大学堂根据“癸卯学制”拟设的 8 个学院中，包括医学、格致、农科、工科 4 院，而格致学院(当时称“科”)所拟设的 6 个系(当时称“门”)分别为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星学、地质学。可见到 20 世纪初年，近代科学技术各门类，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

20 世纪初年，中国的实用工程技术也有较大进步，西方先进国家有关工

程技术的一些新成果陆续被引入中国，并在某些厂矿企业中得到应用。内燃机是继蒸汽机之后世界技术发展中的又一里程碑，1910年，在内燃机发明后不久，我国即仿制生产出25匹马力的内燃机，从而能够紧随世界技术发展的步伐向前进。无线电报是意大利人马可尼于1896年发明的，1905年，我国即在天津设立了无线电报学堂，讲授有关无线电报的制造、特性及使用等问题，同时通过该校意大利籍教习向意大利购买了马可尼式无线电报机，分别安装于军舰与陆地，从而开始了我国最早的无线电通讯联系事业；以后又陆续在广州、上海、南京等地建立起无线电台。

20世纪初年，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的专门刊物也相继出版。其中最早的是1900年由杜亚泉创办的《亚泉杂志》。这是一份综合性自然科学杂志，内容包括数理化农工诸学科。它最早将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律介绍到国内，最早介绍了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的经过及该元素的特性，等等。还有1903年创办的《科学世界》、《教育世界》等，都介绍了各种科学知识，并且将科学普及与启蒙相联系，启发国民觉醒，改变“格路矿于风水，掷金帛于鬼神”的蒙昧状态。

总起来说，20世纪初年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还远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而且基本上处于引进与吸收的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突出成绩表明，中国人民的智慧不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先进的民族。只要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所变革，提倡民主和科学，使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那么，中国人民将很快会赶上或超过国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社会生活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迫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军事压力，被迫打开长期关闭的国门，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西方的交流。此后，抱着各种不同目的的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租界制度的建立，为外人在华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外人得以更多地涌入中华大地。外人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活动，给近代中国带来诸多不幸的同时，亦带来了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从而给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比较、借鉴的参照系。另一方面，迫于外部压力而缓慢开展的中国社会近代化，以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建为标志，逐步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向前推进，为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与物质基础。在此双重因素作用下，长期因循、少有变化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终于开始了缓慢但又确实的变化。

就地域而言，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一些与外人接触较多的地区，如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都市。在上海，外国人在租界内自成一体，过着固有的生活，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衣食住行，与其本国的方式无有多大变化。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无疑对所处一地的华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长期的比较、借鉴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渐渐发生变化。另外，近代企业的建立，经济构成的变化，亦使都市较之乡村发生更多的变化。随着人们加入到新的职业行列，经济状况的变化，其生活方式亦受职业及经济的制约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变化。由最初的沿海都市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化，逐步在地域上向内陆推进，由内陆大城市逐渐延伸到中小城镇，广大的农村则变化最晚、最少。

就内容而言，有关物质方面的社会生活内容首先发生变化，而且较少遇到来自旧有生活方式的阻力，如洋烟、洋酒及其它西洋新式器具的引入与广泛使用。由物质的变化逐渐发展到社会精神生活的变化，如风俗习惯、消闲娱乐等。这方面的变化相对于物质方面变化而言，既发生较晚，亦不太顺利，往往受到旧有生活方式的强烈排拒，有些甚至最终也没有、或者只发生很小的变化，一直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之有机构成而流传下来。

综观清末社会生活变化的具体内容，衣食的变化虽有，但相对于其它方面的变化而言，则变化较小。西服在传入中国相当长时期后，还没有能在全中国普及，尽管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在慈禧太后死后，也穿起了西服，但西服也仅在一些大中城市及中小城镇较为流行，而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是“长袍马褂”，依然使用着中国传统的服饰。食的变化则更小，西餐大菜始终未能敌过中国传统的名吃佳肴，孔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古训作为中国饮食之“座右铭”，影响长存。中国人偶而吃一顿西餐，亦多为换口味，尝试一下番邦异味而已。

住的变化较大，尤其是在城市。在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不久，西式建筑即在列强所强占的租界中开始出现，并逐步为国人所欣赏、接受。以后西式建筑又进一步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出现了多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建筑但又包含其优点的变型，如出现在上海的新老石库门建筑。到 20 世纪初年，中国城市建筑已大异于传统，尤其是沿海城市如上海、青岛、广州、天津等，商会、学校甚至包括清末咨议局等公共建筑，一改中国旧式衙门之传统的庙宇式而取西式或中西合璧式，且内部多设大礼堂、会议厅等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就民居来说，尽管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众多的花园洋房，但绝大多数民居则为中西结合式，广泛吸收了中西建筑的优点，同时考虑到了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习惯及其环境，因而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屋，亦不是西式建筑的简单照搬。另外，由于近代中国遭受多个西方强国侵略，他们在中国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因而在建筑上亦体现出这种状况来，如上海有多个西方国家的侵略势力，其建筑亦五光十色，有英式的，也有法式、德式、俄式及日式的等，青岛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其建筑则大多为德式，而哈尔滨的建筑又大多为俄式的。

行的方面之变化，在 20 世纪初年亦较为显著。传统的中国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骡车、帆船及轿子等，其共同特点是慢。随着中西交流的开始，西方新型交通工具开始进入中国。到 20 世纪初年，轮船、火车在长途运输中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普通百姓出远门，亦多能够乘坐。在城市内，交通状况亦有很大改观，马路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黄土路与碎石路，西式马车也被大量引进，成为城市交通的主力，据统计，当时仅上海公共租界即有马车 700 多辆；由日本引入的改良型人力车，据公共租界 1909 年统计，月捐照数更达 8471 辆之多。就连清王朝统治的中心北京，这时也出现了西式四轮马车。此外更新型、便捷的交通工具也开始出现，如上海在 1901 年出现了汽车，并在 1908 年开始出现了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成立了电车公司，从而开始了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的新时代。

长期以来，分居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古老的驿站和民营信局，不仅速度慢，且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给人们的联系带来了很大不便。近代邮政系统的建立，大大改变了这种状况。1896 年中国正式开办邮政，

起初主要是在沿海城市，以后逐步向内地扩展。到 20 世纪初年，国家邮政系统已在全国推广，并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民营信局和古老的驿站。1906 年 8 月，清政府设立邮传部，其后邮政事业又有所发展。据 1911 年底统计，各等邮政局所已达 6201 处，收寄函件 42.1 万件，收寄包裹 432.7 万件。另外，作为快捷便利的通讯联络手段，电报线路的建设已有相当规模，到 1908 年清政府邮传部将电报收归国有时，全国商办电报线计有 41417 华里，地方官办电报线计有 49480 华里，总计 90897 华里；电报通讯机构遍及全国各省。邮电事业的建立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并改变了人们之间传统的联系方式。

新式娱乐消闲方式的出现，使人们的日常余闲时间的活动有了较大的改观。将西方娱乐方式引入中国的，首先是西方侨民，他们带来了许多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娱乐项目，如跳舞、溜冰、网球、台球、扑克以及听音乐、参观博物馆、展览馆等。这些娱乐方式虽然由于其昂贵的收费，多数中国人无法享受，但对中国人消费意识和旧有习惯的变化，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20 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亦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主要是在大城市。如电灯之代替油灯，改变了人们的照明条件，并使原先许多在夜晚无法进行的工作能得以进行。再如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的分解，小家庭的出现，使得中国旧有的家庭成员之关系得到简化，相互间的依存关系松弛，从而便利了个人的发展。另外，电话的出现，自来水厂的兴建，方便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改善了卫生条件，亦使地域间距离缩短，减除了以往人们之间费时繁琐的应酬，等等。

近代教育的兴起，是直接影响 20 世纪初年社会生活变化的又一重要事件。传统教育是“贵族”式的教育，读书识字是有钱人的事，与穷人无缘。普遍的文化素质低下，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难以有新的要求，因循守旧成为人们恪守的准则。近代教育的兴起，大中小学及专科、职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而近代教育不同以往教育的新内容，则使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及其生活有了更多新的了解与认识，从而极大地便利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例如愚昧与无知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当电灯刚开始在上海租界出现时，国人都表示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电灯之电，与空中之雷电是一样的，企集雷电使其发光，有违天意，将遭报应，据此上海道发出告示，以电灯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为由，禁止国人使用。

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在许多方面与先进人士的宣传和提倡有关。如维新派宣传民权，主张“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进行启蒙教育，反对陈规陋习，成立不缠足会，提倡放足，反对缠足。革命派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更加重视，并且把移风易俗看作是改铸“国魂”的重要手段之一，热烈提倡“剪辫易服”、男女平权、改良婚姻制度，反对蓄婢纳妾、买卖婚姻，发展女子教育和服务事业，废除三跪九叩之礼等等。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就是在此主客观的同时作用下，缓慢而又确实地向新的方向变化发展着。

第二编 救国道路的新探索

第一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一、民初的政党和政治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党派团体的勃兴，而且许多政团趋向政党化。所谓“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这些政党大都以“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相号召，但实际上却各有所图。为扩张党势，不仅“不党”之人被各党竞相拉拢而入，而且非“不党”之人，也常被这党那党所追逐，从而出现许多一身而数兼的跨党分子。而且各党还经常瓦解、合并，重新组合，复杂多变。如此，数量虽多，但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只有共和党、同盟会、民主党、统一共和党等十几个会党。

（一）共和党：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同志会等五个政团合并而成。

统一党由前中华民国联合会发展而来，成立于1912年3月2日，主要成员是旧官僚、立宪派分子，包括一些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的右翼分子。主要领导人是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唐绍仪、汤化龙等。它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主张采用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反对采用美国联邦制；在经济上主张维持现行私有财产制，取稳健的改良政策，反对同盟会的“抑制富者”的激进的民生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它标榜“以稳健为第一要义”，排斥被称为“暴烈派”的同盟会急进分子”。他们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任用非人”，批评《临时约法》多不完备，“应即提出修改”。所以，统一党在政治立场上主要是反对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但与袁世凯追求的总统个人独裁和北洋军阀的军事专制统治，也存有很大的矛盾。

民社由黎元洪、孙武、孙发绪等人发起，1912年1月16日成立于上海，成员主要是旧军官、旧官僚、失意同盟会员和清末立宪派分子，而且有不少现役军人，主要维护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曾主张建都武昌，因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未得到适当位置而不满，攻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无功受禄”，“掠他人之功以为功”，把同盟会列为首要攻击目标，而拥护袁世凯。

国民协进会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政团，1912年2月由范源濂、蓝公武等人在天津发起成立，与梁启超关系密切。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发起，1912年1月成立于上海。

国民党同志会由潘昌煦、朱寿朋等人于1912年2月发起成立于上海，仅为“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及地方公益者”所组成。

以上5个政团虽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1912年5月9日合并组成为共和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它的主张主要是：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不准各省各自为政；经济上也主张国家扶持发展资本主

义实业。可见，它也是资产阶级政党，但却代表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与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作对，反对其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民生主义；而它与大地主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结合，只能走上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中国走向深渊的可悲道路。

（二）民主党：由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团组成。

国民协会是张嘉璈、唐绍仪等人组成。基本骨干是追随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成员以立宪派、旧官僚为主，在各省会约 20 处建有支部，会员逾万人。该会筹组伊始，梁启超加入，成为该会的灵魂。

这两个政团的政纲与上述统一党等五政团相近，因此曾与他们一起酝酿合并组织共和党，后因“理事问题，稍有异议”，中途退出，遂于 10 月 27 日，联合靳云鹏的共和统一会、广东的国民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等 6 政团，正式成立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孙洪伊、梅光远等 30 人为常务员的民主党，站在拥袁反孙立场上，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利益为政纲，进行活动。这种政纲，决定了他们与坚持封建军事独裁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不可能有长久的合作。

（三）同盟会、国民党：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争论过程。

同盟会本来是一个组织上不太巩固的松散联盟，辛亥革命前夕就呈分裂状态。辛亥革命后，由于失去了革命目标，陷入更加混乱的危机中。在辛亥革命前夕退出同盟会的章炳麟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公开主张解散同盟会，取消革命。有些人认为，清帝退位，民国建立，革命大功告成，因此有的会员如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产生“功成做官”思想，追求官职利禄，而有的会员如黄兴则产生“功成身退”思想，要求洁身远行，卸甲归田，淡于政治。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员主张适应新的形势，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以争取实行政党内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任务都已经完成，只剩下民生主义的任务了，等等。同盟会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大有彻底瓦解之势。孙、黄虽然对政治形势有错误估计，但仍关心中华民国的巩固。因此，在全国组党形势日益高涨的刺激下，他们也认识到有重新团结之必要，遂决定改组。1912 年 3 月 3 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后因其伙同袁世凯谋杀湖北党人张振武、方维，被除名）为协理，宣布正式改组为政党。不数月间，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 18 个行省，从而为日后国会选举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的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在政纲中，提出了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力谋国际平等；实行男女平权等主张，这些都是其他政党没有的，反映了它虽承认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但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以防止袁专制独裁，破坏民国，以及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精神。

改组后的同盟会也有不少弱点：一是为发展党势，把一大批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拉入会内，造成组织上严重不纯，反而大大减弱了它的革命性；二是孙中山醉心于“实业救国”，黄兴困于南京留守事务，都不注重“党事”，

其他领导人也消极，造成同盟会长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会员意见分歧，步调极不统一，使它在与北洋军阀集团斗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因此，在参加民国第一个内阁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蔡元培联合内阁总理唐绍仪，以“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独裁斗争失败后，在宋教仁的竭力推动和实际主持下，同盟会与陆征祥为首的统一共和党，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党、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合并，8月25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国民党。企图以国会中“第一大党”的资格，实行“政党内阁制”，继续与袁世凯北洋军阀势力斗争。

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为党纲。可见其保持了同盟会的基本立场，同时为了容纳同盟者，也作了一些妥协，如“实行民生主义”改为“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改为“保持国际和平”；取消“男女平权”等。这些妥协显然含有策略的意义，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现实的斗争，是值得的。当时最迫切的斗争是反对袁世凯日趋严重的独裁化。对此，宋教仁的观察是尖锐的。他说：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所以，孙中山对这次改组是支持的。

（四）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于1912年4月11日成立于南京。其成员主要是同盟会员和立宪派，并多为政治界人物，如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省议会议员等，领导人有蔡锷、孙毓筠、殷汝骊、景耀月、刘彦、沈钧儒、诸辅成等。它的势力不小，党员数万人，支部十余省，参议院议席占1/3。

该党“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与同盟会、共和党相比，具有调和色彩，宣称：“本党党纲于积极的民生主义暨积极的国家主义，均不偏重，折中损益，中道而行。”因此在议会斗争中，它以“第三党”自居，声称与同盟、共和两党“无所偏持”，一切“以调和为主旨”；实际在具体问题上，它必须表明态度，时而附和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一切视其自身利益为转移。

除了以上四大党派外，还有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李怀霜为首的中华民国自由党、徐企文为首的中华民国工党等小党派，也较有影响。它们的成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工商业者、医生、律师、手工业者等，政治上拥护同盟会派，因此遭到袁世凯北洋政府的种种迫害。

随着这些党派的涌现，各种报刊也应运而生。许多辛亥革命前被查禁的刊物，现在公开了，又有数十种新期刊创刊。尤其是那些党派的机关报大张旗鼓地宣传本党派政治主张，攻击异己，成为党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重要的如章炳麟主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及其前身统一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为主笔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戴天仇为主笔、比《民立报》更激进的同盟会青年革命派喉舌《民权报》，统一共和党机关报《大中华报》，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梁启超主编的进步党刊物《庸言》，以及中国社会党刊物《社会星》等等。

这些刊物和它们所属的党派，除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表现文艺、

《国民党鄂支部欢迎理事宋纯初纪事》，《民立报》，1912年10月26日。

《统一共和党本部通告》，《平民日报》，1912年9月1日。

学术、学生、妇女的性质之外，大多数都高唱“民主”、“共和”，实际上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方案。再加上党派利益之争，争来争去，只是争一个假民主、假共和。但当时主要的争斗，表现在两方面：矛盾虽多，焦点是独裁与反独裁；党派虽多，总的是两大阵营，同盟会与反同盟会。这两种斗争又常常互相交叉。党派之争使袁世凯得以居间操纵。反同盟会的党派就成为袁氏打击革命党人的工具。从而在军阀之外，又产生一大批依附于军阀的官僚和政客。他们除少数人人为清廉为国为民的之外，多数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与军阀狼狈为奸，祸害百姓。同时，党派之争与军阀混战纠缠在一起，又造成了民国初年及整个北洋时期错综复杂的政局和激烈多变的态势。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表面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实际上南北对峙的形势依然存在。当时的基本特点是：同盟会领导下的南方各省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处于对抗地位；同时，在南方，又有立宪派、旧官僚控制下的一些省份，虽然拥护袁世凯中央集权，但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又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与同盟会及北洋集团发生磨擦和争斗；而北方也有北洋派与非北洋派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袁世凯上台后，江西、广东和安徽三省仍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都督分别是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为了通过这些地方政权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他们力图把这三省建设成同盟会的“根据地”。因此，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充实整顿各级领导机构，任命革命激进派分子担任军政要员；牢固掌握军队，抵制袁世凯的裁军限制，有效地保存了一定数量的革命军队；积极整顿财政，控制地方财政权，争取多留税款，解决本省财政困难。为此，他们竭力主张“有限制的集权说”，要求“分权各省”，地方自治。同时，又颁布政策，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地方经济，筑路、抗灾、改良社会风气等，收到了一定效果。

所有这些努力，都具有反专制独裁的意义，因此遭到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或攻击柏文蔚等“拥兵自卫”，进行军事威胁；或以重金高位相许，邀李烈钧等入京，但都无济于事。柏、李、胡等始终虚与委蛇，不为所动。因此双方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

湖北、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是立宪派旧官僚掌握政权或占绝对优势的省份。

受武昌首义之赐，黎元洪一跃而为民国副总统、鄂军都督兼参谋总长，但他并不因此而维护革命，反而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把湖北经营成他的独立王国，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利用革命党人的内争，先在 1912 年 7 月，残酷捕杀了同盟会鄂支部（由前文学社改组而成）的大部分成员，又把首义领导人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人先后调到北方，从而严重削弱了湖北的革命力量。同时黎元洪任用仇视革命的亲信，全面控制了湖北的各个要害部门，使首义之区很快成为黑暗地狱。

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袁世凯鲸吞湖北之心，黎元洪又对省外革命党人，尤其是同盟会本部进行拉拢，在南北斗争的有些问题上，取调和态度。袁世凯曾欲以亲信代黎督鄂，调黎单任参谋总长，黎则寻找借口，拒不受命。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情况和发展动向，与湖北相似。蔡锷、唐继尧、陆荣廷等掌握军权的人物，利用当时全国革命派与北洋派斗争的总形势，发展了一种反对革命党人、拥护袁世凯又极力维护本集团利益为特征的政治势

力，成为西南地方实力派。

南方另一些省份如浙江、福建、江苏、湖南、四川等，又是另一种情势，省内同盟会和立宪派势力都很大，势均力敌，因此处于激烈争夺之中，结果是，有些省如江苏、湖南，同盟会的势力继续扩大，占了优势，迫使立宪派分子与同盟会合作，采取一些保护革命者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另一些省如浙江、福建、四川等，同盟会的力量被日渐削弱，终于被袁世凯的势力插入，或完全落入北洋集团手中。

在北方，袁世凯直接控制的是直隶、河南和山东三省。这是北洋集团的发迹地，因此，袁世凯上台后，对这三省进一步加强了控制，安排自己的亲信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后改为冯国璋），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周自齐为山东都督。这些都督上任后，根本不把省议会放在眼里，在治安的名义下，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和一切进步势力，制造了一系列血案，还摧残舆论，禁止人民结社、集会、演说，对人民群众实行恐怖统治。

东北三省和山西、西北各省，原先都不是北洋集团的地盘，辛亥革命中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旧的封建势力统治着。袁世凯就施展策略，夺取了这些地方。以巨额金钱和禄位，收买了张作霖、阎锡山等实力派人物拥戴袁世凯，以北洋军“武力镇慑”，搞掉了企图策划“满洲独立”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如此，袁世凯就实现了对整个北方地区的控制，从而为北洋政府对中国16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二、二次革命及其失败

袁世凯北洋集团与同盟会的争斗，以及他们与立宪派政党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斗争，除了对各省的地盘之争以外，还表现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内阁和议会中。斗争的焦点是民主与独裁。袁世凯以北洋军为后盾，要实行总统军事独裁制，同盟会则要保卫民国和约法，坚持民主共和制。其他政治势力必须对此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袁世凯上台后，第一场斗争就是责任内阁问题。责任内阁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它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也是同盟会所坚持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参加内阁的同盟会阁员宋教仁和蔡元培等，对实行责任内阁满腔热忱。但是，袁世凯则要把内阁变成他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治工具。所以在组织内阁时，袁世凯竭力坚持由他的幕僚出任内阁总理。第一任总理由唐绍仪出任，是因为唐曾是袁的同僚。袁以为唐对于他必言听计从。不料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唐绍仪，自参加南北和议以后，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也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并认为要实行共和立宪，必须取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态度。所以他担任总理以后，便以“调和南北”为职志，国务院“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元培）、宋（教仁）二君”，对袁世凯的独裁行为，如在用人和借款等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抵制。这就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经常煽动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唐对抗，在参议院内，统一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也因要打击同盟会而准备弹劾唐绍仪，致使唐无法供职，被迫于6月15日辞职。

6月27日，袁世凯任命原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内阁总理。陆表面上无党无派，由他组阁，可收“超然总理混合内阁”、欺骗舆论之效，实际上一切听命于袁世凯，因此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和工商总长陈其美等联袂辞职，以示抗议；参议院也进行抵制。袁世凯竟动用军警胁迫参议院通过陆征祥组阁案。之后，议员们又纷纷弹劾陆征祥，逼陆辞职，袁世凯另任命其私党赵秉钧为总理，更受到同盟会等方面的反对。袁世凯遂邀请孙中山、黄兴出面调解。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错误地认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因此他表示今后决定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于提倡民生主义，发展实业。为此，他从1912年4月起，周游各省，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他的思想，还身体力行，提出了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

袁世凯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铁路计划，以笼络孙中山，企图利用孙中山和黄兴的革命影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曾致电孙中山，要孙解职后，尽快北上担任最高顾问。对于黄兴，也同样如此。但均被拒绝。唐、陆内阁风潮相继发生后，袁世凯为缓和同盟会的反对，再次派人到沪殷殷相劝。孙、黄从巩固新创民国的良好愿望出发，调和袁与同盟会日益激化的矛盾，答应北上。

8月24日，孙中山先期到达北京，受到国家元首规格的隆重接待，并在9月9日被授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与袁世凯两次会谈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于是，黄兴在孙中山的电促下，于9月11日到京，同样受到袁世凯的“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在京近一月，与袁世凯晤谈13次，虽然在保护革命势力和巩固共和制度等原则问题上未作让步，但一是由于如上述对当时形势认识错误，二是被袁世凯“热情”、“谦恭”所迷惑，还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谈话中袁世凯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表明自己并无野心，只求“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孙、黄则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在悬而未决的组阁问题上，应袁世凯的要求，孙中山出面劝说革命党人同意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黄兴同意赵秉钧为正式总理。黄还极力拉袁世凯入党，作国民党首领，又遍邀国务员全体加入，企图组织所谓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孙中山甚至向袁世凯作出“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如此热心“调和”并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客观上麻痹了革命党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而对于孙、黄“调和”的初衷来说，却是事与愿违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孙、黄“调和”、停止党争的呼吁，脱离实际，没有什么号召力。孙、黄还未离京，争斗烽烟又起。

唐内阁垮台，使同盟会认识到，要实行责任内阁须有政党作保证。为此，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企图以此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袁世凯则相反，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于是，双方斗争又升级。在

《中华民报》，1913年4月7日。

《同盟会之宣言》，《正宗爱国报》，1912年7月2日。

这场斗争中，由于孙中山已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发展实业。同盟会的宋教仁站在最前线。他认为要实行政党内阁，同盟会必须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党，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即议会中第一大党。于是在宋教仁的实际主持下，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几个政党，成立了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立即与袁世凯展开激烈角逐。如关于省长，袁世凯坚持由中央任命，国民党坚持民选；关于宪法，国民党坚决主张由国会自定，任何人不得随意干预，袁世凯则坚持各省都督参加“讨论宪法大旨”，控制制宪权；国民党坚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袁世凯则反之，等等。结果，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的国会选举，国民党以较大优势获胜，国民党组阁，大势已成。孙中山兴奋地说：“足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

如此，国民党成了“完成共和政治”的中坚和袁世凯实行独裁政治的最大障碍。袁世凯必欲去之而后快。1913年3月20日，就在国民党满怀胜利的喜悦，准备组织责任内阁时，他派人收买凶手，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宋教仁。而且，此案很快真相大白，袁世凯是元凶，全国为之震惊。

宋教仁被刺惊醒了国民党人。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终于看清“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国民之付托”的真面目，立即回国，1913年3月25日到上海，当晚召集国民党人紧急商讨反袁对策。然而会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孙中山等主张武装讨袁，并且要快，先发制人；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法律解决”，即通过国会、司法，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或“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暗杀袁世凯”，以免战争糜烂大局。孙中山对法律解决及暗杀皆不以为然。在掌握兵权的南方各省国民党都督中，也分成这样两派，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主战，其他一些都督或反对，或不积极，有的同盟会老人如谭人凤等甚至主张南北调和。因此，延误了时机。

正当国民党内争论不休时，袁世凯在取得帝国主义财政支持后先发制人了。他沿津浦、京汉铁路紧急调兵遣将，向南方革命党人作出两面夹击的军事部署：5月中旬，安排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以攻取江西为目标，进驻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前锋进驻武穴、小池口战略要地，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月底，又派北洋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同时，又把倾向革命的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调往烟台，进行收买，使其改变立场。袁世凯一面作此军事部署，一面就向国民党宣战：“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6月，先后免去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之职。

内部涣散的国民党，这时才慌了手脚，仓猝应战。黄兴部署湖北首先发难。但由于准备起兵时叛徒告密，机关被破坏，詹大悲仓促起事，被黎元洪派军各个击破，遭到大屠杀，幸存者都投奔江西李烈钧处。

7月11日，李烈钧奉孙中山指令，从上海秘密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于次日宣布独立，声讨袁世凯。如此，江西首先举起了讨袁大旗。

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黄兴在策动湖北起义失败后，被江苏革命党人迎到南京。他们掌握了第八师，于7月15日逼迫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

《时报》1913年5月14日。

并任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接着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广东（陈炯明）、福建（许崇智）、湖南（谭延闿）、四川（熊克武）等，先后宣布独立反袁。但是，由于革命发动前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各地独立后，一直未建立起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为了争取同盟军，7月12日他们竟在南京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大元帅，节制各省都督和讨袁军总司令，连孙中山这样一面比较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都不敢打出来。结果岑并不上任，二次革命实际是各地各自为战，这就决定了它必定失败的命运。

7月11日晚，江西讨袁军司令部成立后，即决定先发制人，掌握主动。12月，林虎部队首先在沙河向北洋军李纯部发动进攻。由于讨袁军怀着对袁世凯的强烈仇恨，奋勇杀敌，初战告捷；打得李纯“左撑右持”，“力尽智穷”，不断电告袁世凯求援。袁急令段芝贵支援，又有汤芑铭率海军督战，讨袁军三面受敌，寡不敌众，形势急转直下。李烈钧且退且战，等待湘、粤援军，但援军迟迟不来。在李烈钧退到南昌时，湘督谭延闿见江西败局已定，取消湖南独立，向袁世凯输诚，并致电李烈钧说“微服过宋，古有名训”，劝其脱离部队取道湖南出外流亡。李和林虎先后亡命日本，部队由谭延闿电请袁世凯同意，由湖南收缴遣散。江西讨袁军失败。与此同时，湖南革命党人对谭延闿取消独立不满，于9月9日再次发动独立，进攻都督府，被谭镇压。湖南讨袁也失败。

其他地区的讨袁战争以上海、南京最激烈。上海方面，由陈其美率部攻打北军驻守的制造局。7月16日，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宣布独立，形势一度对讨袁军有利。但接着袁世凯以巨款收买海军，各国列强和租界当局也都支持袁世凯，不许讨袁军进驻租界。闸北英军甚至将蒋介石率领的207名讨袁军缴械。8月13日，讨袁军在水陆两路和中外反动派的四面围攻下完全失败。

上海讨袁战局受挫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就惊慌失措，取消南京独立，进而到苏州办公，停止沪宁铁路交通，使反袁中枢南京腹背受敌。黄兴眼看失败局势无力挽回，7月28日，悲愤中出走日本。同日，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发表声明，表明“维持和平”心迹，辞职，离沪赴粤。8月2日，孙中山也离沪南下。

就这样，二次革命本来很脆弱的中枢也瓦解了，从而加速了讨袁阵线的崩溃。

由于袁世凯一再电令北军对取消独立的军队也要“勒令缴械，诛其渠魁”，逼得革命党人何海鸣等再度率部占领江苏都督府，恢复独立，并誓死血战，进行了英勇的南京保卫战。南京的锁钥天堡城，五得五失，伤亡惨重。9月2日，何海鸣率残部在雨花台进行最后一战，伤亡殆尽。

安徽、福建、广东3省的讨袁斗争，也由于敌强我弱，内部叛乱，相继失败。四川独立后，袁世凯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翔、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合兜剿”。9月12日，黔军占领重庆，熊克武日前出走，最后一支讨袁军溃散。至此，整个二次革命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二次革命失败后，农民反袁斗争白朗起义还坚持了1年多。袁世凯上台后，在加强其专制统治同时，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横征暴敛，摧残民生，

《李纯报告战况请援电》（1913年7月12、13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较清朝为尤甚。”于是激起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从1912年起，山东、山西、江西、四川、甘肃等地多次爆发群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白朗领导的河南农民起义。7月，二次革命爆发，白朗见北洋军大批南调，乘虚南下，攻克鄂北重镇枣阳，并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孙中山、黄兴都曾给予指导和帮助。但由于双方阶级的局限性，两支革命力量没有紧密结合起来。1914年5月底，义军进入甘肃，因与回、藏等少数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陷入困境。8月，白朗率百余人回家乡河南宝丰，不久被围攻失败。

在“二次革命”迅速被镇压下去的情况下，白朗起义坚持3年之久，纵横驰骋中原5省，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中国农民强大的革命力量。

二次革命的发动和失败，再次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性和软弱性。他们渴望民主共和制度，但没有力量保卫它。而且随着这次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成果几乎全部丧失。袁世凯和占领南方各省的北洋军阀及其附庸，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使革命派大伤元气。接着国民党被解散，国会亦解散，临时约法被撕毁，恢复独裁恐怖统治。这是一年多来革命党人调和妥协倾向的恶果。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十分弱小，又受到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制约，因而无力支持坚决、长期、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尤其害怕列强的干涉。因此，他们不愿意重走辛亥革命的路，希望以妥协改良来维持民主共和制度。再加上他们脱离广大市民特别是农民群众，而往往依靠投机动摇的军阀、官僚和政客，所以难与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相抗衡。

二次革命也暴露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与没落，加速了袁世凯的没落。袁世凯在击败革命党人以前，是小心谨慎的。他把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笼络在自己的身边。但是，随着军事顺利进展，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忘乎所以，一面猖狂地屠杀革命派，一面把原先的同盟者推到一边，走上了众叛亲离的道路。而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也从中开始酝酿。

袁世凯代表近代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刚从大地主阶级转化而来，还拥有大量封建特权。它又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就是说，它既不愿放弃陈腐的封建主义，又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这个阶级的品性极为腐朽，目光短浅，气量狭小，与清朝末年相似，拒绝任何改良，决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因此，它的统治也不可能稳固。

三、“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武力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加快了走向独裁的步伐：逼选总统，破坏责任内阁，取消国会，撕毁约法，最后复辟帝制。

国会成立后，即着手制定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两项工作，孰先孰后，引起了争执。国民党议员奉行法制，认为总统的地位和权力都根据宪法产生，主张先制定宪法；袁世凯深知总统非他莫属，所以极力主张先选总统，以把宪法变成其实现独裁统治的工具。但为了披着合法的外衣登上总统宝座，他暂时还需要借重国会，依靠反对国民党的党派。于是，他首先推动梁启超在1913年5月29日合并共和、民主、统一3党，成立了进步党，以梁为领袖。

7月，袁世凯又任命进步党领袖熊希龄为总理组阁，以资拉拢。梁启超、张謇入阁，分享闲曹。

袁世凯还不放心，为了充分保障总统选举的胜利，又在9月7日，指使交通系头目梁士诒出面收买一些小派别，凑成“公民党”，以梁为党魁，叶恭绰为副，为袁世凯抬轿子。该党由于交通系官员纷纷加入，财力雄厚，一时气势颇盛。

接着，袁世凯就策动黎元洪领衔，联合直、鲁、豫、陕、甘等14省都督致电国会，要求速选总统。

10月6日，在进步党、公民党的帮助下，再加上军警威胁，一天举行三次投票，袁世凯才以2/3的微弱多数，勉强当选首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选总统后，立即过河拆桥，国会、进步党在他眼中都失去了利用价值，相反，倒成了他实行独裁统治的障碍。因为不仅国民党在其议员主持下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仍坚持责任内阁制、国会为立法机关，而且进步党在这个问题上与国民党无多分歧。他们同意与袁世凯合作，排挤国民党，主要是权力之争，希望拥有一定的权力，利用国会和内阁有一番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所以，他们组阁后也不满袁世凯对国会的干预和压迫，从而使原来进步党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形势，日趋和缓。袁世凯对两党接近十分恼恨，就乘镇压“二次革命”之余威，向国会开刀，唆使北洋将领们纷纷发表通电：“迅将国会解散，其国民党之议员，并即驱逐回籍，交各省官司详加察看。”

袁世凯图穷匕见，首先在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并派军警两次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结果共取消438名议员，超过了参众两院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然后，袁又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于11月26日下令组织政治会议，来取代国会，并在1914年1月10日和2月28日，“据政治会议决议”，分别下令解散国会，遣送议员回籍。进步党还没有从国会解散、免死狐悲的凄凉处境中解脱出来，熊希龄这个“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总理又被袁逼迫辞职。从此进步党失去政治上的凭藉，惶惶然无所适从，终于走上反袁道路。

1月24日，政治会议又议决成立约法会议，为袁世凯造法。在袁的导演下，历时4旬，约法会议终于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于1914年5月1日由袁大总统公布。同时废除了《临时约法》。

根据这个袁氏宪法，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世袭罔替。但是，他还不仅以此为满足，还想搞复辟，做一个真正的皇帝。

袁世凯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向革命党和民主政治进攻，除了他掌握的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北洋军之外，就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

袁世凯上台后，英、法、美、德因为忙于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趋紧张的欧洲局势，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支持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帮助他们维护并扩大其在华的既得利益。日本则由于一跃而为东亚强国，又处于侵略中国的有利地位，谋图排除其它列强势力，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因而极力制造中国混乱，以便乘机渔利。但因它当时的实力还难与西方列强抗衡，在对华政策上取与西方列强貌合神离、伺机进取的方针。俄国东部与中国接壤，为了扩大侵华，也希望中国保持衰弱地位，反对中国建立一

个强有力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它的核心地区欧洲同样受到紧张局势的牵制，因此对华也不能搞大的动作。

于是，民国初年列强间的对华政策，在相当激烈的明争暗斗中，还能保持大体上合作的局面。这充分表现在对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上。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英、美、法、德4国公使就相继登门道贺，并为该4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接洽借款。然后，日、俄也加入，形成6国银行团的对华“善后大借款”。

帝国主义提供这次借款，除了为银行家赢得高额利润外，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为此，他们提出了种种条件，如中国财政部须延聘银行团为顾问，银行团应为中国政府财政代理人；银行团监督借款的使用和目的；中国的盐税收入作为借款的担保；中国政府不得向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借款，等等。俄国还提出中国及各国承认其在中国北满、蒙古和新疆的特权；日本则要求承认其在中国南满及蒙古东部的利益等。如此，通过政治借款来操纵中国的政局，过去是没有的，“善后借款”开了先河。而且，继中国海关丧失之后，列强又控制中国主要的税收之一盐税。凡此种种，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

如此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借款，自然激起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唐绍仪和熊希龄任内阁总理时，也进行了一些抵制，但袁世凯为了建立他的独裁统治，打击革命党人，迫切需要帝国主义的支持，竟不惜迎合列强的要求，肆意出卖国家主权，大借外债。1912、1913两年间，袁世凯先后向列强借款33笔，计英镑4350万、法郎10040万、规平银1011.3万两、银元327000元。其中数额最大的一次是1913年4月26日英、法、俄、德、日5国银行团与袁政府签署的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这时美国退出银行团，表面上是出于道义的理由，认为“借款的条件近乎损害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实际上是因为美国在银行团内的处境孤立，并对俄、日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强烈不满，妨碍其贯彻依靠门户开放政策打入中国市场的方针。

袁世凯依靠列强的支持，打散革命党人的对抗，登上总统宝座后，又企望他们支持其问鼎皇位。但是，列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复杂。由于欧战的影响，各国对袁世凯进行帝制表态不一，有的前后变化很大。

君主制的德国出于同类相投，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中国复辟帝制，认为共和不适中国国情。但与其它列强相比，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较小，袁政府主要乞求英国、日本的支持。英国起先“甚不赞成”恢复帝制，担心这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权益。但是后来得悉日本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即改变态度，急忙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表示，英国“亦赞成帝制”。美国则采取不干涉态度。

日本在欧战爆发后立即参战，但其真实动机是企图乘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进而利用西方列强陷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排挤其它各国在华势力，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占中国的梦想。为此，它一面在1914年9月—11月派兵侵占德国原在山东半岛的权利——胶济铁路和青岛，一面炮制出所谓《对支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条”，作为其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1914年12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亲自劝说袁世凯“改为君主政体，日本愿暗为扶助”。翌年1月18日，日置益在怀仁堂向袁面交“二十一条”，

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并表示“如能承允所提条件，则可证明日华亲善，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

“二十一条”共分五项：第一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第二项，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享有居住、经营工商业、筑路、开矿等一切权利，将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铁路的租借期延长为99年；第三项，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得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第四项，中国沿海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它国家；第五项，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察和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日本享有南昌至武昌、杭州、潮州间铁路修筑权，和在福建开矿、筑路、建筑海港、船厂等特权。

这些内容，尤其是第五项，不仅要灭亡中国，而且要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袁世凯原来打算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以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没想到日本竟然企图鲸吞中国。这使他“殊为失望”，但他未敢断然拒绝，而取拖延的办法，并把内容透露给西方列强，望他们从中调解，使日本降低要求。

欧美各国了解“二十一条”全文真相后，对日本潜攫他们的侵华权益，纷纷予以激烈抨击，再加上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表示“减轻要求”，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提出了修正案，并在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政府48小时内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进行武力威胁。

西方列强得到日本让步，就都转过头来压迫中国接受日本的修正案。袁世凯企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恐得罪日本，皇帝当不成，便决定对日屈服，在5月25日，签订了除第五项外，包括“二十一条”大部分内容的“中日条约”。消息传出，全国群情激愤，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袁政府虽然对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进行了镇压，但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日本强迫同意的，因此始终没有履行条约的具体规定，日本也不敢单方面采取行动。

然而，袁世凯却通过这个事件，摸清了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支持他复辟帝制的底，于是便加快帝制复辟的步伐。首先是成立专门为其复辟帝制鸣锣开道的机关“筹安会”。

1915年8月，根据袁世凯的旨意，杨度联合同盟会政客和立宪派名流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织了筹安会，接着，湖南、吉林、安徽、湖北、南京等地亦纷纷成立筹安分会，一时间帝制复辟的阴云笼罩全国。8月14日，杨度、孙毓筠等6人联名电请各省军政长官和公法团体派代表赴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各省随即复电，大都赞成变更国体。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议院请愿。这个“请愿团”的领衔人，大都是袁世凯的私党或被收买的社会名流，如曹锟、张作霖、赵倜、段芝贵、姜桂题等。交通系的梁士诒更是乘机邀宠袁世凯，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不几天，北京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等等。他们的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如“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云云。

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人都是参议员，本打算在9月1日起参议院开会时，一鼓作气让袁世凯黄袍加身。但是，北洋派内部有些人看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筹安会和袁政府的态势，从维护北洋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复辟

帝制不以为然，如徐世昌拒绝劝进，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教育总长汤化龙、平政院长周树模及农商总长张謇均借故辞职。黎元洪、周学熙等也主张实行总统世袭，反对君宪；地方上，虽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仍有直隶朱家宝、江苏冯国璋、广西陆荣廷等不表态，徐州张勋态度暧昧，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则公开反对。袁世凯只好把复辟时间表放慢，分别做这些反对者的工作。结果，大多数反对者见复辟大势已成，放弃原议，拥戴袁帝。于是，袁世凯称帝的丑剧终于开幕。

10月25日开始，各省分别选举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并与“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一起举行。该活动进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个个戎装登坛，如临大敌。会场外布置武装军警，场内则满是监视人员。“国民代表”在此等人指挥下，在预先印有“君主立宪”的选票上写“赞成”二字，又在推戴书上签名。11月20日，各省国体投票告竣。

12月11日，参议院将各省票数汇总宣布，并以总代表的名义通过总推戴书，上呈袁世凯。袁世凯因任总统时曾宣誓共和，今变帝制，“于信义无可自解”，于是就假意忸怩了一番。参议院又通过原先准备好的第二次推戴书，为袁世凯洗刷背叛民国的罪行。

袁世凯当即接受，1915年12月12日一早，他就发下申令，公然说道：“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次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至此，中国又换了朝代。“中华民国”这块牌子也倒了。辛亥革命留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印记全部被抹去。

四、护国战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一直没有停止过反袁斗争。但是，由于组织被打散和失败造成的思想混乱，国民党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各地的反袁斗争也显得软弱无力。

由于袁世凯政府通缉，绝大部分国民党员亡命海外。孙中山、黄兴等多数党员流亡日本，其它一些党员去了欧洲和南洋。由于袁世凯多边卖国，而不是一心附日，日本一批军人企图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袁政权。因此，日本当局对来日本的国民党人的安全“予以适当保护”。这使国民党获得了修整和再起的条件。孙中山利用这条件，一面继续争取日本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革命，一面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筹备“三次革命”。不过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与黄兴为首的稳健派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当前形势的估计及以后斗争所采取的战略策略问题上，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结果导致组织分化：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拟定入党誓约，正式吸收党员，要求入党者“附从孙先生”，并加按指模。于是国民党中的激进派分子又重新聚集到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下。1914年5

《政府公报·命令》，1913年12月13日。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572号，《刘茂曾组探缉队有关情况》，大正2年11月4日。

月，孙中山创办《民国》杂志，胡汉民主编，开展革命主义和反袁斗争的宣传。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他在会上激励大家“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民国谋取福利”，为“第三次革命兴起”而“努力奋争”。

孙中山这次重组中华革命党有三大进步：一是重申民权主义，改变了他原先认为民族、民权已达，唯民生未做到的天真想法，表明了推翻袁世凯、重建民国的决心；二是在思想上强调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三是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但是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中也有弱点和错误：首先，没有提出反帝任务。而且由于“二次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流亡日本，得到了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浪人及部分主张援助革命党以取得中国南方权益的日本政界人士的帮助，孙中山又生幻想，希图“联日讨袁”。他亲自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表示此意。甚至在1915年2月5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激起全国反日浪潮的时候，孙中山和陈其美与日本的犬塚信太郎（满铁株式会社理事）和山田纯三郎（满铁会社社员）秘密签订了“中日盟约”，相约在中华革命党夺取中国政权后，中日两国“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宜相提携：中国政府若聘用外国军事、政治顾问，宜主用日本人；中国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赞助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等。孙中山此举虽带有利用袁日矛盾的策略意义，但使中华革命党在当时反日爱国运动中十分被动。袁世凯乘机散布孙中山为日作伥的流言，离间中华革命党与民众的联系，使该党在国内威信受损。在实践上，由于放弃了反帝旗帜，直接影响了中华革命党发展的规模和斗争水平。其次，没有提出维护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口号，以吸引他们积极加入革命。再次，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三等，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人为地形成一个权力阶层，从而加深了党内的隔膜，脱离群众。再其次，资产阶级政党搞打手印宣誓效忠个人这一套，是受了中国落后的封建帮会传统的影响，得不到广大国民党员的赞成，因此使黄兴等一大批党员分裂出去。中华革命党实际上成了小宗派。这些弱点将对中华革命党的整个斗争产生消极影响。

中华革命党从筹建时起，就进行武装讨袁活动，其中著名的起义有：1914年6月李国柱发动的湖南郴县讨袁军起义，接着，附近的桂阳和临武地区，也分别由雷瀛和雷英、陈校经和邓蔚林发动起义响应。8月，哈在田率领的江苏南通起义。9月，东北邱丕振组织的关外讨袁军起义。10月，邓铿、洪兆麟在广东惠州聚众2000多人举兵反袁。11月，朱执信在顺德率千余人起义，攻打佛山，等等。

1915年1月起，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消息传出，国内反袁情绪又趋高涨。孙中山抓住时机，再次在全国各地发起武力讨袁高潮。他派遣军事指挥骨干，分任各省司令官，负责组织军队，制定讨袁具体计划；这年夏，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中华革命党自己的军队，成立了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4个总司令部，相应在上海、青岛、广州、三原设各军筹备处，总司令分别为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

以上工作加紧进行之时，传来了筹安会出笼的消息。12月，孙中山发表

第一次《讨袁宣言》，历数奸雄窃国种种罪行，向国人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为此，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

于是，国内各地的武装讨袁起义又纷纷爆发，其中最重大的活动是 11 月陈其美领导的上海革命党人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事件和接着发动的肇和兵舰起义，义军一度占领了电话局。1916 年春，居正在山东青岛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东北军，攻克 10 余个州县，威震整个华北地区，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致使袁世凯震怒之下，撤去了山东将军靳云鹏的职务。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华革命党发动这样的起义 40 余次，虽然这些起义由于脱离群众，又孤军作战，缺乏后援和配合，寡不敌众等原因，先后都失败了，但革命党人的英勇奋斗和巨大牺牲，鼓舞和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加速了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人的转变，终于迎来埋葬袁氏王朝护国战争的爆发。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部分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但还坚持反袁、又赞成黄兴“缓进”方针的国民党人，由李根源倡议，在日本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奉黄兴为领袖，先后在日本、美国、南洋、欧洲和上海发展会员 100 多人。他们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曾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相反，走到另一极端，错误地估计形势，改变缓进反袁的方针，倾注全力反日救国，因此反对孙中山借助外力进行革命的思想，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联袁反日，共同对外。结果，他们的主张反为袁世凯利用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袁乘机攻击孙中山等人“利用外力，以为第三次革命之举”，并宣布“宽赦党人”，劝诱党人停止讨袁。但是事实很快教育了欧事研究会的人们。当他们看到袁世凯接受日本无理要求，而且“反以见好邻国之意图谋称帝”时，失望之至，猛回头，重树讨袁旗帜，急起直追。

1915 年 5 月 9 日，黄兴与李根源、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程潜等 17 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接受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公开向袁世凯宣战。此后，他们纷纷回国，在《甲寅》、《正谊》等很有影响的杂志上，连续发表富有战斗力的反袁文章，揭露其卖国复辟的罪行，号召民众惊醒，加入反袁行列，特别在为联络当时最大的几支反袁力量共同讨袁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因为惟有他们与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使各自为战的反袁队伍统一起来，结成一股难以摧毁的力量。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和蔡锷为首的西南地方实力派走上反袁道路，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在筹安会发生前，梁、蔡都没有公开打出反袁旗子。但是，他们拥袁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即爱国、改良、共和。因主张改良及争权夺利，他们长期与革命派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因坚持爱国、改良和共和国体，以及不愿意在全国反复辟的声浪中与袁世凯同归于尽，他们终于与卖国、倒退和复辟的袁世凯政府分道扬镳。

梁启超、蔡锷对袁世凯的怀疑和不满，始于 1914 年下半年。袁瘫痪国会，打击国民党时，也严重损害了进步党的利益。之后，梁虽屡催恢复国会，袁非但没有置理，反而宣布废除了进步党内阁，设立政事堂，种种复辟举动，使他们“越看越不对了”。于是，在参议院中，他们不断就外交、财政、军政等问题，向袁政府提出质问，梁启超还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梁、蔡为此做了几个月的工作，力图“匡救”时局，“阻止”帝制，但结果是出了个筹安会。面对当时“普天同愤”、“党人思逞”的形势，梁启

超、蔡锷终于走上了积极反袁的道路。他们协商后决定，先由梁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掌握舆论主动权；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发动军事讨袁。

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果然引起震动，使袁政府大失人心。蔡锷也施展策略躲过袁世凯的许多耳目，秘密与反袁各方联络，并在11月3日，以治病为名离京赴津，又摆脱袁布置的密探监视和沿路截杀，历尽艰险，经日本、上海、香港转越南河内，来到云南。

这时的云南，继蔡之后担任都督的唐继尧，在全国反袁大势所趋和中下级军官强烈反袁情绪的压力下，也已转向反袁。12月21日，唐继尧召集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熊克武等包括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内的各方代表人士紧急会议，一致赞成立即组织“护国军”讨袁，推举蔡锷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宣布云南独立。27日，蔡锷即率护国军第一军向川南进军。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军第一军分三路向川南进攻，左翼在1916年1月17日进攻新场得手，首战告捷，随后节节胜利，21日攻克川南重镇叙州。中路与川军刘存厚起义部队汇合，于2月7日包围了另一重镇泸州。右翼是戴戡部队，在1月1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独立时才组成。2月18日进抵川南的綦江。另外，贵州还派出王文华部加入护国军，分三路进攻湖南，开辟湘西战场，在2月中旬夺取了黔阳、芷江、麻阳等地。

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军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发动一系列起义，或牵制袁世凯调集军队去川湘战场，或配合护国军攻城杀敌，成为讨袁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袁世凯得知云南独立消息后，于1915年12月29日下令褫夺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人的官位，1月5日，令曹錕率两路北洋军南下征剿云南，第一路司令官马继增，第二路司令官张敬尧。由于初战节节失利，袁世凯被迫在2月23日宣布“从缓办理”登极大典，作为缓兵之计，以图调集更多的北洋军南下，争取时间。

但是，整个局势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袁世凯。首先是北洋集团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原先抵制帝制的人又故态复萌。段祺瑞和冯国璋先后拒任征滇总司令。1916年2月底，段祺瑞甚至不顾袁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冯国璋还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联名致电袁世凯，请速取消帝制。冯还与各派反袁势力及西南护国军暗中联络，又与段祺瑞一起密令前方将士屯兵不前，曹錕率领的征滇军攻到云南边境时，果真不再前进。他们采取他们的老师袁世凯上台前的计谋，利用南方势力，逼袁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实力派，他们的离心，给了袁世凯极大的打击。

其次，帝国主义各国看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袁世凯复辟，也开始转变态度，1915年10月和12月，日、英、俄、法、意等国公使，两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警告，指出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直接间接影响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世凯必败，又将外交干涉政策，变为倒袁政策，以选择更称心的代理人。1916年1月21日，石井正式通知陆宗

與：日政府希望袁政府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将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与此同时，日本还通过各种途径暗中支持中国各派反袁势力，包括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和复辟清朝统治的宗社党等。这些情况也都被袁世凯侦知，使袁震惊。

袁世凯在内外交困时，又传来征滇军不断失败的消息。李烈钧率领的护国军第二军及第三军一部，3月初迎战粤军不断胜利；15日，广西陆荣廷又宣布独立，断粤军退路，迫使龙济光父子在17日投降，从而粉碎了袁世凯企图由广西攻取云南的计划。广西独立还鼓舞了整个护国军的士气，瓦解了北洋军的斗志。四川和湘西的护国军乘机反攻，夺回了先前失去的阵地。北洋军全线崩溃，连第二路司令官张敬尧也身负重伤，急电北洋政府救援。

袁世凯无奈，3月22日，被迫接受冯国璋等各将军和政治顾问莫里循的建议，“立刻取消帝制”。次日，又颁令废止洪宪年号。83天皇帝梦就此结束。但是，袁世凯还不甘失败，25日以后，他利用与南方停战议和时间，又向美国借得100万美元外债，作为“先攻川、湘的战费”，以图反扑，这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于是，形势急转直下，陕西、四川、广东、浙江先后独立，起兵讨袁。

继广东、浙江独立后，独立各省为统一军事和外交上争取承认，又进一步联合起来，5月8日，在广东正式成立一军务院，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对抗。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抚军初由唐、岑、梁、刘显世、蔡锷、陆荣廷、李烈钧等10人组成，后曾不断增补，但始终没有中华革命党的代表参加。

军务院成立前后，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告，宣布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取消其民国大总统资格，恭承副总统黎元洪代之，并昭告各国公使，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从而彻底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5月11日，军务院又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此次举义之真精神”，在于“拥护国法”，号召各省议员迅速筹备国会的召开。这是云南首义后，第一次明确提出拥护“约法”、“保障国会”的主张。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统率各路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的军事围攻，加速了它的灭亡。

军务院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护国战争不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玩弄和谈阴谋而停止下来，而且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这不仅为护国战争补充了新的纲领，树立了新的旗帜，而且为它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从而把护国战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它的历史功绩。

军务院也有局限性。它排斥孙中山为首的反袁最早最坚决的中华革命党人，使整个战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手里，这就大大局限了反袁斗争的成果，而且其内部因各种私利而争斗，最严重的是只知依靠军阀、官僚、政客而不发动人民群众，使护国战争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而留下无穷后患。这再次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袁世凯的亲信陈树藩和陈宦先后宣布陕西、四川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后，5月29日，在护国军的军事包围和湖南各县纷纷独立的压力下，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的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汤芑铭

《莫里循致袁世凯便笺》（1916年3月21日），《莫里循通信集》，第2册第496页，剑桥大学1976年版。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333页。

又宣布湖南独立，成为脱离袁世凯统治的第8个省，使袁世凯感到众叛亲离到何等严重的程度，因而给他精神上格外沉重的打击。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致的讨伐声中，忧惧而死。

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虽然资产阶级改良派进步党梁启超、蔡锷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对复辟封建帝制，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的团结和合作，终于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表明它是继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成功的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战争。

这次革命战争的胜利还表明，经过辛亥革命，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反对封建帝制复辟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这次革命战争又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革命；不仅可以发动和平的改良运动，而且可以发动流血的革命战争。这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大特点。

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次革命战争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积极参加了护国战争，但由于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不仅不敢发动群众，而且把国民党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也排斥出去，因而失去战争领导权，致使这次革命战争未能获得更大的成果，而且最后还是走向失败。因为，袁世凯虽然倒了，民国也算恢复了，但是胜利的果实却又落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国家政治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还产生了如唐继尧等一批大大小小的地方新军阀，他们非但对帝国主义没有丝毫的触动，反而依赖更重了。由此可见，护国战争所得也不过是一块“民国”空招牌，如同当年辛亥革命一样，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失败的，它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寻找继续革命的道路，又提出了新的课题。

五、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都有重大变化和发展，社会风气也有许多进步。

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产生于上世纪末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存在的3个多月里，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接着成立的北洋政府，也为当时形势所迫，不得不任命注重发展实业的宋教仁、陈其美、张謇，先后担任农林、工商和农商总长，继承和发展了南京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尤其是1913年9月进步党的张謇执掌农商总长后，曾电令各省都督调查实业发展情况，并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司，专管实业调查和发展计划。他还注重经济立法，在他任内，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奖励实业发展的法律和条例。据统计，1912—1916年间公布的这类条例、法规有86项之多。这些条例，虽尚未完备，有些也未能认真执行，但毕竟解除了清政府统治时期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障碍，为其发展开了绿灯。

南京和北京政府的这些措施，使中国资产阶级受到鼓舞。他们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发行鼓励人们投资实业兴趣的杂志，掀起了一股投资创业的热潮。工商部于19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到会的实业家100多人，开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代表们在会上纷纷提出了发展实业的各种计划和提案，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强烈愿望。1914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22省代表180余人出席，提出28项、122条款议案，内容涉及各个经济领域。当时人们称此会“俨然一地方议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合群大会”。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与抵制美货后（1905—1908），出现了第三个高潮，从而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概况如下：

据统计，从1905—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总数增加了548个，资本合计12029.7万元。如果与甲午战争前的情况相比，厂矿数增长了6.6倍，资本总额增长了4.7倍。其中尤以民国初年增长最快：1903—1908年，新注册的企业为265家，平均每年44家；1912—1921年为794家，平均每年80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近一倍。从投资额看，1895—1911年厂矿投资额为1亿元，1912—1918年6年间投资总额即达14286.5万元，比辛亥革命前16年还多3000多万元。

从资本种类看，这一时期商办工业资本增长快，到1913年，全国商办企业已达到516个，资本总额9551.8万元；而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94个，资本只有4567.2万元，从而使商办工业资本超过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资本，达到了整个工业资本总数的70%，占了重要地位。这种情况，在一些民族资本家的发展史上，反映得很清楚。

买办出身的祝大椿，1898年开始创办源昌碾米厂时，资本仅40万元，到1913年就在上海、苏州等地办起了缫丝、纺纱、电灯等共11个厂（包括投资）；他的自有资本扩大到235万元，比最初资本增加了22.5倍。又如士绅出身的张謇，1899年开创第一个企业——南通大生纱厂时，有纱锭20350枚，资本69.9万元，到1913年，纱锭增到66700枚，资本增到279.1万元，而这十几年中，所获纯利竟达489.3万元，为创办大生时资本的7倍。张謇还同时投资于其它工、农、航运等27个企业，资本数百万元。

再从主要的工业部门看：棉纺织业，1909年前，商办纱厂仅11家，纱锭18万多枚。到1913年发展到18家，创办资本900多万余元，纱锭48万多枚，另有布染厂27家，资本126万元，织机2000多台。面粉业发展较快，1895—1913年，全国增设的商办面粉厂53家，投资额达862万元。民族工业资本的缫丝业发展最快，1894年前新式缫丝厂已有数十家，但资本不超过200多万元。1895—1912年，就增设了97家，资本达1.158万元，成为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在许多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因此具有明显的弱点，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偏重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和面粉，重工业相当薄弱；二是企业规模都较小，大多是中小企业，机器和技术都比较落后。这些弱点，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和对外国资本及官僚资本的依赖性，也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与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时期，中国官僚资本也有一些发展。原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后所办的军事工业，这时都转到北洋军阀手中。他们为了镇压革命、扩大地盘和获取高额利润，不仅继续扩大经营军火工业，还陆续投资民用工业，主要是煤、铁矿和丝织、造纸、皮革等，还有银行业。因此，虽然这个时期官僚资本的发展没有民族资本快，但它在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中，还是保有 30% 的比例，达到 4567.2 万元。官督商办的有 86 家，资本额为 2947.6 万元，占总额的 1/4。

这时期官僚资本投资的特点是，以现任官僚私人投资工矿企业和开办金融银行业为主，主要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京、津地区。但其发展没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快，也没有控制全国经济命脉。所以如此，是因为袁世凯政权并不巩固，政局动荡，战争迭起。因此，军阀官僚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大半用来购置土地和房产，进行封建剥削，或用于商业和金融等投机事业，很少一部分用来投资工矿企业。

与工业发展相反，这时期的中国农业，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业改革的漠视，农村生产关系没有什么变动。因此，在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和北洋政府剥削加重及连年不断的战争破坏下，农村经济呈现出衰败的趋势，自耕农破产和土地兼并、集中的现象最为突出，据苏南两个县的调查，到 20 世纪 20 年代，35% 的农民耕地被剥夺了：/ 昆山 / 南通时期 / 自耕农佃农 / 自耕农佃农

1905/26.057.4/20.256.91914/11.771.7/15.861.51924/8.377.6/13.064.4
上表各县总农户为 100，自耕农农户比例的减少，佃农农户的增加，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土地集中，农民破产的严重情况。

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事业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建立了近代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制度。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成立了教育部，任命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大部分省区还设立教育科，掌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宜。同时，教育部根据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颁布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教育会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和制度，对清末教育作了一些重大改革。1912 年 9 月 3 日，又公布“壬子学制”，统一了我国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职业教育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并规定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和男女同校、设立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等；又颁布半日制学校规程，大量开办师范及各种职业学校，以补正规教育之不足。因此学校和学生数量增长很快，据教育部统计：1907—1915 年，不到 10 年间，学校数增加了 91851 所，学生数增加了 3269263 人。另外，民国初年，社会教育也蓬勃发展起来。1917 年教育部为此还设立了社会教育司。

通俗教育得到重视。1913 年，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成立，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从事搜集各种图书、讲演、歌谣、戏剧、故事、小说、弹词、唱本，以为改进之参考。各地方乃纷纷设立通俗教育会、通俗讲演所、通俗图书馆，以推行社会教育。据 1921 年统计，全国共有公立私立通俗教育会 233 所，通俗图书馆 286 所，演讲所 1881 所等。

提倡平民教育。起初是留学生在赴英法参战华工中开始识字工作。1920 年，晏阳初回国，见国内文盲有 3 亿以上，就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普及识字教育，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杭州等地，开办平民学校，各地响应，

后来在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各省设立分会，达 50 余处。

实施职业补习教育。1913 年，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规程，订有实业补习条款，并于北京、沈阳等地，设置公众补习学校。1915 年，全国共有此类补习学校 76 所。

统一国语的工作也着手进行。我国方言复杂，实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进步之一大障碍。1912 年教育部成立，即召集“读音统一会”。1913 年 2 月，正式开会，制定注音字母 39 个，审定字音 6500 多个，筹拟国音推行方法，组织国音统一期成会，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发行注音字母报等。

后来，随着袁世凯复辟活动的展开，教育改革的势头受到抑制，有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现象。但资产阶级教育制的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良，学校和学生数量也有一定的增加。

在科技方面，这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集中外地地质学者，调查中国地质，是开创性的工作。

另外，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又渐渐恢复起来，到民国初年已有相当的发展，并伴随着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西医、医院也发展起来。据统计，1905 年在中国的传教士有 3445 人，教会会员 178254 人，到 1918 年传教士增到 29306 人（其中外国传教士为 5961 人），会员 312970 人，信徒 654658 人。教会学校的发展也十分可观，据 1918 年统计，大学 18 所，学生 772 人；中学 228 所，学生 11892 人；小学 5902 所，学生 159775 人。另外还有师范学校、神学院、实业学校、幼儿园、孤儿院等。教会办的医院 320 所，医学校 21 所。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许多除旧布新的法令，再加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冲击，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气也有许多变化：

剪除发辫。“编发之制”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象征。辛亥首义后，各地群众即自动起来剪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1911 年 12 月 29 日），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辫发，以示庆祝。孙中山在致各地电文中，还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

放足。在封建社会中，随着纲常礼教的加强，缠足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因此放足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1912 年 3 月 11 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飭各省劝禁缠足，要求“已缠足者令其必放，未缠足者毋许再缠”。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

改变称呼。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尤其是官民之间极不平等。民称官必须呼“大人老爷”之类。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保持形式上的平等，所以，孙中山曾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命令取消过去“非分之名称”，主张“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如此提倡，慢慢也成社会风气。

废止跪拜礼。跪拜之礼是一种表现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不平等。为了提倡资产阶级人权平等的思想，孙中山在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上，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赞成通过，此后便逐步流行开来。

《临时政府公报》，第 29 号，1912 年 3 月 5 日。

《临时政府公报》，第 45 号，1912 年 3 月 22 日。

《临时政府公报》，第 27 号，1912 年 3 月 2 日。

以上种种，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和它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

第二章 军阀割据的形成

一、北洋军阀的分化与政局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却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这是因为这时的北洋集团已经分化。

袁世凯利令智昏不顾一切复辟帝制时，北洋集团中稍有点理智的人，包括他的北洋嫡系段祺瑞、冯国璋等，不愿为他殉葬，纷纷反对，北洋集团即已出现裂痕。袁败亡后，北洋集团因失去重心和驾驭人物，裂痕扩大，于是分化成两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

袁世凯死后，军阀的不断分裂割据和混战是北洋时期政治的一大特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分散独立的个体经济和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争夺与分裂政策。这是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军队分散掌握在各派系军阀头子手中，而不像封建社会，全国军队忠于皇帝一个人；也不像资本主义社会，全国军队忠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北洋时期充分表现出军队对国家政治决定性的、畸形的影响。落后的经济与落后的军事相结合，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政治。这是民主共和政治几经摧残的根本原因。

皖系成员，一部分是段祺瑞在北洋军中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和北京政府陆军总长时培植的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如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等；一部分是袁死后，段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时，从北洋集团中网罗的私党，如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浙江督军杨善德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这两部分人构成了皖系军阀集团，也表明了皖系控制的基本地盘。此外，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河南督军赵倜、热河都统姜桂题、奉天督军张作霖，以及王揖唐、田文烈、方枢等许多军阀政客，也都一时依附于皖系。在财界拥有雄厚势力的交通系政客曹汝霖、陆宗舆和叶恭绰等，也和段有密切关系。

直系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接替张勋出任江苏都督，为北洋派坐镇江南。他起初的势力和地盘比皖系小，主要是任湖北、江西护军使的王占元和李纯。所以，整个直系势力的基础是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三省。虽势力不如皖系大，但处于南北斗争的咽喉地带，在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皖直两系当时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南方的不同态度上。段祺瑞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主张对南方取强硬态度，由北洋派统一全国，并由他来主宰天下，因此把国民党、进步党及西南实力派等反袁势力，视为异己力量，准备加以消灭。所以，对南方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开国会，惩办帝制祸首三大要求，段祺瑞内心并不乐意接受，只是时势所迫，暂时让步应付。因此在履行这些要求时，他处处作难。

冯国璋则不然。护国战争期间，孙洪伊、唐绍仪等为拉冯反袁，与冯保持经常接触。袁死后，这种关系继续发展。冯与军务院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共商复辟垮台后的要政。因此，冯对于南方的三大要求较早地表示赞同，并对段祺瑞的作难作了一些斗争。

袁世凯死后，中央实权所以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一是由于当时皖系的势力大于直系；二是由于段祺瑞一直在中枢任职，近水楼台先得月。早

在 1916 年 3 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时，为了收拾残局，重新起用段祺瑞，任命他为参谋长，旋又改任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三是由于当时段祺瑞接受了南方提出的三项要求，因此他也为南方所接受。

6 月 29 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废去原来国务卿的职称，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然后，段配合黎元洪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肃清帝制遗毒，同时改造旧内阁，组织了一个包括南方 5 名成员的新内阁，并在 8 月召开国会。7 月 14 日，南方的军务院宣告撤销。中国表面上又实现统一，从此，开始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历史。但是，段并不真心实意地拥护共和，而且袁世凯统治赖以存在的旧的封建官僚势力并没有触动，又成为段的统治基础，他们为了私利和派系集团的利益而争斗，因此，各种矛盾又激化起来。

在当时全国的政治舞台上，重要的政治势力，除了皖系和直系军阀之外，还有国民党、西南地方军阀、进步党和黎元洪总统府。由于皖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因此政局的特点是，皖系与其它各派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同时，其它各派之间也有复杂的争斗。

首先是皖系军阀与其它各派的地盘之争。

在任命各省督军、省长时，段祺瑞实行按军事实力来安排的办法。当时全国有三种武装力量：北洋军、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国民党。北洋军力量最强，占据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和华南一部。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的武装其次，掌握了云、贵、桂、川及湘、粤的部分地区。国民党的武装最弱并且分散，只有驻韶关的李烈钧部、驻长沙的程潜部和驻山东潍县的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安排结果，北洋派控制的各省督军几乎是袁世凯时期的原班人马，西南实力派获得了云贵桂川粤浙地区，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和稳健派）完全被排斥。如此，以后皖系军阀与国民党的矛盾，就主要向政治议会中发展。

在争夺地盘斗争中，国民党所以被轻易击败，除了段祺瑞的计谋，还由于孙中山和大多数国民党人对段祺瑞封建军阀的本性认识不清。在袁世凯死后，孙中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诚恳地与段祺瑞合作，并且为了表示这种诚意，主动在 6、7 月先后发出了收束中华革命军和停止中华革命党活动的通告。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所以能复辟，是由于“民智未开”。于是他得出结论：维护民主共和必须使民众参政，而使民众过问政治的最好方法是实行地方自治，渐次实现直接民权。由此可见，孙中山的主张虽属幼稚，但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所以，国会复会后，国民党人便以国会为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阵地，为重建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这势必与段祺瑞追求新的军事独裁发生冲突。

皖系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争夺相当激烈。而且，在护国战争中崛起的西南各省武装集团，在袁下台后，拥兵自固，扩张地盘，立即把讨伐帝制的正义战争，变成争权夺利的非正义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从而蜕变成一个个地方军阀集团，主要有滇、黔、川、桂、粤、湘 6 系。

滇系军阀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为首。在护国战争中，他派罗佩金率滇军入川，战后，罗出任四川督军。为巩固四川地盘，罗在执行北京政府收束军队的命令时，采用“强滇弱川”的政策，企图搞掉川军刘存厚部。刘部在护国战争中起过一定作用，这时已变成川系军阀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对滇军扩张不满，段祺瑞乘机挑拨，支持刘反罗，1917 年 4 月 18 日，即爆发川滇“刘

罗”之战。战争在成都城内外激烈进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战争结果，滇军失败，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

戴戡是进步党人，又是黔系首领刘显世派遣的入川黔军司令。刘在护国战争后任贵州督军，后又兼省长，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黑暗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使戴戡获得四川省长、军务会办之职，现又兼督军。刘罗之战时，戴曾允刘存厚，待罗下台后，将军务会办一职让刘；现控制了四川大权，却不履前约。于是，7月5日，又爆发了川黔“刘戴”之战。黔军不敌，在从成都败退时，遭刘军腰击，逃散，戴也被杀害。北京政府乘机谋取四川，任命北洋系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军入川，调刘存厚、罗佩金入京候办。但刘不遵命，乘胜追击滇、黔军。唐继尧、刘显世组织反扑，阻挡刘存厚，逐出吴光新。北京政府只好在12月8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张澜为省长。

桂系军阀以陆荣廷为首，护国战争中打败了原投靠北洋系的广东都督龙济光，形成了桂系独霸两广的局面。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争执时，都拉拢陆荣廷，4月10日，升任陆为两广巡阅使。

皖系与进步党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矛盾。袁世凯暴死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立即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全力拥护段祺瑞，并且推动唐继尧、陆荣廷等撤销军务院，拆散了南方护国阵营，一道支持段祺瑞政府。梁启超进步党原来附袁反袁以及与国民党的争斗，都是为了本党的利益，带有投机的色彩。现在袁世凯死了，国民党仍在，而他们自以为与袁的继任者并无重大矛盾；北洋势力不仅不会构成对他们的威胁，而且他们必须依靠北洋派才能有所发展，才能与国民党抗衡。所以，他们又依附于北洋派，而且首先希望段祺瑞帮助他们在西南取得一块地盘，作为进步党的活动基地。

但是，进步党的这个企图，一是与北洋集团图谋西南的安排有矛盾，二是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根本利益相冲突，注定是要落空的。

进步党在西南的活动首先受到唐继尧、刘显世等的挟制。蔡锷、戴戡率滇、黔军入川作战后，唐和刘就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给予必需的援助。护国战争结束后，唐、刘又严密防范梁启超、蔡锷回归，从而迫使进步党放弃经营云贵的计划。两广方面，已是桂系陆荣廷的天下，进步党也很难打入，最后只得转向四川。7月6日，梁启超从段祺瑞处，争得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蔡因病去日本死亡后，戴戡接任川督，又因分赃不均，与川军实力派刘存厚发生冲突。刘在北京政府段祺瑞的支持下，倾全力围歼了戴戡部队，并把戴打死。进步党在护国战争中所掌握的这一点点武力，就这样丧失了。

梁启超进步党经营西南的计划完全失败后，不得不回到北京，依附北洋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谋北洋政府中一席之地。但皖系也只是利用他们与国民党的矛盾，并不愿意他们来分享余润，因此又潜伏下破裂的危机。

以上各种矛盾，或是利害冲突还不尖锐，或是地区相隔远大，多数还处于潜伏状况。唯有段祺瑞与黎元洪的矛盾，生在肘腋之间，很快酿成风波。

二、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段祺瑞追求以他为中心的皖系独裁，很快与总统黎元洪发生冲突，即“府院之争”。这场斗争，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与皖系军阀的矛盾、国民党与进

步党的矛盾，以及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

斗争具体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一）府院权限。段祺瑞及其亲信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竭力把政府议决事件及官吏任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总统只需盖印批准即可。黎元洪却不愿只作盖印的工具。8月下旬，他指使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峰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主要内容两点：（1）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2）所有国务院议决事件及任免官吏命令须经该管部长官同意后，再呈大总统盖印，如总统有不同意见时，得交回国务院再议。同时，黎元洪又支持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与段祺瑞、徐树铮的独裁行为作斗争。段祺瑞不肯让步，几次以辞职相威胁，最后竟用武力将孙洪伊逐出内阁，又唆使督军团胁迫黎元洪罢免了丁世峰，段祺瑞也授意徐树铮辞职作为让步，才暂时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二）制宪问题。8月1日国会复会后，即着手制宪工作。国民党议员主张学习欧美共和制，省制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地方自治，以反对北洋军阀集权，维持南方实力派的半独立地位，使国民党也得到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此主张得到各省议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进步党以“宪法案研究会”即“研究系”的名义在国会中活动，坚决反对省制入宪，以取宠于正在谋求中央独裁统治的皖系军阀。

与此同时，在辩论国会体制问题时，国民党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制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专制的需要。

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居多数，研究系主张不能得逞。因此，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首领对国会甚为不满，他们不断挑动北洋各省督军出面干涉国会，打击国民党。为此，以张勋和倪嗣冲为首的北洋系各省督军代表先后两次在徐州开会，要求修改宪法，改组国会，驱逐国民党员出内阁，胁迫南方独立省份迅即取消独立，否则“以武力解决”。梁启超研究系也勾结督军团，内外配合，夹击国会和国民党。

督军团肆意干政，引起社会各界的谴责，南方实力派也表示不满。黎元洪也深感忧虑。他在9月29日发布了一道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

段祺瑞则极力包庇张勋，掩盖徐州会议真相，并且又策动督军团在1917年1月9日开第三次徐州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和总统府四项所谓解决时局主张。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三）参战问题。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一开始是反对中国参战的，顾虑中国参战后，在结束战争的和会上将以战胜国资格发言，会动摇它在中国夺得的种种权益。但到1916年，日本的态度改变了，因为这年7月3日，日俄订立密约，双方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利益；1917年2、3月份，日本又分别同英、法、俄、意达成密约：日本支持中国参战；4国应允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于是，日本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不反对中国参战，而且竭力拉北京入伙，企图以此操纵中国的政局。

美国起初对大战持中立态度。1917年2月3日，在内外压力下，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但它不希望中国参战，怕自己参战后分不出力量来同日本斗争，中国参战反而会给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机会。因此，在2、3月份，美国国务卿蓝辛多次要驻华公使芮恩施说服中国不要参战，说欧洲战局尚不需要中国参战。

可见，日美双方都想通过参战问题，牵制中国政局。在黎元洪与段祺瑞进行府院之争时，前袁世凯总统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怂恿段祺瑞解散国会以贯彻参战主张；芮恩施则警告外交部次长陈篆：任何企图推翻国会以达到参战目的的举动将不能获得美国的同情。

在美日这次角逐中，段祺瑞为解决扩充军队等问题的财源，决定亲日，在日本支持和怂恿下，决心立即与德断交，继之以宣战。可见，段祺瑞主张参战，在政治上虽然有些道理，实际上包藏着阴险和丑恶的用心，以参战为名，进一步投靠日本，借款扩军，排除异己，征服南方，统一中国。走的是袁世凯卖国独裁的老路。

黎元洪则担心段在参战名义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便接受美国的立场。因此，当3月4日，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时，黎断然拒绝。段即以辞职相威胁。黎想乘机改组内阁，未成，在徐世昌及副总统冯国璋的调解下，只得妥协。3月10、11日，参众两院也通过对德绝交案。

接着就讨论参战问题。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于是段祺瑞又起用督军团。5月1日，内阁讨论对德宣战问题时，倪嗣冲等人闯入会场，表示各省督军一致支持总理段祺瑞对德方针，终于胁迫内阁匆匆通过了对德宣战案。然后胁迫黎元洪核准。黎推给国会去讨论。

在国民党议员活动下，5月19日，国会坚决抵制参战案，并以投票2/3的多数，表示国会对内阁不信任，要求改组内阁。黎元洪在23日发布三道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改组内阁。

段祺瑞接到免职令，当日即以国务总理名义通电各省，声称免职令未经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能负责”。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为张勋复辟提供了机会。

张勋并非北洋派的嫡系，而是一个想重整清朝的复辟狂。辛亥革命时，他坚持与革命军为敌，在南京屠杀民众数千人后，率败军退守徐州、兖州一带，伺机复辟，一些有复辟希望的前清遗老遗少和部分督军聚集到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复辟集团。在镇压二次革命和对抗护国军的斗争中，张勋又坐收渔翁之利，扩大力量，把一支仅有一千多人的辫子军，扩充到数万人的强大武装。以此为资本，他又在袁世凯死后的府院之争中，主持三次徐州会议，被拥为督军团的盟主，从而成为段祺瑞的依靠力量。而当段祺瑞不接受总统的免职令，黎又改组内阁失败、中央出现统治危机时，张勋又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因素。他于是认为复辟的时机来到了。

段祺瑞清楚张勋复辟清室的意图，但为了利用其力推翻黎元洪，不惜以日后实行复辟为钓饵。5月23日，张勋召集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在会上鼓动张勋领头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张则乘机提出，推倒现政府后，各省共同拥戴清帝复辟。徐当场表示，“只要达到驱黎目的，其它一切在所不计”；答应“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各省督军也都赞同。

与此同时，黎元洪也竭力争取张勋的支持，多次派人游说张，表示黎“实处孤危之地”，希望张“维持大局”。辛亥之后，由于德国一直支持张勋的

参见《张勋揭露段祺瑞电》（1920年7月20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复辟活动，供其金钱和枪炮，因此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张勋与段祺瑞有分歧。黎元洪想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因之倒阁而去段”。为此，黎元洪还任命与张勋有联系的李经羲任总理。

但是，段祺瑞又一手策划皖奉等北洋8省“独立”，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和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6月2日，“独立”各省又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并宣布要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在这种情势下，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上任，他向黎元洪提出，必得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黎无奈，只得在5月31日向张勋发出邀请电。

6月8日，张勋的辫子军4300余人进入北京，但张本人却在天津滞留，向黎元洪提出了实行责任内阁、解散国会等6项条件。黎元洪一一照办。14日，张勋偕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入京，“调解”时局。

但是，张勋进京，黎元洪就成为其囊中之物，存废由其自如。这样张勋与段祺瑞两派的矛盾就突出了。在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之后，前者的目标是复辟清室，后者的目标是恢复皖系统治。因此，6月初，段祺瑞策划“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时已与各省暗中议定：废除约法，迫使黎元洪退位，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此方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6月8日，张勋到津时，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电令驻京公使向张直接表明不支持复辟的态度。被认为是清朝遗老领袖的徐世昌，见此形势，也改变了原先复辟清室的立场。

在日本干涉和徐世昌劝说下，张勋只得暂缓复辟行动，改为扶持李经羲内阁，作为控制中央政权的一个工具。但是，日本及其支持下的段祺瑞、徐世昌则坚决执行使李内阁流产的方针，指使各省督军对李内阁取“不合作”态度。张勋周围的复辟派遗老万绳栻等人，为逼张复辟，也密电各省纷纷致电，反对李内阁。陈曾寿等以天津诸遗老名义，又写信催张行动。6月底，保皇党党魁康有为也进京来为复辟推波助澜。于是张勋终于走上复辟之道。

6月30日，张勋偕其同党潜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政变。7月1日凌晨张勋身穿朝服，率文武官员300余人，拥入宫内，向12岁的溥仪行三跪九叩礼，将其捧上皇帝宝座。接着，溥仪下了一连串“上谕”，宣布“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改元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任命各级伪官职，等等。张勋则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张勋复辟，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非常激愤，即邀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等共商救国大计，7月4日发表《讨逆宣言》，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6日，孙中山等人乘军舰南下，谋在广州组织武力讨张。北京、上海、两湖、两广以及复辟祸首张勋、刘廷琛、万绳栻等人的家乡江西各界人民，海外华侨，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复辟浪潮。

张勋复辟集团原以为北京复辟，北洋各省督军们会立即响应。其实不然，只有少数几人上折“谢恩”，大多数军阀在观望一阵之后，见复辟不得人心，都相继表示反对。黎元洪在7月1日严词拒绝在“奏请归还大政”奏折上签字，第2天特任冯国璋以副总统代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然后，他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寻求保护。

段祺瑞乘机策划重新登台。3日，他匆匆向全国发出反复辟通电，斥责“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师，至7月1日遂有推翻国体之

奇变”；表示自己“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随即赴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研究系政客梁启超、汤化龙，交通系政客叶恭绰和段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及徐世昌派的陆宗舆、张国淦、吴鼎昌等人，都参加了总司令部，分任各职。一切重要文电，均出自梁启超手笔，熊希龄则躲在幕后为段祺瑞四方活动。

同日，驻保定的第三师师长曹锟，在征得冯国璋的同意后，也参加了段祺瑞的讨逆军。4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等人8大罪状，宣布讨伐，并誓师出发，分东西两路同时进行，西路由曹锟任司令，沿京汉路北上；东路由段芝贵率领，沿京津路西进。战斗在5日打响，讨逆军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各省督军也纷纷通电讨逆。

张勋复辟集团见失去国内外一切支持，军事上又节节失利，开始瓦解。一些附张的军人和政客，有的倒戈，有的外逃。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得一面向伪清廷提出辞职，一面央请北京公使出面“调停”。讨逆军向张勋提出3个停战条件：取消复辟；保全清室优待条件；在京解除辫子军武装。但张勋还企图带兵退归徐州老窠，不肯解散辫军，谈判破裂。

12日拂晓，讨逆军分三路向北京城内辫军发起总攻，辫军抵抗失败。中午，张勋逃往荷兰使馆。

这场张勋复辟丑剧，才12天就结束了。这表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要求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已成为中国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三、护法运动

1917年7月5日，段祺瑞在讨逆军的胜利进军声中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翌日，冯国璋也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并下令将李经羲免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4日，段由津入京，组织起与研究系及冯国璋合作、而完全排斥国民党及黎元洪的新内阁。其中陆军、内务、财政总长，分别由段祺瑞（兼）、汤化龙、梁启超担任。

由于有了这样的变迁，尤其是不再存在国民党的干扰，对德宣战问题终于顺利解决，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国及其盟国奥地利宣战。然后派遣20万华工赴欧洲战地服务，帮助协约国。接着，国内政局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国会。民国以来，由于国民党占多数，国会屡屡与北洋政府的独裁统治作对，段祺瑞不想再恢复国会。梁启超研究系则为了继续投靠皖系，又感到在国会中本党议员未占多数，难以控制国会，也不愿见其复活。在护国战争中曾表示维护国会和约法的梁启超，又转向了，充分表现出政客投机的品性。但他们又觉得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没有国会掩饰而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也行不通。于是根据梁启超的提议，段祺瑞决定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然后据此新法组织排除异己的新国会，以操纵北京的政局，同时穷兵黩武，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政策。

孙中山一直注视着北方局势的发展。他看到黎元洪身为国家元首，在督军团祸乱中，屈服于督军压力，解散国会，“实同降伏”；而冯国璋身为副总统，“迫胁元首，申请解散国会，实属通同谋叛”；段祺瑞“以叛讨叛，以贼灭贼”，复出后又公然弃毁约法和国会，更是可恶。他看透了北洋军阀

摧残共和的本质，认为中华民国已名存实亡。而“民国不可一日无主”，于是，孙中山便着手发动护法运动。

1917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广州，争取了陆荣廷和唐继尧的合作，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海军总长程璧光响应，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于21日率舰队10艘自上海开往广东，通电护法。8月中旬，至广州的议员已达150余人，仍不足法定人数，即于25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主要任务是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军政府由国民党、海军及驻粤滇军组成。桂系消极抵制，使军政府一开始就隐藏着危机。

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的成立，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力量，他们纷纷起来响应。首先是护法前线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发表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联衔通电，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他们组成护法军湖南司令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接着，安徽、浙江、四川、陕西、湖北，以及山东、福建、河南等省的一些区县和驻军，相继通电声讨段祺瑞政府，宣布独立自主，成立护法军、靖国军、自主军等，先后加入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他们中，有的是革命党人举旗讨逆，有的是爱国将领反对段祺瑞武力兼并，有的则是北洋系军人反戈抗段，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都打起护法旗号，表示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与孙中山军政府结成反段统一战线。

对此，孙中山受到莫大鼓舞，立即制定了护法战争的军事计划，准备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

段祺瑞决心以北洋武力对付西南护法，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他制订了出兵湖南、直捣广东军政府的战略，8月6日，特派其心腹大将、北洋“四大金刚”之一、前陆军次长傅良佐代替谭延闿，任湖南督军，并调北洋第8师、第20师入湘征讨。9月29日，代总统冯国璋指责孙中山非法召开非常国会，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严缉交法庭依法讯办”。

陆荣廷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所以，湖南不仅是南北必争之地，也直接关系到桂系的利益，遂决定援湘抵抗。10月3日，他在南宁召开两广援湘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并出兵援湘，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军政府特派革命党人钮永建为总参谋长。同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进剿”“首逆”段祺瑞、“主谋”梁启超和汤化龙、“叛军之魁”倪嗣冲等。

至此，南北对抗的军事态势终于形成。其实，战争已在9月22日爆发。傅良佐对湘南自主十分恐慌，先令湘军第1师第1旅进攻湘南护国军于衡山。但是在28日，该旅官兵在前线相继起义，反戈护法。南军乘势前进，节节胜利。

护法军政府的成立和南军的胜利，促使北洋派内部直皖两系矛盾的激化。冯国璋早有当独裁总统的野心。为了搞掉政敌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段内阁采取又敷衍又对立的态度。护法战争开始后，他看到倒段去皖的时机已到，即指使前线直系将领反对武力统一政策，并拉拢南方陆荣廷、唐继尧等军阀政客停战议和，致使段祺瑞派往湖南的北洋军第8师师长王汝贤，第20师师长范国璋，突然于11月14日通电停战撤兵。同时，长江3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也主张停战议和，并阻止北军南下，形成直系与西南军阀联合反皖的局面。傅良佐因此被迫退

出长沙，南军进占。段祺瑞则于16、22日两次提出辞职，企图要挟冯国璋。

冯国璋却乘机于22日下令准段辞职，并解除其陆军总长的兼职，特任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并在内阁中除去5名研究系阁员：汤化龙、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

段祺瑞内阁第二次倒台，为冯国璋直系与南方的和议开辟了道路。但是，南方护法阵营也在发生分裂。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坚持护法的原则立场，反对在未达到护法目的情况下停战议和。他于11月18日发表声明，表示“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若无此条件，则应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

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和唐继尧为首的滇系进行护法战争则是出于维护他们的私利。尤其是陆荣廷，只为看守其老家两广的地盘，见目的已达到，即响应北方停战议和的号召，令前线按兵不动，并积极向北方求和，在12月9日抢先发表主和通电。唐继尧也与陆荣廷沆瀣一气，遥相呼应，在12月4日宣布已令川滇军实行停战，要求北京政府“严令川督切饬各队一律停战”。如此，湖南护法军失去了乘胜前进夺取岳阳、巩固长沙的时机，并使北军获得喘息、反攻的机会。

段祺瑞遭到严重挫折，但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与徐树铮等一起，组织力量反扑。他们又故伎重演，复活督军团，联合奉系张作霖，收买直系大将曹錕，奋力反击冯国璋。12月2日，他们在天津召开北方7省3区督军、都统和护军使会议；6日，北方10督又联名通电，要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迅速进行新国会选举，以便“合法倒冯”。北方主战派又占了上风。冯国璋被迫让步，于16日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这参战督办实际是第二内阁，不仅掌握军权，而且插手内政外交。同时，冯为笼络桂系，又在25日发表停战布告，责成南北各军各守原防，停止敌对行动。

正在这时，驻荆门（今江陵县）的湖北鄂军第1师和襄阳镇守师黎天才分别在12月1日和16日宣告自主，拥护军政府护法，武汉为之震动。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合作战斗。这吓坏了直系主和派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他转向主战。皖系主战派乘机派吴光新、张学颜部进攻荆、襄，并很快攻克，战争再起。南军则在1918年1月27日攻占岳阳，以为报复。

南军夺取岳阳，武汉人心浮动。皖系主战派纷纷攻击冯国璋、李纯等直系主和派“优柔适以贾祸，姑息更足养奸”。直系主和派进一步瓦解，李纯见不能见信于西南，又遭主战派无端攻击，在1月11日电请辞职。冯国璋在压力下，再次让步，在30日向西南下讨伐令。于是，从2月中旬开始，直皖两派各路北军——曹錕、吴佩孚、张敬尧、张怀芝、张宗昌、张之杰、冯玉祥，以及海军杜锡珪，从水、陆两路，联合向湘鄂、湘赣边界挺进。充分显示出直皖两系在保卫北洋派利益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在北军气势汹汹的攻势面前，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3月26日，吴佩孚部队开进长沙，接着又占领衡阳。

与此同时，皖系又决定引奉军入关，以迫使冯国璋就范。2月25日，徐

《大元帅对于时局之通电》，《军政府公报》第25号，1917年11月19日。

树铮赴奉天晤张作霖，达成奉皖联合，奉军入关作战，声援段祺瑞。徐树铮还担任奉军副总司令。然后，奉军直达京津，冯国璋大为恐慌。岳阳被北军攻占后，皖系主战派更为嚣张。3月19日，以曹錕为首，包括转化过来的长江3督在内的15省3特区督军联名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于是冯国璋又被迫让步，请段出山。29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段祺瑞这次组阁抛弃了旧友研究系，结交了新欢交通系。

但是，在冯国璋失势时，直系将领曹錕、吴佩孚迅速崛起，与皖系发生新的对抗。他俩这次南下，攻克岳阳，收回长沙，占领衡阳，战功最大；而西路张敬尧、张宗昌部在湘军顽强抵抗面前，却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然而段祺瑞上台后竟将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使吴大为不满。这时，曹錕也屡得冯国璋密电诘责，意识到继续主战，徒为皖系扩大地盘，乃谋求与南方讲和，直皖矛盾再度激化。

5月29日，曹錕未经段政府同意，即擅自离开汉口，回师天津守住直隶地盘。吴佩孚则更是大胆，6月15日，与南军签订停战协定；8月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复电赞成和平。段祺瑞在直、桂军阀联合反对下，8月下旬被迫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直桂则形成新的联盟，加剧了直皖矛盾。

与此同时，南方护法阵营也发生了变故。陆荣廷视两广为私产，不满孙中山在广州的活动和发展，对护法军政府取拆台政策。为迫使孙中山离职，他指使其亲信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拘杀孙中山大元帅府卫队官兵数十人。而唐继尧不仅阻止驻粤滇军支持护法军政府，还以“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名，组织“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提出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公开揭露滇桂军阀的破坏活动，命令海军炮轰莫荣新军署，以示警告。桂系军阀于2月26日暗杀了拥护孙中山护法北伐的海军总长程璧光。4月份，在政学会的阴谋策划下，国会非常会议终于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首领制为总裁会议制。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懌、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政务总裁，以岑为主席总裁。从此，军政府成为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控制的工具，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愤而辞职，离开广州。护法运动失败。

护法运动表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反对专制，反对复辟的顽强的革命精神。虽然“护法”的口号没有涉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但是运动的实际斗争，对冲击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粉碎复辟帝制阴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一切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支持。

然而，护法斗争失败提供的经验教训也许比它的进步作用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胜利。辛亥革命后，随着北洋军阀的暴力压迫和官禄利诱，革命党人不断分化。许多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鱼目混珠”，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并造成宗派林立，成份“过于复杂”。在这次护法运动中，许多党员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支持孙中山，反而勾结军阀反对孙中山。像这样

一个组织不纯、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何以领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其次，缺乏可靠的革命武装，难以推倒由帝国主义作靠山、握有强大反革命武装的军阀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始终未掌握可靠的革命武装，只知争取、利用旧军阀。因此，在关键时刻，不是被瓦解、打败，就是反戈叛变，难成大业。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条，从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到这次护法运动最终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 20 多年来奋斗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所谓“国会”、“约法”等这些被资产阶级视为神圣的东西，已经被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捍卫它的努力也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没有成功的希望。

凡此种种，时代呼唤着中国人民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和新的革命领导阶级及其政党的诞生。

四、皖系军阀的内政外交

段祺瑞在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紧对南方实力派用兵的同时，也加快了筹备新国会，彻底排斥国民党、研究系、直系等异己力量，实行皖系独裁统治的步伐。

1917 年 11 月 10 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段的亲信王揖唐、王印川窃取了议长和秘书长之职，操纵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的修改工作。1918 年 2 月 17 日，这些新法公布。段祺瑞为了切实操纵国会选举，争取国会中的多数，夺取中央全权，就布置徐树铮、王揖唐、王印川等部分他最亲近的官僚政客，在 3 月 8 日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因他们经常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宅聚会而得名），来包办选举事宜。

3 月 23 日，段祺瑞重新上台，立即策划新国会选举。国会在革命党人眼中，是民主共和制度的象征，看得很重，但在军阀眼中只是个工具。可以操纵时，能为其卖国、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就加以利用；不能操纵时，就成为障碍物，一脚踢开。袁世凯、黎元洪、张勋、段祺瑞等都如此。现在，段还需要国会。4 月 26 日，曹錕、张怀芝、倪嗣冲联名通电，请迅速召开新国会。

这时，皖系开始踢开梁启超研究系，而与交通系合作。一是因为皖系与研究系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会议员选举法时，曾发生过矛盾。研究系自恃在各省省议会尚有基础，主张参议员应照旧选举法规定，由省议会选出。而安福系因把持着地方团体，主张改由各地方团体选出。两派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为此，安福系极力排斥研究系；二是因为安福俱乐部 3 月 8 日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求于“财神”梁士诒。梁曾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此时正想借段重振交通系势力，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 300 万元巨款的援助。另外，这时皖系正与奉系勾结，徐树铮（奉军副总司令）先后挪用奉军军饷 200 万元，交王揖唐使用。

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就演出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的选举丑剧。

选举从地方到中央，逐级进行。8 月 22 日最后选出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副议长让给奉籍议员刘恩格，以拉拢张作霖；参议院的议长副议长都让给了

交通系，由梁士诒、朱启钤分任，这一是为了笼络敷衍交通系，二是不使梁将来与皖系竞争国务总理。就这样，由安福系一手策划包办并占绝对多数议席的新国会产生了。研究系伙同皖系军阀把国会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据，研究系自身也被排挤掉，梁启超研究系从此下野。这是历史的嘲弄。研究系的前身进步党曾投靠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支持来制服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势力，但不久即被袁世凯抛弃。现在研究系想投靠段祺瑞来扩充党势，排斥异己，结果又落得同样的下场。说明官僚和政客在北洋时期，只能充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帮凶和走卒。从此，国会成为皖系和安福系一党一系为非作歹的工具。

新国会产生后，就着手选举总统。皖系操纵国会的目的就是要选举自己的领袖或是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来当总统，以达到合法倒冯，制服直系，独裁全国的目的。

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有3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谁来当总统，直皖之间又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冯国璋是现任代理大总统，继任总统符合法理。但是，冯在北方势力不大，国会中的力量更弱，当总统事事受皖系掣肘，因此，他多次表示：“决不再作冯妇”；“余已决不愿下届总统之当选。”但他也不愿把总统让位于皖系，提出了与段祺瑞一起下野的先决条件。

段祺瑞想当总统，但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一方面因其推行武力政策，被看成祸国殃民的魁首，很不得人心，不仅南方誓死反对他，直系不允许，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和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也都不同意段当总统。既然出任总统为情势所不容，段祺瑞只好知难而退求其次，即选一个接近皖系、又能为皖系所用的人当总统，以稳定皖系已经取得中央实权的政局。为此，他也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冯国璋必须从总统位置上撤下来。

直皖斗争的结果，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得不同时退出，而剩下的总统候选人徐世昌，恰合当时各派所能接受的条件。徐是北洋派元老，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其为人八面玲珑，笼络各方：在南北对立中，他以“调和者”自居，甚至对西南表示和平妥协的愿望；在直皖斗争中，他也保持中立，既不即不离，又两面讨好。因此，1918年7月底，北洋各督军在天津开会时，已决定推举徐世昌为总统。

实际上，在这种形势下选举徐世昌当总统对巩固皖系的既得权力有利，因此，8月间，当新国会积极筹备总统选举时，吴佩孚等前敌将领接连发出通电要求罢战议和，也表示强烈反对新国会选举总统。在他的推动下，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亦实行新的结合，发出先决时局、后选总统的通电。而吴佩孚的举动，又暗中得到曹錕和冯国璋的默许和支持，实际上是直系向皖系发动的一次新挑战，意图是要推倒段内阁，挽救冯国璋的失败。

这样，又出现了先决时局、后选总统；先选总统、后决时局两种主张。斗争的实质是：皖系以国会为武器，以速选总统倒冯驱直；直系则以前敌军官作先锋，以缓举总统谋和倒段。结果，段派不顾一切，在9月4日正式举行总统选举。由于国会已成安福系的工具，徐世昌顺利地当选了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

至此，皖系军阀在内政上，一手以武力，一手用国会，实行独裁专制统

治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在外交上，也推行彻头彻尾的卖国政策。

皖系军阀如此疯狂地镇压革命，排斥异己，肆无忌惮地破坏民主共和，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

袁世凯垮台后，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转向在华组成一个稳定的亲日政府这个目标上，而且把这个目标定在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身上。1916年10月，日本新的寺内正毅内阁成立。他们修正了前大隈内阁采取的那种赤裸裸的军事威胁的作法，采纳寺内亲信西原龟三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和大藏大臣胜田主计的《对华借款方针》的建议，在“日华亲善”的幌子下，推行更加隐蔽的侵华政策，以各种名目给予段祺瑞政府以大量借款，支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以达到假皖系军阀之手，向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扩张其侵略势力，并迫使欧美列强承认日本“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的目的。

在这些对华借款中，最著名的是“西原借款”。据日本大藏省档案资料记载：1916年10月至1918年9月寺内内阁期间，日本与中国新签订的借款总额达38645万日元，与两年前对华借款总额相比，增加到3倍，其中对中央政府的借款占总额的70%以上，而由西原直接经手或参与交涉签订的有8项，共14500万日元。

西原所以在参与制订并执行寺内内阁对华政策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与段祺瑞皖系集团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先后6次来华，代表寺内进行活动，与段祺瑞、徐树铮、靳云鹏等军政要人接触，并干涉和操纵中国内政，成为日皖间的直接牵线人，“西原借款”就是日皖勾结的产物。

西原的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一方面加快了段祺瑞投靠日本的步伐，使其成为完全亲日的军阀集团；另一方面，在当时激烈的府院之争、南北战争和直皖角逐中，几次挽救段祺瑞，使皖系反败为胜。尤其在1917年11月，湖南战争失败，直系将领通电主和，冯国璋总统下令罢撤段祺瑞本兼各职的最困难时刻，寺内竟公开派要人及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表示：“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即徐世昌）、合肥（即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而且，除了上述借款之外，日本还应段祺瑞的要求，给予大量军械援助。正由于此，段才得以在1918年3月份复出，并顺利推出徐世昌为总统。

但是，日本的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以段祺瑞卖国为前提。寺内内阁一方面通过“西原借款”等援段办法，逐步将段祺瑞皖系军阀变为它侵华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具体推行所谓中日“经济合作”，在华攫取大量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1918年5月22日，寺内亲笔拟定题为《借款问题及其它》的文件，“其中列证了对华交涉的各项经济案件，以及解决山东问题的重点”，具体有以黑龙江、吉林两省金矿及森林为担保的借款，吉会铁路借款，以烟酒专卖利润为担保的借款，设置国营炼铁厂的借款，延长山东有关铁路线及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等。这些项目，明显地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铁路、棉花、羊毛及各种矿产资源，并企图控制中国铁路投资，以排斥英、美利益，夺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皖系军阀政府对日本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一一答应，并通过曹汝霖之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因此，段祺瑞的卖国行为，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连寺内正毅在下台时也自夸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

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袁世凯曾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实行卖国而声名狼藉，加速了他的灭亡。现在段祺瑞也走上此路。其它北洋军阀及地方军阀也都投靠某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干尽卖国勾当。中国古代军阀除个别因战败对外国称臣纳贡之外，一般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比周围国家发达，很少依附于外国。近代世界，由于帝国主义比中国强大得多，再加上人民的反抗也加强了，所以各个军阀集团都依附于帝国主义来争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权。这就成为近代军阀的一个根本特点。为此，他们必然卖国，用中国领土和主权，同帝国主义做交易。而历来卖国最失人心，必然走向灭亡。这又成为任何一个军阀不能长久统治的根本原因之一。

日本竭力扶持段祺瑞皖系军阀掌握中央大权，掠夺中国经济，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恐慌。它一方面先后支持黎元洪和冯国璋直系军阀以为对抗，一方面与日本直接争夺侵华利益。由于美国参战最迟，它成了在远东有力量和日本对抗的唯一大国。1914—1918年，欧洲列强各国对华输出普遍下降，而日美两国却迅速上升。但是，在政治上，美国却难以与日本抗争，从“二十一条”到“府院之争”，美国遭到一系列失败。尤其到1917年上半年，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日本支持的段祺瑞皖系军阀，取得胜利，将亲美势力驱逐出北京政府。同时，1917年4月，美国宣布对德参战卷入欧洲大战，一时无力在华与日本继续对抗，因此不得不谋求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的办法，在11月2日，双方就有关中国问题签署了《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即《蓝辛——石井协定》。

协定宣称：“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美国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这是两个帝国主义，背着中国，以中国的领土主权进行交易的罪恶文件，因此协定公布后，遭到中国舆论的同声谴责。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因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终于为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承认而欢呼胜利，而且为它扩大对华侵略及皖系政府进一步卖国，又制造了一个“依据”。终于在1918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军事协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实际上，日本是企图借“防敌”（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名，乘历来在远东与日本对抗的沙俄势力瓦解之机，夺取我国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根据日本的要求，双方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从而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多行不义必自毙。段祺瑞政府自恃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撑腰，内有皖系军阀的支持，疯狂推行卖国独裁政策，自以为如此可以建立起皖系军阀的长久统治，实际上更加不得人心，也加剧了它与直系的矛盾，加速了它的灭亡。

五、南北议和之争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第116页，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6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便着手推动南北议和的工作，各种政治力量也围绕这个中心展开角逐。首先是副总统选举问题。

总统选举之后，国会即筹备副总统选举。在安福系一手操纵和包办之下，总统选举既然很顺利，副总统按理也不难，但由于存在着南与北、直与皖的和战之争，终于导致了副总统选举的流产。

当时副总统的候补者有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也想当副总统。但是，冯、段对有名无权的副总统不感兴趣，而曹锟在前一阶段促使主战派胜利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操纵国会选举的安福系头目徐树铮，为了贯彻皖系主战派的主张，便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继续对南方作战，并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为抚慰。

然而，梁士诒和以他为首的旧交通系，反对这种安排。梁一是痛恨徐树铮的专横跋扈，已与安福俱乐部决裂；二是因为反对段派的主战政策，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而主张缓选，或把此席让于广州军政府的岑春煊，以谋求同南方的妥协和平。梁启超研究系的国会议员，因被皖系抛弃，也故意唱反调，反对选曹。直系长江3督基于想同西南和平妥协，以图保存和发展自己，也主张缓选，反对选曹。另外，还有一部分主战的安福派议员，担心曹锟心口不一，也表示“决不举彼”。

由于许多议员抵制，所以，10月9、16日两次举行副总统选举，皆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后来也终未选出。

副总统选举的流产，标志着当时时局的一个基本特点：主和派和主战派、南与北、直系与皖系，都势均力敌，不战不和，出路只有一条——南北议和；但也正因为如此，议和也必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一般斗争，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只有在力量对比失去平衡时，才会有胜负。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条件已不允许中国的南北战争继续下去。欧洲人民从长达4年的战争苦难中解脱出来，世界一派和平景象。参战获胜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着手准备召开世界和平会议，处理战争善后问题，同时开始把注意力从保卫自己转向对外扩张，于是又重新注视中国的侵略利益，与日本发生新的争夺。

美、英、法不赞同日本单方面支持皖系军阀造成日本独霸中国和分裂中国的局面，追求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以便他们更好地控制和掠夺中国。因此，欧战结束后，美、英、法等国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加影响，促使日本同他们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而日本，由于这年9月21日国内发生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倒台，新成立的原敬内阁也想改变一下日本的形象，抨击前内阁对华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乱，招致人民怨恨。在国内外压力下，面对卷土重来的西方列强，日本不得不改变侵华手法，采取了与美、英等国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11月，新任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公开表示：“日本当与列国行动一致”，“希望中国统一”。

于是，美、英、德、日、意5国公使经过几度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于12月2日一同晋谒徐世昌，当面呈递劝告觉书，表示：“欧战已终，世界各国希望和平甚切，对于贵国亦盼能早日统一全局，以协助世界人民和平思

想之新建设。”

与此同时，国内政局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反对南北战争，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统一的呼声空前高涨。直系主和运动，得到舆论界的同情和支持。再加上北军主力吴佩孚部从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湖南战场退出战争，日本又改变援段政策，使段祺瑞在财政上发生极大困难，因此，战争在实际上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全国规模的强大的和平运动。

10月23日，首先由熊希龄、蔡元培、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然后，议长梁士诒也推动旧交通系成员以个人资格加入该会，国民党、研究系、直系及无党派名流，亦纷纷效法，使和平期成会成为一个有广泛代表性和重大影响力的和平运动领导机构。接着，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武汉、广州、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也都成立和平期成会，并于1919年3月2日成立了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选举熊希龄为会长，梁士诒、张一麐为副会长。它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两方，推动和议的召开。此外，北京还成立了以徐世昌和钱能训为后台的“和平统一会”、以满蒙王公、回藏教首和汉族要人为成员的“五族和平合进会”等。

这些和平组织，都广泛开展活动，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两方，推动和议的召开，使少数皖系主战派陷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就是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发表就职宣言，表示：“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当段祺瑞被迫辞职时，他委任钱能训组阁，从而为南北议和铺平了道路。

接着，徐世昌一面多方与段派疏通，争取他们同意议和；另一面派特使赵炳麟（和平统一会主席）到广西，与岑春煊、陆荣廷接洽，谋求和平。10月30日，岑春煊等致电北京政府，主张南北两方各派同数代表，开对等会议。孙中山则表示强硬态度：“国民所蕲望之平和，为依法之平和，为得法律保障之平和。”要求实行法治，尊重国会，取消安福国会。段祺瑞假意表示：“和战均总统之命是听”，但不同意牺牲新国会和召开南北对等会议。与此同时，安福系又进行倒阁运动，张作霖、倪嗣冲和曹錕要求段祺瑞再次出来组阁，一时又出现主战派重新抬头，段内阁即将复活的迹象。

正在这时，12月2日，各国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和南方速谋和平统一的觉书。徐世昌即于次日召集段、曹、张、倪等各督军及全体国务员会议，以洋人之威，对段等主战派施加压力。段等被迫接受和平方针。时局又有了转机。1919年2月20日，以朱启钤为总代表的包括北方安福系、旧交通系、直系、奉系、研究系的北方代表团，和以唐绍仪为总代表，包括国民党、政学会和桂、滇、川、黔、陕、湘、闽以及海军各方代表的南方代表团，终于在上海开始和平会议。但是，主要由于段系主战派的破坏和南北军阀的分赃斗争，和会进行得十分困难和曲折。

早在1918年10月23、26日，南北政府为给和会创造条件，就下令停战，并于11月16日实施。但段祺瑞却指使其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公开对抗徐世昌的停战令，大举进攻护法军。所以，和会一开，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停战问题，继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但段祺瑞爱兵如命，他可以几次辞内阁总理，却抓住军权不放，不愿卸去参战督

《晨报》，1918年12月3日。

《孙中山复蔡元培信》（1918年12月4日）。

办、边防督办的职务，因此竭力反对取消参战军；又借口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坚主维持参战借款，所以，虽然徐世昌和钱能训有和议诚意，却难以满足南方要求。于是，1919年3月2日，和议中断。

和会中断，西方列强再次出面干预。3月6日，美、英、法、意4国公使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并压迫日本停付参战借款，推动中日政府同时于3月14日公布中日军事协定全文。直系长江3督和吴佩孚也施加压力，4月1日，陕西停战实现。4月7日，和会正式恢复。

和会重开以后，唐绍仪先后提出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等19项议题，而争论焦点是国会问题：南方主张恢复民国六年被解散的国会，定宪法，选总统；北方的主和派，包括直系、旧交通系、研究系，及徐世昌、钱能训为后台的己未俱乐部和未赴广州的旧国会议员，主张民国六年的国会可以在南京开会，完成制宪，但必须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新旧两国会同时解散，再根据宪法选举新国会。但段祺瑞安福系议员视安福国会为安身立命之所，又是维持皖系军阀统治的重要工具，坚决反对解散之说。4月12日，他们在段寓所开会，决定为维持新国会而拼力活动，除了又启用督军团施加压力外，历访各当道要人，还求救于日本帝国主义出来干涉，为此竟密电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在所有与日本争持的密件上即行让步，以争取日本的支持。

在安福系的猛烈攻势和强大压力下，徐世昌和钱能训开始后退，他们也顾忌解散新国会将使他们的总统和内阁“陷于违法之地位”。因此在4月18日众议院开的质询会上，钱能训表示维持新国会，不赞成恢复旧国会，于是，和会又陷于僵局。

5月初，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国人猛烈抨击段祺瑞卖国罪行。唐绍仪抓住有利时机，在5月13日，促开和会第8次正式会议，并在会上提出恢复旧国会等8项强硬条件。结果，因北方拒绝接受，南北方代表向各自的政府提出总辞职。15日，钱能训电朱启钤，准北方代表辞职，即日返京，和议终于破裂。

1920年6月，曾重开和会，但不久因北方发生直皖战争，南方又发生粤桂战争，真所谓“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又复不合”，南北议和无形消失了。

在中国，无论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还是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最终都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战争决定胜负。在双方力量对比均衡的情况下，和平谈判往往毫无结果，和平局势也是暂时的。只有在胜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和平谈判才能收稳定胜败局势之效。

六、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7、8年中，即1914—1922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主要是英、法、德忙于欧洲战争，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无论中国和国际上，都出现了空隙，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大战爆发后，双方动员了7500万人上战场。千百万工农群众脱离生产，致使大批工厂倒闭，大片土地荒芜；再加上许多工厂转为军工生产，日用品产量骤减，还有战争的摧残，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特别是民用工业和农业受

到严重破坏，生产力大大削弱。如英国侵略中国的重要行业——棉纺织业，因纺织工人被征从戎而停业者，极为可观。而且，在战争中这些国家大伤元气，各交战国经济损失总计达 2700 亿美元，许多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坏。尤其是主要交战国英国、法国和战败的德国（光是德国对协约国的赔款，42 年内本利计 2260 亿金马克，平均每年 54 亿），战后都成了美国的债务国，一时忙于恢复国内的经济，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这种情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外国来华船只和商品逐年减少：1913 年各国来华船只为 24491838 吨，1916 年就减为 18581333 吨，1918 年更减为 14357648 吨。又据海关统计，1914—1918 年，各国输华商品额，每年都低于战前 1913 年的 586290 千两（海关两）的数字，其中 1915 年减为 477064 千两，比 1913 年减少了 20.3%。

中国出口的增长：战争使有关国家疏于民用工业生产，忙于军火生产的结果，使过去依赖于帝国主义输入某些工业品的国家，出现了商品短缺，不少订单飞向中国；而且有些欧洲工业国家也由于战争的需要，反而从中国输入某些商品，因此给中国商品开辟了更多的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中国的面粉当时就曾远销欧洲和南洋群岛等地区。战前入超的面粉，1915—1921 年，却平均每年出超百余万担。总的出口情况是：1914—1918 年，出口额逐年有所增加，比 1913 年增长 14.8—20.5%。历年入超的严重情况，获得很大改善，由 1914 年的 2.1 亿海关两，减为 1919 年的 0.16 亿海关两。这是中国自 1878 年以来对外贸易入超额的最低点。

工业利润显著提高：由于国内外市场的拓展，中国民族工业企业利润迅猛增长。例如，上海申新一厂在 1915 年的实际盈利为 2 万元，1917 年就达到 40 万元，1920 年又增加到 110 万元。5 年之间增加 55 倍。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工商业者的投资，也增加了华侨商人回国投资的兴趣，并使一些军阀官僚以其搜括所得转入工业生产，从而大大地增强工业资本的力量。

这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民初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发展实业的措施和政策。那时“投资热”中创设的各项实业，遇到欧战爆发后的发展条件，因而发展速度更快。工业生产，从投资到获利，需要有个周期。若无民初良好的开端，战时的发展必不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这与战争后期投资，战后受到外患东来而萧条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及北洋政府卖国行径所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战争爆发后乘虚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例如，日本早期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商品棉纱，从 1904 年起就向中国倾销，与英纱一起，严重打击中国棉纺业。但是从 1915 年起，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开展五四运动等，大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再加上中国政府受此压力而在 1917 年重提战前被日本多次反对而未实行的提高税率 5%（从 1919 年 8 月开始实行），使日本在中国廉价抛售棉纱的利益减少了一半，终于使日本对中国的棉纱输出从 1916 年开始逐年大幅度减少，而中国棉纱产量，则乘机（包括英国因欧战而退出中国棉纱市场）大幅度上升。据日本学者统计：1915 年，日本向中国棉纱输出量为 1179360 担，1916 年 1068326 担，1917 年 955798 担，1918 年 360963 担，到 1924 年只剩下 28510 担了。

[日]井村薰雄：《纺织的经营与制品》，第 44—54 页，1926 年版。

而同期中国的棉纱产量却从 1915 年的 1600 千担，上升到 1924 年的 8300 千担。

自然，出于帝国主义掠夺的本性，日本并不因此退出中国纺织市场，而是转而在中国大规模投资设厂，并且经营获利更多的棉布，因此从 1918 年起，日本在华纺织厂的织机数扶摇直上，从 1911—1917 年的每年 886 台，上升到 1918 年 1636 台，1919 年 1986 台，1921 年 2986 台；1924 年 5925 台，到 1936 年抗战前夕，达到 28915 台，是第一次大战结束时的 32 倍。与中国纺织厂对比，1917 年，中国资本的织机数为 4134 台，占中国织机总数的 59%，日本在这年只占 23.2%；1936 年，中国资本的织机数为 258503 台，比重下降到 43.6%，日本上升到 49.5%。因此，也反衬出中国纺织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发展，获得了极好的机会。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基本概况如下：

首先，厂矿创办数及投资额迅速增加。大战前发展最快的 1904—1909 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有 50 家，而 1914—1919 年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就有 90 家，等于战前历年开设厂矿的总数。又据北洋政府农商部不完整的统计，全国较大的厂矿公司，1914 年为 146 家，资本总额 4100 万元。1922 年，厂矿公司增加到 379 家，资本总额 16000 万元。公司增加 1.5 倍，资本增长近 3 倍。

同时，民族工业的机械化程度也有较大提高。1913 年，全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为 4.3 万匹马力，1918 年增到 8.2 万匹马力，增加约一倍。同期，全部机械动力也增加一倍多。机器入口额从 1913 年 800 万两，增到 1921 年的 5700 万两。

其次，就工业部门看，轻重工业都有所发展，特别是轻工业发展较大。轻工业中，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又更快。1919 年，这两个部门的资本约占全部工业的 53%，集中全国工人的一半以上。

棉纺织业。大战开始后，洋纱进口量逐年减少。1913 年进口洋纱 263 万担，洋布 10 亿万码。1921 年分别减为 110 万担，6 亿万码。由此，引起国内市场价格上涨，刺激纺织业迅猛发展。1913 年，中国资本的棉纺织厂，全国约有 40 余家，拥有纱锭近 50 万枚，布机 2000 台。1914—1922 年，新增棉纺织厂 54 家，全国纱锭增加到 150 万枚，布机 6700 余台。总观 1914—1922 年 9 年中，民族资本棉纺织厂的增加，远远超过了 1913 年前 20 年建厂的总数，在旧中国工业史上只有这一次。

面粉业。1914 年中国的面粉对外贸易额入超还有 700 万两，1915 年就开始转为出超。1920 年出超额竟达 1700 余万两，可见这几年中国民族资本面粉业发展速度之大。1895—1913 年的 19 年中，全国开办面粉厂共计 53 家，而 1914—1922 年 9 年中，就迅速增加到 108 家，为前 20 年的两倍。

此外，其它轻工业，如机器缫丝业、火柴、造纸、榨油、制糖等，都有较大增长。

重工业由于战时煤、铁需要量猛增，所以采煤、采矿和冶炼业增长较快。

[日]井村薰雄：《纺织的经营与制品》，第 44—54 页，1926 年版。

[日]阿部洋编：《日中关系与文化摩擦》，第 255 页，日本岩南堂书店 1982 年版。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188 页。

陈真：《中国近代史工业史料》第 4 辑，第 112 页。

全国机器开采和土法开采的煤产量，1913年为1200多万吨，其中中国资本的只有580万吨；1920年增至2100多万吨，中国资本的也上升到1080万吨。铁的产量，1913年为46万吨铁矿和9.7万吨生铁，1920年分别上升到133万吨和26万吨。但属于民族资本的冶铁业绝大部分还是土法生产，产量也一直保持在50万吨铁矿，17万吨生铁的水平上，没有增加。

民族资本的机器制造业，也有一些发展。1914—1922年，上海5000元以上资本的机器厂有14家，但一般都设备简陋，只能修理机器，装配零件。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普遍出现工场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的现象。在纺织业、面粉业、榨油业、制盐业以至矿冶业中，1914年后，都有大批的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厂。这对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成熟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在欧战期间及其后4年中国民族工业有如以上的发展，但其原有的弱点，如轻重工业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沿海特别是津、沪地区发达，内地落后），依赖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总体实力上弱小而未能操纵国计民生等，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甚至更严重了。这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想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种种束缚，以求自由的发展，又有动摇性和软弱性。

这就是为什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挽救中华民国而进行反袁斗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不断失败，又屡败屡起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

第三章 决定命运的抉择

一、新思想启蒙运动

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封建统治，封建主义思想造成中国人民严重的愚昧和落后。这种腐朽的意识形态，极力维护正在分崩离析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小农经济基础，阻碍政治变革和社会的进步。

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在冲击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思想。但这种冲击比起软弱的政治斗争还要无力，并未动摇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而且随着辛亥革命成果的丧失，袁世凯复辟帝制，民国、共和、国会、约法被践踏，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尊孔复古逆流也滚滚而来。

充当这次尊孔复古逆流急先锋的是戊戌政变时鼓吹托古改制、以孔非孔的英雄而在辛亥革命后急剧倒退的康有为。1912年10月，在他的推动下，陈焕章等人出面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推康有为任会长。袁记教育部立即予以承认立案。陈焕章被袁世凯特聘为总统顾问。孔教会在各省设立了支会，出版会刊《孔教会杂志》、《经世报》。康有为也编辑出版了《不忍》杂志，卖力鼓吹封建复古思想，鼓吹君主立宪。此外，各地还先后相继成立了不少与孔教会相类似的团体，与孔教会相呼应。

这股封建复古逆流肆意攻击共和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康有为发表《中华救国论》、《蓄乱》等文章，把辛亥革命后一切罪恶都加在共和头上，咒骂民主共和国“为暴民无政府之政，可以亡国”；“夫名为共和，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博爱，而惨杀日加酷烈；号为自由，而困苦日不聊生；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辛亥革命后，广东、江苏、湖南、四川等不少地方的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停止了祀孔典礼。康有为对此极为不满，说“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陵夷，法守隳斲，礼俗变易”，“……乃至天坛不祀，上帝不享，则神怒民怨，天人交恫”。另一复古狂劳乃宣，抛出《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文，拼命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夫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也。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崇之则治，蔑之则乱。”

于是，他们便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把已经在中国统治达几千年的儒家政治思想，进一步上升为“国教”，企图以此挽救世风浇漓、维系道德人心。他们还祭起“敬天”的法宝，说孔子的“圣言圣行”，是如同耶稣“福音”一样，体现了“天意”，云云。影响开去，社会上迷信盛行，鬼神当道，祸害众生。上海甚至公开出现“灵学会”。

康有为孔教会等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袁世凯随即粉墨登场推行一系列复古复辟措施。他虽因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不敢定孔教为“国教”，对尊孔读经却极力提倡。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祭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参加，表示鼓励。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正式颁发《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3天后，即28日，袁世凯即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在北京孔庙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礼。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祀孔活动。

在此前后，袁政府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提倡忠孝节义；发布了《祭天仪礼》和《郊天乐章》，恢复祭天。1914年12月20日，袁世

凯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23日，他亲自到天坛祭天，企图借天来震慑百姓，用神权来对抗民权，把他的独裁统治说是天授神权，不得违抗，并为他自称天子、问鼎皇位制造气氛。

这股尊孔复辟逆流正在横行的时候，昔日的资产阶级革命队伍正在迅速分化瓦解：有的被杀、有的变节、有的颓唐、有的消极，只有少数人起来还击这股复辟逆流，但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中反袁“护国”及以后的“护法”斗争，思想文化领域少有作为。而“护国”、“护法”的结果，也只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茫茫中国，黑暗如磐，光明在哪里？

长江后浪推前浪，正当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革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一个以另一批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这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其影响，具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又适逢科举废止，基本上是在新学与西学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少人毕业于新式学堂或在国外留过学，对于日本及西方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西方文明，有比较深层的认识。因此，他们相当看重精神力量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所以，当他们的父兄一辈革命家对辛亥以来共和制度的蜕变进行反思，并为巩固假共和制度，就共和还是立宪、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进行热烈而无为的争论时，他们却独辟蹊径，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和思考。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所以不能成功，共和制度所以没有巩固，是因为国民没有觉悟起来，如陈独秀所说：“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

而国民不觉悟，是由于国民愚昧落后；国民愚昧落后，又是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思想毒害的结果。于是，他们决定从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教育，改造国民性，铸造“新青年”和“新社会”入手，开辟一条新的救国之路。一场新思想启蒙运动就发轫了。

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意义上看，这次新文化运动是“西学东渐”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三步深入。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首先发现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因而提出要“师夷长技”，学习制船造炮之术。于是掀起“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对西方认识的加深，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清朝政府的严重腐败与卖国，有识之士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但是，民国成立后，共和制度名存实亡的残酷现实，又使人们认识到仅有制度的模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一场吸取西方文明，并把它当作武器，批判中国传统儒学，改造中国人“国民性”，重建民族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

1915年9月，曾经积极参加“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陈独秀，从革命失败后一度彷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从此，他团结先后加入进来的易白沙、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鲁迅等人，在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组成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一支启蒙运动的火炬。

《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把改造国民性和摆脱封

建精神枷锁及传统小农经济观念的束缚作为启蒙运动的根本任务。在陈独秀等人看来，民主与科学是欧美进化的根本原因，中国要进化，要富强，也不能例外。他把使人摆脱愚昧的西方文明归结为“三事”：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输入这三大成果，才能“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不破不立，新文化运动闯将们认为，要输入“西方文明”，必须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是造成中国国民性愚昧落后的最大祸害。它损害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窒息个人自由意志之发展。因此，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儒家纲常作为这场启蒙运动攻击的重点。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吴虞等，都发表檄文，进行声讨，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遵此三纲，“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人格者”；由此而生之道德：忠、孝、节，皆为“奴隶道德”。他们驳斥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反复论证旧礼教旧道德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之道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等等；号召青年、妇女打碎奴隶道德，树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实现个性自由，“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鲁迅还以小说（如《狂人日记》）为武器，无情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他发出誓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留在世上”，呼吁“救救孩子”，要求人们起来为“真的人”的生活而斗争。陈独秀提出这种“新青年”的标准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欲达此标准，“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就是民主，就是求解放，人人平等、自由。“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

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动者们，起先想不问政治，专做文化运动、思想革命。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的反抗怒潮席卷全国，谁也回避不了，此其一。其二，引进西方民主时，民主思想与民主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其三，在改造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时，清除人民中“朕即国家”及国家是少数统治者私产的封建主义国家观的影响，是重要任务。其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在探索辛亥革命失败、共和制度蜕变过程中发现，辛亥以后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制订了约法，召开了国会，但只是改变了政体，国体未变。辛亥革命只是种族革命，“驱除鞑虏”，推倒了一个皇帝，政权依然掌握在欺压百姓的少数军人、官僚及依附于他们的政客手中。多数国民还是没有地位，出现了徒有共和之名，没有共和之实的假共和局面。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成员，还是资产阶级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法兰西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但是，他们要真共和，不要假共和。于是，他们抓住共和制度的根本——还政于民，进行奋斗，而不是追求形式上恢复或巩固约法与国会。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远比满足于“护国”、“护法”的父兄辈资产阶级革命家高明得多。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第1卷第1号。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第1卷第5号。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

就这样，宣传西方民主政治和近世国家观，批判君主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国家观，反击帝制复辟逆流，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

陈独秀把欧洲近世国家观归结为两个方面：国家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多数国民自觉地居于主人地位。因此，“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由此，他把民权自由与共和立宪结合了起来：“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

由此出发，新文化运动以人权说为武器，把思想上批判孔教与政治上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相结合，为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度而奋斗。陈独秀指出主张“三纲”的孔子之道“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他们号召青年，不仅要打倒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还要彻底“除三害”——霸住中国政治舞台的军阀、官僚和政客。

这样，新思想启蒙运动就把两条路线鲜明地对立起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权说——共和立宪——资本主义；儒家学说——纲常名教——帝制政治——封建主义。在这种对比中，他们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启发国民增强民主意识，关心政治，把青年由启蒙引向救亡，引向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还大力宣传科学思想，向封建迷信、天命论、鬼神说开战，批判佛教、老庄思想对人的毒害，指出：“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为此，他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和批判：（一）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主张“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以科学说明真理”，“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二）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唯心论和“天命、天罚、天幸”的天命观，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证明无形无质的鬼神是根本不存在的。（三）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指出“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科学的态度就是“综合客观之现实，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使主观思想合于客观实际，以达到“宇宙人生真正契合”。（四）坚持真理，破除偶像，指出一切偶像都是无用的骗人的，“都应该破坏”，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作到“宇宙间实在的真理与吾人心坎儿里彻底信仰”的统一。（五）宣传社会进化，反对保守，力求进取。“自宇宙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鼓励青年从消极保守退隐中摆脱出来，建立积极、进取、战斗的人生观。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第1卷第6号。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青年》第2卷第4号。

《敬告青年》。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5号。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5号。

《敬告青年》。

陈独秀：《破坏偶像论》，《新青年》，第5卷2号。

文学革命是这场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当时，腐朽的封建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统治着中国文学界。几个主要流派如“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文选派”宣扬“代圣贤立言”，都为传播封建礼教迷信思想服务，在形式上则提倡刻意摹仿的陈腐的八股文、文言文等，不准有任何的创造和突破。所有这些，严重腐蚀着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麻痹他们的意志，阻碍他们与现实社会接触，影响新思想的传播。因此，随着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又于1917年发动了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改革。内容的改革，突出反对封建思想；形式的改革则是反对僵死的文言文，提出生动活泼的白话文以及标点符号等。开始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陈独秀的支持下首先发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8项条件：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强调文学必须有思想，有情感；提倡白话文写作，创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等等。他并最先用白话文写作诗文，开一代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赢得很高的声誉。

胡适发出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但他初涉文坛，又远在异邦，对这场斗争心中无数，态度并不坚决，一再宣称“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陈独秀则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于是，他紧接胡适之后，发表《文学革命论》，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并把文学革命与伦理革命、政治改革联系起来。他说：“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上书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他以此广纳将士，并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接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纷纷响应，加入进来，在文学界卷起巨澜。鲁迅还以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丰富的文学创作，表现了文学革命的最高成就。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等，也从此推广开来。文字改革如汉字拼音化和拉丁化也开始探索。

陈独秀等人认为，国民愚昧落后，民族种种弱点，无不与旧的教育制度有关。因此新文化运动中又掀起一场教育革命。中国教育制度与西洋教育制度相比，主要有3大弊病；被动的而非自动的，灌输的而非启发的；神圣的而非世俗的，幻想的而非直观的；单独脑部的（智育）而非全身的（德智体）。

对此，他们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

陈独秀：《答胡适之》，《新青年》第3卷第3号。

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

教学内容，“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教学方法，采取“自动启发主义”。

陈独秀等人的教育改革主张，得到了当时任北大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蔡元培的支持。蔡聘任陈为北大文科学长，对文科的学制、教学方法，进行某些改革尝试。同时，他们又帮助蔡元培对整个北大这个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封建教育堡垒进行整顿和改革，实行男女同校、学生选科、学生自治等制度，倡导德智体美相结合、求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宗旨，唤起了青年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心。

自然，由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自身的阶级和思想的局限性，运动也有种种弱点。如急于求成的功利观念，认识与实践中的实用主义、经验论和唯意志论倾向，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偏颇态度等。这些都反映了社会长期黑暗和动乱又找不到出路时，人们普遍狂躁的心态，它给运动增添了更强的革命性，亦带来破坏性，而且给运动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从整体来考察，这些弱点与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的猛烈攻击，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封建势力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他们推出“以遗老自居”的林纾为急先锋，以《新申报》和《公言报》为阵地，或致函蔡元培，或以“小说”影射，肆意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非圣非贤”，并制造谣言，勾结军阀政府，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成员，致使蔡元培被迫辞职，陈独秀也离开北大。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并不屈服，以大无畏的勇气进行反击。他们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于是，新旧势力展开激烈的较量。

激战结果，使民主主义思想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犹如狂飙席卷大地，催人猛醒。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恋爱、求学、择业的自由，不怕家庭阻挠，家族攻击，纷纷挣脱封建枷锁，集合到《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周围来，成为救国新道路的探索者；同时，许多青年在砸碎封建枷锁，争取个人自由权利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没有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个人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于是，他们从启蒙走向救亡，以前所未有的自觉性和战斗激情，投入政治运动，密切关注国家命运，从而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民主觉悟的提高，也为接受更高的民主思想和更彻底的解放理论准备了条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传到中国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利斗争的失败，这个新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导方面，及时转换方向，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也因此发生根本转折，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二、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获胜的协约国各国纷纷拟定各种瓜分世界的方

案，准备到巴黎和会上去分赃。

美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免遭战祸而享尽和平发展的恩宠，从而使它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力量，于是决定利用战后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和公正的心理，以其经济实力向外扩张。为此，早在 1918 年 1 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提出了“十四条”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构想，其主要内容是：

（一）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缔结后不得有任何种类的秘密的国际谅解；

（二）领海以外，无论平时或战时，必须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

（三）消除经济壁垒，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

（四）各国军备必须裁减至符合维持国内安全的最低限度。

（五）对所有关于殖民地的要求作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此项调整的基础，就是要严格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在决定所有这样的主权问题时，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重视。

（六）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

其他几条，据此原则，对各国具体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这“十四条”受到世界舆论特别是弱小国家的普遍欢迎。

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则力图保持战前的殖民利益，但已是力不从心，被迫追随美国之后。日本是新起而更加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决心与美国竞争，首先欲保持其大战中获得的利益。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中国。怎样排除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是美国所处心积虑的；日本则毫不让步，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并利用几年来皖系军阀执掌北京政府，已经攫取不少权利，特别是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1914 年 11 月，占领青岛，该地德军向日军投降。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为日本所夺取。

1917 年 8 月，段祺瑞政府为取得日本的支持，追随日本而对德宣战，但段祺瑞政府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又把山东的权益向日本作进一步的出卖。9 月，双方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 2000 万日元的合同，使日本取得了当年德国也未获得的修筑胶济铁路延长线的权利。

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开幕。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意、日、中等 20 多个国家的代表，实际上是前 5 个国家，特别是美、英、法 3 国操纵会议。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是：北京政府外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开始时，他们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一）7 条希望条件：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二）取消 1915 年 5 月 25 日的中日协约（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

这两个提案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也表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这两项提案提交到和会最高会议时，都遭到了拒绝，认为不在和会讨论之列。于是就剩下一个山东问题了。

1 月 27、28 日，美、英、法、意、日代表的“五人会议”，讨论德属殖

民地问题，中国代表被指定列席。会上，日本代表提出事先准备好的日本政府宣言书，声称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他种权利，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并发表了1917年初英、法、俄、意、日5国签订的秘密谅解：承认日本的上述要求。中国代表申诉理由，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各方面说明：“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它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双方僵持不下，转入会外活动。

日本向中国政府和其它各国施加压力，并提出由日本和中国直接解决，和会及其它国家无权过问。英法等国和日本因有1917年的密约，站在日本一边。美国虽想通过中国代表团抵制日本，曾提出5国共管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利的建议，但遭到日本拒绝。日本还以退出和会及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于是，美国也向日本让步。中国外交失败。

4月29、30日，英、美、法3国会议，日本代表被邀出席，中国却被排除，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终于作出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的决定，而且条文之详尽、措辞之强硬、对中国侮辱之露骨，连北京政府代表陆征祥致北京政府密电（1919年5月1日）都承认“实为历史罕见”。

但是，陆征祥对这样的条约，还是在其5月1日致大总统、总理的密电中，考虑签字。中国人民对此奇耻大辱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

三、五四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而告终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全国沸腾。北京政府在1918年11月28—30日，以参战国资格举行3日大庆，又是阅兵典礼，又是歌舞宴会，忙碌了一阵，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京中各学校也在14—16、28—30日两次放假3天，并举行庆祝游行。北京大学还在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后发言，阐述这次胜利之意义。可贵的是，他们在演讲中把欧战结束与俄国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联系起来考察。李大钊说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蔡元培也喊出“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大家都一致欢呼“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还为此称赞威尔逊的“十四条”，并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学生游行庆祝时，竟有不少人跑到美使馆去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广大人民群众最高兴的是，中国与英、法、美、日等国一道成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失去的权益，一洗过去遭受强权欺侮的耻辱。所以在巴黎和会开会时，中国各界各团体人士都密切注视着它的进展。但是，随着中国代表的要求逐个被拒绝，中国人民的幻想也一个一个破灭了。

1919年2月初，中日代表团因山东问题在和会上争执，日本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时，中国人民即愤怒起来，各界各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要求政府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严词拒绝，以保主权，庶达国民公意，而免貽笑友邦”。有的致电巴黎中国代表：“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改变调子，称威尔逊为“威大炮”，其“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并指责5国垄断和会，“公理何在？”

随着对巴黎和会幻想的破灭，人们对卖国贼愈加痛恨。4月16日，上海

民议联合会、华侨平和期成会、对日外交后援会等几个团体的代表召开联合大会，作出决议说：“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輿、章宗祥、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

《每周评论》不断揭露卖国贼的罪恶，并点了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輿3个亲日派的名字，在青年学生中发生很大影响。而当和约中山东问题的条文内容传到中国后，人民群众的悲愤情绪达到了极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每周评论》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文章认为争取“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其实，北京和山东的爱国人士已经行动起来。早在2月5日，北京大学2000余人召开大会，推出干事10余人，分头联合各校，致电巴黎代表，拒绝日本要求。其它各地学生也有类似活动。4月20日，山东10万余名群众，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表示力争山东主权之决心。5月3日，北京一些政界人士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决议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该日午后2时在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以示不承认21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处理山东问题之密约。

但是，学生们决定按自己的时间表行动。5月2日，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从蔡元培处和林长民（徐世昌的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发表在《晨报》上的文章中得知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后，便约集参加《国民社》的各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发言。北大法科学生谢昭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大会在既热烈又悲壮的气氛中，通过以下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拒签巴黎和约；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余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前。他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书：“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等等。广场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很多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最后决议举行示威游行，推北大学生傅斯年为总指挥，然后向使馆区进发。

北京政府先后派教育部次长、步军统领李长太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到场干涉，都被学生顶回。队伍到使馆区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大批巡捕荷枪实弹阻于铁栅栏处。双方交涉2小时之久，不得要领，学生队伍即改道向曹汝霖住宅赵家楼进发，下午4时许，涌到曹宅门前。曹宅内外已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双方争执一阵后，学生即冲进曹宅，适遇在曹宅作客的章宗祥，即予痛打；继因寻曹未着，即烧宅屋。近6时，李长太、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逮捕未散去的零星学生32人，并将大火扑灭。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为营救被捕学生，继续力争山东权利和惩办卖国贼，举行全市总罢课，并于次日成立北京市学联，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教育界教职工及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蔡元培等各校长组织校长团，向当局交涉营救学生。反动当局对如何处置学生运动产生分歧意见，皖系军阀坚决主张严厉镇压，总统徐世昌和一部分议员“恐惹起绝大风潮而后患将不堪设想”，同意吴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实现两个条件下，释放被捕学生：（1）7日不许学生参加群众大会；（2）同日各校一律复课。蔡等完全答应。被捕学生获得释放。

5月7日的国民大会未能举行，但学生的斗争没有停止。反动当局正酝酿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并欲免去蔡元培的职务。蔡闻讯后，为保护学生，于8日辞职，并秘密出走天津南下。教育总长傅增湘因表示同情学生和蔡元培而遭皖系非难，也于11日秘密出走。北京各校学生及教职员代表开会，掀起留蔡运动，13日向政府最后询问，如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14日，在学生再次总罢课及社会舆论压力下，徐世昌被迫下令慰留蔡元培。

但是，北京政府同时又下令挽留5月4日受打击后被迫辞职的曹汝霖等卖国贼，还明令免傅增湘职，欲以安福系要人田应璜掌教育大权。这又激起广大学生和教师们的强烈愤慨。于是，他们于5月19日举行总罢课，并向徐世昌提出欧会不得签字，惩办国贼，挽回蔡、傅，打消田掌教育等6项要求。总理钱能训竟要学生拿出“卖国证据”，否则，“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学生表示，“非惩办卖国贼之目的达到，决不上课”，并在罢课期间开展一系列活动：组织讲演团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行日刊；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等等。

学生爱国行动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不断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要求取缔学生“排日”运动。日本驻华军舰纷纷驶泊天津、吴淞、青岛、山海关各埠示威；驻北京的日兵也持枪到总统府门前进行军事恫吓。在日本压力下，北京政府开始对学生运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6月3日，军警马队及侦缉队、保安队一齐出动，逮捕在街头进行宣传活动的学生170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讲堂内；4日，又拘禁700余人。法科校舍无法容下，又辟马神庙理科校舍为临时监狱。

北京“六三”大逮捕消息传到上海后，经上海学联的联络，于6月5日，实现了商店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以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和要求，并且，从6日起，罢工斗争不断扩大，到10日，上海工人罢工进入最高潮，以致上海市外市内、海上陆上、交通和电话通讯等均告断绝。与此同时，全国30多个城市，也卷入到斗争中来，五四爱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而且参加运动的阶层极其广泛，不仅有学生、工人、商人、市民，还有乡镇的农民群众、士兵等。直系军阀吴佩孚，也企图利用群众斗争打击政敌皖系，于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大总统说：“士为四民之首，士气即民气也。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相见。……”表示了对学生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态度。美国政府见学生斗争矛头主要针对日本，也取“不反对”立场。

在这种种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开始动摇。尤其在6月8日，接得淞沪

《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80—181页。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1—352页。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9年，第1卷，第696页。

护军使卢永祥和上海道尹沈宝昌急电，说上海三罢，“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10日，又接天津商会急电，称“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北京政府终于恐慌起来，从10日上午开始，到这天深夜，被迫接连三次下达命令，先后罢免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本职。五四爱国运动达到了第一个目标的胜利。

但是，对于这次运动的根本目标——拒签和约，北京政府由于对帝国主义种种顾虑，还是不能接受。6月17日，北京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电令巴黎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此举再次激起群众爱国运动的高潮。特别是受害最深的山东人民，6月18日，派出请愿团进京，表示：“不达目的终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则农人亦将罢耕，以表一致。”接着，北京及全国人民又再一次行动起来，纷纷进行请愿斗争，要求拒签和约。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收到要求拒签的电报达7000多通。

6月28日，为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留法工人和学生即包围中国代表住所，迫使其不能赴会签字。中国代表团在拒签后发表宣言，表示“遗憾”。

惩办国贼，拒签和约，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而它又完全是中国人民群众斗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表现的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和彻底性，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工人阶级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便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斗争

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和约——五四运动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局，也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状况。于是，当运动循其自身的规律深入发展时，人们自然将运动中激发起来的政治积极性，转向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和彻底摆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新途径。

另一方面，启蒙推动了救亡，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救亡又反过来检验理论，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这又促使新的理论探索工作的开展。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人们崇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所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说成是“公理战胜强权”。他们把“公理”解释成“合乎平等自由”；“强权”理解成“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因此，大战结束，又是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人道主义对侵略主义的胜利。据此精神，中国收回战前德国夺去的山东权利，乃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当巴黎和会的结局宣告“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破灭时，当人们看到在大战中和大战后，那些令人向往的自由幸福富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种种不可克服的危机时，先进的中国人终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也看到了进化论的局限性，转而寻找新的理想和救国理论。

就这样，五四以后，寻找真理、探索新的救国之道、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迅速高涨起来。一花引来百花开。历时数年的《新青年》宣

《新闻报》，1919年6月10日。

《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

传和新文化运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成果。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新潮》之外，全国出现了三四百个进步社团及它们的刊物，如北京的《新中国》、《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社会》、《工学》等，上海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等，天津的《觉悟》、《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日刊》等，还有《湘江评论》、《浙江新潮》、《新湖南》，等等。这些刊物，绝大多数宣称“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之改造”，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为“旨趣”，并提出各种各样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方案和措施。

正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和俄国苏维埃制度的影响，透过重重封锁来到中国，人们视它为“20世纪的世界新潮”而热烈欢迎它；社会主义就成了最时髦的东西，成了人们公认的新思潮。数以百计的刊物对它表示好感和向往，用以代替往日对资本主义的向往。

但是，当时这股“社会主义”的新思潮，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如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

自然，有些人们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放，但更多的人又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给予“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如《新社会》所主张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还有人认为“民主”就是要使社会上全体人“机会均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使劳动者“取得生产机关的支配权”，“增进社会上全体的人的幸福”。

在对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宣传中，《新青年》又走在最前面。它在1919年12月构制出这样一个新蓝图：“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显然，这个“图式”，是对当时全国各地进步社团和期刊所设计的种种新社会蓝图的一个综合。同时，《新青年》又根据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民众运动改造社会”的主张。由此，他们从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靠拢。

十月革命前，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其影响微不足道。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数量很少，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缺乏肥沃的土壤。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支约200万人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且，由于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剥削和压迫，又集中在沿海沿江大城市、铁路、矿山及纺织、面粉等主要部门，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有坚强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在五四运动中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再加上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的影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郑振铎：《发刊词》，《新社会》第1号。

汪馥泉：《什么是现代的时代精神》，《教育潮》，第3期；艾华：《说德谟克拉西》，《新空气》，第1卷第1号。

《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传播，准备了良好的阶级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新思潮一起涌进中国，然而，它要在思想界独占鳌头，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须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这要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们都经历了扬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由怀疑到绝望、转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然后满腔热忱地在他们掌握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等刊物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6日，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上，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结束部分，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接着，5月，李大钊负责主编了一期《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的文章从各方面介绍、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尽管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理解，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较系统、较完整的介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断受到反动当局的阻挠和迫害。它被视为“洪水猛兽”和“过激主义”。1919年6月初，京师警察厅“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等情”，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11日，陈即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拘禁3个多月；在此期间，8月31日，警察厅又查封了《每周评论》。陈出狱后，仍受监视，于是与《新青年》一起迁往上海。但又因“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并鼓动军学界，扩张过激主义”，而多次被中国军警和租界巡捕房搜查，罚款，拘捕；《新青年》也不得在上海印刷、出版和出售。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因此，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战斗。

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思潮中，除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其中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以及他们的改良主义，由于杜威和罗素亲自应邀到中国来宣传演讲，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以“平民”代表的面貌出现，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作了一些“批评”，又都鼓吹不需要“流血斗争”，因此对一些渴望变革、又害怕激烈革命的青年，有较大的吸引力。

杜威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是他的学生和信徒。他于1919年4月30日来华，在北京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5种长篇演讲，全面、系统地宣扬实验主义。这种理论片面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宏观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所以，在谈到中国社会的改造时，杜威说：“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改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种笼统的理论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没有用的。”

陪同杜威到各地演讲的胡适，在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被迫离京的时候，取得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他改变了该刊的政治方向，抛出了他的“政治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向李大钊等人热心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他说，空谈好听的、外来进口的、偏向纸上的“主

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但那“是没有用处的”，“很危险的”，因为它“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他奉劝新舆论界“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

李大钊见了胡适文章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给予批驳。该文从强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为此，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主义必须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强调阶级斗争和“根本解决”的关系，指出，若不去用马克思主义，“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此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及《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章，李大钊也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双方进行论战，鲜明地表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两种世界观、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论两种政治主张的对立，各自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在当时思想舆论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阵地，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1920年，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又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由于众多的思潮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于是，何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适合于中国社会改造的，就成了社会主义新思潮内部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首先是由罗素和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挑起的。

罗素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于1920年9月应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和北京大学的聘请来华讲演，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活动。在社会领域，他主张劳资调和，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然而，他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实业未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连这种社会主义都不能立即实行，现在只有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是当时新思潮重要刊物《改造》的主编，曾宣传过“社会主义”。陪罗素走了一遭，猛然醒悟，认为罗素的主张“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宣称：“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都得过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那么，怎样来发展中国的实业呢？张东荪说实行“协社”，而且这种“协社的企业”，“可在资本主义下实行”，也可与资本主义“并行”，就是“不能驱逐资本主义”。从中国国情来看，张东荪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其出发点是阻挡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梁启超向皖系投机失意后，于1918年冬出国游历英、法、比等国，于1920年春回国。他根据自己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状况的考察，主张实行一种非“马克思一派倡的”社会主义，即要避免“社会革命这个险关”、“尽情发挥”资本家和工人“互助精神”的“社会主义”。——显然，他们主张的

《每周评论》，第31号。

《每周评论》，第35号。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

《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

《游欧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第34页。

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他们还借口中国实业不发达，劳动阶级还在“胎教时代”，否定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

李达、陈独秀等对以上张、梁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是：“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这个原则不能因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而改变；“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他们的结论是：“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陈独秀还在具体分析比较了5种社会主义流派后明确指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这些论述，有力地揭破了梁启超主张的假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擦亮了許多受迷惑青年的眼睛。同时，蔡和森和毛泽东在讨论中，也表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明确主张采用“马格斯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

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对于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抛弃资本主义、选择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开展革命工作，做了理论准备工作。缺点是不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作统一的理解，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将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开展产生“左”的影响。

在进行以上社会主义讨论的同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运用社会主义进行种种改造社会的实践，企图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从而使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一度在中国流行起来，如克鲁泡特金的进化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等。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都对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发生过兴趣，而王光祈据此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影响最大。

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等等。

北京工读互助团曾发展到4个小组，共数十人参加。后来，天津、武汉、上海、长沙、广州等地都仿效实行，出现了各种工读互助团那样的组织，但都很快就失败了。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向中国人民宣布：拯救中国不能采用实用主义和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急进的激烈的方法，谋社会整体的改造。这就为大量先进分子急速地向科学社会主义迈进开辟了道路。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从右边攻击不同，无政府主义从左边攻击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在中国有如汪洋大海，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帝国主义、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工读互助团简章》，《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

封建势力的长期压迫下，不断破产，产生一种绝望中反抗的极端情绪，否定一切权威和约束，追求绝对自由，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制度、政党和纪律。于是就崇信欧洲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20世纪初，中国就产生了一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复、李石曾、吴稚晖、张继等，他们的后继者有黄凌霜、区声白等。

十月革命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斗争矛头指向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具有进步的意义。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他们把主要斗争锋芒转向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1919年5月，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大肆攻击，特别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说“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无产阶级政权“压制个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只能使“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声称“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去除一切强权”，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之时，正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建党工作之日，对这种思潮的态度关系到要不要建立政党和建立什么样政党的大问题。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从而拉开了全面回击无政府主义的序幕。然后，陈独秀、李达、施存统、蔡和森、李大钊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3次通信影响较大，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开辟的《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专栏内。

在这场论战中，共产主义者方面有针对性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必要，是“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尽，……非有比较长期的压制不可”；同时又宣告，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要消灭国家，必须“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对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多方面进行了说理辩驳，指出若如此，任何事情，特别是社会生产，“非闹到停顿而破产不可”；“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在分配方面，他们指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各取所需”“是绝对办不到的”。

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主要是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批判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捍卫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建党学说。这场论战持续了1年多，论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在一些社团、学校，以及国外留学生中，都有反映。而且，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贫乏，马克思主义取得了

《新青年》第6卷第5号。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

施存统：《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

李达：《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2号。

明显的胜利。1922年，区声白在给陈独秀信中，不得不表示承认错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大批激进青年也比较清楚地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转变为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如陈延年、施洋、黄爱、庞人铨等。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一大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

五、中国共产党成立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即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2月，因北洋政府迫害，陈独秀离京前往上海。李大钊护送其到天津途中，两人交换了建立共产党的意见，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建党活动。

李大钊返京后，与邓中夏、高君宇等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在3月先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还有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和张国焘等。研究会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恰在这时，苏联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粉碎了盘踞西伯利亚地区的高尔察克匪帮，打通了中苏联系。前一年发表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传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同时，中国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也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注意，派魏金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

李大钊等北京革命者热烈欢迎魏金斯基，双方举行多次座谈会。魏金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内外政策，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分子，加深了对苏俄革命的了解，更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并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加速建党工作。之后，魏金斯基一行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

陈独秀到上海后，集中精力研究劳工问题，着手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他亲自到工人中去，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提出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新观点，指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他与魏金斯基交换意见后，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当务之急，而且建党条件已经具备，遂决定立即开展建党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各地举行了隆重纪念劳动节的活动，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趋向。《新青年》、《星期评论》、《新社会》、《晨报》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都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的纪念专号篇幅比平时增加一倍多，除纪念文章外，还有多篇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上海陈独秀领导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活动规模较大。他们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7个团体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北京李大钊、何孟雄、邓中夏等进行的活动更为多样，不仅有纪念集会，还到街上和长辛店工人中散发传单，讲演和游行示威。从此，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办平民夜校、工会等形式，

《五四运动文选》，第360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劳动底觉悟》，《新青年》第7卷第6号。

建立了与工人群众经常的联系。

与此同时，魏金斯基和陈独秀以新青年社为中心，多次召集上海信仰社会主义的社团代表，举行座谈会，探讨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问题，最后，一部分人取得一个共识：要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7、8月份，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最初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赵世炎、李达、周佛海、沈雁冰等十几人。陈独秀为书记。之后，有些人去了欧洲、日本和武汉等地，成了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

上海共产党发起后，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的工作。他们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为全国建党作准备。为此，《新青年》从1920年9月1日起，成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重点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组织了对胡适和张东荪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及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俄国革命的历史、苏俄劳农政府的现状，以及俄国革命的领袖人物的情况。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等。

11月，上海发起组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宣言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坚持正确的共产主义原则。

此外，上海发起组还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开办类似党校性质的“外国语学社”，培养干部；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团章发到全国，指导各地建团工作；建立了“华俄通讯社”，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报导中国革命消息，并取得帮助。

自然，上海发起组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开展工人运动。为此，在8月15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专门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又帮助工人群众摆脱各式各样的黄色工会的影响，建立了真正的工人团体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1921年1月，发起组又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专门组织与领导工人运动，并组织了这年隆重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直接推动或影响下，北京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等13人；长沙毛泽东、何叔衡等一批原新民学会的成员；武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十余人；济南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广州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东京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巴黎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先后成立了各地的共产党小组。从而为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1921年6月，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又派马林来华考察中国革命状况，推动共产党的建立。当时，陈独秀因在广东工作，李达任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马林与李达、李汉俊联系后，了解了1年来中国各地的建党情况，认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达、李汉俊就分别写信给各地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会议进

行到 30 日，因为法国巡捕侵扰，31 日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船上进行。

大会起草并通过了《成立宣言》、《纲领》和《决议》。《宣言》论述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的，分析了国际阶级斗争的状况。《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等。还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决议》规定了党在当前实际工作的任务以工人运动为中心，要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成立产业或工厂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并派出党员参加工会工作。

大会最后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在此前后，同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如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人、湖北的恽代英等人、四川的吴玉章等人，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都自动取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说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最觉悟的革命者的共同要求，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产生过程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其鲜明的特点：（一）它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注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没有受到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二）党一建立就立即投身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实干苦干，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三）党一成立就自觉地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四）党一开始就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在全国共产主义者中具有崇高的权威；保持党的统一，反对任何分裂活动，就成为党的优良传统。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点，它将保证今后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也有弱点，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到建党时间较短，因此党的理论准备不足。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启蒙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先进国家（如英、法）经历了几百年，在不够先进的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在落后的中国仅 20 年；若从新启蒙运动开始，只有五六年；而从马克思主义正式传播开始，则更短，只有一两年。建党后，又忙于实际革命活动，理论补课也没有跟上。另一方面，党的建造者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不甚了了。因此，他们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作统一的理解。这表明，在正确的方向确定以后，寻找通向革命胜利的具体道路，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作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1921 年 9 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政府教育长的工作，回到上海主持党的中央局。11 月，中央局向各地发出《通告》，就 1 年内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作出具体安排和要求。

“一大”通过的《决议》和后来下达的《通告》，第一次提出和制订了全国性的工作计划，开始实施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从此，中国才有了真正的希望。

六、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军阀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中国革命的激流，领导起工农群众反帝反

军阀的斗争。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工人阶级首先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举行大小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人数30万以上，给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巨大的力量。

共产党“一大”以后，1921年8月，成立了以上海为总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合法机关。它的工作主要是两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深入和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

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初，由于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的出色工作，在各区工业和交通中心，都建立起强大的工会组织，如上海机器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唐山工人图书馆、京绥路的“精业研究所”、“正太路总工会”、济南的“山东铁路工会”和纺织工会、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湖南劳工会、华南的广东全省土木建筑工会等。

通过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工人群众的觉悟都有较大的提高。于是罢工斗争也随之而频频发生，较大的有：1921年7月上海英美烟厂8000多工人的罢工，9月的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11月的陇海路工人大罢工，12月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等。这些罢工的斗争对象分别是外国资本家、英国总管、法国总管和法租界当局，具有反帝意义，而且都取得了胜利，从而推动了全国工农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高潮的到来。

香港海员行迹天涯，感知世界风云，由于多次要求船主改善恶劣的待遇遭到拒绝，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述各次罢工胜利的鼓舞下，于1922年1月12日开始，实行大罢工，先后参加罢工的工人有2万多人，到2月10日止，因罢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轮船增至168艘，货物26万余吨，使香港与外地的航运几乎全部断绝。罢工由苏兆征、林伟民为首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领导，总指挥部设在广州。海员罢工后即纷纷离港回广州。罢工期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各地工人从各方面予以支援。上海、长辛店、湖北、开封等各处铁路工人及别业工人，都组织香港海员后援会，开展同情罢工、游行示威、募捐资助等活动。

香港当局采取一系列手段，破坏罢工，并在2月1日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派军警查封并占领了在香港的会所，逮捕工会领袖。3月4日又在沙田阻拦工人回广州而制造了枪杀6人、伤几百人的“沙田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香港全体市民的愤怒。各业工人举行同情海员的总罢工，使市内交通断绝，生产停顿，商店关门，经济生活瘫痪。终于迫使香港当局接受工人的条件。

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为了进一步推动正在发展的罢工高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全国各工会代表于5月1—6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劳动大会，会议发表了宣言，通过了8小时工作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等10个决议案。

这次大会实现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亦即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全国团结，确立了中国革命工会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说明中共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大会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又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提出了劳动法大纲 19 条：承认劳动者有集会权、罢工权、国际联合权、8 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禁止童工等。通过劳动立法运动，这个大纲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深得人心，实际上成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纲领，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的觉悟，使罢工高潮在全国普遍地展开，1922 年下半年到 1923 年初，出现了以下几个罢工潮：

北方铁路罢工潮：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罢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铁路工人罢工等；开滦 5 矿工人大罢工；武汉罢工潮：汉阳钢铁厂罢工、粤汉路武长段工人罢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汉口英美烟厂罢工、汉口洋花厂罢工；湖南罢工潮：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上海罢工潮：日华纱厂两次罢工、长江海员同盟罢工、闸北丝厂罢工、金银业手艺人罢工、日华纱厂和英美烟厂同盟罢工；广东罢工潮：广东盐业工人罢工、澳门华工总罢工，等等。

这些罢工，除了上海、广东区有些罢工失败之外，一般都取得了胜利。而且在罢工潮中，工人阶级的觉悟又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普遍认识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少数人或个别工厂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没有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利益的改良是靠不住的。因此，工人斗争的水平逐步提高，开始向侧重组织地区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更高更紧密地结合方向发展，终于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峰——京汉铁路大罢工。

1923 年 1 月，按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京汉铁路各工会代表筹备总工会的工作积极进行。但是，这时形势有了新的变化。1922 年，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的罢工运动主要在官办企业中进行，到 1923 年初则主要在外国特别英国工厂中进行，而且具有更显著的反帝色彩，在罢工宣言中有谴责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主权、要求断绝中英贸易等内容，这就把要求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同反帝压迫的政治斗争结合了起来，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同时，工人运动的发展，正在沉重打击北洋军阀的统治，1922 年 8 月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胜利，仅增加工资一项，就使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每月损失 6 万元。由于京汉铁路是联结北方首都、河南英国厂矿、保定和洛阳军事要地以及华中政治经济中心武汉之间的交通枢纽，它对吴佩孚及英帝国主义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一度为了驱逐亲日派段祺瑞及交通系而支持过共产党、“保护劳工”的吴佩孚，到 1922 年底改变了态度，积极准备对付工人运动。所以，当他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将于 1923 年 2 月 1 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消息后，就下令制止，并在开会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软禁工人代表，砸毁总工会会所。致使成立大会被迫中断。当晚，总工会决定从 2 月 4 日起举行总罢工，抗议压迫。

2 月 4 日，郑州、江岸、长辛店先后宣布罢工。正午 12 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栅一律停止工作；全路 2000 多里，工人 3 万多人，在 3 小时之内，有条不紊地实现了总同盟罢工，充分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与伟大的力量。

京汉铁路总罢工实现后，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便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怂恿北京政府立即采取武力手段镇压罢工。2 月 7 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便在京汉路沿线主要各站，对工人开始血腥镇压和屠杀，其中最严重的是江岸和长辛店。工人们坚决反抗，无奈赤手空

拳，横遭全副武装的军警摧残，致使 52 人牺牲，300 余人受伤，40 余人被捕入狱，1000 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其中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后，被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捆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威武不屈，严词拒绝，终被杀害，壮烈牺牲。另一罢工领导人、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被捕杀时，“军法吏问他身后关于家庭的遗命，他说无产阶级便是他的家庭。身中三弹犹引吭三呼‘劳工万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坚贞的气节。

江岸惨案发生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总罢工令，援助京汉铁路工人。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同情罢工。然而，由于军阀吴佩孚和萧耀南同时加紧镇压工人，帝国主义海军陆战队也全部登陆，为了减少牺牲，保存有生力量，待机再举，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工团联合会联名，于 2 月 9 日忍痛下令复工。

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了，但它在 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阶段；此后，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更多的革命群众所接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口号。同时，斗争的失败，也给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以深刻的教训：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团结占人口 80% 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并且组织强大的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

事实上，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制度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在 1920 年直系军阀政权建立之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不仅在广大战区的人民群众饱受战争破坏之苦，而且军阀借战争肆意征兵绑走青壮劳动力，掠夺人民资财，把大量饷需和战费转嫁人民头上，再加上水旱灾害，广大农村严重破产，往往颗粒无收，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于是，农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或工人运动的影响下，纷纷起来反抗。1921—1923 年较大的农民斗争有：

1921 年下半年浙江萧山县农民斗争。这里人口稠密、交通发达，但农民不仅长期受高额地租和苛捐杂税剥削，还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当地地主家庭出身、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在上海参与筹建共产党的沈玄庐，同情农民的处境。当萧山衙前农民不堪压榨，要求他主持公道时，他即提出组织农民协会以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1921 年 9 月 27 日，萧山衙前农民协会终于在农民大会上宣告成立，并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章程。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民协会和农民斗争纲领。随后，萧山几十个村庄的农民纷纷响应，也先后建立农会组织，不到半年建立了 80 个农民协会。秋收以后，这些农会就发动农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抗捐斗争，提出了“减租四折”的要求，并取得了一些胜利。这次农民斗争，虽然最后在地主、豪绅勾结反动官警镇压下失败了，但打开了中共领导农民革命的第一页。

1922 年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1922 年，海丰的农民就在彭湃的领导下成立了农会。次年 1 月 1 日，海丰县总农会正式成立时，会员已有 10 万人。这年，天灾严重，地主仍强迫农民交租，农会便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提出“减租七成，至多三成交纳”的口号。在海丰农民运动影响下，广东各地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斗争，陆丰、惠阳、惠安、普宁等县都成立了农

会，会员增至 20 多万人，形成一支强大的农民革命队伍。

1923 年湖南衡山农民斗争。1923 年初，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共产党组织开始从事农民运动。衡山的岳北、白果一带是军阀赵恒惕的家乡，农民受压迫剥削很重，同时这里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受工人运动影响较大。9 月，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不久，会员增加到 10 万人以上。在农会领导下，农民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外运，以及减租减息的斗争。

此外，1923—1924 年，山东、陕西、河南一些县，也都爆发过激烈的农民抗捐抗暴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发展，开创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新局面，预示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将埋葬北洋军阀的统治。

第四章 军阀混战与国共合作

一、直皖战争

直皖两系在以北洋派统一全国、实行军阀统治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分歧，但为了争权和扩大本派系的利益，皖系主张对西南军阀的军事割据，实行武力解决，直系则主张和平谈判。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成为直系领袖，直皖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了。皖系因与段祺瑞相抗衡的冯国璋死了，更加骄横，对直系也更加咄咄逼人。直系则决心利用五四运动后人民的反皖情绪，推倒皖系。

这时，皖系与奉系的关系也恶化了。因为在奉皖联盟时，徐树铮未经张作霖的同意，随意调遣奉军，并以奉军副司令名义在天津擅杀直军将领陆建章，嗣后又挪用奉军军饷数百万元，得罪了张作霖。1919年9月，张解除了徐的奉军副司令职。同时，五四运动后，张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完全失去了人心，而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经营外蒙，又有碍奉系势力的扩张，因此接受了直系“联奉制皖”的策略，建立奉直反皖战线和奉（东三省）直（直、赣、鄂、苏）7省同盟。

1919年5月，南北和议破裂后，吴佩孚即以“前方经济困窘，官兵苦不堪言”为由，屡次要求北撤，并在1920年2月，与南方军政府秘密协定，军政府接济直军开拔费60万元，而由湘军接受直军防地。段祺瑞认为，吴佩孚北撤，一将破坏其南征计划，二又威胁皖系利益，因此授意北京政府不予批准，命令他不得自由行动。

正在这时，又发生河南易督和安福系倒阁事件，使直皖冲突激化起来。

为了阻止吴佩孚北撤，2月26日，安福系国会挟持北京政府作出以皖系将领吴光新代替赵倜任河南都督的决定。此举迫使在直皖矛盾中守中立的赵倜倒向了直系，形成8省反皖同盟。总统徐世昌主张和平解决南北冲突，但他没有实权，在中央又受皖系钳制，因此只好左右逢源，有时中立，有时支持直系，有时敷衍皖系。对河南易督，他因与赵倜关系密切，同情赵。赵倜得到直系支持，又得总统同情，就坚决抗皖，遂使皖系河南易督失败。

靳云鹏与徐树铮都是段祺瑞的亲信，和傅良佐、曲同丰一起，被称为段手下的“四大金刚”。但靳还是徐世昌的门生、冯国璋的同学同事、曹锟的把兄弟、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往来都较密切。因此，段祺瑞对靳云鹏不能毫无戒心，致使靳与徐在他面前争宠失败；段对徐的信任超过了靳。靳因之对徐衔恨在心，两人关系更加恶化。1919年6月13日，钱能训内阁总理辞职，龚心湛兼代。9月5日，龚又被安福系所迫去职，继由徐世昌提议由靳云鹏陆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皆赞同靳组阁，徐树铮则推动皖系督军倪嗣冲等通电反对，但未果。11月5日，靳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

靳上台后，想摆脱段祺瑞的控制而独树一帜，企图自成各派的中心，而左右政局。他力主南北议和，反对对南用兵；抵制河南易督；对日外交提出

《岑春煊致唐继尧密电》（1920年2月4日），云南省长公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八字方针”——“尊重民意，保持主权”。因此，段祺瑞、徐树铮就利用安福国会与靳内阁作对，使靳内阁处处受牵制要挟，“一步不能发展，一人不能任用，一事不能顺手办理”，最后发展到倒阁运动，迫使靳在1920年3月31日和5月8日两次提出辞职。

8省同盟成立后，作出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议，徐世昌也对靳内阁表示支持。双方相持不下。因靳云鹏5月初辞职后坚不肯复任，北京政局陷入严重的内阁危机中。徐世昌感到左右为难，惶惶不可终日，就请张作霖出来调停。与此同时，吴佩孚不顾北京政府禁令，于6月沿京汉铁路撤至保定。湘军乘势驱逐皖系湘督张敬尧，占领湖南。直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6月19日，张作霖以“调人”姿态应召入京。22日在保定举行有吴佩孚及其联盟各省代表参加的会议，提出挽留靳内阁，罢免安福系三总长，解散安福系，撤销边防军等6条意见。由于段祺瑞表示异议，徐世昌与张作霖、段祺瑞会商后，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一）修正筹边使官制，西北边防军转移管辖；（二）靳云鹏辞去国务总理，专任陆军总长，由周树模组阁；（三）安福系三总长出阁等。但安福系要员强烈反对。段祺瑞还要求惩办吴佩孚。张作霖调停失败，在7月7日离开北京赴军粮城，一面发表“局外中立”宣言，一面集中7万兵力于天津，以示援助直系。

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领衔呈劾会议，要大总统对曹锟、曹瑛、吴佩孚褫夺官职，下令拿办。徐世昌在皖系逼迫下批准。同日，段在团河成立定国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布兵于京津沿线，一路取保定，一路扑天津，两路分进。

12日，曹锟、张作霖等8督，通电讨段，指责边防军出动。直系即在保定设“讨贼军”大本营，吴佩孚任前敌总司令，分东中西三路迎战皖军。7月14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

双方激战3天，17日，战情发生变化。西路吴佩孚迂回突击松林店的皖军前敌司令部，俘司令曲同丰，占领涿州，进击长辛店，西线皖军全部瓦解。东线皖军因此大受威胁，再加上奉军助直作战，在廊坊指挥作战的徐树铮逃回北京，所属“边防军”往北败走。

南方军阀都声援直系。军政府及熊克武、谭延闿等人，均通电声讨段祺瑞和安福系。

段祺瑞山穷水尽，不得不自请罢官，并撤销定国军。22日，直系在居庸关附近最后打败皖军，翌日，直奉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接着，北京政府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免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通缉祸首徐树铮、王揖唐等，解散安福俱乐部。从此，皖系势力衰落下去。

袁世凯垮台后，皖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曾不可一世。但仅仅4年时间，也彻底垮台了。表面上，它败于直系，实际上亡于正义和人心。由于他们执掌中央政权后践踏国会，撕毁约法，穷兵黩武，排除异己，卖国自肥，坏事做绝，人心丧尽，因此很快走向灭亡。

这几年，南方虽有地方军阀之间的不义之争及他们与孙中山国民党的矛

《靳总理否认直接交涉说》，《晨报》，1920年3月20日。

《安福系逼走靳云鹏》，《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6日。

盾，但基本上代表着维护民国国会和约法的立场。因此，对南方的态度往往成为衡量人心向背的试金石。皖系始终坚持武力讨伐南方，所以失去人心；直系为了对付皖系而联络南方，由弱变强，取皖而代之，而以后它又重蹈皖系之覆辙。这是每个北洋军阀集团兴衰的共同规律。

另外，这次皖系失败，也与日本帝国主义换选走狗有关，再次显示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军阀政治中的作用。日本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改扶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以保持日本在中央的影响。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并在战后的北京政府中，和直系平分秋色。

直奉两系共同把持的北京政府，实际上是英、美、日3国共同的侵略工具。但是，由于帝国主义间的相互矛盾和两个军阀集团的利害冲突，又迅速导致了另一场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

二、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俄国因革命，德国因战败，皆退出中国；英国和法国遭到严重削弱，但仍想重返中国；日本实力大增，在中国占支配地位，并攫取许多特权，尤其是夺取了旧日沙俄和德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在战争中和战后的经济实力急剧增长，除向战后衰弱的欧洲扩张外，积极向中国和远东发展。因此，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中国和远东势力范围的斗争又激化起来。

1918年，大战结束时，美国36家银行组成银行团，准备对中国借款。但是，当时美国在远东的力量还难以向日本在中国的霸权地位挑战，顾虑若美国单独借款于中国，不特为日本所反对，且招英、法之忌而陷于孤立。于是，美国政府即向日、英、法3国提议合组国际银行团，来承受中国的一切政治借款和经济借款。美国公使芮恩施还明确向北京政府提出条件是，新银行团得控制中国政府的财政权和用人权。

美国此举目的，在于以巧妙的伪装来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优势，但还是被日本所识破而反对。日本一方面动员其国内“舆论”并指使中国的亲日派起来反对；另一方面派代表参加4国银行团代表会议，进行讨价还价。

经过长期多次的争执，双方都作出一些让步，1920年5月11日，英、美、法、日4国代表达成协议，日本同意了美国组织新银行团的计划，但日本在东北取得的某些筑路权不列入银行团借款范围之内。10月15日，新4国银行团在美国成立。

新银行团的成立，只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暂时妥协，实际并未发生作用，随着力量对比状况的变化，美国又立即采取新的步骤——召开华盛顿会议，以进一步削弱和限制日本，控制中国。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参加者有美、英、法、日、意、中、荷、葡、比9国。中国代表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

中国代表在11月23日的会议上提出关税自主案。其后又相继提出山东问题、废止二十一条、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界地、取消各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除客邮、撤废无线电台、尊重中国战时中立等提案。其中山东问题仍是关键。所以，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来说，是巴黎和会的继续，五

四运动外争国权的继续。

会议讨论了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和太平洋、远东问题。美国在会议上联合英国迫使日本接受美、英、日海军吨位为 5 5 3 的比例。12 月 13 日，英、美、法、日 4 国又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条约》，互相保证其在太平洋岛屿属地不受侵犯。接着，英、美、法、日、意 5 国又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所有这些，达到了美国倡议这次会议的基本目的：限制各国海军军备，特别是约束日本海军力量的发展，以抑制其汹涌向外扩张的势头，并迫使英国同意英、美海军平等的原则，拆散英、日同盟；同时又协调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一致反苏和反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步伐。但是，由此也埋下了日本痛恨美英的种子，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轴心国反对同盟国的重要导火线。

会议通过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条约。（一）关于二十一条：由于其侵犯了美国在华利益，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表示可以为“局部之放弃”。（二）关于中国主权，会议通过“九国公约”，根据美国代表提出的四项原则，名义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实际上却规定中国必须承认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这无异使中国在“协定关税”之外，又增加了一条“协定工商业”的束缚，使中国主权受到进一步的破坏。（三）关于山东问题：美国为了使日本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采取了牺牲中国利益的立场，不在会议上讨论，而在会外由中日直接交涉，英美代表列席旁听。美国还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接受这种交涉方式和日本的条件。最后双方缔结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结果，日本虽允许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但条约规定中国需将此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及其它合法职业”。胶济铁路交还中国，又规定：“应于该铁路产业移交完竣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此项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实际上是中国赎买此铁路。而且，还规定在库券未偿清前，“中国政府应选一日本人为车务长，并选任一日本人为会计长”。——总之，据此条约，中国并未完全收回山东的主权，胶州湾只是由日本独占变为各帝国主义共管的商埠，胶济铁路则仍在日本控制之下。

华盛顿会议在承认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美国在海军吨位比例和中国问题上抑制日本的胜利，报了大战期间签订《蓝章——石井协定》时受辱的一箭之仇。但是，日本并不甘心这一次的屈就。会议之后，它就假手奉系加紧进行为其争夺地盘的斗争，美国则支持直系对抗，从而使直奉两系矛盾激化，终于发展为战争。

美国一直以它倡导的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为根据，把自己打扮成维护中国独立和主权的恩人。中国的反动当局和买办文人都这样感激美国。但是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九国公约”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用门户开放国际共管的网罗来宰制中国”，并“于英、美、日、法四国协约之外，更设九国协约的骗局，使中国自己入彀”。文章感叹中国政界多数舆论不能识破这种更加隐蔽的侵略方式，指出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中国，曾“惹起全国剧烈的长期的反抗”，现在“九国公约”却使全国人民“眼花意迷，入了醉乡，这是中国民族的大耻辱”。

三、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后，出现了直奉共掌北京政权的局面。1920年8月9日，靳云鹏复出，署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11日组织直奉联合内阁。接着，曹锟、徐世昌、张作霖、靳云鹏之间，为了实行分赃，签订了6点密约：（一）以后国家大计，须先征求曹、张同意而后施行；（二）鉴于张作霖已是东三省巡阅使，现委派曹为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使；在这两个区域内用人行政，政府予曹、张以方便，不能有所干涉；（三）总统地位，由曹、张竭力维持，曹汝霖、陆宗輿亦由曹、张负责保全其面子；（四）靳内阁如有为难之处，曹、张予以援助；（五）各省如有不服从中央命令，曹、张有劝告之责；（六）段祺瑞生命财产，曹、张予以保全。此外，关于曹、张二人之间势力问题，则采取平均分配办法。两军驻近畿之兵，各为一师，等等。

这种状况，既反映了直系取代皖系、英美在华势力的扩张和日本在华势力的削弱，又反映了奉系在中央势力的增长和日本不甘失败、将与英美重新争夺的决心。因此，这个直奉联合的局面是十分脆弱和短暂的，可以说，自皖系垮台之日起，就被新的争斗和破裂所代替，而且各种政治势力开始新的组合：亲日派奉皖又重新联合，对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

开始时，两派争斗各有所获。在扩张地盘的斗争中，直系占了优势。首先，直奉两系都想把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在安徽督军人选问题上，奉系保举张勋，直系推荐张文生。结果，1920年9月，北京政府发表张文生为安徽督军，又提升李纯为长江巡阅使。张作霖很不满。又关于江苏督军人选问题，1920年10月，李纯突然死亡后，奉系又荐张勋继任，受到直系和全国舆论的反对，又被直系齐燮元夺走。另外，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吴佩孚乘武昌兵变、王占元离鄂而取得两湖巡阅使职位。——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都纳入直系势力范围。这使奉系愤恨不已。然而，直系对奉系在直皖战争中参战人员甚少，却坐收渔人之利，抢夺大批皖系从日本运来的辎重财物，也强烈不满。

在中央的斗争，由于徐世昌和靳云鹏都站在奉系的一边，曹锟又满足了一己的利益而一切听从张作霖的，奉系却占了优势。如惩办皖系祸首问题：直系为了防止段祺瑞、徐树铮伺机再起，要求彻底铲除段派势力，尤其是段、徐和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及安福系。吴佩孚称他们“祸国殃民，实属罪大恶极”，要求逮捕严办，而且“总期除恶务尽，免致恢复”。但是徐世昌、靳云鹏顾念段祺瑞数十年的旧交，奉系则企图联皖反直，皆极力庇护他们，又以6点密约交易，争取了曹锟的支持，排除了吴佩孚的主张，把本来就不够的惩办祸首名单又大大削减，甚至段祺瑞和曹汝霖、陆宗輿也不列入，还让曹、张保全段祺瑞的生命财产和曹、陆的面子。

又如召开国民大会问题。8月1日，吴佩孚发表关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通电，主张大会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操纵、把持，由大会公决统一善后及制宪、选举等一切重大问题，并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此主张立即获得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的广泛响应。张作霖见吴如此笼

《申报》，1920年8月28日。

《申报》，1920年8月6日。

络人心，认为对己不利，就坚决反对。8月13日，他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说：“国民大会，非可为问题也。该会系吴子玉将军所主唱，然其背后，有某国人煽动操纵，吴氏不过为其傀儡耳。就中国现状观之，此事万属不可能。”徐世昌也洞悉吴佩孚倡导国民大会的目的之一在于否认他总统的合法性而加以反对。曹锟也表示：“国民程度过浅”，于是，国民大会主张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再如内阁问题。靳云鹏在许多问题上与徐世昌、张作霖站在一起，但由于他与皖系的旧隙，排斥内阁中与皖系有关的交通系官僚周自齐、叶恭绰。交通系就与奉、徐联合倒阁，困住内阁的财政。1921年12月18日，靳云鹏内阁终因财政困难而辞职时，徐即于24日应张作霖要求，任命旧交通系头子梁士诒为内阁总理，其阁员多为亲日派分子，说明经过1年多的较量，奉系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又在中枢上升。梁上台后，在奉系军阀操纵下，首先赦免那些曾经在形式上遭到直系通缉过的皖系祸首；其次是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致使当时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皆亲美派分子）进退维谷。第三是控制吴佩孚的军饷。所以，梁内阁遭到吴佩孚和直系亲英美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攻击。

于是，直奉冲突终于激化。吴佩孚与直系督军于1922年1月5日及19日，抓住借日款赎路问题，猛攻梁士诒卖国，并揭其为帝制祸首，要求“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或“请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士诒”，进行倒阁。

张作霖明白直系的倒阁，意在反奉，不得不亲自出马来为梁士诒内阁辩护。吴佩孚进而挑明：“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

4月14日开始，张作霖派奉军大举入关，驻天津及津浦线附近，以军粮城为大本营。19日发表通电，宣称“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为去“统一和平之障碍物”。同时广泛联系皖系散在各地的旧部，利用他们痛恨吴佩孚、妄图东山再起之心理，群起而攻击直系。

21日，吴佩孚联合直系各省督军，发表抨击奉张的通电，揭露“其借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惟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除暴安良，义无反顾。”²²日，曹锟也通电指责奉张在京津布兵，主张“统一当以和平为主干，万不可以武力为标准”。²³但双方已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双方各动用兵力12万多，实力相当。但奉军易地而战，劳师远征；直军以逸待劳，形势有利。

4月29日—5月3日，直奉之间，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分三路同时开火。战斗相当激烈，两军屡进屡退，伤亡无数。吴佩孚擅用正面固守、侧后迂回包抄战术。3日晚，他探知奉军炮火已消耗不少，乃以大队直军猛攻正面，另派精兵绕道前进，引兵至奉军后方，直扑芦沟桥，攻占丰台。奉军腹背受敌，连连后退。最后，西路军先锋部队（原冯国璋旧部，被奉军原师收编）第16师输诚，丢掉长辛店，引起奉军总崩溃。中路固安奉军获悉长辛店失守，西路军溃败，军心大乱，败逃天津。东路奉军颇有小胜，但因司令

²²《晨报》，1920年8月14日。

²³《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张学良受伤，又听西路军失败，也向山海关溃退。张作霖见各路俱败，大势已去，即下总退却令。

5月5日，徐世昌下令饬奉军退出关外。10日，免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省长各职，听候查办。但是，张作霖闻徐世昌命令后，却于5月12日通电独立，自任奉军总司令，宣言东北“自治”，并且重整旗鼓，在秦皇岛附近向直军反扑。此举引起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奉张提出警告。张被迫接受英、美为中间人的调停。直奉双方在英国一艘军舰上达成停战和议。20日，奉军全部出关。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而告终，总统徐世昌也随之不稳；奉军虽败，但此战是直军速战速决，奉军是速退自保，精锐未失。因此，政局继续动乱不安。

这次直奉战争以及北洋时期的历次军阀混战，给全国人民特别是战区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军阀备战，除了卖国向帝国主义借款之外，主要掠夺人民，征收苛捐杂税。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广大农民就成了横征暴敛的主要受害者。战区的人民更惨。他们不仅受苛捐杂税之苦，还要受复征之害（由于军阀交替频繁，原来的军阀征收了，新的军阀又要征收）。打仗时，除受到炮火毁坏之外，还要受兵差、兵祸之灾。老百姓畏兵如虎，逃亡他乡，以致田地荒芜；无力逃亡者只得坐以待毙。所以历次军阀混战，战区都百业凋敝，赤地千里，很长时期恢复不过来。这也是北洋时期历次和平运动高涨的主要原因，显然不彻底消灭封建军阀，一切和平的愿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四、南北政府对峙

在北方连续进行直皖、第一次直奉战争、政权更替的同时，南方桂系军阀与国民党及广东地方军阀的三角斗争，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1916年7月护国战争后，孙中山认为约法恢复，国会召集，“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因此在取消中华革命军的同时，也取消了中华革命党。考虑到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他准备恢复国民党名称，以增强其在国会的地位，扩充党务。但因不久发生张勋复辟和护法战争，此事不得不暂告停顿。在护法战争中，孙中山痛感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认识到西南军阀之不可靠，“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于是他决心整顿党务，把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

孙中山一生重视党的建设，而且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并举。这次改组国民党更是如此。他希望把国民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建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党，以肩负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重任。因此，他利用护法运动失败后居住在上海这一段较长的时间，闭户著书，精心撰写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篇著作，作为这次改组的指导思想。

《孙文学说》又称《心理建设》，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著名命题，阐述了“知”——革命理论与“行”——革命实践的辩证关系，更强调“行”的重要性。他反复告诫革命党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他自信地宣称：“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拿

此二著后与《民权初步》合并，称为《建国方略》，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他企图以这个学说解决当时革命党人中国革命不断失败而普遍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克服消极悲观情绪，为再建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屈不挠地奋斗。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设事业设计的宏伟蓝图。这表明孙中山并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而是要建立起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

经过长期的筹备，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正式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专心致力于党务和著述时，世界和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以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孙中山醉心于自己的事业中，没有一开始就跟上这个新潮流。他主要关注国内政局的发展，并在直皖战争爆发后，积极支持粤军打回广东，以图开创新的革命局面。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发动时，陆荣廷在龙州召开会议，决定以讨伐福州北军为名，进袭粤军，从而发生了第一次粤桂战争。8月11日，军政府发出进攻福建的动员令，以桂军沈鸿英为总司令，分三路进军。12日，在福建的粤军陈炯明决定回师广东，亦分兵三路迎战桂军。16日，战争开始。桂军在广东作恶多端，深为人民所痛恨。粤军思归，士气昂扬，在“粤人自救”的口号下，得到各地军民的积极支持，节节胜利，8月下旬就兵临惠州城下。地方军阀魏邦平、李福林乘机秘密移师广东，陈兵珠江，对桂系莫荣新实行“兵谏”。10月5日，岑春煊以“粤事险危”，特派章士钊北上与北京政府谈判，取消自主。10月22日，粤军攻占惠州后，岑春煊见大势已去，乃于23日通电宣布辞职。24日，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懌等以4总裁名义宣布撤销军政府。26日，莫荣新又宣布广东取消自主；接着，谭浩明也宣布广西取消自主。31日，北京政府即宣布南北“和平统一”，改选国会。这是直系多年来追求的目标。

但是，这只是北京政府的一厢情愿。因为桂系宣布取消广东自主和撤销军政府时，已被粤军逐出广州，继之又退出广东。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当即通电反对岑春煊、陆荣廷的南北议和，否认取消军政府及广东自主。11月25日，孙中山偕同唐绍仪、伍廷芳等由上海回广州重组军政府。29日，举行第一次政务会议，推举孙中山兼内务部长，唐绍仪、唐继尧、陈炯明等人分任财政、交通、陆军等各部部长，陈炯明还兼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如此，又形成南北两政府的对峙局面。

与此同时，四川继续进行西南军阀之间的混战，结果是，滇军和黔军被熊克武和刘存厚的联合川军逐出四川，接着刘存厚又被熊克武所逐，四川自治。滇军顾品珍回滇时，赶走唐继尧，宣布云南自治。黔军卢焘回黔时，推翻刘显世，宣布贵州自治。湖南则发生谭延闿、赵恒惕、程潜的三角斗争，结果，谭延闿离职，由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也实行湖南自治。

孙中山恢复广州军政府后，宣言继续护法。为此，他认为“必须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和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然后，为巩固北伐后方，

平定西南，孙中山首先发动讨桂战争。6月13日开始，粤军连战皆捷，促使桂系土崩瓦解。7月9日，沈鸿英被推为“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与陆荣廷脱离关系。柳州、桂林等地纷纷响应。陆见大势已去，16日通电下野。8月5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孙中山委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接着，孙中山设立大本营于桂林，积极准备北伐，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同时又联络皖系、奉系，形成孙、段、张反直三角同盟，计划于1922年春假道湖南，大举北伐。

但是，陈炯明企图割据广东自立为王，公开与孙中山对抗，勾结直系吴佩孚，反对北伐；联合湖南督军赵恒惕，阻止北伐军入湘；暗杀倾向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邓铿，终于迫使孙中山在3月份改变北伐计划，督师回粤。

孙中山一面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内务部长及粤军总司令职，留任陆军部长，以冀其悔悟；一面设大本营于韶关，改道江西北伐。4月6日，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分兵三路，进攻江西。6月13日，攻占赣州，打败直系军阀陈光远，直逼南昌。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时，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政变，以4000人占据石井兵工厂，包围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孙中山在宋庆龄和秘书林直勉等帮助下脱险，旋率永丰、永翔、楚豫等数舰海军，与叛军战斗50余日。因陈炯明得到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孙中山平叛失败。7月下旬，北伐军不得不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撤退。孙中山也回到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以失败而告终。

孙中山不屈不挠，于10月，将驻扎在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后又以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组成西路讨贼军。1923年初，通电讨陈。陈炯明迅速溃败，从广州退往惠州。2月，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再任陆海军大元帅，成立大元帅府。然后，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总结20多年革命经验，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积极准备改组国民党，走上了与共产党一致的救国新道路。

与此同时，北方的局势也发生了新变化。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打起他以前反对过的“武力统一”的旗号，计划把全国分为9个军区，编全国军队为40个师，把军政大权归中央，企图建立其独裁统治。为此，1922年5月15日，他指使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及陕督刘镇华等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位，要徐世昌与孙中山同时去职。在吴佩孚的强力逼迫下，徐世昌于6月2日被迫辞职；11日，黎元洪入京供职。吴佩孚企图利用黎作傀儡，建立一个由直系直接控制的“全国统一”的政府。

各省军阀则大唱“省自治”和“联省自治”，以抵制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保护自己的地盘。除了西南各省自治外，全国许多省纷纷宣布“自治”。全国掀起了一个不小的“自治”浪潮。

其实，“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都是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一种手段；不过是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所以，同一军阀，有时叫嚣“武力统一”，有时则宣布“联省自治”。

“统一”与“自治”的争斗，一时活跃了中国的政治气氛。各色代表人

物纷纷发表政见，指点江山，连宣布“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参加进来。他在《每周评论》被查封后，即筹办另一新刊物，宣传他的改良主义主张。几经周折，1922年5月7日，由他主编的《努力周刊》创刊。14日，即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上面签名的都是著名的文人学者，如蔡元培、陶知行、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丁文江等，共16人。《主张》的中心意思是提倡“好人”论政参政，建立一个“好政府”，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实行计划政治，并对南北统一、裁兵、裁官、改革选举制度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具体意见。这是胡适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个具体纲领，表现了胡适及其同伙在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中善良而天真的愿望。为了推销他们的改良主义主张，胡适竭力反对共产党的革命路线。10月1日，他在见到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后，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题为《国际的中国》文章，公开地直接攻击中共第一次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他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胡说“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希望和平与统一”，宣扬“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的这个主张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早已发表的“对中国时局的建议”如出一辙。该建议要中国用外资“建设两万英里铁路与两万英里马路”，为此，中国必须“制定宪法及国会选举法”，实行法治，以使国债在将来不被“否认”。可见，他们提倡的民主与法制，是为保障外国侵略者的在华利益服务的。所以，胡适亲自草拟“好人政府”的“政治计划”后，一面向芮恩施请示，一面送给吴佩孚征求意见，以为能博得他们的支持。

军阀、官僚、政客们不理睬胡适等书生的迂腐之见，依然我行我素，争权夺利，只是有时为欺骗民众和舆论，利用一下所谓“好人政府”的主张。

1922年6月黎元洪出任总统后，为巩固其地位，竭力主张“废督裁兵”，遭到军阀反对。他几次任命国务总理组阁，皆被吴佩孚推倒。9月，只得采取吴的主张，任命王宠惠为代理国务总理组阁。在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及汤尔和、罗文干入阁，组成了当时被称为“好人政府”的内阁。但是阁员中吴佩孚嫡系多居要职、实权则在吴佩孚手中，故又被称为“洛派内阁”（吴驻兵洛阳）。于是又遭曹锟保定派的忌恨。11月，当了军阀3个月工具的“好人内阁”又倒台，成为历史笑柄。直系分裂成两派。北洋军阀内部又多一层争斗。

1923年6月，曹锟抢先制造“第一次北京政变”，唆使冯玉祥、王怀庆率中级军官300人，到黎宅索饷，逼迫黎元洪出走天津。接着，曹锟以5000—10000余元一张选票，收买议员500余人，于10月6日，在大批军警严密监视下，当选为总统。翌日，吴佩孚一改反对先选总统初衷，电贺曹锟当选。国民党则发表宣言，谴责曹锟贿选总统。8日，孙中山明令讨伐曹锟，斥其贿选，是文明国家的“奇耻大辱”。

10月10日，曹锟正式就任总统，并颁布曹氏“宪法”，任命高凌霨代理国务总理。曹锟上台后，为了换取列强的支持和承认，又进行了一系列卖国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凡军阀都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并以此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问鼎中央政权。但是，如果说他们带兵打仗有的还有点能耐、搞阴谋诡计有的还颇为能干的话，一般只知鱼肉百姓，在治理国家方面，都一窍不通。然而，辛亥以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央政权却不断地落到这些军阀手里。于是他们

忘乎所以，又欲当总统，又想做皇帝。结果都像鸭子上了烤炉，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袁世凯是如此，曹锟亦是如此。

曹锟是一个昏聩粗鄙、愚昧无知的封建军阀，早就想效法其前辈，过一过国家元首的瘾。当皇帝是太不合时宜，袁世凯的败亡，就是明鉴。于是他就当总统。在他看来，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只不过是名称不同；只要登上一国之长的宝座，便可为所欲为。他的头脑中哪有一丝一毫的民主观念，更谈不到什么“总统是人民公仆”的思想了。所以，这种丑类当总统，完全是“沐猴而冠”，历史的嘲弄，也表明曹锟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

五、中共的革命纲领与策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巩固自己的基础，奠定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地位和力量，完全正确。但由于没有经验，在革命纲领和策略上，只是简单地模仿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拒绝与共产党以外的一切政党联系，表明它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懂得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能直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制订正确的革命纲领和策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共产国际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先后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和1922年1月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第一步，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以上精神传到中国以后，中共的思想路线开始逐步转变，在指导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就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打败奉系独掌北京政权的时局变化，第一次公开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正确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鲜明的政治主张：“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具体步骤是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在这样的基础上，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制订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大会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制订了为实现这个纲领所必须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与国民党及其它革新团体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政策。

《先驱》，第9号。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共“二大”的伟大历史意义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形式是组成各阶级的统一战线；革命目标是建立统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革命前景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马林考察中国革命状况并与国共两党领导人多次会谈后，在 1922 年初提出了共产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的建议。其理由是孙中山为挽救濒于死亡的国民党，只允许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作为新鲜血液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不同意党外联合。这个建议，起先遭到陈独秀等中共中央多数人的反对。因此，6 月中共对时局宣言及“二大”提出的“统一战线”，还是党外联合的思想。鉴于此，共产国际在认真研究了马林报告后作出决定，正式批准马林的建议，并派马林到中国来执行。

8 月，马林再次来到中国，并在他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会议热烈讨论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陈独秀、李大钊等多数人表示服从国际决定（张国焘等少数人坚持反对），并表决通过，但是条件是要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接受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随即加入国民党，并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

1923 年 1 月共产国际根据马林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6 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当时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革命运动的深入，都是有利的：共产党员作为“新鲜血液”挽救“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共产党则可以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到工农和全国人民的广阔天地中活动，迅速成长成为能够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大党。

“三大”的缺点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力争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其实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条件下，即使提出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要求，也不能实现。因为孙中山当时所以坚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同意两党党外联合，除了吸收“新鲜血液”之外，还认为共产党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凡革命者都应加入国民党，为三民主义奋斗，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政策本身，就为日后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丧失革命领导权埋下祸根。而在这种条件下要求共产党保持独立性和革命领导权，对于当时年幼的共产党，是不能胜任的。

中共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的确立，推动了国民党改组工作，从而加快了
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21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陈独秀致吴廷康（魏金斯基）的信（1922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 年）第 15 页。

六、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继续斗争，进行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但又不断失败。这些失败，一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势力的强大，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破坏。1922年孙中山由于他所倚重的陈炯明的叛变，而陷于深深的绝望和苦闷之中。在这样的境遇中，孙中山先后得到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

早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消息时，孙中山就产生了“想同列宁直接联系，交流革命经验”的想法，争取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为此，他在1918年春从广州给列宁拍去一个电报，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目标相同”，“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正受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和武装干涉，处境十分孤立和困难。因此，列宁得电后十分感动，立即响应，表示两国革命“正遇到一些空前未有的困难，呼吁共同斗争，互相支援”。从此，双方建立了联系。

1920年秋，魏金斯基在帮助陈独秀等人筹建中共时期，去孙中山寓所拜见了，就苏俄与孙中山建立关系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翌年11月，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又去桂林拜会了孙中山，双方长谈三次。马林向孙提出两项重要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武装的核心，从创办军官学校着手。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建议。1922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林来华指导青年团工作时，又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与孙中山会谈，就苏俄对孙中山的支持和孙中山正式承认苏维埃政权问题交换了意见。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和北伐事业相当困难，正多方争取援助。但是英国、美国都支持陈炯明叛变，乐意看到广州政府垮台。因此，在平叛失败被迫离开广州时，孙中山思想有了急剧的转变：对西方完全失望，转而与苏联结盟。患难识知己，孙中山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了真正的朋友。

1922年秋，列宁根据马林建议，派出越飞作为苏俄第一个公开的、正式的特命全权大使赴华。越飞在北京遭到北洋政府冷落之后，与孙中山及其代表廖仲恺进行了多次会谈，就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达成了一些原则意见。1923年1月，他们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至此，孙中山的联俄政策确立起来，并昭告世界。

1919年发生在北京波及到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给予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从中得到很大的启示，看到了自己依靠的海外华侨以外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看到了自己所借助的南方军阀势力以外真正革命的力量——工农民众的力量。从工农民众身上，孙中山获得了继续革命的勇气和力量。

以俄为师，依靠工农，最后归结到国民党改组，与共产党合作。除了列宁和共产国际之外，最早推动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的是李大钊。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与李大钊开始接触。李信仰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孙中山也发生了影响，孙把李大钊等引为“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孙中山的一个未公布的文件》，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1950年第19期。

苏联《国际生活》，1957年第11期。

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1922年8月中下旬，正是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而去的时候，李大钊来到他的身边。李根据中共“二大”精神，与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老同盟会员林祖涵一起，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接着，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

9月4日，孙中山召集各地国民党负责人会议，马林、陈独秀、张太雷也应邀出席。会议正式决定改组国民党。接着，孙中山指定有陈独秀参加的9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具体筹划改组工作。但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特别是联共政策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改组工作进展缓慢。孙中山坚决排除阻力，坚持正确方向。1923年8月，他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10月，又聘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党改组。11月12日，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宣言总结了国民党成立以来的成绩及失败教训，指出这次改组，要“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合民众所渴望”；在组织上，“务使上下沟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根据宣言精神，孙中山派廖仲恺等到上海组织临时中央上海执行部，派李大钊负责北京党务改组工作，并在广州重新登记党员。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65位代表出席。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等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孙中山在开幕词中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大会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原则，接受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

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少数人反对国共合作，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李大钊以北京代表名义发表《意见书》表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廖仲恺等支持李大钊的声明。结果大会否决了国民党党员不得跨党的提案。

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宣言》。宣言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以“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关于民权主义，以“三权分立”为原则，主张实行直接、普遍、革命的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国民党主张的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要以反对或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为划分能否享受国民自由及权利的标准。关于民生主义，其原则有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并特别指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在“国民党之政纲”中，明确规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中央及地方均权主义，及人民享有的各项自由权等。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宋庆龄选集》，第465页，中华书局版。

《革命文献》，第8辑，第1079—1080页，台北出版。

《革命文献》，第9辑，第1243页。

孙中山指出：此次宣言的通过，“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对内“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定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这个宣言，标志着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其政治原则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因此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

大会选举了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林祖涵等数名共产党员入选。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国民党经过这次改组，逐步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领导权则掌握在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手中。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就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在广东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6月16日正式开学，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等人参加了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黄埔军校的建设得到苏联的帮助，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后来这些制度又被推广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去。该校培养的学生，对后来的中国军事和政治，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该校也是蒋介石军事发迹的摇篮。以蒋为首的黄埔系军事团体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后来国民党新军阀军队的统一，不像北洋系旧军阀不断的分裂和混战。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恐慌。英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革命，一面支持陈炯明“反攻”广州，一面怂恿陈廉伯利用商团势力于1924年10月10日发动武装叛乱，企图配合陈炯明推翻广州政府。

在广州革命政权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孙中山在共产党支持下，于10月13日，断然命令参加北伐的全部警卫军和湘、粤军一部分，星夜兼程回师广州平叛，解散了广州商团，摧毁了商团武装，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以上这些表明，国民党改组后，与工农相结合，面目一新，生气勃勃，前途光明，与过去追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阀“护国”、“护法”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第五章 国民革命的发展

一、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及北洋军阀内部的争斗形势又有一些变化。

奉系张作霖被逐出关外之后，不甘失败，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整修军备，以谋再战，重返关内。1922年10月，张作霖以100万元购得日本存于海参崴的军械子弹。1923年2月，日本又把购自意大利的一大批军械转卖给张作霖；8月，日本又以价值368万元的军械2.2万件运入奉天省城，等等。为取得这些援助，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多项密约，出卖满洲的主权。此外，张作霖还向德意购买了大量飞机。于是，奉系很快把它的陆军发展到25万人，除了装备精良的步兵、骑兵之外，还有2个炮兵旅和1个重炮团，拥有300架飞机、4个大队的空军和21艘军舰约3.2万余吨位的海军。

在政治上，张作霖为了孤立和打击直系军阀，与南方孙中山和皖系段祺瑞组成反直三角同盟，还在直系内部打入一个楔子，与冯玉祥联络，付给冯军3000万元的军费，约定：“两军相遇，均应向天鸣枪。”冯玉祥因吴佩孚在“废督裁兵”时夺其河南地盘，对吴耿耿于怀，又长期受曹、吴克扣粮饷之害，早有异心。

日本帝国主义除了继续加紧扶助在东北整军备战的奉系军阀外，又扶助属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以对抗在美国势力控制下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争夺江苏这个富庶地区。

美英帝国主义决不让步，支持直系军阀对抗，英福公司与吴佩孚签订了道济借款150万英镑；美国公使也促成该国商人售予吴佩孚大批军火。美国人还为吴佩孚组织训练飞机队，向江苏齐燮元提供导淮借款。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如此争斗，愈演愈烈，终于导致江浙战争的爆发。

由于在曹锟贿选总统时，卢永祥曾通电不承认其总统地位，并停止与北京政府公文往来，一时间反直系政客和未参加贿选的议员麇集于杭州、上海。浙沪一带成了反直中心。于是，曹、吴策划了江苏齐燮元联合闽督周荫人、赣督蔡成勋、皖督马联甲4省攻击浙江卢永祥的计划。9月7日，北京政府借故“褫卢永祥、何丰林官勋，并免本兼各职，令齐燮元督部剿办”。江浙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由于浙卢兵力稍强，略占优势。但后来江齐后援多，江浙两省之战一变成为4省对1省之战。浙军孤立无援，一面是海，三面临敌，军力、粮饷都难接济。最后，卢永祥弃浙撤沪，仓皇出逃日本。10月13日战争即告结束。北京政府令齐燮元兼淞沪护军使，命孙传芳兼督理浙江军务和闽浙巡阅使。

在江浙战争进行时，北方第二次直奉战争也爆发了。1924年9月4日，为配合浙卢反直，奉张以粤、浙、奉同盟为由，向直系宣战，15日，组建6个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向关内开进。曹锟获悉急电吴佩孚入京商讨对策。9月12日，曹任命吴为“讨逆军”总司令，布置3个军赴前线御敌，后有10路援军，还有海军和空军助战。

马炳南：《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这次战争规模空前，双方各投入兵力约 25 万人，而且海陆军一起参战。9 月 17 日起，战斗首先在热河打响，双方主力则对峙于山海关和九门口一带。吴佩孚又用计谋，暗调渤海舰队，攻击葫芦岛；以骑兵绕海道登营口，奇袭沈阳。但今次奉军经过整训，皆换以少壮将校，已非昔比，识破吴佩孚惯用包抄奇袭战术。直系舰队两次拔锚出发，均被奉军击回。战至 10 月中旬，在南方江齐胜利之际，北方直系却纷纷败退。即使在 10 月 14 日吴佩孚亲自到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扭转局势。

任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的冯玉祥见直军处境危险，便与同样遭曹、吴排挤的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驱曹。10 月 19 日，冯玉祥率部由前线古北口回师，23 日进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接管北京全城防务，实行“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等于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直军顿时大乱。奉军乘胜前进，夺取秦皇岛、山海关。吴佩孚从海道逃回天津，电请苏、鄂直系军阀部队来援。但因山西阎锡山部助奉，占领石家庄；山东督军段祺瑞的门生郑士琦宣布独立，援吴直军皆被阻隔。

正当吴佩孚待援无望时，冯玉祥又在 24 日逼迫曹锟下令前敌停战，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25 日，冯又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议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请段祺瑞出面改组政府，维持时局。同时，冯军又改称国民军，配合奉军，继续夹攻直军。

11 月 5 日，吴佩孚率残部 3000 人离津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吴在途经南京、武汉时，曾组织反扑。但直系各督见风转舵，改图联省自保。吴佩孚见大势已去，乃避居河南信阳鸡公山。

吴佩孚在反皖系斗争时，曾大谈军人的天职是“救国救民”，甚至高唱“劳工神圣”，被视为“爱国进步将领”；一时笼络人心，为打败皖系和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捞取不少政治资本。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一度与他联络。但是，曾几何时，他就落得如此下场。

其实，任何一个在野的军阀为了夺取中央政权，都要借助于革命党和人民力量。为此，他们都要耍手腕，披伪装，说好话，以欺骗民众，提高其威望。可是，一朝权在手，他们就很快凶相毕露，向革命派和人民杀来。这也是中国近代军阀的一大特点，也是他们的统治都短命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袁世凯、吴佩孚到蒋介石莫不如此。1923 年“二七惨案”就彻底撕破了吴佩孚这个反动军阀的伪装，暴露了他那副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工人运动虽然遭到挫折，吴佩孚也因此大失人心。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基本因素。这是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国民会议运动与政治经济危局

冯玉祥发动政变、迫使曹锟下令解除吴佩孚职务后，颜惠庆内阁也随之倒台。1924 年 10 月 31 日，曹锟又被迫批准建立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由黄郛代理国务总理。11 月 2 日，曹锟宣告退位，黄郛摄行总统职务。至此，直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终于结束。

少数保皇党人乘机活动，企图复辟。冯玉祥决定把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11 月 4 日，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从即日起永远废

除皇帝专号；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约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等。5日，溥仪及其妻妾和少数太监宫女即移居什刹海“醇王府”。就此，清除了民国成立后延续13年的“中国之帝号”。冯玉祥的这一正当行动，得到了孙中山和全国人民的赞同，帝国主义却感到悲伤。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11月29日，诱惑溥仪逃避日本公使馆再由日人护送至天津，寓居日租界张园，以图日后利用。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倒直政变后，倾向革命，将其部改名为国民军3个军，分别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然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但是，这时北京政权仍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尤其是奉系的挤压、未受损失的长江流域直系势力随时可能北上的威胁，使冯玉祥惶惶不安。为维持北京政权，冯又联络皖系军阀，争取山东督理郑士琦截阻直系援军北上，遂决定请段祺瑞出山。于是，11月22日段入京；翌日，黄郛摄阁总辞职；次日，临时执政府成立，段任临时总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段祺瑞政府虽是冯、奉、皖联合政府，实际上奉皖很快联合压迫国民军，迫使冯玉祥于段上台之日通电下野。而且由于直系倒台，孙、奉、段反直三角同盟瓦解，孙中山的革命影响也被排斥。段祺瑞在就职时公开表示“外崇国信”，遵守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与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对抗。另外奉皖正与国民军酝酿新的冲突。直系也不甘失败，准备反扑。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11月发表了《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为了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反动本质，宣传共产党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早日结束分裂局面，争取国家和平统一，重提1年前的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由于旧国会已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中共提议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它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开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同时还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13项最低限度要求。

这时孙中山也认识到恢复旧国会已无意义，接受国民会议主张，决定抱病北上。他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明确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政治立场，阐明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北上途中，他又一再重申其北上目的：在于“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中共更是布置各地组织大力推动。于是一场对内要求成立民主共和政权、结束军阀统治；对外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1924年11、12月间，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地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拥护中共和孙中山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北上，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会员达几十万人。

对此，帝国主义十分恐惧和仇恨，极力加以破坏。他们警告段祺瑞政府要严格遵守一切不平等条约，扬言不准孙中山在上海、天津等租界地居留，等等。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帝国主义承认，公开表示答应帝国主义要求：“孙文所唱之废除不平等条约，偏于理想，余殊不赞同。”并以1月之内召集由

奉、冯反吴时有约，奉军不入关。冯这次因不满奉军违约入关而通电下野。

《申报》，1924年12月9日。

军阀控制的各省区代表“善后会议”，对抗国民会议。孙中山到天津后，愤怒斥责段祺瑞卖国，并因此使病情更为恶化。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医治无效，孙中山逝于北京。国民会议运动也低落下去。孙中山临终时，留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嘱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实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将革命进行到底，表现了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伟大品质。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局也更加混乱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打破了旧的政治格局，北洋各派又为争夺地盘互相攻击，进行混战。首先是奉、齐战争。段祺瑞上台后，为报江浙战败之仇，12月11日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3省巡阅使和江苏督办之职。张作霖为谋扩张势力于长江流域，乘机派张宗昌率兵南下，争夺直系的地盘，从1925年1月17日起，与齐燮元部大战于丹阳、无锡之间。齐军不敌，从苏州败退上海。齐将部队交孙传芳接收后流亡日本。2月3日，在吴光新调停下，孙传芳和张宗昌签订和平条约：浙军退松江，奉军退昆山，上海永不驻兵，兵工厂交上海总商会保管。奉齐战争告一段落。

接着又发生奉、浙战争。由于奉系不满意以上安排，又利用段祺瑞排挤直系势力的机会，促使北京政府于4月24日任命张宗昌为鲁督，杨宇霆为苏督，姜登选为皖督，使奉系势力大大扩张。孙传芳即联合齐燮元旧部及鄂、皖、赣3省直系军阀，于10月15日自称浙、闽、皖、赣、苏5省联军总司令，分5路北进，夺取上海、南京、蚌埠等地，与奉军大战于徐州。11月7日，奉军败退山东。孙传芳占领徐州后，实现了对5省的割据。直系则乘奉浙战争机会，巩固了长江流域的地盘。

奉浙战争结束后，奉系内部矛盾激化，又导致奉、冯之战。奉系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都得到了地盘，惟独郭松龄受杨宇霆排挤，一无所得。郭即与冯玉祥联合反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果实被奉系抢去，处处受到压迫，早有反奉之心。11月22日，郭松龄公开与奉系决裂，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23日，又在滦州宣布独立，发兵突然攻奉，并大败奉军。冯玉祥军之宋哲元部乘机占领热河。郭军得此支援，迅速推进，12月中旬抵达营口，威胁沈阳。日本帝国主义见自己的走狗又面临倒台危险，出兵相救，于12月23日，巨流河一战，打败郭军。郭松龄兵败被杀。

郭奉在关外大战时，关内冯玉祥在12月初向李景林发起全面进攻，24日占领天津。李败走山东投靠张宗昌。至此，国民军取得了直隶、河南省的地盘。而奉系保有东北、热河和山东的地盘。

军阀长期割据和混战，表明中国政治危机之严重，同时，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也陷入了绝境。

首先是战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以及大战结束后不久资本主义世界性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1921），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带有空前的疯狂性，使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很快失去继续发展的条件，陷入愈益严重的危机和长期萧条之中。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倾销商品，使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从1919年的6.4亿两（海关两）增至1926年的11.3亿两，而且很快变为入超。1920年入超即已超过1913、1914年的水平。1921年入超高达3亿两以上。中国商品市场即被外国商品垄断，这将严重窒息中国的民族工业。

杨端六、侯原培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

同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额也直线上升，到 1930 年，其在华投资总额已达 19.77 亿元，比 1914 年增长 2 倍。其中增长速度最高的是金融业。1914 年在中国的外国银行资本额不过 600 万元，主要是英国的，但到 1930 年，竟陡增至 3 亿元以上，增长了 52.8 倍。主要是战后美国、特别是日本银行突然增加的结果。对企业的投资也增长 2 至 4 倍，而且普及到工业、矿业、贸易和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部门，并在这些部门成为支配力量和垄断势力，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如此严重的经济压迫，已经使中国的民族经济喘不过气来，又遭到长期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之害：所属各省交通运输经常阻断，国内币制、度量衡不统一，各地厘金制度繁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终于使中国民族工业纷纷破产。以中国最发达的纺织业为例，大战以来的兴盛，1921 年下半年即告结束。1920 年每生产一包纱，可获利 65 元左右，1921 年则要亏本 20 元以上。由此，迫使中国纱厂不得不减工停产，以至破产。从 1923—1931 年，停工、出售、被债权人接管的中国纱厂，达 52 家，其中 16 家被外资兼并。纺织工业是这样，中国其它民族工业破败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中能够接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掠夺，也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使广大农民受到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大量土地进一步集中到少数军阀、官僚、地主手中。据统计：到 1927 年，全国土地占有状况，无地和少地（10 亩以下）的农民占农村人口 75%，仅占有土地 6%；而占农村人口 14%的地主富农，却占土地 81%。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一般实物地租占收获量 50%以上，有的高达 80—90%。而货币地租的增加更是惊人。1922—1927 年，江苏 18 个县市的货币地租增加了 40.9%。雪上加霜的是，北洋军阀政府随着军费的增长（1926 年 1.5 亿元增至 1927 年 7 亿元），又加紧对人民搜刮，苛捐杂税增加至 6 至 7 倍，还预征田租：1926 年河南预征至 1929 年，陕西预征至 1931 年，四川的梓潼更预征至 1957 年。此外，农民还要受高利贷的剥削。农村的借债户，一般占农村人口 50—70%。放债者为地主、商人、官僚、军阀，收取年利一般高达 70—80%，也有超过 100%的。再加上经常发生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大批大批地破产，往往是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不少农民“逼上梁山”，走上劫富济贫、反抗统治者的道路。

因此，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积极性，像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燎原烈火。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终于很快到来了。

三、五卅运动与全国革命高潮

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北京政变给北洋军阀统治以沉重打击，为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为了迎接和推动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 1925 年 1 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着重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如何进行群众工作的问题，为此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明确了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和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

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大会的缺点是没有明确规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武装斗争也未予重视，因此使大会的主要精神——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未能落实。

大会以后，中共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便利用当时有利的客观形势和国民党组织积极工作，首先使工人运动很快走出“二七”以后的低谷，推向高潮。1925年初，上海、青岛、北京、奉天等10几个大中城市，纷纷出现罢工事件，罢工普及到各个行业。其中以上海、青岛两地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规模最大。

当时，日本在华纱厂共有41家，工人8.8万余人，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两地。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中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工作时间每班为12小时，工资低微，最少者仅每日一角，生活难以温饱，而且没有保障。2月初，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工人因为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而罢工。由于厂方不答应罢工工人条件，在中共领导下，罢工很快波及到日本在上海的其它21家纱厂，并且粉碎了日本资本家各种破坏手段，取得胜利。

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直接影响下，4月19日，青岛日本纱厂也爆发1万多人的大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用武力阻止工人组织工会，开除、逮捕和毒刑拷打工会干部。中共运用上海经验进行领导，并派上海纱厂工人代表到青岛支援。罢工在5月10日取得局部胜利后结束。

为了进一步加强正在走向高潮的工人运动的引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5月1日在广州召开。大会贯彻中共“四大”精神，强调了工人阶级取得中国民族革命“领导地位”与“提携广大农民群众”的重要性，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林伟民（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邓中夏（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25人为总工会执行委员。

在工人斗争的激励下，青年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4月8日，福州学生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行请愿运动，结果遭到美帝国主义唆使下的福建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造成全国震惊的惨案。接着，上海日本帝国主义也向工人反攻倒算，他们违约任意开除工会代表，克扣工资，镇压工人的反抗，甚至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青岛也发生了同样的惨案。

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在28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斗争，并扩大为全民族的斗争。因为当时上海的所谓纳税外人会正准备要在6月2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提案，不仅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也直接危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此，中共提出了反对工部局提案的口号。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余人，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工人、抓捕学生的罪行，并宣传反对工部局提案。巡捕即连续逮捕学生100余名，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近万人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帝国主义捕头竟下令向群众开排枪射击，造成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为抗议这一暴行，中共中央领导上海总工会、学生联合会、马路商界联合会，并推动总商会，在6月1日，实行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全市20万工人、5万余学生和大部分商人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74页。

《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2页。

参加。帝国主义出动所有在沪各种武装部队继续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进行残酷镇压，上海成了血腥世界。其中英、美刽子手成了急先锋。各国还紧急派来 26 艘军舰，妄图直攻北京，再次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决不屈服，坚持斗争。但是，当帝国主义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来利诱，又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给相威胁时，中国大资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先后动摇，退出了斗争。资产阶级不堪长期罢市所受的损失，6 月 26 日，各商店开市了。青年学生也因放暑假纷纷回家，减弱了运动的力量。为了防止工人阶级孤军奋战遭受不必要的打击，中共中央及时改变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8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各厂逐步复工。

五卅惨案震动全国，北京、汉口、长沙、哈尔滨等全国 30 多个城市，以及一些边远省份、县镇的工人、学生、农民、商人、市民等，都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等斗争，海外各地侨胞和留学生也积极支援国内反帝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 6 月 19 日开始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由全国总工会派遣的苏兆征和邓中夏发动领导。仅香港罢工人数即达 25 万人。罢工委员会组织了 2000 多人的纠察队，封锁了香港和广州沙面租界，截留出口粮食，扣缉私货，断绝其肉食蔬菜供应，市内垃圾粪便堆积街道，香港成了“臭港”。英帝国主义受到沉重打击。这次省港大罢工，由于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坚持了 1 年零 4 个月，在中国及世界工运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最后终于迫使各帝国主义承认在海关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作为结束罢工的费用。

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同时，农民运动也逐步发展。国共合作后，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自 1924 年 7 月起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办，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特别是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人数最多，达 300 余人。毛泽东亲自给学员讲课。《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内容之一。学员来自全国各地 10 几个省份。结业后，就作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各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到 1926 年 1 月，广东地区已有农会组织达 37 个县，会员达 62 万人，农民自卫军 3 万人。河南地区到 1926 年 4 月，农会会员达 27 万人，农民自卫军 10 万人。湖南地区到 1926 年 11 月，农会组织已在 50 余县建立，会员达 136 万余人。其它省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进展。这年 4 月 20 日，在中共领导下，于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总结交流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强调农民参加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指出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从而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南方工农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北洋军阀的罪恶统治和连年混战，使北方人民直接受到更大的灾难和痛苦。1925 年 11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一次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的反奉倒段运动。11 月 10 日，趁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召开关税会议的时候，全国学生总会和广州外交代表团等团体组织了一个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示威运动，并发出通电，要求段祺瑞下野。月底，北京工界、学界发起国民大示威，提出“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政府”、“建设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时称“首都革命”。上海、南京、开封、长沙、汉口等地都举行示威运动响应。

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统一。陈炯明的部队在 1922 年冬退踞广东东江一带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支持

下，继续与广州政府为敌，于1924年冬和1925年9月两次进犯广州。在此期间，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举行叛乱；盘踞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夹击广州；国民党右派刺杀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左派旗帜廖仲恺。广东局势一度十分危急。国民党及1925年7月1日成立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省港罢工工人、海陆丰农民支持下，以黄埔军校生为主力，粉碎了这些进攻。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以及杨希闵、刘震寰、邓本殷的部队，重新改编了被右派控制的粤军，并将许崇智和胡汉民逐出广东。从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但是，频繁而激烈的斗争，也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除了广东军阀之外，一贯反对三大政策的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老右派也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1925年11月23日他们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议案，并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设立伪中央党部。

此外，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又形成国民党新右派。他们为了通过北伐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拼命在革命阵营内争夺革命领导权。为此，他们一方面宣传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竭力压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只许其成为实现他们野心可以利用的助力（为此，他们不同意老右派露骨的反苏反共政策），不许其成为障碍；另一方面，他们也排挤国民党其它各派的势力。在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开广东之后，他们把矛头对准汪精卫。

1926年3月20日，国民党新右派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以欺骗手段诱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将军舰开进黄埔，然后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住所，拘捕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

5月15日，蒋介石等又抛出“党务整理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总数的1/3，不得担任中央机关部长，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等。

当时，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导在华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魏金斯基及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老右派取坚决斗争，并使他们“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的策略，但对以“左派”或“中派”面目出现的新右派失去警惕，企图利用他们的反帝反军阀的积极性来推进革命，为了使他们留在革命阵营内，而对他们取妥协让步的策略，答应了蒋介石的上述要求。共产党人从黄埔军校、国民革命第一军和国民党中央部长中被完全排挤出来。当时直接控制着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汪精卫受到孤立，被迫去职出洋。蒋介石则乘机夺得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掌握了党、政、军大权，使革命发展潜伏下危机。

四、国民革命军胜利北伐

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革命又打败奉系李景林，占据政治中心直隶以后，英、日帝国主义预感到革命发展对他们的严重威胁，便联合起来，促使奉、

直军阀化敌为友，结成反对国民军的联合战线。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在他们的压迫下，通电“引退”，赴俄游历，京畿附近冯军，由鹿钟麟统率。11日，张作霖通电出兵，向关内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军，公然于3月12日派2艘日舰护送4艘奉舰驶入大沽口，并攻击大沽炮台。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反向中国提出抗议，并纠集辛丑条约签字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津、沽一切防务。17日，各帝国主义20多艘军舰集中于大沽口，进行威胁。中国人民无比愤慨。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5000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会后赴国务院请愿，在国务院东辕门遭军警枪击，当场被打死47人，伤200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此案，在全国激起反帝反段政府的怒潮。

段祺瑞遭人民激烈反对，又见国民军大势已去，企图联合奉军，苟延残喘，被鹿钟麟发觉。4月9日，鹿率部包围执政府，推倒段祺瑞。但是，国民军在奉直联军围攻下也难以立足，激战4个月后败退西北。北方各省又入奉直之手。与此同时，吴佩孚在南方又联合孙传芳和川、贵、滇西南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并首先出兵湖南。广东国民政府为打破此围攻计划，在6月初，派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第八军各一部援湘，而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6月5日攻占攸县，首战告捷，揭开北伐战争序幕。

7月1日，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北伐的任务和目的是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表明虽然当时国共合作已经潜伏着很大的危机，但北伐仍是一次革命战争，而且比以往孙中山进行的北伐，具有更大的正义性、革命性和彻底性。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挥戈东南，消灭孙传芳，夺取长江下游，再徐图北进。7月上旬，在第四、第七两军主力的援助下，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下，率军直扑两湖，12日就进占长沙，8月下旬开入湖北战场。

吴佩孚见湘战失利，惊惶失措，8月25日星夜赶到武汉，决定死守鄂南门户汀泗桥待援，挽回败局。26日，第四军与吴佩孚亲率的主力部队近万人，在汀泗桥鏖战竟日，翌日，吴军伤亡重大，败退贺胜桥。30日，第四军乘胜追击，反复冲锋肉搏数小时，敌人节节败退。吴佩孚在贺胜桥附近“手刃退却之军官十余名”，督军顽抗。在叶挺独立团勇猛冲锋下，吴军终于全线崩溃。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两湖战事结束，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主力。

9月6日起，北伐军第一、二、三、六军开辟东南战场，向江西进攻。各军军长分别为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程潜。19日第六军即攻克南昌。但因第一军王柏龄部抗命后退，使孙传芳循南浔铁路从容增援，陷程潜孤军于重围，被迫撤出后，两军为争夺南昌，激战数日，双方伤亡重大，不分胜负。蒋介石不得不调第四军入赣助战，李宗仁为军长的第七军也加入，始将孙传芳主力围歼于南浔路南段。孙军残部败退南京。11月8日北伐军再克南昌。

北伐军取胜江西后，第一军即开辟福建战场。由于福建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北伐军未经激烈战斗，即连克数城。12月18日，何应钦“兵不血刃”进驻福州，占领了福建全省。

1927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长江下游浙、皖、苏推进。东路军以第一军为主，向浙江、上海挺进；中路军以第三、六、七军为主，进取安徽、江苏；西路军以第四、八军为主，北取河南。

浙江方面，由于浙江省长夏超起义及浙军内部周凤岐、陈仪倒戈，东路军长驱直入，2月18日进占杭州，旋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在中共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在3月22日打败张宗昌的直鲁军，然后迎接北伐军进驻上海。中路军由于敌军起义，也未经重大战斗，夺取了皖南和苏南地区，进驻南京。至此，孙传芳彻底溃败，逃往苏北。

西南各省军阀，这时期继续扩张和混战，结果有的拥护国民政府，有的独立自固，政局也逐渐明朗化。最大的唐继尧滇系军阀集团，曾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北京政权垮台和广东革命根据地动乱不稳之机，几次出兵，或北上企图夺取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地区，或东征，谋图广西和广东，但均被打败。滇系军阀向外扩张受挫，引起内部分化，再加上北线胜利的影响，唐继尧手下实力派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在1927年发动“二·六政变”，推翻了唐继尧长达数年的个人军事独裁，代之以胡、龙、张的新军阀统治。7月1日，云南正式易帜，投靠蒋介石南京政府。

桂系军阀陆荣廷，由于长期与直系军阀勾结，也遭到内部非议，1924年6月被李宗仁、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推倒。1925年2月，李宗仁又打败沈鸿英，控制广西全境，然后加入广州国民革命，被编为第七军。

川系军阀最为混杂，刘湘、杨森、熊克武、但懋辛、邓锡侯、赖心辉，彼此争雄，互相火并，直到1926年5月，刘湘联合杨森，才将袁祖铭黔军驱逐出境。8月，杨森以吴佩孚为靠山，任四川省长职，刘湘则主张四川“自治”。待吴佩孚被北伐军赶出两湖后，刘湘即向武汉国民政府表示“保境安民”。

袁祖铭黔系军阀被逐出四川后投靠国民政府，参加北伐。但这支黔军入湘后肆意扩充，与唐生智发生冲突，结果，袁于1927年1月30日被唐诱杀，所部瓦解，仅有王天培部由鄂西东下参加了北伐战争。

南方基本上被国民政府统一的时候，北方政局也发生了新变化。冯玉祥见北伐胜利进军，于1926年9月15日归国，17日率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党，旋经甘肃、陕西，进入豫西，引起北京政府的恐慌。1926年4月，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鲁军入京。表面上奉、直再度执政，实权控制在奉系手中。

在军事上，奉系也企图借孙传芳、吴佩孚抵抗北伐军失败之机，吞并其地盘。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抵抗北伐的战争。他派奉军一路西进，以援吴为名，吞食直系老巢直隶全省，开入河南；又派奉鲁军沿津浦路大举南下，以援助孙传芳为名，接收孙军败撤的阵地。因此，自两湖败退河南的吴佩孚残部和东南败退下来的孙传芳残部，在北伐军和奉军的夹击下，纷纷通电反吴、反孙，投靠北伐军，被冯玉祥和蒋介石收编。

这样，在北方，能对抗北伐军的，唯有一支奉军了。

奉系如此侵吞北方地盘的同时，对人民实施更加残暴的统治，以镇压北方民众响应北线的革命运动。《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先后以“宣传赤化”被杀害。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又不顾国际公法，派军警包围袭击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机构，捕去大使馆工作人员及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数十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被绞杀。奉系军阀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五、工农运动迅猛发展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及其以后全国工农反帝反军阀群众运动的发展，推动并支援了北伐战争，同时、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又推动工农运动迅猛发展。

首先起来的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这3省及河南省为工作重点。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湖南农运基础较好。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到1927年1月，农会会员从40万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1000万人以上。1926年12月1日，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应邀出席指导。大会通过33个决议案，包括减租减息、禁止高利贷、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取消团防、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1927年2月和3月，江西和湖北也先后召开本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5月，湘、鄂、赣3省农会会员分别达到518万、250万、38万人。此外，福建、浙江、河南等地农民运动也有一定发展。

农民组织起来同时，便在广大农村掀起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他们打落地主威风，审判并处死个别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改造或夺取乡村政权；建立农民武装梭镖队，打击或瓦解或中立地主武装——团防局、保卫团、民团；普遍开展减租减息，租额一般减轻5—30%，取缔高利贷，平抑谷价，打击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食，批判宗法制度和神权、族权、夫权思想，破除迷信，禁止赌博、吸鸦片，打击土匪流氓，开办学校，兴修水利等，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农民运动沉重打击了我国农村顽固的封建势力，成就了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未曾实现的大业。

但是，面对农村大革命形势，革命阵营甚至共产党领导机关内部产生了右倾恐慌情绪。他们指责农民运动“过火”，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运动，打击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对此，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3月间，他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应相反。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它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可以说，后来导致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国特有的革命道路，最早是从这里发端的。

在农村出现大革命形势的同时，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

北伐出师时，中共中央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许多特派员到全国各地，依靠当地组织大力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给北伐军带路、侦察、救伤员、做后勤等，同时开展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争取改善自己的权利。北伐前，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有工会 76 个，工人 10 万余人；湖北仅有 13 个工会；江西更弱。北伐军进占这 3 省后，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工团联合会，分别改组为全省总工会，并先后在长沙和武汉召开本省的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到 1927 年初，湖南工会会员达到 40 万人，湖北 30 万人。江西南昌也成立了总工会，有 73 个工会，会员 4 万人。

工人组织的扩大和斗争的展开，震动了帝国主义。1926 年 11 月 26 日，武汉的外国领事团正式向武汉革命政府“抗议”，要求取缔工人运动。同时，帝国主义还支持直系和奉系对抗北伐战争，干涉中国革命。为此，在打垮直系以后，中共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规模广大的反英反奉运动。12 月 26 日，武汉市民 20 万人召开反英大会，严重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并号召全国“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会后，继续扩大反英反奉运动。1927 年 1 月 3 日，当宣传员在汉口英租界附近演讲时，大批英国水兵登陆，驱逐听讲群众，并用刺刀刺死中国海员 1 人，刺伤群众数十人。

帝国主义暴行激起反抗怒潮。5 日，在共产党人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市民数十万人举行示威大会，会后驱逐了英国巡捕，占领了英租界。武汉革命政府也接受群众的决议派军队进驻租界。

见汉口群众势大，英帝国主义在九江进行报复。1 月 6 日，英水兵在九江登陆，镇压英资太古、怡和两码头工人的罢工，开枪打死工人 1 名，打伤数人；英舰还开炮示威。九江工人即英勇抗击，也占领了英租界，并由武汉政府派员接收。

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把全国反英运动推向高潮。在中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下，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在 1927 年 2 月 19 日和 20 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案、浔案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据点——租界，具有伟大的意义。而在 3 月，上海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解放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上海，更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早在 1926 年 10 月，孙传芳前线吃紧，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与国民党合作，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但由于这次起义“以商界为主体”，无产阶级把领导权主动交给了资产阶级，再加上敌强我弱，准备不足，情报错误等原因，23 日仓促起事，第二天就失败。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 10 余人牺牲，百余人被捕。

1927 年 2 月，北伐军进兵浙江，18 日到达嘉兴。上海市总工会即发出总同盟罢工令。到 22 日，罢工工人达 36 万人。但是，罢工以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到 21 日才下达起义令，失去了有利时机，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发动起来，起义就被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血腥镇压了。

3 月 20 日，北伐军占领了上海附近龙华。中共根据过去教训，21 日晨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及第三次武装起义令。正午 12 时，总同盟罢工实现，随即转入起义。市民也都积极助战。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终于在 22 日胜利。接着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在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

过半数。

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其规模和业绩都是史无前例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在政策和策略上也有“左”的倾向，打击面过宽，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同盟者工商业者和北伐军军官家属问题。当时北伐军军官多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由于直接领导工农运动的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没有经验，对运动中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不能及时纠正，正确引导；而对国民党新右派蓄意叛变革命、镇压工农运动的阴谋又失去警惕，也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来保护工农运动，因此，当北伐军转向反革命而反扑过来时，工农运动也很快失败了。

六、从“四·一二”到“七·一五”

革命汹涌向前，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不甘心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就竭力反抗，破坏革命。由于北伐首先打击直系军阀并向英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推进，所以英帝国主义就成为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

1926年6—8月，英国轮船依恃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长江支流川江横行肇事多起。9月5日，英国军舰又借故炮轰万县城，造成死伤中国军民千余人的“万县惨案”。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军舰还直接炮击北伐军，又让吴佩孚的军舰挂上英国国旗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1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国就联合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来对抗中国革命。英、美、法、日等各国，纷纷从本国或海外军事基地向中国大量增兵。一时间，在上海和长江一带，很快集结起军舰63艘，军队2万余人，造成帝国主义各国共同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局势，并在3月24日制造了“南京惨案”。当时北伐军占领南京，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对北伐军和平民猛烈轰击，造成严重伤亡。

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中国革命同时，又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手段，利用所谓“温和派”打击革命派。英国和美国公开宣布准备“以最宽大的精神”与中国谈判新约，企图以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上的虚伪让步来利诱中国资产阶级。日本则竭力拉拢蒋介石与奉系军阀妥协，共同成为其侵华工具。帝国主义还推动上海及江浙财阀大买办资产阶级，积极勾结蒋介石反叛革命。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曾衔英、美之命到南昌与蒋介石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借给他6000万元，以反共灭共为条件。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找到了反革命的靠山，终于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

北伐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追求独裁、破坏革命的行为，进行了一定的斗争。1926年11月，由于革命发展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议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新的革命中心武汉。但是，在北伐军打下南昌后，蒋介石为了把持国民政府，违抗中央决定，坚持迁都南昌——他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并扣留路经南昌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为此，武汉在2月9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谴责并粉碎了蒋介石的企图，决议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3月7日，又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中央实行主席团制，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职务；又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重大决定须经军事委员会会议决，企图以此削弱蒋介石的军权，还有“迎汪抑蒋”等措施。

但是，斯大林对当时中国革命的严重危机估计不足，对蒋介石仍抱有有很大的幻想，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继续北伐，最后再把他像一只被榨干了的柠檬抛弃掉。为此，他指示国际代表罗易、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继续团结蒋介石。因此，上述对蒋介石的斗争是软弱无力、不得要领的，未能制止蒋介石滑向反革命。

1927年2月11日和3月7日，蒋介石发表两篇演说，打出了反共的旗号。他诬称“共产党员压迫国民党员”，宣称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未始不可联合。同时，他就从南昌开始，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革命的暴行：3月6日，制造了赣州惨案，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接着江西10多个县接连发生惨案，严重摧残江西工人运动，并在3月16日武力解散了坚持革命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九江市党部，镇压了九江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3月20日，蒋介石到达安庆，23日，又制造安庆惨案。就这样，蒋介石一路杀到上海。

鉴于上海工人起义后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工人纠察队还有大量武装，群众的革命情绪激昂，蒋介石对上海革命的镇压采取了两面派手段。

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后即假惺惺地对总工会代表保证不让工人纠察队缴械，甚至还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给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表示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敬意”，以麻痹人们的警惕性；另一方面，他又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帝国主义见蒋一路镇压工农运动，也对他建立了信任，赞扬他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准许其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上海的侵略军帮助他镇压革命。接着，蒋介石下令将受到革命影响而对工人纠察队友好的上海驻军薛岳部队调走，另调新近投靠过来的浙系军阀周凤岐部担任“沪上防务”，充当屠杀革命的刽子手。同时，他又与上海的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勾结，组织流氓成立“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来对抗上海总工会，等等。

在进行以上种种反革命部署同时，4月1—3日，蒋介石与两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古应芬、吴稚晖、张静江等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全面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方案。他们诬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分共”，驱逐苏联顾问，镇压工农武装。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也参加了密谈。为与蒋介石集团争夺权力，在分共的时机与方式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分共事项；会前可由他通知陈独秀，让各地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仍执行共产国际拉住蒋介石的路线。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会谈，并发表联合宣言，批驳共产党“想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谰言；但又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事事开诚协商进行。共产党想以此束缚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手脚，结果反而使上海工人阶级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晨，从租界内出动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向各区的工人纠

《字林西报》，1927年4月2日。

《美国外交文件》1927年卷2，第94页。

察队驻地进攻；大批反革命军队紧跟其后，诡称“调解”、“保护”，收缴纠察队枪械。准备不足的工人纠察队，有的受骗被缴了械，有的虽起来反抗，但寡不敌众，很快被击败，死伤 300 余人。

上海总工会立即宣布总罢工，进行反抗，13 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一致议决：收回工人武装，严惩祸首，抚恤烈士家属等。午后 1 时，群众到宝山路 26 军 2 师司令部请愿游行时，反动军队向徒手群众射击，并用机关枪扫射。工人当场牺牲百人以上，伤者无数。当时正值大雨，血流成河。下午，白崇禧指派军队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和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并继续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大批优秀的革命志士先后英勇牺牲。14 日晚，上海总工会举行紧急会议，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忍痛复工。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以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这个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除了得到这些阶级支持之外，由于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也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到南京政府中任职，对其寄予幻想。

与此同时，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等，都相继“清党”，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表示拥护南京政府。

革命人民则愤怒声讨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的罪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 月 17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开除其党籍，免其本兼各职，并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捕蒋治罪。22 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 39 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四一二政变”后，大革命局部失败，国内政局发生很大变化，在全国形成 3 个政权的对峙的局面：北方仍为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所控制；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成为新军阀反革命政府，它以江浙为中心控制了南方原属国民政府的大部分省份；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仍是革命政府，并含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但其控制地区缩小为湘鄂赣 3 省。虽然蒋奉之间，以及他们与四川、广东、广西地方军阀之间有矛盾，但他们反对武汉革命政府是一致的，所以形成了对武汉地区的四面包围。

武汉革命阵营内部的情况也很复杂。汪、陈发表联合宣言后，就赴武汉。中共中央亦随之迁汉。“四一二”后，汪精卫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控制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湘鄂赣 3 省革命群众运动还在高潮之中，就打出反蒋旗号，以国民党“左派领袖”面目出现，取得了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他口头上高喊革命，暗地里却准备分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的背叛错误地视为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而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误以为这样的“联盟”，天然是“可靠”的，因此进一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汪精卫等百般迁就，对他们可能的背叛没有警惕。

在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奉军对武汉的威胁较大，北方又有冯玉祥国民军配合，武汉政府决定对东南西三面取守势，于 4 月 19 日举行第二期北伐。6

月1日，与国民军合作，占领了郑州、开封，把奉军逐出河南。

但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包围封锁，英、美、日帝国主义又关闭了在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运走煤油燃料，使武汉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原料、燃料短缺，生产萎缩，工厂停工，工人失业。5月中旬，武汉地区100多家商店几乎全部关闭，失业工人达12万人。国民政府为维持财政支出和筹措北伐军费，不得不发行大量纸币救急，结果又引起通货膨胀，影响人民生活。在这种情势下，工农群众和国民政府必然与同样陷入困境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更不要说工人运动在革命高潮中受“左”的影响，提出更高的经济要求了。于是，资产阶级首先动摇起来，与逃到城市里来的地主豪绅联合起来，大喊“工农运动过火”，要求取缔。这表明资产阶级已由害怕而开始脱离革命。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就急剧右转，加紧压制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

革命陷入严重危机，出路何在？共产党内发生深入还是广出的争论。毛泽东等主张深入湘鄂赣3省的土地革命，依靠农民巩固革命根据地，再图发展；鲍罗廷、陈独秀等则主张先北伐，扩大革命，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又认为“东南是帝国主义的基地”，反动势力强大，革命应向西北发展，依靠“可靠的盟友”冯玉祥，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4月27日—5月10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寻找挽救革命的途径。大会否定了鲍、陈向西北逃跑的路线，决议北伐与土地革命同时进行，并决定只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的土地，但又规定这个决定须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执行。于是便成为一纸空文。“五大”在关键时刻，对挽救革命没有找到任何出路，只得坐待整个革命局势继续恶化。

国民党的动摇和共产党的软弱，导致右派军人的叛乱不断发生。5月13日，驻防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乘第2期北伐，武汉空虚，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发表反共通电，打到武汉附近，形势十分危急。叛军虽被叶挺所率第11军第24师及中央独立师粉碎，但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三四千人。5月21日，第36军33团团长沙克祥，又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封闭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国民党省党部等一切革命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在长沙和附近各县屠杀上万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又在江西将该军全部政治工作人员和方志敏等共产党人164名“遣送出境”，命工会、农会停止活动。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惨杀革命干部。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密切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5月18—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八次全会，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给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紧急指示”。6月1日，指示到达中国，要求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分子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2万名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这个指示，虽然有些内容脱离实际，有些内容已为时过晚，却表示了企图挽救革命的强烈愿望，有些内容也不是绝对不可取，若参照执行，相机行事，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可能有所补益；纵然不能挽救革命失败，也能减小革命力量的损失。

但是，陈独秀、鲍罗廷和国际代表罗易认为，在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的条件下，“紧急指示”无法执行。罗易竟天真地把指示给汪精卫看，希望汪精卫国民党去执行。

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见“紧急指示”后大惊失色，认为这是共产党耍

阴谋推翻国民党，便加速了反共步伐。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张发奎等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汪精卫等原计划企图联冯而反共反蒋，争夺国民党领导权。但是，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既不帮助鲍罗廷实现“西北路线”，也不满足汪精卫等的如意算盘。他主张宁汉合作，分共反奉。会议按冯玉祥的意图，决定由冯指导陕、甘、豫等省党务，北伐军撤回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期北伐以伤亡1.4万多人的巨大代价（共产党员最多的第4军和第11军伤亡最大），击溃了奉军的主力，只是为冯玉祥争得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

6月20—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举行徐州会议，会商实行“分共”与宁汉合作问题，并作出一系列决议。会后，冯玉祥致电武汉，攻击武汉地区工农运动“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补救之方唯有“设法使鲍（罗廷）归国”，宁汉“通力而合作”；催促汪、谭等“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武汉随即实行“分共”。

6月29日，第35军军长何健在汪精卫等指使下，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时在湖南“清乡”，解散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中共中央于7月13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反对革命、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声明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拒绝与汪精卫等同流合污，撤离武汉。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随后对武汉地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力量强大得多，再加上国民党的叛变和共产党还在幼年，缺乏经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留下的成果，也是极其伟大的。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的北伐战争，和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工农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为即将推翻北洋政府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深入人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受到一次相当普遍的革命洗礼。而被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荡涤过的南方数省，成为未来更高阶段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摇篮。最伟大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这次大革命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取代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并且，经过这次革命的艰苦锻炼和严峻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面的经验，从而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吴稚晖全宗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革命文献》第16辑，第91页。

第六章 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

一、科学与玄学之争

20年代，随着政治领域阶级斗争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思潮与流派也发生了复杂激烈的斗争。1923年，就发生了一场以张君勱、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吴稚晖、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之争，亦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这年2月，张君勱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宣扬神秘的唯心主义，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为理论的方法和因果律所支配，虽可以说明自然现象，但管不着人类的精神现象，因为人生观与科学是不相容的。人生观的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出于良心之自动”、“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所以人生观问题只能由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张君勱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只是偷运了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梁启超游欧回国后也宣布“科学破产”，认为是科学给人类带来欧洲大战那样的灾难。他写《人生观与科学》一文支持张君勱，说：“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那么，玄学又怎样来解决人生观问题呢？张、梁推崇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提倡内心修养，并视其为救世的最大法宝。梁启超甚至呼吁青年们用中国的封建文化去挽救大洋彼岸物质文明的破产。

其实，这种以东方文明挽救西方文明的观点，早在1921年初就有人明确提出、系统论述过。陈嘉异在《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中指出，东方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不备的优点，即：（一）它是“独立的、创造的”。（二）它具有“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优越性”，而且能够用精神生活统御物质生活，把二者溶为一体。（三）它“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而尤以民族精神为其根柢，最能运用发展”。（四）它“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之优越性，而尤以世界主义为其归宿，故东方文化则可为将来之世界文化”。——显然，这种思想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攻倒算。

由此可见，玄学派既是腐朽的、公开的唯心主义者，又是封建复古主义者。

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认为“科学万能”，反对张君勱的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论说。他表示“决不能相信有超物质上的精神”。但是，丁又受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强调“直接感觉”、“直接经验”，物质以此而转移：“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存的觉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的感触。假如我们的觉官的组织是另外一样的，我们的所谓物质一定也随之而变。”又说：“我们所晓得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是这种概念和推论。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实际上他是把心理现象混同或还原成物理现象了。同时，他又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

《科学与人生观》，上册，第1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本节引文，除另有注释外，皆引自该书，不一一加注。

《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

而存疑，并自号“存疑的唯心论”，这实际上又是向玄学派投降了，如陈独秀指出的：“张君劢就有理由说：‘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

化学家任鸿隽、心理学家唐钺以及吴稚晖等人支持丁文江，写文鼓吹“科学万能”，强调“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而林宰平、张东荪等人则为张君劢辩护。一时相当热烈。

胡适不仅写文章《孙行者与张君劢》支持丁文江，反对玄学派，而且在论战结束，给《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序言时，提出了他自己的所谓新的人生观。他认为不单物质的原因是客观的，“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他用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知识，列出10条标准，来说明他的人生观，结论是：人在自然界中“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因果的大法则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乍看起来，胡适似乎十分崇拜科学，信奉唯物主义，其实他宣扬的是马赫的经验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因为他强调“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就是说，凡是未经怀疑、未经求证的一切都是假的，毫无价值的，不存在的。所以他的人生观也是存疑主义和只相信感觉、经验、实验的唯心论的产物。

应该说，丁文江、胡适用经验论哲学来否定先验论哲学，注重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有其合理之处，但他们由此又走向极端，不承认物质不依赖于任何精神而独立地存在着，也不相信人生和世界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感觉、经验和二百年科学实验的结果而转移的。而且，他们在论述“思想知识等事”的作用时，也拒绝说明与物质力量相比，何者为第一性，并与玄学派一样，无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使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作用，成为心物二元论者。

与玄学派无批判地歌颂东方文明，主张复古不同，“科学”派无批判地推崇西方文明，散布民族虚无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他们从“科学万能”的信念出发，认为科学是超越的，它作为西方文化的结晶，可以移植到中国来，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这种主张本身是反科学的，不可能实现的，但其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态度，应该肯定。

由此看到，科玄之争的真正目标不在于学理本身，而在于推销各自对中国救亡图存的方案，带有严重的功利主义色彩。

科玄之争虽是两个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争，却引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

1923年11月，陈独秀在与胡适同时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指出了丁文江、胡适在驳斥玄学派时的弱点，揭露了他们“存疑唯心论”、“心物二元论”的本质；阐述了人的意志与物质生活的关系，指出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律所支配；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只有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内，才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因此结论是：“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但陈独秀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者，他没有详加论证物质的原因如何成为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的根本原因，也未正确说明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精神力量的反作用，企图调和实验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要胡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结果被胡适钻了空

子，胡适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宣称“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

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是瞿秋白。他在这年12月发表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系统论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自由与必然、社会与个性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与伪科学派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帮助克服了陈独秀在论争中的弱点。他的主要观点是：

（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共同点又有相异点：同者，都有规律，即有因果关系可寻；异者，自然界只有盲目的无意识的各种力量的互相影响，而人类社会则是由有意志的人所组成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意志可以违背社会发展的共同因果律，相反，个人和群众的动机、意志，不论是显而易见的或隐匿难见的，都不是历史现象的最后原因。历史现象的最后原因，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发展”，各种动机“亦是经济原因的必然结果”。

（二）人的意志为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所制约，同时又对社会起一定的作用，这才是人创造历史的完整的表述。“自由”是对“必然”的科学认识，是对因果律的尊重。因此，人欲求得自由，必须探悉这些公律，利用这些公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而达到某种目的。如此，才开始从“必然世界”进于“自由世界”。

（三）说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在于经济，但并不否认社会的心理现象及个性，然而只有它能解释心理及个性的原因。个性一开始便是社会的，在阶级社会里便是阶级的。

瞿秋白的文章，实际是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总结。这场论战的展开及其结局，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入。

另外，从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角度看，这次讨论是近代中国最富哲学色彩的一场论战，实际上是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流派在中国的一次遭遇战，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主要思想派别有关哲学、科学、东西文化的第一次全面论战。虽然论战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科学”派明显占了优势。如张东荪所承认的：支持玄学的文章比支持“科学”的少得多。而且，“科学”派力图用科学改造传统价值体系的积极态度，符合当时中国思想界救亡图存的进步的历史潮流，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意味着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占了上风，中国哲学意识未来形态的自主选择，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结果，突破了传统直观把握的宇宙观的垄断地位，中国实证哲学流派形成，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开端。

但是，由于中国科学和理论水平的低下，再加上急于探求救时之方、治国之道功利主义倾向的影响，这次论战又有诸多不足。

首先，双方以至陈独秀和瞿秋白对科学的理解都是以经典物理学为基础的，视科学为一种客观、独立、不含任何价值判断、没有丝毫个人色彩、有一绝对客观标准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证明，科学理论也无法摆脱人的主观因素，任何科学理论都打上了人的主体意识烙印。由于这个认识前提条件的缺陷，玄学派把人生观排斥于科学之外，而“科学”派则被迫把心理现象“物化”，还原成物理现象，牵强附会、软弱无力地论证所谓“科学万能”。就是说对科学认识的这个缺陷，挑起了这

次论战，又限制了这次论战。反过来，这次论战又加强了这个缺陷，人们对科学的教条、僵硬、独断的理解，对渴望科学精神的中国现代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而上学，好走极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许多曲折。

其次，论战双方都只是在复述、应用西方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并无进一步的发展提高；功利主义的影响，又使讨论过于贴近现实，涉猎虽多，却浅尝辄止，语焉不详，缺乏哲学的严谨和深度。这是造成中国哲学理论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同时，还伴随着进行文化侵略，基督教在这个活动中就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批传教士随着帝国主义的军队和枪炮来到中国，其中除个别人如 1914—1937 年任上海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主编的美国传教士乐灵生、1925 年到四川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等，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帝爱国运动之外，绝大多数传教士与当地军阀势力勾结，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利用宗教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1922 年，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就已达达到相当的规模。全国有市会 40 处，会员 53800 多人；校会 200 处，会员 24100 多人；外籍干事 95 人，华籍干事 87 人。女青年会也有市会 12 处，会员近 3000 人；校会 80 多处，会员近 6000 人；外籍干事 87 人，华籍干事 51 人。为了鼓励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总部在瑞典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 1922 年 4 月 4 日至 8 日中国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 11 届大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创始人及同盟主席、国际宣教协会会长穆德（美国人），依仗美国基督教北美协会的经济支持，亲自来华主持大会。

大会进行时，700 多位代表参加，其中外国有 32 个国家 146 名代表。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到会场保护。4 月 7 日总统曹锟还接见了全体代表。

早在 3 月份，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上海各校学生首先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宣言指出，现代社会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和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

接着，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北京、天津、广州、武汉等近 20 个城市的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召开大会，发表通电和文章，进行反基督教运动。

运动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以科学反对宗教迷信。当时不少人由此出发加入运动，因此许多地方组织了“非宗教大同盟”，既反基督教，又不专指基督教；（二）批判基督教不仅反科学，而且是帝国主义用以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反基督教学生同盟武汉支部”在代电中指出：4 月 4 日的清华基督教同盟大会，“其目的纯是诱惑青年，扩充教徒势力，为资本主义作护符来侵略我国”。

《先驱》，第 4 号。

《民国日报》，1922 年 4 月 4 日。

一些进步团体也支持非基督教运动。少年同志会有一通电指出：本会以“改革社会黑暗，增进个人道德为宗旨，对于妨碍科学进步，组成贵族势力，保持阶级制度，阻止个性发展的宗教，早已认为国敌，因此对于非宗非基之呼声，极表赞同”。中华心理学会也发表反对“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断定他们的谬误；以历史的观察，审定他们的罪恶；以心理的分析，揭破他们的虚伪不德，不能不出于极端的反对。”

非基督教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攻击和破坏。他们攻击非基运动像义和团一样是“盲目排外”，是“过激党”的“过激行动”。上海日文报纸挑拨非基运动“含有过激意味及反英美色彩”。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当即发表声明：“吾等惟知以科学的立场，建设合理之社会。基督教既不能与科学并立，近复日思扩张其势力，故吾人不得不结合，以反抗之。”张闻天等发表文章，着重揭露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罪恶，捍卫了非基运动的正义性，指出基督教使得中国人做帝国主义的奴隶、资本家的奴隶而“同时心悦诚服”。沈雁冰批驳“现在的教会只有一个躯壳，不值得反对”的说法，指出：“现在的教会和资本主义及军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地方随处可见。”

教会攻击非基运动干涉信仰自由。一些学者如周作人、钱玄同等也附和。蔡元培、陈独秀等予以批驳，指出信仰自由应包括信教与反教两方面的自由。陈独秀说：青年反基督教是“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谈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

有些地方的教会势力勾结反动当局来镇压非基督教运动。安徽芜湖警察厅长徐绍修和省长许世英曾出告示取缔芜湖非基同盟，结果引起芜湖及全国非基同盟的更大反抗。

这次非基督教运动由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失去了对象，而慢慢消沉下去，成立的反基督教同盟也先后涣散了，但反基督教的呼声却深入群众，社会上常有反基督教的活动。如1923年11月，基督教青年会在广州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青年》即发表文章揭露：“青年会是英美帝国主义用以麻木软化中国青年的最有效力的文化宣传机关。藉游戏运动以投青年之所好。它收容着几十万青年学生在它的旗下施以基督教与迷信外人的教育。……青年会又在各地提倡平民教育，麻醉一般平民的知觉，使他们只知贱视自己，敬畏外人与上帝。青年会又是英美帝国主义笼络青年们，给他们德育知育体育的知识，使他们忘却干预本国政治的机关。这种机关的势力一步一步的扩张，即是青年们逐渐被他们征服，荼毒，泯没性灵，丧失爱国意识。”

到1924年，由于中国革命高涨，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加紧干涉，文化侵略也进一步升级。他们一方面利用在华出版的报纸如《字林西报》、《大陆

《民国日报》，1922年4月2日。

《民国日报》，1922年4月5日。

《非宗教运动杂谭》《民国日报》，1922年4月6日。

《沈雁冰致张闻天的信》，《民国日报》，1922年4月7日。

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民国日报》，1922年4月7日。

《中国青年》，第5期，1923年11月17日出版。

报》、《京津泰晤士报》等，大肆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则加以辩护和美化。另一方面，利用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猖狂攻击中国革命，阻止中国人民参加革命。在教会学校中，情况尤其严重。

据 1925 年 1 月统计，中国共有新旧教徒 100 万人，青年会员 8 万人。教会学校：小学 5928 所，学生 160991 人；中学 962 所，学生 256900 人；大学 38 所，学生 11790 人。这种学校既不向中国政府注册，也不许中国教育团过问，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在这些学校中，学生没有任何自由。如鸦片战争后法国在广州办的天主教圣心学校，新思潮之书籍杂志，禁不许读；而新约旧约，所谓圣经者，则强迫背诵，禁拒怀疑辩论，抗言立即斥逐，学生往来书信，必须拆阅，稍涉嫌疑，即遭没收；同学聚谈疑为集会，教员演讲视若雠仇，等等。

更严重的是，学校当局不许中国学生爱国；他们肆意污辱中国学生而不许有任何反抗。例如，广州圣三一校长（英国人）对学生说：“英国人所办的学校，有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情，任听你们中国人自由”；又如，1924 年 5 月 7 日是国耻日，各地学生这天都出校游行，借以唤起国民。圣心学校学生慑于校长平日淫威，未敢要求出校游行，只求校内开一演讲会。岂料（法国人）校长对学生说：“中国的命运早已在华府会议中决定了，无庸你们去救，你们也是救不来的。”岭南大学的美国人对学生说：“此是教会学校，不许谈论国事”；“学生会有政治意味，不准组织。”广西梧州建道学校的美国人宣称：“我系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中国学生来往，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的来爱我们的美国。”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也对学生说：“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

鉴于此，中国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非基督教运动又高涨起来。早在 5 月份，一些因要求纪念国耻日而受压迫最深的学校如广州的圣三一、圣心，徐州的培心，南京的明德，福州的协和等校，就开展了反对学校当局的斗争。他们要求“在国内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教育，争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结果，学校当局开除了不少教师和学生。爱国师生不堪忍受，“与其为奴，勿宁失学”，纷纷离校。广州圣三一学生还组成退学团，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斗争，最后决定在教育权没有收回、目的未达以前脱离圣三一，暂且走进执信学校。退学学生为进一步斗争，组织了“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以与国际帝国主义抗争，争取更多的人为收回教育权而斗争。

7 月，该组织通电《向导》周刊社及全国各教会学校青年、各工会团体、文化机关和各报馆，呼吁国人同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指出：“世界国际帝国主义者之于我国也，经济侵略之不足，而继之以文化侵略，故我国六七十年来创巨痛深，殆难言宣，物质精神同遭打击。”《向导》在刊登此通电时，还发表了陈独秀写的“时事评论”《收回教育权》，给予支持。

同月，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全国响应。8 月中旬上海也成立反帝同盟筹备会，并再次成立非基督教同盟，掀起反基督教运动，与北京反帝同盟互相呼应，非基同盟选出高尔柏、张秋人等组成委员会，决定以《民国

《向导》，第 72 期。

《向导》，第 74 期。

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出版“非基督教特刊”。中共中央、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也积极配合，使国人知道基督教之害，指导和联络各地的运动。

在此前后，湖南、湖北、直隶、广东等十几个省都先后成立了非基督教的组织，相继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并互通声气，协力进行。

张秋人在回顾 1922 年以来的“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怒潮”时，揭露帝国主义是如何利用基督教的作用的：“第一用它麻醉本国的工人阶级，使信社会之贫富出于神意，不应以阶级之争破坏现社会制度；第二用它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使信它们的兵舰军队是为了赠送上帝的福音，赠送教育及一切文化而来，不为抢劫金钱而来，使对他们永远感恩戴德，不思反抗。”他指出：“第二个作用，正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特殊反对基督教之最大理由。”

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在宣言中提出“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并拟出 4 条具体办法。所有这些，为这次非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指明了目标。

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积极组织更多的学生加入运动。恽代英在 1925 年写的《打倒教会教育》一文中指出：“有一百万的民众，二十余万的青年，正在帝国主义者遣派来的一般牧师、神父、教会教育家手中，受他们的蛊惑劫制。我们天天怕色彩，怕党派；然而帝国主义者已经借教堂、学校、青年会的帮助，在中国造成这样一个大的党派了。我们愿意永远一盘散沙地屈服于他们这种党派行动之下么？还是我们应当为反对他们而即刻组织起来？”这年 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罪恶及其本质，号召全国青年一致奋起，声讨帝国主义。

这个群众性的反基督教文化侵略运动，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全国广泛而深入地发展。不仅在各大中城市，而且在延安那样的偏远地区，也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反抗斗争。1925 年内，教会学校的学生，纷纷要求退学，并有一些教徒退出了教会。基督教青年会的衰落尤其明显。1927 年全国青年会会员人数只及 1920 年的 60%，参加青年会活动的人也日益减少，许多校会不得不停止活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报刊，不断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报纸的反动宣传，借以提高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1924 年 12 月出版的《向导》周报，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及其它殖民地国家的反动宣传之后，指出：“殖民地的民众应当信任自己的力量，应当起来用武装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天天喊什么赤化，过激主义，……无非是要达到自己侵略的目的，但是这种伎俩毕竟欺骗不了中国人民！”

这次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斗争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几个教徒退出教会、学生退出教会学校，主要在于宣传科学人生观，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是一次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教育，这对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动的缺点是缺乏具体分析。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及其它慈善事业，有些是出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进行了某些罪恶活动，多数

《中国青年》，第 60 期。

《向导》，第 96 期。

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这一点没有得到必要的肯定。

三、反对封建复古文化的斗争

进入 20 年代后，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奋进。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季刊、《前锋》和团中央刊物《先驱》、《中国青年》，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知识，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及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中共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及印刷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也出版发行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此外，中共还开办了平民女学、上海大学等，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所有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政治军事战线上革命斗争的开展。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一方面用逮捕、查封、没收等暴力手段，严厉镇压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用封建买办文化来阻止、破坏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鉴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在五四时期败下阵来，他们变换手法，网罗了一批留过学、出过洋的人，以“精通西学”的学者名流身份大搞复古文化，维护旧势力的统治。“甲寅派”、“学衡派”和学术上的训诂考据派就应运而生了。

曾经留学英国的章士钊及其主编的《甲寅》杂志，在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以后他即转到反动势力一边，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1925 年 4 月，章士钊以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并把停办多年的《甲寅》月刊复刊为周刊，随后，向革命派进攻，竭力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他一方面用教育行政手段，严厉压制并镇压学生运动，迫害在教育部任职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问题上，章士钊极力提倡“国故”，尊孔，读经，恢复科举制度。规定小学从四年级起，每周读经 1 小时。他与封建势力相勾结，以《甲寅》周刊为主要阵地，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章士钊重新发表了 1923 年写的《评新文化运动》及《评新文学运动》等文，诬蔑新文化运动会造成“精神大乱，郁郁侘傺之象充塞天下”；攻击白话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蜡”，“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

在政治上，章士钊的复古思想集中表现在他根据段祺瑞 1925 年 2 月 23 日所发“以农立国”电文而提出的“农村立国说”中。此说企求建立一个“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农业国家，以治工业国产生的劳资阶级斗争尖锐等种种弊端；鼓吹用古代“圣人”所创礼教与文化，以约束人们放纵的“兽性”。章士钊认为我国古代先哲已经看到了工业化的坏处，故创“礼教”与“农化”以为预防。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他极力排斥新文化运动。他断言文化只有东洋与西洋或古与今之别，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的“共通文化”，以此反对学习西方文明，更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他说：“愚殊自信，共产之说，在中国实无意义。”“愚自始不信吾国有共产党，有之，亦冒利无耻，为某使驱遣，乘便扰乱社会安宁秩序，售其奸私者尔。”其根据是，吾以农国之故，欧洲工党规模毫不适用；“马

孤桐：《农治翼》，《甲寅》，第 1 卷第 5 号；《农国辨》，《甲寅》第 1 卷第 26 号。

《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第 1 卷第 30 号。

《曳白记》，《甲寅》，第 1 卷第 35 号。

克思之学说，尤格格不入”

由此可见，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说”，是一种逃避阶级斗争，反对革命运动，企图把中国倒退到封建小农社会，以维持军阀割据和巩固北洋政府统治的反动复古思想。

学衡派是以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胡先骕和吴宓等人为骨干的复古派。他们在整理国学和研究中西古代文化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他们以1922年1月创办的《学衡》杂志为阵地，鼓吹“孔教救国说”，而摒斥日、美、甘地与列宁等一切学说。他们认为“中国之最大病根”，在于“不行孔教”，“挽救今日政治腐败之法，厥维提倡已视为腐旧而以节制为元素之旧道德”。“孔教救国”的具体办法是：要有千百个“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通力合作，先对中西文化作“彻底研究”，进而“发扬光大”与“改造”固有文化，并“吸取他人文化”，然后“宣导国人，蔚为风气”。为此，他们极力排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马克思的办法是针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病症”的，拿来解决中国的“病症”，是“南辕北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增加困难。

学衡派不同于甲寅派的一个特点是，对现实的一切持否定态度。他们集中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同时也反对胡适的新文学主张与实践。

针对这股复古逆流，《向导》、《中国青年》及时发表文章，指出章士钊等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当了帝国主义的走卒。他们“是受了欧化影响而带有一点资产阶级性的”封建士大夫，号召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向着复古逆流“分头迎击，一致进攻”。当时中共的主要精力放在紧张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工农运动上，因此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主要由鲁迅等人来进行。

鲁迅从中国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出发，批判了“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封建复古派的谬论，阐述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的改革不可缓了”，“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因此，“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对章士钊提倡读经，鲁迅指出“读经”与“救国”绝不相干。而且，他们“是明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其用意无非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凭着官力将一切新生的力量压下去。”

此外，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化运动>》，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等，也给予甲寅派

《论业治》，《甲寅》，第1卷第38号。

柳诒征：《论中国近世之病根》，《学衡》第3期。

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学衡》第4期。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

《忽然想到》、《北京通信》、《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集。

《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3集第97页。

以有力的回击。

对于学衡派，《中国青年》发表文章指出，胡先骕辈虽是留学生出身，但他们的思想却封建主义居多：开口不离仲尼，闭口不离先王。我们可以称他是“穿西装或者还是挂十字架的‘康有为’”。鲁迅则称他们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他列举出他们的文字不通之处，加以嘲笑说：“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甲寅派和学衡派统属于“东方文化派”，主张用“东方精神文明”来挽救中国，由此出发，他们提出了上述“农村立国说”和“孔教救国说”。瞿秋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如哲学、道德、风俗、艺术、科学等一切社会心理，都是经济发展之结果：“一方面是经济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发展的助缘。”批判他们所谓“欲望、肉欲为社会现象的根本”，是“文明产生和进步的原动力”的说法，是一种“唯心论”；揭穿他们宣扬的“东方文化”，一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二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三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其中宗法社会的伦理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

胡适是崇拜西方文明、否定东方文明的，但在这股复古逆流中，他也打出“整理国故”的旗号，提倡用考据的方法，从训诂、校勘、辨伪方面去整理古书，用实验主义去“改造国故”，为其“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服务。胡适说：“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里，他提倡“整理国故”的目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从研究具体问题中输入实验主义的学理，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导青年脱离革命实际。为此，他为清华大学同学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有经、史、子、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近 200 部古书，其中包括“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等 20 多部佛教书。

由于胡适等人的提倡，当时学术界整理国故，疑古辨伪的风气盛行。顾颉刚把史学界发表的古史辨伪文章汇编印成《古史辨》，从而产生了“古史辨派”。该派在考证古史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由于他们立足于唯心史观，许多结论是错误的，是为他们的历史虚无主义服务的。胡适否定《诗经》以外的古文献，否定东周以上关于古史的有关记载和传说；顾颉刚认为尧、舜、禹等人他们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

文化界一开始就对“整理国故”的反动作用进行抨击。鲁迅在 1924 年 1

《什么是文化工作》，《中国青年》第 142 期。

《估学衡》，《鲁迅全集》，第 1 集第 449、450 页。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 1 期。

《介绍我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 1 集（下）。

《古史辨》，第 1 册第 35 页。

月所做的一篇讲演里说：“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郭沫若也指出：“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质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份内事”，“但他却不能大锣大鼓四处宣传：‘你们快来学我，快来学我’！”

经过以上批判，这股复古逆流很快得到遏制，更被大革命掀起的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所淹没。《甲寅》在1927年4月被迫停刊。他们鼓吹的所谓“农村立国说”、“孔教救国说”也随着大革命的发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倒台而彻底破产。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进步与反动、新与旧的斗争是没有止息的。反动势力往往借助于历史幽灵为其现实斗争服务，所以反对复古文化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

四、与资产阶级右翼的思想斗争

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以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现代评论派和戴季陶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在思想战线上向革命派发起了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团结党外左派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了反击。

国家主义派原是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公开标榜国家主义。1923年12月，其代表人物曾琦、李璜和余家菊等留法分子在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当时就受到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等人的批判。1924年秋，他们把活动中心移到国内。以邹鲁、谢持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因在1925年11月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决议而得名。这两派虽有一在国民党内、一在国民党外之别，但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都反对革命。

为了欺骗群众，西山会议派仍然打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铲除一切军阀”的旗号；国家主义派则接过五四时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但在他们的纲领和文件中，这些口号的内容已被篡改，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含义却作了新的解释，而把反帝变为反苏，把打倒军阀变为勾结军阀。

西山会议派认为：“凡为自身谋利益而利用中国，或貌为平等待我而实际则相反的，都是帝国主义。”而张继在致汪精卫等信中则明白指出，“不平等待我的”就是“赤色帝国主义之苏俄”。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共产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是“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可见他们不反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派极力煽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类岂得为友”的反动民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我们以为望俄相助，简直是‘饮鸩止渴’”；攻击中国人民争取苏联帮助是“前门尚未拒虎，后门已迎狼入室”。

《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集第276页。

《整理国故的评价》，《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第332—334页。

《告国民书》（1925年12月14日），《清党实录》，1929年版。

《张继致汪精卫等书》，《清党实录》。

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第78—79页。

西山会议派并不认为军阀是必须打倒的封建势力，说“军阀之所企图者，惟个人之地位幸福及其所欲得之虚誉耳。”因此，他们“善意的渴望今之拥有军队实力者，瞻前毖后，务各自立于真正拥护国家与民众利益之途”，实行改良主义。

国家主义派有时伪装进步，也骂几句军阀国贼，但他们大多与军阀勾结，以军阀作靠山，并为其出谋划策，助纣为虐。如北伐战争期间，曾琦参加孙传芳的机要，为张作霖炮制“四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德）；余家菊当过孙传芳门下的军事教官，并为其创造“三爱主义”（爱物、爱人、爱世界）；他们还到吴佩孚军队中讲演，称“凡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因此，吴佩孚也标榜自己是国家主义者。

为了反对革命，国家主义派竭力攻击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不合“中国国情”；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故意挑拨阶级的冲突”造成的。为此，他们公开宣称：“国家主义者更要极力……主张‘阶级合作’，而反对‘阶级斗争’。”他们高喊“全民革命”，“主张各阶级合力同心去从事于革命运动，并且来日全民革命之后，也要一样主张各阶级合力同心去从事于建设”，实现“全民政治与全民福利”，就是“用国家政府的力量来干涉国民经济生活”，进行一些改良，让有产者拿出一点钱来提高工农的生活。

但是，当反动统治者向工农群众压迫时，他们就马上抛弃所谓“阶级合作”的遮羞布，而为虎作伥。他们以“国家至上”，要人民“牺牲个人，尽忠于国家”，来维护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而当这个旧军阀的统治倒台时，他们又投靠新军阀蒋介石，积极支持其制造“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四一二大屠杀”等，打击共产党。

西山会议派则从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破坏国共合作、鼓动反共清党来破坏革命。

他们把侵略与被侵略、奴役与被奴役说成是“由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两个壁垒”，从而阉割民族主义的反帝精神；把民权主义说成是“全民政治”，用超阶级的革命观和国家观，掩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取消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口号，代之以“移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以劳资“常相调和”，改善工人生活。

对于国共合作，他们宣称：“总理之收容共产分子也，是许其加入本党，为本党党员服从本党主义及命令也，绝非与共产党合作。”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有其信仰的主义，因主义有别而不能合作；“共产党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实不合社会之需要。盖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叫嚣“本党不容党员有违背本党的主张而鼓吹阶级革命，更不容共产党利用本党的招牌来鼓吹阶级革命。”

现代评论派以胡适为首，以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的《现代评论》杂志为阵地。他们与上述两派不同，主要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胡适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深恶痛绝，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也忧心如焚，富有救国救民的激情；他提出的从具体问题入手改良政治的主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4月8日），《清党实录》。

《中国国民党对时局宣言》，（1925年11月27日），《清党实录》。

《国家主义论文集》第1集第77、32页，第2集34页。

《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1926年1月4日），《清党实录》。

也能抓住一些社会问题，如文学改良、生育制裁（即节育）等，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自然具有进步的意义。他对西方文明的介绍和宣传，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上严重存在的固步自封和盲目排外的倾向，也有冲击作用。但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崇拜，尤其是美化帝国主义侵略，仇视马克思主义，诋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使他走到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他说：“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由于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钢铁世界，汽车世界，电力世界，科学世界，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胡适如此鼓吹西方“近代文明”之后，就把中国引上“西洋化”的道路。他根据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德诺所谓中国今日有“三大问题”的说教，提出了他的“挽救中国”的主张：“用铁路与汽车来做到统一，用教育与机械来提高生产，用防弊制度来打倒贪污。”而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必须先有一番心理的建设”，“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只有这样，才能“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实现“西方化”。

为此，现代评论派拥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反对中共和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宣传善后会议“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步骤”，“是一个解决时局的实际办法”，攻击进步分子不参加善后会议“反倒增加它为恶的可能”，就不会得到“国民的谅解”，甚至要负“时局解决计划之失败”的责任。

他们更诬蔑“五卅”运动中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陈西滢说，“我是不赞成高喊宣战的，……我们不妨据理力争”，攻击反帝斗争“与拳匪的一味横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胡适则说，排队游行，高喊“打倒英日强盗”，“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他以“青年导师”的面孔训导青年学生放弃“爱国的责任”，追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目标，提出“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的信条，并且引用易卜生的话说：“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最要紧的是“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个有用的东西”；“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

在女师大和“三一八”惨案中，现代评论派一方面歌颂章士钊的功德，挑唆军阀政府严厉镇压学生，认为规劝学生不要“过甚”，劝杨校长辞职引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万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另一方面，他们制造种种流言，诬蔑师生的革命行动，攻击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为反动当局镇压学生和迫害鲁迅制造舆论，甚至倒把造成惨案的责任推给群众和运动领袖，说爱国请愿的群众“没有审判力”，受了群众领袖的欺骗，“自蹈死地”。

《胡适文存》卷1，第21页。

《胡适文存》卷1，第41—48页。

《现代评论》，第2卷第29期。

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2卷第38期。

《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

《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

戴季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因在 1925 年 7、8 月间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自称“在理论上建立三民主义中心思想”，而形成“戴季陶主义”，实际上代表正在崛起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利益，其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因此其政治思想又有与上述三派不同的特点。由于还要厕身于革命阵营内，利用工农的力量发展自己，与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争权夺利，因此他们还披着革命的外衣。

在政治思想上，戴季陶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实际肆意阉割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他大讲所谓道德，说孙中山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他企图以此来建立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

因此，戴季陶竭力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十分惧怕工农革命运动。他提出“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他说：“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一方面是要被治者阶级劳动阶级农民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即工人不要罢工，农民不要反抗地主，要用“诱发仁爱性能”的办法，使他们“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同时希望统治阶级觉悟起来，对被统治阶级也实行“仁爱”。因此，他主张在国民革命中不应该提倡阶级斗争，只应该“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攻击中共“制造”阶级斗争，“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一个国民革命”。

戴季陶提倡仁道，反对阶级斗争，只是为了束缚工农革命的手脚，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当国民党新军阀向革命进攻时，他却一点也不仁道，立即暴露出狰狞的面目，反对国共合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戴季陶为反对国共合作制造了团体有“排他性”和“共信不立”的理论，认为根据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的原则，“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并进一步引伸出“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的信条，断言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不可能合作，提出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放弃共产主义，“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否则就退出国民党。

综上所述，四派在具体说法和手法上虽有差异，但在主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上，却有共同性，即都攻击马克思主义，阉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反苏反共，破坏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以《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政治周报》为阵地，对上述种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批判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的伪三民主义，批驳现代评论派的“西化”论和对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诬蔑。

恽代英、瞿秋白批判戴季陶的“道德说”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严重歪

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曲，“是想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和“‘君子’爱民的仁政”；指出戴所称道的所谓知、仁、勇、诚等孔孟道统，不过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正是我们必须摒弃的东西，而“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他们又明确指出，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是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所以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民生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性比较明显，理论上比较贫乏。陈独秀把他们的言论与国民党一大的宣言进行对比分析，全面批判了他们的反动的三民主义观。

对于胡适等人鼓吹的“西洋近代文明”，瞿秋白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指出文化只是“征服自然界”的手段，关键是“人类驾驭”的能力。且不说西方文明是否如胡适吹捧的那样美妙，但帝国主义却“处处阻滞”殖民地弱小民族去掌握。比如，美国人在中国所设的学校中讲授包含自由平等一类原则的美国宪法，可是美国人在中国犯法后，美国政府却加以庇护；科学艺术也受限制，住在租界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要捉到巡捕房里去。“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并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

所以，要发展民族经济、科技和教育，首先要反帝。

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鲁迅集中批判了现代评论派诬蔑革命群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的谬论，揭露他们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帮闲的丑恶嘴脸。指出胡适、陈西滢之类以青年“导师”自居，其实是毒害“未经老练的青年”的骗子。他们的反动作用，正像领着一群柔顺的胡羊奔赴屠场的山羊一样，“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又像“媚态的猫”，“比它的主人更厉害的狗”。鲁迅还揭掉了他们“公允”和“局外人”的假面，“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指出他们“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公允的笑脸。”他严厉谴责现代评论派助纣为虐，帮助制造“三一八”惨杀的“鬼蜮手段”，大声疾呼：“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鼓励青年摆脱“正人君子”们的欺骗，学习刘和珍等人精神，做“真的猛士”，“奋然而前行！”同时要总结和提高斗争策略，不要“又是砍指头，又是当场晕倒”的消极反抗，克服太“高”和太“急”的毛病，而“要缓而韧”，并提倡“壕堑战”，以防暗箭，还要有“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

（二）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戴季陶和国家主义派的阶级调和和全民政治的谬论。

恽代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是不能取消的，因为“解决

恽代英：《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刊社 1925 年版。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 1 期。

《一点比喻》，《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156 页。

《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46 页。

《并非闲话》，《鲁迅全集》，第 3 集第 62 页。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 3 集第 201 页。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 1 集第 359 页。

民生问题必定要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才是正确”；那种“靠生活充裕的人去‘为’人家革命，十余年的经验已证明是靠不住的了”。瞿秋白则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而戴季陶的“仁爱性能说”，不但是“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暗示农工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直地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所以，“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他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针对戴以民族斗争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瞿还阐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的思想：国民革命“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它“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亦“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

恽代英和瞿秋白还批判了国家主义派用抽象的“国家”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教，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的客观事实，“而且这种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绝无改良主义的阶级妥协之可能”。因此，国家主义的说教“完全是骗人的，……不但妨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妨害中国眼前的国民革命工作”。

（三）巩固国共合作，批驳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诬蔑。

陈独秀以辩证的观点驳斥戴季陶“共信不立”理论时指出，只要把“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国共两党是有共信的，这个共信就是：“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他也指出了别信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益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共信与别信并存，才是联合战线，否则，不是吞并，便是分裂。瞿秋白则一针见血地揭露戴季陶的理论“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根本上要消灭C.P.”。

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在回答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叫嚣时，阐述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又必须保持独立性的光明磊落的立场。他们指出：共产党员所以加入国民党，一是因为认定中国目前的产业状况不能进行“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而只能进行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二是因为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能容纳工农阶级的要求，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利益参加国民革命的，而不是合并。

（四）揭露资产阶级右翼充当帝国主义军阀破坏国民革命工具的反动本质。

恽代英：《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代英：《与李瑄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中国青年》，第73期。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1925年8月30日），《向导》第129、130期。

萧楚女：《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恽代英：《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中国青年》第41期。

毛泽东从国民党自身的发展、国内革命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变化、新旧民主革命的不同以及西山会议派的阶级属性等方面分析，指出西山会议派等右派从中国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国家主义派同国民党右派一样，“是列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恭顺可靠的保护人！”“是一个借了反对共产党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他们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实际他们“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各阶级联合战线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战线的最坚决主张者，是民族运动的死敌”。

西山会议派主要由曾有革命历史的国民党元老组成；戴季陶主义则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三民主义理论权威出现；而国家主义派和现代评论派由于盗用了五四时期的革命口号，运用了国家、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字眼，加之他们的骨干分子多有教授、学者的头衔，因此，这四派曾在革命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经过中共及左派知识分子以上的批判和揭露，再加上1926年1月广州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他们的思想影响有的破产了，有的缩小了；他们的组织也多数瓦解，如1926年北伐开始后，许多人宣布退出国家主义团体，连当时人数最多的上海“中国少年自强会”也自行解散，宣布“愿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曾琦见此不胜感慨地叹道：“赤焰薰天势莫当，纷纷余子竞投降。”有的组织如西山会议派则退出了革命阵营，成了完全的反革命派。现代评论派的多数人，也投靠国民党新军阀。

由于共产党尚在幼年，理论准备不足，在这场思想斗争中，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并不系统和深刻，没有出现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是由于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更贫乏，因此这场批判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根基，并且为国民革命的胜利前进护航开道。这是首先要肯定的。

其次，共产党在这场思想斗争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还有种种弱点，但可贵的是对这条战线的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敏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理论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的理论队伍也得了锻炼。

五、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由于群众爱国运动急风暴雨的冲击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新文化运动阵营即开始分裂。五四以后，《新青年》移到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斗争，对新文学无法兼顾。新文学运动失去了主要阵地。而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有的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主要从事政治运动去了；有的则变为资产阶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政治周报》，第3期。

《醒狮派——最反动势力的结晶》，《中国青年》第97期。

级右翼，也把主要精力从事反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活动，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附庸。于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在文学战线上活跃起来。他们在中国革命运动的推动下，继续发展新文学运动，新兴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据不完全统计，1921—1925年，全国先后成立新文学团体130多个，文学刊物不下100余种，新文学著作和译作约千种。

这些新文学社团派系十分复杂，但也有共同特点，即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非常憎恨，“呐喊”着勇敢地予以攻击。但是，他们对于新兴的无产阶级力量及其前途，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彷徨”于十字街头。正如鲁迅在评论1924年的语丝社时所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然而，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他们的文学活动也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鲁迅是这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旗手。1918—1926年间，他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集》等专集，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他用文艺作武器，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御用文人的倒行逆施和他们的丑恶嘴脸，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因此不断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1926年8月，他又因被反动当局通缉，南下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蒋介石政变后，他愤而辞去中大一切职务。他痛心目睹了青年之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的事实，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共产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在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中，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由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12人发起，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后迁上海。参加者有朱自清、谢冰心等170多人。其出版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等，并编印《文学研究会丛书》100多种。

文学研究会在其宣言中说它的主要目的是：联络感情，增加知识，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散漫的团体，没有统一的主张。以茅盾（沈雁冰）为代表的一部分会员积极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环境、人生，关心劳苦大众的疾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因此他们积极参加了反对文坛上的复古派、唯美派、颓废派等反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斗争。而另有一部分会员则提倡脱离现实的艺术。由于这种状况，1925年五卅运动后，革命高潮到来时，这个散漫的团体就分化了，至1932年《小说月刊》停刊，该会无形解散。其中一部分人仍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走向革命文艺阵营。

《鲁迅全集》，第4集第131页。

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65页。

《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第71页。

创造社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留日学生酝酿发起，成立于 1921 年夏，先后出版过《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创造丛书》等。

创造社初期的文学主张受歌德、海涅、拜伦、雪莱等外国浪漫派思想的影响，反对功利主义，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灵感和天才，具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倾向，认为“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是出于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应该“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上的全与美”。但是，创造社的成员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感受较深，对中国的军阀政治也极为憎恨，有强烈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因此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并改变文艺观点，强调文学为社会乃至为革命的思想。1923 年，郭沫若写道：我们“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文学“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如暴风一样唤号”，“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1925 年以后，在大革命形势推动下，创造社明确提倡“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郭沫若在 1926 年 4 月写道：“每逢革命的时期，在一个社会里面，至少是有两个阶级的对立。……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成为革命的前驱。”他号召青年做一个“革命的文学家”，“到兵间去，工厂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搞“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文学”；不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放弃在现制度下求不到的“彻底的个人自由”；“你们不要以为多饮得两杯酒便是什么浪漫的精神，多谄得几句歪诗便是天才的作者。”

此外，还有语丝、未名、南国、弥西、沉钟等社团，也以各自的特色，对这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充满着斗争，除了与前述的“甲寅派”、“学衡派”和“现代评论派”斗争外，还与惯写才子佳人题材而得名的“鸳鸯蝴蝶派”斗争。该派滋生于“十里洋场”的上海，风行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他们声称自己的文学创作宗旨是：为了自己游戏和消遣，也是为着供读者娱乐和消闲。因此，其少数作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有进步的意义；在文学表现艺术上也为丰富中国文学流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总倾向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新的才子十佳人”，其作品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

因此，当五四以后，革命形势逐渐高涨时，鸳鸯蝴蝶派的消极作用就日益突出，对于开始觉醒的人民起着麻醉和迷惑的作用。尤其在复古逆流中，他们也乘机积极活动，与新文学争夺读者。他们主办了数十种期刊杂志，并掌握了不少报纸的副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21 年 3 月复刊的由王纯根、周瘦鹃主编的《礼拜六》周刊（这时的鸳鸯蝴蝶派又称“礼拜六派”）。对此，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 3 号。

《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3 期。

鲁迅：《上海文艺一瞥》，《文艺新闻周刊》，第 20、21 期。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7 号。

鲁迅及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等，对“礼拜六派”的错误主张和消极作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创造社和其它进步文学社团也都积极参加并支持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因此，该派的刊物和作品进入30年代以后便逐渐衰亡了。

以上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为30年代左翼文艺和革命文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 两种命运的较量

第一章 国民党统治与苏维埃革命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夺取了国民革命的成果，从此，逐步确立起在全国的统治，中国历史开始了以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黑暗与光明两种命运长期较量的过程。

国共分裂时，中国政局极度混乱，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革命同反革命、新军阀同旧军阀、新军阀内部各个派系之间，多种矛盾与对抗同时存在。国民党新军阀在镇压共产党的基础上，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内部纷争和同旧军阀的争夺，到1928年底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

汪精卫“七一五”“分共”之后，势如水火的宁汉两方渐有妥协趋势。经过冯玉祥的居间调停，武汉方面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迁都南京”；南京方面也表示欢迎武汉重要分子至宁“柄政”。但武汉方面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实现宁汉合作的条件，而且已派兵东下“讨蒋”，声势颇为浩大。与此同时，南京方面蒋桂之间、乃至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蒋介石企图以战场上的胜利来扭转于己不利的局面，可是他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的战事，却吃了大败仗。8月12日，南京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力主与武汉议和，实即逼蒋辞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3日宣告下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他要以“静镇谨守”、“待机而动”的办法，来夺取“最后之胜利”。胡汉民、张静江等亦继蒋辞职而去。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方面的实权落在桂系手中。武汉方面失去了攻击的主要目标，因而宁汉合流的进程大为加快。但当武汉方面人物相继到达南京后，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又出现了不利于汪精卫的新形势。汪精卫以国民党“正统”自居，提议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党事纠纷。但他的主张未得任何一方的响应。已被南京国民党恢复党籍的西山会议派人物，坚决主张汪精卫下野。为了打破僵局，孙科提出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以代行中央职权的建议，得到各方的赞同。汪精卫自感形势不妙，于9月13日秘密离沪，并通电自责“防共过迟”，表示自动下野，听候处分。

9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正式决定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人员组成。其职权是：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行使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职权；统一各地国民党党部；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6日特委会成立，决定改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并发表宣言，称：今后将“一方面继续清党，不使全党中有一不忠实之党员厕身其间；一方面继续北伐，期于最短期间完成中国之统一。”随后，特委会又决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中央党部新的人选，原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各地政治分会一律取消。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名义上包罗了国民党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但国民

党内三个最重要的人物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均未到会。所以注定国民党的这次所谓“统一”必然是短暂的。首先是汪精卫重回武汉，与唐生智结合，于9月21日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湘、鄂、皖3省，反对南京特委会。于是，宁汉合作又变成新的宁汉对立，到10月下旬，更演成李（宗仁）唐（生智）战争。结果，唐军失败，放弃武汉，唐本人于11月11日通电下野，部队撤往湘南后被改编，桂系势力扩展至两湖。

宁汉再次分裂的同时，还出现宁粤间的对立。汪派军人张发奎率部到达广东后，于10月上旬通电反对中央特委会，并与在广东拥兵自立的李济深相结合，主张由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10月29日，汪抵达广州。汪等在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力主解散特委会，在广州恢复中央党部，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纷争。

宁汉、宁粤争斗之时，蒋介石也在为东山再起积极奔走。9月底至11月上旬，蒋介石用40天时间访问了日本，以寻求日本对他建立全国统治的支持。但是蒋介石的目的并未达到。在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中，田中表示日本只赞成他反共和“巩固南方”，“解决长江以南问题”，而不允许他立即着手北伐。

11月10日，蒋介石返抵上海。这时，蒋汪二人基于同桂系的矛盾，表示愿意携手合作，并在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问题上取得了协议。11月15日，汪精卫、李济深离粤赴沪，准备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但就在汪、李离粤的第三天，广州局势又发生剧变。11月17日，张发奎部发动了驱逐李济深和桂系势力的军事政变。12月11日，又有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的爆发，张发奎部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大部参加了起义。这两次性质不同的广州事变，都被反汪势力抓住作为攻击汪派的借口。他们指责汪精卫、陈公博是“准共产党”，“养奸成祸，害国殃民”。南京政府下令查办汪、陈等人。这样，汪精卫一派便在半年之久的国民党派系争斗中遭到惨败，而蒋介石则重新成为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通过由蒋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负责筹备四中全会的决议。1928年1月7日，蒋正式复职。中央特别委员会随之被取消。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1928年2月上旬在南京召开。这是国民党进一步反共和重新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力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改组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会议决定：开除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和所谓“附逆有据”者的党籍；以前宁汉两方的决议案，凡关系联俄容共者，一概取消，凡因反共开除党籍者，一概无效；“对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四项，均应制止铲除”，等等。会议推举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蒋介石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为主席；蒋介石、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12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为主席。会后，3月上旬蒋又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而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为广州（辖两广）、武汉（辖两湖）、开封（辖豫陕甘）、太原（辖晋绥察）政治分会主席。经过这次会议，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重新集于蒋介石。四个政治分会的设立，则是承认国民党各派军阀割据的现状。

四中全会后，为了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军重新编组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分别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总司令，总兵力 70 万人。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占山东，消灭直鲁联军张宗昌部和原直军孙传芳残部。1928 年 4 月 5 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出师北伐宣言。7 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各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线进击。津浦线、鲁南、鲁西南的战事进展颇为顺利。4 月 21 日攻占济宁，5 月 1 日进占济南。

国民党军的北伐和国民党政府统一全国的计划，同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以便进一步霸占中国的野心发生尖锐矛盾。于是，日本决定以武力阻止其北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从 5 月 3 日起，日军向进驻济南商埠的国民党军和商埠的中国民众展开进攻和屠杀，5 月 8 日又向济南城发起攻击，11 日完全占领济南城。在一周多的时间中，中国军民被杀死杀伤六七千人，财产、房屋损失无数。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其属下共 17 人，被日军惨酷杀害。5 月 2 日进驻济南的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将部队撤到胶济路沿线 20 华里以外。济南城和胶济路被日军占领 1 年之久。

济南惨案后，进入山东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一部退守徐州，他部绕道渡河沿津浦线北进。5 月中下旬，国民党军相继攻占石家庄、临沂、德州、绥远、大同、张家口、保定。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张作霖决定撤回关外，北京秩序暂由王士珍组织临时治安维持会负责。南京政府代表开始同奉军、直鲁联军代表谈判和平接收京、津。6 月 3 日 1 时许，张作霖乘车离京返奉。6 月 4 日凌晨，日人在沈阳城郊皇姑屯将张作霖的专车炸毁，张被炸成重伤，不久死去。6 月 8 日和 12 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相继进占北京、天津。阎锡山被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张荫梧、傅作义分任北京、天津警备司令。至此，统治中国将近 18 年的北洋军阀政权宣告结束，国民党政权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权。接着，新疆督办杨增新、热河奉军将领汤玉麟先后于 6 月 16 日、7 月 19 日通电易帜，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20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北京改名北平，北平、天津为特别市。南京政府宣告“统一告成”，但东北问题尚待解决。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6 月 20 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 月 1 日张学良致电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各要人，表示他“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主张“同时收缩军事”，“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7 月 4 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随即派出代表前往北平与南京代表谈判。经过双方协商，决定 7 月 22 日实现东北易帜。

但是，张学良的举动遭到日本方面的无理阻挠，易帜未能按计划进行。田中义一就任日本首相后，推行所谓“积极满蒙政策”，加紧对我国东北的侵略。田中经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再三警告张学良不得实行易帜，而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8 月初，日本政府借张作霖丧礼的机会，派老资格的政界人物林权助到沈阳对张学良进一步施加压力。林权助和林久治郎竟蛮横地向张学良表示：“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张学良

关于济南惨案中被日军杀死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数字，有多种统计。这里取自国民党济南市党部的统计：死 4382 人，伤 2900 人。

严词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坚持要“完成中国统一”，并逐步采取具体措施。

12月29日，张学良终于冲破障碍，发出易帜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30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辖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

东北易帜，表明国民党已把它的统治扩展到了全国。张学良的易帜，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二、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兴起

国民党在确立全国统治的过程中，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实行了疯狂的屠杀政策。大批的中华优秀儿女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但是，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新的革命方针，决定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革命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以左派国民党为旗号，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义。起义当天占领了南昌城，成立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随后，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次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由于缺乏新形势下斗争的经验，起义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在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而是挥兵南下，计划到广东后重整旗鼓，再行北伐。因此，10月初，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至粤北。

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是一次在革命遭受失败的关头，为审查和纠正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革命方针而召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发布著名的《告全党党员书》，清算了国民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党员重新开展斗争。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前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战略方针的转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但会议在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忽视了反“左”、防“左”，这就为“左”倾冒险主义敞开了门户。

1927年9月，毛泽东、卢德铭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鄂南、湘东、赣西一带的工农武装组成，总计约5000人。部队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义，而称工农革命军。原计划兵分三路，会攻长沙。但起义爆发后很快遭受挫折。毛泽东看到在当时形势下，占领城市没有可能，于是在各路起义军会师浏阳文家市后，毅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南转移。9月底，部队在江西永

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缩小建制，建立部队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同时实行军内民主，连以上设立各级士兵委员会。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底，部队进入井冈山的茨坪。毛泽东领导的向井冈山的进军，为国民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斗争、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当月，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要决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正式决定放弃国民党名义，而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国民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产党曾认为，尽管国民党的领袖叛变了革命，但国民党仍是“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共产党不应把这一旗帜让给“军阀和反动资产阶级”，同时，利用这一旗帜，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苏维埃口号”还只能宣传，而不能着手组织。然而实践表明，复兴“左派国民党”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国民党已成为反革命政党。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今后组织群众革命斗争，不能“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更明确规定：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11月中旬海陆丰农民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此后近10年当中，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一直在苏维埃的旗帜下进行。

12月11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领导下，举行广州起义。这是一次工人与士兵联合并有市郊农民参加的起义，起义军约5000人。从凌晨3时许，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起义军歼灭了市内敌人的大部，当天上午宣告成立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当时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这次起义是乘国民党粤桂军阀混战、广州市内敌军力量薄弱的机会举行的。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军阀立即调主力回师广州。起义军总指挥叶挺提出迅速将部队撤出广州市区的建议，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指责，省委没有采纳这一建议。12日，军阀部队向广州市疯狂反扑，起义军浴血抵抗，张太雷牺牲。13日，起义军余部约1000人被迫撤出广州，转往东江和北江。这次起义是中共领导革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突出地表现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它的失败表明，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已经行不通。

从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约达百次，遍及10多个省140多个县。除上述三次起义外，重要的起义还有：

1927年9月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起义。

1927年10月马尚德（杨靖宇）领导的河南确山起义。

1927年10月底至11月初广东海陆丰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海陆丰起义。

1927年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的湖北黄（安）麻（城）起义。

1927年11月至翌年春中共鄂北特委领导的鄂北起义。

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的赣东北弋（阳）横（峰）起义。

1928年1月下旬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

1928年2月中共湖南平江县委、醴陵县委和罗纳川等领导的湘东起义。

1928年3至6月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

1928年3月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湖南桑植起义。

1928年4、5月间刘志丹、唐澍和中共陕东特委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

1928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领导的江北起义。

所有这些武装起义，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英勇回击，都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具体表现。它们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影响，使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到农民群众之中，组织并保留了一部分革命武装。这些就为以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在苏维埃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动，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其特点，一是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民主革命不能“自告一段落”，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的同时，就要“推翻资产阶级”。二是否认革命已转入低潮，反对组织革命退却，要求继续进攻。三是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这些错误观点和主张的提出者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得到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的同意。这次盲动主义从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统治党中央。它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1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停止执行。

1928年6、7月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基本问题。大会批评了国民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批评了苏维埃革命开始后的“左”倾盲动主义，并强调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是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大会确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大会提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等项内容的民主革命10项政纲。这些都是正确的。“六大”制定的路线，对中国革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大会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营垒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断定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国民党的各个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大会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及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有唯成份论的偏向。这些是这次大会的不足方面。大会结束后举行的新的一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举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力负总责，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中共在六大大会及“六大”前后的很长时间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政策，这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密切相关。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一个中国革命“三阶段”说，认为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武汉时期是“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表明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第三阶段为“苏维埃革命”，

只有工农参加。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这种理论，而采取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直到1935年冬才纠正过来。

从1928年7月到1929年，共产党继续在一些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其中重要的有：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10月中共闽北地方组织领导的崇安起义；1929年4月王维舟等领导的四川万（源）宣（汉）起义；5月中共豫南特委领导的商城起义；11月中共安徽六安中心县委领导的六（安）霍（山）起义；12月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及翌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的广西龙州起义。历次武装起义，都保存了一部分革命武装力量，在此基础上，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时机，革命武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陆续创建了各处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冬至1928年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与地方农民武装相结合，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两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毛泽东分任军长和党代表。随后成立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南下，井冈山曾被敌占领，中共湘赣边特委决定建立以永新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到1930年秋，新的湘赣根据地发展到包括10多个县的地区。

彭德怀等领导的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1930年，湘赣、湘鄂赣两区连成一片，鄂东南的红军扩编为红八军，五军、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后又成立红十六军。至1931年，湘鄂赣根据地已建立了十几个县的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后，与当地革命武装相结合，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年6月，红四军、十二军、三军合编为红一军团。8月，一、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赣南闽西区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方志敏等领导的戈横起义武装和闽北崇安起义武装开辟了闽浙赣根据地，那里的红军于1930年7月编成红十军。

黄麻、商城、六霍起义武装开辟了鄂豫皖根据地。1930年春，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地红军统一编为红一军。随后，三个地区连成一片，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后发展为红四方面军。

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革命武装建立了包括湘鄂边和洪湖两区的湘鄂西根据地，创建了红四军和红六军。1930年7月，红四军与红六军会师公安城，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周逸群（后为邓中夏）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次年3月，红二军团又改编为红三军。

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开辟了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不久，八军并入七军。后七军北上，并入红一方面军。

除以上区域外，从1927年冬至1930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广东东江地区、海南岛、川东、苏中、浙南等地建立过革命根据地或开展过游击战争。东江地区红军于1930年5月编为第十一军。海南岛红军于1930年8月编为红军

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8—189、191、213页。

第一独立师。川东地区红军于1929、1930年间组成过川东游击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苏中红军于1930年4月编成第十四军。浙南红军于1930年夏编为第十三军。

至1930年夏，农村革命根据地已建立了十几块，分布在十余个省，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十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武装3万人，总计10万人，枪约6万支。中国革命开始呈现重新发展的形势。

以各地武装起义和开辟农村根据地的经验为基础，毛泽东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相继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给林彪的信）等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他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实行分裂剥削政策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农业经济占优势，反动统治营垒不统一，再加上1926至1927年革命影响的遗留、全国革命形势的必然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 and 政策的正确等条件，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可能的。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走向，“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高潮”。因此，共产党必须确立“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理论的和具体工作的指导。以后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到苏维埃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他进一步完整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走先占农村、后占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2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由毛泽东起草而为大会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确立了红军的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半数以上土地掌握在不足农村人口总数10%的地主、富农手中，而中国的富农也有不少是兼出租土地的半地主式的富农。地租一般要占农民劳动成果的一半以上。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关系，使广大农民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变革封建的土地制度，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孙中山生前曾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国民党当政后背弃了这一主张。当时社会上不少政治势力和文人学者，提出种种方案，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基本上限于纸上谈兵。真正有成效地解决农民这一最迫切问题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

中共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是：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发动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一般采取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并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问题，开始规定为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31年前后改为归农民私有，并可租借买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有的根据地都展开了烧田契、分田地的斗争，数百万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土地革命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也给红军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苏维埃区域是在艰苦的武装斗争环境中向前发展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

一出现，即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便集中兵力对红军和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围剿”与反“围剿”构成了当时国共两党军队战争的主要形式。

1930年12月至1931年5月，鄂豫皖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二次“围剿”，歼敌约万人。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围剿”，歼敌7万余人，使赣南、闽西两区完全连成一片，根据地扩展至近30个县境。1931年1月至10月，洪湖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三次反“围剿”，使根据地得到发展。1931年11月鄂豫皖红四军与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从本月起至第二年6月，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发起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四方面军发展至4.5万人，鄂豫皖苏区已拥有6座县城，350万人口，共建立26个县的苏维埃政权。1930年12月至1932年春，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的红军也都接连打破优势敌人的多次“围剿”。在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等红军领导者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一整套科学的战略和战术原则。主要有：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下，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使用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等。这是红军得以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表明苏维埃革命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力图把新兴的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另一方面，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错误又在不断地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中共在克服了盲动主义之后，又出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并于1930年6月统治了党中央。立三路线突出地表现了一种急躁和冒险的情绪。在形势分析和理论认识上，立三路线极度夸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准备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已提到党的面前；坚持革命的均衡论，否认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主张革命急速胜利、急速转变，不承认革命的长期性和革命转变的阶段性；坚持“城市中心”，反对“农村包围城市”。在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制定和推行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企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立三路线的推行，给共产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造成巨大损失。由于进攻中心城市，红军减员3万多人，并丧失部分根据地。由于组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使白区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遭受很大损害，短短几个月，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损失7万余人。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冒险计划的执行，结束了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但是，对“立三路线”的纠正，并没有走上真正清算“左”倾错误的道路，而是被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拉向了更为“左”倾的方面。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通过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夺取了中央领导权，由此开始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共中央的第三次统治。王明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写成的小册子《两条路线》（1932年出第二版时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这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这本小册子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而是批评他的所谓“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由此阐明比李立三更加“左”倾的观点。小册子要求“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四中全会后，一方面由于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的努力和各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奋斗，苏维

埃革命在继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贯彻执行，又不断地给革命事业造成干扰和损害。

三、国民党的训政与改约

国民党政权初期推行的各项政策中，训政与改约是重要的两项。前者是对内的，后者是对外的。

国民党军占领北京后，南京政府于1928年6月12日发出《对内施政方针通电》，表示要结束军政，开始训政。同年9月初，热心于国民党训政研究的胡汉民从国外回到上海，随即开始进行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5院组织之；设主席委员1人，委员12—16人；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接着，国民党中央会选任蒋介石等1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为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分任5院院长。

国民党的《训政纲领》共有6条。它规定：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大会闭会期间，把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4种政权；“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负责“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对国民党训政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作了进一步说明和规定，这就是：国民党同人民群众在行使政治权利的关系上，实等于母亲与婴儿的关系，母亲（指国民党）对婴儿（指人民）必须保育之、教育之；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独负全责”；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在必要时，得对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必须是“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者，“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以上两个文件的规定表明，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就是国民党专权，人民无权，只许国民党一党和被其篡改的三民主义一个主义的存在，不许其它政党和主义存在。

“训政”开始时国民党规定：训政期限为6年，到1935年结束。而实际上是实行20年。在“训政”名义下的一党专政体制，窒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就成为一切要求民主进步的人们群起反对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始“训政”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外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帝国主义是国民党政权的一大支柱。但这个政权又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为了争取民心，它亦努力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是独立国家的形象。因此，它一方面努力消除历史上强加于中国的屈辱标记，另一方面，对来自帝国主义的新的侵略，又采取既抵制又退让的两面政策。192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内称：“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会，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进一步提出改约的三项原则：条约已届期满者，废除旧约，“另订新约”；条约未到期者，“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旧约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

定者，应“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外交部同时发布“临时办法”7条，其中规定：驻华外交人员，享受国际公法赋予之待遇；外人之身体及财产受中国法律之保护；外人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及中国法院之管辖；应征之关税，在国定税则实行以前，照现行章程办理；外人与华人同等缴纳捐税；未列入上述各条之事项，依国际公约及中国法律处理之。

改约宣言发出后，南京政府即就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同有约各国进行交涉。1928年7月25日，美国首先同中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随后，至1928年底，陆续有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荷兰、葡萄牙、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11国同中国签订了《关税条约》或《通商条约》。在中国保有不平等条约并已期满的日本，在中国政府与其交涉中，态度蛮横，拒绝废除旧约，直至1930年5月才同中国签订了新的《关税协定》，但仍保留有较其它国家为多的附加条件。

上述新的关税条约或通商条约规定：（一）取消各国关税特权，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如中美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中英条约规定：“缔约国现行条约内所有限制中国任意订定关税税则权之各条款，一律取消，适用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二）实行最惠国待遇。如中美条约规定：“有关关税之事项，缔约国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它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

中英条约规定：缔约国一方人民在另一方运入或运出货物所纳之关税，内地税及其它税项，“不得有何借口……异于或较高于各本国或其它各国人民自同一产地所运货物完纳之税项”。（三）新税率须与1925年关税会议暂时议定之税率相同，即货分7等，按类征收5—30%的关税。（四）海、陆税划一税率。

这些规定表明，重新订立的关税条约，一方面对中国具有积极的意义。关税自主原则在条约中得到确认，长期以来进口货物一律征收关税5%和陆关较海关少纳税1/3的不合理规定得到改变。按照1929年开始实行的新的海关税则，中国海关收入大为增加。据统计，国民政府的海关收入，1927年为1.53亿元，1929年为2.76亿元，1934年为3.83亿元。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关税自主，税率的确定也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复杂得多。历史上相继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旧称治外法权）的国家有19个，经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4年的中俄协定，德、奥、俄三国的领事裁判权已经取消，此后继续享有该项特权的共16国，其中有些国家的条约已期满，有些国家亦答应可取消领事裁判权，只有少数国家仍然坚持。1929年4月，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英、美、法、荷、挪、巴西6国，要求撤废领事裁判权，但前5国的回照一致反对中国收回此项权利。9月，外交部第二次照会5国，重申前意，又未得赞成。12月28日，南京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发布特令：从1930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

《东方杂志》第25卷第16号，第127页。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卷，第374页。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卷，第374页。

《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第16页。

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30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撤废领事裁判权宣言，表示愿与各国协议具体实施办法。但未得英美等国的响应。1931年5月南京政府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7条，将原定1930年1月1日实行的特令，推迟到1932年1月1日实行。“九一八事变”后，又决定此条例暂缓实行。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便搁置起来。

为了废除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孙中山生前也曾为此努力奋斗。国民党政府的改订新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南京政府对列强的依赖性，这次改约远没有完全取消列强的在华特权，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如果说国民党的改约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那么，国民党外交上的另一些重大举动，如对宁案、济案的处理，就是对屈辱妥协了。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其开始固然有外国人受到伤害，但随后英美军舰对南京的炮击，使中国军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其严重损失。然而1928、1929年解决此案时，国民党政府却诬指事件“完全为共产党……所煽动而发生”，答应向英美等国道歉、赔偿和惩凶。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的罪行，最后是以“实地调查”为名，一笔勾销。与此相反，国民党政府对曾大力援助中国革命的苏联，采取了敌视的态度。1927年12月，经蒋介石提议，南京政府发布对俄断交令。1929年7月，制造了中东路事件，武力接收按条约由中苏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逮捕和遣送苏方高级职员59人。在东北军被苏联军队打败后，于12月签订了《伯力协定》，恢复事件前中东路的状态。

四、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消长

国民党统治初期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政治上的多元性和分裂性。国民党内部派别林立，矛盾重重。各派之间勾心斗角，权势相倾，以至混战不已。在变幻离合的角逐之后，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它在国民党内的优势地位，但国民党分裂性的特点依然存在着。

宁汉合流后，经过半年多的角逐，到1928年2月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前后，国民党内并存的实力集团便剩下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蒋控制中央，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阎、李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们在反对旧军阀的大目标下，形成暂时的联合，并取得二次北伐占领京津的胜利。但是，当奉系势力被赶出关外后，由于共同作战目标的失去，由于蒋介石排斥异己和其它集团也各怀异志，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立即尖锐起来。

矛盾从地盘、军队、党权三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当时国民党各派占据地盘的情况是：蒋介石据有南京、上海及东南各省；冯玉祥据有陕、甘、宁、青、豫、鲁；阎锡山据有晋、冀、绥、察和平津两市；桂系据有两湖、广西。冯玉祥地盘虽广，但多为贫瘠之区，山东的济南和胶东又在日人的控制之下；冯军在河北对奉军作战中出力甚大，冯本想能占有河北和北京、天津，但蒋介石采取联阎制冯的策略，在国民党军进入北京之前，就同阎商定由阎统辖这一省二市。对此，冯极为不满，加大了他同蒋的裂痕。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自己地盘小，又没有出海口，也对当时

的地盘分配情况不满。阎锡山占有了河北和平、津，当然满意，但他要把平津两市税收全部据为己有，又为蒋所忌恨。

为了削弱其它军事集团的力量，国民党军占领北京后，蒋介石即提出裁兵的主张，大讲“裁兵救国”。1928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相继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在宋子文的主持下，都把裁兵作为主要议题之一，经济会议专门通过了《请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全国编遣会议条例》，限定编遣工作于半年内完成。蒋介石借编遣军队之名来削弱他人的用心，非常明显，但他的节省军事开支以进行经济建设的理由，又使其它军事将领们不能公开反对。于是，全国编遣会议得以在1929年1月正式召开。

军队编遣会议正式成立“编遣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会议从开始到结束，都大力强调“以至公大信精神”，“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而这正好反映了各派军阀的偏私、欺诈和他们之间的矛盾重重。争斗突出表现在势力最大的蒋冯两派之间。

当时四派拥有的军队，蒋50万，冯40万，阎20万，李20万，另有东北军和西南各军，总计约200余万。蒋以“中央”的名义强调统一与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长、萨、土、肥四藩“功成不居”、“归命中央”的精神和做法。冯玉祥则想方设法对自己的军队少遣多编。预备会上冯提出4项编遣原则：“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冯无疑是说第二集团军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理应少遣多编。据此，冯提出一个把蒋冯两军数额拉平而压低其它集团军数额的编军方案，但被蒋所支持的阎锡山的方案所否定。阎案抬蒋压冯，既提高自己地位，又离间蒋冯关系。至此，冯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称病不再出席编遣会议，2月初离开行政院副院长、军政部长职务，回到河南。编遣会议最后通过一个体现蒋介石中央政府意志的《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但这个大纲只是一纸空文。编遣会议加剧了各军事集团的矛盾，特别是蒋冯间的矛盾。

蒋介石在策划削夺其它实力派军权的同时，又采取措施，加强他对党权的控制。编遣会议后，蒋介石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规定会议代表以指派、圈定、选举三种办法产生，其中指派、圈定两项共占代表总数的82%，地方选出者仅占18%。这种一手把持国民党三全大会的做法，激起强烈的反对，特别是汪精卫、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发起了反圈定指派代表的运动。但会议还是于1929年3月下半月在南京召开。会议处分了汪精卫的改组派和已公开反蒋的桂系将领，汪被书面警告，汪派的陈公博、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3年，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也被永远开除党籍。会议又专门通过嘉慰蒋介石案。会后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但是，蒋的权势愈张，被蒋排斥者的反蒋之心愈切。

混战终于一场接一场地爆发。

首先爆发的是1929年3月开始的蒋桂战争。蒋桂争斗，从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前即已开始。1929年2月初，蒋秘密运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唆鲁反桂。桂系将领立即兴兵讨鲁，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将鲁

“陈家”，指蒋之亲信陈果夫、陈立夫。经过国民党“三全大会”，他们都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职务。

免职，由何键继任湘省主席。蒋进行了多方谋划：起用唐生智携巨款至冀东，贿买被白崇禧收编的唐之旧部反桂；利用桂系内部矛盾，策动桂军将领倒戈；以调解湘案为名，将支持桂系的李济深诱至南京软禁，并策动陈济棠、陈铭枢夺取广东军政大权；派人疏通冯、阎，使他们通电“服从”中央。到3月26日，蒋介石以南京政府名义下令讨桂。蒋坐镇九江，亲自督师进攻武汉。由于桂军临时前线总指挥倒戈，蒋军轻易地占领了武汉。随后，蒋派军队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5月上旬，李宗仁组织南路“护党讨贼军”，通电反蒋，并派兵进攻广东。6月下旬，受蒋支持的粤军打败桂军，蒋任命原桂系军人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蒋桂战争结束。

蒋桂战争进行之时，冯玉祥即积极调配兵力，准备讨蒋，但因冯军将领韩复榘、石友三被蒋收买叛冯，冯的讨蒋军事未能发动。10月，冯军将领宋哲元通电讨蒋，蒋下令讨伐。至11月，冯军败回陕西。这时，在改组派的策动下，李宗仁与被蒋重新起用为师长的张发奎合组“护党救国军”，向广东进攻。这是第二次蒋桂战争，或称粤桂战争。蒋命何应钦主持讨桂军事。12月，张桂军被打败。同月，唐生智与石友三联合，参加“护党救国军”，举兵拥汪反蒋，不久亦被蒋打败。

1930年5月爆发规模最大的4派军阀中原大混战。这年春，冯、阎、桂及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形成反蒋大联合。冯、阎、桂三军将领50余人联名通电逼蒋下野，推阎和冯、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和副司令（另推张学良为副司令，张不就）。4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1日，蒋下达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战争初期，冯、阎一度得势，蒋军失败，桂军也曾一度进占长沙、岳阳，但最后，联军们被蒋军各个击破。8月，阎军撤到黄河以北；9月，冯军亦退到豫北。

在军事上混战的同时，汪精卫于8月在北平主持召开以改组派为主、同时有西山会议派和阎、冯代表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组成包括汪精卫等7个人的常务委员会。根据扩大会议的决定，9月9日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这样，又一次出现互相对立的两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两个国民政府。

在蒋介石的争取下，东北的张学良于9月18日发表拥蒋通电，随即挥兵入关，占领天津、北平。整个战局急剧变化。阎军退回山西，冯军将领纷纷倒戈。10月中旬，阎、冯决定联袂下野。11月初，搬到太原的海陆空军司令部宣告取消。扩大会议在太原草草公布一个《约法》后，烟消云散。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波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乃至湖南等省，双方投入兵力上百万，给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灾难。除财产损失外，战争中死亡30万，伤者无数。

中原大战的结局，是国民党各派势力消长的一个明显的标志。蒋介石依靠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间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分化瓦解及各个击破的策略，打败了各派军阀。这使蒋介石在整个国民党军阀势力中取得显然的优势。但是，反蒋势力仍然存在，派系争斗没有停止，又发生蒋胡之争。

中原大战结束前夕，10月3日，蒋介石通电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其目的是通过国民会议的形式从法统上加强他的独裁统治，把自己抬进总统宝座。蒋的这一做法遭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反对。胡时任国民党中央常会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他提出：训政时期召开的国民会议，不是权力机关，无权制定法律、选举总统、推举政府首脑，孙中山并未主张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这即是蒋胡之间的所谓“约法之争”。其实质是：蒋要进一步扩张个人权势，胡则要限制蒋之个人独裁，并从而保住自己的权位。尽管在建立南京政权和国民党内的争斗中，胡给蒋很大帮助，但蒋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公然挑战。于是在 1931 年 2 月 28 日以宴请为名，将胡扣留，随后软禁于南京汤山。蒋介石此举不仅加剧了蒋胡两派的对立，也引起国民党其它势力的不满，蒋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一步，表示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不必提出总统问题。5 月 5 日至 17 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

软禁胡汉民和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了又一次反蒋派别的联合。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军人等各反蒋势力云集广州，在“救护党国”、“打倒独裁”的口号下，于 5 月 27 日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 日成立又一个“国民政府”。这是国民党内的又一次大分裂，它直接导致了半年后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和国民党统治的一次严重危机。

五、中间政派的主张和活动

国民党各派势力的争斗和混战，构成了国民党政权初期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所反映的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主要矛盾仍旧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其集中表现就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国民党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实施反动独裁统治，全国平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没有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在整个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中，除国共的对立和国民党各派系间的争斗外，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阶级中的改良分子从事着反蒋或要求民主、改良社会的活动，他们既对帝国主义压迫、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军阀间的混争表示不满，又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感到恐惧，试图走第三条道路。他们之中的具体主张并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说，均属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政派。有的中间政派，同时就是参与国民党内部争夺的派别。

从 1927 年冬至 30 年代上半期，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的中间政派主要有：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乡村建设派等。

第三党以国民革命时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为首，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政党。1927 年 11 月 1 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共同署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布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提出一系列为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政治主张。但当时并未形成组织实体。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响应邓演达等的号召，于 1927 年底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翌年春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选举正在海外的邓演达为中央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代理。该党自称是“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要为实现“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而斗争。因它自立于国共两党之外，故也被称作第三党。1930 年 5 月，邓演达回国，着手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整顿、改组。谭平山因在某些问题上与邓发生分歧，离开第三党。8 月，邓召开中央干部会议，把党名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政治主张》，邓被选为中央总干事，并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在邓演达的领导下，第三党一时很有生气，曾建立 11 个省区 3

个市区的地方组织，积极进行了反蒋宣传。邓并利用他在黄埔军人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威胁。

第三党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并在具体内容上予以充实和发展。它的基本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一切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管理人员；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项；直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政权，建立平民政权；最后目标为社会主义。平民政权以农工为重心，并把工商业者吸引在周围。平民政权的政策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与苏联恢复邦交，同弱小民族结成反帝联盟；实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设国家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革命主张。

但是，平民革命如何进行？平民政权的各项政策如何实现？第三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的道路，认为工农武装暴动是“盲动”、“乱动”，建立苏维埃是“空想”、“妄想”，土地革命“不是革命的正当手段”。他们所说的平民革命，主要是通过号召各群众团体“自动去开国民会议”和策动国民党军队倒戈反蒋来进行。这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1931年8月，邓演达被国民党逮捕，11月由蒋介石密令杀害。第三党受到重大打击，但多数成员仍然坚持反蒋斗争。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是中国民主党派中的左翼。1935年11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

改组派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是国民党内的在野反对派。汪、陈在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派系斗争中遭到失败，于是他们便利用国民党背叛人民后出现的危机情势，打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旗号。陈公博、顾孟余先后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杂志，宣传他们的主张。1928年冬，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负责人均为汪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曾在国内许多省市和海外一些地区建立支部，会员一度达万人。

改组派的主要口号是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重新“确立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复活“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国民党。他们对待共产党及其它政治派别如第三党、西山会议派、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派等，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有明显的反共色彩。改组派也曾积极进行反蒋，特别是在1929年，反蒋活动十分活跃。3月，掀起反对蒋包办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浪潮。5月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以激烈的言词号召打倒蒋介石。下半年与张（发奎）桂联合，掀起军事倒蒋运动。改组派刊物还曾为民族资本家抱不平，指责南京政府增加捐税是“民死主义”。改组派的上层，除个别反蒋民主人士（如王乐平等）外，多是投机政客，但为了争夺权势，他们不能不提出一些改良主张。改组派的下层，主要是一批革命失败后彷徨苦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对当权的国民党不满，又不赞成共产党，所以聚集在“改组国民党”的旗帜下。

蒋介石对改组派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改组派创办的学校、刊物及各地领导机关，均遭破坏。1930年春，总部实际负责人王乐平被暗杀。此后，改组派的基层活动全部停顿，继续存在一个时期的改组派，实际成为一些上层分子争权夺势的工具。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在北平召开的“扩大会议”，即以改组派人员为主。失败后，汪、陈先后出国，汪于1931年1月发表解散改组同志会宣言。到1931年5月，汪又搜罗一批改组派分子到广州，

参加第二次反蒋大联合。“九一八事变”后，随着蒋汪合流，汪派重要分子尽入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改组派不复存在。

人权派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其成员主要是欧美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没有政治上的派别组织，但在几年时间内“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胡适语），并陆续创办新月社、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杂志。开始主要是探讨文学问题，后亦讨论时事政治问题，宣传民主和 인권，形成一种颇有影响的共同政治舆论，故也被看作是一个政治派别，称“新月”派，又因出版《人权论集》而称人权派。

人权派多为名流学者，主张民主政治，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不满，要求以民治代替党治。1928年8月，国民党宣布实施“训政”，10月通过《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由国民党“行使政权”等，引起人们的不满。胡适也写信给司法院长王宠惠质问。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立即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该命令虽以人权为“身体、自由及财产”三项，但“都没有明确规定”，并且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不得非法侵犯他人的人权，而“没有提及政府机关”，实际上是政府可以假借任何名义侵犯人们的人权，所以保障人权只是空话。接着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也在《新月》上发表《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等文，抨击国民党专制和训政时期约法，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国民党政府以“行为反动”、“言论悖谬”警告胡适，并曾拘留罗隆基，国民党的报刊也进行围攻。胡适等则以出版《人权论集》相对抗。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反对专制，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反对党派和个人独裁，主张宪治、法治和 인권，实行专家治国的政治。其目的是建立现代民治国家。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也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但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向国民党政府要人权。

乡村建设派是一个农村改良主义派别。它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有共同的趋向，即在农村实验推广某些改良措施，试图以此来振兴农村，复兴民族。它是由村治派、平民教育派、职业教育派、民众教育派、华洋义赈会等许多派别和团体发展而来的，在30年代形成一个影响颇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据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建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实验点、实验区有1000多处。1933—1935年，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乡建工作的内容包括：推广平民教育、职业教育，进行农业技术改良，推行农业合作，救济灾荒，搞乡村自卫和乡村自治，改革乡村社会组织等。其参加者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改良派，有国民党官员，还有不少进步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等，他们分别领导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山东、河北定县、江苏的实验。

梁漱溟提出了系统独特的乡村建设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文化失调”，具体说：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同时，中国文明为“乡村文明”，不同于西方的“都市文明”。自西洋风气输入后，中国原来的社会秩序和文明都被破坏了，但又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这种旧辙已破而新轨未立的状况，就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他认为必须从乡村做起，建立

一种既能发挥中国原有文明长处、又能容纳西洋文明进步精神的新的社会组织，“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其具体形式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后，在邹平、菏泽等许多县进行了这种实验。

晏阳初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为克服这四大问题，应进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进行教育的方式，有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成员，在定县搞了多年实验，建立了多所平民学校。

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理论，有一定合理成份，如梁重视农村问题，重视发展农业；晏重视教育，把办教育看作是比开金矿、煤矿更重要的开发“脑矿”的工作等。乡建派在各地的实验，对发展农村教育和推广农业技术等，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他们不敢正视中国的社会现实，不承认阶级区分与阶级斗争，梁漱溟还反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因而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也不可能达到救治中国的目的。

第二章 国内战争与日本侵略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党政府“安内攘外”政策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把蓄谋已久的武装侵占我国东北的计划付诸实施。

早在明治时代，日本即形成了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扩张政策。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后，把这一扩张政策推向了新的阶段。这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召开东方会议，专门讨论推行侵华政策的各项事宜。田中提出《对华政策纲领》，声称：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与日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决心负起“特殊的责任”，“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纲领还表示，日本将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并进一步扩张其在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的权益，实现它独霸东北的野心。

东方会议结束后，7月25日，田中上奏日本天皇，根据此次会议议定的内容，提出“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其核心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而为“征服满蒙”，又必须采取“铁血主义”。

秘密奏折把日本从侵占我国东北到称霸全世界的野心、步骤、手段完整地表达出来。1929年7月田中下台，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既定政策并没有改变。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缓解国内矛盾，进一步加紧实施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

1929年7月，日本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奉命起草《关东军占领满洲计划》。同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及石原命人进行“满蒙占领地行政”的研究。1931年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决定要“在东北四省内进行某种策动，并尽可能利用此种机会”，“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草稿），规定：在东北“如果反日运动变得激烈，则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并“力求在一年内即于明春以前生效”。但关东军认为1年时间太久，主张立即着手进行。

按照“进行某种策动，并尽可能利用此种机会”，即有意挑起事端，以作为武装进攻的借口这一阴险策略，日本侵略者在1931年7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事件，又利用日本参谋本部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被中国东北驻军抓获并秘密处死一事，疯狂煽动反华情绪，制造战争舆论。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将南满铁路沈阳附近柳条湖村一段路轨炸毁，随即向北大营中国驻军和沈阳城发起突然袭击。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此开始。次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布告示，反诬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因此必须“膺惩之”。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140页。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143—144页。

《田中奏折》，首先是1929年由中方方面披露的，但至今没有发现原件。日本官方人士和部分史学研究者矢口否认其存在，认为是“伪件”，但也承认后来日本所采取的对华政策，与奏折内容是一致的。中国方面的蔡智堪、王家桢提供有当年获取此文件的详细情节。见香港《自由人》，1953年8月29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九一八事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东方和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影响巨大的事件。它是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和称霸亚洲的重大步骤；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世界格局，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它也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寄希望于国联制裁，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前，当日本进攻东北的形势已十分明显时，8月16日，蒋致电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即将此电转发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演说，声明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公理之判决。”同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说已将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要求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全国国民亦“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力量“围剿”红军，在他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能威胁其统治的“心腹大患”，他不能既反共又抗日而“腹背受敌”。蒋介石站在以江浙为中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东北还不是他的“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东北丧失了，不过是把“有名无实”变为“并丧其名”，这对他“没有多大关系”。蒋介石对日本的武力一向怀着恐惧心理，认为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三天之内”，就能“灭亡我们中国”，中国没有抵抗日本的条件。他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的干涉上面。但是，国联并未能维护“公理”、“公法”，虽几经会商，也没能采取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反而对日本起了袒护和纵容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驻东北的日本兵力为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共10400人，9月21日从朝鲜调入一个混成旅团4000人，再加上其它军事力量如预备役军人、警察大队等，总计2万多人；而在东北三省和热河的中国军队有20多万人，击败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不抵抗命令使中国军队不战自退，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侵城夺地。9月19日晨，日军占领沈阳。同日，占领长春、营口、本溪、鞍山、抚顺等20座城市。21日，吉林省代主席熙洽投降，日军占领吉林市。至25日，辽、吉两省已有30座城市被日军侵占。然后，日军北向，11月19日占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接着，日军又掉转枪头南下，1932年1月3日，未发一弹进入锦州，并迅速占领辽西地区。2月5日，占领北满中心城市、东北特别行政区哈尔滨。至此，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3000万同胞，100万平方公里土地，数不尽的财产、宝藏、工矿设施，完全沦于敌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同声谴责。但是，由于一些主要国家不愿开罪日本，当时世界上并没有形成足以阻止日本侵略的强大压力。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开始是消极观望，偏袒日本；待日军占领锦州后，由国务卿史汀生发出“不承认主义”的照会，宣布美国不承认“九一八事变”以来“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但这不过是一纸空文。英国控制着国际联盟，国联的态度即表明了英国乃至法国等国的态度。开始，

国联采取不辨是非的办法，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置于同等地位，向中日两国提出同样的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的要求。10月22日，由法国外长白里安提出日本限期撤军的决议草案，但由于日本的反对，未能形成正式决议。日本准备进攻锦州期间，国联曾应南京政府的要求，讨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因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也拒绝接受，未能成议。1932年1月，国联组成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另有法、意、德、美等国代表参加的调查团，对事变进行调查。10月初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其中虽然也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又竭力为日本辩护，最后提出一个对东北地区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这反映了英美等国与日本的矛盾，也暴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1933年2月，报告书为国联所接受，但不久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这个报告书又成了废纸。

苏联政府从道义上同情支持中国，谴责日本，并主动提出恢复中苏邦交。但当时苏联的远东政策是以避免反苏阵线的结成为重点，因而也就设法使日本不变成苏联的敌人。苏联政府一再提议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表示准备同意伪满在莫斯科设立总领事馆，可将中东铁路卖给“满洲国”。

国民党政府依靠国联来制裁日本侵略的政策受挫的同时，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内反蒋派亦乘机猛烈抨击蒋介石集团。12月15日，蒋被迫下野。国民党政府发生统治危机。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燃起战火，向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突然袭击。日本此举的主要目的是转移中国和国际上对它侵占东北的注意，以便它在东北策划“满洲国”，确立殖民统治。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并得到上海人民热烈的支援，奋起反击，进行轰轰烈烈的淞沪抗战。

战斗打响时，南京政府没有立即支援十九路军。当时政府的实权，特别是军队仍掌握在下野的蒋介石手中。但是，十九路军抗战得到全国支持，国民党反蒋派抨击“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于是，依靠国联受挫的蒋介石，为挽回东北不抵抗损伤的声誉，并为复出创造条件，决定以有限的抵抗谋求对日妥协，采取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建议，令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驻防京沪、沪杭两线的第87、88两师，合成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参战，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这次上海抗战坚持整整一个月，给进犯的日军以重大打击。日军以大量增援，全线进攻。3月初，中国守军侧背防地被突破，不得不从第一道防线后撤到第二道防线。这时日军因伤亡惨重，远离海上补给线，又见中国军队筑起更加坚固的防线严阵以待，不敢再战。3月中旬，经英国公使斡旋，双方停战并举行谈判。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自5月9日起，日军从占领地撤兵；国民党政府则屈辱地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无驻兵权。第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

上海停战后，蒋介石正式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是“九一八”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发展，同时也是对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处理对内对外关系所一贯奉行的原则的新确认。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文

经两年多交涉，1935年3月苏“满”签订协定，苏以1.4亿日本金市的价钱将中东路卖给了伪满，实际卖给了日本。

告，声称“不先消灭赤匪”和“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又在武汉发表《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他决心“一本素志，全力剿匪，不冀其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决定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在“一二八事件”中，又推行以抵抗求妥协的政策。

1932年3月14日，即中日双方在上海停止军事冲突的同一天，蒋介石给国民党宣传人员发出手令：“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我中国之大患，乃在人心复杂散漫，精神萎顿不振，而又不能忍劳耐苦，乃至寇深匪狂。望我政治宣传各同志，刻苦耐劳，坚定工作，忍辱负责，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赤之使命”。此后，蒋又一再声明，他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是抗日来攘外。”事实表明，“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就是对内镇压、加强专制统治，对外妥协、出卖国家主权，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积极策划在东北成立傀儡政权。先是在省、县两级建立伪组织和伪政权。1931年11月把清朝废帝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次年3月1日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定都长春，改名新京。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年号“大同”。两年后，“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一切听命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司令官。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施残暴的军事政治统治，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又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使东北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在确立东北的殖民统治之后，便进一步向热河和长城一线扩张。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分兵三路进犯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毫无防御准备，日军仅以先头部队120多人便占领省会承德。蒋介石把热河失陷的责任归于张学良，迫使张辞职出国，其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权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4月，日军攻占长城一线喜峰口、冷口、古北口。此时，蒋介石正指挥国民党军对工农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不少国民党将领请缨援助长城抗战，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声言：如再有“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长城各口的守军虽英勇抵抗，但终因孤军奋战，都未能取胜。5月上旬，日军从长城线向冀东发动进攻，占领20余县，同时进攻察东。在这种形势下，经南京政府同意，北平军分会派代表与日方签订《塘沽协定》，把冀东划成“非武装区”，规定中国不得在该地驻军，而日军在撤回长城一线后，仍可对该地“随时用飞机及其它方法视察”。它表明国民党政府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此，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随时进占冀察，直取平、津。

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与国民党分化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浪潮，同时反对蒋介石误国害民的反动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各地苏维埃政府和随后不久成立

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多次作出决议，发表宣言，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发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共特别强调要在东北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组织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打击。这些主张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时中共中央已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之下，党中央没能把握住“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阶级关系急剧变化这一基本事实，因而也就没能制定和实施适应新形势的政策和策略。

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侵略下的东北各地，抗日运动首先兴起。各地各业工人纷纷举行反日罢工，或以破坏铁路桥梁、袭击敌人军车等办法，打击日本侵略者。各界群众积极进行抗日宣传。1931年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代理省长兼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抗战，重创敌军。1932年2月初，为阻止日军北攻哈尔滨，东北军22旅旅长赵毅率部进行双城阻击战。接着，24旅旅长李杜等率新组建的吉林自卫军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这些战斗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显示了中国爱国官兵不甘忍受日本侵略的斗争精神。

在东北，具有更大声势的是普遍于各地的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义勇军的名称不一，主体仍是东北沦陷前后重新组织起来的东北军旧部，另有由民间秘密会社和地主武装组成的，也有由土匪武装改编的，称作山林队。不少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的武装斗争。“九一八”后的1年多时间中，义勇军遍布白山黑水之间，人数达30万。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曾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大打击。但义勇军成份复杂，领导不一，既不依靠人民群众，又不互相配合，结果，到1933年便基本被打散。

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抗日救国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斗争高潮。各界群众的抗日救国会不断召开。工人举行抗日大罢工，组织救国会、义勇军等抗日组织。学生开展从罢课、集会、游行、发通电，到请愿、示威、成立抗日团体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出于爱国激情，请愿和示威的学生甚至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和代理行政院长，捣毁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学生们还当面逼迫蒋介石“北上”，发起“送蒋北上抗日”的运动。1931年12月17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制造珍珠桥惨案，对汇集南京请愿抗日的学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但是，人民群众的反抗怒火是遏制不住的，惨案发生后，各地纷起抗议。上海学生、工人和市民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抬棺游行。

“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要求抗日、停止“剿共”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许多工商业者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掀起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舆论的报刊，如《申报》、《国闻周报》、《大公报》等，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的误国政策，要求当局“改弦更张”。1932年1月18日《国闻周报》发表《我们的希望》一文，要求国民党“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以对外的‘涵养工夫’来对内”，“以对内战争的‘勇猛精神’来对外”；“以对外‘维持邦交’之精神来对内”，“以对内狡猾之手段来对外”。《申报》连续发表评论，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不少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表文章，呼吁“举国一致，共赴国难”，“立息内争，共御外侮”。有的还提出建立“国防政府”以集中人才的主张。这些情况表明，在日本大举进攻、亡国危险迫在眼前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提出非议，

甚至进行抵制。冯玉祥、李烈钧、程潜等通电全国，要求当政者“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误”，“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复东北。”继黑龙江马占山江桥抗战之后，1932年，19路军和第5军进行了上海抗战。

由于抗日浪潮的冲击，同时由于国民党的派系争斗，1931年冬国民党的统治一度陷入危机之中。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严重对立的宁粤两方，在“共纾国难”的口号下，开始举行谈判，并于10、11月间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决定先由宁粤两方各自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按规定的数额分别选出中央委员，然后至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讨论处理双方提案，改组政府；待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行取消。于是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和广州分别举行，但广州“四大”又分裂为广州胡汉民派和上海汪精卫派，广州方面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在这样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决定再次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

12月下旬，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蒋、汪、胡3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张继、伍朝枢、戴季陶、于右任分别为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院院长。由此实现了国民党各派政治权力的均衡。1932年元旦，林森、孙科就职，广东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取消。

但是，国民党表面上的统一，并未解决其危机。三个重要人物，蒋介石已辞职返回奉化，胡汉民和汪精卫滞留香港，这使国民党失去了权力中心。按新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已是“不负实际责任”，而“负实际责任”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仍然操纵实权的蒋系人物的掣肘，负不了实际责任，以致南京政府连日常开支都难以维持，中央政权几乎陷于瘫痪。孙科只得吁请蒋、汪、胡入京主持一切。

蒋介石决定拉汪排胡重新出山。1932年1月中，蒋、汪在杭州会谈，达成权力分配协议，由汪主持内政外交，蒋负责军事。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批准孙科辞职，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同时决定重设军事委员会，统管全国军事，并推举蒋介石为委员长。蒋汪携手，使国民党统治从危机中走出，同时也使其“安内攘外”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1932年春的上海抗战，曾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推向高潮。淞沪协定后，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下，抗日救亡运动一度消沉。到1933年，由于日本侵略势力向热河和关内的扩张，抗日运动又复兴起来，并有新的发展。

首先，是全国要求抗日民主的呼声高涨。

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

各地工人、学生、工商界、爱国华侨、宗教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主张出兵抗日。国民党军队一些将领也“请缨抗日”。舆论界要求国民党迅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王造时“忠告”政府“安内必先攘外”，“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益世报》发表社评说：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政府“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丁文江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要求蒋介石“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

商量休战”。这些言论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强烈愿望。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1932年12月正式成立后，为推动当时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1933年6月，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同盟仍然进行活动。

1934年4月，中共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许多人签名发表。纲领提出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的全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6项主张。5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在上海成立，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

其次，是国民党军队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国民党阵营分化的加剧。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时，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是为长城抗战之始。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压力下，亦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抵抗。从3月起，国民政府相继调动6个军36个师的兵力，抗击日军两个师团23个旅团和5万多伪军达两个多月，给日军以打击。3月9日，宋哲元部奉命夜袭被日军占领的喜峰口，用大刀砍杀日兵500人，又连续夜袭敌营，取得战果。冷口方面的商震部、古北口方面的王以哲部和中央军徐庭瑤部，也都对进犯的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多次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张对日抗战，收复失地。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们分任总司令、前敌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同盟军成立不到1个月，即发展到10万人。吉鸿昌率军分三路展开察北抗战，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将日伪军完全赶出察省。接着，同盟军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国土。但是，由于日军遭到沉重打击而企求停战，蒋介石为继续“剿共”亦求与日妥协。于是蒋决定结束长城抗战，破坏同盟军继续抗战的活动。国民党政府派15万大军进逼察省，包围张家口。冯玉祥被迫离开张家口。同盟军一部投奔陕北苏区，中途失败，一部由吉鸿昌、方振武率领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奋战于热河、长城一线，9月失败。方流亡国外，吉到天津转入地下进行抗日工作，11月被捕牺牲。

“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与红军作战。由于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愈益不满，并受到工农红军的影响，十九路军走上了抗日反蒋的道路。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及该军前领导人陈铭枢，联合国民党内以李济深为首的一部分反蒋势力及第三党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及其宣布的政治经济主张，代表了中间阶层的愿望和要求，是国民党营垒的又一次分裂。他们把本来对着红军的枪口，掉转过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是一种革命的举动。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采取了武力进攻与收买分化的策略，中共和红军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对十九路军没有给予必要的援助。至1934年1月，福建事变便被镇压。

第三，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

1933年春夏以后，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从自发的抗日义勇军斗争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主的阶段。1932、1933年间，中共领导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彦

等多支抗日游击队。随后，各地游击队陆续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或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发表统一建制宣言，宣布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抗联共编成11个军，并先后组成第一、二、三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张寿箴（即李兆麟）担任总司令或总指挥。人数最多时有3万人。抗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方面是人民的抗日运动在发展，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也在发展。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发表声明，狂妄地表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国，不许他国援助中国，也不许中国与外国发生不利于日本的往来。对这个狂悖的天羽声明，国民党政府不予驳斥，而是哀求日本的谅解。1934年7月至1935年1月，华北与伪满洲国实行通车、通邮，并在榆关设税关，这等于变相承认了“满洲国”。1935年5月发生“新生事件”。本月4日出版的《新生》杂志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了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也涉及到日本天皇。对此，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的罪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查封《新生》周刊，惩办杂志主编、文章作者和负责图书审查的官员。国民党政府完全接受日方无理要求，查封了杂志，判处主编杜重远1年零2个月徒刑，并在处理此事件期间，于6月10日发出“邦交敦睦令”，声言对违背中日“邦交”者，“定予严惩”。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也电告各地，“取缔排日运动”。此后报刊严禁出现“抗日”字眼。国民党的屈辱妥协外交，并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侵略步伐，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

三、国民党统治的加强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导下，采取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措施，来强化其统治。

国民党政权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实施军事专政。

1932年1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机构。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确认该委员会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所有“国防绥靖”之事宜皆由它“统率”。蒋介石任委员长。当时内地22个省份，有20个省处在军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余下的陕西、江苏两省，也都受军人支配。

1932年6月上旬，军事委员会颁发陆军师暂行编制表，规定：统一各师编制，军为直辖单位，军长不兼师长，全国48军、96师。由此形成了一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庞大的所谓“中央军”。这是国民党统治的主要军事支柱。国民党通过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补充和更新武器等办法，大力加强这支武装。除整编加强正规军队外，国民党还大力扩充反动地方武装。规定各地武装民团一律称“保安队”，另外还有“壮丁队”、“铲共义勇军”等武装。保安队以中队为单位，上设大队、总队。壮丁队和“铲共义勇军”每保一小队，合小队为联队、区队、县总队，分别由保长、乡长、区长、县长指挥。保安队负责本县“治安”，并协助邻县防务，将全

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出版说明”和“组织序列表”，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国每一寸土地，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在政治上，国民党通过扩大特务组织、厉行保甲制度、制定颁布反动法律等途径，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革命和进步力量、异己势力的控制、镇压和监视。

还在国民党政权建立初期，国民党内即已形成了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而受命于蒋介石的 CC 系势力集团。这支势力逐步扩大，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党政部门、文教和经济部门。在陈果夫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设“党务调查科”，相继由陈立夫、曾养甫、叶秀峰、徐恩曾等主持，其成员都是职业特务。1935 年底，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到抗战时期发展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除 CC 系外，蒋介石又指使贺衷寒、戴笠、康泽、曾扩情等于 1932 年 3 月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由蒋亲任社长。它以黄埔军人为核心，活动范围起初为军事系统，后扩展到其它方面。复兴社设有特务处和别动队，专门进行特务活动。以戴笠为处长的特务处，在全国各地遍设特务网，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异己力量进行监视，绑票暗杀，无所不为。后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以康泽为头子的别动队，是一支特务武装，到抗战时期一部分编入军队，一部分跟随康泽进了三青团。扩大特务组织，强化特务活动，这是国民党加强反动统治的重要一着，也是国民党政权法西斯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为了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控制，还在第二次北伐结束之前，蒋介石就电令浙江、安徽、江苏 3 省亟应“兴保甲，办团练”，并要求 3 省“首先兴办，然后推之于各省。”至 1936 年，全国已有 13 个省和北平、南京 2 市推行保甲制度。在保甲之内实行“管、教、养、卫”。管：管理户口，监视言行，实行“连坐法”，订立公约；教：进行党化教育；养：摊派捐税；卫：与编练民团相结合，建立地方武装。保甲制的推行，强化了国民党在基层的统治。

国民党政权建立以后，即着手制订维护其统治的各项法律。1928 年 3 月公布《中华民国刑法》和《暂行反革命治罪法》，11 月公布《惩治绑匪条例》。1929 年 12 月颁布《反省院条例》。1931 年 1 月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4 年 11 月公布《戒严法》。1936 年 2 月公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国民党利用这些法律，逮捕杀害了无数共产党员、革命者、进步人士和无辜的群众，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

在文化思想方面，国民党控制言论，“围剿”进步文化。他们通过颁布《出版法》、《宣传品审查办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实行“邮电检查”等强力手段，剥夺革命文化的出版自由，阻止进步书籍的发行，又派遣特务、侦探，组织流氓、暴徒，袭击和捣毁进步文化机构，绑架和杀害进步文化人士。1929 年，国民党政府就查封了创造社、艺术剧社和上海国民通讯社。1930 年 10 月杀害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宗晖。1931 年 2 月杀害共产党员青年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九一八”后，这种活动更加疯狂。1931 年，现代、北新、群众、江南、乐新等数家书店被查封。1933 年 5 月，作家丁玲和潘梓年被绑架，诗人应修人因反抗绑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作家洪灵菲被捕杀害。随后，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店被

关于 CC 的由来，说法有二。一说，1927 年 11 月陈果夫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中央俱乐部”，英文缩写为 CC；二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姓氏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为 CC。

破坏。1934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暗杀。国民党妄图利用这些手段消灭一切革命进步文化。

在“围剿”进步文化的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在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宣称：共产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法西斯主义能建立“有效能的统治权”，才是训政时期的中国“所要求者”。蒋介石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论调，兜售愚民主义的“力行哲学”。在蒋介石的提倡下，一些国民党的报刊掀起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狂潮。他还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硬说孙中山的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鼓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推行愚民政策。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逐渐建立起国家垄断资本，作为其统治的经济基础。国民党政府对经济的垄断，是从金融业开始的。1928年11月，南京政府成立中央银行。该行享有发行钞票、代理国库、募集和经理内外债等特权，先后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孔祥熙担任总裁，1935年资本总额达到1亿元。在此期间，南京政府又通过加入官股的办法，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33年设立鄂豫皖赣4省农民银行，1935年4月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4行之外，1930年组成邮政储金汇业局，1935年成立中央信托局。以4行2局为中心，再加上由国民党政府插手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小4行（新华信托、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北4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南3行（上海、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等二流银行，就形成了一个金融垄断网，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业。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度两改元的基础上，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以中、中、交三行（后加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均以法币为限；一切银币、银两都必须兑成法币，实行白银国有，作为外汇准备金；法币与英镑挂钩，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后又同美元挂钩，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

这次币制改革，标志着国民政府对全国金融控制的完成。也反映国民党垄断资本的形成。有其历史的进步性。由于统一货币，便利市场流通，因而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工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法币政策实行后的1936年，工农业生产达到旧中国历史最高水平。在法币政策下，集中货币发行权，阻止白银外流，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这对不久即爆发的全国抗战是一个必要的准备。

四、苏维埃革命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的主张，发动党员参加抗日斗争，特别是在东北积极领导了抗日武装斗争；同时领导苏维埃革命继续向前发展。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已经统治党中央领导机关，但它在各革命根据地的贯彻有一个过程，它本身也有革命和冒险两方面，所以尽管它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但由于苏维埃区域军民的共同努力，1931年后两三年时间中，红军和根据地仍有较大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毛泽东为主席；同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大会通过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

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还通过劳动法、土地法等文件，制定了各项政策。这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成果。但是大会通过的文件，都包含有“左”的错误，如规定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等。

由于受到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人，在该军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及团长黄中岳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这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一个有力打击，也是“九一八”后国民党营垒发生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1932年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对苏维埃区域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2月集中5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这时，毛泽东已被排除红军的领导岗位，但其战略战术思想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指挥下，于2月底至3月下旬，先后取得黄陂和草台岗两次战斗的胜利，歼灭蒋介石嫡系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接着，红军进一步扩大战果，使赣南闽西区与闽浙赣区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0万人，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

撤出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中旬越过大巴山，进入川陕边区。在粉碎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后，创建了一个包括20余县革命政权和拥有四五百万人口的新苏区。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

1931年以后，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边游击战争逐渐开展起来，先后成立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1935年2月，两个苏区统一领导和指挥，到年中，两地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在20余县范围内建立了革命政权。

撤出洪湖苏区的红三军，于1932年底到达湘鄂边，试图开辟新苏区。但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危害，使部队受到重大损失。1934年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批判了“左”的错误，使红三军得以摆脱危机。此后，仅3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包括5个县境，纵横100公里，人口10余万的黔东苏区。

1933、1934年，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高峰，全国红军达到30万人，根据地人口上千万。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贯彻，不久就大部丧失了。

五、红军长征与抗日救国主张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首先表现在白区工作中的盲动主义和“九一八事变”后所执行的错误的方针政策上。

1931年后的几年中，中共“左”倾领导者始终坚持一条所谓“积极进攻路线”。在这条路线下，每逢纪念节日，都要不顾客观形势和后果地组织斗争，如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讲演、贴标语、散发传单等等，结果每搞一次斗争，革命力量都要受一次损失，使党组织遭受破坏。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重大步骤，由此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共面临着如何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反对日本侵略与反对国民党统治及其它帝国主义的关系等重大课题。中共中央虽然提出了坚决抗日的主张，但未能适应抗日的需要而调整自己的认识和政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左”倾领导者提出：“九一八事

变”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帝国主义“公开的直接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运动”，因此，党和革命人民的任务应该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革命”。他们坚持把反蒋反国民党放在第一位，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策略，坚持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这样，就不可能做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发展革命和推进抗日事业，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境地。

“左”倾中央由于白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无法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瑞金。此前，“左”倾中央已经对各苏区领导机关实施了宗派主义的改造。在中央苏区，1931年11月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指责该区领导犯有“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游击主义”等“极严重错误”，开始排挤毛泽东的领导。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又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不顾周恩来等人的意见，调毛泽东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为进一步排挤毛泽东，贯彻“左”倾路线，1933年春相继发动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罗明被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毛谢古被指为“江西罗明路线”，亦遭到打击。从这时起，“左”倾冒险主义左右了苏区的各项工作。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四面出击，八方树敌，给苏区工作造成巨大损伤。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做好各项准备之后，对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这次“围剿”，国民党更加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厉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其中一半兵力由蒋亲自指挥进攻中央苏区。

对第五次反“围剿”，“左”倾中央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自始即采取了错误的指导方针。从9月下旬至11月中旬，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要求红军在苏区以外战胜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并由此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红军在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奋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反使自己遭受很大损失。此后，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既不敢插入敌后作战，又不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处处设防，节节抵御，进行阵地防御，与敌人拚消耗。结果连连失败，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至1934年10月上旬，博古、李德等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向湘西作战略转移。“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迫使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

红一方面军长征之前，1934年7月，红七军团6000余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赣边挺进，11月同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为打破国民党军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红十军团继续北上，1935年1月进至皖南地区，受挫后返回赣东北，主力2000余人在怀玉山地区被敌合围，大部壮烈牺牲，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被俘，后在南昌英勇牺牲。除派遣红七军团北上外，还命令红六军团西征。该军团9700余人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领导下，于8月上旬撤出湘赣苏区沿湘粤边西行，10月下旬在黔东与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

两个军团的行动。然后向湘西转战，至1935年1月初步开创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开始长征。项英、陈毅领导部分部队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者又由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消极避战，被动挨打，结果，红军继续遭受重大损伤。从10月中到12月初，虽然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部队也损失过半，锐减为3万余人。红军计划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部队到达湘桂黔交界处通道一带时，敌人已在湘西南布置重兵。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经黎平会议，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建立川黔根据地。1935年1月上旬，红军占领贵州遵义，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军事指挥上的是非问题，二是解决组织问题，三是解决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单纯防御”战略和逃跑主义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2月5日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再后，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左右，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会议决定改变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红军北渡长江，至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结束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确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组成的新的中央领导，这就在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南过乌江，佯攻贵阳，5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第一步胜利。此后，依靠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了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懋功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在组织问题上，张国焘想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抵制了他的无理要求，但决定由他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8月上旬，红军总部将各军就驻地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由朱德、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草地北上。中共中央同右路军行动。但张国焘仍坚持南下路线，并企图武力威胁中央顺从其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一、三两军（原一、三军团）继续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举行会议，决定将所率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经过许多艰难困苦，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今吴旗）镇。红一方面军历时1年、纵横11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至此结束。

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红十五军团是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9月中旬合编组成的。会师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建制。全军共1万余人。11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全歼国民党军一九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陕甘支队北上期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退却。10月上旬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公然分裂党和红军。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制止了他的错误举动。1936年6月，张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时北上。7月，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一带会师。二、六军团是上年11月撤离湘鄂川黔开始长征的。会师后，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10月9日，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一方面军部队会师。22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将台堡，同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会师后，四方面军主力和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共2万余人，奉命渡过黄河西征，随后改称西路军。西路军经过4个月的艰苦鏖战，最后遭到惨痛失败。

红军长征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锻炼、保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成为以后革命向前发展的基础。长征的胜利，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正像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英勇无畏的气概，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和到达陕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共产国际为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也进行了重要的政策上的调整。这两方面因素，推动着中共中央逐步改变国内战争的战略，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当时指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从中国分离出去，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6月，日本借口天津两个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和国民党遵化地方当局曾援助退入该地的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即所谓“河北事件”，以及在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曾被张北县中国驻军扣留，即所谓“张北事件”，向中国方面提出种种无理要求。6月27日，察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6日，经汪精卫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答应日方对冀省所提之各项要求，此即一般所称之《何梅协定》。通过“何梅”、“秦土”两个协定，国民党中央势力基本退出了冀察两省，中国在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接着，日本又策划华北5省自治运动。10月下旬，日军策动香河暴动，指使汉奸、反动地主、流氓占领县城，宣布“自治”。11月下旬，国民党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受日本的指使，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

会”（后改称“政府”），使冀东 22 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日本还一再逼迫国民党第 29 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策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实行“自治”。国民党政府继续妥协退让，明令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名义上仍隶属南京政府，但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

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激起中国人民新的抗日浪潮。“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平爱国学生首先奋起。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二九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由此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5 年 7、8 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鉴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大会正式改变了以往视社会民主党为工人阶级死敌及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决定在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大会特别讲到中国，赞同中共“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直接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方针，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开始纠正关门主义认识，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个宣言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激动人心的语言，号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共同抗日救国，做到“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还提出各界团结救国的具体组织形式，即“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首先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国内许多报刊转载，发生广泛影响。

1935 年 11 月下旬，受命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八一宣言”内容很快为中共中央所接受。11 月 28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内容与“八一宣言”基本相同。12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发表谈话，明确指出：“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确分析了中国时局的特点及阶级关系变动，指出日本准备吞并全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因而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新的民族运动，也具有了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这一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组织”。决议还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对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整。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充分论述新形势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严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

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式确立。

瓦窑堡会议及前此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进行“围剿”红军的战争；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在主观认识上，尚没有把反日与反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摆恰当，并且对蒋介石可能具有的抗日的一面估计不足，这就必然得出抗日是主要任务，而反蒋又是抗日的前提，必须既抗日又反蒋的结论。

到1936年，随着客观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中共上述认识逐渐改变。第一，1935年的华北事变，加剧了日本与蒋介石和日本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矛盾。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并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第二，蒋介石转而执行“联苏制日”政策，在苏联的推动下，开始寻求与中共政治解决的途径。第三，中共在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了解到即使像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学良，也还做不到反蒋，而认为应联蒋抗日。这样几方面因素，推动中国共产党重新考虑在抗日大前提下的对蒋关系问题，即由反蒋抗日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1936年2月，为打通抗日路线和扩大苏区，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由于受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重兵阻拦，5月初红军回师陕北，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接着，红军又西征甘肃、宁夏，开辟新的根据地，从而正式形成陕甘宁苏区。在中共朝着逼蒋抗日方向转变的过程中，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提出“不能同时既反日又反蒋”、抗日“必须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的意见。8月25日，中共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标志“反蒋”主张的正式放弃。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目前条件下，“国民党军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发展。这一方针转换的完成，表明中共真正把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才能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以真正贯彻，使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使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得以发动。

六、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一）广泛联络上层人士。其中包括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爱国将领、社会名流、学者，也包括国民党核心集团中的某些人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先后致书杜斌丞、宋子文、邵力子、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许德珩、冯玉祥、张伯

苓、陈果夫、陈立夫、张东荪等许多人，解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吁请他们促成中国合作抗日局面的实现。

（二）实行白区工作的转变。1936年3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达天津，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大力克服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把中共的白区工作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轨道，实现白区工作的转变。刘少奇发表一系列文章、报告及党内通讯，批评错误做法，阐发正确的方针策略和工作方法。为了推动白区工作的转变，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写了《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阐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及领导群众斗争的原则等问题。

（三）同国民党当局重新接触。1935年4月，蒋介石派其亲信邓文代任中国驻苏使馆首席武官，与苏当局联系中苏联合制日事宜，并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与中共联络。王明会见了邓，并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接触。在国内，中共北平市委派吕振羽、周小舟到南京与国民党方面的曾养甫、谌小岑举行了会谈；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张子华也会晤了曾养甫；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了由宋庆龄派往陕北的董健吾所转达的国民党方面要求谈判的信息。这也促使中共逐渐放弃反蒋口号，并在1936年8月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正式提出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9月以后，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上海与国民党谈判。至11月，因国民党坚持“改编”红军的要求，谈判无结果而终。

（四）争取地方实力派。如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写信、发表谈话、派干部、会谈等多种途径，与他们取得联系。其中特别是大力做驻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十七路军）的工作，争取首先在西北造成合作抗日的局面。东北军官兵有家乡沦陷之苦，迫切希望打回老家去。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九一八”后又一直以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代蒋受过，怀有强烈的洗雪国耻、报效国家的愿望。杨虎城西北军曾有过与共产党合作的历史，又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歧视。东北军、西北军都在“进剿”红军中遭到失败，已感到“剿共”无出路。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途径，既联系上层，又争取下层，很快改变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敌对关系。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秘密会谈，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完全停止敌对状态。这对后来中国政局关系极大。

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1936年内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由“一二九”开始的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一直在持续着，并且开始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抗日救亡刊物大量出现，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1936年5月在上海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实现了国民党统治区各界爱国进步人士的大集合。

1936年6月初，发生两广事变。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的旗号，公开与蒋对立。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当局领导全国抗日，并把所属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准备进兵江西、湖南。这次事变带有国民党内部争斗的性质，但也增加了全国抗日的气势。蒋介石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下反陈，另一方面拉李宗仁举行谈判，再加全国救国会做工作，呼吁各方团结御侮，结果，陈济棠于7月中旬宣告下野，

李宗仁仍在广西任职，战事未起。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日军与伪军李守信、王英等部进攻绥东，中国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抵抗，与日伪军大战于红格尔图等地，把日伪军击败，并乘胜收复百灵庙。全国掀起援绥运动。

当时，一方面，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认真贯彻，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在对外对内政策上有些变化，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没有改变，当两广事变解决而用政治谈判取消红军的企图失败后，又把主要精力用在“剿共”上面，决心把共产党和红军消灭在西北。这两方面情况，使已决心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尖锐起来，到1936年11、12月，达到不可化解的地步。

11月绥远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严词拒绝了张学良带兵援绥的要求，令张专心“剿共”，否则将撤职。同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激起全国巨大的抗议浪潮。张学良亲自架机到洛阳见蒋，要求释放七君子，又遭蒋拒绝。12月4日，蒋介石赴西安“督剿”，要求张、杨：或服从命令，全力进攻红军；或撤出陕甘，东北军调闽，西北军调皖，由中央军“进剿”。至此，蒋已把张、杨逼入绝境，不反抗，即灭亡。张、杨经过密商，决定既不“进剿”，也不外调，对蒋再做说服，促其停战议和，如劝说不听，就实行“兵谏”。12月7日，张向蒋“哭谏”，蒋表示至死不会改变“剿共”政策。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人示威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游行队伍步行往临潼向蒋请愿抗日，蒋命张制止，如不听，“格杀勿论”。张学良进一步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也再一次被蒋介石的顽固态度所激怒。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是日凌晨，张学良派部队至临潼华清池捉蒋。同时，杨虎城派部队在西安城内拘捕了随蒋来西安的军政要员。12月13日，张、杨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这次行动的动机是对蒋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主张。

西安事变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国内外各种势力都做出自己的反响。其中，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南京政府分成“讨伐”和反“讨伐”两派。开始时，以何应钦、戴季陶为代表的“讨伐”派占上风，何被推为“讨逆总司令”。以英美为背景的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等反对讨伐，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冯玉祥、张治中等也主张和平解决。这样，主和的意见很快又取得优势。他们派先后做过蒋介石、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首途西安，进行试探。

共产党对张、杨的“兵谏”之举，事先并不知道，但事起之后，张杨很快电告了毛泽东，并电请中共派代表去西安共商大计。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和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也很快电告了此事。中共中央得悉后，及时做出支持张、杨的反响，肯定事变是为了抗日，是义举，决定：第一，致电张、杨，建议他们做好军事部署，以免西安腹背受敌，并应搞好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团结；第二，红军南下，策应东北军、西北军行动；第三，派周恩来等去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事变如何解决呢？在中共中央12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负责政治局与书记处工作的张闻天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等意见，亦即主张同南京政府和平解决事变。但在怎样处理蒋介石

这一解决事变的核心问题上，却经历了一个反复研究和讨论的过程。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在同张学良会谈中，取得要保证蒋介石安全的共同意见。12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否定了把蒋交人民裁判的意见，提出“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不站在反蒋的立场”。同日，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对西安事变的原因、意义、可能出现的前途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都做了正确的分析和规定。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西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南京方面派出宋子文、宋美龄来西安与张、杨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宋氏兄妹也进行了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同西安三个方面（张、杨、共）的谈判，达成了若干项口头协议，包括：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蒋向周恩来表示：第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第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第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蒋要求不采取签字方式，而以人格作担保。12月25日，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正式和平解决。25日当天，蒋到洛阳，迫令张学良电告杨虎城释放被扣的国民党其它军政要员。26日，蒋回到南京，当天发表《对张杨的训词》。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李烈钧等组成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判刑10年，几天后，国民政府又予以“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软禁。1937年6月，杨虎城被逼出国，回国后被国民党逮捕关押。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毛泽东语）。经过这次事变，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剿共”政策，开始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这是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过渡的关键一环。从此，近10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新的国共合作局面开始出现。

国民党为了商讨西安事变后的内外政策，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会前致电该会，向国民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5项要求的核心是希望国民党放弃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采取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新政策。4项保证的基本精神是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以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和全国抗战的发动。会议开幕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要求国民党联共抗日。会议发表了宣言，其对内政策部分，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对外政策部分，仍向日本企求和平，但表示如果“超过忍耐之限度”，就要“决然出于抗战”。会议还通过决议，攻击共产党，声称必“使赤祸根绝于中国”，但又含蓄地表示，可在一定条件下与共产党谈判和合作。通过这次会议，国民党正式把“武力剿共”政策改变为“和平统一”政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共产党对该会的通电，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此后，中共派出周恩来等人，与蒋介石等又进行了多次谈判，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个半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由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关头，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以求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和今后的中国革命能有正确的指导。1936年12月毛泽东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积近10年红军战争的经验，集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探索的成果，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1937年7、8月，毛泽东写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基本观点的两篇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该提纲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提到一个新的水平，确定了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共在新的征程中继续前进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

第三章 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一、左翼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主要方面是军事斗争，同时也包括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左翼文化运动，就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所领导的思想文化斗争的基本内容和表现。

在1927年革命大转折时期，“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他们主要汇集于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文学团体，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两个文学团体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作家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主张创造为完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服务的革命文学。这是对的，是五四时期提倡文学革命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大进步。

但是，当时正是“左”倾思想在国际进步文艺界和中共党内严重存在的时候，再加上两个团体的成员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因而也发生不少“左”的错误。一方面是在文艺观点上，他们把文艺的作用夸大到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片面强调“文学是宣传”，又把作家世界观的改造简单化；另一方面是把鲁迅当成了革命文学的障碍，不仅改变了原来同鲁迅联合行动的计划，而且向鲁迅发起攻击。对五四以来其他有声望的作家，如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也一概否定。由此引起了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鲁迅批评了两个文学团体的“左”倾幼稚观点，正确地阐明了文艺的作用、性质及作家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他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文艺与革命》、《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章中指出：各种文艺作品“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文艺并不具有“改变环境”、“旋转乾坤”的作用；“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文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不是“突变”的。鲁迅还特别批评了某些人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面孔，“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错误。

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及其他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1930年3月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者有鲁迅、茅盾等50余人。成立大会选举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并发表《理论纲领》，说明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反对一切反动的文艺思想，为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文学艺术而斗争。

左联成立后，又相继成立了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美术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教育家联盟、世界语联盟、电影小组、音乐小组及其它左翼文化团体。这些团体又联合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委员会的领导。这样，就形成了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左翼文化大军。此外，还有一大批有声望的文化界人士和作家、艺术家，虽没有参加“文总”，但却是左翼文化的同盟军和战友，如邹韬奋、

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1980年4月2日《人民日报》。

巴金、老舍、曹禺、郑振铎、叶圣陶等多人，他们各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革命进步文化作出贡献。

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采取多种方法保住和发展出版阵地，不断出版新的刊物，并不断改变形式和名称。如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后，即改出《新生周刊》（杜重远主编），《新生》再被查禁，就再改出《大众生活》。左翼作家经常更换笔名，以躲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鲁迅后期使用过的笔名竟多达70余个。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在中间性的甚至偏右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左翼文艺工作者通过努力，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电影小组初成立时，只有夏衍、郑伯奇、钱杏邨等几个人，后来队伍迅速扩大，几乎完全掌握了上海几家著名电影公司的编导权。

左翼文艺家通过论战，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进攻。

还在左联成立之前，1928年，“新月派”的梁实秋等人就曾以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抹煞文学的阶级性。他们提出：文学“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天才“是基于人性的”。人性并没有阶级之分，“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的就不能成立。”革命文学阵营的彭康、冯乃超等相继著文予以批驳，阐明文学具有阶级性的道理，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创造“自身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性。鲁迅则指出：文学必须借助人才能表现“性”，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梁实秋取消文学的阶级性，但对其文章内容“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革命文艺队伍批评了新月派，阐明了无产阶级关于文学阶级性的原则。

1930年6月，一批国民党官员、特务、反动文人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标榜“民族主义”是“文艺的最高意义”，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吹捧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的战绩，散布反苏媚日的反动思想。所谓“民族主义文艺”，不过是直接为维护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一种喧叫。他们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就是由国民党中宣部最后审定的。所以，革命文艺家着重揭穿了这个派别的反动实质。茅盾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艺，不过是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之外的“无耻的麻醉欺骗”伎俩，他们的文艺作品，更是干脆“鼓吹‘屠杀’！”“完全暴露了法西斯蒂的面目。”瞿秋白、鲁迅直斥民族主义文学就是“屠夫文学”，“宠犬派文学”，“流尸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喧叫，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即宣告破产。

1932年又发生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开始是以“自由人”自诩的胡秋原在批判民族主义文艺的同时，散布了攻击左翼文艺的观点。接着，是把作家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进一步宣扬超政治、超阶级的文艺论。胡秋原说：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有某种政治主张的人，每欢喜将他的政见与文艺结婚，”这是“使人烦厌的”。

见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5月出版，第10—17、49—56页。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68、69页。

这明显是针对无产阶级文学阵营而发的。苏汶把阶级观念与文学创作、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硬说当文学有了阶级观念之时，它就由“处女”变成了“人尽可夫的卖淫妇，她可以今天卖给资产阶级，明天又卖给无产阶级”。如此，文学就不再是文学，而“变为连环图画之类”；作者也不再是作者，而“变为煽动家之类”。

胡、苏所表达的“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观，核心仍是否认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对此，左翼文艺家们指出：文学的阶级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个文学家，不论他有意还是无意，“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文学是附属于某一阶级的”，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必须指出文学阶级性这一“真面目”。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鲁迅生动地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这“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瞿秋白还提出“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这一命题。周扬则论述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左翼文艺家对文学的阶级性与真实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以及文学价值观、作家思想改造等无产阶级文艺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做了较深刻的说明。但是，从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就有的文学上的机械论、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在这次论争中依然存在着。瞿秋白、冯雪峰等觉察到并批评了这种倾向，但提出更尖锐批评意见的，是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他在1932年11月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尖锐指出：否认“第三种文学”存在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学之外，显然还有小资产阶级文学，并且这种文学在目前中国革命文学中是“最占优势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不是敌人，而是同盟者。对他们不应排斥和谩骂，而应“解释、说服和争取”。他不赞成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说法，认为这种观点大大缩小了文学的范围，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在阶级社会，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只要“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即使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也仍然是有价值的作品。张闻天还论到文艺大众化问题，认为：文艺应该大众化，但绝不能说只有通俗的宣传鼓动作品才是无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应该利用“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张闻天的这些意见，对左翼文艺工作者起了指导作用。

左翼的和其他进步的文艺家在创作上取得了多方面成就。左翼文化时期的鲁迅以撰写杂文为主，创作了上百万字作品。他的杂文具有锋利、泼辣、幽默的风格，内容涉及到非常广泛的社会面，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做到了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正是经过鲁迅及他影响下的现

《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118、121页。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134—135页。

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同上，第149—150页。

《论“第三种人”》，同上，第180页。

《张闻天文集》（一），第307—312页。

代杂文作家的努力，使杂文成了现代中国文坛的一种重要的文体。瞿秋白、茅盾、唐弢、徐懋庸、聂绀弩等也都写出一批思想深刻、艺术高超的杂文作品。

小说创作方面，茅盾、巴金、老舍等写出了传世之作。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于1933年出版后，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这部小说形象地、真实地反映了3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阶级矛盾，成功地塑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以艺术的形象说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茅盾的小说还有《林家铺子》等。巴金于1933年出版长篇小说《家》。它以“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抗争精神。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于1936年秋在杂志上连载。它通过对北平一个人力车夫一生勤苦劳作和最终悲剧的描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与命运，对旧社会发出了血泪的控诉。当时有影响的作家还有叶绍钧、蒋光慈、张天翼、沙汀、丁玲、叶紫、萧军等。总计左翼作家和其他进步作家在十年内战时期创作的中长篇小说，约有150余部；短篇小说数以万计，汇集成书的就有上百种。

剧作方面的最高成就，是曹禺1935年创作完成的《雷雨》，它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生活悲剧，展示了这个家庭的罪恶历史和现实，使人们看到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和下层人民痛苦悲惨的处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曹禺的名著还有《日出》。著名的剧作家还有田汉、夏衍、洪深等。

诗歌方面，有殷夫的诗集《孩儿塔》，臧克家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艾青、田间也都发表了激情盎然的诗篇。

电影艺术的成就也十分突出，《渔光曲》、《马路天使》等都是影响广泛的优秀影片。

音乐方面，田汉、聂耳等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等不朽之作。

左翼文化工作者开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宣传。其中鲁迅和瞿秋白的贡献尤为突出。鲁迅所译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和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在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瞿秋白翻译了《高尔基论文选集》，编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列宁论托尔斯泰》，撰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斯大林与文学》等多篇评介文章。

30年代以鲁迅为旗帜，以左联为组织核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一座丰碑。它是“五四”以来文化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后来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荣先驱。

二、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争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上半期，中国思想理论界和文化界论战迭起。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农村经济性质论战、新哲学论战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等，相继发生，并产生广泛影响。

1927年革命高潮过去之后，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无论主张走什么路，都必然涉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而国情认识的核心又是社会性质问题。

中国革命是在苏联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中国思想界

的反思又必然受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内意见分歧的影响。拉狄克、托洛茨基等一派，认为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拉狄克），或说：“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托洛茨基）；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过去，再爆发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斯大林等则认为：中国的基本事实，一是“半殖民地地位”，二是“封建残余的压迫”。因此，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反帝“民族解放革命”。但又认为1927年民族资产阶级已背叛革命，小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因而强调工农民主革命。中共“六大”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而中国托派，则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变成“残余之残余”。

中共中央和托派组织都发动自己的成员及其影响的知识界阐述各自的观点，从而构成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还有一些文人学者乃至政界人士，也都纷纷提出看法。如：顾孟余认为中国的社会构造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陶希圣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但“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士大夫阶级”；梅思平认为中国社会“乃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顾是“改组派”，陶、梅属由《新生命》杂志形成的“新生命”派。

1930年4月，《新思潮》杂志刊载“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吴黎平、王学文、李一氓等人的文章，阐明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主张，批驳了托派和陶希圣等人的观点。这期专号的出版，标志着社会性质论战的开始。接着，托派任曙、严灵峰等发表论著，反对《新思潮》的观点。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同年8月至1933年4月又出版《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4辑，汇集了各种观点的有代表性文章50余篇。其它许多刊物也参与论争。有关专著相继问世。这样，社会性质论战在社会史论战这一总标题下掀起高潮。

论战中对中国社会性质提出的观点，可谓五花八门，至少有10余种，但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说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说之争。

托派任曙、严灵峰等地开对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研究分析，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而且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度夸大，由此断言“中国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他们抹煞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依存的事实以及帝国主义经济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要“绝对”破坏封建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对华洋资本应“一视同仁”、“一并计算”。他们还歪曲农村的阶级关系，认为在中国占有广大土地的“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

中共理论工作者驳斥了托派的观点。他们指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他们分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既肯定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又指出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

该杂志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出版。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它不可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更不可能“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地主阶级经营土地和剥削农民的租佃方式，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封建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经济中仍然占据着优势，因而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极为重要。自然，当时的宣传，也有不当之处，如把整个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相提并论，一同看作是革命对象，这反映了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的一种“左”的观点。

到1935年，又发生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争论。这是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和深入。论战的一方为中共理论工作者钱俊瑞、薛暮桥等，他们以《中国农村》月刊为阵地，被称作“中国农村派”；另一方为托派王宜昌、王景波、张志澄等，他们以《中国经济》月刊为阵地，被称作“中国经济派”。前者从农村经济的分析中，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及农村土地革命的必要。

对当前社会性质的认识，必然要联系到对过往历史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展开不久，又扩展为整个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事实上，当时这两个论战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前者也被看作是后者的内容之一。

社会史论战涉及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和几千年历史的进程，问题极为广泛、复杂。它既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又带有很大学术性质。大体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社会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中国未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等。每一问题都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争论十分激烈。这场争论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进步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初步理出了中国社会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脉络。按照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这就为中国新史学体系的建立确定了框架。经过论战，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历史科学著作，推动了中国史学队伍的成长。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为创立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也都取得成就。

关于新哲学即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是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风行全国的形势下，由资产阶级学者张东荪挑起的。他在30年代上半期发表《我亦谈谈辩证唯物论》、《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等文，出版《认识论》、《现代哲学》等专著，还编辑了《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张东荪提出“架构”论，认为客观外界“只是空的架构”，“有物理而无物质；有生理而无生命；有心理而无心灵”。他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攻击辩证法已成了人类思想史和学术史上“过时的古董”，马克思的辩证法“错误到不可救药”。

年轻的理论工作者邓云特（邓拓）迎接了张东荪的挑战。他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张东荪的观点，其中《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尤为重要。他指出，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有它的总规律”，唯物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总规律”、“普遍法则”。他解释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认为“每一事物之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一切事物的运动都以矛盾为其动力”；“事物之发

展，必须有量的积累与质的突变”；“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是“自然、人类社会及思维等一切现象发展的过程”。

叛离共产党的叶青，也相继发表《哲学到何处？》、《张东荪哲学批判》、《论哲学的消灭》等著作和文章，并编辑了《哲学论战》文集，批判张东荪，以所谓新唯物论者自居。但叶青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对者。他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哲学消灭”论，说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宗教早已消灭了，现在是“科学独霸知识界的时代”，科学“消解”了哲学，“哲学的本土没有了”，哲学也就“消灭了”。叶青对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观点，如运动的绝对性、矛盾的普遍性、对立物的统一与斗争、量变质变、内因外因等，都做了歪曲的解释。

青年哲学家艾思奇，着重反驳叶青，也批判张东荪。他发表《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几个哲学问题》等文，又在上海《读书生活》连载“哲学讲话”。他批驳了叶青的哲学消灭论，指出哲学并没有消灭，新唯物论“使哲学仍保持着独立的领域和对象，那对象就是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法则，也就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运动变化的总法则”。哲学“必须以各科学部门的研究为基础。同时，它也可以反过来指导各科学部门的研究”。“哲学讲话”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既是批判错误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贡献。

《哲学讲话》单行本 1936 年出第四版时，易名《大众哲学》，至 1948 年共印行 32 版。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李达，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哲学论战，但他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1935 年，李达写成并印行了《社会学大纲》一书，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系统阐述。它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稍后发表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共同标志了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

三、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同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样，也是有关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不过，侧重点是经济出路问题。

实现现代化，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有志于中国富强的人们的一项追求。“师夷长技”的提倡，“中体西用”的主张，洋务活动的推行，变法维新的尝试，中华民国的缔造，“实业计划”的制定，代表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所作出的努力。当然那时并没有“现代化”一词的出现，也没有对现代化的内容作出全面论证，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未能达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进入 30 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中国的国民经济愈加衰落。同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至 1933 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已占据了整个东北。落后挨打的严酷事实，使现代化的重要性更突出地显现出来。30 年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33 年 7 月，《申报月刊》利用创刊一周年的机会，出版“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刊登 26 篇论文，从各方面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一）关于“现代化”的必要及其含义。

《申报月刊》编辑部为特辑所写的“编者之言”中，对“现代化”的必

要性作了清楚的说明：“中国现代化”问题，虽然已是“八九十年来的宿题”，但“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筹一展的地步。”“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亦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编者把是否“现代化”的问题，提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加以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在讨论中尽管多是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立论，但实际上对现代化含义的理解仍是多种多样的。大致有：（1）“现代化”应分广狭二义，广义的现代化包含社会的各个方面，现代化应是整个社会的；狭义的现代化即指产业革命、经济改造、生产力的提高。（2）现代化虽然包括政治文化学术及社会制度各方面，但主要含义却是经济方面的，即工业化与机械化。（3）就国家社会言，现代化只指工业化，“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至于政治、宗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关系”；就个人和物品言，“现代化包含着进步的意思”。（4）现代化“就是‘革新’的另一种说法”。（5）现代化是一种“过程”，过去指“资本主义化”，现在“无疑的是指那走向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而言”。（6）如同中国革命是全世界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一样，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全世界‘现代化’的大连锁之一”。

（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困难、障碍和先决条件。

这是《申报月刊》提出讨论的重点之一，有21篇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来自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因此，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如有的论者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当然是须先消灭障碍中国前进的反动堡垒，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魔掌里夺回来。换言之，即对外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废除不平等条约，摆脱一切经济上与政治上之桎梏，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同时对内发动广大的民主斗争，扫荡军阀政治，肃清残余的封建势力。”二是认为“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先自侮乃至外侮”，中国之实业不振，系由“自身种种原因所造成”，补救之法，当然要从克服自身之弱点做起。诸如利源未浚、地力未尽、技术幼稚、方法陈旧、管理不善、资金缺乏、运输阻滞、产品粗劣、政治腐败等等，认为应该由改善这些状况做起。三是强调教育的作用，认为“中华民族本是教育程度不足的人民”，而现在又“都不知道把精神文明建筑在物质文明之上”，只是强调“物质救国”，这就造成一种“想学德意俄，我们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想学英美，我们又没有自由开化的民众”的状况。挽救的方法，当然只有从发展教育入手。

（三）关于现代化的方式和资本问题。

这是《申报月刊》所提另一讨论重点。关于现代化方式即道路问题，不少人主张社会主义，也有不少人主张经过非资本主义路线进入社会主义，或主张兼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所长，或主张实行“受限制的资本主义”，还有人明确主张资本主义。

赞同社会主义方式的人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认为中国应走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的道路。他们从当时全球性的经济恐慌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又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看到了希望，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我们不能重复”。另一种主张社会主义方式的人，是把社会主义只单纯理解为“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断言可以“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可以不对现制度进行批判和分析，而着力于研究推进统制经济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非资本主义路线”的主张是：中国社会为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既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目前也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所需要的是“由广大被压迫群众自动地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创造非资本主义的胜利的条件”，一面凭借广泛的政治力量，扫除封建剥削，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支配，一面确立进步的经济政策来改造涣散的小农经济，“经过相当的发展以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有人称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化”。

主张资本主义方式的人认为，“经济进化有一定之程序”，中国为一贫困之国家，第一步当设法增加富力；而“获得为人类本性”，“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也。”所以，“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

关于现代化所用资金来源问题，除个别论者主张“孤军奋斗”、完全采用国民资本外，其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利用外资，“国民资本及外国资本，当同时兼用”，但必须是“利用外资”，而不能“为外资所利用”。

《申报月刊》所发起的这次讨论，虽然仅限于知识界，但仍具有重要意义。它把体现世界潮流的现代化问题突出地提到中国人民面前，并且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东方杂志》等许多刊物也相继发表文章，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现代化问题的主体当然是经济现代化，但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创造相应的政治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问题讨论，是同旨在说明中国要不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性质的论战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这一论战的发展。现代化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问题，所以，不久它又成为“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之争中的重要议题。到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仍在时断时续进行。

四、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

1935年前后文化思想界展开的“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之争，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与深化，也是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的进一步发展。

先是，国民党为进一步实施对革命进步文化的“围剿”，配合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于1934年发出所谓“文化建设”的号召。这年3月，国民党在上海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推举CC系头面人物陈立夫为理事长。该会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为宗旨，要求“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孔孟道德。10月，文化建设协会创办《文化建设》月刊，其发刊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宣称要发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陈立夫为该刊创刊号撰写《中国文化建设论》一文，说要“以科学化运动检讨过去，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以文化建设运动创造将来，然后乃有中国的民族复兴”。正是在国民党的这种“文化建设”的召唤下，1935年1月10

日，上海、南京、北平的10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十教授宣言”的特点是：完全以“文化建设”的姿态出现，字面上未涉及现时任何政党、派别、主义之争；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颇显出一种公允、辩证的样子；极力强调中国的所谓特殊性、时代性。宣言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因此，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以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宣言认为，建设中国文化，既不该“复古”，也不该“模仿”英美、苏俄、意德，因为中国有其“特殊性”和“时代性”，中国本位的基础应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宣言提出的文化建设的总原则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这篇“宣言”的基本精神与国民党的所谓“文化建设”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它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东西文化问题，同时它又是由十位文化名人提出来，所以引起很大反响。许多报刊发表社论和评论文章，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地相继召开座谈会，这使沉寂了多年的东西文化论争又活跃起来，掀起又一次讨论高潮。论者中，对宣言表示拥护赞扬的，表示激烈反对的，表示部分赞成的，作进一步申述补充的，都大有人在。5月，十教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对宣言中所说“此时此地的需要”作出进一步解释，这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从宣言发表到当年8月，仅《文化建设》月刊登载或转录的有关文字即达百万字以上。年内先后有《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编辑出版。

从东西文化关系角度激烈反对十教授“本位文化”论的，是“西化”派胡适和“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等。胡适揭露了十教授宣言的复古本质。他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不过，是把“复古”主张、保守心理“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胡适又以“文化惰性”的观点，批评十教授维护“中国本位”之错误，阐明他提倡“西化”的理由。他说：“十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即不知道“文化本身是保守的”，“自有一种‘惰性’”。文化变动无论怎样激烈，也“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拚命走极端，文化的情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即使“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旧文化的“惰性”也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陈序经是“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者。20年代末、30年代初，陈序经在国外留学时即大力宣扬“全盘西化”的观点，1933年底又在广东中山大学作“全

10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培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儒、樊仲云、萨孟武。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309—403页。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编辑后记》，《从“西化”到现代化》，第425—429页、424页。

盘西化”的讲演。十教授宣言发表后，“全盘西化”论与“本位文化”论构成截然对立的两方。陈序经不但反对“本位文化”论，而且批评胡适的主张也是持“折衷调和论”。他主张“全盘西化”的理由是：其一，文化本身“是一种系统”，“分开不得”，一方面变动，他方面必受影响，因此，要采纳西洋文化，就必须“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其二，“西洋文化，是现代的一种趋势”，它包含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好处”，是“正趋于为共有的道路”的文化；而中国文化，自汉以后就“迟滞不前”，“不符合现代的环境和趋势，又为采纳西洋文化的障碍”。其三，“文化的本身，是整个人类所共有共享的东西”，“文化亡，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其四，中国文化样样不如西洋文化，“我们无论在文化哪一方面，都没有人家那样的进步。”其五，全盘西化，可使文化的“惰性”自然消失。

“本位文化”论者们，是“全盘西化”论的当然反对者。十教授之一王新命发表《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一文，力斥“全盘西化”论者“忘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四万万民族也是文化的产物”；“忘记了全盘西化的结果会把西方人垃圾箱中的垃圾来替代中国人饭碗中的白米饭”；“忘记了聪明相等的民族纵有其不相如的地方，而在文化的创造上，决不会甲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天堂的材料，乙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地狱的材料”；只看到了西洋的好处，没有看到西洋的坏处；“忘记了性史春药洋八股的流行，正是无条件接受西化的中毒状态。”继之，十教授“总答复”中，明确表示“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必须“审慎的选择”，否则，“岂但反客为主，直是自甘毁灭”。

不少反对“本位文化”论的人，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论。如吴景超反驳陈序经的文化“系统”说，指出，“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的说法，只含有一部分真理，火车与车轨、男女同校与社交公开，这是分不开的；但“我们采纳了西洋电灯，是否便非采纳西洋的跳舞不可呢？采纳了西洋的科学，是否便非采纳西洋的基督教不可呢？”张熙若也阐明了同样的道理：现代工业与现代科学、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劳工问题、近代社会主义与近代人道观念人权观念人格观念、近代许多学术与进化观念等，这些是分不开的；但又有许多部分是可以分得开的，“日本人完全吸收了西洋的科学，同时又保存他们自己的大和魂。苏俄采取了西欧和美国的生产工具，同时又拒绝它们的资本主义。”张熙若进一步以具体事例驳斥了西洋什么都比中国好的“洋迷”思想。

胡适从“文化惰性”论出发，曾经主张过“全盘西化”。在1935年这次论争初起之时，他还表示：“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但同年6月，他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正式声明放弃这个口号，因为他已感到这个口号“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这是“不容易成立的”。他提议：“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

见《中国文化之出路》，《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70—375页；《东西文化观》，《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再谈全盘西化》，《独立评论》第147号。

《从“西化”到现代化》，第446页。

《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412页；第413页。

《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同上，第449—450页。

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中国本位”、“全盘西化”，都表明了对待中西文化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前者的实质是“复旧”，后者的本质是“崇洋”，它们代表了两种极端的看法。那些既反对“中国本位”，又反对“全盘西化”或与“全盘西化”论者有区别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提出了他们各自的主张。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自由接触与“充分世界化”（胡适）；“努力现代化”或“尽量现代化”（张熙若、严既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熊梦飞）等。这最后一种主张的具体解释是：“一、全盘的吸收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二、局部的吸收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三、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四、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邹韬奋、李公朴、艾思奇等发表宣言，着重批评“本位文化论”和国民党的愚民政策。通过讨论，许多人都认识到，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都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能无条件地保存中国固有文化，也不能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都主张在兼采中西文化优点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有中国民族特征的新文化；不少人还主张应以现代化代替西化，并对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提出意见，包括：发展自然科学、促进现代工业、提倡现代学术、养成科学化的思想方法等。

五、抗日救亡文艺的发展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抗日救亡文艺很快发展起来。

为推动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两次发表宣言，并组成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第二次宣言中，号召“作家们，本着各自的文化领域，用各种方式，激发大众斗争的意识，建立正确的理论指导”；“反对文化统制，反对文化界汉奸”；“全国文化界联合组成救亡的统一阵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发表宣言，表示赞同上海文化界的主张，呼吁“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在此前后，各地救亡刊物雨后春笋般出现，仅上海一地就达100余种，全国不下千种。邹韬奋在1935年11月创办的《大众生活》，发行量达20万份，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宣传阵地。

上述形势要求左翼文化工作者实行思想和工作上的转变。上海左联领导人在得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以后，决定解散左联，并把当时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国防文学”口号，作为建立文艺界抗日联合战线的口号。接着，文艺界相继提出“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国防音乐”乃至“国防漫画”、“国防木刻”等口号。1936年春，左联自动解散，“文总”及其所属的各左翼文艺、文化团体亦相继解散。4月下旬，冯雪峰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达上海，向鲁迅转达瓦窑堡会议精神。鲁迅、冯雪峰、胡风一起讨论了文学口号问题。5月底，胡风发表《人民大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同上，第553—554页

《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从“西化”到现代化》，第524页。

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另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6月，周扬发表《关于国防文学》和《现阶段的文学》两文，前者批评了几次撰文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徐行，后者批评了胡风，并对“国防文学”作出进一步解释。他说：“国防文学”口号是在“全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正以巨大的规模伸展到一切的领域内去”的形势下提出的，“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胡风和周扬的文章发表后，文艺界开始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卷入论争之中，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都著文发表意见。

周扬等左翼文艺领导人为适应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们“左”的宗派主义情绪仍未完全克服，对鲁迅尊重不够，把“国防文学”当作唯一正确的口号。同时，有的“国防文学”的宣传者，出现右倾思想的苗头，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在病中写了三篇文章，表明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他将无条件地加入革命政党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对于两个口号，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深刻，也更有内容，但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前者应是“总的口号”，后者为“具体口号”之一。

这场争论到1936年9月基本停止。它的意义是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宣传，对进一步克服文艺界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起了推动作用。10月初，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林语堂等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21人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全国各地涌起“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这表明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初步奠定。

1935年后，抗日救亡文艺作品逐渐增多，伴随“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和文艺界抗日联合战线的初步形成，救亡文艺大为兴盛起来。

小说方面，有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1933年）、萧红的《生死场》（1935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1935年）等。《生死场》通过对东北北部一个村镇生活图景的描述，表现了农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现实中和日本入侵之后的苦苦挣扎与缓慢的觉醒。《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东北一支抗日游击队的成长，歌颂了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这两部小说都作为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出版。

剧作方面，“九一八”以后，田汉等就创作了多种宣传抗日的话剧，如《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战友》、《回春之曲》等。在从1935年底形成的国防文艺运动高潮中，国防戏剧尤为活跃。田汉的《阿比西尼亚的母亲》、阳翰笙的《前夜》、尤兢的《夜光杯》、凌鹤的《黑地狱》以及集体创作的《洋白糖》、《我们的故乡》等先后上演。《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前线》等街头剧，更直接也更强烈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要求，收到巨大的宣传鼓动效果。1936年11月，夏衍的国防剧作《赛金花》上演。

电影方面，“一二八”事变不久，上海各影业公司即很快推出一大批反

映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的新闻记录片和动画片。此后，由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或影响的上海电影界，拍摄了一大批抗日救亡题材的优秀影片。其中有：《共赴国难》（1932年）、《民族生存》（1933年）、《肉搏》（1933年）、《逃亡》（1935年）、《风云儿女》（1935年）、《狼山喋血记》（1936年）等。与电影剧作密切相连，一批鼓舞人心的抗日救亡歌曲创作出来。《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奔放豪迈的爱国热情，高亢激昂的旋律，唱出了民族危机的深重，呼唤人们筑成新的血肉长城，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搏斗。《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号召青年们勇敢地投入民族斗争的战场：“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这两首歌都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

诗歌方面，革命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于1935年发起“国防诗歌运动”，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青年诗人蒲风撰写的《我迎着风狂和雨暴》喊道：“我不问被残杀了多少东北同胞，我要问热血的中国男儿还有多少。”“战斗吧，祖国！战斗吧，为着祖国！”我们要做一个“优良的射击手。”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以上各项成绩的取得，为抗日救亡文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上）

一、全国抗战爆发与正面战场失利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

华北事变后，日本一面继续加紧策动华北5省“自治”，以实现华北政权的“特殊化”；一面加紧扩军备战，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日本连续制定1935年、1936年、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规定了在华北、华中、华南作战的兵力部署及要占领的城市和地区，总的要求是：“必须以最小之兵力达到作战目的”，占领华北、华中及华南之要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基本上即是按照这几个“对华作战计划”向前推进的。

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法西斯军人发动叛乱，企图以武力手段改造内阁，建立军部独裁政权。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日本政府却依照叛乱者的意愿，更迅速地走向军部专政和全面侵华的道路。“二二六事件”后组成的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压力下，恢复了废止20多年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即陆、海军大臣须由现役将官充任），从而使军部对政府的干预和控制进一步加强。4月，日本做出加强在华驻军的决定，中国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改由天皇直接委任，兵力增强三倍，并把1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9月，日军侵占丰台，进一步形成了包围北平的态势。此后，日军在平津一带频繁演习，且规模越来越大。到1937年春，日军增至2万余人。6月，日军在宛平城北的演习，三五天举行一次，由虚弹改为实弹，由白天改为夜间。同月，近卫文麿在军部支持下组阁。日参谋本部派员至天津、张家口、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上海等地察看地形。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气焰，中国民众和军队的民族义愤空前炽烈。许多先进分子和青年学生到驻军进行宣传，鼓动抗日。193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日军举行以北平为假想目标的万人“秋季大演习”时，中国驻军29军也进行了大规模演习。对日军的挑衅，中国驻军进行了回击。日军剑拔弩张，中国军队也决心抵抗，一场新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大冲突，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芦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13公里处，是永定河上的一座公路桥。桥东为宛平城，北面有平汉铁路跨河而过。事变前，芦沟桥已是北平通往南方的唯一门户。驻守芦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军队为第29军37师110旅的部队。7月7日晚，日军一部在芦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演习，10时40分演习将结束时，扬言听到了几声枪响，1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20分钟后，失踪士兵归队，但日军仍坚持进城调查。当双方派出的代表进行交涉之时，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射击，继而炮轰芦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旅长何基沣赴前线指挥作战，29军司令部也对前线官兵发出坚决抵抗的命令。全国性的抗战正式爆发。

事变的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战通电，号召全国“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国各界、各爱国党派和团体、海外华侨、国民党的一些省市党部，纷纷通电、集会，要求政府实行抗战。北平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战地服务团，积极支援29军抗战。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路军等部4个师又1个旅，向保定、

石家庄等地集结。但南京政府仍抱着和平解决希望，力图把事变继续当作地方局部事件通过谈判加以解决。7月12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方面处理变事的立场是：除由驻军“守土自卫奋勇抵抗”外，“一面由外交部向日本使馆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制止日军之军事行动”；“一面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他意识到芦沟桥事件有可能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但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事变前途“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中国方面是“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日本政府在芦沟桥事变后，一面声称“坚持不扩大方针”，一面加紧向华北增兵。7月11日，日内阁决定，将关东军2个独立混成旅团的主力 and 飞行集团一部及驻朝鲜第20师团，立即调往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同时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15日，组成临时航空兵团，编入中国驻屯军。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和29军领导人，曾多次作出努力，与日军谈判，甚至不惜接受日军提出的苛刻条件，以求得变事的和平解决。但日本侵华战争的方针已定，任何和平努力都是徒劳的。27日，日内阁作出再动员国内3个师团到华北的决定，参谋本部命令中国驻屯军“讨伐平津地区中国军”。同日，日军向中国方面发出限48小时内撤退北平地区驻军的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了这通牒，通电守土自卫。28日，日军向北平发起全面进攻，29军各部奋勇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指挥作战中壮烈殉国。7月29日和30日，平津陷落。

1939年8月13日，上海燃起战火。在日军疯狂挑衅并已准备进攻上海的形势下，进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攻击。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由于“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中国“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随后集中精锐部队与日军展开淞沪会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的战争指导方针为：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兵力使用上，在抗战第一期，主力集中于华东，使用于京沪长江方面；一部用于华北，沿平绥、平汉、津浦各线要地作战；小部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军委会把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另有4个预备军、2个直属集团军，以及海、空军。陆军总兵力，共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20个独立团。这样，随着日本侵华规模的扩大和国民党政府的实行抗日，全中国都进入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之中。

从1937年7月底平津失陷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有：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

1937年8月，华北日军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线西犯和南进，沿线中国守军都进行了顽强抵抗。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对沿内长城线西进至平型关的日军一部进行伏击，取得歼敌千余人的胜利。但是，总体上均未能挡住日军的凌厉攻势，西至张家口、大同，南至保定、邯郸、德州，黄河以北的大片国土陷于敌手。

10月初，日军开始向太原方向进军，攻占崞县、原平。13日，向太原北

部门户忻口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第9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琪、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殉国。娘子关、平定、忻口先后失陷。接着，日军从东、北两路会攻太原。11月8日，太原落入日军之手。太原会战历时近1个月，中国军队伤亡10万人以上，毙伤日军2万余人。

华北太原会战的同时，华东淞沪会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之中。日本内阁于8月13日正式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8月15日，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命令，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进入上海的中国军队，开始时编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属于冯玉祥为司令官的苏浙第三战区。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中国军队主动出击，重点目标为日海军陆战队营区，但日军工事坚固，攻击受挫。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与日本航空队展开空战，击落日机多架。8月23日，日军上海派遣军在长江南岸强行登陆，随即向中国守军发动猛攻，双方展开激战。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进一步加强在上海的作战能力。10月，战况更趋激烈。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旋即突进至黄浦江一线。7日，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兼任方面军司令官。9日，日军攻占松江，中国军队全线后撤。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总兵力为70万人，日军参战部队为20余万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日军付出伤亡4万余人（一说6万余人）的代价，在3个月中只向前推进15至20公里，从而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征服中国的企图。

淞沪会战期间，10月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发表迁都宣言，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但实际上政治中心移往武汉。

日本为适应侵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在1937年11月20日设置了代表天皇的日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24日举行的大本营第一次御前会议，对下一步侵华战争作出决策：在华北，主力用于占领地“确立治安”上面，同时准备进攻山东；在华中，“及时进行果敢追击”，并准备进攻南京和其它地区；在华南，准备派兵切断粤汉、广九铁路。作战重点仍放在华中。

淞沪会战后，日军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沪宁路，目标南京；一路沿沪杭路然后转太湖南侧。蒋介石委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率军10万保卫首都。12月11日，日军开始攻城，12日攻占雨花台、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唐生智命令部队撤退突围，各路军队蜂拥挤向江边，秩序极端混乱，拥挤、踩踏、落水而死者多人。12月13日，南京陷落。24日，杭州陷落。进入南京的日军，在全城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前后6周时间，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30多万。全城房屋1/3被毁坏。1个月中，强奸事件有2万多起。被日军掠走的财物，仅图书一项，即有88万册。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计划，连贯华北、华中两个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1937年12月27日攻占）为基地，从津浦铁路南北两端夹攻徐州。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部队，进行了保卫徐州的作战。先是，由于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从济南南下的华北日军于1938年1月上旬连占泰安等数城。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将韩复榘处死，改任孙桐萱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2月10日，李宗仁命孙部袭取济宁、汶上，遏住日军南下势头。在津浦路南段，华中日军攻占南京后，即以一部兵力渡江北犯，于2月初攻占临淮关、凤阳、蚌埠，与中国军队形成隔淮河对峙局面。2月14日，日华中方面军改

编为华中派遣军，以 俊六大将为司令官。3 月中旬，华北日军强行南下，进攻滕县、临沂，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师长王铭章阵亡。3 月 23 日，日军一部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突进。4 月 3 日，中国军队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向已被包围在台儿庄地区的日军发起攻击，至 7 日晨战斗结束。整个台儿庄之战，共歼灭日军 1 万余人（亦说七八千人、2 万余人），这是全国抗战以来继平型关战斗之后又一个重大胜利。但这一胜利并未能扭转整个战场形势。4 月 7 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徐州作战命令，并调整部署，集中 6 个师团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形成对徐州的包围。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决定放弃徐州。5 月 19 日徐州失陷。

日军占领徐州后，沿陇海路西进，6 月上旬陷开封后，国民党军为阻止日军进攻郑州，经蒋介石批准，炸开郑州北花园口黄河大堤。这一“以水代兵”的举动阻挡了日军在陇海路的西进，但也给豫皖苏三省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数十万人被淹死，上千万人流离失所，40 多个县市的地区成为泽国。

从 1938 年 6 月，日军开始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作战行动。自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许多领导机构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临时首都。国民政府决定以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新组建的第九战区以及空、海军共 110 多万人进行武汉保卫战，由蒋介石亲自指挥。7 月初，日华中派遣军重新编组序列，辖 11 个师团和 1 个支队。8 月下旬，日军分两路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进，各路中国守军都进行了顽强抵抗。除陆军之外，双方还投入大量海军和空军，战斗十分激烈。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大队参加了战斗，取得不小战绩。但结果，中国军队未能阻住日军的进攻。9 月，武汉陷于三面被围之中。10 月 12 日，日军利用国民党政府的麻痹思想，在几乎未受到抵抗的情况下登陆大亚湾，21 日广州失陷。至此，平汉、粤汉路均被切断，武汉外围也大部失守。10 月 24 日，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令放弃武汉。25 至 27 日，武汉三镇相继为日军占领。武汉会战历时 4 个半月，战场波及皖、豫、赣、鄂 4 省广大地区，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日军战略进攻的顶点。

经过 16 个月正面战场作战，中国军队总计毙伤日军 40 余万，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野心。但是，中国方面的损失是严重的。这期间，国民党军伤亡 110 万，冀、晋、察、绥、鲁、豫、苏、浙、皖、赣、闽、鄂、粤 13 省 100 余万平方公里土地、1 亿多人口的地区沦于日寇之手。这种局面的造成，除去敌人的军力、经济力都远远超过中国这一原因以外，同国民党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以阵地战为主体的单纯防御战略密切相关。大部分军队的作战都是很勇敢的，但战略上是分兵固守一城一地，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日军攻占武汉后，其战区广大、战线延长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把敌后变成了抗战前线，对日本侵略军造成了巨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而转过头来，以主要力量巩固所占有的地区。抗日战争由此进入了敌我双方处于拉锯状态的战略相持阶段。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华政策发生变化。一是对国民党政府在继续给以军事打击的同时，加紧政治诱降；二是把只重视正面战场作战改为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时日本确定的对华作战方针是：“确保占领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

为此决定增兵华北，在华中、华南以防御姿态和有限的战役，牵制国民党军的行动。1939年春，侵华日军（不包括关东军）已达到80万人，9月，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侵华日军。

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召开南岳（湖南衡山）军事会议，把战区重新划分为10个，蒋介石提出“二期抗战”要实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10个战区的总兵力为204个师又39个旅，共200余万人，与抗战爆发时基本相当。从1939年春至1941年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役战斗有：1939年3月中旬至5月初的南昌会战；1939年5月的随（县）枣（阳）会战；1939年9月中旬至10月初的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的冬季攻势；1940年5月至6月中旬的枣（阳）宜（昌）会战；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的桂南会战；1941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豫南会战；1941年3月中旬至4月初的上（高）高（安）会战；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1941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第二次长沙会战等。

以上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和规模仍然很大，但就日军方面说，已不同于攻占武汉前的攻势作战，多为确保占领地的以攻为守的“压制”性作战，作战时间大都较短，在1个月左右，而且往往进攻到预定地区或受到严重阻击时，即行停止或返转撤回原阵地。国民党军队的反击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使战争基本保持了双方对峙的局面，但自身伤亡过大。这些情况，反映了战略相持阶段的特点。

二、中共开辟敌后战场

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失利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深入敌人后方，同当地人民紧密结合，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经过异常艰苦的奋战，许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

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项基本主张：抗日战争必须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共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这十大纲领的内容包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军事总动员，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全国人民总动员，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自由；改革政治机构，制定民主宪法，选举国防政府；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抗日的民族团结。

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实行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即把十年内战后期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为分散使用的抗日游击军，把以运动战为主改为以游击战为主，通过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在《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即指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确定，红军主要作战地点是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当前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和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力量。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游击战，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中，更从理论上全面论述了

抗日游击战争所具有的“战略地位”。

广大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在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指引下开辟出来的。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下辖115、120、129三个师，分别以林彪、贺龙、刘伯承为师长。全军共4.6万人。10月，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军队政治委员制度，聂荣臻、关向应、张浩（1938年1月改邓小平）分任三个师政治委员。8月底9月初，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与日寇作战。

八路军115师首战平型关，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随后，八路军担负了从日军侧翼和后方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和太原的任务。各师以旅、团为单位，主动出击，从9月下旬至11月上旬，取得一系列阻击战、袭击战、伏击战、进攻战的胜利，总计歼灭日军近4000人。其中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一战，击毁击伤敌机24架。这些战斗，配合了山西正面战场的作战。

太原失陷后，115师政委聂荣臻率该师一部，乘日军主力南进之机，在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察南、冀西地区展开作战，建立了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下旬至12月，晋察冀边区粉碎日军2万余人的八路围攻，使根据地得到巩固。

120师在晋西北、129师在晋东南、115师主力在晋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初步形成了晋西北和晋冀豫根据地。1938年2月，日军集中10万兵力开始进行所谓“平定”山西的作战。120师与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军民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歼灭日军7000余人，收复数十座县城。后115师主力挺进山东，与山东纵队相会合，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八路军主力开辟上述根据地的同时和稍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冀中、平西、冀南、冀东、山东等地也迅速开展起来，并且逐步建立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继八路军开辟华北敌后战场之后，新四军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0月12日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全军共10300人，分别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为支队司令员。1938年6、7月，一、二支队先后挺进苏南，经过艰苦奋斗，建立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三、四支队分别开创了皖南、皖中抗日根据地。10至11月，新四军一部在彭雪枫率领下挺进豫东，开创了豫皖苏边抗日局面。

总计从1937年9月八路军挺进山西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创建或初步创建了晋察冀（包括晋察冀边和冀中）、晋绥（包括大青山和晋西北）、晋冀豫（包括晋冀豫边和冀南）、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边、山东（包括鲁西、鲁中、胶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多块抗日根据地，从而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这个敌后战场，解放了大片国土，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也由实际上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人，其中八路军15万多人，新四军2.5万余人。广大敌后战场的开辟，对

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促使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关键性作用。

在抗战初期，共产党内曾出现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王明是 1937 年 11 月底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作战上。他否认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允许的范围之内。王明的错误造成了一个时期内共产党未能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 年 9 月底至 11 月上旬，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推动了敌后抗战事业的发展。

1939 年以后，敌后战场的作战范围更为扩大，作战次数和激烈程度也都大为增加。这是因为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破产后，不得不抽调更多的兵力回过头来巩固其占领地，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与反“扫荡”开始成为敌后战场作战的主要形式。

1940 年 8 至 12 月，八路军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推动整个抗战事业的发展，发动了“百团大战”。共出动兵力 105 个团，作战 1824 次，毙伤日军 2 万余人、伪军 5000 余人，俘日军 281 人、伪军 1.8 万余人，破坏铁路 470 余公里、公路 1500 余公里。八路军伤亡 1.7 万余人。至 1940 年底，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华中，1939 年 3 月以后，新四军在周恩来、刘少奇、叶挺、陈毅等领导指挥下，在南下的八路军支队的协助下，执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坚决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限制，在巩固原有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又开辟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鄂中、鄂东、豫南根据地。

在华南，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东江地区和海南岛领导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后分别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和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在两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总计 1939、1940 两年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抗击了 58%和 62%的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及全部伪军，粉碎了日伪军千人以上至 5 万人的“扫荡”近百次，作战万余次。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在对敌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坚力量。到 1940 年底，部队发展到 50 万人，根据地人口达到 1 亿多。两年内，人民军队伤亡 15 万余人。

三、群众性的抗日运动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整个中华民族，工农商学兵各界，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都投入到这场保卫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来。

从“九·一八”后就充当抗日先锋的工人阶级，抗战爆发后更积极地行动起来。在保卫平津和上海的战斗中，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大批铁轨、枕木、钢板、麻袋等物品运往前线，协助部队构筑工事。平津、同蒲、正太三铁路的工人，大部分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成千上万人加入工人游击队、八路军、决死队。太原各厂工人在中共的推动下，组织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发展为拥有 5000 人的工卫旅，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井陘等煤

矿工人组织的游击支队，有 1300 余人，一度攻入日伪井陘矿务局。沿海城市的广大工人积极参加工业内迁的工作，为奠定抗战的物质基础作出了贡献。

农民始终是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支持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需人力、物力，都主要来自农民。1937 年底至 1938 年间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山东 10 余次抗日武装起义和冀东 20 万人抗日大暴动，都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平型关大捷后，参加抬伤员和运送战利品的农民达数千人。在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农民参加自卫军、民兵和游击队，直接参战。妇女、儿童也积极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各地农民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仅山西一个省，1939 年有农民救国会会员达 100 多万人。

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积极投入抗日斗争。芦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会等 20 多个群众救亡团体组成战地服务团、劳军团、看护队，分赴前线 and 医院开展服务、劳军和救护工作。学生们还组成募捐团和宣传队，募集抗经费，进行抗日宣传。

工商界以很高的爱国热情参加抗日运动。抗战爆发前，上海商界已组成职业界救国会，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淞沪抗战时，该会改称职业界救亡协会，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动员各商店以积极认购公债的行动支援抗战。全国各地商业界广泛开展了义卖捐献活动。沿海沿江城市的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和保存企业的愿望，将他们的工厂迁入内地。至 1941 年，内迁厂矿约 600 家，总计机器和材料 12 万余吨。这对发展大后方经济，支援长期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1938 年 7 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了“七七”周年纪念活动，以各种方式进行抗日宣传，还组织慰劳团到各战区慰劳，在武汉发动“献金”活动。“献金”活动声势浩大，5 天之内，参加献金群众达 50 余万人，献出金额超过 100 万元。这次活动表明了各阶层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接着，各界群众又踊跃参加了捐献寒衣活动。

宗教界也投入到抗日运动中来。不少地区的佛教、回教界，成立了救亡会、救难协会等组织。上海地区的僧侣组织了伤员救护队。在武汉，千余名各地回教徒代表、千余名基督教徒分别举行反对侵略、拯救国难祈祷。天主教徒举行大弥撒，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平民。天主教主教于斌赴美国 120 个城市旅行募捐，得款 80 余万元，支援抗战。西藏活佛发表《告蒙藏人士书》，甘肃佛教会发表通电，揭露日军违背佛教教义，进行烧杀抢掠和破坏佛寺的罪行。西藏喇嘛曾举行大规模的抗日祈祷大会。

中国 50 多个民族，几乎全部直接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东北的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等少数民族，在芦沟桥事变前后，一直同汉族人民一起，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从抗日义勇军到抗日联军，都有这些民族的儿女参与其中。有的抗联部队，朝鲜族战士几乎占有半数。满族人民的优秀代表关向应，同贺龙一起，领导了一二师和晋绥边区的斗争。蒙古族人民从 1933 年起就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1937 年 10 月共产党领导成立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大青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后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共同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回族人民在抗战爆发后组织了“甘宁青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回民抗日救国会”等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回民游击队、回民支队等回民抗日武装，在华北和西北有数十支，著名的冀中马本斋回民支队，曾发展到 2000 余人，6 年作战 870 余次，歼灭日伪军 3.6

万余人。在广西，壮、毛难、仫佬各族同汉族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海南岛的黎、苗族组织有人民自卫军，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军侵占滇西后，当地白、傈僳、傣、景颇、佤、拉祜、阿昌、崩龙、汉各族人民共同奋起，抗击日本的侵略。各族数十万民工一起修建了工程浩大的滇缅公路，为保证中国的抗战和支援缅甸的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的台湾高山族人民，在抗战爆发后，同汉族人民一道，继续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7年有枋寮高山族和汉族1300余人暴动，1938年初有雾社高山族暴动，1941年3月有台东高山族暴动。新疆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共同成立了反帝联合会，开展了群众性的献金和募衣活动。他们用献金购买10架新疆号战斗机，开往抗日前线，把募集的8万件皮衣、1万架马鞍和一大批药材，运往延安。青海各族人民捐献了大量银元、羊皮和军粮。藏族人民也以各种方式支援了抗战。

海外1000余万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了宝贵贡献。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其中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和司徒美堂领导的“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是规模最大的两个。在欧洲有“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各地华侨为抗战捐助了大量现金和物品。新加坡爱国华侨胡文虎，一次捐法币200万元。陈嘉庚按月捐法币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一次捐美元10万元。在1939年，华侨捐款和汇款总计11亿元（其中捐款1亿多元），占当年国民政府军费18亿元的60%。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发行的30亿元公债中，海外华侨认购11亿元，占总额的1/3强。从抗战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在3000批以上。至1940年10月，共捐献飞机217架，战车27辆，救护车1000余辆，大米1万袋，药品、服装、鞋及其他用品总值约3.5亿元。华侨子女大批回国参军参战。仅粤籍华侨回国参战者就有4万余人。担任滇缅公路运输任务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有4000多人是华侨。中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3/4是华侨。不少归国华侨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各地华侨还开展了抵制日货、拒绝为日人做工、禁运军火去日本、举行反日大示威等活动，把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扩展至全世界。华侨领袖还密切注视祖国抗战的发展形势，痛斥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举动。1938年10月底，陈嘉庚鉴于国民党对日妥协倾向的发展，在新加坡致电国民参政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议案，为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这对国民党内的妥协分子是一个严重警告。

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开展，说明中国抗日阵线的广大，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国际工人阶级和友好人士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都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略，号召全世界和各该国无产阶级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7年9月，拥有1900万会员的国际工会联合会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并通过会员国抵制日货，募捐援助中国工友。第二年又通过了《加紧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案》。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工会参加的国际运输总工会，于1937年10月通告各国运输工会，禁止运送军

另有统计数字：抗战的前4年，华侨救国捐款达法币26亿元，占当时国民政府抗战军费的85%。5亿元救国公债，华侨认购一半，最后全部无偿贡献。

火至日本。第二年又通过“援华制日”案。1938年6月，宋庆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推动了国际援华工作的开展。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率医疗队来华，在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为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和发展根据地的医疗事业，鞠躬尽瘁，最后以身殉职，表现了无比崇高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及爱泼斯坦、汉森、福尔曼，美国医生马海德，印度援华医疗队大夫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典、捷克、英国等的许多记者、医生，都为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事业做了有益工作。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工合”），很快在全国各地办起工业合作社1000多个。“工合”运动对解决当时战争和民用的急需，帮助各抗日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乃至对培养工业技术力量和扩大中国抗战的影响，都起了作用。

在各国政府中，首先对中国抗战给予大力援助的是苏联。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至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的军用物资贷款有4.5亿美元。苏联还派遣志愿空军人员和军事专家来中国直接帮助抗战，总计3000余人。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歼击机大队长赫曼诺夫在内的200余名志愿飞行人员，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美国在中国抗战爆发后，采取所谓“完全中立”的政策，但实际是纵容和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所需军用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由美国进口，而美国对中国则没有实际援助。1941年以后，美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美国政府支持的陈纳德航空队——“飞虎队”，于1941年8月在中国成立，随即与中国空军共同展开对日作战，1年间击落日机280多架。1941、1942两年，美国给中国贷款5.5亿美元，英国给中国贷款5000万英镑。

四、国共关系的演变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为推动国共合作尽快成立，做了进一步努力。1937年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中央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要求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宣言在1937年2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基础上，进一步郑重声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共产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份宣言表明了中国国民党同国民党携手抗日的真诚愿望与急切的心情。此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等就中共宣言的发表和红军改编问题，两次在庐山谈判，直至“八一三”事变发生、战事更加紧迫之后，蒋介石才答应了中共方面提出的改编红军的条件。

8月22日和25日，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23日，蒋介石发表关于中共宣言的谈话。蒋的这个谈话，拒不承认他多年奉行的“安内攘外”政策给国家造成的危害，仍然不把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关系上面，但还是承认了国共共同抗日的原则和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

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8月底至9月，中共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现乌鲁木齐）等地设立了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等地设立了八路军通讯处，以作为协调国共两党关系和加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机构。

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由于日本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策的重点在对外，国共两党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政治上，中共对国民党领导人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对国民党的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举措，如《抗战建国纲领》的颁布、国民参政会的设立等，给予了足够的评价和支持。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军政训练，并派人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防参议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在不少群众性的抗日活动中，国共两党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供应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部分军需。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拨给的军费，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

山西在华北敌后战场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搞好那里的统战工作。1936年，山西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由阎锡山任会长。不久，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工作，应阎锡山邀请主持牺盟会。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同意由牺盟会发动组织群众，成立新军。随后相继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至第四纵队，还组成了政治保卫队（后发展为三个政卫旅）、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发展为工卫旅）及13个游击支队（后发展为暂编第一师）。山西新军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武装。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思想体系的不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灭共的根本立场，所以，即使在国共关系较好的时期，两党之间也仍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除表现在抗路线、纲领、作战方针等基本问题外，还突出表现在始终未能就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达成协议这一问题上。

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是各党派在各自保持独立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族联盟，而国民党的基本方针则是“溶化”共产党，建立一个取消共产党独立组织的、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大党。1937年12月，中共代表与蒋介石在武汉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提出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和制定共同纲领等意见，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但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并未能讨论由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委员会变成了形同虚设。

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它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唯一正确办法”是：“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至于联盟的具体形式，可由各党派、团体选派代表组成各级组织，或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它办法或方式。

10月，毛泽东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报告中，批驳了国民党的“一

党主义”，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二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三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六中全会决议认为，“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不考虑共产党的意见，坚持“一党主义”。1938年12月和1939年1月，蒋三次约见中共代表，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共明确拒绝了蒋的要求，指出：两党“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它任何政党”。一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方至死不改变“合并”共产党的企图，致使国共合作始终未能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形式。

1939年后，国共关系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开始由对外转向对内，抗日逐渐消极，反共活动逐步增加。促成国民党政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采取侵华新策略，加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诱降。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当年1月16日第一次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调子，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日本不予拒绝”。12月，近卫的第三次声明更明确表示要调整同中国的关系，实现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甚至说：“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与日本诱降相呼应，英美也从各自利益出发，为了重点对付欧洲希特勒德国的威胁，也希望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达成某种妥协。1938年底和1939年4月，英驻华大使卡尔两次由沪至渝，劝说中国与日本议和。同时，英美报纸大量散布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解决“中日冲突”之说。1939年7月，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表示“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10月，英美大使一齐到渝活动。上述背景，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妥协倾向日益严重，汪精卫集团甚至公开叛国投敌。

第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所固有的反共本性的再现。他们既想用“接纳”共产党的办法来“溶共”，又想在抗战中借日本人之手来“灭共”，至少削弱共产党的一大部分力量。但战争进行1年多的时间后，共产党力量不但没有被削弱和消灭，反而迅速壮大。蒋介石多次提出的意在从组织上“溶共”的办法，都为共产党所拒绝。这些使蒋介石集团仇视共产党的情绪迅速增长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5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754页。

见《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1991年版第6页。

《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17—18页。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93—95页。

起来。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一方面讨论了继续抗战的问题，表示要“持久抗战”、“抗战到底”，但蒋介石所说的“底”，只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另一方面研究了如何强化国民党和如何加强“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陆续发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动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从联合共产党积极抗日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转化。

从1939年3月底至10月中旬，国民党先后在山东博山、湖南平江、河北深县、鄂东、河南确山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总计杀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伤员、家属和共产党员一千数百人。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军事反共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

从1939年12月至翌年春，国民党在华北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在三个地区向八路军发动进攻。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春夏，国民党已在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长达千里。至12月，相继侵占边区枸邑等5个县城。在山西，阎锡山于1939年12月制造“晋西事变”，用6个军的兵力围攻驻守晋西南的决死队和八路军；还配合蒋介石，向晋东南的决死队和八路军进攻，摧毁沁水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500余人，逮捕千余人。在冀南和太行区，1940年2月，石友三、朱怀冰等部沿平汉路两侧向八路军进攻，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

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对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和上述三个地区的抗日军民本着自卫的原则，给进犯者以坚决回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使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部分山西决死队编入八路军。

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后，中共主动提出休战，与国民党谈判。双方议定，以漳河为界，南为国民党军防区，北为八路军防区。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已不得不承认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重要地位。1940年6月，中共中央以周恩来为代表，就陕甘宁边区范围、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作战区域划分等问题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1940年下半年，日本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谋结束中日战争，进一步加紧对蒋介石诱降。英美为对抗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也加紧拉拢国民党政府。蒋决定趁机再次制造大规模“磨擦”事件，打击中共力量，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其反共的重点由华北移到了华中。

1940年7月，国民党发出一个所谓“中央提示案”，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攻击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活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再次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皓电”发出同时，蒋介石对进攻新四军作出部署。11月9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发出“佳电”，驳斥国民党的攻击诬蔑，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同意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但要“宽以期限”，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继之，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的作战计划》和进攻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在皖南集结了7个师约8万人

的兵力，准备围歼新四军。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开始转移，但从1月6日下午开始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至8日，被包围于茂林地区。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新四军在军长叶挺指挥下，苦战7昼夜，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遭到失败。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被扣押。项英遇害。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革职并交军法审判。这就是“皖南事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共中央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群众大会、发言人谈话、通电等各种方式，揭露事变真相，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华中八路军新四军作好了自卫作战的准备。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同时也受到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中共的斗争，国内外的谴责，再加上1941年1月下旬日军乘机大举向豫南进犯，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攻势转为守势。1941年3月蒋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皖南事件“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砍下了深深的一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仍在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故两党在事变后仍能保持合作抗日的局面，但隔阂日深，关系已无法恢复到抗战初期的程度。经过这次事变，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共产党在华中领导的武装力量也更加放手地发展起来。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把陇海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人。新四军驰骋于更广阔的敌后战场上。

五、日伪统治的沦陷区

日本帝国主义从制造芦沟桥事变到攻取武汉，16个月中夺占了包括华北、华中、华南1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1亿人口的广大地区。这些沦陷区同“九一八”后被日本侵占的东北三省和热河一样，成了日寇铁蹄直接践踏下的殖民地。

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以华治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每侵占一地，即在那里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

在晋冀鲁豫地区，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行三权分立体制，主席暂缺，以汤尔和、王克敏、董康分任议政、行政、司法三委员会委员长。临时政府以北洋军阀时代的五色旗为“国旗”，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年号，以北平（改称北京）为首都。

在绥察晋北一带，1936年5月即有蒙奸德王等在日本的策划支持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以后不断扩大，1939年9月，合并察南、晋北、归绥

即德穆楚克栋鲁普，时为察哈尔省所属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

三个伪政权，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王为主席，定都张家口，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

在华东，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南京2市。9月，华北、华东两个伪政权组成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

此外，日军攻陷广州、武汉后，分别成立了伪广东省政府和伪武汉特别市政府。

与建立伪政权相配合，日本在其占领区还建立各种伪“民众团体”。在北平有“新民会”，会长即是华北伪政权的头子王克敏，中央指导部长为缪斌。上海有“大民会”，汉口有“正义会”。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及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叛国投敌。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即伪中央政府。汪精卫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温宗尧、王揖唐、梁鸿志分任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院院长，陈群、褚民谊、周佛海等任部长职务。伪中央政府成立后，“临时”、“维新”两政府取消。华北设政务委员会，保留独立处理局部问题的权力，以示华北地位的特殊，由王克敏任委员长。“维新政府”的政务则由汪精卫政府直接接收。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对伪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独立地位，没有承认它的领导。

上述所有伪政权，都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和它侵略压迫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汪伪政权成立前夕，1939年12月，日本与汪精卫秘密签订《日汪协定》（即《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该协定不但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既成事实之存在”，而且承认以后“事变继续中”可能发生的“特殊事变之存续”。就是说，把日本已经进行的和将要进行的侵华活动一概合法化。协定规定了“调整日支新关系之原则”及“要项”。内容包括：日、“满”、支三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日本向中国“新中央政府”派遣顾问，向“强度结合地带及其它特定地域内之所要机关”，配置顾问职员；日军驻屯于华北、蒙疆、华中及长江下游；日本向中国军队、警察派遣顾问、教官；华北、蒙疆及其它区域之资源开发，“与日本以特别之便利”；等等。总之，汪精卫政府必须保证其所辖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殖民地、附属国。汪政府成立后，1940年11月，上述日汪秘密协定变成正式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占领地的殖民统治，大搞“治安肃正”、“强化治安”运动，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发放“良民证”，进行大编乡，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禁绝一切抗日活动。在其占领不稳固的地区，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建立“人圈”。

尤为灭绝人性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东北竟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验。从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仅在其所谓731部队中，就至少有三四千人因被用作细菌武器的研制而丧生。

对沦陷区的经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残酷的掠夺政策。在东北，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建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垄断钢铁、轻金属、汽车、飞机、煤炭等的经营。为了战争的需要，制定了两个产业五年计划，疯狂掠夺东北的资源。农业方面，大量掠夺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实行百万户农业移

民计划，圈占大量土地。在华北、华中、华南，日寇同样进行了全面掠夺。金融方面，日伪先后建立 20 余家银行，其中有：设在张家口的蒙疆银行，设在北平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设在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设在南京的伪中央储备银行，设在汉口的中江实业银行以及广东银行等。日伪利用这些银行垄断金融，发行钞票，掠夺物资。工矿业方面，日本开始是采取“军管理”（华北）和“委托经营”（华中）的方式进行掠夺，后改为“中日合作”的办法，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1938 年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两个“国策公司”，下设许多分公司，经营煤铁等矿产以及盐、电力、交通、电讯等业。“合作”只是名义，企业实际经营权全归日方，利润的大部分也为日本所有。农业方面，日本强占耕地，夺取农场，摊派捐税，强行低价收购农产品，直至直接掠夺粮食、牲畜、财物。日寇将粮食规定为军用物资，进行“统制”，对生产者强制“征购”，对消费者施行“配给”。青壮年也是日寇掠夺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1939 年至 1942 年春，仅在华北就有 600 万青壮年被抓到东北等地做苦役，至 1944 年，有 22.6 万人被抓到日本当苦工。

日本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高等教育用于培养各级傀儡官吏和高级奴才，中等教育用于培养为其服务的下层技术人员和师资，初等教育用于向儿童灌输奴化思想。日语为中小学必修课。史地课本要按照日本的侵略需要进行修改。各级学校都把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作为教育的宗旨。日本侵略者还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利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其统治。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日本侵略者指使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加以修改”，使之“不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相抵触”。为此，汪精卫集团便把三民主义解释成为反共卖国主义，胡说三民主义就是“大亚洲主义”，日本侵华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

沦陷区的广大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虽处在日寇的严密控制和残酷的军事统治之下，仍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共产党在沦陷区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机智灵活地开展斗争。农民的反日起义不断爆发。尤其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直顽强地坚持着抗日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抗联为配合全国抗战，除与敌人的“讨伐”军作战外，还主动出击，同日军进行多次战斗。1938 年后，日增兵东北，进一步加紧对抗联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抗联活动区域日渐缩小，部队大部转到深山密林，但仍不时出击，打击敌人。1940 年 2 月，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在作战中壮烈牺牲，敌人剖开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肠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1940 年后，抗联缩编为 10 个支队。至 1941 年，全部兵力已不足 2500 人，集中到中苏边境进行军政整训，同时组成若干支游击小分队，深入内地，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直至抗战胜利。以抗联为代表的沦陷区人民的斗争，是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

《汪精卫与近卫会谈内容》（1939 年 6 月 14 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第 408 页。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1939 年 11 月 23 日），同上，第 443—444 页。

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而革命的理论又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近代的中国，是世界各种矛盾的交汇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促使中国人民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抗斗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去，同时即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已有了20年奋斗的历史，经历了两次革命胜利、两次革命失败和两次历史性的战略转变，其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也取得了不少失败的教训。这些就使中国共产党逐步成熟起来。

中共为了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于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张闻天为院长，负责培训干部和编译马列著作。几年内，延安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反杜林论》、《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多种马列著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时必须“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毛泽东强调，学习理论，一定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共高层领导人学习马列理论的空气空前浓厚起来。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创办党内刊物《共产党人》。

在30年代末，继前面讲过的社会性质、社会史、农村经济性质等论战后，又发生了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推动了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则要求中国共产党更明确地说明自己对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对现时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

中共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得到系统阐发的。毛泽东写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的三篇著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此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继续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容。它的要点有：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入手，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1931年“九一八”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既然如此，中国革命就“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另一个革命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这里所阐明的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现时的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而是新式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区别又联系，这些也就是现时中国

革命的基本规律。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和总路线。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区分为两个时期，“五四”前为“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后为“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两者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特征是革命的领导者已由资产阶级转为无产阶级。其二，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就使中国革命的阵线更为壮大，特别是广大农民成了革命的主力军。其三，从国际条件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看，毛泽东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其四，以上几个因素，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据此，毛泽东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三）革命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不但要正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进程与特征，而且要解决如何领导这一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亦是“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主要是指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共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但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如抗日战争时期，还要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中国革命的发展进步，基本上是同武装斗争相伴随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党的建设，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为此，他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革命者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等合法权利，革命必须长期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由于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所依靠的人力、物力主要来自农村；由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主要经济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和充满矛盾，反动势力的分布是城市强大而农村薄弱；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革命势力大有回旋余地，这些因素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也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

从1927年独立领导革命战争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这条道路的探索。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此后经过红军战争的发展与受挫，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30年代后期便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其长期性、残酷性及由此产生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重要性。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具体条件出发，得出“乡

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结论。

（五）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毛泽东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代表大会形式的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要确立起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的、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两大原则的新的经济关系；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就是要经过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创造条件，最后走向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已能为中国革命提供完整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一理论，是对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重要贡献，它基本解决了中国这类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以及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便为向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样两个重大的问题。

政策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一项最基本的方针和政策，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又是一个成份复杂、充满矛盾斗争的集合体，所以中共中央特别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研究。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1940年3月和12月，毛泽东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两文，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做了系统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不会改变，但必须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阶层和派别划分为进步、中间和顽固三种势力，规定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动各种民众运动和争取全国知识分子。这是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争取中间势力，即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能否做到这一点，往往成为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同蒋介石所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投降政策做坚决斗争，使之孤立。对他们的斗争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即自卫原则，防御原则；有利，即胜利原则，局部性原则；有节，即休战原则，暂时性原则。总之，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些策略原则的运用，对于维护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具体表现。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规定了政权建设、土地问题、争取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正确的政策。

七、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中国现代进步的文化运动，向来是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抗战爆发之前，文化界就已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芦沟桥的炮声更催动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奋起。他们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等口号的激励下，自觉地把个人汇入全民族的抗日洪流中去，从而使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兴起。

上海文化界最先行动起来。“七七事变”后一周，7月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者协会，当即决定由夏衍、张庚等16人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芦沟桥》，在沪的著名编导和演员100余人参与其事。20余天后，该剧正式演出。7月28日，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淞沪抗战期间，整个上海文化界都投入保卫上海的斗争。8月20日，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主持下，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有的留在上海，有的奔赴内地和前线，宣传演出。9月3日，又由22名孤儿组成“孩子剧团”。8、9月间，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邨）等创办《救亡日报》，茅盾主编《呐喊》（第二期改名《烽火》），胡风主编《七月》周刊，叶浅予、张乐平等组成漫画宣传队。

南京失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然也就成了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都集中到这里。1937年12月和翌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群众》和《新华日报》先后在这里创刊。1938年2月上旬，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非中共进步文化人士，为抗日宣传做了大量工作。第三厅成立后，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的前线。上海“孩子剧团”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汉口后，成为第三厅的直属剧团。第三厅成立的同时，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从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东北各地汇集于武汉的文化工作者组织起来，于1938年3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恩来特地拜访冯玉祥，请他对“文协”予以支持，并邀在冯处工作的知名作家老舍出面主持“文协”。舒舍予（老舍）、冯玉祥、邵力子（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茅盾、田汉、阳翰笙等97人署名发表文协“发起旨趣”，号召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文协成立大会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5月初，文协创办会刊《抗战文艺》。文协成立前后，在武汉还成立有戏剧、电影、美术等各类文化界抗敌协会组织。文协还在成都、香港、昆明、延安等地建立了分会。

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1938年，抗日救亡和其它进步报刊大批涌现。除前述外，重要的还有：沈钧儒、李公朴、柳湜主办的《全民周刊》及该刊与《抗战》三日刊合并而成的《全民抗战》，田汉、洪深等主编的《抗战戏剧》，以及《抗战与文化》、《戏剧新闻》、《抗战电影》、《诗群众》、《文艺阵地》、《战地》等20多种。这些刊物的出版发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紧张激烈而又瞬息万变的战时环境，不允许文艺家们去从事长篇巨著的创作，因此，短小精悍、能及时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的作品，便成为一个时期文艺创作的主流。一是街头剧、活报剧。最著名者为产生于抗战前夕、后来又经多次改编的《放下你的鞭子》，它演遍了全国各地。另外有《三江好》、《打鬼子去》等。二是报告文学，成为“大时代的宠儿”。丘东平的

《第七连》、《把三八式枪夺过来》，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刘白羽的《逃出北平》等，都成为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三是歌曲创作。冼星海、张曙、吕驥、贺绿汀等许多音乐家，都谱写出鼓舞军民斗志的优秀作品，如《全民抗战》、《太行山上》、《游击队》、《到敌人后方去》等，尤其冼星海在延安创作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更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四是诗歌。当时出版的诗刊有：《开拓者》、《时调》、《诗时代》等 10 余种。诗人们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歌颂神圣的抗战，痛陈人民的苦难，揭露敌人的残忍。如艾青的《向太阳》，臧克家的《从军行》，田间的《给战斗者》，郭沫若的《战声集》，卞之琳的《慰劳信集》等，都是发生了很大影响的战斗诗篇。

抗战爆发前后，大批文化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同当地文化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掀起根据地的抗日文化运动。全国抗战爆发不久，1937 年 8 月中旬，在延安的作家丁玲等 30 余人组成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军奔赴前线。以后相继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鲁迅艺术学院。其它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建立了文化界救亡团体、职业文艺团体（剧团等），出版了报纸、刊物，设立了“鲁艺”分院。

根据地抗日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广泛的群众性。各地普遍兴起农村戏剧运动、街头诗运动。据统计，1940 年夏，太行区建立了巩固的农村剧团上百个。1941 年，晋察冀创建了几十个模范村剧团。1942 年春，冀中有剧团约 1700 个。延安倡导了“街头诗”运动，不仅把诗写在街头，而且登在各种诗刊、报纸、杂志上，还油印出版了街头诗集，其中不少是工农群众自己创作的。延安还发起过两次群众性的报告文学创作运动，作者有工、农、兵、商、学各界。1941 年，冀中根据地组织了“冀中一日”的创作活动，参加者近 10 万人。根据地的专业作者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丁玲的《陕北风光》，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周而复等集体创作的《海上的遭遇》，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等。

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紧密配合了全国抗战事业，也为后来文艺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下）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形势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密切相关。

1941年6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苏联人民奋起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美英两国声明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被称作《大西洋宪章》的宣言，表示两国将联合起来，以便打败“纳粹暴政”。10月初，美英苏签订协定，规定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联合行动，这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时美日之间正在就维持太平洋现状和中国问题等举行着谈判。日本受到德国法西斯侵苏战争一时得势的鼓舞，决定趁机向南扩张。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不到100分钟的轰炸中，美国停泊在该港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紧接着，日军向东南亚各国和西南太平洋岛屿发动进攻。至1942年4月，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上美、英、法所属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被日本占领。那里的人民都掀起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1941年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德意日3国签订《联合行动协定》，而更多的欧亚美国国家则对日宣战，中国国民政府于12月9日也对日宣战。1942年1月1日，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共同宣言》，宣布签字国保证用自己全部的经济、军事力量来对法西斯国家作战，援助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家，并不得单独对敌国媾和。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结成。以后又有21国加入宣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汇合在一起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使中国战场更有效地牵制日军，增加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在1941年12月底，成立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北部在内的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统帅，美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任参谋长。史迪威并主持在印度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1942年10月，美英通告中国，两国决定放弃他们的在华特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取消美英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与换文。根据新约，美英宣布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废除辛丑条约，放弃北平使馆界管理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军舰停泊权和各地租界，英国并放弃指派英人为总税务司和在中国各港口雇佣英籍领港人的特权。这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猖狂一时。但到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春，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欧洲战场，1942年7月至1943年2月，苏联红军进行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辉煌的胜利告终，随后，苏军对德军展开反攻。在太平洋战场，1942年5月中途岛之战，日军惨败。1942年8月至第二年3月，美军在瓜达耳卡纳尔岛争夺战中取胜，并由此转入局部反攻。在北非战场，英美联军也取得很大胜利。1943年5月，在北非的德意军投降。7月，英美联军进攻意大利，9月意大利投降。与此同时，

被法西斯占领的欧亚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德意日 3 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也发展起来。

以上形势，有利于中国抗战，造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作战重心转移到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但中国战场仍是它陆军作战的主战场。日军大本营确定的太平洋开战后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是：第一，进一步加紧对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的进攻；第二，对国民党一面施展“谋略”诱降，一面保持适当的攻击势头，以击破其抗战力量；第三，进行资源掠夺。最后达到“攻占南方要域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目的。为适应太平洋战争的需要，日军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中撤调 6 个师团编入南方军。这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 212 万人，其中 73 万用于东北和朝鲜，62 万用于华北华中华南，39 万用于南方作战。航空兵 8.5 万人，一半用于南方作战。

1940 年下半年“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对华北八路军的进攻即已加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把“确保”华北的“治安”作为建立巩固的“大东亚战争”后方基地的重点，因此，对八路军的进攻就更加凶猛。1941 年，日本华北方面军把过去实行了 2 年的“治安肃正运动”发展为“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1941、1942 两年内，“强化治安”共进行 5 次。他们把华北划为“治安”、“准治安”、“非治安”三种地区，分别采取以“清乡”、“蚕食”、“扫荡”为主的办法。2 年内，日军在华北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千人以上的达 100 多次，万人以上的 20 多次，其中对冀中、冀东、晋察冀、太岳、鲁中沂蒙等区的大“扫荡”，使用兵力 2.5 万人以上。

“扫荡”中，日军使用所谓“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张网捕鱼”、“捕捉奇袭”、“纵横扫荡”、“辗转抉剔”、“对角清剿”、“反转电击”、“梳篦式清剿”等等战术，所到之处，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再配合以“囚笼政策”，广修公路、碉堡、据点、封锁沟，企图通过这样残酷的“扫荡”和封锁“蚕食”，从根本上摧毁以至消灭敌后抗战力量。

在华北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和对八路军进行大“扫荡”的同时，日伪在华中搞了“清乡运动”和对新四军的大“扫荡”。从 1941 年起，日军对华南东江、珠江三角洲、琼崖等抗日游击队和根据地也进行了“扫荡”。

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战争。1941 年 6 月—1943 年 5 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 4.2 万余次，毙伤俘日军 13.4 万余人，伪军 19.7 万余人，总计消灭日伪军 33 万余人。经过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粉碎了日寇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但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根据地的平原地区，也受到了极大摧残。在冀东区，日寇先后制造潘家峪、潘家岱两起大惨案，计杀害中国村民 2580 余人。经过日伪军的几次“扫荡”，冀东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游击区。在冀中区，经过敌人 1942 年 5 月至 7 月的大“扫荡”，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尚存的根据地被分割成 2600 多块，部队减员近一半，群众死伤被抓者达 5 万余人。冀南平原根据地也变成了游击区。1942 年 5 月，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太行区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但是，各抗日根据地终能站住脚根，坚持下来。到 1943 年，便开始走上恢复和再发展的道路。

在国民党战场，日军为了配合南方作战，牵制华中的国民党军，首先于 1941 年 12 月下旬至 1942 年 1 月中旬第三次进攻长沙。日军出动 12 万人，

中国军队 37 个师参战。结果日军的进攻被打退，中国军队取得长沙大捷，歼灭日军 5 万余人。1942 年 4 月 18 日，美国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第一次轰炸日本本土，返航时降落在浙赣路沿线地区的机场。日军大本营为防止美国空军继续利用中国机场，命令中国派遣军打通浙赣路，摧毁浙赣走廊地区的中国空军机场。5 月中和 6 月上旬，日军约 15 万人由浙赣线东西两端对进，中国守军节节抗击，日军第 15 师团长等多名军官毙命。6 月 7 日，日军攻占衢州。7 月 1 日东西对进的日军会师横峰，打通了浙赣线。随后对机场、铁路进行大破坏，对战略物资进行大掠夺。7 月中，又侵占了温州。至 8 月，日军除继续占领金华及其附近地区外，撤回原地。此役日军被歼近 3 万人。1943 年 5 月和 11 月，日军各集中 10 万兵力，向鄂西和湘北常德地区发动两次进攻。国民党军逐次抵抗，总计歼灭日军 3 万余人，最后均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 年 2 月，中国政府应英国的要求，派遣军队入缅作战。英国对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长时间内采取“绥靖”政策。但 1938 年 9 月英法合作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并没有阻住德国在西欧的扩张。1940 年 6 月，英法军在敦刻尔克遭到惨败，法国投降，英伦三岛面临严重危机。可是，英国不接受教训，又企图牺牲中国求得同日本的妥协，以加强对德战争。7 月，英日签订封锁滇缅路的协定。这对日本侵略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1940 年 9 月，日军水陆并进侵入越南北部，企图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直到这时，英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才发生变化，转而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保住它的殖民地缅甸不被日本夺去。10 月，英国重新开放滇缅路。接着，酝酿中英军事同盟和联合保卫缅甸问题。1941 年 12 月下旬，中英军事同盟和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

1942 年 2 月，仰光危急，英方迭次要求中国派遣军队入缅作战。中国遂令第 5、第 6、第 66 三个军共 10 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这时，日军已攻占仰光，正分三路北进，中国远征军担任中路和东路作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西路英军作战失利，被围困于仁安羌以北地区。中国远征军前往救援，解救出被围英军 7000 余人、汽车百余辆、战马千余匹，以及被俘的英军、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 500 余人。由于西路英军全线撤退，中路远征军右侧受到威胁，接着，整个远征军的后路完全被切断。远征军被迫向国境和印度强行撤退。撤退途中要通过崇山密林，道路异常险峻，又值雨季来临，气候炎热，蚊虫成群，疫病流行，再加给养困难，日军堵截，部队损失惨重。10 万远征军最后剩下不足 5 万人，牺牲者中多半是撤退中伤亡的。著名抗战将领、第 200 师师长戴安澜率部向北转移途中遭敌伏击，负重伤后殉国。

纵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局，日军更加强调了以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主的方针，而其进攻的疯狂性和残酷性均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这给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重大损伤。但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消耗了敌人，保住了基本阵地。日军在国民党战场的进攻，虽然规模很大，但大都是牵制性的。国民党军对日军的进攻继续给以抵抗，并基本能够恢复进攻前的态势。但国民党军为保存实力，固守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仍是敌来我打，敌退我停，没有利用新的有利形势和条件主动地向敌发起攻击。

二、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

1937—1940年，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1940年7月统计，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和两面负担粮税者）约达1亿人。但是，进入1941年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扫荡”与“蚕食”，同时也由于国民党实施经济封锁和华北地区连年遭灾，解放区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由40万人减到30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到11万人，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毛泽东说：当时“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策，领导解放区军民为克服严重的困难局面而奋斗。当时相继实施的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十大政策。

（一）对敌斗争政策。针对敌人的所谓“总力战”，各解放区军民亦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对敌斗争，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封锁、反“强化治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把大力发展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放在重要地位，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建立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对敌作战，实行“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方针。在主力部队的带领下，地方军和民兵以地道战、地雷战、交通破击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为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从1942年春，华北八路军开始实行“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一是派出武装工作队和小股部队深入敌占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对敌开展政治攻势，打击与分化瓦解伪军和伪政权，变敌之后方为前线，将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以此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二是主力部队在敌人大规模“扫荡”开始之时，跳到外线，即敌后之敌后，把内线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与外线敏捷果敢的进攻战结合起来。三是与反“扫荡”作战相邻的其它根据地军民向当面之敌发动进攻，以牵制敌人，策应被“扫荡”地区军民的斗争。

（二）发动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包括减租减息、三三制、拥政爱民。第一，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早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就已正式确定下来，但没有普遍认真地执行。1942年1月中共中央再次做出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各解放区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实行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减租额一般为原租额的25%，即二五减租。减息一般减到年息一分左右。第二，实行交租交息，继续保留地主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第三，对待富农，既照减其封建性剥削的租和息，又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生产，以鼓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抗日。到1943年，各根据地掀起了减租减息的高潮。第二，三三制，是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原则。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根据地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政权机构要由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三部分人组成，名额各占1/3。这种三三制的人员构成，鲜明具体地体现了根据地政权

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可以更好地把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各界民主人士都团结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周围。第三，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从1943年开始实行，目的是使军队与民众、军队与政府部门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三）支持长期战争的财政经济政策。包括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第一，发展生产，即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此作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基本环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规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处理公私关系上的“公私兼顾”及“军民兼顾”的原则，发动部队、机关、学校投入生产自救，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中共中央等各级领导人也都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消费之外尚有结余。到1943年，做到了丰衣足食。同时发展了工业和手工业。其它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紧张、频繁的战斗环境中贯彻“劳武结合”的原则，也积极组织部队和群众发展生产。大生产运动不仅使解放区渡过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局面，为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改进了各级领导机关的作风，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发展生产和管理经济的经验。第二，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采纳民主人士李鼎铭的建议于1941年12月决定实行的。精兵方面，规定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山区为2:1，平原为1:1，某些最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简政方面，要求裁并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实行合署办公。各根据地整个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精兵简政的实行，不但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解决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而且提高了部队质量和政府机关工作效率。

（四）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政策。包括统一领导，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第一，统一领导，即实施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在当时各个根据地长期被割裂，分散独立性较强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整顿三风，即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批判和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时期遗留下来并仍有很大影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树立和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其中尤以整顿学风问题，即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核心。整风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决避免过去“左”倾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第三，这次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它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全党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大大前进了一步。它在中共思想建设史上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构成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现代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次整风，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些，就为夺取抗战胜利以至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第四，整风后期审查干部中，曾开展过“抢救失足者运动”，以“逼、供、信”的办法，把不少党员、干部打成“特务”，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时间不久，中共中央纠正了这一错误。

“抢救运动”虽然是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发生的，但它只是整风的一个支流。

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解放区军民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岁月。中国共产党紧密依靠群众，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粉碎了日寇摧毁抗日

根据地的企图，战胜了财政经济上的巨大困难。经过这一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熟起来。不久，抗日战争即开创出新的局面。

三、国民党统治日趋腐朽

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和各党派曾对国民党寄予很大希望。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由于抗战比较努力，同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党派的关系比较好，允许人民有较多的抗日自由，也曾得到全国普遍的拥护。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毕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随着 1938 年 10 月武汉的失守和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它的政策就逐渐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尤其到 1941 年以后，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就更加明显，同共产党的励精图治形成鲜明对比。

国民党政权从建立开始，就实行一党专政，而它的一党专政，又主要就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个人权势无限度地膨胀。通过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当上国民党总裁，接着又出任新设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蒋介石还修改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废除常务委员制，规定一切事宜均归委员长一人决定和负责，委员长即是海陆空军大元帅。此外，蒋介石还担任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中央设计局总裁、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1943 年 8 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后，蒋介石又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并规定五院院长也须由主席提名，向主席负责。这样，就使蒋介石个人独裁政治的形态更为完备。蒋介石的“手令”可以代替一切。

1939 年以后，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保甲制度，使之更加“党化”、“警察化”、“特务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推行所谓“新县制”。新县制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下设乡或镇，乡或镇辖 10 保，每保辖 10 甲，每甲辖 10 户。各级设相应的民意机关、武装组织、教育机构，由乡镇保长担任地方武装的队长和学校的校长。这是一种层层受国民党控制，把政权、武装、教育机构结合一起的法西斯化的基层政治体制。

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特务统治。1938 年，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正式形成“中统”和“军统”两个。中统局全盛时有 1.3 万多人，加上为其控制和使用的人员（如国民党党员通讯网、通讯员等），共约 20 万人。军统局刚成立时有 7000 人左右，后来发展到（包括附属人员）约 9 万人，警察、治安机关等也在其掌握之中。庞大的特务组织对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形成了严密的监视系统，实际主宰了国统区的政治生活。1943 年，国民党聘请美国特工专家作指导，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军统头子戴笠为主任，美国军官梅乐斯为副主任。该所在许多地方开设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务，并直接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众多的革命者惨死于这个机构的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中。国民党设立多处集中营，仅上饶一处，就囚禁过数千人。

为了控制青年，1938 年 7 月国民党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国民党肆意摧残进步文化，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由邹韬奋在 1925 年创办的生活书店，曾为中国进步文化的发展和全民抗战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1938 年生活书店各地分店发展到 55 个。从 1939 年起，各处分店即相继遭到国民

党破坏。至 1941 年 2 月，国内生活书店只剩下重庆一处。1942 年 3 月，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公然称“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这就进一步从法律上剥夺了人民的权利。这年 5 月初，国民党中央下令各省市不准举行纪念“五四”的活动。在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下，不少进步报纸、刊物被迫停刊，或被迫改组，或被迫开“天窗”，或稿件被删改；进步文化工作者遭到迫害，甚至被杀害。

国民党各级官吏日渐腐化堕落。他们倚仗权势，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犯禁走私，贪污受贿，利用一切办法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官僚在美国冻结的存款就达 3 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巴西等地的存款，达 5 亿美元，折法币（按 1944 年 9 月比价）3000 亿元，可装备 300 个机械化国防师。1944 年 3 月舆论界揭发，国民党官僚在昆明囤积的物资，足供全省军民 5 年之用。1944 年 1—11 月，粮食部门破获的贪污案件就达 1243 起。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 1940 年大声疾呼：“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他呼吁“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少要员自己就是发国难财者，所以仗义执言的马寅初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遭到逮捕，被关进集中营长达 21 个月。此事突出说明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朽。

由于国民党各级官僚依仗政治特权大发国难财，同时由于国民政府依靠政权力量加强了经济垄断，所以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空前膨胀起来。在金融方面，1939 年 10 月设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国民党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直接担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1942 年 7 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集中于中央银行。到 1944 年 12 月，国民党国家行局的存款额已占到全国银行业存款总额的 92%。在商业方面，官僚资本也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国民党相继成立了贸易委员会（1937 年 9 月）、专卖事业管理局（1941 年 4 月）、物资局（1942 年 2 月）等商业垄断机构，实行了专卖和统购统销政策。从 1942 年起，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 6 类日用商品实行专卖。此前已对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了统购统销。1942 年 2 月，对棉纱实行了统购。这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和措施。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大官僚还设立了不少受政治特权庇护、具有垄断性质的私人商业公司。国民党官僚资本对工矿业垄断也迅速形成。1937 年 9 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作为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官营工矿业主要有两大系统，分别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此外还有不少省办的官营工业。孔家、宋家等大官僚们兴办了一批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实际上是公私不分，也居于垄断地位。官营工矿业资本额在全部工矿企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1935 年为 12%，1941 年为 50%，1942 年为 69.58%。其资本额的绝对数，1942 年比 1935 年增加 44 倍。

国民党政权加重了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经济剥削。从 1938 年起，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各地贱价征购粮食。从 1941 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

《西南经济建设与继续抗战之先决条件》，香港《工商日报》1940 年 10 月 6 日；《战后的经济问题》，香港《大公报》1940 年 12 月 8 日，均转见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 1978 年第 2 版，第 260 页。

征实，规定税额 1 元折征稻谷 2 市斗，到 1942 年提高到 4 市斗，同时，“随粮代购”，即征购与征实一起进行，两者数额相等。征购部分不但价格低廉，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给“库券”。1943 年，在川、滇等 9 省改征购为征借，安徽改征购为“捐献”。1944 年，征借普遍推行于国统区各省。征实、征借两项，大约占收获量的 50%。承受此种负担的地主要用加租的办法弥补其损失，因此，最后的负担者只能是自耕农和佃农。

从 1942 年由中央银行集中货币发行权后，通货急速膨胀。法币的发行额，1937 年 7 月为 14.07 亿元，至 1939 年 6 月增为 29.98 亿元，尚属平稳；1939 年 12 月达 42.87 亿元，1941 年 12 月达 151.38 亿元，1942 年 6 月达 249.45 亿元，1945 年 8 月达 3980.82 亿元。8 年之中，增发 280 余倍。通货恶性膨胀，使人民群众的财富无形之中化为乌有，相反，却有利于官僚资本迅速集中财富。

国民党政权的日趋腐朽，在军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1941 年起，大批国民党文武官员和军队投降日寇，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到 1943 年 9 月，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已有 20 人，高级将领 58 人，军队 50 万人，占 80 万伪军的 60%。由于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日益降低，甚至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以致在 1944 年豫湘桂作战中，遭到不应有的惨败。

1944 年 4 月至 12 月，日本侵略军向河南、湖南、广西 3 省平汉、粤汉、湘桂沿线要地发起大规模攻势作战。其目的，一是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从大陆上沟通与侵入东南亚的日军的联系；二是摧毁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解除美国第 14 航空大队利用这些基地对日军和日本本土轰炸的威胁；三是压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整个豫湘桂作战中，日军出动兵力总计 50 余万人，中国方面参战兵力 100 余万人。双方先后举行豫中会战、长（沙）衡（阳）会战和桂（林）柳（州）会战。中国军队虽然给敌人杀伤，但终归失败，河南几乎全省及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沦陷，日军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沿途空军基地也被日军摧毁。8 个月的豫湘桂作战，在日本方面已属孤注一掷，但国民党军由于指挥无能 and 部队战斗力下降而惨败。战线被日军向前推进 2000 余公里，土地丧失 20 万平方公里，包括城市 146 座，被毁空军基地 7 个，机场 36 个，6000 万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四、中间党派的主张与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政党政派，除国共两党外，还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国致公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等。这些政党政派从“九一八”后（有的从其成立时起），即奔走呼号，积极主张抗日救国。芦沟桥事变后，他们的抗战热情更加高涨。其中，救国会和第三党尤为活跃。

芦沟桥事变的第三天，7 月 9 日，救国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支援 29 军抗战健儿，全力保卫北方。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 7 人于 7 月底获释，他们表示要继续为全国的团结和抗日而奋斗。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三日刊，沈钧儒、李公朴、柳湜在武汉创办的《全

民周刊》，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都为抗日宣传作出了贡献。

第三党于救国会发表保卫北方宣言的同一天，致函国民政府，提出实现民主政治、发挥人民抗战能力等“八大政治主张”。1938年3月，第三党召开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通过《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15项，强调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问朝野，一致团结，战胜暴日，要求国民政府扫除官僚主义，实行民主，建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取消保甲制度等。第三党不仅多次以致函和宣言形式提出抗日救国的基本主张，而且积极从事实际的抗日斗争。第三党中央和地方组织创办了不少刊物，如《抗战行动》、《前进日报》、《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华侨》等，宣传抗日。其成员在河北南部、皖中桐城、广东等地组织过游击队，进行抗日游击活动。留守北平主持第三党地下工作的王守光，因进行抗日宣传，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尽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日寇放出狼犬活活咬死。

除救国会、第三党外，职教社也连续发表言论申明立场：“不复吾失土，不复吾主权，只有战！”青年党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厉行全国总动员，加强抗战力量”。致公党号召党员抗日，并通过致公堂等团体发动华侨积极支援抗战。

各中间党派在积极主张抗日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他们的抗日主张，又存在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政府。有的党派，如曾经激烈主张抗日反蒋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了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于1937年10月自动解散。1938年4月，国社党代表张君勱、青年党代表左舜生分别致书蒋介石、汪精卫，或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等等。有人为了达到拥蒋的目的，竟肆意反共。1938年12月，张君勱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以做到“军事权之统一”；“打破割据”，“取消特区”，以做到“一国之内惟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这三条要求，完全迎合了蒋介石“溶化”共产党的企图。

1939年11月，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及无党派人士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订有《简章》，标明它“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职志”。又规定《信约》12条，其核心是既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又要求蒋介石实行宪政，给各党派以平等合法的地位。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现实，中间党派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争取民主的斗争上来。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前后，他们积极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和民主宪政运动。

先是，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4月，国民政府公布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参政员由各省市、蒙藏、华侨、重要文化团体和经济团体方面产生。共产党和大部分民主党派方面的参政员，即是以第四项身份出席的。参政会的设立，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强大的民主呼声压力下所做出的一个姿态，并不表明国民党真的要开放政权、尊重民意。参政会不是决策机构，其决议案无权督促政府必须执行。它基本上为国民党所控制，因此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但是，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和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从1938年7月第一届参政会召开起，共

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积极参加了参政会活动，提出许多有利于抗战民主团结的议案，增加了抗战声中的民主气氛。

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各中间党派纷纷提出实行宪政的议案，国民党为应付舆论，也令其参政员响应，于是参政会通过决议：“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开展起来。国民参政会成立了宪政期成会，许多城市召开和成立宪政座谈会、促进会。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广泛开展了宪政运动，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但是，当权的国民党不过是在玩弄宪政骗局。他们顽固坚持1936年由国民党一手炮制、以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核心内容的“五五宪草”和旧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坚持几年前国民党一手包办“选出”的国大代表为有效。国民党地方政府又对各地民主宪政运动横加压制。而当宪政运动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构成某种威胁时，国民党立即把实行宪政的诺言收起。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曾扬言第二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但到1940年9月，国民党又宣布，因交通不便，国民大会延期举行。历时1年的宪政运动，转向低落。

宪政运动进一步揭穿了国民党反民主的真面目。在宪政运动进行期间和低落后不久，国民党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这些，给各个中间党派以很大的刺激，他们忧虑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能否维持，担心自己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能否生存下去，于是感到第三种政治势力有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基于这样的认识，前述三党三派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于1941年3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黄炎培担任临时主席，10月，由张澜接任主席。三党三派入盟后，仍保持各自组织的独立性。后来，由于非党派的个人入盟者不断增加，到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民主政团同盟和后来的民盟，不是单一阶级的组织，它带有阶级联盟的性质，但其基本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10月宣布“对时局主张纲领”10条，包括：“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加强国内团结，协调党派间的关系；“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厉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同时发表的同盟成立宣言，又强调“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些主张无疑体现了民主、团结、抗战的精神，其中心是要求民主。自然，笼统地提出“军队国家化”原则，且把它置于政治民主化之前，这在国民党控制着国家政权的条件下，是不恰当的，它不利于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也不利于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实现。

迫于国内外民主势力的压力，1943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布：“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同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以筹备宪政的实施。以此为契机，民主政团同盟和其他民主分子掀起了抗战以来第二次宪政运动。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于“九一八”12周年纪念之际，写出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指出：国民党必须“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否则，“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永远无从谈起”。1944年元旦，黄炎培等创办《宪政》月刊，作为宣传宪政的阵地。接着，各地宪政座谈会、

时事座谈会、宪政促进会、宪政研究会等会议和组织纷纷召开或成立。5月，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认为“目前世界的主潮为民主”，而国民党当政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战后就会出现“国家的分裂与毁灭”。该声明主张中国必须切实“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组织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后，宪政运动又同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声势更为浩大的冲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潮流。

五、“中国之命运”的争论

有关“中国之命运”，即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在近代以来，特别是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一直尖锐地存在着。国共10年内战的实质，就是由谁来决定中国命运的问题。待抗日军兴，国共合作，全国一时呈现出新的气象，中国命运之争暂时潜伏下来。但是，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1939年发生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实际就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斗争。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和一些反共文人，极力强调所谓“政令”、“军令”的统一，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论调。他们借口中共表示愿意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狂妄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抗日民主政权，取消共产主义思想。他们阉割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它变成反共的旗帜。

1939年5月，蒋介石做《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构筑成蒋记三民主义。他说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都是“一偏之见”，只有既不偏于精神又不偏于物质的民生史观，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皆有缺点”，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推之世界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能作为“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他大讲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大讲愚民的“力行哲学”，大讲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用被他篡改了的三民主义代替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其它一切主义，继续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共产党的叛徒叶青，连续抛出反动文章和小册子。他把三民主义篡改成不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一民主义，并宣称要“以三民主义作标准来批判其它主义”。他吹捧国民党，吹捧蒋介石，咒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项事业。他鼓吹“一次革命”，用以说明民生主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部包括在内。其结论是：“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中国有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就够了，用不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叶青之流的进攻。他们区分了真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正确阐述了革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揭穿了叶青“一次革命论”的反动实质，并且在争论中，全面阐明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指明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中国必由之路。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于中国之命运争论的第一回合。

进入1943年，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还表现得如何猖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局势已定。在这种情况下，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更加突出起来。1943年3月，蒋介石以他自己的名义出版《中国

之命运》一书。这本经蒋介石授意、综合了蒋介石历来思想而由陶希圣写成的小册子，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蒋介石集团的立场、观点、内外政策，标志着蒋介石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即“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可决定其盛衰荣枯”；“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如果全国能够“精诚团结，奉公守法”，中国的命运就是“独立，自由”，否则，“诈欺虚伪，毁法乱行”，中国的命运就是“衰落”、“灭亡”。蒋介石这些话的实质含义，第一，就是消灭共产党，消灭人民军队，消灭解放区，因为蒋介石同时宣布，中国共产党就是“变相军阀”、“新式封建”、“破坏统一，妨碍建设”的“封建反动势力”，“没有存在的余地”。他说：“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无论怎样宽大，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什么合理的方法了”。第二，进一步强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国家体制。蒋介石说：“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总之，蒋介石所指出的中国之命运，就是继续维护并进一步强化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

蒋介石这本书的发表也是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继此书之后，国民党又借1943年5月共产国际决定解散的机会，大肆宣扬“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狂妄地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6月中，胡宗南召开会议，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使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达到四五十万人。7、8月间发动多次挑衅性进攻。陕甘宁边区军民紧急动员，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其它解放区积极声援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各界群众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国际舆论也批评蒋介石的反共内战行为。鉴于这样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于9月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宣布中共问题“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对于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反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1943年3月起连续发表一系列针对性、战斗性很强的社论和文章，全面批判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各个观点，回击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诬蔑，剖析了蒋介石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人指出：蒋介石的这本书“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着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而“中国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消灭不了的，中国民族的生命、幸福与光明是消灭不了的”。他们依据中国历史的事实，确凿地说明：“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中国必须走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道路。

这次围绕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展开的争论，是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高潮。由于蒋介石亲自出面叫嚣反共，甚至示意决心发动反共内战，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一个直接指名批判蒋介石反动思想的机会。这也说明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正在激化。

1944年下半年，中国之命运的争论，进一步集中到要不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上来。当时国统区第二次宪政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国民党军在豫湘桂的大溃退充分表现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9

月 15 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林伯渠代表中共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0 月 10 日，周恩来发表《如何解决》的讲演，对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作了说明。

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当时兴起的宪政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步骤，抓住了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也把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引到更实质性的问题上来。中共的主张得到国统区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9 月 24 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 500 余人集会，由民盟主席张澜主持，与会者痛诋国民党一党专政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强烈要求召开国事会议或党派会议或国民会议，成立联合政权。10 月，宋庆龄、张澜、郭沫若等 72 人发起召开追悼邹韬奋大会，与会数千人，提出要向法西斯统治展开更积极的斗争。10 月 10 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中心口号。

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直接对立，所以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一主张，而顽固坚持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方案。1945 年 3 月初，他在宪政促进会的讲话中声言：“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它联合政府。”这是在国民大会的幌子下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分别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它们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中国之命运。

国民党“六大”于 1945 年 5 月 5 日至 21 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奉行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方针，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会议经蒋介石提议，决定“以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以实施宪政”。这里所说的国民大会，其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国民党中央指定或由国民党包办“选举”出来的，所要“制颁”的宪法，是以 1936 年国民党公布的“五五宪草”为依据的。蒋介石还声明：“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不过是把“训政的地位”改为“扶翼的义务”。由此可见，蒋介石的“还政于民”，仍是归政于国民党。这次大会的另一个中心内容，是加强反共。会议专门通过《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和《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诬蔑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

中共“七大”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大会的开幕词中即尖锐地提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问题。他说，即使打败日本之后，中国也还有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又指出，国民党的“六大”是“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共产党的“七大”则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 905 页。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 921—922 页。

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共“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证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发挥，毛泽东根据 20 多年来共产党建设的经验，着重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他把这三大作风称作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三大标志。毛泽东指出，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不应该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法西斯的国家制度；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中国革命还处在反帝反封建的阶段；中国只应该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他并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中心就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便进入最后决定胜负的阶段。

六、文化斗争和文艺成就

文化界对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与坚持，起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存亡的搏斗中，文化界也不铁板一块，充满着斗争。

10 年内战时期就发生过激烈争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又被提了出来。在当时，抗日救亡是中华民族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抗战文艺理应受到热烈的提倡和扶持。但是，有些人却鼓吹什么“与抗战无关”、“远离抗日宣传”的文艺，而对抗战文艺则百般挑剔，斥为“空洞的抗战八股”、“愚笨”、“实在无多知识”，云云。

革命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罗荪、宋之的、巴人、张天翼等先后撰文批驳这种观点。第一，他们充分肯定了抗战文艺的伟大意义，指出：描写抗战的文艺作品，尽管“距离所谓‘伟大的作品’的门槛还远得很”，但材料、人物、生活、情绪都是“真实”的，读者们从这些作品中“认识了抗战的一面，增强了抗战的决心”。第二，他们认为，在全民族抗战的年代，“与抗战无关”的文艺是不存在的。“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就是“要我们的作者，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在现在，不但与抗战无关的中国人不存在，就是他要对抗战守中立——也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总会影响到抗战，会起一定的作用”。“就连飞升到象牙之塔里的爷们也都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跳不出这‘时代’。”这些论述，坚持了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正确方向，但也带有绝对化、简单化的毛病。在当时，固然应该大力提倡抗战文艺，但那些非抗战题材、内容健康、艺术上也有特色和较高水平

巴人：《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4 册，第 258—259 页。

张天翼：《论“无关”抗战的题材》，《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4 册，第 269、265 页。

的文艺作品，在文化史上亦应有一席之地，不应完全否定。

1940—1942年间，正值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猖獗，国内蒋介石集团强化法西斯统治和加紧反共活动之时，文化界出现一个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小团体。其成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于1940年4月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至1941年7月停办，共出17期），1941年12月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办副刊《战国》（1942年7月停刊，共出31期），故被称作“战国策”派或“战国”派。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第一，宣扬“意志”哲学，鼓吹“英雄崇拜”。陈铨专门撰写《论英雄崇拜》和《再论英雄崇拜》两篇文章，说：只有人类的意志“才是历史演进的中心”，而英雄又是“人类意志的中心”，因此，归根到底，历史是少数英雄，即“天才”创造的。英雄具有“神秘伟大的力量”，“是群众的救星”，“宇宙伟大的现象”。既然如此，人类就应该“无条件地崇拜英雄”，直到死去。而中国“目前最急切的问题”，就是“怎样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中国有哪些值得人们以死去崇拜的“英雄”呢？除去已故的人物之外，陈铨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蒋委员长”。原来，“战国策”派的意志哲学和英雄崇拜，就是要人们禀承蒋介石“意志”行事，对蒋介石“无条件地崇拜”。第二，宣传所谓“形态历史观”，断言当今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他们认为，世界上凡自成体系的文化，都要经过“封建”、“列国”和“大一统”三个阶段，20世纪是“大战的世纪”，中国面临的是“大战国时代”。在这个“大战国时代”，必然产生一种“国力潮流”，即“注重统一与集权”，“包括政权集中，军权统一，经济干涉，国教创立等项”，它“代表‘秩序要求’”。中国要有自己的“理想政治”，确立自己的“战国策”。而国民党提出的“‘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中国的“理想政治”，三句口号也就分别代表了“战”，“国”，“策”。

可见，“战国策”派，归根到底是在为加强国民党独裁统治寻找根据。第三，鼓吹所谓“力的宇宙观”。他们说：“力”是“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力就是“正义”，“正义”就存在于力中，在“力的宇宙观”中，“‘德’的一个字并不在这个方程式中。”根据这种“强力”主义，战国策派极力颂扬“力的文化”，主张文艺表达强力，描写反理性的“恐怖、狂欢与虔恪”。

共产党领导的思想界和文艺界，对“战国策”派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实际上，“战国策”派带有某些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宣传并没有多少市场，当纳粹德国逐渐显露败象之际，这个派别也就消沉下去了。

抗战时期，一些既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营垒、又不属于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哲学营垒的哲学家，纷纷出版著作，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冯友兰。冯友兰在抗战前写出《中国哲学史》，同时开始酝酿他的“新理学”。1939年正式出版《新理学》一书，标志他的“新理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之后，又出版一系列著作，对新理学作进一步发挥，连同《新理学》，统称“贞元六书”。新理学是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挥，同时杂糅了一些佛道思想和西方哲学。它把世界划分为二，一是此岸的现实

《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出版。

陈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战国策》第9期，1942年1月28日出版。

林同济：《力！》，《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出版。

世界，一是彼岸的虚构的“理世界”。现实世界的物，是“相对的料”，是第二性的；“理世界”“万理俱备”，“万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第一性的。物不过是“理之实现”。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在讲人生问题时，冯友兰区分人的四种境界，最高者为“天地境界”，这种境界的人，“体与物冥”，“万物皆备于我”，“我”成了“大全”（即理世界）的“主宰”。这里，又从客观唯心主义倒向了主观唯心主义。对冯友兰的哲学观点，共产党刊物《群众》曾发表陈家康、胡绳等人的文章，予以批判。

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有表现。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那里的抗战文艺运动。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以致当抗日战争困难局面出现后，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表现出来。许多不正确的文艺观点在文艺界流行，诸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要“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指对革命根据地），“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妨害创作情绪”；“艺术指导政治”；“反功利主义”等。有些文艺部门存在着脱离实际、关门提高的倾向。有些作品热衷于描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情趣，甚至欣赏、赞扬他们的缺点，而对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则加以丑化。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系统制定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了《引言》和《结论》两次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就文艺为什么人、普及与提高、文艺与政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以及人性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著作。它所突出指明的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所论证的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及其它一系列文艺原理，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它的有些观点，也带着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左”的倾向，是需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更而发展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首先推动了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引下，大批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下部队，体验生活，改造思想，积累素材，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众多的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作品。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旧到新的变化，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新歌剧《白毛女》，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在继承民族传统和吸收西洋剧作经验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民族风格，极受广大群众欢迎。京剧《逼上梁山》，迈出了旧剧革命的成功的一步。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较好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有更多的优秀作品问世。一大批长篇小说创作出来，其中有：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柳青的《种谷记》、草明的《原动力》、欧阳山的《高干大》、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此外有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歌剧《刘胡兰》（西北战斗剧社）等。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也取得巨大成绩，其中以戏剧创作最为突出。1941—1943年间，郭沫若连续写成六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后改名《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这些剧作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紧密而又巧妙地配合了当时的民族斗

争和阶级斗争。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剧作。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有影响的作品有：讽刺喜剧《升官图》（陈白尘），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合编），政治讽刺诗《马凡陀山歌》（袁水拍，写于1944—1948年），小说《围城》（钱钟书）等。

七、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3年春夏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一步朝着最后战胜德、日两国的方向发展。这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讨对日作战和战后对日本的处置问题。12月1日发表开罗宣言，表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宣言最后说，三国为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将坚持进行“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开罗会议后，11月底、12月初，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德黑兰会议，商讨对德对日军事行动、战后对德国的处置及建立联合国组织等问题。美英承担1944年上半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义务，苏联答应在欧战结束后半年参加对日作战。

1944年，欧洲反法西斯各国向德国侵略势力展开全线反攻，德寇被赶出苏联国土，英美开辟了第二战场，盟军攻入法国北部。1945年4月，苏联红军开始攻打柏林。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各国反法西斯势力广泛发展起来，许多国家举行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武装起义。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1944年由“逐岛进攻”改为“越岛进攻”，直插日本重防区域，相继攻占马绍尔、加罗林、马利亚纳等群岛和关岛、菲律宾、冲绳岛等，并对日本本土进行大空袭。东条英机、小矶国昭两届内阁相继倒台。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给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敌后各解放区在渡过1941、1942两年最艰苦的岁月后，从1943年开始恢复和再发展，到1944年进入局部反攻。在日军向国民党军发起豫湘桂战役之时，人民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自1944年春至1945年夏连续发动五次攻势，并以一部兵力转入外线作战，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进军。其间，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到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90余万人，并取得了实施大规模攻势作战的经验，从而为展开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解放区已发展到19个，遍及19个省，人口9550万，民兵220万，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成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基地。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由于蒋介石执行保存实力、消极抗日的方针，出现了与解放区战场截然相反的情况。1944年，国民党不但未能利用新的有利形势，主动出击，收复国土，而且在豫湘桂三省失地千里、损兵五六十万。只有在缅北、滇西实行了反攻作战，并取得胜利，到1945年1月打通了中印公路，把日军赶出了缅北。

1945年春，战局的发展对日军越来越不利，日军大本营决定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区，抽调兵力加强对中国沿海地区和日本本土的守备。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适时撤回湘桂沿线兵力，确保武汉地区及北部粤汉线要地”。日

军撤退之时，国民党军尾敌前进，5月下旬收复南宁，6月底收复柳州，7月初收复龙州、凭祥，下旬收复桂林。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临近之时，1945年2月，苏美英召开雅尔塔会议，三国首脑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在该协定中，苏联承诺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1）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意即中国须承认外蒙古的独立。（2）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俄国据有的以下权益：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3）千岛群岛交予苏联。该协定对加强盟国对日作战，加快消灭日本法西斯，有着重要作用；但它对有关中国主权的规定，是背着中国作出的，是一种侵犯中国主权的霸权主义行为。后来美国把协定内容通知蒋介石，蒋因得到了苏联支持他统一中国的保证，便表示同意这个协定，并由国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等项协定。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这时，日本已处于内外交困、无以自拔的境地。5月中旬，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进而争取苏联“善意的中立”，“使之成为有利于我结束战争的斡旋者”。但是，一批死硬的法西斯分子仍坚持战争到底。6月8日，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决定“以七生尽忠信念为力量之源泉”，动员人力、物力，进行“本土决战”，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出《波茨坦公告》（后苏联加入此通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28日，日本政府拒绝接受公告，表示要“坚决完成战争”。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杀死杀伤居民和军人约20多万。8月8日夜，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百万红军兵分三路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很快突破日军的筑垒地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同时，苏联太平洋舰队攻占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及朝鲜北部的一些港口。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对日作战。此时，70万日本关东军，在强大的苏联红军面前，已不堪一击。

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的同一天，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毛泽东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它同盟国作战”，“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10日、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区抗日武装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各军迫使敌伪投降，并向预定地区进发。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遵照毛泽东的号召和朱德的命令，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从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近6万人，攻克和收复县城139座，据点740多个，破坏和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东段）、北宁等铁路线，使各大解放区基本上连成一片。

在败局已绝无挽回之可能的情况下，8月15日，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铃木内阁辞职，陆相阿南惟几自杀。17日，东久迩组成投降内阁。但此时日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所以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和苏军向关东军的进攻仍按原定计划进行。28日，美军先遣队在日本登陆。30日，美军元帅麦克阿瑟作为盟军统帅抵达日本，负责接受日本投降

和占领日本本土。9月2日，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9日，中国战区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的8年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结束。9月3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至10月中旬，在华日军除因拒降被八路军、新四军等部歼灭者外，其余均缴械集中完毕。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战斗，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势力的支援下，打败了日本这个骄横一时的东方法西斯强国，不仅收复了芦沟桥事变和“九一八事变”后沦陷的国土，而且收复了被日本霸占50年的中国宝岛台湾。8年中，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38万余人，受降日军128万余人；歼灭伪军118万余人，受降伪军146万余人。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军队伤亡380余万人，民众死伤1800多万人，两项共计2180余万人；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共达1000多亿美元。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人民和反法西斯各国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中国的抗战也支援了其它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战场坚持时间最长，钳制和消灭日军最多，而且，由于中国军民的抗战，使日本不能北攻苏联，也不得不推迟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的牵制，使日本不能全力对英美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进步人类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经过这次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完全成熟了，它的队伍和它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起来。共产党以外的革命民主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就为后来夺取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六章 两种命运的决战

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世界呈现出资本主义衰落、社会主义兴盛的局面。这种形势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有利的。但是，国际环境也有不利于中国人民的一面。首先，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依仗经济、军事优势和对原子弹的垄断，妄图称霸世界。在中国，美国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企图通过蒋介石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庸国和称霸世界的基地。它的办法，起初是一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甚至“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一面鼓励国共双方进行协商，由国民党做些民主改革，共产党则交出军队和政权，由此在中国建立一个蒋介石领导下的、各党派共同参加的、亲美的联合政府。但是，美国的这一意图既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又不完全符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需要，因而受到国共双方的反对。当和平“调停”失败后，美国便走上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道路。其次，是苏联对中国的态度。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及其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起着支持作用，对美国在中国的行动起着限制作用，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但是，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存有偏见并估计过低，而对国民党则估计过高，所以它一再向美国 and 蒋介石表示，苏联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希望中国以蒋介石为“领袖”实现“统一”。在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照会中，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这种只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对美国“扶蒋反共”和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起了鼓励作用。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日本的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立即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两种命运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毛泽东说：抗日战争阶段过去之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由于蒋介石推行反共政策，妄图独占抗战果实，抗日民族战争一结束，新的国内战争的危险立即摆在中国面前。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出三道命令。一是要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所有受降事宜，均由国民政府“统筹决定”。二是命令各地伪军“就现在驻地”，“切实负责，维持治安”，“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改编”。意即利用伪军阻挡人民军队，以便国民党独占抗战果实。接着国民党对伪军大量收编，把许多伪政权和伪军头目封为国民党军的什么总司令、总指挥、绥靖司令、先遣司令等。国民党还向日军发出命令，要日军对人民军队的接收“作有效之防

卫”，对已被人民军队攻占的地方，要“将其收回”。演出了蒋日伪大合流的丑剧。三是命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随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积极调兵遣将，抢占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美国进行了号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出动大批飞机、军舰，把远在西南、西北和印度境内的几十万国民党军运往华北、华中、东北。美国还直接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中国一些城市，以帮助蒋介石“接收”。这样，沦陷区的大中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基本被国民党军所抢占。

经过8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起来。中共党员已有120万人；解放区已有1亿人口、120多万军队、200多万民兵。这是蒋介石决心消灭的力量，但也是他不敢轻视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洞悉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政策，一方面作好迎击进攻的准备，一方面仍然力主通过和平民主的途径，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在中共“七大”上就确定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宣言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全民族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反映了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愿望。中国民主同盟于8月15日发表的《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并要求“全国的老百姓”、“国际的朋友”、“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他们的主张。9月6日，成都文化界200多人发表“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宣言，尖锐指出了严重的内战危机及其根源所在。宣言说：“在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话刚吐出口的时候，内战的阴霾霎时密布了全中国的天空”，其根源即“存在于政治上缺乏以人民大众作主的民主制度，存在于国家的政权一直为一党的少数人所把持”。同月，第三党领导人发表谈话，希望“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各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尤其希望当政的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举国一致的“和平建国、民主统一”的要求。总之，人民革命力量已经壮大起来，和平民主成了战后中国强大的历史潮流。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和平民主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要求，同时由于美国在一个时期内也希望蒋介石能用政治的办法“和平”统一中国，蒋介石要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蒋介石在加紧抢夺抗战果实，积极部署内战的同时，也打出了“和平”的招牌。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在抗战胜利后的1年时间里，国内政治斗争显得十分突出，先后有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短暂的和平局面的出现。

二、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8月14、20、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渝，就“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共定大计”。他表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完全了解的，但考虑到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和平民主以及蒋介石集团内部存在种种矛盾的情况，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和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甚至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

改革；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努力维持国内和平。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随即于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此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真诚愿望。因此毛泽东等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称颂毛泽东亲莅重庆为“弥天大勇诚堪格”。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共进行43天，10月10日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留渝谈判。

“双十协定”内容共12项。其中有些项目达成了协议，有些项目没有达成协议，或实际没有达成协议。达成协议的主要有：关于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双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介石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双方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首先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此外还有关于给人民以自由、党派合法、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等问题。未达成协议的项目，一是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修改国民党一党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五五宪草》；国民党坚持原代表有效，坚持《五五宪草》。最后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解决。二是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这是双方争论的中心。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为此提出四种方案，均被国民党方面拒绝；国民党坚持“政令必须统一”，即取消解放区政权。实际并未解决的项目主要是关于军队问题。中共方面作了重大让步，表示可以从南方8个解放区撤出自己的军队，并把军队数目缩减为24个师，至少20个师，占全国军队编制的1/7（国民党将军队编为120个师）。国民党方面表示，如果此次商谈的各项问题能全盘解决，可以考虑20个师的数目。双方同意成立三人小组，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个问题。

重庆谈判推动了和平民主潮流的发展，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它使共产党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使坚持独裁内战的反动势力进一步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尽管“双十协定”很快被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仍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一面同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一面派军队进攻解放区。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两次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蒋为“围剿”红军而编写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签订后几天，蒋又发出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晋冀鲁豫军区在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举行上党战役，歼灭进犯该地的阎锡山部主力3.5万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于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举行了绥远战役，歼灭沿平绥路东犯的傅作义部1.2万人。晋冀鲁豫军区于10月下旬至11月初举行了邯郸战役，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孙连仲部3万余人，其中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万余人起义。山东军区部队等于10月中旬至1946年1月中旬进行了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歼灭沿津浦路北犯之敌2.8万余人。四次战役总计歼灭国民党军近11万人，有效地阻滞了国民党军向华北解放区

的推进。

在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就是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经过努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向南防御，即在长江以南实行收缩，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兵力，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的进攻，保证部队主力向北展开。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倾注大力争取东北。为此，中共中央先后派出部队11万人，干部2万人（其中包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10人，中央委员中有4人为政治局委员）。先期由冀热辽军区出关的部队也迅速发展到10万人。到1945年底，东北的人民军队总兵力达到28万人，在东满、北满、西满、南满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本年11月初，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与东北抗日联军（已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由于人民军队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对国民党进犯军予以自卫反击，并积极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解放区进一步扩大。至1946年1月，解放区的面积已有近2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5亿，城市506座。

在解放区军民胜利地进行自卫反击战的同时，国统区人民反内战的运动也迅速发展。11月间，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成都各大学21个团体联名发表《制止内战宣言》。重庆许多群众团体和杂志社纷纷呼吁制止内战，并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昆明，11月25日，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师生及市民6000余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武力威吓。26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抗议，28日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暴徒围攻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校，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结果4人被炸死，11人受重伤，14人受轻伤，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又激起更大的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浪潮。

这期间，民主党派空前活跃，新的党派纷纷成立。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民盟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进一步完备了组织系统。同月，谭平山等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2月，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1946年1月，洪门致公党发表宣言，呼吁国内停止内战，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图建设。到1946年4、5月，又有酝酿于豫湘桂战役期间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正式成立。前者领导人为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等，后者领导人为褚辅成、许德珩等。这些民主党派在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战和国统区的反内战运动，给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以沉重打击，使蒋介石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还需要做进一步准备。同时，国际上美、苏、英等国，出于各自的目的，也都不赞成中国重新爆发内战。美国政府决定采取步骤，帮助国民党“和平统一”中国。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同时任命陆军上

将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负责“调处”国共争端，即“运用美国的影响”，“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又要求国民党政府作出容纳其它党派的改革，以便换取中共交出军队，用“和平”的办法“统一”中国。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也表示：“同意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要有“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内部冲突必须停止。

在上述国内国际背景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召开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政协会议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主持召集，与会代表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共38人。五个方面人士，实际代表三种政治力量。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青年党追随国民党。民主同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派，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中也以中间派居多。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根本主张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但会议中，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多与中间派取得一致意见。会议进行22天，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草、军事五项协议。其中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规定：修改已有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委员40人，半数为国民党人员，半数为其它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凡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的议案，须有出席委员2/3之赞成始可通过。

这些协议都是经过激烈的争论而达成的。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关系问题。国民党主张必须先由共产党交出军队，做到军队国家化，然后它才能开放民主。中共指出，必须先有政治民主化，然后才能做到军队国家化，如果把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就不仅会断送这支军队，而且将从根本上断送政治民主化，中共只能把军队交给民主化的国家。但为了打破僵局，使谈判进行下去，中共又提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可以同时进行。讨论中，民盟提出，不只共产党要交出军队，国民党的军队也要整编。在多次讨论之后，始达成上述各项协议。这些协议所确定的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虽然不同于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是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否定。因此这些协议的达成，表明了人民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这次政协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比较典型的合法斗争，并开创了以党派政治协商的形式解决政治纠纷的先例。政协协议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欢迎。

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认为：由于政协协议的达成，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指示要求“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协议而奋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履行政协各项决定的，

以便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个指示同时也指出：“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接受政协协议同过去实行抗战一样，“带着极大被迫性”，“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要“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要把练兵、减租、生产作为“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不久，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

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意执行政协协议。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竟有人提议对国民党出席政协的代表进行弹劾。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近万人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暴徒进行捣乱破坏，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地策动多起反苏反共事件。3月上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完全推翻了政协关于宪法草案的协议。蒋介石宣称政协通过的修改宪草的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要把握住其重要之点多方设法来补救。”全会通过的《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提出五条宪草修改的原则：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也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省无须制定省宪。这些就把政协确定的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几项原则完全否定了。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公然推翻了政协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他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事实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仅根本反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而且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也是不准在中国实行的。

三、美国“调停”与全面内战爆发

战后中国局势的演变，同美国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一个时期内是在所谓“调停中国内部纠纷”的名义下实现的。国民党方面接受美国的“调停”，是因为它完全了解美国“扶蒋反共”的根本立场及其“调停”的基本出发点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而且蒋介石在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打击下，意识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还需要用政治手段遏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需要充足的时间部署内战兵力，美国的“调停”正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共产党方面接受美国的“调停”，是因为中共中央认为，“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是，我们不可存幻想）”，但杜鲁门1945年12月15日的对华政策声明，表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1992年版，第62—63页。

《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1991年版，第494页。

1945年12月22日，马歇尔到重庆。23日会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等表示了中共对马歇尔出使任务的重视和赞许，希望停战，建立一个联合政府。12月27日，准备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内战的具体办法。3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复文中共代表，表示同意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建议由政府 and 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停止军事冲突办法。1946年1月5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7日，国共双方代表张群、周恩来同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以马歇尔为主席，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1月10日，张群、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分别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根据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他们是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军调部一切事宜均按三委员一致同意的原则办理。停战协定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和向解放区的进攻，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坚持将东北地区排除在停战协定之外。

1946年2月14日，“双十协定”和政协会议决定设立的军事三人小组正式成立，成员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充任顾问的美国代表马歇尔。经三人小组的多次协商，2月25日达成《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该方案规定，全国军队的整编及中共军队的统编用18个月的时间分为4个阶段完成。“整军方案”达成后，国共两党代表主要围绕军队驻地实即解放区问题，继续谈判。由于国民党仍然企图消灭解放区，不打算按政协协议的规定走向政治民主化，因此，整军方案也就不可能贯彻执行。

1946年上半年，争夺东北成为国共斗争的一个焦点，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本来，自“九一八事变”东北丢失之后，国民党在那里已没有一兵一卒，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坚持了那里的抗战。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立即把抢占东北作为重要目标。11月，国民党两个军由美国军舰海运到秦皇岛。11月16日，攻占已由人民军队驻守的山海关，接着沿北宁路向北推进，从而挑起了东北的内战。1946年4月，面对东北内战升级的形势，马歇尔建议，中共军队撤离长春，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国民党政府军队停止前进。中共方面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主动撤离长春，但国民党军不仅占领了长春，而且继续沿铁路向北、向东开进，5月28日占领吉林。直到6月6日，蒋介石才下令东北国民党军于6月7日正午停止一切前进、攻击和追击，期限为15天（后延至月底）。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共发表关于东北暂时停战的声明。军调部前进指挥所也于是日在长春设立。

在此后停战期间的谈判中，“三人会议”虽然就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特殊情况下美方代表的决定权、完全结束东北军事冲突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修订2月25日“整军方案”问题上，蒋介石设置了种种障碍，他甚至限令中共军队必须退出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这种蛮横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提出“三人会议”应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重申全国停战令等四项建议，又为蒋介石所拒绝。至此，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在休战期间的谈判中，共产党是比较愿意就停止冲突达成协议的，而政府则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共产党接受这些条件是不大可能的”。“某些国民党文武领袖的力量和权力是以武力解决为目标的，他们的信念是，全

面战争要比目前伴之以经济与政治停滞的半战争状态为好”。但是，马歇尔所说的国民党文武领袖们的“全面战争”的信念，正是同美国对国民党的大力支援密切联系一起的。

自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美国用飞机和军舰把远在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54万人，运送到华北、华中、华南、东北的各重要地区。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有9万人进入中国，帮助国民党占领战略要地，驻华美军最多时达到11.3万人。美国为国民党政府装备部队45个师，训练各类军事人员15万名。美国还命令100多万日军和几十万伪军将武器装备交由国民党政府接收。美国政府给予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军事物资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就达13.3亿美元。1946年3月，美军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正式组成，总人数达2000人。该顾问团实际上成为美国直接参与策划和指挥中国内战的军事机构。国民党正是利用美国的“调停”，依靠美国的援助，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的。

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美国的“调停”能有助于中国向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共并没有把中国人民的命运单纯寄托在美国的“调停”上面，尤其是接受历史教训，没有对蒋介石将发动内战来消灭共产党的图谋，掉以轻心。中共中央在努力制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同时，积极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明确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在另外的一些指示中，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1937年以来在农村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以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自卫战争获得更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国民党自认为已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之后，便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首先是以22万人的兵力围攻鄂豫边的中原解放区。接着，以46万人进攻华东解放区（包括山东、苏皖两解放区）；以25万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26万人进攻晋察冀、晋绥解放区；以16万人准备再次进攻东北解放区；以15.5万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7.5万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的解放区。中原解放区部队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除留小部分兵力坚持当地斗争外，大部突围。其它各解放区都展开了英勇的自卫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1946年7月9日，经马歇尔推荐，杜鲁门任命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参加“调停”工作。他与马歇尔乘国民党表面上获得的巨大军事胜利，帮助国民党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制订了蒋记“宪法”，给国民党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时，压国共双方在军事上都作出让步，实现“和平”，以便最终建立起美国人希望的，由国民党主宰、中共和其它民主党派作附庸的“民主中国之形式”。蒋介石充分利用了美国的援助和压力，中共则坚决拒绝，于是，内战规模迅速扩大。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第二天返回美国。马歇尔在声明中虽然也对国民党内的“最有势力之反动集团”进行了指责，但把“调停”失败的

责任主要归于共产党，说“最近数月中，中共所追随之路线，显系彼等不愿促成公允之妥协”。中国共产党严厉驳斥了马歇尔的谎言。1月29日，美驻华使馆奉美国政府命令，宣布退出“三人会议”，撤回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2月3日，美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延安。美国的“调停”至此最后结束。

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企图用和平和政治的手段，建立国民党为主宰、中共和其它民主党派为附庸的政府，以把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加强其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抗衡力量。他们满以为中共和中国人民会接受这种安排。不料这种政策反被蒋介石集团所利用，把美国拖进了中国全面内战的泥坑。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说明政策制订者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无知。他们不了解蒋介石不同于中国其它军阀集团，具有特殊的能量和谋略，它需要美国的援助，但有时并不完全听从主子的摆布；他们更不了解中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成员，决不会拿人民的利益（解放区、军队等）去做交易，换取国民党政府的一官半职。

四、军事政治形势的根本转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是十分悬殊的。当时国民党处在力量的顶峰，军事力、经济力占着显然的优势。它的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运到内战前线的有160万人。由于对日本侵华军100万人的受降和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它的装备较抗战时期大为增强。正规军86个整编师中，有约1/4为美械、半美械装备。国统区的面积为7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为3.39亿，分别占全国总数的76%和71%，全国所有的大城市、主要交通线和几乎全部近代工业都控制在国民党之手。它又得到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全面援助。在共产党方面，它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为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共66万人。其装备，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少量火炮。解放区的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36亿，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人力物力资源远不如国统区。同国民党可以接受大量美援相反，解放区军民一切依靠自力更生。

在上述力量对比下，国民党反动派猖獗一时。蒋介石宣称，他拥有空军、海军、重武器、特种兵，只要“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狂妄地预言：“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就能整个消灭中共领导的军队。由于国民党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一些中间派人士很为共产党担心，甚至劝说共产党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国际上，美国是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后台，它已撕下“调处人”的伪装，全力支持国民党在战场上消灭共产党。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发展抱悲观态度。全面内战爆发后，苏联的报刊虽谴责“国民党内的某些反动将领”对中共发动战争，但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面，仍是谋求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与合作。

面对严峻的形势，如同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不同的是，这时共产党已完全成熟了，力量也更壮大了。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敌我力量对比的全部因素，特别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名称，在全面内战爆发时有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民主建国军、民主同盟军、华中民主联军等多种，从1946年10月正式称为人民解放军。

是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这个主要因素，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1946年8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美国手里的原子弹，固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实际上它也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武器”。“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预见了中国内战的前途，对在人民群众中克服恐战情绪，增强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高举“自卫战争”的旗帜，勇敢地投入了战斗。为了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制订了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要“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彻底孤立反动派和好战分子。在军事上，要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作战主要目标是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作战形式，一般地是运动战。要打歼灭战，每战力求全歼和速决。在经济上，要作长期打算，力戒浪费，努力生产，军民兼顾，自力更生，以求立于不败之地。

战争一开始，国民党军依仗暂时的优势，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其战略意图是：首先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 and 交通线，歼灭人民军队的主力，或将黄河以南的人民军队赶至黄河以北，聚而歼之。在战争前8个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余人，总计71万余人。国民党军虽然占领解放区城市105座，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每占一城都要留下兵力担任守备，实际上等于背起105个大包袱。

国民党军由于有生力量的被大量歼灭和兵力的更加分散，从1947年3月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实行所谓“钳形战术”，把进攻的重点置于陕北和山东。

在陕北，国民党投入兵力25万，首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陕北人民解放军只有2万多人，在顽强阻击敌人、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后，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之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不久，中央工委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暂驻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西北野战兵团（后改称西北野战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指挥下，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并制造机会不断给进犯之敌以有力打击。从3月下旬至8月，相继取得青化砭、蟠龙、沙家店等战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在山东，国民党军吸取以往分路进攻常被分割歼灭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由南向北平推。华东野战军采取高度机动回旋战术，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终于在5月中旬，抓住骄傲孤进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在蒙阴东南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该师及其它增援部队3.2万余人。至7月，华东野战军向鲁西、鲁南发展战果，直

逼津浦路，国民党军不得不将部分主力从鲁中西调，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基本被打退。

在陕北、山东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局部反攻；国统区的一些地方共产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当地的游击战争。

经过从 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6 月一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112 万人，其中正规军 78 万人。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战略进攻基本被停止，蒋介石“速战速决”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计划彻底破产。

同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相伴随，国统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形成配合人民军队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这是国民党独裁、内战、卖国和疯狂掠夺政策的直接产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沦陷区“接收”工作中的丑陋表演，就已使它丧尽了民心。国民党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官僚资本空前膨胀。久盼抗战胜利的沦陷区人民受到新的敲诈和掠夺。各路“接收”大员们大饱私囊，疯狂地抢掠金条、房产、汽车和各种财宝以至女人。人民群众得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结论。

在撕毁政协协议和发动全面内战之后，国民党一面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一面残酷地镇压民主势力，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1946 年 7 月中旬，国民党连续制造两起血案，两位英勇无畏的民主战士、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8 月，国民党特务又捣毁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闻追悼会，会后殴伤民盟中央主席张澜。

1946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下旬，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一党包办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一部规定总统拥有至高权力实即承认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中华民国宪法》。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占 85%，此外就是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由原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于 1946 年 8 月合并组成）参加了大会。中共指出这次会议是非法的，坚决予以抵制。民盟支持中共立场，并作出决议：鉴于民社党违背政协协议参加了“国大”，凡“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代表，也拒绝参加会议。通过这次“国大”及随后的所谓“政府改组”，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反动本性进一步暴露。

到 1947 年，国民党进一步采取措施，彻底关闭了谈判大门。2 月，它逼迫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和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并限令中共驻重庆、南京、上海人员于 3 月 5 日前全部撤退。这标志着国民党彻底断绝了国共之间维持 10 年之久的联系。民盟等中间势力曾为恢复国共谈判积极奔走，但终不能改变国民党把内战进行到底的决心。5 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 10 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指令有关当局，对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作有效之制裁”。6 月 25 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

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于 1946 年 11 月 4 日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一个全面出卖国家主权的条约，它披着“友好”、“平等”、“互惠”的伪装，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如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与中国商品同等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中美商约”签订前后，国民党政

府或地方当局还同美国政府或有关方面签订其它一系列卖国条约协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要交美国“当局”裁判，美军肇事须由美警宪处理，美国飞机可以在中国领空自由飞行，美国军队可长期驻留中国，美国可在中国建造海军基地，美国有对中国教育、海军、财政实行监督权等。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驻华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杀害中国民众、奸淫中国妇女的事件屡屡发生。美国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国统区成为美国独占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

国统区的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一方面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空前膨胀，全面垄断了国统区的金融、商业和工业。到1947年，官僚资本已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2/3和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另一方面是民族资本企业大量破产，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大城市，倒闭的工厂商店达2.7万余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至1946年底，已倒闭3160家。国统区工业、农业产量，1947年同1936年相比，均减少30%以上。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国民党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恶化。1947年的财政赤字近70%。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一面对各阶层人民加征赋税，实行竭泽而渔的剥削政策，一面增印钞票。1947年的法币发行额比1945年抗战结束时增加了25倍。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1947年7月的物价比抗战前夕上涨6万倍。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

李闻惨案发生后，在全国立即掀起了追悼死难者和抗议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斗争浪潮。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陪都李闻惨案后援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缉拿和严惩凶手及主使者，立即撤换并严处云南警备总司令，下令全国举行公祭，立即撤销国民党特务组织等。

1946年11月底到12月初，上海摊贩为反对国民党上海当局禁止黄浦、闸北两区摊贩营业并逮捕摊贩的行径，举行数千人的请愿游行，并包围黄浦区警察局。上海全市商店停业声援，形成一次全市性的争取生存权的斗争。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由此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30日，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和游行，要求严惩暴徒，公开道歉，驻华美军撤出中国。斗争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总计约有50万学生举行了罢课和示威。许多教授、文化界知名人士、工商界人士、市民、工人也纷纷表示支持或亲身投入学生的斗争。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人民为抗议国民党军警殴打、枪杀市民举行游行。当天又被国民党军队打死打伤数人。由此引发了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者攻占了台中、嘉义等许多市镇，最后被国民党血腥镇压下去。从3月8日大批国民党军在基隆登陆起，20多天中有3万多人被屠杀。这次武装起义显示了台湾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

志。

1947年5月，爆发了较抗暴斗争规模更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5月4日，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各校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3000人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门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由于未得满意回答，学生们决定5月20日举行大游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也派代表到南京请愿。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同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企图以此压服学生。但学生们并没有屈服，而是展开更英勇的斗争。5月19日，上海7个国立大专学校7000多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警宪，用水龙、皮鞭、棍棒喷射殴打学生，上百人受伤，20多人被捕，造成“五二血案”。同一天，北平7000余学生举行“华北学生北平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五二”后，学生运动由“反饥饿反内战”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扩展至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得到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上海文化界88人，大学教授76人，北平的大学教授100余人，分别联名发表意见，支持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发表言论，声讨反动派，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

不少地区的工人、农民、市民也投入到斗争中来。工人罢工，民变蜂起，抢米风潮到处发生。1947年，国统区有20几个大中城市发生约3000次工人罢工。这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5至6月，抢米风潮席卷40多个大小城市。

事情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指出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当战争进入第二年之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方面变化。至1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降为373万人，内正规军由200万人降为150万人。在兵力部署上，由于重兵深陷于陕北和山东战场，在南线的鲁西南、豫皖苏边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薄弱，形成了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式布局。部队士气急剧下降，官兵中充满着失败和厌战情绪。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已由127万人增至195万人，其中正规军由61万人增至近100万人，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除山东、陕北外，其它战场已转入局部反攻。部队士气愈加旺盛，对胜利充满信心。

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和兵力总数超过对方，就举行全国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这样做，一可以彻底打破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解放区人力、物力，使解放区不能持久的战略方针；二可以调动敌人回防空虚的后方，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三可以扩充自己的而缩小国民党军的人力物力资源；四可以更有力地支援国统区的第二条反蒋战线，掀起更为波澜壮阔的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从1947年7月至9月，相继

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鲁西强渡黄河，挺进鲁西南。随后发起鲁西南战役，近1个月时间歼敌6万余人，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刘邓大军以不要后方依托、跳跃前进的特殊进攻样式，向南疾进，跨越重重障碍，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至11月下旬，初步完成战略展开。接着，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集团挺进到豫陕鄂地区；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进入豫皖苏地区。他们与刘邓大军布成品字形，互为犄角，互相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区的围攻。到12月底，新开辟的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三块解放区连成一片。刘邓等率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内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逐渐转入反攻。晋察冀野战军从9月上旬至11月中旬先后发起大清河、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

上述人民解放军各战场的外线和内线攻势作战，组成了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总形势。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1947年7月至年底，经过半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75万余人，战争已主要转到国统区进行了。国民党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这是战争形势的根本转变。毛泽东1947年12月论述这一转变时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又歼灭国民党军77万人。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土地改革运动进入高潮。从1946年五四指示发布后，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已由减租减息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至1947年下半年，已有约2/3的地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但存在着解决不彻底的问题，另外1/3的地区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为了把土改运动向前推进一步，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该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但它所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的办法，容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所以后来作了改变。

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级党政机关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和帮助各地土改工作的进行。从1947年冬季起，各解放区的共产党组织结合土改，普遍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以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在土改和整党高潮中，一度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一些地区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侵犯中农利益，侵犯一般工商业。对地主和富农及地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和分子不加区别，以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扫地出门”，甚至乱打乱杀。整党中实行“搬石头”，打击基层党员干部。中共中

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坚决予以制止。经过半年时间，“左”的错误被纠正过来，党的政策全部走上了正轨。1948年4月，毛泽东根据20年共产党领导农民土地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经验，提出了一条完整的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它明确地规定了土地改革中的阶级路线、中心任务和最终目的，把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确的轨道。从土地法大纲公布到1948年秋，有约1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其结果是：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从根本上铲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热情，土改后立即出现生产、参军和支前的热潮，使人民解放战争有了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源泉。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在“勘乱总动员”的旗号下，进一步加紧对国统区人民的搜刮与镇压，由此也就推动更多的人们投入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1947年10月下旬，发生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非法逮捕惨死狱中的事件。在浙大校长竺可桢披露此事之后，全国10多个城市的10余万名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1948年4月初，北平的高校师生、研究院研究人员、医院医护人员等，为反对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迫害和争取合理待遇而举行罢课、罢教、罢研、罢诊、罢工、罢职的“六罢”斗争。上海、南京的学生也不断展开斗争。5月，南京全市大中學生联合举办纪念五四宣传周和“五二〇”周年纪念活动，并召开全市学生“反迫害大联防宣誓大会”。5、6月间，全国各阶层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运动。参加者有学生、教授、社会名流、工商业者。上海发起10万人反美扶日签名运动。北平437名大学教师、南京、上海370名教授和社会名流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恫吓中国人民的谈话提出抗议。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等百余人声明：“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气节，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

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构成的中间势力，在抗战胜利后十分活跃。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表明了他们的政治理想，这就是利用战后“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即把中国变成一个既不同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与共产党结成联盟，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积极促成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为保卫政协成果而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民主党派的一些人更明确地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或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路线”）的概念，竭力加以宣扬。他们主张“调和国共，不许国民党排斥共产党，也不许共产党排斥国民党”，要把国共两党从两个极端“拉回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在国际问题上，亦主张“采取中间路线”，“既不应亲美反苏，亦不应亲苏反美”，对二者要采取“同等亲善政策”。他们“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主张“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呼喊造成一个“第三大党运动”，来左右中国的政局。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对“中间路线”这样的主张与活动，也是不允许存在的。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被迫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发表公告，宣布民盟总部“即日解散”，“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其它民主党派也失去了公开活动的自由。这标志着中间路

线破产。

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的事实，使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成员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性，从而抛弃了对蒋介石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48年1月1日，国民党内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宣布“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反对美国反动派破坏中国民主与和平之帝国主义政策”、“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之代表组织联合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等主张。1月5日至19日，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发表紧急声明，否认南京政府宣布民盟“非法”这一“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通告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民盟活动。会议明确表示“要民主就非革命不可”，从而放弃中间立场，承认在同反人民反民主势力的斗争中“决不能有所谓中立的态度”，“独立的中间路线，……更难行通”。表示“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特别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

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各民主党派政治上新的进步。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书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就召开政协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的主张很快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李济深、何香凝、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名通电国内外，响应中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号召国人共策进行。他们同时致电毛泽东，认为“大计亟宜早定”。此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及海外侨胞又单独或联名发表宣言、声明、文告、文章，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形成一个宣传新政协运动。这是中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表现。

五、国民党统治走向崩溃

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尽管国民党军在数量和所占区域上，仍比人民解放军要多、要广，但战争的优势实际已不在国民党方面，而转到人民解放军方面。这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仍有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但这些部队大多是重建的，或经受过严重打击的，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它们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个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守备任务，可作战略机动的兵力已寥寥无几。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出现了严重危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上升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战场上的缴获使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大为改善。解放军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炮兵和工兵。不但有了丰富的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经过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工作、斗志）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部队的政治觉悟进一步

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23、124—125页。

见《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三中全会宣言》，同上书，第349—350、355—356页。

提高。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 235 万平方公里，人口 1.68 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空前高涨。

为挽回败局，1948 年 8 月上旬，国民党军统帅部召开“军事检讨会”。蒋介石提出要“振作军心，提高士气”。但如何“振作”和“提高”，束手无策。会议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对东北、西北和西南也作了相应的部署。会议强调要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同时组成若干精锐机动作战兵团，以使人民解放军对其战略要点和增援兵团“啃不烂”、“吃不掉”。会议还决定迅速编练第二线部队 150 万人。

在国民党重新部署兵力，企图“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时，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1948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在 8、9 两月攻克济南，然后于冬春夺取徐州，即攻克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9 月上旬，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9 月 8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建设 500 万人民军队，在从 1946 年 7 月起的 5 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

国共双方的部署表明，战争已进入固守与攻克大中城市战略据点的阶段。

从 1948 年 9 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上发起空前规模的秋季攻势。随后，秋季攻势发展为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

1948 年 9 月 16 日至 24 日，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以伤亡 2.6 万人的代价，取得歼敌 10 万余人（内 2 万人起义）、攻克济南的重大胜利。这次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它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坚固设防和 10 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2 日，东北野战军进行了辽沈战役。这是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当时东北战场是全国 5 大战场中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的一个战场。国民党军是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总兵力 55 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 3 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处境非常困难。东北 97% 以上的土地和 86% 以上的人口已获解放，土改已经完成，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总兵力为 70 万人，另有地方部队 33 万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军力和经济力上均已超过敌军。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首先突袭北宁路锦榆段，切断关内外敌军的联系，围攻锦州。10 月 15 日锦州解放，歼敌近 9 万人，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同时，从锦西、葫芦岛驰援锦州的国民党“东进兵团”被阻于塔山地区；从沈阳出援锦州的“西进兵团”被阻于彰武、新立屯一带。接着，长春国民党守军一部起义，其余投降，10 月 19 日长春和平解放。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南下“规复锦州”。东北野战军首先在黑山地区对廖兵团进行顽强阻击，然后将其分割包围。10 月 28 日，廖兵团 10 万余人全部被歼，廖耀湘被活捉。东北野战军乘胜前进，11 月 2 日解放沈阳、营口，辽沈战役结束。11 月 10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锦西、葫芦岛，12 日收复承德。东北全境和热河均获解放。辽沈战役历时 52 天，东北解放军伤亡 6.9 万人，歼灭国民党军 47.2 万人。经过这个战役的胜利，加上当时其它战场上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增加到 300 余万人，国民党军减到 290 余万人，在总兵力上，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超过了

国民党军。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据此预计，再有一年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11月初，国民党军统帅部决定将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及其它部队共约70万人（后增至80万人），分别置于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确保该段交通，拱卫京、沪，必要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抗击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华东野战军发起攻击后，11月8日，国民党徐州绥署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地下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让开解放军追击大道，11月11日，解放军把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战事。22日，黄伯韬兵团10万人全部被歼，黄伯韬被击毙。25日，中原野战军将奉命由豫南增援徐州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至12月15日，将该兵团10万人全部歼灭，黄维被俘。黄维兵团被围时，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放弃徐州，率三个兵团救援黄维，然后一同南撤。12月4日，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永城东北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孙元良兵团向西南方向突围，6日被歼，孙元良逃脱。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猛攻，至10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被全歼，邱被击毙，李潜逃，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66天，人民解放军伤亡13.4万人，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至此，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及华中重镇武汉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战役进行期间，支前的一二线民工达150余万人，运送粮食4.3亿斤，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进行了平津战役。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连同其它部队，总兵力为50余万人，驻守在东起北宁路山海关、西迄平绥路张家口的500余公里狭长地带。11月29日，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开始向张家口外围进攻，以切断该地国民党军西逃之路，并吸引傅作义抽调主力西援。至12月7日，平绥线上傅作义部主力已被解放军华北第二、三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于12月17日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割断平、津之间的联系。20日完成对天津的包围，割断天津与塘沽的联系。傅作义集团被分割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然后，人民解放军按照先取两头、后打中间的部署，逐次发起攻击。12月22日，全歼新保安之敌。24日解放张家口。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等地区的作战和接管工作。14日，解放军向拒绝和平解放的天津敌军发起总攻，15日全歼守敌13万余人，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17日，塘沽守敌乘舰南逃。傅作义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又经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耐心工作和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决定接受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的和平条款。21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31日，傅作义部从北平撤离完毕，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平津战役历时64天，解放军伤亡3.9万余人，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使华

北地区除归绥、太原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全部解放。

总计三大战役，共历时 142 天，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 154 万余人。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空前未有、世界战争史上也属罕见的伟大战略决战。连同 1948 年 7 月以后进行的其它战役战斗，解放军共歼敌 231 万余人。国民党军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动摇。

这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也陷入了总崩溃的境地。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1947 年为法币 29 万余亿元，占全年支出的 67.6%；1948 年为 900 万亿元，这年 6 月，赤字达到财政支出的 95%。巨额的财政赤字，只有靠大量发行纸币来补充。法币发行额，1947 年底为 33 万多亿元，已较抗战前增加 23500 多倍；至 1948 年 8 月为 660 多万亿元，较上年底又增加 20 倍。法币与美钞的比价，1948 年 1 月为 17.8 万比 1，8 月贬至 1108.8 万比 1。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急速上升。上海市每担白米售价，1948 年 1 月为法币 150 万元，8 月涨至 6500 万元；每袋面粉，1948 年 1 月为 20 万元，8 月涨至 2000 万元。上海批发物价，1 至 8 月上涨 50 至 100 倍。法币的价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

为扭转上述局面，国民党政府于 1948 年 8 月 19 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元券作为本位币，发行总额 20 亿元，限期以 300 万比 1 和 30 万比 1 的比价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金、银、外币，逾期不兑一律没收；各地各种物品和劳务价格，均冻结在 8 月 19 日的水准上，依照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是对各阶层人民的又一次大洗劫，大量的黄金、白银、美钞，被政府强制收兑而去。但在生产下降、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暴力劫持工商业者所造成的“平价”局面，是维持不住的。在抢购风潮之下，限价政策很快破产和被废除，跟着就是金元券的大幅度的贬值、发行限额的废除和物价的更加狂涨。金元券发行额，1948 年 8 月为 5 亿多元，1949 年 4 月增至 51612 亿元，8 个月增发 1 万多倍，超出原限额 2580 倍。它的价值几近废纸。物价指数，如以 1948 年 8 月为准，至 1949 年 4 月上涨 83800 多倍。经济的崩溃，预示着国民党政权即将走向灭亡。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进一步加剧，美蒋关系发生不利于蒋介石的变化。还在 1947 年 7 月，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无能”，深为不满，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不受人民欢迎并压迫人民的政府”，但又认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所以，他仍建议美国必须继续并扩大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同时促使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并由美国顾问监督美援计划的执行。至 1948 年 6 月，美国从日本投降后援助国民党政府的贷款、物资、服务等项的总值已达 43.4 亿元。魏德迈“调查”结束时，暗示蒋介石应该下台。接着，司徒雷登在答复美国国务院征询时，进一步表达了要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的意向。1948 年 3 月底至 5 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各派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由于蒋介石的势力仍无人可以压倒，他“当选”为总统。蒋进一步企图控制副总统的选举，捧出孙科，压制李宗仁。但经过近 1 个月的激烈竞争，已受到美国青睐的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1948 年下半年，美国迫使蒋介石下台、支持李宗仁上台的计划加紧进行。司徒雷登甚至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由美国劝告蒋“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

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的建议，马歇尔为避免担起“必须支持这个继承的政权”的责任，没有采纳司徒雷登的建议。11月9日，蒋介石致函杜鲁门，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同时发表一份支持蒋政权的“坚定的声明”。杜鲁门婉言拒绝了蒋的要求。月底，宋美龄赴美求援，亦无收获。这时，桂系抢先打出“和谈”的旗号，并逼蒋下野。

在大厦将倾而又受到美国和桂系逼迫的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出一个表示要“和谈”和“引退”的《新年文告》，声称他愿意同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国民党的“宪法”、“国体”、“法统”、“军队”等为条件。如果和平实现，他“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中国共产党严厉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个意在保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和谈”建议，并提出自己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给蒋介石一个致命的打击。1月21日，蒋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后，采取步骤，准备与共产党进行和谈。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同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但李宗仁并无军政实权，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指挥着政府、军队和特务系统。蒋的意图是借李宗仁和谈争取时间，以便重新编练军队，与共产党再战。他对李宗仁和桂系采取孤立与分化的策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要求和谈，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却密令军队与中共“誓不两立”，进行“长期战争”。接着，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反对和谈。行政院长孙科自行“迁政府于广州”，立法院中的CC系分子也步其后尘。李宗仁坚持举行和谈。2月底，他动员孙科返回南京。3月，以何应钦代替孙科任行政院长，组成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加刘斐）参加的和谈代表团，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李宗仁确定的与中共和谈的原则是：平等谈判，不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不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建议立即停火，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之间划出临时分界线；在两政府共存条件下讨论八条。其核心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3月26日，中共中央派定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后加派聂荣臻），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和谈从4月1日在北平开始，至15日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对战犯问题、国民党军政人员问题，均作了宽大处理。对其它问题也做了适当的解决。中共方面宣布以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李宗仁在请示蒋介石并经国民党中央商讨之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集结于长江下游北岸的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由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

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2至4月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分别改称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华北3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长江防线顷刻瓦解。22日，国民党江防部队仓皇撤退，南京国民党大员纷纷外逃。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把红旗插到蒋介石的总统府。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亡。

六、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各项问题。

会议根据解放战争进展的情况认为，今后对国民党尚存的100多万军队，可采用战斗的、和平的和留待改编等三种方式加以解决，而战斗方式，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指出以乡村为重点、先乡村后城市、用乡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决不可以丢掉乡村，城乡应该兼顾，但“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工作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其它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全会着重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指出：经济的严重落后，现代性工业和农业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10%和90%这一事实，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现代性工业虽然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但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会议还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制订了对待它们的政策，并从而明确了新中国的经济主要由五种成份所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全会还讨论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两种基本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和社会发展方向，强调共产党执政后必须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为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作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准备。3月25日，中共中央迁入北平。

国民党南京政权被推翻后，人民解放军继续进军，先后解放太原、杭州、上海、南昌、武汉、西安、青岛、福州、兰州、长沙、西宁、银川、绥远、新疆。国民党湖南绥署主任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国民党绥远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通电起义。

在国民党残存势力眼看被全数歼灭之时，蒋介石重新从幕后走向前台。逃亡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6月初改组，由阎锡山出任院长。7月，蒋介石到广州，国民党中常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决定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以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此后，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又先后迁至重庆、成都，12月迁到台湾。李宗仁托病出国就医，

飞往美国。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同时，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在积极进行。

从1948年8月起，在香港和一些大城市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中共的邀请，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筹建国大计。1949年1月22日，进入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他们表示：在召开新政协、加速推翻南京卖国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他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务使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这是一个庄严的声明，它表明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国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在经过长期奋斗、选择之后，正式告别旧民主主义道路，而踏入新民主主义阵营。与此同时，全国工会、青年、妇女和各种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召开新政协作了重要的准备。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等文件，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加紧进行各项具体筹备工作。

为了给新中国筹建工作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论述过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和政权制度，指出新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具体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会议，“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搞“三权鼎立”。

新政协筹备期间，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以回答反对派在对华政策上的责难。该书首次披露了1844—1949年，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若干文献，说明了美国援蒋的事实和遭到失败的经过，并表示了将继续与新中国为敌的立场。

中共中央发起了对白皮书的讨论和批判运动。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多篇评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学校、报社、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发表许多声明、谈话和文章。讨论涉及多方面问题，包括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百年来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中国人民如何对付帝国主义的新阴谋等。在这许多重大问题上展开这样广泛的讨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它是对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一次大清算，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思想上的重要表现。它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建立扫除了不少思想障碍。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召开。会议代表共662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

民主同盟等各党派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爱国华侨代表，宗教界代表以及特邀代表。代表的广泛性，使会议具有了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 1/4 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月30日，选出了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还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称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纲领文件，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政权机关及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之后，就明确地把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奋斗目标。共同纲领的制定，表明这一奋斗目标变成了伟大现实。

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委员会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这一天，首都 30 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数千年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侵略，22 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一起被中国人民扫进了坟墓。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而且沉重地打击了世界殖民体系，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必须同本国社会和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变成改造现实的伟大力量。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经由新民主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四编 新中国的历程

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一、大陆的统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无限光明的美好前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考验。

在国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得到苏联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欢迎和支持，也得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到 1950 年 10 月，已有 25 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其中有 17 个国家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环绕着当时新中国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复杂的、严峻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形成了美苏两国互相对峙、进行冷战的局面。美帝国主义凭借它在战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遏制”共产主义的烟幕掩盖下，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组织军事集团，进行扩张渗透，妄图独霸全球。在中国，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已彻底失败之后，仍不肯放弃侵略中国的立场，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在军事上实行包围，还积极支持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对大陆进行捣乱和破坏，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在国内，前进的道路上也有很多困难。首先是全国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国民党反动派还有 100 多万军队盘踞在西南、华南地区和沿海岛屿，妄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负隅顽抗，卷土重来。在新解放地区，还有国民党溃逃时遗留下来的大批政治土匪和特务等反革命残余势力，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疯狂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危害着社会治安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在农村，约占全国农业人口 2/3 地区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地主封建势力还没有打倒。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困难极为严重。新中国成立时，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十分落后的经济，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更是一个千疮百孔、濒临崩溃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交通运输陷于半瘫痪状态。1949 年还遭受严重水灾，有大量灾民和城市失业者需要救济。同时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给正常的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家财政更是困难重重。

以上情况表明，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虽已经基本结束，但同三大敌人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因此，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面对建国初期的复杂形势和种种困难，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总结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口号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指导方针。会议指出，要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

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这次会议，为国家当时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完成全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全面进行民主改革和恢复经济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继续向尚未解放的华南、西南进军。由于敌军崩溃之势已成，我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以雷霆万钧之势，勇猛追歼残敌，相继取得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阳)宝(庆)战役、广西战役的胜利，和歼灭胡宗南集团、宋希濂集团的贵阳战役、重庆战役及成都战役的胜利。在吸取进攻金门岛失利教训的基础上，1950年4月又取得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胜利。在席卷全国大陆的军事胜利的形势下，还相继用和平方式解放了云南、四川、西康的广大地区以及新疆等地。到1950年6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30万人，完成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负隅顽抗的幻想。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继续解放西藏和台湾，但是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破坏和阻扰。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地区后，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勾结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进行种种挑拨和分裂活动。当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时，西藏地方政府少数反动分子，在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挑唆和支持下，搞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企图使西藏脱离祖国大家庭，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并坚持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一面积极争取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一面严正驳斥和谴责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时，坚决打击阻挠和平解放的西藏反动势力，于10月进行了昌都战役，解放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也促进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迅速分化。经过复杂斗争，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5月23日，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完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从而也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

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溃逃的时候，将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作为其最后挣扎的基地。蒋介石在1949年1月“下野”前后，就对台湾苦心经营、预留退路。1949年1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迁往台北。1950年3月，蒋介石正式宣布复行“总统”职权，提出“反共复国”的口号，企图在军事上巩固台湾基地，进而伺机“光复大陆”。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在大陆失败后，仍企图割裂和控制台湾，作为其包围、封锁新中国一个重要的环节。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时候，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利用朝鲜爆发内战为借口，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自此，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武装的支持下长期盘踞台湾，破坏中国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追歼残敌的同时，还先后抽调150余万人，对国民党溃逃时潜留下来的大量土匪特务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同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协助地方进行减租反霸、建立民主政权，使剿匪工作迅速取得很大胜利。到1952年底，共歼灭国民党匪特武装240余万人，在大陆

上基本平息了匪患。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各地的政权机构，相继建立起各级地方人民政权机关。在新解放地区，首先实行军事管制，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军事管制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接管一切公共机关和官僚资本企业，恢复生产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在建国初期，由于各种条件尚不具备，故先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过渡。从1949—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有关大行政区、省、市、县、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原则。各地相继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权，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在建设各级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实行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少数民族人口据1953年普查统计共350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他们分布的地区很广，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0%。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步汇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中共根据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一贯立场，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区和自治机关，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有权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事业。到1952年6月，全国建立了各级民族自治机关130个。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政策的贯彻。

全国大陆的统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地（除台湾等岛屿外）各民族人民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个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也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最基层有效地行使权力的政权。中国人民有了这样的政权，就获得了改造旧中国、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条件和强大武器。

在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同时，政府还采取相应的措施，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建立起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经济基础。

二、抗美援朝战争和民主改革的基本完成

正当我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斗争的时候，新中国又面临着新的外部侵略的威胁。

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因为统一问题爆发了大规模内战。27日，美帝国主义公开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插足中国领土台湾。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任命美国驻远东军队的总司令道格拉斯·麦

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企图利用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扑灭朝鲜革命力量，其侵略的矛头也是指向新中国的。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中朝两国一水相隔，唇齿相依。中国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为了进行必要的准备，7月13日，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当战局进一步恶化后，9月30日，周恩来又严正警告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转告美国：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如果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美帝国主义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警告，10月初，其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朝鲜进犯，并疯狂地向朝中边境推进，同时频繁地出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公然将战火烧向我国。

当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历史关头，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敢不敢同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进行一场武装的较量，这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既充分地估计面临的困难，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同时为了把战争尽可能地局限在朝鲜境内，不给美帝国主义以扩大战争的借口，会议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赴朝参战。作战的直接目的，是迫使美国停止侵略，通过谈判以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令出动，赴朝作战。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助战，但是临时改变了。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19日黄昏，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长驱直入的敌人仓促遭遇，利用敌人判断错误、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捕捉战机，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初战告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美国侵略军继续以更大规模向北进犯，发动所谓“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英勇作战，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迫使敌军从总攻击变成总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以后又相继进行了互有进退攻守的三次大的战役。到1951年6月10日止，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经过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的力量对比基本上趋于平衡，战争形成相持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从1951年7月开始双方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

义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企图在谈判桌上获得它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妄图以所谓的“军事压力”迫使我国在谈判中屈服。因此停战谈判形成了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过程，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歼敌72万多人。到1953年夏，各方面形势的发展日益对美国不利，迫使美国不得不于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在抗击侵略者的同时，继续稳定金融物价，继续进行经济的恢复与建设。并在全中国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消除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虽然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国内生产建设的步子，但战争激发起来的群众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是以劣势装备打败了高度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敌人。这个胜利，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保卫了中国的安全，维护了远东和世界和平，而且揭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侵犯新中国的尝试，为我国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事业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首要条件。从1950年到1953年春，国家在新解放区农村领导农民完成了这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为了搞好这次改革，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中共根据建国后的新情况，总结战争年代多次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起草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有关土地改革的法令和文件，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文献。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土地改革首先在条件已基本具备的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约1.2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大规模进行；1951年冬到1952年春，在华南、西南约1.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1952年冬到1953年春，主要在一些少数民族约2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为了不误农时，土改一般都在每年冬春之交的农闲期间进行，前后持续了3年左右时间，分期分批地完成。

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已基本结束，统一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条件下去进行的。这时，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各项工作都应当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服务。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由于形势和任务的这种变化，虽然这次土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同解放前基本相同，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但在具体政策和作法上却有新的变化和特点。

在政策上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对富农经济由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即保留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予征收；对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也保留不动，只对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与此相适应，对

地主也采取了比较宽大的政策，限制了对其财产的没收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则提高了其保留土地数量的标准。实行这些改变，有利于中立富农，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运动的阻力，还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这一切，都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作法上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土地改革必须“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进行，把放手发动群众同严格执行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导农民正确区分“敌、我、友”，结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并学会运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同地主阶级作斗争，防止乱打乱杀现象发生，适时提出必须防止重犯过去某些“左”的错误。还在城乡各界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并吸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去农村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争取他们支持土地改革。这些措施都是恰当的，使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次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得比较顺利，成为历次土地改革中搞得最好的一次。

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它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打倒了地主阶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镇压反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

国民党反动派在统治中国期间，建立了各种庞大的政治军事的反动组织，培植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当他们逃窜台湾的时候，在大陆上还遗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包括溃散武装（政治土匪）20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多万，各种特务分子60多万。他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以为梦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他们破坏工厂矿山，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以至组织骚乱暴动，残杀暗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坚决打击反革命活动，并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到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到1951年10月，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基本结束。以后转入复查扫尾和对党政军机关内部的清查等工作，1953年全部结束。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给当时公开暴露的、也是对群众危害最大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我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甚至在旧中国历代政府也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都被基本上肃清，使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

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同进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相配合，党和人民政府还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民主改革。

首先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逐步开展民主改革。

建国初期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工矿企业，虽然就其所有制而言，已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但由于接收这些企业时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政策，因而仍然在企业中保留了较多的旧的官僚管理机构和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还较普遍地存在着封建把头制、包工制以及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等，还隐藏着一批反革命残余势力，继续骑在工人头上，压制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1年11月开始在全国国营厂矿交通企业中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在运动中，有领导、有组织地放手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揭露和控诉各种封建压迫制度及封建把头的罪恶，彻底废除腐朽的官僚机构及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及封建残余势力，把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并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名符其实的主人。在完成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的同时，私营企业也在“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民主改革。

其次，废除封建的婚姻制度，彻底解放妇女。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我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也是我国民主革命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婚姻法公布后，党和政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并多次组织检查婚姻法的贯彻执行情况，使新的婚姻制度在我国社会中初步建立起来，使广大妇女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

最后，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及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由于与反恶霸斗争有密切联系，当时也都带有民主改革的性质。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定。当晚，即出动大批干部和民警封闭全市所有妓院，将妓院老板200余人全部集中审查处理，将1000几百名妓女集中在教养院进行学习，启发她们的思想觉悟，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和老板对她们的虐待及种种折磨，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技艺。经过学习教育，她们的绝大部分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择偶成家，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等全国大中小城市都采取同样的方法封闭妓院，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这个在旧社会绵延三千年的丑恶现象顿时绝迹。

对吸毒、赌博等同旧中国黑社会势力密切联系并得到反动统治阶级保护的社会遗毒，党和政府也采取类似的方法严加禁止。一方面严厉打击、制裁藉以谋利的制毒、贩毒者和赌头、赌棍；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自觉地戒毒、戒赌。经过二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遗毒，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竟被禁绝，从而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

土地制度改革和其它各项民主改革的胜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比较彻底

地完成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反封建斗争的任务。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都起了极大的变化。这些胜利，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更加巩固，也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有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当然，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对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的遗毒和影响的艰巨性认识不够，仍然存在着不足。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

旧中国经济本来极其落后，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3年多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战争更使它遭到严重的破坏。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仅3243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万吨，减少约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这种情况使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紧迫。

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国营经济，构成了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官僚资本是指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经营的官办企业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他们接管的原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中国的企业，以及由国民党四大家族、大官僚分子直接举办的企业。对官僚资本的接收，采取了和对待国民党政权机关完全不同的办法，即不是打碎它的机构，而是“原封不动”，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由军管会把它完整地接收下来，先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样，使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企业设备被破坏的现象。到1950年初，全国除台湾外，大陆上的官僚资本企业均已由人民政府相继接管。合计共有工矿企业2800多家，金融企业2400多家。

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双重的革命性质：一方面，它是封建的买办资本，没收官僚资本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官僚资本是中国的垄断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的2/3，没收官僚资本就消灭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接管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加上从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公营经济，就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体系。由于我国现代工业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资本手中，没收和接管这些资本而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也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1949年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占40%，其中煤产量占68%，电力占58%，生铁占92%，钢占97%，棉纱约50%。还控制了全部铁路和大部分现代交通运输业，控制了绝大部分银行业务和国内外贸易。这就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建国初期，恢复经济的一个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是必须改变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既成局面，制止投机资本利用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继续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迅速稳定

市场和物价。为此，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了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首先在市场上与投机资本作斗争。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后，各地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银元投机猖獗的情况，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明令严禁金银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对非法的金融投机活动，严加取缔，并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投机资本家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继续兴风作浪，扰乱金融市场。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支持下，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破坏金融的投机商238人逮捕法办。武汉、广州也同时取缔了地下钱庄，逮捕了投机首要分子，沉重打击了金融投机资本的非法活动。这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银元之战”。但是，投机资本家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大肆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为此，又进行了一次“米棉之战”。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等重要物资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当11月25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投机资本家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自此，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打击投机资本取得胜利后，物价出现了暂时稳定，但并不巩固。因为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财政收支不平衡，钞票发行过多。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就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为此，必须改变在建国前为适应当时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况而采取的各革命根据地“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管理办法，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形势的需要。1950年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陈云主持下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详细研究了全国财政、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统一财政经济的办法。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集中地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这个决定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管理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立即在全国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同时，政府还采取核实和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均收到明显的效果，使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支出相对减少。自3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物价也更趋于稳定，并稍有回落。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政工作的实现，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连续12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入不平衡的局面。这个胜利，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国营经济基本上确立了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并初步建立起全国计划管理体制的雏形，成为我国经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转上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轨道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切表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国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人民政权也巩固了。

全国财经工作统一和物价稳定以后，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于是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

转的号召。

首先是大力恢复农业生产。这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降低农业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收购政策，保证农民的合理收益；发放大批农业贷款，帮助贫苦农民克服生产中的困难；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推广良种和改良农具；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实行丰产奖励。并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解决贫苦农民在生产中独力无法克服的资金、耕畜、农具不足等种种困难。到1952年底，全国参加各种形式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民已达454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9.9%，不仅对提高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引导农民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与此同时，国家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大笔资金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对一些灾害严重的河流如淮河等，开始进行全面的治理。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了恢复生产，国家在顺利完成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接管后，立即在广大工人的支持下，迅速修复被破坏的机器设备，复工复产。同时逐步开展企业内部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改进对企业的生产管理。还整顿旧的工资制度，逐步推行劳动保险制度，改善职工的生活，提高工人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生产积极性，普遍开展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运动，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同1949年相比，1952年国营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61%，大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国家还尽一切可能集中财力、物力，开始进行一些最急需的建设，主要是铁路交通和煤炭、电力、钢铁等能源基础工业的建设。铁路交通建设方面，3年内国家共投资17.7亿元。除修复、改善原有铁路外，还根据开发内地资源的需要，新建了来睦（广西的来宾到睦南关）、成渝（四川的成都到重庆）和天兰（甘肃的天水到兰州）三条铁路共1263公里。到1952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共24518公里，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约10%左右。3年内，还新修公路3846公里，其中包括工程艰巨、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公路从康定到昌都一段，于1952年11月建成正式通车。能源、基础工业建设方面，3年内共投资26.7亿元，除主要用于恢复和改造原有企业外，还新建企业3300多个。这些改建、扩建和新建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东北地区，这不仅因为东北地区解放较早，恢复建设开始早，还因为东北地区原有的重工业基础较好，又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连同原有企业，到1952年底，全国共有国营工业企业9500多个，职工510万人，国营工业总产值3年间增长287%，平均每年递增57%，大大地增强了国营经济的实力，成为经济恢复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还认真贯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政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1950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8%，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85%，在我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于增加社会生产，实现商品流通，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建国初期，在打击投机资本的同时，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私营工商业，仍然通过发放贷款、供给原料、委托加工、收购产品等各种方式加以扶植，

帮助它们克服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使私营工商业在短期内得到了恢复。特别是当 1950 年 3 月全国物价稳定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坚持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利用和限制的方针，纠正党内少数人企图趁此一举解决掉资本主义经济的“左”的思想倾向，决定采取措施，合理调整工商业。七届三中全会并把这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

合理调整工商业的主要内容，就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三个方面，其中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统筹兼顾方针，对私营工商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应、销售市场、劳动条件、价格和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作必要的照顾，并且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把它们的生产与销售大体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它们从停工歇业的困难中摆脱出来，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服务，并获得正当的利润。到 1951 年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了 48.2%，私营商业商品零售额比 1950 年增长 36.6%。

调整工商业是对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进一步改组和改造，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使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当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等消极面也充分暴露出来，许多工商业主都采取行贿、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毒”）等种种不法手段牟取暴利，从而加剧了它同政府、国营经济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矛盾。这就导致 1952 年上半年在工商界开展了一场“五反”运动，同在党政机关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同时进行。这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一场大规模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通过斗争，引导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和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继续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而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五反”运动后，政府针对在运动期间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扩大加工订货，收购产品，更广泛地开展城乡物资交流，调动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有所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方针，并鼓励其向合作经济发展。从 1949—1952 年，个体手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 年个体手工业产值为 1949 年的 219.5%，增长了一倍多。

再次，恢复和发展国内外贸易，促进城乡物资交流。1950 年国营商业只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 14.9%。为了使国营商业承担起组织全国商品流通，调剂社会供求和稳定市场物价的艰巨任务，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建立起领导和管理全国贸易事业的行政领导机构，组建各种专业贸易公司，扩展商品服务网点。经过几年的努力，到 1952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全国共有 28 个专业公司，33282 个国营商店。与此同时，还在全国城乡大力发展合作社商业作为国营商业发展城乡贸易、联系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重要助手。到 1952 年

底，全国共有基层供销合作社 35096 个，对活跃城乡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恢复国内贸易的同时，也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人民政府在没收和改造原官僚资本进出口贸易企业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的国营对外贸易体系，积极发展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贸易，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1952 年，进出口总额达 64.6 亿元，比 1950 年增长 55%。3 年间，进出口贸易保持了基本平衡，改变了旧中国大量入超的状况。

经过 3 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 年，工农业总产值 810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 20%，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145.1%，农业总产值增长 53.5%，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1952 年同 1949 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 800 万增加到 1600 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 70%，还先后在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1949 年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占 34.7%，1952 年上升为 56%。

在建国以来短短 3 年多时间里，国家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领导全国人民一方面扫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所遗留的任务，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另一方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开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全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心振奋，一片朝气蓬勃的新气象。这个胜利，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宪法的制定

1953 年，当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

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共自 1921 年建立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和最高纲领。但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了在中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新民主主义也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

本来，对于什么时候采取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多数领导人曾经有过很多论述。大体的设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比如 15 年或 20 年，以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等到经济和文化都大为兴盛以后，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但是在恢复时期结束的时候，这种

设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是等一二十年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采取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并批评了刘少奇等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颇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意见。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与我国建国后几年来政治、经济形势和阶级斗争新发展的状况有很大关系。

（一）几年来各项政治运动的胜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这时，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发展，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保证。同时，由于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我国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也有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必要。

（二）由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代表着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受到群众的欢迎和信任，特别是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热情拥护，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到1952年，国营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4.7%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23%增加到60%，使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强大因素，并日益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为稳定极端混乱的物价、金融和财政而采取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高度统一，很自然地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由于计划经济的实行，不仅对国营经济，而且对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也必须加强领导和管理，以克服其盲目状态，这就不能不成为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同时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消极腐朽的一面，加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较为简便的选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种矛盾和斗争，在经济恢复时期就连绵不断。特别当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市场空前繁荣，资本家就乘机抢购、套购粮食、日用品和工业原料等重要物资，拒绝加工订货，盲目发展自产自销，干扰甚至破坏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因此，国家只能在利用和限制的同时，逐步地将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最后改变其所有制，以根本解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四）1952年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虽然互助合作有所发展，然而也出现雇工剥削等情况。为避免新的阶级分化，于是“趁热打铁”，加快推行互助合作运动。三大改造首先从农业合作化开始，这也不是偶然的。再加上手工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对私人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经验，因而改变了原来的设想。

（五）从国际环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和鲜明对比。在两大阵营中，中国人民只能从旧中国身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记忆中和新中国继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和敌视中来认识资本主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同情和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榜样作用。这样的世界格局，也是促使中国人民明确作出社会主义选择的一个因素。

正是在以上国内外的新形势和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重要思想，在中央一些同志之间谈论过。后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单地说就是“一化三改”。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它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是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路线。

现代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说：“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我国的现代工业，即使1952年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仍然是一个极端落后的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并不发达的苏联、东欧国家。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不能不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

另一方面，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代替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用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为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前提条件。如果不实行这种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就不仅不能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且会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生种种矛盾，国民经济不能协调发展，从而使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也无法达到。如果把社会主义工业化比喻为一只飞鸟的主体的话，那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它的两翼，只有主体和两翼相协调，才能振翅高飞。

过渡时期总路线还指出，要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考虑到，我国原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改造亿万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实现。根据当时的认识，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时间。加上3年恢复时期，共18年。虽然如此，这同原先所设想的先进行15年或20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一步实行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显然不同，分两步走变成了一步完成，超越了发展阶段。而且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行时，又大大缩短了时限。

从以上可以看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亦表现了当时领导人思想的局限。这里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对于像在中国这

样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大艰巨性和长期性仍然认识不足；二是把马克思当年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当成自己追求的目标模式，对社会主义改造有过分求纯的倾向。宣传提纲还强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由于这些认识的局限，对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

响。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中共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纲领和旗帜。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法制的建设，以充分发扬人民民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已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195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并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肯定了中共领导的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贯彻在宪法中有两条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这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宪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根本的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它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二）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步骤。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并对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定了具体的政策。

（三）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时规定，公民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遵照法律纳税和服兵役等义务。

（四）规定了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基本政策。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应友爱互助，加强团结，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民族自治机关享有比一般地方国家机关更广泛的自治权力。

大会在通过宪法以后，又通过了几个重要的法律。

大会最后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和决定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选举

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等 13 人为副委员长；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重大发展，是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一次空前盛会。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和各项法律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但它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仍要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1954 年 12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其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人民并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国内外重大事项及重要人事安排进行协商，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等 15 人为副主席。这样，在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同时，也坚持和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这期间，中共在党内进行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

五、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实现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基本任务。

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于消灭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农业生产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小农经济是分散的、落后的，它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上我国地少人多，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很难根本改变我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也不能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真正摆脱贫困并避免新的两极分化，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只有引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1 年 9 月，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 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1953 年 2 月，经作个别修改后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为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贫困农民增加生产，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并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决议要求在全国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互助组（包括临时的和常年的），在群众有较丰富的互助经验并有比较坚强领导骨干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强调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工作中，既要反对消极放任自流的右的倾向，也要反对强迫命令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10月至11月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指出：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决议继续强调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靠简单号召的办法来实现，也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更不能用剥夺农民的手段，而必须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并且指出，应继续切实照顾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发挥他们的生产潜力，任何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的行为都是错误的。

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从1952年到1955年上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很大发展。据1954年底统计，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468万个增加到993万个，初级合作社由300多个增加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由2100万户增加到70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例由19.2%增加到60.3%。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67万个，经过整顿，初步巩固65万个社。

当农业合作化运动日益发展的时候，1955年夏，中共党内因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意见不一致而发生了一场争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原规划是15年左右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个决议也规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直到1955年春、夏间，中央对于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意见一直是一致的。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计划，要求农业合作社从现有65万个到1956年春耕时发展到100万个，并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但6月下旬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京后，对农村形势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方针作出了新的判断，主张修改计划，加快发展，从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即翻一番。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他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干部领导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不同，需要逐步提高，分批发展；从1954年春的11万个社到1955年春的65万个社，发展过快，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的任务很重，应着重巩固现有的合作社。后来的实践表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毛泽东却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思想右了，是对合作化不积极。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但是领导却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他强调：包括贫农和下中农在内的全国大多数农民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报告还指责邓子恢等“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

是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党的领导能力。甚至说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这样，就把党内在工作中正常的争论，夸大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使党内民主生活出现不正常现象。

会后，毛泽东的报告一直传达到农村党支部，各地党组织都纷纷反对“右倾”，检查“保守”思想，对合作化运动重新作出部署，农业合作社迅猛发展。在这种形势下，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确认了毛泽东对邓子恢及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并把他们的“错误”性质进一步提高为“右倾机会主义”，强调“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之写了序言和一批按语。这些序言和按语继续强调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并且认为不仅在农业合作化工作中，而且在其它许多方面工作中，也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也必须开展“不断地批判”。这就使反“右倾”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1955年夏季以后，在全国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气氛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形成一个超高速发展的狂潮。由于把坚持稳步前进方针的人指责为“小脚女人”，右倾保守，犯了路线错误等等，在党内形成了一种人人怕犯右倾错误的“恐右”心理，使宁“左”勿右、“左”比右好、急躁冒进的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加速合作化的群众运动的潮流，像大海的怒涛，呼啸而来，席卷了整个中国的大地，合作化就急骤地完成了。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11782.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这就是说，原计划15年实现的农业合作化，仅仅7年时间，就超前完成了。

由于思想上急于求成，发展过急过猛，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原来规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原则、方法，如说服教育、自愿两利、典型示范、逐步过渡等等，都被置之脑后。事实上，80%以上的农民是在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内加入初级社并随即转入高级社的。这显然是超越农民的觉悟水平，违背了自愿的原则。同时对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作价偿还，也没有认真执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农民的基本原则，这是很深刻的教训。

在匆忙实现高级合作化的时候，由于对怎样办高级社的经验十分缺乏，所以在很多方面照搬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形式过于简单划一，造成了很多问题。在所有制方面，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一律归集体所有，基本上消灭了个体经济；在管理体制方面，统统实行集中生产，统一经营的经济模式，忽视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家庭经营的重要作用，造成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办社规模上，由初级社转高级社时，也实行小社并大社，社的规模由高潮前平均26户的初级社，合并为平均近200户的高级社，社的规模过大，干部管理能力跟不上。加上当时对商品经济缺乏正确认识，不允许合作社以及社员经商，把农村合作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这一切，对于我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都带来很大消极影响。对于农业合作社的这些弊端，在1956年下半年已开始有所认识，在1956年和195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发出一系列指示，对高级社进行整顿。但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发动，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使这些问题不仅未能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在长期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也很少进展，生产工具很少改变。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并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后期由于对形势的估计错误，因而要求过急，造成运动发展过猛，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等偏差，这是工作指导上的失误。然而这个规模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功绩仍是不可磨灭的。它在一个有 5 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村个体经济转到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困难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手工业的合作化，在总路线提出以后，原来也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农业合作化高潮起来后，也影响了手工业的合作化速度，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采取手工业全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 1956 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 91.7%，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

1953 年，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从利用、限制到改造的方针，即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改造，最后完成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

为了加快公私合营的发展，1954 年 1 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作计划会议，通过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7 月，又制定《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对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公私双方的权利和职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盈余的分配等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使对公私合营的政策原则以法律的形式更加明确和完备起来，促进了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的积极性，加快了改造的步伐。

1954 年和 1955 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 1953 年的 1036 户，增加到 1954 年的 3193 户。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了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这种情况促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形成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形势。

195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集中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决定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推进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同时实行定息制度，并组织专业公司，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和必要的企业改组。会议要求全面规划，在两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1955 年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巨大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也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1956 年 1 月 10 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 1 月底，全国 50 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实行了全市性的全行业公私全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99%，私营商业户数的 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私营企业的财产进行清理估价，核定资产。核定结果，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资金共 24.2 亿元。又决定按私股股额，不分工商、大小、盈亏及地区行业一律按年息 5 厘，逐年发给股息。定息原定 7 年，后延长 3 年，到 1966 年 9 月取

消。同时，对私方从业人员，按照“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全部安排了工作，资方人员原有的高薪不动。一部分代表人物在政府机关或经济业务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随后，经过企业改组，到1956年底，原8.8万余个私营工厂，除极少数转入地方国营外，其余组成3.3万余个公私合营企业，原240万户私营商业，除少数转入国营或合作社商业外，其余分别组成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改造企业的同时，还以企业为基地，对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使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首先是1955年以后要求过急，速度过快，特别是全行业公私合营，仅仅两三个月时间，全国几百万私营工商业者一齐拥进来，必然造成工作粗糙，在具体政策的掌握上也发生了种种偏差。其次，对大量并无雇工剥削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本应逐步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并可适当保留一些个体经营，但在改造高潮中，却划入公私合营范围，都被带进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的面过宽，也过于彻底。这些人都被笼统地称为“私方人员”，长期错当作资本家看待，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阶级界限。对一部分私方人员也安排使用不当，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所长。再次，在经济改组中，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盲目合并过多，使一些中小工厂丧失原来特点，花色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商业网点不足，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不利于生产和流通的发展。

总起来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

到1956年底，由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就是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时，我国社会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集体所有制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私营经济由6.9%下降到0.1%以下；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前三种合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92.7%。其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已达98.8%。以上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绝对优势，我国已从多种经济成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同一切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一样，都有一个建立、健全和巩固、发展的过程。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它也是不成熟、不完善、不巩固的。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脱胎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来设想的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时期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提前完成而匆匆结束，因而工业化的任务仍远远没有完成。另一方面，当时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改造后期过急过快，虽然我们创造了很多适合我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却没有来得及在实践中从容实施，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发

展和完善，创造出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的多样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而是以一些理想的固定观念和苏联的具体榜样作为改造的目标模式，造成在所有制结构上过分单一，在管理体制上过分集中和过于僵化等种种弊端，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上两方面的情况说明，我国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来规划我们的工作。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这就成为后来不断发生“左”的错误的重要原因。

六、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共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1952年恢复经济任务完成后，从1953年开始国家便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这个五年计划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制订的，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主持进行的。从1951年起进行调查研究，着手试编。开始时，不仅缺乏制订长期计划的经验，也缺乏系统的资源调查和经济统计资料，同时还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等种种不利因素。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多次修改，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1955年3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同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即：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这三方面的任务，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就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全国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总额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占55.8%。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工业方面的投资占58.2%。五年计划规定，工业生产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98.3%，平均每年递增14.7%；农业及其副业总产值增长23.3%，平均每年递增4.3%；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1.1%，平均每年增长8.6%。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商品零售额将增长80%左右，职工平均工资约增长33%，农村购买力将提高近一倍。计划也规定了交通运输、农林水利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指标，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规划。

“一五”计划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设规划，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它全面体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也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力求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共同愿望。同时又是从实际出发，既考虑需要，又照顾可能，是一个积极而又稳妥的切实可行的计划。

为了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一) 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城镇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加,同时农村因种植经济作物或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而缺粮的农民也大量增加,需要由国家供应粮食的人口,1953年已增至近2亿人,1953年的粮食销售量比上年猛增31%。全国解放后粮食产量虽然年年增加,但增产的幅度仍然赶不上需要的增长。同时,由于粮食自由市场的存在和私商的投机活动及余粮户待价惜售心理,从1953年起,城乡粮食供应逐渐出现紧张情况,部分地区出现粮食脱销,并发生混乱现象,粮食投机活动也十分猖獗。从当时全国粮食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情况来看,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调剂,粮食也可以实现供需的基本平衡,虽然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为了对有限的商品粮食进行合理的分配和使用,1953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统购)和计划供应(统销),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以保证全国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一政策的实施,缓解了粮食战线上的紧张状况,同时对整个市场物价的稳定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是有力的保证。在我国农业生产落后、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实行是必要和正确的。继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国家对棉花、纱布、食油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也陆续实行了统购统销的办法。

(二) 统一调配和大力培养建设干部。技术力量不足,管理人才缺乏,是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个突出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全党按照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的原则,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一批优秀干部,把他们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并号召老干部钻研业务、技术,努力成为工业建设中的内行;同时,对原有的技术人员,认真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中的作用;还举办或扩充各级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大量招收知识青年、工人和在职干部入学,培养、训练新的技术人才。这一措施,对缓解技术人才的矛盾起了良好的作用。

(三) 持续不断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通过劳动竞赛、技术革新、提合理化建议、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推行生产责任制、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坚持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以及先进生产者运动等种种形式,使增产节约运动持续不断地发展,对缓解国家资金的困难,对调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 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及时纠正1956年急躁冒进的偏向。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总的说是比较顺利的。从1953—1955年,国民经济稳步前进,健康发展,成效显著。但是在1955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几年来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中共的某些领导人也逐渐滋长起骄傲情绪,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建设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张。1956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更对农业发展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战略构想,要求粮食和棉花每年分别以8.7%和10.4%的速度递增,到1967年总产量分别达到1万亿斤和1万万担。这个高指标的农业远景规划表明,社会主义建设中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情绪开始在党内出现。结果,大大提高了1956年计划指标,造成基建规模过大,职工增加过多,信贷突破计划,财政赤字增加,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供应紧张的局面。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较早地察觉到这种急躁冒进倾向,从5月开始,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起着手纠正和反对这种倾向。在6月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研究了半年来经

济工作中所发生的冒进情况，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压缩指标，制止冒进。根据会议的精神，在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主持下，修改了过高的1956年计划指标，“二五”计划草案和1957年计划控制数字，使这两年的经济建设转到健康发展的轨道，顺利地完成了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多数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时，毛泽东在思想上是有保留的，但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尚未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尊重多数领导人的意见，没有提出异议，容许进行上述种种纠正冒进的措施。这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能顺利地超额完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一）基本建设成效显著。5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施工的工矿建设项目1万个以上。重要工业部门新增生产能力大幅度增长，如炼铁339万吨，炼钢282万吨，采煤6376万吨，电力246.9万千瓦。并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如汽车制造、发电、冶金、矿山设备制造、重型机器、精密仪表制造，以及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制造，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等，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残缺不全的旧貌，并为工业的合理布局建立了初步的框架。

（二）工业生产迅速发展。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128.3%。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25.4%；消费资料生产也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9%。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开始改变重工业落后的面貌。

（三）农业生产增长也比较快。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加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5年间，国家用于农林水利的投资共41.8亿元，农业生产条件也得到相当的改善。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运输邮电、国内外贸易都有很大发展，全国市场繁荣，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收支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四）国防、外交、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党和政府在改造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国防、外交和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时期。适应新时期的形势和需要，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1953年12月到1954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针，总结几年来的工作，规定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在我军现有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

根据以上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在建国初期很短的时间里，在军队精减整编的基础上，很快地组建了空军、海军、炮

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等军、兵种，使人民解放军由原来单一步兵迅速向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并且相应地加强部队的培训，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文化、科学和技术水平。为此，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随后建立了大批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大量培训军事干部。还有计划地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军工企业，使我国逐步地能生产制造各种大口径火炮和坦克、喷气式歼击机等武器装备。为了打破美国的核讹诈，1955年决定筹建核工业，次年即开始研制火箭及原子能的工作，使我国在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方面争取了时间，得以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此外，又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及各种规章制度，决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等等重大措施，促进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我国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前进了一大步。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根据两方面的事实制定的。一方面，旧中国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特权和影响，中国在外交上长期仰人鼻息，任人宰割，处于屈辱的地位；另一方面，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互相对峙、进行“冷战”的局面。美帝国主义为了称霸全球并维护旧殖民主义的统治，打着“遏制”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站在和平、民主方面，支持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合作的态度。据此，中共中央提出，在着手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时应“另起炉灶”；对于同美国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建交，应“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原则。

朝鲜停战后，亚洲的紧张局势开始有所缓和。1954年4月，由于苏联的推动，在日内瓦召开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是我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尽一切努力争取达成某些协议，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阻挠，会议未能就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但挫败和推迟了美国企图对印度支那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计划，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法国从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权利，从而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

为着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面对着帝国主义对会议的破坏阴谋以及与会各国间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

而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提出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各国建立了联系，为扩大和加强我国与亚非各国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同时还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促成了中美两国 1955 年 8 月开始大使级会谈。

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同时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联系，并日益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做好这一切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工作如何。

旧中国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并且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它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所控制，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广大工农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全国 90%以上的人是文盲。

新中国成立后，在维持原有学校及文化教育设施的同时，也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改革。教育工作改革的内容，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外，还实行了教育向工农群众打开大门和在全国范围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

在科学工作方面，建国之初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并实行团结科学家的政策，大力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的方针和建立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包括高等学校和各生产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在内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体系的方针。在文艺工作方面，中共继续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科学、文化、卫生工作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的成绩。

建国之初，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不肯跟随国民党逃亡而留在国内迎接解放。知识分子学习热情也很高，他们要求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首先在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中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还组织他们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并且逐步把这一学习运动扩展到各界知识分子中去，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一运动，到 1952 年秋基本结束。这次学习运动，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思想批评中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如有些单位学习苏联，要求承认苏联的某些生物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批评另一些生物学说是资产阶级的），做法有些粗糙，有的单位采用群众斗争的办法，感情上伤了一些人。但是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感到有收获，通过学习，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使自己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

这期间，还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 年）和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4 年）运动，还有对梁漱溟

的批判，试图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或批判，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知识分子。这些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一定作用，有其积极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些批判实际上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一拥而上，形成围攻，有的文章简单粗暴，武断片面，无限上纲，以势压人。不仅对武训、对胡适等，甚至对《武训传》的作者、对俞平伯及已故民主战士陶行知等都有否定一切的倾向。由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还进而否定取消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这一切，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1955年，又展开了一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并且迅速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镇压。这种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的做法，特别是并没有经过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作“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做法，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了以言治罪的先例，造成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

1955年冬，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猛发展，要求大大加快工业化建设的速度。预计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已为期不远，中共中央开始把注意力逐渐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提出了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前，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小组，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知识分子较多的大城市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建国6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为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周恩来在报告中着重阐明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深刻地论述了科学和掌握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措施；第三，提出了热情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并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的任务，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由于以上各项事业的发展，“一五”期间，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为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4.2%。1957年底，全国职工人数共2451万人，比1952年增长55.1%，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基本上得到安置。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是十分巨大的。各项建设事业顺利开展，经济发展比较快，也基本保持协调，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全国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连同恢复时期一起，这是新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第二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历史转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最基本的任务是如何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尽快发展生产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东方大国。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4.9%，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只有142元。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全国有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他们大都仍然处在半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中。这些都说明我国还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根据我国的特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项新的极其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由于缺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曾在许多方面学习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情况毕竟与苏联的不同，而且那些经验在苏联也并不都是成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表明，苏联的经验虽然有许多对我们是有益的，但也有一些不适用于我国，或者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因此，必须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期间，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已经分出部分精力，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进行过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先是刘少奇为准备向八大的政治报告，从1955年底开始陆续召集中央工业、交通等部门的负责人汇报经济建设战线的工作状况。1956年2、3月间，毛泽东也集中1个半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周恩来以及中央和国务院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参加了这些汇报会。汇报中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

正当我国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开始出现新的重大变化。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苏联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一次大暴露，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极大的震动。它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神秘观念，解放被束缚的思想，加强理论同实际的结合，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种情况，对于正在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讨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泽东集中和概括了大家的意见，在会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报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报告着重提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的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

抄，机械搬运。这就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报告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一系列正确方针，强调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集体和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以及中国和外国等各种关系，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初步的探索。

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处理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方针。这个方针规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同存在，在政治上互相协商，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并尊重各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它的提出再一次明确肯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原则。这对确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大意义。这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强调，“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虽然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强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为此，他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如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政府的监督等等。

上述各项思想和方针的提出，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

在我国由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转变的历史关头，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充分肯定1945年七大以来党的路线和主要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对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作了系统的全面的总结。

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明确指出，经过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大会全面分析了我国的国情，制定了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建设方

针。大会认为：由于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又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规定，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将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万吨，粮产量达到5000亿斤，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

大会还提出改进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要求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各省、市、自治区的管理权限。同时，要注意解决上级国家机关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分配、福利实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此外，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即在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但附有一部分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个意见受到大会的重视，并为大会决议所采纳。

大会强调，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为此，必须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用这些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大会确定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在文化科学领域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大会还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应该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民主权利受到充分的保护。

大会还着重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他指出，建国以来，共产党已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地位很容易使一些党员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发展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增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首先要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与此同时，还要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防止个人迷信，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报告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途径，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党章中，上述思想和原则都得到充分的反映。

大会选举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等 97 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新选出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并由上述 6 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基本结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开始。它在我国历史转折的关头，及时地分析了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新任务，并为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主要的方针政策。八大的路线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它体现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建设，并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这是党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初步的可喜的成果。后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都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中共八大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个领域继续进行了探索。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上海、天津等城市中又出现了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这种现象如何处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56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同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的负责人谈话时，发表了新的重要意见。他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个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刘少奇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说：我们国家有 90% 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也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这就提出，不仅个体经济，而且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进一步突破。

其次是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决定将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大部分轻纺企业和一部分重工企业以及一部分交通港口和企业等下放给地方管理。下放企业的利润实行中央和地方二八分成。同时，适当扩大了地方和企业对物资分配、生产计划、财务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的权限。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已经开始起步。

在农业方面，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一系列指示和通知，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整顿，这实际上也是对农业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其主要内容有：要求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中央要逐步做到由规定生产计划，过渡到只规定农产品的采购和调拨计划。中央计划和地方计划对农业社都有参考和指导作用，但不能直接命令合作社样样照上面计划办事。农业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社、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将原来关于社员自留地不超过当地人均土地数 5% 的规定，提高到不超过 10%。农业社要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把合作社的集中领导与发挥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主动性、灵活性结合起来，使生产队和副业组也有一定的权限和职责；要切实地建立集体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合作社对生产队应普遍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

还强调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切实改进干部作风。

这些方针和措施虽然还不能完全解决农业管理体制中的各种问题，但它毕竟有助于消除当时农业社的混乱现象，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改革和完善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调整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根据中共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方针，对1957年的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和安排。

1956年上半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毛泽东又要求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年年初，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实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并主持起草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纲要40条》），号召各级党委都要反对“右倾保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委员会”。在大力反右倾的形势下，对经济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要求过大过快，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周恩来等一些领导人发现了这种情况，及时地提出要防止和反对冒进倾向。这年6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决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人大确认了这一方针。毛泽东当时虽未提出异议，但他的观点实际并没有改变。

八大以后，围绕着制定1957年经济计划问题，在中共中央又出现了分歧。毛泽东主张1957年的预算指标可以高一些，实际上是不承认1956年有冒进。周恩来认为，鉴于1956年经济建设中发生了一些冒进倾向，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等方面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多数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调整1957年计划。毛泽东未明确反对。

1957年1月，陈云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6年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为了防止出现经济混乱，在制定计划时，必须切合实际，保持综合平衡，特别要注意保持财政收支、物资供需、银行信贷这三大平衡。

由于贯彻执行了上述各项方针和措施，逐步缓和了财政经济的紧张局面，较好地完成了当年的年度计划。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1.5%，农业总产值增长3.6%，财政收入增长7.9%。这一年的经济建设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中共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并积累了初步经验。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大大提前，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过于急促，因而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不明确、不巩固。例如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还没有全面的具体的了解，对于在我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于党内正在滋长的骄傲情绪和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扩大民主、健全法制、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以及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有力的措施。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还不够。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是八大路线后来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的基本原因。而反右派斗争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想，则是导致八大路线改变的直接因素。

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中共八大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又有新的发展。

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强烈反响，使这些国家内部存在已久的矛盾以及它们同苏联之间的矛盾都充分暴露出来。从1956年6月到同年10月，在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扩大民主，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抗议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反对本国某些奉行错误政策的领导人，并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利用波匈事件再次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进一步加深，围绕着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国际上的风波对我国也不能不产生某些影响。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各国有很大不同。我国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后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后，一贯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各项工作中，共产党的路线和基本政策也是正确的。但是工作中也存在缺点错误，特别是1955年下半年批判“右倾”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生了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的偏差，造成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紧张局面。虽然从1956年夏天起，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发现并着手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中共八大也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但由于中共中央负责人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为纠正这些偏差而采取的措施不够坚决果断，因而急躁冒进所造成的许多困难没有及时消除。如八大以后，在许多城市中出现了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也遇到不少困难。这些情况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在农村中，由于合作化运动后期出现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等缺点以及农业管理体制、产品分配和干部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种种问题，损害了农民的利益，1956年夏收以后，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有些县区，有半数以上的合作社出现农民闹事。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思想日益活跃起来。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他们开始批评教条主义，提倡思想解放，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一些消极现象，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和意见。

对于国内新出现的这些情况和问题，许多党员和干部还缺乏清醒的认识，不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他们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消灭了剥削制度，就不会存在矛盾了。由于思想上缺乏准备，一旦群众闹起事来往往惊慌失措，陷于被动；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以至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以致造成更大的困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矛盾，需要

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是非对抗性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他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要求普遍地提倡和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部分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宣布，党内准备今年开始整风，并号召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对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和意见。他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发展科学和艺术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毛泽东的上述两个讲话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逐步传达后，在党内外引起热烈的讨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根据中央的指示，纷纷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执行“双百”方针的情况进行检查。党内外群众对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从共产党方面来说，这实际上已经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我们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有许多同志很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滋长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整风指示发布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群众团体和文化、教育、科学等部门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内外的大众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这对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这年春夏之交，在全国形成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运动的主流。

但是，在整风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帮助党整风为名，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各党派“轮流坐庄”；他们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人数虽少，能量颇大。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一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思想偏激、缺乏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时陷入思想混乱，发表了一些违反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利益的言论，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错误的要求，在社会上形成

一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错误思潮。

整风运动出现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是与1956年以来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当时，我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正处在大变动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巨大动荡，国内外的急剧变化不能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来。同时，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党政干部中也确实存在着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各种脱离群众思想和作风。人民群众一方面欢迎新制度，一方面又对新制度不熟悉、不适应，对某些干部和工作不满意。有些人对社会主义还不理解，存在一些怀疑甚至有某些抵触情绪。当然也有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敌视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企图扭转整风的正确方向。为了排除对整风运动的干扰，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回击，对他们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毕竟只有极少数人，同他们的矛盾并没有成为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反击少数右派分子，并不需要发动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应该是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就在什么范围解决，是什么性质，就按什么性质处理。尤其应该注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但是，由于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还缺乏全面的深刻的认识；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过去习惯于用对敌斗争的眼光观察问题，处理矛盾；也由于党的领导在一连串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把许多群众的善意批评，当成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从而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已指出，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联成一气，互相呼应，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在整风运动中要暴露和孤立右派分子，要做好反击右派的准备。这就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党中央连续发出党内通知，指示党的各级领导，对所谓“右派分子”的言论，要放手让他们发表，并在报刊上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而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以使他们在人民面前充分地暴露其反动面目。在这种“诱敌深入”或“引蛇出洞”的策略下，一段时间内，各地报刊上都不加评论地刊登了许多错误的或攻击性的言论，其中不少属于片面摘录、断章取义的。这就人为地造成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张气氛，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5月中以后，一些单位陆续出现了大字报、大辩论。在某些高等院校还发生了罢课闹事的情况，并且有日益蔓延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就全面展开。

反右派斗争首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文艺界、学术界、科技界、卫生界、新闻出版界以及省、市以上的党政机关中进行，接着在工商界、中小学教员和地、县等党政机关中也陆续展开。运动中，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不适当地采用了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这种极易混淆两类矛盾的方式，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因而把大批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给党提意见的人们当成右派分子，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反右派斗

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给与会者讨论。文章指出：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青岛会议依据毛泽东的上述文章，讨论了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并决定在城乡劳动人民中分期分批地普遍进行一次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当时全国反右派斗争高潮的气氛下，这种教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对一部分群众、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是代表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富裕中农的过火批判和斗争。其中不少人还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坏分子”，成为专政的对象。

在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下，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问题。全会肯定了青岛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论证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要求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继续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开始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为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次全会后，按照中央的规定，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的单位，应转入着重整改和思想教育阶段。但总的来看，在经历了反右派斗争的急风暴雨之后，一般群众心有余悸，已经不敢讲话。而不少干部的骄傲情绪却有增无减，更加听不得不同意见。因此，中央提出的整风要求，实际上很难实现。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后，各单位先后进行了对右派分子的定案处理工作。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定案工作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批善意地提意见的人，以及只有一般性错误言论的人或虽有严重错误言论但并非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加分析地也定为“右派分子”，从而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据统计，全国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共55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错划。这些人不仅遭到严重的批判斗争，而且大都受到严厉的组织处分。这些错案一直延续了20多年，许多人因此长期受到压制，甚至含冤而死。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损失。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深刻记取。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进行，还没有严重影响到其它领域。但在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右派斗争中急剧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想逐步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终于发展为“大跃进”的全局性错误。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的经济建设虽然发展比较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1955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急躁冒进和急于求成的思想没有得到清理，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这个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随着反右派斗争中“左”倾思想的急剧发展，这种急躁冒进思想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泛滥起来。

在 1957 年 9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对 1956 年的反冒进提出批评，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纲要 40 条”，“结果来了一个右倾”。他要求把这些都恢复起来。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要求，基本通过《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修正草案）》，并决定以讨论农业纲要 40 条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批判右倾思想，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

195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了《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社论发表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具体落实“40 条纲要”。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同年 11 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并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提出，15 年内苏联要在经济上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毛泽东也提出 15 年左右，中国要在钢铁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这年年底，15 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国内公布后，对于渴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民，确实起了很大的鼓舞和动员作用。问题是随着“左”的冒进思想的迅速发展，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满足这一目标了。1958 年 4 月，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欣喜地描绘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后写道：“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个决定性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又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浪漫主义的情绪，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严重忽视了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所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仿佛只要有了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就会不受任何条件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赶超速度越来越快，目标越来越高。5 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即提出：我国 7 年赶上英国，再加 8 年或者 10 年赶上美国。6 月又说：3 年超过英国，10 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成为大跃进追求的直接目标。

为了推动大跃进，1958 年 1 月和 3 月，毛泽东先后召开了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更加严厉地批判反冒进，把党内思想上、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上纲为政治问题，造成党内不正常的紧张气氛，使不同意见难以发表出来，从而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个人专断的发展。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把相信真理同崇拜个人混为一谈，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除了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外，还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这就使个人崇拜合法化。从此，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也很难贯彻执行了。

在以后的宣传中把不断革命说成是要不停地变革，不断地打破现状，否认事物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与此相联系，毛泽东还提出要反对所谓“庸俗平

衡论”，认为在经济工作中注意保持综合平衡是“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采取“积极的平衡”，即不断地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在当时“左”的气氛下，这实际上是宣传人们可以不顾客观条件，任意地提出高指标，从而否定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不断跃进提供理论依据。毛泽东还提议生产计划搞相互评比指标，各地区你追我赶，指标越抬越高。于是，浮夸风、高指标日益发展。

在反右倾、鼓干劲，促进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观点，报告肯定“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它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种分析把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消灭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仍然当作完整存在的剥削阶级来看待，甚至把大批知识分子也归入剥削阶级行列，实际上是根据政治思想来划阶级，显然违背马列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从这种分析出发，这次会议正式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论断，肯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同时又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指明了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正确的。但是，对党的主要任务的确定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估计明显地处于相互脱节的状态，反映了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的矛盾，从而使党的工作着重点后来没有能够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然而又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而且，在执行中又指责那些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有怀疑的干部和群众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说他们举的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因此，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只能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在会后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党内外不少干部和群众被当做“白旗”，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压制。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不久，中央又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并明确提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这就强化了已经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助长了以党代政的偏向。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迅速趋向高潮。全国各族亿万人民，响应党的号召，为尽快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在各条战线上顽强拼搏，日夜奋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在3年大跃进期间，兴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和大量地方工业。但是由于当时生产指标层层加码，一再提高，大大超过了实际可能的限度；各级干部为了能够实现上级领导的要求，便采取弄虚作假或强迫蛮干的办法。于是伴随着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日益泛滥起来。

首先，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在中央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指导下，粮食产量的指标不断提高。各协作区纷纷召开农业协作会，制订本地区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目标。华东地区带头提出，1958年该区6省的粮食

产量要比 1957 年增加 500 至 800 亿斤，达到每人平均 1000 斤，1959 年达到 1500 斤，1960 年达到 2000 斤。此后各区竞相加码，指标越抬越高。高指标带来了高估产。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粮食产量，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7 月中，报载河南出现小麦亩产 7320 斤的“卫星”，创“全国和全世界的最高丰产纪录”。8 月，安徽又放了一颗“特大卫星”：早稻亩产 43075 斤，并第一个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9 月，又报导广西创造了早稻亩产 130434 斤的惊人纪录。在这种气氛下，报纸上就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错误口号，并大批所谓“条件论”和“粮食增产有限论”。农业部根据各省上报数字，估计全年粮食总产量将突破 1 万亿斤。

在工业战线上提出“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方针，因而工业大跃进首先表现为一再提高钢产量的计划指标。1957 年钢产量为 535 万吨，1958 年原计划为 620 万吨，成都会议第二本帐规定为 710 万吨，5 月底政治局扩大会议增加到 800—850 万吨。6 月 19 日，毛泽东在听取有关同志的汇报后又提出：干脆翻一番，搞 1100 万吨。

工农业生产上的急于求成思想也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上的急躁冒进倾向。在经济建设上急于赶超资本主义大国的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也急于超越苏联，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伴随着大跃进的高潮，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运动首先在农村展开。早在 1958 年 3 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都会议已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此后，一些地区即开始进行并社的试点。这年 4、5 月间，毛泽东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曾议论过，将来我国的农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若干乡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这种公社的性质，显然已不同于原来的农业社。7、8 月间，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设想在报刊上发表后，不少地区闻风而起，着手创办人民公社，开始出现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急剧发展的形势下，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热烈地赞扬了大跃进运动，认为大跃进已经使农业生产出现“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估计 1958 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6000 亿到 70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60%到 90%。

会议高度评价了人民公社，并作出了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人民公社成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人民公社仍然实行“按劳取酬”，不必忙于改变分配制度；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实行工资制。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又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他说：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 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要把 6 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决议也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项决议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本纲领，它贯穿着浓厚的

急于过渡的思想，成为此后急剧膨胀的共产风的主要来源。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 1958 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并在会议公报中发出“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

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关于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 1959 年粮食产量达到 8000 亿到 10000 亿斤，钢产量达到 2700 万到 3000 万吨；并认为实现了这年的计划后，我国在钢铁和其它一些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将超过英国。决定要求 1962 年粮食产量达到 15000 亿斤，钢产量达到 8000 万到 1 亿吨；同时，要在全中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各协作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总之，“在 1958 年到 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些要求显然是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主观空想。

北戴河会议标志着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点。会后，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从而导致在实际工作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地泛滥开来。

北戴河会议发出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后，各地都把炼钢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根据“土洋结合”、“大中小并举”的方针，除拼命提高大中钢厂的产量外，还大力推广“小（小型）、土（土法）、群（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经过 9000 万人 3 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苦干，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浪费了不少森林矿产资源，国家补贴了 80 亿元，终于在 12 月 19 日，宣布完成钢铁翻番的任务。实际上，其中有 300 多万吨土钢基本上是废品，根本无法利用。

与全民炼钢运动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全国农村迅猛地开展起来。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布后，各省一哄而起，掀起了并大社转公社的高潮。到 9 月底，全国原有的 74 万多个农业社已合并为 26000 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共 1.2 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9% 以上。

公社建立初期，都实行社一级的所有制，原来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几十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后，把一切集体财产都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实际是对农民的剥夺，因而引起农民的恐慌，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极大的破坏。公社大多宣布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实行社员“吃饭不要钱”，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强调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努力缩小商品交换，扩大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这实际上是使人民公社向着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封闭或半封闭的社会倒退。

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后，都企图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些地方如河北徐水县和山东范县（今属河南），声称一两年即可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提出了“八包”、“十包”等，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至男婚女嫁等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在当时生产力的条件下，这些自然是十足的空想。

实践证明，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

彩。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采取主观随意的态度，不仅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企图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只能是一场空想共产主义的试验。

1958年下半年相继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由于不断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使基本建设投资直线上升，全年投资总额达到267亿元，比上年猛增93%，占当年财政支出的65.2%。国家职工人数也随之剧增，1年内增加了2000多万人，总数达到4532万人。由于大办工业中过多地占用了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刮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1958年由于气候较好，又有1957年冬天大搞农田水利和积肥等有利条件，农作物长势较好，本来是一个丰产年成，但丰产不丰收，经后来核实，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不过4000亿斤。比上年增加不到10亿斤，而由于高估产导致了高征购，这年要征购粮食1175亿斤，接近实际产量的30%。与此同时，由于财政紧张，银行发放农村的贷款，不论是否到期，也要求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再加上高征购，引起农民的很大不满。不少群众和社队干部用瞒产私分等办法进行抵制，农副产品收购不上来。轻工业等日用品也减产，市场供应出现严重不足。总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造成全国相当紧张的局势。

大跃进期间，在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战线上也掀起大跃进高潮。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指导下，要求迅速消灭三大差别，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为此，强调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提出三五年内在全国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并要求“人人能写诗，人人会画画”。在教育方针上，片面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培养“普通劳动者”。因而要求学校打破正常的教学秩序，让师生走出校门，以大部分时间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一些认真钻研业务，努力从事教学工作 and 重视科学文化学习的师生们往往被说成“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加以批判。这不能不严重影响教育质量。

在思想战线上，大跃进期间，提出了“兴无灭资”即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口号，实际上取代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1955年提出我国应提倡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意见。当时曾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肯定。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提出“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后，马寅初的正确意见竟被作为“反动观点”，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围攻，并撤销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杨献珍等一些哲学工作者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提出不同意见，也被认为是否定主观能动性，反对大跃进而受到批判。一些正确的法律观点和制度，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和律师辩护制度等，更被当作否定党的领导，维护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加以批判，并于1959年撤销了国务院法制局和司法部，大大削弱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这种错误的思想批判也波及到军事领域。否定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

四、从纠正“左”倾错误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这年11月起，毛泽东首先提出并带头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1月21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相继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针对有些人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这些都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几种过程，而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也就是说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决议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衷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衷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

决议批评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还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的“左”的倾向，指出这种想法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强调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由于对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估计过高，认为粮、棉、钢、煤等主要产品都将比1957年增产一倍或一倍以上，因此，会议通过的1959年计划，除将基本建设投资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钢产量由2700万吨到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到2000万吨外，其它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会议还要求在1959年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

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要“讲真话”，“压缩空气”，反对浮夸，要“冷热结合”，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同时也提出不要作“观潮派”、“算帐派”。还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这些精神虽然对当时头脑发热的人们起了一些降温的作用，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根据会议的精神，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但是由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没有解决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等许多“左”的问题，在整社中又不适当地进行了反对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因此，“一平二调”等共产风并未得到有效的克服，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也没有真正缓解。1959年2月，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等省视察，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好，决心从这一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为此，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又在上海接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这次郑州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在稍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上，又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些文件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生产队（相当原高级社范围）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后一个文件还规定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相当初级社），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折价补偿。

4月初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上述规定，并讨论和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除对基本建设投资和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基建投资由360亿元降为260亿到280亿元；基建项目由1500项降为1092项）外，其它生产指标大都未变，因而高指标问题仍未解决。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审议和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上述一些高指标公之于世，造成了以后工作中的又一次被动局面。大会还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本届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早在1956年夏天，毛泽东即提出他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以后又多次表示过希望摆脱此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建议的决定。八届七中全会又重申了上述决定。毛泽东的原意是想退居领导工作的第二线，逐步改变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但由于大跃进以来的新形势，他在七中全会上又强调统一领导，要求把权力集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并声称他要在中央亲自挂帅。所以实际上在这以后，毛泽东仍然处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前后，毛泽东觉察到干部中存在着不敢讲真话，向上级只报好事不报坏事，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等问题。他在七中全会讲话中，曾号召大家学习以敢谏闻名的明朝官员海瑞，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提出批评。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后，国民经济工作中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首先是农业生产情况很不好。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1.1亿亩，即少播20%。夏收中，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生产中问题也很多。钢铁生产从年初到6月底，只完成530万吨，距计划要求的半年生产900万吨相去甚远。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针对这种形势，陈云提出：粮食要省吃俭用，控制销量；国营、集体、个人三条腿走路，发展猪鸡鸭鱼等的饲养，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特别要注意恢复和发展农村手工业的生产；认真精简去年多招收的工人，压缩购买力；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接着，他又受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委托，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5月中旬，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应降为1300万吨。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陈云的意见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5、6月间，中共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对一些生产指标和具体政策作了新的调整。钢由1800万吨降为1300万吨，煤由3.8亿吨降为3.4亿吨，基本建设投资由260亿至280亿元降为240亿元，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由1092个降为788个。同时，宣布恢复农村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庄稼和树木，谁种谁收，不征公粮，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归社员私有。指示还明确指出，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8个月的纠偏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错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遏制，整个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以及其它一部分领导干部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充分肯定，也就是说，在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并没有根本的转变，因而“左”的错误未能彻底纠正。特别是由于在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重大反复，造成了整个形势的逆转。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内容是继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提出了18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思想和政策问题。他认为当前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大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2日到10日，全会分六个大组座谈讨论。讨论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相当多的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有成绩，但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从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克服“左”的错误。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纠“左”已纠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统一到正确认识上来深感忧虑，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他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的支持和理解，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他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关系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我们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片面性和浮夸风，“犯了不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跃进到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还提到反“左”比反右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符合实际和切中时弊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这些意见却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并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在各小组讨论中，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实际是否定总路线，反对毛泽东的。但也有许多人表示赞成或者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

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提过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他不能容忍从根本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和领导作风上提出批评。这种言行不一，思想与实践矛盾现象的出现，表明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领导力的衰退。但是，由于当时实行的实际上领导职务终身制，尤其是长期个人崇拜的严重恶果，使毛泽东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而其它领导人的威望和才干相对受到压抑。因此，毛泽东的领导不能受到任何批评，表明党和国家的命运将长期取决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一个党、一个国家和人民，不能反对并改变领袖的错误，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和悲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后，不少干部和群众（其中有机关干部、党校学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党外民主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了他们对当前形势的忧虑以及对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意见和批评。毛泽东把这些反映同会议上的争论联系起来，又把国内的善意批评同国际上的恶意攻击混同起来，于是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在这种错误判断下，他决心发起反击。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他们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7月26日，他又在一位干部反映意见的信上写了一段批语，明确指出：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

毛泽东的讲话和批语，使庐山会议的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会议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大会或小会上开展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并决定把他们撤职，继续批判审查。

会议结束后，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斗争，不少人还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65万人之多。

反右倾斗争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把阶级斗争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共产党内。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把党内在方针政策上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做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来处理，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与此相联系，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更加发展起来，也助长了党内存在的那种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甚至投机取巧，阿谀奉承等不正之风。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盛行的“宁左勿右”的风气又恢复和发展起来。不久前已被认识到的一些缺点错误，仿佛又成为正确的了。于是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

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并持续了更长的时间，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在 1958—1960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农村的社会制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动荡。在经济建设中，由于违反了综合平衡的基本要求，破坏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1960 年的 3 年中，各年积累率分别达到 33.9%、43.9%、39.6%，平均为 39.1%，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比较高的 24.2% 的平均积累率。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畸形发展，从 1957—1960 年，重工业增长 2.3 倍，而农业却下降 22.8%。由于贯彻执行“以钢为纲”的方针，钢铁生产挤占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它部门无法正常生产。由于基建规模过大，增加了大量职工和资金，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财政赤字 3 年共达 169.4 亿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下降 4.9%。

所有这些情况不能不极大地破坏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以从 1959 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的侵袭，农副产品急剧下降。1959 年的粮食产量仅为 3400 亿斤，比上年减少 600 亿斤。但由于当时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却比上年增加 173 亿斤，达到 1348 亿斤，占了实际产量的 1/3。1960 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为 2870 亿斤，比 1959 年又减少了 530 亿斤，降到 1951 年的水平。在此期间，棉花、油料、生猪等农副产品也连年大幅度减产。

从 1959—1961 年，由于农副业和轻工业的大量减产，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之中。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 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了 23.4%。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 23%，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减少 31%。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 70%，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减少 78%。由于食品奇缺，许多人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妇女断经不育，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剧增，形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加以由于中共和苏共两党之间矛盾的发展，苏联政府于 1960 年 7 月 16 日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立即全部撤走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并停止或大量减少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计划、图纸等各种资料，使中国大批建设项目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在上述严峻形势下，大跃进再也无法搞下去了，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五、调整国民经济，战胜严重困难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使中共的领导逐步清醒起来，重新着手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以战胜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

1960 年 6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十年总结》的讲话。他回顾了过去的曲折经历，并对大跃进中的某些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谈到今后的经济建设方针时，他提出，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1960 年的计划要加以调整，指标应留有余地，宁可少一些。

这与大跃进初期信心十足地强调高速度的情形相比，思想显然有了变化。同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死死规定下来，再不要讲3年到5年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还提出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9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指出，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开始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些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并重申庐山会议前中央为纠正“左”的错误而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要求坚决地贯彻执行。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他要求全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还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八届九中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标志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大跃进实际上停止了。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有新发现的毛泽东于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一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纷纷下到农村或工厂，直接倾听群众呼声。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如实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多数干部的认识逐步接近客观实际，这就为贯彻调整方针，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根据上述精神，毛泽东率先带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3省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经广大干部和群众1年多的反复讨论和试点，又先后做了几次重大修改，主要是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并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修订后的“农业60条”，在解决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条例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因而在调动农民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还

是发挥了作用。

继“农业 60 条”之后，中央各有关部门又陆续着手制定工、商、文、科、教等各类条例。这一系列具体条例是在总结建国后各项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实质上是对大跃进以来被搞乱了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拨乱反正，对于纠正各方面的“左”倾错误，建立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起了积极作用。没有这些具体的工作条例，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就难以贯彻落实。在制定这些具体条例的过程中，又推动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一步转变。

3 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不能不引起许多干部和群众的深入思考，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各种疑问：对当前的困难怎样认识和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什么？产生错误的根源何在？“三面红旗”究竟正确不正确？怎样才能真正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各有不同，在领导干部中也并不完全一致。

为了系统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解放军的负责干部，共 7000 余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

会议原定 1 月底结束，由于不少与会者希望会议能充分发扬民主、创造条件，让大家有机会畅所欲言，把心里话都讲出来。毛泽东提议延长会议时间，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在列举了几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之后，着重指出工作中发生了如下的缺点错误：（1）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它平均主义的错误；（3）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4）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

报告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同时，也由于近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就妨碍了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明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几年来在党和国家生活中，一方面，主要是民主不足；另一方面，分散主义也相当严重。因此，必须加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把困难想得多一点，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以上这些认识，可以说是从大跃进的失误中已经取得的初步的但是十分宝贵的教训。限于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会议对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还没有给予明确的彻底的解决。

首先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看法，仍然认为

“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就使得会议不可能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的高度，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会议讨论中，刘少奇认为，我们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还说人民公社晚办几年也许更好。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他还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刘少奇的这些比较接近实际的说法，实际上是毛泽东所难以接受的。

其次，这次会议还未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仍然把成绩和正确的方面归功于毛泽东，而对他的缺点错误则不敢涉及。尤其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竟然不顾事实地说，毛主席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林彪的这些讲话说明，个人崇拜的不良现象继续存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未真正恢复起来。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认真地清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没有对反右派斗争以来多次发生的过火斗争和错误批判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彻底清算，以致不久之后，这一错误又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起来。

七千人大会尽管有以上的局限，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发扬了党内民主，使全党对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并初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这对统一全党认识，加快调整步伐，战胜严重困难，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但是不久之后，即发现1962年的预算隐藏着巨大的赤字，并且从1958年以来，连年都有财政赤字，到1961年累计赤字已达180多亿元。在2月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西楼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对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我们现在处在“类似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也认为经济形势严峻，提出对经济恢复的速度要“争取快，准备慢”。5月，中央常委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都强调对当前的困难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要下大的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坚决退够。会后，根据通过的这个报告，对国民经济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整。

第一，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两年半内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周恩来当时曾说过，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后来提到此事时也感叹地说，几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共产党领导，哪个办得到！

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1962年同1960年相比，基建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亿元，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由82000多个减为25000多个。

第三，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经过调整，全国工

业企业数由 1959 年的 318000 个，减为 1962 年的 197000 个，减少 38%。与此同时，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的生产指标。

第四，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1962 年，在深入贯彻“农业 60 条”，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继续加强对农业的支援。

此外，还在制定一系列具体工作条例的基础上，大力整顿经济秩序，加强企业管理和财政管理，控制货币发行，加快货币回笼。同时，努力疏通流通渠道，恢复供销合作社，发展集市贸易，以利搞活城乡经济。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

首先是对 1958 年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工作。1962 年 4 月 27 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作出决定，要求对近几年来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在 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肯定了军队方面采取的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也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对过去搞错了或者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摘掉帽子，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这一意见，得到了会议的赞同，会后，甄别平反工作即迅速全面地展开。到 1962 年 8 月，全国有 600 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不过这项工作进行得不够彻底。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曾提出应解决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但毛泽东认为右派分子中除个别人外，一般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只可对其中改造较好的，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帽子。另外，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也认为他们有“国际背景”，“阴谋篡党”，还说彭德怀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因而不能给予平反。彭德怀对这种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感到极大的委屈，于是在 1962 年 6 月中，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呈送了长达 8 万字的申诉信，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检讨，对不符合事实的指控也作了说明，要求中央重新审查。然而，这封信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在后来使彭德怀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对待。

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同时，对科学、教育、文化以及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也作了调整。1961 年 7 月至 1962 年 4 月，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科研 14 条”、“高教 60 条”、“文艺 8 条”等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大跃进以来上述各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左”的偏向，要求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恢复正常的科研、教学工作，繁荣文艺创作。

1962 年 3、4 月间，先后举行了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在这些会议上，就目前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作了坦诚的讲话。刘少奇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共产党中央。周恩来也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这种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郑重态度深为感动，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接着，中共中央还相继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检查纠正近几年来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强调必须正确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工作等各方面的的问题，以加强全国各

阶层和各民族的团结。

以上一系列工作，对于改善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的关系，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共同战胜困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迅速取得成效。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首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这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农业总产值也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其次是财政金融和市场情况也有所改善，1962年收支大体平衡。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约35%，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上升。当然，这一切只是表明经济困难刚刚迈过了沟底。总的说来，工农业的生产水平和广大人民的生活程度仍然是很低的。

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时期，应不应该推行“包产到户”这类农业生产责任制，曾经在共产党内引起严重的分歧和争论。1959年，在一些农村地区就出现过“包产到户”，但在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很快受到批判和制止。1960年以后，在安徽、广西等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又自发地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毛泽东知道后表示同意试一试。这年秋天，安徽省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实行了“责任田”制度。但到这年10月，中央初步决定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毛泽东认为这种办法可以基本解决农村的矛盾，没有必要再试行“包产到户”。中央随即发出指示，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变相单干，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要求制止和改变这类作法。但是，许多农民对“包产到户”却迟迟不愿取消，有的明改暗不改。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也表示支持。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经过长期系统的调查研究，肯定安徽等地实行的“责任田”或“包产到户”不是方向性错误。他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他的这些意见曾在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6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过。会上意见分歧，难以统一。邓小平表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民间谚语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刘少奇、陈云也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此外，邓子恢还向中央建议适当地扩大社员的自留地，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朱德也强调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要重视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但也有一些中央和地方干部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否定集体经济。由于党内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认识不统一，中央指示各省委对此类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和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作好准备。

六、外交战线的成就和反对“两霸”的斗争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国际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出现高潮，一系列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在美国和苏联各自的盟国中，独立自主的倾向也有了很大发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称霸世界，一面加紧相互争夺，力图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面又相互勾结，加强对其他国家的干涉和控制，企图造成“美苏合

作，主宰世界”的格局。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努力支援民族独立运动，同美苏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由于中国积极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大力倡导和奉行各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1956—1965年的10年间，首先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中，掀起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高潮。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10个阿拉伯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撒哈拉以南的30多个新兴国家中，仅1960年前后就有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有亚洲的锡兰（今为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和拉美的古巴也是这个时期同中国建交的。此外，1964年1月，中国同法国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对于中国加强同西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突破。此后不久，中国分别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互设了商务代表处。

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也日益频繁。50年代中到60年代中，有20多个亚非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前往亚非各国进行友好访问。周恩来总理三次出访亚非各国。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等先后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等8个亚洲国家；1960年春，周总理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缅甸、印度等6国。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又先后访问了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10个非洲国家和缅甸、巴基斯坦2个亚洲国家。紧接着，周总理和宋庆龄副主席还访问了锡兰。刘少奇主席也于1963年和1965年先后出访印尼等亚洲8国。通过这些互访，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增强了团结和合作，扩大了中国在亚非各国的影响。

在此期间，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较好地处理了与大多数邻国的关系。从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中国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5国签订了有关的协定或条约，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同这些国家的边界问题。至此，除印度和苏联外，中国与自己邻国的边界问题都已获得圆满的解决。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相邻的两个大国和古国，两国人民在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一直相互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国真诚地希望进一步发展中国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两国之间建立起友好睦邻、团结合作的关系。两国建交初期，在国际斗争中，也曾经积极合作，相互配合，并共同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从50年代末起，中印关系由于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走上曲折的道路。

中印边界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曾企图把所谓“麦克马洪线”强加给中国，但中国历届政府都未同意过。所以两国之间只存在着一条根据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而印度政府却要求按照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传统习惯线以北的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管辖的土地划归印度。中国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分歧，在此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并不断用武力打破中印边界现状，把自己的边境哨所连续向北推移，企图把它单方面的主张强加给中国。1959年8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边防部队猛烈开火，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面对中印边界一再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情况，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在1960年10月，赴新德里同尼赫鲁商谈。由

于印方拒绝中国的合理主张，双方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此后，印度军队加紧推行其“前进政策”，继续不断地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1962年10月17日，印军更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边防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进攻，收复了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为了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自12月1日起，将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公里。接着，中国方面又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并归还了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此后，中印边界局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但这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双方的共同努力。

万隆会议以后，从1955年8月起，中国同美国开始了大使级会谈，并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某些协议。但在关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上，由于美国坚持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要求中国承担不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遭到中国理所当然的拒绝。到1957年底，会议从僵持发展到中断。1958年7月，美国公然派遣武装部队入侵黎巴嫩。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叫嚷要“反攻大陆”，并加强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大陆进行的骚扰和破坏活动。为了反击美蒋的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于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美国匆忙从地中海等地调海军到台湾海峡支援其第七舰队。中国外交部对美舰入侵中国领海向美国提出多次严重警告。同时，重申了中国同美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彼此争端的愿望。9月中，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美国企图用让出金门、马祖，换取中国同意对台湾和澎湖不使用武力，实际仍然是要搞“两个中国”。这不但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的，蒋介石集团也对此十分不满。考虑到在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同国民党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中国政府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并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以及一些码头、海滩和船只，逢单日也不一定打，以利金门诸岛能得到充分的供应。同时，劝告国民党当局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要提防“皇姑屯事件”的再演，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计议”。

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又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和控制。1965年3月，美国派出3500名海军陆战队在岬港登陆，准备随时进犯北越。美国军用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国军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并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这年10月，中国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开始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到1968年3月止，总计达32万余人。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军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在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达5000多人。中国向越南提供的物资援助总值达200多亿美元。在中国以及一些其它国家的大力支援下，越南人民艰苦奋斗，使美国侵略军陷入毫无胜利希望的困境之中，不得不在1968年11月宣布无条件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并准备同越南开始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同时，中苏矛盾也逐步激化。苏共20大以后，中共对如何评价斯大林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同苏共持有不同见解。波、匈

事件爆发时，中共建议苏共抛弃大国主义，平等地对待兄弟国家。这些都引起苏共领导人的不快。此后，赫鲁晓夫加紧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致力于同美国搞缓和。为此，他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力图控制中国，使中国的军事、外交服从其战略需要，遭到中国拒绝。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不顾事实，迫不及待地于1959年9月9日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从而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在中国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赫鲁晓夫对此极为恼火，在6月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策划并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攻击中共“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会后从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并废除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苏联领导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而且使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此后，苏联还在新疆策动暴乱，使数万中国公民出走到苏联。从1962年11月起，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共。同时，苏共还先后在5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围攻中共。40多个兄弟党也发表决议、声明或文章，指责中共。中共被迫陆续发表了7篇文章，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和指责进行公开的答辩。1963年7月，中苏两党举行会谈。会前，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运应该采取的路线和方针的看法。会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会谈结束前，苏共即于7月14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全面的攻击和反驳。苏联的各种宣传舆论工具也一起上阵，掀起一股新的反华高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对中苏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一系列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理论原则和战略策略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并公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样，就形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

中苏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很难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在各国党之间必然会产生种种不同认识和一些实际矛盾。对这些分歧和矛盾，本来可以自愿地、平等地在内部交换意见，协商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可以耐心等待，由实践来检验。但是，由于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的传统作风日益发展，对各兄弟党的不同意见往往采取家长式的武断专横的态度，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且为此不惜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损害它们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甚至发展到图谋颠覆这些国家和党的领导的程度。这就不能不使苏联同这些国家的矛盾尖锐化。中国共产党有独立自主，抵制指挥棒的传统，面对苏共的高压、干涉和控制，起而反抗其大国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和行径，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中共党内逐步滋长的“左”倾思想，也不可能不在论战中反映出来。由于对别国党和国家的情况了解不够，对马列主义的某些原理有误解或教条化倾向，在论战中，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来评价别国党的是非，甚至把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措施，也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产生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场争论的主要经验

教训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只能由各国党按照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决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能为此而干涉或控制别国的内政。邓小平后来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倒台，勃列日涅夫任苏共第一书记。中共曾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但他们在对华政策上与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向蒙古派驻苏军，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66年3月，苏共召开23大时，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断绝，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中，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巨大成就。10年内先后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27个，比建国后头7年增加一倍多，到1965年，已有49个国家同我国建交。特别是我国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反对美苏两霸，坚决支持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并坚持独立自主，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立场，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普遍称赞。

七、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再次发展

1962年夏，当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的时候，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并未真正解决；在某些方面，如对形势的估计，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以及对甄别平反工作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还有所发展；加以国际上苏联领导加紧反华活动，帝国主义加强“和平演变”策略和武力威胁，也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把这一切都联系起来，再一次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又将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正确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斥责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并认为彭德怀的申诉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

1962年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全会通过的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对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并具有更加严重的意义。

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标志着“左”的思想再度抬头。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使七千人大会前后正在逐步恢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又一次受到破坏，使“包产到户”这一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极大意义的改革措施以及其它的改革探索遭到压制。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商业工作等几个决定以及“人

民公社六十条”的修正草案，并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因而使经济调整工作在会后能够基本上按原订计划继续进行。不过，由于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使得“左”倾错误在经济领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清理，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则进一步发展起来。

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首先在所谓政策思想检查的名义下，对当时的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经提出过的一些有关统战工作的理论政策性意见，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错误批判。1964年，对他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判和斗争，把他提出过的那些有益的探索的意见，统统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对资产阶级实行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并因此撤消了他在统战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一切领导职务。

在关于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有些比较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意见也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十中全会前，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征得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写信，提出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避免使自己陷于孤立。还提出对外援助必须根据我国的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对克服当时对外工作中的某些过左倾向极为有益。但在1963年以后，这些正确意见被歪曲为“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并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受到多次批判。与此同时，还把在十中全会上已经批判过的邓子恢等人的意见称为“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作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又一再加以批判。这些批判，对我国的国际国内政策不能不发生重要影响。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有些地区根据全会精神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湖南和河北保定地区，分别从纠正“单干风”和“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入手，揭开了所谓阶级斗争盖子。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推荐了湖南和河北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则开展一次“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主要是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有些地方和单位的实际领导权已经落到资产阶级手里，指出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否则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不得不分出很大精力来抓阶级斗争，并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共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运动中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

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

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下到基层，帮助开展运动。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国大约有1/5左右的农村社队进行了社教运动。少数城市的企事业单位也展开了“五反”运动的试点工作。运动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影响下，一些地方对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向中央上报了许多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已经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已被“和平演变”的严重情况和典型材料。在这种形势下，1964年5、6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于国内的情况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全国有1/3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基于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会议决定，要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对“烂掉”的单位，要重新夺权，不仅要追查下面的根子，还要追查他们在上面的根子；社教运动要延长时间，不要心急图快；农村要清理漏划的地主、富农，城市也要审查评定阶级成份。会后，根据上述精神，中央对“后十条”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各地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有些地区要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提出完成整个运动大约需要5、6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总结研究社教运动的经验和问题。会议进行过程中，在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某些分歧。毛泽东认为，这次运动主要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会议前夕就提出过，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刘少奇则认为，运动中还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而且党内矛盾和党外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情况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抓住重点，“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会议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指出，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到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23条”下达后，各地重新调整规划，整训工作队，并解脱了大部分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打击面过宽的偏向，使部分地区一度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此后，运动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并集中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1966年春，全国大约有1/3的县、社进行了“四清”，国营工业和交通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约占总数的3.9%，其它如财贸、文教等部门，只在少数单位进行了试点。

历时3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贯彻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甚至是敌我斗争，把它同“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联系起来，并提出了“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方针，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

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展开了过火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讲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由于当时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述又有所误解或者作了教条化的理解，因此，在舆论或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未能真正辨别是非，分清敌我。十中全会上，对小说《刘志丹》已经展开了错误的批判。会后，文艺界开始根据会议精神检查工作，贯彻“反修防修”方针。1963年5月，首先在报刊上发起了对孟超编的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的公开点名批判，在此前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3年12月，他在一个批语中，指责“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此后，文化部及全国文联各协会即组织本部门全体干部结合总结检查工作，进行整风学习。对文艺界许多领导人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并对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各协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改组。

文艺界整风的过程中，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对一大批文艺作品，如《刘志丹》、《怒潮》、《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抓壮丁》、《三家巷》、《革命家庭》、《红日》等等，进行公开的政治批判。这些小说、电影大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其中虽有少数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手法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解决。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些作品都被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进行过火的批判。

与此同时，在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方面，对所谓“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等，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从1964年夏开始，对文艺界的错误批判，又逐步扩大到哲学（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经济学（对孙冶方重视价值规律等经济思想的批判）、历史学（对翦伯赞所谓“非阶级观点”的批判）等各个学术领域，严重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

随着思想文化批判的加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再次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并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反对“白专道路”、“业务挂帅”，要求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指派师生过多地走出学校，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从而打乱了教学秩序，影响了教育质量。

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破坏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些投机取巧分子，以“革命左派”自居，胡批乱斗，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严重地影响了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左”倾批判日益加剧之时，邓小平曾试图加以控制。1965年3月，他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

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但是，这些正确意见已经无法改变当时的局面。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兴风作浪，大造舆论，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服务。

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不一定要读马列的原著”；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又主要是学习“老三篇”（指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著作）和“背警句”，“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还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当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以及其它一些党政军负责干部，都不同意林彪的这些说法和作法，认为这是割裂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些人先后受到迫害和打击。在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制造了所谓“谭政反党集团”的冤案，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给予撤职处分。1965年12月，林彪又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妄图篡军反党”。随后，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揭发批斗，迫使他跳楼致残。

对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结果，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主要是认为这些斗争还没有“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修正主义的根子”，还不能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在后来回顾这些斗争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于是从1965年起，他就考虑寻找新的突破口，准备舆论，以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

八、经济调整完成和十年建设成就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努力，1963年夏，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这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工业结构不平衡、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尚未很好解决，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国民经济在调整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巩固、充实和提高。会议确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为今后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从1961—1965年，经过5年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正常，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加强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经济效益也有所好转。在此基础上，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1963—1965年的3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其中，农业总产值年

均增长 11%，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7.9%。1965 年同 1957 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59.9%，其中农业产值增长 9.9%，工业产值增长 98%。工业主要产品中，钢增长 1.3 倍，达到 1223 万吨；原煤增长 77%，达到 2.32 亿吨；原油增长 6.75 倍，达到 1131 万吨；发电量增长了 2.5 倍，达到 676 亿度。主要农业产品中，棉花达到 4195 万担，增长 27.9%；粮食达到 3891 亿斤，接近 1957 年 3901 亿斤的水平。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提高，市场供应显著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并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1965 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达到 125 元，比 1957 年的 102 元提高 23 元。但粮食、棉布、食油、猪肉等一些农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仍低于 1957 年。以上情况说明，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根本好转，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全面完成。

在此期间，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1957 年到 1965 年，用于工业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总共 1100 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 1198 个，新增固定资产 766 亿元。以 1966 年同 1956 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 3 倍。10 年中，新建扩建了冶金、煤炭、石油、机械、化工、建材、轻纺等一大批重要企业。大庆油田以及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的先后开发，结束了我国“贫油国”的历史，于 1965 年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50 年代末，我国开始兴建石油化学工业，到 60 年代中，相继建成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上海高桥化工厂和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等一批石油化工基地。从此，我国能够大量生产乙烯、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以及各种化学肥料等新兴产品。与此同时，另一种新兴工业电子工业也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1956—1965 年，先后建成电子工程 66 项，完成电子产品定型项目 762 项，已能生产各种雷达、无线电通讯和广播电视发射等设备以及电子计算机、电话交换机、收音机、电视机等许多重要的电子产品。工业的心脏——机械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分别组成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机械制造体系，能够独立设计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精密设备。1964 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 90%以上。

交通运输得到迅速发展，新增铁路通车里程 7825 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等线都已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湘桂、京原、襄渝等线也在加紧修建，有的接近完工。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除铁路外，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线路也有相当快的发展，设施也大为改善。

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地展开，兴修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建造大型水库 290 多个，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等几大水系的抗洪能力大大提高，灌溉面积扩大了 660 多万公顷。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了 6 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了 70 倍。此外，在植树造林、改良土壤、控制水土流失、推广优良品种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从而使农业的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技术装备程度也有了提高。

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巨大发展。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由 800 多个增加到 1700 多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达到 12 万人。1957—1963 年，全国科学技术人员由 120 多万人增加到 230 多万人，增长了近一倍。1956 年制定的 12 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已经提前实现，现代尖端学科如原子能和生命科学的研究，取得了显

著成果。1964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同年，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达到的新水平。

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取得很大成就，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1957—1965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共125万多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207万人，分别比1949—1956年增长3.4倍和2.3倍。教师队伍也由224万多人发展到460多万人。各级党校、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也培训了大批干部。在此期间培养成长起来的大量干部和各方面人材，经过艰苦复杂环境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我国发生了历时10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固然有其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而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为特征的“左”倾理论和实践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斗争的锋芒越来越指向共产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则是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而国内的反修防修，又是以国际反修为背景的。作为一位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经常注意揭露和克服党和国家确实存在的阴暗面，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十分重要的。他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所作的斗争，也一直赢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拥护。因此，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主张，不仅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得到党内外广泛的支持和拥护。问题在于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一直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视为修正主义，从而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党变质、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危险，并且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认为，国内修正主义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并且有国际背景。因此，“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终于找到的方式，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严重偏差的结果。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独特构想。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五七指示”中，表达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概貌。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而他却坚持认为，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些构想，就是不断革命。持不同意见的人，就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想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在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障碍，并且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认为必须清除这种障碍。同时，毛泽东以他自己的斗争经验，感到中国有被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危险，要使全党，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得到反复辟的锻炼。但是，他采用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方法，期望进行一次认真的反修防修大演习则是错误的。结果造成一场长时间的动乱，造成各方面巨大的损失，这是事与愿违的。

在浓厚的个人崇拜风气下，共产党的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集体领

1967年2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以至被破坏，使党丧失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通过长时期的宣传教育，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社会思潮。就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的号召和推动下，“文化大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就席卷全国。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对京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文艺学术领域的政治批判运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江青取得毛泽东同意，于同年2月间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共同策划，由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执笔写成的。整个写作活动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都不知道。

《海瑞罢官》是著名明史专家、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个京剧剧本。目的是配合毛泽东关于要宣传明朝著名官员海瑞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精神的倡议。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却把《海瑞罢官》中所描写的“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海瑞罢官》是1960年底写成的，竟然反映了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江青等为了政治需要，连最起码的事实都置之不顾。

这篇蛮横无理、点名批判的文章发表后，当时并没有人要求全国报刊转载。除江青等人外，也没有人知道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因此，除华东各省市报纸迅速转载外，10多天内北京和其它省市报刊均未转载。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迅速在全国范围展开。到1966年初，扩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教授、学者、专家的文章，形成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政治批判运动。面对这种形势，各方面要求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经刘少奇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后，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提纲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遂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党。这份简称为《二月提纲》的文件，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约束，把它置于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还指出，讨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利用，挑拨性地歪曲为是针对毛泽东的。

在中共中央研究和拟定《二月提纲》的同时，江青去找林彪密商后，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起草了一份会议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审定，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批转全党。这份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极力抹煞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武断地判定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所谓“黑线专政”的说法，很快扩展到其它许多部门，助长了“怀疑一切”思潮，为进行“一个阶级推

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制造了某种依据。这份《纪要》反映了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社会上进行声势很大的政治批判的同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中央内部，接连发生震动全党全国的事件。在不到半年内，在党中央身负重责，分管党务、军务、宣传、机要等重要部门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受到不公正的揭发批判，实际上被停职或撤职。党内党外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时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上述讲话内容。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中央文革”的前身。

在此期间，“革命大批判”的势头愈来愈猛。对吴晗的批判，株连到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以显著地位发表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署名文章。这两篇杀气腾腾、锋芒直指中共北京市委的文章，识者均能看出其来头很大，暴风雨就在后边。林彪后来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这段话的论断虽然是错误的，但从中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发动批判《海瑞罢官》的意图和那段历史发展的轮廓。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的内容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揭发批判，只不过是会把会前分别对他们的错误批判，拿到更大范围的中央正式会议上来进行。会议对一些身负党政军重责的中央领导人进行的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似乎证明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从而使全党产生资产阶级复辟危险迫在眉睫的严重错觉。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的内容是针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而实际上是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方针、政策，成为一份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说，因为这些人“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严重背离实际的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并据此规定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事实上，建国以来，文化领域各界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在一定期间存在的问题，有右的错误，但主要是“左”的错误。认为当时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需要进行全局性的夺权斗争，这完全是主观臆断。而且把文化领域的夺权，同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联系在一起，发出我们已面临党变质、国变色的现实危险的警号，要求通过以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去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更是极端错误的决断。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打乱自己，自己否定自己，混淆敌我和是非，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大内乱和大灾难。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制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他煞有介事地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这些耸人听闻的话，在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造成了人人自危、极度恐怖的气氛。林彪在讲话中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他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这些粗暴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把个人崇拜鼓吹到极端的话，对会议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表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观点，已经为党中央所接受。在党中央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对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文件，很难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讨论。面对文件中那些康生在会上讲明的毛泽东手笔，只能采取毛泽东所肯定，林彪所提倡的“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态度。同时，限于当时的条件，包括毛泽东在内不可能有人能料到“文化大革命”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地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接受了《五·一六通知》，从而接受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决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已经占了统治地位。

就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引发了一些联想。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的轮廓。他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如同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那样，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毛泽东的“天下大治”的设想。这样的设想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曾多次加以阐发。实现这些设想，看来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种目标。“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最高指示”广为传播，它所包含的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相抵触的要求和观点，曾经在许多方面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

中央政治局5月会议后，按照《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

委之下”的规定，中共中央于5月28日发出通知，宣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江青又具有特殊身份，因此，从一开始它的工作就撇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

《五·一六通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旋即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并通过报纸社论，把它的内容传播到社会。“文化大革命”作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随之开始。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张具有尖锐政治性质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大字报贴出后，当即受到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强烈反对，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6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革命简报》上看到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全文，他在文旁写了批语：“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还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通知此事。当天，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于5月31日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人民日报》在刊载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诬指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同时，经毛泽东同意，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并发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的社论，宣称“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上述一系列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在高等学校师生中，群议纷纭，莫衷一是，开始出现混乱和对抗。

从6月上旬开始，北京和各地部分青年学生出于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基层党委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的目标，不能进行正常的领导工作。许多学校、机关、工厂发生严重混乱现象，纷纷要求上级派人加强领导。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依照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作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先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许多省、市也相继向本地区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

采取派工作组领导运动这种传统的作法，目的显然是希望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试图消除许多基层单位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但是，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各单位群众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向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态度也不同，因而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造反派”（亦称少数派）和保守派（亦称多数派），并且展开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两派斗争之外，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因此，工作

组未能真正扭转愈来愈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的困难地位。

为了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中共中央早在6月3日就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各地工作组在贯彻中央指示的过程中，虽然得到了“多数派”的拥护和支持，却遭到“少数派”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抵制。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社论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篇社论进一步激发了群众中的“革命造反精神”。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人避开工作组，乱揪乱斗40多人，其中有党团干部和教师、学生。斗争时，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的现象。工作组在向党中央反映这一事件的简报中指出，这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已被坏人利用，并规定群众要求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党中央于6月20日转发了这份简报，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一个多月后，这份简报被撤销，并成为刘少奇的一条罪状。

工作组按照“八条指示”和中央批发的简报精神，对乱揪乱斗的现象加以制止，从而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支持和挑动下，发生愈来愈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或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却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25日，他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的，后来不赞成了。”这表明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看法也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而在这次会上，他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于7月28日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党内关于派工作组的争论，实质上是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对“乱”的不同看法。

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对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动乱怀着忧虑，希望能保持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要求对猛烈发展的运动有一定的约束，派工作组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的一种措施。刘少奇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说，陈伯达自6月中旬以后曾三次提出不派工作组或撤出工作组，党中央“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

张承先为改组后的北京市委经毛泽东批准派往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

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先是同意派工作组的，最早派出的工作组是经过他批准的。而到6月中旬，他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不忙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不怕乱。毛泽东在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谈到他对“乱”的看法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他认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的这个关于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所谓右派的想法，就是要发动亿万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形势，借以打倒被他认为是已经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和国家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可是在当时，党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并不知道他的这些想法。在7月29日召开的“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表现出忐忑的心情。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都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要怎样进行和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个人专断下形成的反常现象，也反映出“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特点。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煽惑不明真象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青年干部，冲击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制造社会动乱，妄图实现“乱中夺权”。林彪在8月8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中，公然声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揽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乱”，当时解释为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个逻辑是很难解释通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政权为人民所掌握，发生动乱只能是乱了人民对国家的治理，造成各方面工作的损失和破坏，这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的道理。

在全国呈现动乱的形势下，为了制定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排除所谓“运动的阻力”，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会议开始的8月1日，刘少奇在大会上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对派工作组问题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插话，指责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在8月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并且令人震惊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他宣布：“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这个会议突出地表明，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已经完全不能平等地讨论问题，一切听命于一个人。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并且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

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地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大字报原稿是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写在一张1966年6月2日《北京日报》边空上的，文后注有日期，经誊清后，由他于8月7日凌晨修改并加标题，当天印发全会。写这张“大字报”显然不是很严肃的。以派工作组为直接依据，而追溯到1962年以来党中央在指导方针上存在的某些分歧，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这完全不能令人信服。而恰恰是这样一张“大字报”，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进军的号角。”8月17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发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迅速传遍全国。“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省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浪潮由此而起。事实上，刘少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的工作都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都是对党和毛泽东公开的，他的重要论著在正式发表以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他在言论中和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过的，他并没有坚持。至于党中央对干部的任免，也不是由刘少奇个人而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的。因此，经过“文化大革命”揭发批判10年之久，也没有能够证明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以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没有，也不可能对“走资派”这样的非科学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因而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必不可免地把斗争目标普遍地引向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在敌我关系上的混淆，是《十六条》的一个根本性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十六条》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文件还提出要“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但是，同样没有能够提出明确的划分左派、中派、右派的标准，从而加剧了群众中已经发生的分裂和派别斗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说：“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后来又提出“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的论断。把派别和派性合法化，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提倡“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即所谓“四大”、“大民主”。实践证明，作为整体，它从来没有起到过积极作用，而只是带来混乱和破坏。《十六条》公开号召“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些助长自发性和过火斗争的要求，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乱揪、乱斗、乱打的情况下，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运动很快失去控制，民主和法制遭到肆意践踏。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十六条》虽然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坚持正确的领导”等字句，但是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这就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留下了通道。

《十六条》也有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群众”等，但是以后证明，这些只是附带提到的软弱无力的规定，由于它们是同鼓励用“大民主”的方法向所谓走资派造反的主体规定互相矛盾的，这些规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并没有产生任何约束力。

会议自8日起，转入了对刘少奇等的揭发批判，气氛更加紧张。最后一天，8月12日，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这是会议中间临时加上的议程。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林彪的名次排列在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刘少奇则由第二位排到第八位。陈伯达、康生进入政治局常委。全会没有改选主席和副主席，而会后任何文件以及报刊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仅把林彪称为党中央副主席。

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完成了正式的组织手续，“文化大革命”就强加给全党和全国了。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审查和批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完全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开展起来的。

二、大动乱局面的形成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从政治、组织上解决了所谓“运动的阻力”问题，而要把“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全国，还需借助一定的形式和某种社会力量。因此，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得到了毛泽东极大的支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青年学生被认为是“勇敢的闯将”，《十六条》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种过分的评价，对鼓动大批青年起来“造反”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助长了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狂热性和盲动性，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红卫兵运动集中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早在1966年6月间，北京的一些中学就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当时，对于发展这样的青少年组织是否适当，在学校中和社会上都有争议，一度还受到压制，因而没有得到多大发展。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并且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这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很快传遍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表达了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从学校扩展到各行各业，迅猛发展，势如燎原。

伴随着红卫兵运动而兴起的，是全国大串连。“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支持大串连的目的，显然是鼓励广大青年奔赴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进行数以千万人计的全国性的大串连。截至1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在大串连期间，全国交通异常拥挤，各大中城市社会秩序紊乱，直接影响了生产和人民生活。这是全国大动乱的前奏。

引自陈伯达 1966年10月16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红卫兵运动的内容最初是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北京和全国各地红卫兵“冲向社会”、“走上街头”。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并采取了许多过火、粗暴的行动。很多街道和老字号店铺的名称，被改为“东风”、“反修”、“红卫”一类千篇一律的名字。全国各地著名的寺庙、教堂、陵墓、雕塑等，除极少数受到特殊保护外，几乎全部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甚至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许多地方，如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孔陵，也遭到严重破坏。

一部分红卫兵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实行揪斗、体罚、抄家。当时，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被当作“黑帮”、“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抄家；大批自然科学家、医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著名的教授、编辑、记者等，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抄家；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教师、劳动模范被当作“保皇派”、“黑爪牙”、“牛鬼蛇神”来批斗。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到1966年9月底，被抄家的达33600多户；上海仅从8月23日到9月8日半个月时间，被抄家的达84200多户。北京的抄家物资中，有大量的文物图书。康生趁机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30多次，拿走大批珍贵文物、善本图书，据为己有。总计被康生和林彪、江青一伙窃取的图书达34000多册，文物5500多件。

在“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红卫兵运动随后就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炮打”、“炮轰”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围困、进驻、揪斗等方式，使各地党政领导机构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除野战部队外，都停止了活动，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

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法制的作法，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不同程度的抵制。红卫兵组织中间也由于观点不同和权利之争，开始发生分裂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名目的派别旗号，并各自争取一部分群众，展开了剧烈的派性斗争。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抵制，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和内讧，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过。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社论要求“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由此，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又顷刻刮遍全国。

在这场批判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干部被指责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5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在这份经中央文革小组修改，并经毛泽东审定批准的指示中，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来京的10万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张春桥在大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批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这就正式把党组织的领导排除于“文化大革命”之外，使“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合法。在紧急指示的冲击下，掀起了“造党支部反”的浪潮。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负责人普遍受到批斗，党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一

些省市领导人被迫频繁转移驻地，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勉力维持社会生活运转。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被否定，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演变为一场长时期内乱的症结所在。

为了推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中共中央于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把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把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抵制，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否定党的领导，助长自发性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主张，歌颂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在会上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他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旨在把斗争的锋芒，明确地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

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经毛泽东批示：“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这就掀起了全国性的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使无政府主义思潮更为泛滥，加剧了“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的势头。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号召，是在10月初“全国大串连”高潮中提出的。经中央工作会议予以肯定和强调，在江青等的鼓动和指使下，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到处“点火”，批判运动的范围迅速扩大，工交企业和广大农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本来，按照中共中央原定部署，“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工交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为了贯彻这样的部署，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7月至9月曾多次发出通知和规定。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下，这些通知和规定完全失去了效力，整个工农业生产战线开始呈现混乱状态。为了正式改变中共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原定部署，根据毛泽东的意向，中央文革小组先后拟定了对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指示（草案）。

在1966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主持召开5部7市（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参加座谈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并一致认为，由于生产不能中断，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应与文教部门、党政领导机关有所区别；主张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由党委统一领导，仍应分期分批进行，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单位与单位间进行串连；要求采取措施，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则如周恩来事后所说，“基本上是全盘否定”，“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处于生产第一线的领导干部，为了防止经济建设遭受更大破坏，不顾自身安危，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真话，报实情，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一场试图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斗争。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汇报，讨论通过经陈伯达主持修改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江青在会上指责工交战线的领导人“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的

那一套玩艺儿，我看不在这场大革命里搞，没有办法”。康生说：“工厂存在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存在的问题少”，“现在的工厂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工厂。”张春桥攻击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看不到工厂企业里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彪在总结讲话中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强令工交战线“现在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指责陶铸关于维护生产秩序的主张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通过了《工业十条》。这个文件于12月9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正式改变了中央原定部署，决定在工交企业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文件还规定工人可以在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本市进行“革命串连”，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学生也可以到厂矿进行“革命串连”。由此，“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部门，并且同大、中学校学生联结起来。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迅速向农村蔓延。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其中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从而改变了原定的在四清运动中结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部署。还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开展“四大”，社队之间可以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广大农村。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猛烈冲击下，“文化大革命”横向发展，迅速扩大到工交企业、财贸部门和广大农村。《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的发布，是造成全国大乱局势的一个严重步骤。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干部首当其冲，大批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尚能坚持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又被纷纷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是迫害干部的首恶。在他们的指使下，从12月起，在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随后，又把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陶铸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下，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尽力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专家学者。但是，他的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摧残。“文化大革命”既经发动起来，它就不可避免地带着巨大的破坏力量，继续恶性发展。

三、全国性的全面夺权

全面夺权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过程。经过几个月的“炮打司令部”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已濒于瘫痪。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无异是发布全面夺权的动员令，而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则是全国全面夺权的发端。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1月6日，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这次大会以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领导权力落到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人的手中。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月8日，他在一个会上谈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问题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1月14日山西、1月22日青岛、1月25日贵州、1月31日黑龙江先后宣告夺了省、市委和人委的党政大权。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上面下面、城镇农村、各行各业的普遍夺权，造成全国性的大动乱局面。

全国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社会动乱加剧，生产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损害。在整个社会生活陷于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军队被推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不久，军队任务扩大为“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当时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军队做了大量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执行了“左”的指导方针。军队奉命支持“左派”，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这一派那一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使工作中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通过“三支两军”，军队全面参与地方工作，直接卷入地方的派性斗争，在一段时间内，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使地方和军队都受到损害。

全国全面夺权造成的严重社会动乱，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老一辈革命家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注，代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志，挺身而出，进行抗争。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2月11日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原定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讨论中提及军队状况时，叶剑英愤而起立，对着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叶剑英责

问道：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这次会议在争论中无结果而散。

2月16日继续开碰头会，斗争更加激烈。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针对中央文革一伙假借群众名义残酷迫害干部的惯伎愤怒地质问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李先念责问道：“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谭震林在发言中怒不可遏，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劝阻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两次会议，被江青等诬称为“大闹怀仁堂”。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以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把他们同王明、张国焘联系起来，责备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并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请假检讨”。从2月25日至3月8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猛烈批评这些老同志，并把老同志们的正义抗争，诬指为“二月逆流”。江青一伙借批判“二月逆流”，于3月间开始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使全国全面夺权发展得更加剧烈。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在“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中，江青、康生一伙煽动追查干部历史问题，扩大了对干部打击和迫害的范围。早在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刘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在他们暗地唆使下，全国各地一些红卫兵组织就开始了“抓叛徒”的活动。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批示说：“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批示认定“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刘少奇、张闻天作出了“叛变的决定”。

这件事的真象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当时，在《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宪兵团退出北平，有了营救出一批被捕党员的可能。在刘少奇主持下，北方局作出要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张闻天征得中央其他同志同意后，代表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薄一波等61人于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分9批履行了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这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这些同志在牢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拒绝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一直坐到1936年，这时完全是奉组织指示履行程序出狱。这批党员出狱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这一段历史，中共中央早就进行过多次审

查，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江青、康生等故意将这件事加以歪曲，借以彻底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扫除全面夺权的一些障碍。

在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唆使下，一时间“抓叛徒”形成热潮。各地的“抓叛徒”群众组织和各种各样的专案组，把干部中已有正确审查结论的历史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他们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等重大冤案。许多过去在敌人统治下英勇斗争、功绩卓著的老同志；许多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作了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统统被加上“叛徒”、“特务”等罪名遭受惨酷迫害，有些遭摧残致死。

1967年5月以后，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由她直接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随意捕人，刑讯逼供，制造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戚本禹于7月18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从此即剥夺了刘少奇本来已是范围很小的行动自由。8月5日，以庆祝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一周年为名，又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7、8月间，在江青一伙的煽动和支持下，北京和外地的上百个群众组织，组成了数以万计人参加的所谓“揪刘火线”，夜以继日地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持续时间达1个多月。

在北京发生的这类围困、冲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严重事件，迅速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全国各地大批判的打击面愈来愈广，揪斗干部的手段愈来愈狠。派性斗争由“大字报战”、“标语口号战”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使用的武器从原始的棍棒刀矛直到现代化的机枪大炮。互相把对手呼为敌人，把抓到的对方人员呼为俘虏。对干部群众的人身迫害从“戴高帽”、“喷气式”等形式，发展为各种摧残人身、侮辱人格的暴行。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和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忧心忡忡，并以不同形式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的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即“七·二事件”），从主要倾向看，就是群众性的抵制“左”倾错误的一场斗争。

林彪、江青一伙借发生“七·二事件”之机，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所谓“文攻武卫”。一时间，中国大地确实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公然提出“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以煽动武斗。7月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就在此期间，报刊公开提出“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队领导机关的浪潮。8月上旬，在上海、南京、常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在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社会秩序紊乱不堪的情况下，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却于8月7日发表讲话，煽动在全国“砸烂公检法”。他说：“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同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旋即发生封闭外交部党委，砸烂外交部政治部，以外交部名义向驻外机构滥发指示等严重事件，并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办公楼等一系列严重涉外事件。在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专政机关被打乱的情况下，许多地区连续发生抢银行、抢仓库、劫车船、冲监狱等恶性案件。在

全面内战中，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动乱不堪的局势下，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调查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不同场合作了多次讲话。他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最混乱的这一段期间，对形势作出这样的估计，显然与实际相去甚远。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乱的独特看法，以及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主观想法。但是，动乱的局面已有失去控制之势，他也不得不略加约束。因此，他在讲话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他提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告诫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谈话的纪要于10月7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这对于减轻受迫害干部的压力，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抑制严重混乱局面，毛泽东还批准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关、戚”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的“左派”，是制造动乱的“前线指挥”。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显然是给“造反派”的一种警告。9月5日，毛泽东批准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9月13日，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在这期间，毛泽东还作出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部门实行军管。他还批准发出多项布告、通令等，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交通运输，抑制武斗蔓延。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时间收到一点效果，但不可能根本改变“文化大革命”必然伴随的动乱局面。

当时，为了稳定局势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是宣布“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学校即“停课闹革命”。大批青年学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参与了社会各方面的夺权活动和派性斗争，并起了领头和骨干的作用。一些著名学校的群众组织，还成了当地派性斗争的指挥和联络中心。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由于当时动乱局面还在发展，相当多的学生仍散在社会没有返校，学校本身的派性斗争正烈，教师和干部还受到批斗和审查，因而这一通知没有发生多少效果。学校秩序继续混乱，武斗仍在蔓延。

1968年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在一度发生对抗后，工人控制了全校的局势，这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不久，这

种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党政财文各机关单位。工、军宣队实际上也是一种形式的工作组。工、军宣队的进驻，对于抑制武斗、缓和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工、军宣队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方针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它本身也存在对进驻单位情况不明，成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弱点，在工作中也犯了许多错误。

“复课闹革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当时有 1000 多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分配。这些毕业生不离开学校，必然影响招收新生的工作。面对这些问题，也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 1600 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内地和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当然，这些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而是广大知识青年在逆境中奋斗的成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 100 亿元。实践证明，这种以下乡插队为主要形式，采取政治运动方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国家、对农民、对知识青年都不利。

随着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红卫兵已经实现了“文化大革命”需要的“点火”、“冲杀”等实用价值，此后就名存实亡了。进入 1968 年，大动乱的局面从全国看有所缓解，但“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各种矛盾仍在发展，新的斗争不断发生。尤其是违背人心的全面夺权，激发了普遍不满和不同形式的抵制。这被认为是必须加以打击的“右倾翻案的妖风”。

1968 年 3 月，林彪、江青又罗织罪名，将抵制他们指示的杨成武（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司令）撤职，同时任命黄永胜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3 月 25 日，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吴法宪分别任正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集团完全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1968 年 9 月 5 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日宣告成立。自 1967 年 1 月上海夺权到这时，经历了 20 个月反反复复的全面夺权，全国（除台湾外）29 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取代了原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成为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层次的集权，这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倒退。当时的报刊大肆宣传，认为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全面夺权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 年比上年下降 9.9%，1968 年比上年再降 4.7%。政治上、思想上遭受的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召开九大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进行了各项准备，其中最主要的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早在 1966 年 12 月 18 日就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

直接控制和指挥下，对刘少奇进行秘密审查。他们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象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1968年9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刘少奇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中央委员刚从被隔离审查的地方放出来出席会议，一些中央委员在会上继续遭受诬陷性批判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

毛泽东在8月13日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大家讨论一下：究竟“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占主要的，还是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林彪、江青等借着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在分组讨论一开始时，就组织围攻参加了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江青、康生等把“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乱军”、“搞修正主义”等罪名强加给受批判的老同志，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交代和检讨。这种以势压人的批判，给会议造成了极度紧张的气氛。

全会在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已明确赞同专案组的审查意见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上述审查报告和附件，于11月下旬以中央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最终铸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件冤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达2.6万多件，祸及2.8万多人。刘少奇于1969年10月17日被押往开封，11月12日含冤病逝。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并通过公报而昭告于世。会后，立即展开了广泛的“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的“革命大批判”，目的显然是要通过刘少奇大规模的、公开的、指名的批判，进一步把“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搞臭，更加广泛地宣扬“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左”倾错误思想。这一场“革命大批判”时间很长、范围很广、作用很坏，造成了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各方面极大的混乱。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议程是：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系统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左”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等任务。报告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党的“基本路线”，而对于党应该怎样去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未加论列。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明文写上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和毛泽东

的接班人是林彪的内容，直接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章还取消了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使广大一般党员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大会选举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占 19%。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一些骨干和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成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4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了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主要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

召开九大并没有像毛泽东预计的那样使“文化大革命”趋向结束，反而由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和地方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和他们之间日益加剧的争权夺利，酝酿着更加尖锐的斗争。

中共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把“斗、批、改”这样具体化，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以达到他“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包含着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产物，又是全面贯彻“左”倾方针的手段。因此，随着“斗、批、改”的推进，“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并没有消停，矛盾反而愈来愈多，引起和助长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在这个斗批改阶段，进行了全面的整党建党。这次整党建党的方针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当时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领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不提，这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在建党过程中，许多帮派头头、打砸抢分子涌入党内，造成党组织严重不纯。

在这个“斗、批、改”阶段，还进行了所谓“教育改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已长达 4 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 2 至 3 年。课程设置为：“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在教学工作中，还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改革”带来的恶果是；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被破坏；学员入

学时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上大学成风，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

1971年4月至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在这个《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完全脱离实际的“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中共九大后，全国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工作取得进展。1969年基本上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和科技项目取得了成就。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经济建设和科技取得的成就，表明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下，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克服万难，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

这个期间，经济工作也有失误。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拟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1970年以后大幅度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大量增加职工，导致1971年底就出现“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资金投放和物资消耗增加过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产品质量明显下降，各种事故增多。面对这种情况，又不得不再次调整。

中共九大后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斗、批、改”，因林彪事件的发生而中断，以后也实际上没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四、林彪政治阴谋的败露及其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问题已经解决，转而把考虑重点放在政府的重建方面。而要重建政府，修改宪法和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成为当务之急。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成是夺取更多权力的机会。这个集团本来就是以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步形成的。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居于“副统帅”的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了顶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黄永胜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担任副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日常的军事领导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这时与江青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随着林彪集团权势的扩大，他们的野心也恶性膨胀。他们阴谋凭借在组织上占有的优势，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不顾毛泽东明确的意见，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实是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叶群对吴法宪说过：

“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李作鹏也公开说，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较合适，因为他是副统帅，又是接班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工作的会议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全体会议上抢先发表讲话。他强调宪法草案的特点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林彪在这里使用“无产阶级专政元首”的提法，显然是改换另一种用语，表达他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在讲话中，反复称颂毛泽东的功绩，批驳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的观点，并且说：“毛泽东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的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矛头是对着江青集团。因江青集团探知毛泽东不赞成称他是“天才”而反对林彪的观点。这篇讲话，对于林彪集团的成员来说，无异是一个发难的信号。

8月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一份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他们在发言中，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但是用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攻击江青集团，并以华北组《简报》的形式，扩大影响。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对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贬低毛泽东思想、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表示了极大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从而造成了一场混乱。

8月25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告状。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全会即告中断。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陈伯达鼓吹天才“欺骗了不少同志”，包藏着野心。全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

全会于9月6日恢复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全会于当日闭幕。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矛盾和斗争达到了高潮。在这场较量中，林彪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妄想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12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华北会议，在1个多月的会议期间，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宣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1971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对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从4月15日开始，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会上作了检讨。4月29日，周恩来代表

中央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黄、吴、叶、李、邱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同日，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

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宗派势力濒于瓦解，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早在 1969 年 10 月，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0 年 10 月，林立果秘密组织武装政变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 年 3 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 工程”纪要》。

正当“联合舰队”积极准备发动一场尖锐斗争的时候，1971 年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在与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这样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把林彪视为接班人，而且认为林彪已充当了反对他自己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于 9 月 5 日、6 日接到他们亲信的密报，得知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陷于极大的恐慌。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 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即周宇驰，当时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份手令赶到北京，进行了具体部署。他们密谋在华东地区用地面攻击、爆破铁路桥梁、飞机轰炸等手段摧毁毛泽东乘坐的专车，置毛泽东于死地。同时，他们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9 月 3 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原计划在杭州住到 9 月下旬。当他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即引起警惕。9 月 10 日下午，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12 日下午 6 时许，安抵北京站。毛泽东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所采取的机智措施，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无法实现而破产。

9 月 11 日晚，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12 日，他在北京指挥“联合舰队”骨干，仓皇准备飞机，拟定名单，妄图于 13 日晨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核心成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林立果于 12 日晚 8 时许私调专机飞抵山海关机场，立即乘车赴北戴河与林彪、叶群会合。

9 月 12 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10 时 30 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山海关等异常活动的迹象。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的事，并下令将飞机马上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阴谋已难得逞，于 9 月 13 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摔死。“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

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用党章肯定下来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新擢升的6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不对？“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效果？等等。“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五、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及其受挫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消除和减轻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9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军委日常工作。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传达。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第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可惜的是，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是，他没有从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没有在这个转折关头毅然宣告结束这场悲剧性的“大革命”。毛泽东仍然从他固有的公式出发，认为林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事件是激烈阶级斗争的表现，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他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延长和加深了“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

在协助毛泽东消除和减轻林彪事件影响的工作中，周恩来为纠正“左”倾错误作了极大努力，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周恩来着重抓了企业整顿工作，恢复和健全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经过整顿，1972年工业比上年增长6.6%，1973年比上年增长9.5%。

在农村工作方面，也着手纠正一些“左”的弊端。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73年农业总产比上年增长8.4%。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周恩来抓住时机，从全局上推动这项工作，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此后，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在外事工作方面，这个期间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断和周恩来的努力，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和发展同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关系。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

数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在对抗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到1972年底，还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

在这个期间，周恩来对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工作，也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要求，推动了这些部门的工作取得进展。

周恩来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过程中，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上和其它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正是由于抓住了批判极左思潮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使当时各方面工作出现了转机。

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恶劣影响而作的努力，遭到江青一伙的反抗。他们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组织撰写的一些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进行攻击，还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右倾回潮”。显然，批极左思潮，触及了江青一伙蓄意鼓吹极左思潮，赖以乱党乱国的要害。

在周恩来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他认为批极左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不能容忍的，因而他作出只批极右，不允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下去。周恩来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议程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深入地、具体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总结必要的历史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并且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十大把“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即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尽管毛泽东要求：“希望这一次十大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但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团结胜利是不可能相容的。大会选举了195人为中央委员，124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不少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1973年8月31日，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更得到加强。这在客观上为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条件。

中共十大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再一次作了充分肯定，但自“九·一三

事件”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厌倦和怀疑情绪仍然在增长。周恩来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虽然被打断，但已经显示了人民群众对纠“左”的广泛支持。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出现“复辟倒退”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忧虑。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在谈话中，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篡夺权力的主要障碍。毛泽东的谈话，使他们认为有了反周的武器。1973年10月，江青等在他们直接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11月间，他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周恩来的所谓右倾。江青在会上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指责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于是，他们炮制了一份名为《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经毛泽东批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等人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内容，既不是认真地批判林彪的各种罪行，也谈不上是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而是借批孔影射主张纠正“左”倾错误的周恩来，以及得到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的一批老干部。江青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就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暗示“大儒”就是周恩来。

“四人帮”打着开展“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北京两次召开动员大会；以江青个人名义给军队、地方一些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送材料，煽动“点火放炮”、“夺权”；江青亲自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在军队领导机关制造混乱。在他们的煽动指挥下，到处揪斗老干部，拉山头，打内战。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一些人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口号，煽动停工停产。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重新打倒，或自动离开岗位，或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使许多地区和单位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批林批孔”运动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据1974年1月至5月统计，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3.7%。由于生产下降，影响到财政收支不平衡。1月至5月与去年同期相比，收入减少5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

毛泽东当时追求两个目标：保卫文革的成果，实行天下大治。这是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为了捍卫文革成果，他必然站在江青等一边，对周恩来等不满；而为了求治，他又不得不依靠周恩来等老干部，抑制“四人帮”的活动。因此，毛泽东虽然支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对可能引起新的大动乱的因素也极为关注，并尽量避免。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进行篡权活动有所察觉，并对他们进行了有重要意义的批评。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

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些批评，虽然只是针对某些作风问题，但明确地提出了“四人帮”问题，也使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四届人大，必然要讨论和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安排和调整。“四人帮”意识到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不顾毛泽东的批评，加紧了阴谋活动。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极为不满。在10月17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借题发挥，就当时一艘国产轮船顺利远航罗马尼亚返回上海一事，指责国务院，声称进口船只就是“崇洋迷外”，矛头直指周恩来和国务院。他们在会上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要邓小平对“风庆轮事件”的处理立即表态。江青气势汹汹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中间立场呢？”邓小平严正地回答：“这是强加于人。”“我要调查！我要调查！”张春桥站起来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在“四人帮”的围攻下，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政治局会议不能继续开下去，无结果而散。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对江青一伙进行了多次批评，重申总理还是总理，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这对于挫败“四人帮”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展示了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一宏伟奋斗目标，虽然预定的时间过于急促，但这次大会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这都给了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人民的希望。

六、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和斗争的反复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不顾刚刚出来工作的困难处境，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多年动乱造成铁路运输长期堵塞，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

周恩来于1972年5月间发现患有癌症，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1974年6月1日病情加重，住院作第一次手术。此后即未出院，坚持工作直至逝世。

生活。为了改变这种严重局势，中共中央于2月下旬召开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邓小平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使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以外，都超额完成计划。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邓小平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4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第三，必须落实政策。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钢铁工业的整顿立见成效，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其它工业和农业也进行了整顿。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反映了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这期间，对于军队、科技部门和文艺界也进行了整顿，都取得了初步成效。

邓小平主持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实际上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方针。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是支持的，但也是有限度的。他历来不允许别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这就使整顿工作一开始就存在很大局限和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

为了深化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并且说按劳分配，带有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限制。于是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四人帮”乘机抓住各种题目，贩卖他们的私货。在他们的指挥下，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察觉。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27日和6月3日又两次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

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能扼制的，他们仍然寻找机会，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自己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四人帮”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又在全国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运动。

毛泽东同意评论《水浒》的主旨，看来是以古喻今，借以证明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但是，江青等又从中生发出另一个题目。8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等一些亲信开会。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

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以此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她把四届人大后安排一些老干部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工作，诬蔑为“收罗土豪劣绅占据重要岗位”。毛泽东得知后，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制止了他们的活动。

在这期间，一方面邓小平主持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努力纠正某些“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在“四人帮”把持下推行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运动，对整顿进行顽抗。这种整顿和反整顿的斗争，明显地带有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性质。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同志的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扼制；由于人心思治，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受到抑制；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左”的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对此，“四人帮”疯狂反对，毛泽东亦不能容忍。

毛泽东自1971年冬身患重病。1975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根据他的意见，由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处于这种状况，使他更加不能准确地了解全面情况。“四人帮”、毛远新等所作的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题目是同邓小平“讨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评，并以政治局名义，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接着，因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两封来信，反映毛泽东支持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调查解决。毛泽东认为这两封信动机不纯，是想打倒退群、谢静宜，矛头是对着他（毛泽东）本人的；邓小平转信是偏袒和支持这种行为，于是，在全国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局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肆意批判，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用。一些地区闹派性和武斗重新泛滥，造成停工停产，交通堵塞。全国再度陷于混乱。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积聚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通过天安门事件迸发出来了。

七、人民的抗议运动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闹声中，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与人民为敌，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广大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月4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层层传达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

4月4日晚，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决定从当晚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对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进行镇压。

4月5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被撤走，诗词、挽联、条幅被撕下拿走，一些自愿彻夜守护花圈的群众被逮捕。对此，数万群众陆续聚到天安门广场表示抗议。晚上9时30分，1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已经持续近10年的“文化大革命”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发了人民长期积压在心中的强烈怒火，在天安门事件中形成总爆发。这次抗议运动，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但是，“四人帮”仍不迷途知返，一意孤行。在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全国人民积极支援救灾斗争的时刻，他们却胡说什么“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抓抗震救灾工作“是以救灾压批邓”。江青擅自印发整顿期间由邓小平指导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稿，诬蔑为“三株大毒草”，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全国批判。“四人帮”与人民为敌的面目，已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恶痛绝。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批判，遭到广大干部、群众广泛的、公开的抵制。

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并且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中共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布置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信”，有的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挑起这副重担”，为江青上台造舆论。他们企图以上海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力的基地，作了包括武装暴动在内的许多布置。

“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们十分焦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向叶剑英表达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愿。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痼疾。经与叶剑英、李先念商定后，决心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住所宣布执行这一决定。对“四人帮”在北京的死党，也同时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不到一个半小时，千夫所指的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力量就被彻底粉碎了。当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于7日晨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与此同时，“四人帮”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遭到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抵制，也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全国一片欢腾。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毛泽东始终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交给“四人帮”，并对他们进行过批评和揭露，减轻了在这场尖锐斗争中的困难。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持续10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最为丰富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教育质量普遍下降，文盲大量增加，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泛滥开来。“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全民族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直接的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

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反革命集团，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反革命集团，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后来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所存在的弱点、缺陷和弊端充分暴露，并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从反面给广大干部群众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促使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以自身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并以郑重、认真的态度，科学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从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取得了伟大的历史补偿。

第四章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宣告了长达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四人帮”终于垮台，全国人心大快。他们急切地盼望着尽快结束动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那些错误做法，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即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为此新的中共中央顺应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愿，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全国开展了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运动。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传达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12月10日起，又连续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揭露批判了江青等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公布了他们的历史问题及其极左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与此同时，全国普遍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各地的帮派头目和骨干分子，采取果断措施，予以隔离审查。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对于当时仍处于动乱中的少数地区，中央先后派出工作组，前往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秩序。到197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由于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逐渐形成了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全国局势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国家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调整了部分领导人，提出了新时期的任务。先后选举或任命邓小平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追认了1976年10月7日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并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并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8月1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接着，工会、妇联、共青团亦相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为清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各方面的影响，恢复正常秩序，逐步迈出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在政治战线和干部工作上，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较快的进展。1978年4月5日，中央还决定对没有摘掉帽子的10多万名“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到今年11月，这项工作在全国全部完成。

在经济工作上，努力扭转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发展国民经济。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务院便要求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郑州、兰州、成都、南昌、太原、昆明等铁路局铁路堵塞的问题。1976年12月和1977年4至5月，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铁路、煤炭、计划、冶金、交通等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整顿，一批企业的“老大难”面貌有所改变，生产上的混乱情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农业生产1978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突破6000亿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1977年比上年增长14.3%，1978年又增长13.5%。财政收入1977年比上年增长12.6%，1978年又增长28.2%，都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影响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当时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加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着“左”的错误，这就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间，指导思想上的是非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拨乱反正呈现了徘徊局面。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以后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他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张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还认为中央对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阻挠为“天安门事件”等冤假错案平反。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可能得到根本纠正，拨乱反正的工作不可能顺利进行，恢复老干部工作的进程不能不再拖延，旧的个人崇拜不仅没有纠正，还产生了新的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十一大，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但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完成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在经济工作上，这时本应集中力量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可是由于对形势缺乏全面冷静的分析，对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顺利的一面看得多，对当时的困难估计不足，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地提出一系列高指标，一味追求高速度，反而发生了“洋冒进”的错误。从1976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口号，过于乐观地认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1977年年底，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钢达到6000万吨，原油达到2.5亿吨。为了达到这些高指标，工业方面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

由于要求过高过急，安排任务过大，不能不采取高积累高投资的方针。1978年的积累基金比上年增长30.6%，而消费基金仅增长8.4%，积累率急剧上升到36.5%，成为“大跃进”后20年中积累率最高的一年。与此同时，还过急地引进了大量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了大批外债。所有这些，使“文化大革命”以来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更加比例失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为了尽快解除各种错误思想对人们的精神束缚，顺利地进行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在是否应坚持“两个凡是”的争论的基础上，从1978年5月起，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就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5月，他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也在不同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5月11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样，就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因而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使这场讨论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这是我国思想界、理论界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促进全国人民端正思想路线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后来改革开放的实行，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历史性的转折及拨乱反正的进行

经过了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之后，终于在1978年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次转折以这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在讨论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纷纷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决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应对天安门事件以及彭德怀等同志平反等6个问题。接着，许多同志又提出应为“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等问题进行平反，解决好历史遗留的问题。这样，会议便突破了原来设想的议题，把这次原定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变成了一次拨乱反正和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重要会议，从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好了准备。在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一致同意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会议深入讨论了思想路线问题，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正确解决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

放思想，“开动机器”。

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国民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国民经济管理体系的权力过分集中，这些问题应该在几年中认真地加以解决。会议还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

会议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还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少宣传个人；人人要遵守党的纪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端正了指导思想。会议不仅纠正了华国锋坚持的“左”倾错误思想，还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纠正和清理，从而结束了“左”倾错误长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始全面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会议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会议提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总的指导方针。因此，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也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这次会议之后，国家立即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

在思想理论上，系统地清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还要实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错误理论，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阶级斗争问题。重申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不应该缩小，

也不应该夸大。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掀起高潮。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即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以至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得到了平反。到1981年，中央和全国各地为29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平了反，并合理解决了为数更多的没有立案审查而受到错误批判和株连的各级干部、各民族群众的问题。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妥善安排，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调整、整顿和加强。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落实了各项政策，调整了社会关系。从1979年1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个人成份也一律定为社员；同时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为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家属落实了政策。从1979年11月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使原86万工商业者中的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原工商业者的成份也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除此以外，知识分子、统战、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也逐步得到了落实。这样，就使大批的人原被压抑的积极性被调动和发挥了出来。

在此期间，各民主党派重新恢复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被迫停止了的活动，并被肯定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恢复工作后，发挥各自的特长，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经济建设上，坚决清除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从1979年认真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到1982年，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逐渐协调。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有了较显著的改善。在经济调整中，中央还提出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并开始认真地探索。

在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战线上，拨乱反正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善。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加强了自身的建设，调整了部分领导人。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赵紫阳为总理。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9次会议，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主要错误，决定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

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决议对建国 32 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并肯定了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

三、改革开放的起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和经济调整，改革开放也迈开了步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最深刻的变化，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最令人瞩目的重要事件之一。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前，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主要是人民公社制，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和管理，在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工进行分配。这种管理上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严重平均主义的经济管理体制，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的生活长期没有多大的改善，有 1 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生活非常困难。

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安徽省有些社队在 1978 年秋季，就自动实行了“三包一奖，包产到人”或直接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当时，不少人对包产到户抱着怀疑态度，担心会导致资本主义。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明确对这种责任制给予支持。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对包产到户作了进一步的肯定，正式确认了它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合法地位，并提出凡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后来，又进一步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到 1983 年初，全国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达 93%，其中绝大多数是包干到户。

以双包为特征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实行以后，比较彻底地破除了人民公社体制中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端，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得欣欣向荣，不仅粮食产量有了较快的增加，还使农业结构得到改善，农村经济日渐活跃。与此同时，农民生活显著改善，长期以来低产缺粮、依靠国家大量救济的 240 多个贫困县，几年间大部分解决了或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的政治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行，中央对人民公社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1983 年 10 月下发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 1984 年底，全国已有 99% 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 9.1 万个乡（镇）政府，成立了 92.6 万个村民委员会。从此，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不复存在，农村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

在农村改革蓬勃发展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了试验和探索。一是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早在 1978 年 10 月，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就开始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到 1983 年，全国各地的工商企业普遍进行了扩权。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开始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的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开始实行政企分开。二是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

点。从 1981 年底开始，先后在湖北沙市、江苏常州和四川重庆三个大中城市进行试点。1984 年以后，各省、自治区也先后选择了一批城市进行试点。到这年年底，全国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达到 58 个。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提了出来。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指出，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因此，“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他认为：“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在实行以上改革的同时，国家还根据有利的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变了过去的封闭状态，大胆地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先后对广东、福建和天津、上海、大连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采取原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形式，以吸收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实行，为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任务。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胡耀邦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大会提出：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 1980 年的 7100 亿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2.8 万亿元左右。为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 10 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 10 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大会提出在经济工作中，特别要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

这次大会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一定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制度化、法律化。这些理论和任务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了。

大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通过了新的党章，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任务。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于 9 月 12、13 日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

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选举结果，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陈云为中纪委第一书记。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这次修改宪法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这个纲领，经济建设蓬勃展开。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都已提前或超额完成。

在“六五”计划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7%，都大大超过了计划增长4%的速度。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8%；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7%，这是建国以来农业发展最快的时期。

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其幅度之大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5年间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年均增长8.8%，超过计划增长4.1%的指标。其中职工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71.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每年递增6.9%。农民纯收入增加1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每年提高13.7%。

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1983年6月6日至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乌兰夫为副主席，彭真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丕显等20人为副委员长。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10人为国务委员。决定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选举邓小平为主席。同年6月4日至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选举邓颖超为主席，杨静仁等29人为副主席。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分期分批地进行整党。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集中讨论了整党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经过3年半的时间，整党工作到1987年上半年宣告结束。经过这次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但是，由于对党内不正之风的状况及其影响估计不足，忽视和放松了对不正之风等问题的纠正，致使纠正的措施不够得力，整党工作的进展不平衡，不少单位走了过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

农村改革的显著效果，启发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展。经过试点和探索，从1985年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改革试点的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个文件大胆突破了一系列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模式，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应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等等。

这个决定一个最重大的突破，是把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

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样，就从理论上纠正了长期以来排斥商品经济的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这个决定的指导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 1985 年起全面展开，除了对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资、外贸、基建等进行单项改革外，还进行了两项带全局性的重大改革。一是改革价格体系。国家采取了“放调结合，稳步前进”的方针。在价格形式上，由过去单一的国家价格改为国家牌价（固定价）、国家指导价（浮动价）和市场调节价（自由价）三种形式；在价格管理权限上，由过去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企业定价和自由定价三种方式，给了地方和企业一部分定价权。从此，就走上了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存的“双轨制”道路。二是改革工资制度。增加了职务工资和奖金等工资组成，推行百分计奖、浮动工资、定额工资、计件工资等多种分配方式，使职工的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成果及个人的劳动贡献紧密挂钩。

通过这些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所有制形式上，破除了过去急于求公、求成、求纯的“左”的指导思想，改变了单一公有制结构的不合理状况，逐步发展了城乡集体经济、个体和私人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开始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从 1978—1988 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经济从 80.8% 下降到 56.6%，集体所有制经济从 19.7% 上升到 36.4%，个体经济、私人经济、中外合资及外商独资等经济从几乎为零增加到 7%。这些经济成份，在搞活经济、满足人民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有制经济本身，也实行了多种经营方式，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提高了经济效益。

在经营管理形式上，改变了过去过于集中和经营形式过于单一的缺点，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把企业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根据企业特点、规模大小以及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作用的不同，对不同企业实行了不同的经营方式，如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发展新的股份制企业等等，逐步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到 1987 年，全国已有 80% 的国营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改革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层层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实行劳动用工合同制；改革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引进竞争机制，公开招标投标，实行劳动优化组合等。这些改革，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加强了职工的责任心。

在宏观经济管理形式上，逐步改变了过去国家经济管理机构分投资、分物资、直接下指令性指标的直接管理形式，开始向间接管理过渡。1984 年 10 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缩小了生产、流通领域的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下放了计划管理权限，增强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与此同时，还改革了投资体制，下放了投资审批权限，从 1985 年起将基本建设投资内财政无偿拨款全部改为银行有偿贷款；改革金融体制，恢复和建立了各专业银行及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

构相配合的新体制；进一步改革税收体制，在 1984 年实行利改税的基础上，从 1985 年起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体制，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在流通体制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独家经营的局面，实行多渠道经营和流通，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1984 年 2 月，国务院批准了改革商业体制的报告。从此改变了原有的日用工业品一、二、三级批发体制，建立了大批的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业、饮食、服务、维修网点大大增加，消费市场日渐完善。在此同时，生产资料市场也开始形成，物资交易市场和经营网点有较大发展。到 1987 年，全国已有贸易中心 2200 多个，城乡农贸市场 6 万多个，社会商业网点 1099 万个，物资经营网点 32 万个，物资贸易中心 644 个。

在城市综合改革上，改变了过去纵向封闭型的条块状管理体制，发挥了中心城市的功能，发展了各种横向经济联合。到 1987 年，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已达 72 个，开始形成一批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如以上海为中心由苏皖浙赣闽沪组成的上海经济区，以沈阳为中心由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三盟组成的东北经济区，以重庆为中心由川滇黔桂藏渝五省六方组成的西南经济协调组织等。据统计，全国已建立了 3.2 万个新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100 多个大中型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49 个跨地区、跨部门的横向经济联合网络。除此之外，国家还先后对重庆、武汉、广州、西安、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宁波等 9 个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一些企业集团实行了计划单列，被赋予省一级管理经济的权限；在全国 1/3 的地区实行了市带县的新体制，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一些城市中，还进行了其它方面的一些改革试点，如机构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

通过以上改革，逐步打破了过去在农村搞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和在城市搞以产品分配代替市场交换的产品经济的旧模式、旧体制，逐步建立起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使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与商品经济的活力初步结合了起来。

对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体制，中央也逐步进行了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当然，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失误。比如在研究和推进改革时，对国情、国力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思想上行动上都有些急于求成；在改革统得过死、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法制建设以及必要的管理工作也有些跟不上；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不够好，有的甚至互相矛盾，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出现了上述问题和失误，同时由于在抓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存在“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状况，结果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多；分配不公，收入差别较大；党内腐败现象滋长，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蔓延等现象，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在经济建设中，由于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又产生了要求过急的现象，有的领导人不顾实际地强调尽快“翻番”，致使许多地区和单位盲目攀比发展速度和片面追求高指标。与此同时，许多工作却没有跟上，如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注意不够，对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产品质量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在着重增强企业活力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时跟上等等，从而导致了经济过热现象的出现。

特别是 1984 年第 4 季度以后，出现了追求超高速发展的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进口控制不严，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某些不稳定的因素，农业生产从 1985 年起开始滑坡，粮食、棉花明显减产。

这些失误是没有经验造成的，是前进中的失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和政府不断调整政策和措施，克服失误，终于使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特别是在 1984—1988 年这 5 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快的。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83 年与 1978 年相比，5 年间从 3588.1 亿元增长到 5809 亿元，增长 2220.9 亿元；可是以 1988 年与 1983 年相比，从 5809 亿元增长到 14018.2 亿元，增长 8209.2 亿元，是前 5 年增长额的 3.7 倍。国民收入增长到 11738 亿元，增长 7002 亿元，是前 5 年增长额的 4 倍。工业总产值增长到 18224 亿元，增长 11763 亿元，是前 5 年增长额的 5.3 倍。农业总产值增长到 5865 亿元，增长 3115 亿元，是前 5 年增长额的 2.3 倍。

所以，正如邓小平 1992 年春南巡讲话所指出的，从 1984—1988 年这 5 年间，虽然有失误，但“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长，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台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是我国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殊发展规律探索的重要成果，也是 10 年来理论上的一项重大建树。

由于对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方面认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可以促进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急于求成，搞“大跃进”，或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越大越公越纯越好，搞“穷过渡”；一方面又以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长期存在着，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从而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说明，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对我国的改革和建设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经过 30 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领导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初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认为我国的社会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1986 年 9 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认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说明，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逐步深化了。

198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赵紫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赵紫阳在大会上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根据。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经过 30 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总起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报告指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当确立以下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第一，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第二，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第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第四，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五，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第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表明已经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基本上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较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的问题，从而使我国的改革和建设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成的，可是实践发展的结果，完全不同于原来的设想，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尤其是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为落后。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在落后国家为什么可以建设社会

主义和怎样建设的问题。因而，它对于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中共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会议指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根据这个方针，中共十三大以后，国家对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修改了宪法的部分条款。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同时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选举李先念为政协主席。

从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也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调整了领导成员。

六、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为了解决自1984年以来的经济过热现象，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1988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会议认为，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为了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同时，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特别是深化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了这些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并运用法律的、纪律的、教育的手段，综合治理，克服腐败现象，保持党的机关的廉洁。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后5年或较长一些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同时还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这次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清理整顿公司，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清查楼堂馆所，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并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政治上、经济上都出现了新的问题。政治上主要是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即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和国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利用某些领导人的腐败现象进行煽动，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及其它一些地方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风波平息之后，中国共产党于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

全会分析了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全会审议

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认为赵紫阳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接着，赵紫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进行审查。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强调，要坚决继续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会后，党和政府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做了七件实事，改善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七件事是：（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3）取消对领导人食品的“特供”；（4）严格按照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5）严格禁止请客送礼；（6）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7）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为改变实际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作表率，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信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同年11月6日至9日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同意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经济上，由于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供求总量失衡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差和体制上的缺陷等依然存在，也由于一下子收缩过紧，1989年入夏以后，市场销售急剧下降。扣除涨价因素，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下降7.7%，这是近27年没有过的。生产资料市场也从第三季度降温，全年销售总额实际下降18.2%。由于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工业生产出现了严重困难，开工不足，停工半停产增加，生产效益下降，利润大量减少，亏损急剧增加，不少企业甚至出现了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状况。与此相联系，城镇待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增大，一部分职工实际收入下降，部分居民生活发生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于10月30日至11月3日召开了工作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当前的经济问题。11月6日至9日，接着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认为，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要用3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全会还强调指出，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

的方针，这是总结我国 40 年的经济建设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这年底到 1990 年初，在继续控制需求总量、贯彻紧缩方针的同时，采取了适当调节紧缩力度，调整信贷政策，适当放宽对收购资金和技术改造资金的发放，重点扶植国营大中型企业等措施。从 1990 年 3 月开始，工业生产逐步回升，国际收支明显改善；物价上涨幅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到这年年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胜利完成，国家第一步战略目标实现。

根据这种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于 1990 年 12 月 25 日至 30 日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指出今后 10 年主要是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同时总结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基本原则，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具体化。1991 年 3 至 4 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从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改革开放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七、新的起点

到 1991 年底，我国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经济形势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

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也发生过失误和曲折，但总的来讲，成就是巨大的，发展是迅速的。从 1978—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从 3588 亿元增长到 17400 亿元，国民收入从 3010 亿元增长到 14300 亿元，工业总产值从 4237 亿元增长到 23851 亿元，农业总产值从 1397 亿元增长到 7662 亿元。在 1979—1990 年的 12 年中，分别平均每年增长 8.7%、8.4%、12%、6.1%。与其它大国相比，发展速度是最快的。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从 1978—1990 年，居民消费水平从 175 元上升到 713 元，其中农民从 132 元上升到 539 元，非农业居民从 383 元上升到 1448 元，除少数地区外，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有的地区还正在向小康水平过渡。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行，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格局，增强了经济的活力，为以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深刻地总结了 10 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根据治理整顿已经基本结束，国内形势稳定，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国的情况，高瞻远瞩地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

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还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江泽民代表中央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全面总结了14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了新的概括，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头脑。在报告中还提出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关于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现在看来可以更快一些，达到年均增长8—9%。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0月19日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四大以后，各民主党派也召开了新的代表大会，修改了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1993年3月15日至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批准了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决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乔石为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田纪云等19人为副委员长；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荣毅仁为国家副主席；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4人为副总理。

1993年3月14日至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京举行，李瑞环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主席，叶选平等20人当选为副主席。

中共十四大和八届人大、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提出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的任务，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新时期的文化、教育、科技、国防和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10多年中，不但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教育、科技、国防、外交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

“文革”结束以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科学领域也进行了拨乱反正，许多文艺家、教育家、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等重新开始工作，一些文艺和学术团体也恢复活动，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涌现出许多新的作品、学术著作和科学成果。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做出很多成绩和贡献。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文化方面，各类文化设施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电视事业发展迅速，在广大城市及部分农村迅速普及，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在文艺创作上，中篇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电视剧、戏剧小品在这个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也都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有的还在国际大赛中获奖，提高了我国文艺作品在国际上的声誉。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都出现一批重要成果。

在教育方面，普通高、中等教育得到明显发展，教育设施得到一定改善，特别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多种形式的岗位培训发展迅速，形成了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办学的局面。在这期间，我国实行研究生制度，已经培养了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还向国外派遣了大批留学生，有不少回国后迅速做出了出色的成就。

在科技方面，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而有力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在1990年以前的10年间，全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1万多项，国家奖励的发明1700多项，特别是生物技术、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讯技术、超导材料的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某些成果，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七五”期间国家推行的“星火”计划，大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卫生方面，各类医疗事业有了明显发展，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城乡看病难的状况有了缓解。由于生活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均寿命明显提高。

在体育方面，不仅体育设施有了较快地发展，体育成绩也有很大提高，有不少运动队、运动员在重要的国际大赛中，连续夺取世界冠军。特别是中国女子排球队，改变了我国大球项目弱的局面，称雄于世界排坛数年。在洛杉矶、汉城和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实现了零的突破，取得了一定数量的金牌。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在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我国在北京第一次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亚洲运动会，得到了各国运动员的称赞。

当然，在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分配上“脑体倒挂”现象的出现，又出现了“读书无用”、“知识无用”的思潮，不少中小學生弃学，不少教师及科研人员亦转而从工从商，学术著作出版艰难，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出现了文化的“低谷”，呼吁尽快地加以解决。

（二）国防

在这一时期，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解放军在加强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改进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在守卫边境、保卫祖国安全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提高。

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时期还实行了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1981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和方针。1985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新的战略估计，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性很迫近的看法，要求军队工作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会议要求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这个大前提下，努力搞好军队和国防建设。这样，就实现了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的转变，部队实行了体制改革和整编。在1979年和1982年，部队实行了两次整编，将基建工程兵、铁道兵转给地方；将担任内卫执勤的部队划归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军委的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组建了合成部队的集团军，将炮兵部队、坦克师分别编入各军。经过这两次整编，使部队减到了400万人。1985年，部队再次实行整编，将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合并为七大军区；在陆军中增加特种兵的比重，提高合成程度；对军队规模作大的压缩。到1987年，这次整编基本完成，部队员额减少100万人，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明显增强。从1988年9月起，还重新恢复了军衔制。与此相配套，还实行了文官干部制度。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后备力量的建设，建立了快速动员体制和士兵预备役制度、干部预备役制度，并建立了若干预备役师，把民兵制度和预备役制度结合了起来。

（三）外交

随着全国工作中心的转移、改革开放的开展，我国根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世界形势新特点，更加鲜明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实行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更加灵活、务实的对外政策。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982年1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把上述方针写进了新宪法之中，从而开始了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在对外交流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82年中日建交10周年时，两国政府首脑互访，确认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三原则，使中日关系获得满意的发展，日本成了中国

主要的贸易伙伴。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了20多年的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开始正常化。1990年8月，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破裂了20多年的两国关系也得到了恢复。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我国继续与新独立的独联体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东欧国家的新政府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为了有助于中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紧张形势的缓和，我国还先后同以色列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同各国改善和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我国积极参加了双边的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对外贸易和文化、教育、体育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调整外交方针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调整了同外国党的关系。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处理兄弟党关系的新原则，指出各国党的纲领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当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在这一新原则的指导下，1985年为止，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200个左右各类政党和组织，有了各种形式的联系。

自1983年以来，我国还在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同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通过谈判，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就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圆满地解决了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

“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由邓小平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后来在具体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1978年11月，邓小平就提出台湾同祖国大陆统一后，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1979年3月，他又提出香港问题解决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从1983年7月开始，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会谈，1984年12月19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两国政府交换了批准书。《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行使主权。为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50年内不予改变。从此，香港进入了归还中国之前的过渡时期，并从1985年起开始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结束后，从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起，中葡两国政府开始会谈。1987年4月13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互换批准书。从此，澳门也进入归还中国之前的过渡期。《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届时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其它规定与对于香港的规定基本相同。

中英、中葡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署，使香港、澳门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也为按“一国两制”办法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先例。

根据邓小平的设想，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正式作出了我国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经过 80 年代的努力，第一步战略目标到 1990 年已经胜利实现。现在，全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第二、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奋斗。

我国第二步以及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后，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原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低潮。如果我们顺利实现第二步以及第三步战略目标，不仅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更加坚强有力，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生机勃勃，我们将更加不怕任何困难，可以更加有力地回答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还给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第五章 充满变数的台湾社会

1949年12月8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国国民党中央在大陆遭到彻底失败后被迫宣布退守台湾。从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开始了偏安台湾的时期。

一、从混乱走向稳定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整个台湾孤岛人心惶惶，社会动荡，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连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深感国民党“已彻底失败而绝望”。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自我放逐，逃亡海外。国民党下层组织严重涣散，“只有党部，不见党员”。军事上大崩溃，经济上更糟。贫乏的自然资源，又压上了国民党从大陆带来的200万人口，其经济力难以承受。于是，只能靠印发钞票来应付，大陆通货膨胀的局面又在台岛重演。“外交”方面，台湾更是孤立无援。世界一般舆论都认为国民党在台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就连国民党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国也等待“尘埃落定”，对国民党暂取“观望政策”。

总之，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台湾，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此国民党确立了“卧薪尝胆”，准备“反攻大陆”的方针，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政治方面采取的措施有：

（一）蒋介石复“总统”职和重组国民党权力核心。蒋介石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即使在他引退之后也未放过权。1949年12月2日，蒋介石召集党政会议，商讨“复职视事”问题。1950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居住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性的电文，要求其3日内必须返台，否则作为自动放弃“代总统”职务。同时决议蒋介石复“总统”职。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总统”职，并发表文告称：要“扫除中共”，“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3月15日，蒋介石重登大宝后，立即更换李宗仁代理“总统”期间的人事安排，接受“行政院长”阎锡山的“辞呈”，令其“退休”，任命其亲信陈诚组阁。同时，令其长子蒋经国出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大权。这样，就在台湾又形成了以蒋氏家族为核心的新的权力架构。

（二）改造国民党。蒋介石自下野到他复职前后，一直反省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本身的失败，是其“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致”。因此，蒋介石提出：要“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从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湾中国出版公司1978年5月版。

李松林主编：《中国国民党在台湾40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8月版。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9辑第44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11月版。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1949年下半年始，蒋介石便着手谋划国民党改造问题。同年7月26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改造、重建国民党方案。8月5日，正式成立了由陈诚、蒋经国等16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其后国民党改造运动在台湾全岛展开。

国民党改造包括党员归队，对党员整肃，“刷新党政关系”、开展“民运工作”和社会调查等诸项内容。蒋介石希冀通过上述诸项措施，重新加强国民党对行政部门的控制和缓和“二二八事件”形成的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争取人心。

配合国民党改造运动，蒋介石于1952年元旦文告中，号召推行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四大改造，以完成“反共抗俄总动员”。与此相适应，还开展了“革命实践运动”，以革除“一般干部普遍犯的虚伪的毛病”，即“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同年2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又通过了《反共抗俄总动员纲领》。此后，“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便在台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布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此番改造一方面整顿了国民党各级组织，使国民党统治机能进一步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借“整顿党务”为名，将反对派统统挤出决策圈，完成了上层权力的再分配，使台湾真正成为清一色的蒋家天下，在客观上也使混乱的台湾政局渐趋稳定。

（三）在台湾全岛实行戒严体制。1949年5月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法》，5月19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宵禁，从午夜至清晨5时，“随意行动者”处死。根据《戒严令》规定：戒严期间禁止工人罢工、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宵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带身份证等等。上述规定完全剥夺了广大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力乃至人身自由。

国民党当局还加强对新闻、广播、出版等机构的严密控制，制定了《戒严时期出版物管理办法》，规定：“为共匪宣传者”，“诋毁国家元首者”，“混淆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者”，“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者”等类出版物均予以查禁。与“戒严令”相适应，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重建特务机构，加强特务统治。这种戒严体制直到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方告终止。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中外历史实属罕见。

（四）实施地方自治。1949年8月15日，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在先期到达台湾的陈诚主持下宣告成立。张厉生出任该会主任委员。该会草拟了四个台湾自治的草案，其主要内容是：调整行政区域，将全省划分16个县、5个省辖市、1个管理局、6个县辖市、234个乡、78个镇，以健全地方基层组织；民选县市镇长和村里长；建立民意机构，延揽台湾省籍人士，局部开放地方政权。

国民党退台初期实施的“地方自治”是其政治安抚政策与专制制度结合的产物，因使一部分非国民党的台籍人士获得参与政治的“合法”管道，缓解了台籍人士同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客观上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但其实质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辑。

史为鉴：《禁》，台湾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只是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一种点缀。

在经济上，台湾当局在所谓“反攻大陆”的总体政治目标下确定此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是：稳定经济；依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建设次序，首先发展农业；农工均衡发展，重点先发展“代替进口”、面向内销的民生必需品工业。具体措施是：

（一）推行稳定经济的三项政策：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以稳定物价；实行高利率政策，以吸引社会大量游资，改革税制，简化行政机构，压缩行政开支，以平衡财政收支。通过上述三项措施，通货膨胀率渐趋减缓，物价上涨率也趋向稳定。1949年物价上涨30倍，到1950年上涨仅3倍，1951年后更受控制，1961年仅达2%。台湾当局用了12年的时间，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

（二）推展土地改革。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初，台湾仍保留着封建土地制度。1949年台湾全省耕地面积为84.23万甲（每甲合0.969917公顷），农业人口总数为387.9万余人，按户算有69.1万，其中地主8.1万户（占农业人口的12%）占有耕地45.7万公顷（占全省耕地56%），而农民61万户（占农业人口88%），却仅占耕地18.3公顷（占全省耕地的22.42%），此外有17.6万公顷土地（占全省耕地21.57%）属于国民党当局所有。这种极端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不仅造成农民生活苦不堪言，生产积极性低落，而且增加了农民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当局出于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经济、稳定局势、维持生存的考虑，决定依照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遗教实施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实行三七五减租。规定耕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37.5%，保证佃权等。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佃农的地租负担，缓和了租佃矛盾，但也照顾地主利益过多。

第二阶段，办理公地放领。从1951—1976年先后把光复时接收的日本掠夺的土地，分9批出售给28.6万农户。受领公地的农民由于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第三阶段，实施耕者有其田。1953年1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耕者有其田法》。同年4月23日，台湾省政府颁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该法和条例规定：地主可保留中等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超过部分一律由当局征收，转放于现耕农民放领。当局付给地主一部分工矿企业股票，一部分实物债券。由于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无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进一步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国民党当局乱中求稳。但土改后的状况，远未达到平均地权。

（三）发展代替进口工业。继币制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台湾当局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在资金不足等困难条件下，利用劳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依靠“美援”，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以自产品代替进口工业品。具体措施是：第一，在“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促进农业”的方针下，大力发展农业，为实现工业化创造条件。1952年农业创造净产值达5.08亿美元。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与资金，

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台湾中华书局印行，1961年10月版。

《台湾经济问题》，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时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为代替进口工业准备了市场。第二，发展以纺织品、食品、合成纤维、塑料产品、金属制品等非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代替进口工业。经过 10 年代替进口工业的发展，台湾消费品发展迅速，非耐用消费品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 64.2%，基本上满足了岛内要求，有些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第三，实行系列管制与保护措施。为了促进岛内工业的发展，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限制进口、保护岛内工业发展的内向型贸易、金融政策和外汇措施。具体为：严格进口管制；实行外汇管理；保护关税；实行设厂限制；合理利用“美援”与侨资等。发展替代进口工业政策的实施，在台湾工业化初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台湾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业消费品的自给能力大大提高，为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岛内市场狭小，也出现了生产过剩和对外贸易发展缓慢等严重问题。

在军事上，国民党确立了收缩海南、舟山群岛的兵力，确保台湾安全的方针，以加强台湾的海防。为了确保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长治久安，蒋介石还从整顿思想入手，对军队不断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时期的腐败作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军事上的另一项措施，就是不断加强大陆沿海的骚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1950 年 2—3 月间，台湾当局派飞机连续 13 次轰炸上海，同时轰炸南京、广州、福州和闽江等地，造成数千人伤亡。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 10 万余人先后 42 次（1950—1954 年 8 月）偷袭大陆沿海与岛屿。但这些偷袭与骚扰行动都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国民党当局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 1957 年 10 月 10 日至 23 日在台北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以策定“反攻”战略与策略。会议制订了“反共复国”的总方略。“反共复国”重心有二：加强军事反共；积极开展“心战政战”工作。会议提出“反共复国战略乃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主义为先锋，武力为后盾”。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增设陈诚为副总裁。为贯彻“反共复国”路线，国民党当局不断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加剧了此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 1958 年金门海峡的隔海炮战。此次空前的海战是国民党“武力反攻大陆”的试探性攻击，由于遭到人民解放军的严厉惩罚，迫使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复国”活动有所收敛，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上面。

在“外交”方面。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是国民党“外交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时期”。对此，台湾当局确定了以“反共抗俄”为基本“国策”，以确保台湾为争取生存目标，采取“争取国际间的同情与支持，先巩固原有的外交路线，再建立新的外交据点”的“外交”路线。国民党七大召开时，又强调了重美、日的“外交”路线。在此一“外交”路线的指导下，台湾当局采取了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重新投入美国怀抱，签订“对日和约”等措施。在当时美苏对抗、大陆向苏联“一边倒”、朝鲜战争和美日勾结的国际背景下，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有利于台湾从混乱走向稳定。

二、建设台湾，稳步发展

进入 60 年代之后，台湾当局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形下，开始提出“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的口号，同时将施政重点集中于建设台湾、经营台湾，以

长期维持国民党在台统治。

在经济上，进入 60 年代之后，台湾当局面临着新的问题：美援停止；内部市场饱和；代替进口工业受阻；失业严重；贸易出现逆差，财政出现赤字。面对这种形势，台湾当局在 50 年代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采取了比较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即从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大力发展劳力密集的出口加工工业，拓展对外贸易，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台湾当局采取了下述措施：

实行财经改革，搞局部自由化，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从 1958—1961 年，台湾当局展开一系列经济改革：检讨过去的进口管制办法，以实现进出口自由化；从税收、外汇以及金融方面给予私营企业以优待；改革税制与征税办法，促进资本积累；通过外汇和贸易制度的改革，实行单一汇率和贸易自由化；增加鼓励出口的有关措施，改善出口商的外汇取得条件，扩大与外国投资商的投资合同等。上述措施的实施，对台湾制造工业从事出口生产十分有利，促使更多的制造业厂家转向发展出口加工业。

改善投资环境，开办加工出口区，开始大量引进外资。1965 年 1 月，台湾颁布《加工出口区设置管制条例》。根据《条例》规定：划出一定地区，供外资企业投资设厂，并提供各种方便和优惠政策，以便更好地引进外资，扩张出口，把经济导向国际市场。1965 年 3 月，台湾当局首先在高雄设置加工出口区，其后又在楠梓和台中设立了加工出口区。

实行外贸与内资一并鼓励，区内（指加工出口区）与区外（指工业区）齐头并进，引进与自筹双管齐下的多形式筹集资金和发展生产的政策。

实行计划经济，推展第三、四、五期 4 年计划。1953 年，台湾当局制订了第一期 4 年经建计划，其目标在于扩大工农业生产能力，对内要求稳定经济，对外要求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当此目标实现之后，台湾当局于 1957 年推展第二期 4 年计划，其目的在于继续开发资源，增加农业生产，加速工矿产业的发展，扩大出口，平衡国际收入。这个目标实现后，为配合外向型经济策略，又连续实施了第三、四、五期 4 年计划。三期 4 年计划的目标是：改善投资环境，开拓国际市场，将经济导向新的结构；促进经济现代化与维持经济稳定；提高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增加外贸收入。

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台湾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经济结构上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1952 年时台湾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5.9%，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到 1973 年时，农业总产值由 35.9% 下降到 11%。第二，内向型经济转变为外向型经济。台湾对外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额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23.2% 上升为 1972 年的 71.68%。第三，重工业得到发展，纺织电子电器工业发展尤为突出。总之，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是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据台湾资料显示：此一时期台湾经济的综合年增产率为 10.37%。农业年增长率为 4.99%，工业年增长率高达 19.6%。10 年中有 5 年工业增长率超过 20%。台湾经济年增长率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持续之长不仅在亚洲地区少有，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

在政治方面，台湾当局一方面继续推行“反共复国”战略，一方面蒋介石完成了传子部署。

1960 年 9 月 28 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台北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反共建国纲领》等决议。翌年 4 月，为适应“反共复国”需要，台湾当局又邀约海内外反共人士分批举行会谈，以阳明山为会址。会谈的主要内

容如主持会谈的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陈诚所说：“（一）商讨反共复国大计，积极解救大陆同胞；（二）加速复兴基地的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生活，充实反共力量；（三）加强海内外的团结，一致为复国建国而努力；（四）交换对政府应兴革的意见，造成更多的成绩和更大的进步”。

阳明山会谈是在国民党偏安台湾后从混乱走向稳定情况下召开的。它的召开为台湾当局鼓吹“反攻大陆”与建立“反共复国”基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63年11月12日至22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主要研讨了“掌握反共复国机势”的方略，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结海内外的反共势力。

与“反共复国”战略推展的同时，蒋介石也完成了传子部署。首先蒋介石采取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蒋就可做终身“总统”，以完成传位于子。接着，清除反对派，凡不利于蒋经国接班的人士均在被清除之列。于是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与“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因与蒋经国闹矛盾，先后被蒋介石清除。亲美失意政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雷震等人，因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抨击国民党独裁和企图另组新党，被蒋介石以“涉嫌叛乱”为由于1960年9月4日下令逮捕监禁。然后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长”陈诚又于1965年因肝癌不治病逝，蒋经国接班的最后一个阻力终于自动消除。选择过渡人物。陈诚病逝后，蒋经国接班格局已定，但马上继任“副总统”，威望尚嫌不够。于是1966年2月19日在台北召开了一届四次“国民大会”，选举严家淦出任“副总统”，作为蒋经国接班的过渡人物。蒋介石之所以提名严家淦作为自己的副手，是因为严有两大长处：严没有自己的班底，不擅拉帮结派；没有权力欲，为人颇圆融通达。正是由于这两点，使严不可能造成对蒋经国接班的威胁。严当了“副总统”之后，立即将“行政院”副院长一职交与蒋经国。后来，严又辞掉“行政院长”一职，使蒋经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党政军核心人物，成为蒋介石的准接班人。

在对外关系方面，台湾当局在进入60年代之后仍谋求同美国等国保持盟友关系，以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台之间不仅结束了“蜜月”时期，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1965年2月，远东事务副国务卿格林宣称：希望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扩展关系。翌年4月，国务卿腊斯克公开宣称愿同中国大陆扩大非官方交往。同年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台湾当局认为可乘机“反攻大陆”，并要求美国予以支持。但美国方面却以《中国神化》为题发表评论，表示了与台湾当局相反的意见。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审时度势，在对华政策上改弦更张，明确宣布与中国大陆建立双边关系，以缓和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形势。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给台湾当局的对外关系投下了新的阴影，最终导致了70年代初期台湾“外交”战线的大溃决。

三、革新保台，偏安求存

70年代之初，国际风云变幻，台湾受国际气候与保钓运动的影响，政治空气由沉寂变为活跃，各种政治思潮风起云涌。台湾当局面对丧失“国际人格”的困境与经济衰退、政治活跃的局面，提出了“革新保台”的口号，推行“在台生根”偏安求存的路线。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席位问题”议案，和将台湾国民党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定。此决定作出之后，几乎一夜之间，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26日，蒋介石发表了《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攻击联合国“自毁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已成为“罪恶的渊藪”。宋美龄后来在《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一文中宣称：联合国驱逐国民党代表已“敲响了这个国际和平组织的丧钟”。截止到1973年2月，仅39个国家与地区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

继联大驱蒋之后，美国也改变对台政策。出于全球战略考虑，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2月28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上海签署了著名的《联合公报》。《公报》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否认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对台湾当局影响甚大，国民党中常会于《联合公报》发表当天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磋商；蒋经国也发表声明，指责美国“背信毁约”。同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继尼克松之后，也笑逐颜开地坐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上。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交。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对江河日下的残破“外交”局面，蒋介石只得发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蒋经国则宣称：要因势利导，采取新的“外交”方针。当时有人提出“德国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国国协模式”等方案。但基于“一个中国”的观念和“汉贼不两立”的法统立场，这些方案均未被台湾当局采用。

面对“外交”困境，1972年2月，台湾当局确立了“弹性外交”，即“实质外交”的方针：凡是对台“无敌意的国家”，均愿与之加强联系，并“将以经济、财政、贸易、教育、文化等配合外交的推展”。台湾当局推展“实质外交”的结果是：到70年代末，台湾在30多个“无邦交”国家中派驻各种名义的机构或代表，诸如“对外贸易发展协会”、“亚东关系学会”、“太平洋经济文化中心”办事处等。

“实质外交”是台湾当局处于“外交”困境中，在国际社会中求生存的一种主要模式。此一方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台湾“外交”摆脱了困境，并使经济方面得到发展。但由于它不具备国际法的保证和正式外交的权利义务，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与不稳定性，1979年台美断“交”便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应付危局，国民党在政治方面采取的首要措施是调整权力结构。1972年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立即推行新人新政。他大幅度地更动人事，起用不少新人。新内阁成员有两大特点：一是内阁成员年轻化了，平均年龄61.8岁。此种做法对于打破老人政治具有一定的作用。二是新内阁的“省籍菁英”比例大幅度增加，在实施“本土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一政策的实施，迎合了一部分台湾人参政的要求，因而得到了台湾舆论的好评，“省籍”矛盾也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蒋经国还积极推展“行政革新”与“社会革新”。蒋经国在其出任阁揆后的第一天，就在“行政院”的院会上要求各级首脑敢挑重担，深入民间基层解决问题，对不合法令予以修正、废止，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提出“平凡平淡平实”的六字方针。随后又提出了10项革新要求，其中心点在于压缩行政开支，要求公务员廉洁、杜绝贪污、受贿等。不久，蒋经国在“立法院”会上提出8项“社会革新”要求，以净化社会风气，革除贪污、受贿等。

推展“行政革新”与“社会革新”，民众普遍欢迎，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政治上，为了挽救法统危机，蒋经国继续推展“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案。随着联大驱蒋和作为“法统”象征的大陆籍“中央民意代表”逐渐老迈、凋谢，“法统”受到沉重打击，“国会”不能正常运作。有鉴于此，196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称：“应于今年内办理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并于1972年12月，选出51名“增额立法委员”。翌年2月选出15人“增额监察委员”。

台湾当局与蒋经国推展的“中央民意机构”增补选案，对于缓和“法统”危机具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修补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当局所面临的危机。进入80年代之后，国民党的“法统”面临更大的挑战。

正当蒋经国大展宏图之际，其父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于1975年4月5日病逝台北。按国民党“宪法”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之”。根据这条规定，“副总统”严家淦于蒋介石病逝后宣誓就任“总统”职。严虽当了“总统”，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蒋经国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继承了父位。同年4月28日，国民党召开中央临时全会，修改《中央组织条例》，决定国民党党章保留“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的“纪念和尊敬”之意，同时决定增设主席制，推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主席。1976年11月12日至18日，国民党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选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之后，另一只眼总是盯着“总统”宝座。对此严家淦非常知趣，主动让“贤”。他虽让党国元老劝严继续留任，但严坚决放弃竞选。蒋经国在盛赞严家淦在位时“德政”之际，于1978年5月当选为“行宪”以来的第六任“总统”。

蒋经国真正掌握台湾党政军大权之后，为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首先清理和整顿、调整“国防部”和军队上层人士，免去黄埔系高魁元“国防部长”职，起用他一手培植的宋长志、郝柏村、蒋仲苓等分别充任“国防部长”、“参谋总长”、“三军司令”。与此同时，蒋经国还让跟随他多年的王升、李焕出任“总政战部主任”、党务、政务人事机构，并纳入国民党中常会。令对蒋家忠诚又懂经济，行政经验丰富的孙运璿组阁。蒋还起用台籍人士谢东闵作为自己的副手。这样，逐渐形成以太子系、财政系为轴，元老派为辅助，联合地方势力的权力架构。

蒋经国上台后，为标榜自己统治的民主，发布三点指示：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日是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第二，今后不希望被称呼为“领袖”。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位是孙中山总理，一位是蒋总裁。第三，今后不希望有

“万岁”口号出现。在对岛内控制上，蒋经国也比其父时期有所进步，例如逐渐以“放逐制”代替“监禁制”。蒋经国的种种做法，试图改变人们在他从事政工、特务工作的恐怖印象，树立起一个“民主”、“开明”、“革新”的新形象。但有一点蒋经国始终秉父志不渝，那就是坚持一党专政，严禁组新党。然而，台湾政局的演变，非蒋经国一手能左右。70年代，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严重的威胁。

70年代初期，中国留学生（主要是台湾在海外留学生）因美国宣布将钓鱼台列岛归还日本一事而发起了保卫钓鱼岛运动。此一运动对台湾政局影响较大。保钓运动之后，要求台湾当局革除弊政、改革现状、批评国民党顽固保守的“政治革新”运动接踵而来。运动参加者是岛内一些“对台湾现状不满，对国民党不满，对台湾种种问题感到灰心，感到需要迫切改革台湾问题的人”。他们当中以知识分子居多。同时，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中产阶级也有较大的发展。他们不满“纳税有份，参政无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权力。70年代，党外势力在台湾政坛上非常活跃，他们创办杂志，诸如：《大学杂志》、《台湾政论》、《八十年代》、《美丽岛》，抨击时政，呼吁政治革新。党外势力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争引发了震动岛内外的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

中坜事件发生在1977年11月15日台湾地区首次五项公职人员选举之日，是由于在选举中国国民党地方机构舞弊案所致。愤怒的选民们群起阻塞中坜镇交通，并用石块袭击警察局。整个过程共烧毁8辆警车和60辆摩托车。由于台湾最高当局采取“克制”态度，才未使事态扩大。此一事件的发生使台湾当局对党外势力的策略有所调整。

继中坜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高雄事件。1979年12月10日，以党外势力创办的《美丽岛》杂志社，在向台湾当局申请以庆祝“国际人权日”的3万人集会游行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强行于高雄举行纪念活动。军警予以严厉镇压，当场打死200多人，并以“涉嫌叛乱罪”将黄信介、姚嘉文等160名党外人士逮捕，同时查封《美丽岛》杂志社及其分设各地的十几个办事处。

经过高雄事件，由保钓运动燃起的政治热情再度冷却了。然而，随着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愈来愈难以平息知识界与党外势力对当局高压政策的不满情绪。进入80年代之后，党外势力再度复苏，使国民党在台统治一天不得安宁。

在经济方面，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使台湾经济表现出衰退的迹象。首先使70年代的台湾始终处在剧烈的物价变动之中，通货膨胀，从1972年底至1974年2月，台湾的消费价格竟上升了66.5%。与物价上涨的同时，外贸也出现了逆差。由于石油危机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一些新兴的国家与地区如南朝鲜、新加坡、香港的轻工产品投入国际市场同台湾竞争，1974年台湾贸易逆差额达13.27亿美元。因台湾经济以出口为动力，贸易出现逆差必然要影响到经济发展，70年代经济增长率明显降低。据统计，1974年经济增长率由1972年的13.31%降至1.12%。伴随经济不景气，大批企业倒闭或裁减人员，使失业率逐年上升。

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台湾当局采取了在稳定中求发展的策略，制订了

各种调整措施，以稳定和维持经济的发展。1973年6月，宣布稳定物价的11项措施，如提高利率、调整汇率、延续基本建设、降低关税、实行物价管制等。1974年1月，又颁布了《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该案所提具体措施是：提高油价，限制石油供应；调整交通运输费；调整军公教人员待遇；取消限价；提高存款利率；发行公债等项。这些措施实施后，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基本上稳定了物价。

当物价渐趋稳定之后，台湾当局又于1975年制订了1976—1981年6年经济建设计划。6年经建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从以轻工业为主逐步过渡到以重工业为主，从劳动密集型工业逐步过渡到技术密集型工业，以减少对外依赖程度，增强经济的应变能力，促进经济现代化，提高福利水平。

在推展6年经建计划的同时，台湾当局又于1973年宣布进行10大建设。该项建设分为：一是社会基本建设，包括核能发电厂、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北迴铁路、台中港、苏澳港及桃园国际机场；二是重化工业建设，包括高雄造船厂、高雄钢铁厂、石油化学工业等。10大建设至1979年全部完成，共耗资2000余亿元新台币。10大建设的推展，对缓和台湾经济衰退、减少失业率与经济复苏，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继10大建设之后，台湾当局又宣布进行12项建设。12项建设对台湾重工业发展与交通运输的改善、能源解决均起了一定作用。

与12项建设开展的同时，台湾当局于1979年在新竹创建了类似美国硅谷的科学工业园区，旨在引进高科技和高级人才，把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研究和制造高级工业产品，推进工业技术的发展。建立科学工业园区，是台湾当局为促进工业由劳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经过台湾当局政策的不断调整，台湾经济衰退有所缓解。

四、“政治革新”案的推展与社会转型

踏进80年代的大门，台湾生存的内外环境更加艰难，“不安全感”增强。加之大陆调整对台政策，提出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岛内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与“台独”活动猖獗，出现了抨击国民党僵硬政策，要求变革的呼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台湾社会出现了政治革新运动，并导致了社会的全面转型。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以和谈方式结束两岸“对峙状态”，将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后来，邓小平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共和平统一中国的呼声赢得了海内外华人的好评。但台湾国民党当局却极力抵制。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开幕式讲话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会议根据蒋经国的讲话精神，策定中心议题为“加强三民主义，策进光复大陆”，加速台湾建设。

1981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十二大在台北召开。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宣称：三民主义救中国，共产主义祸中国，已由近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31年来海峡两岸不同的制度与经验所证明。因此，“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乃成为当前海内外全体中国人一致的心声”。该案还称：“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不改变”，“国体决不改变”，决不与中共谈判、实行三通（通航、通邮、通商）。为了贯

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国民党十二大提出当前的急务是：“加强复兴基地建设”；“强化国民党领导”；“加强三民主义思想登陆”。因此，是会并未适应新的形势，为台湾前途开创一条新路。

正当台湾当局坚持反共拒和、推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际，又受到了江南命案的冲击。江南本名刘宜良，系美籍华人作家，1984年因撰写《蒋经国传》而被暗杀。

江南被杀震怒了海内外华人社会，纷纷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在内外压力下，台湾当局宣称卷入江南命案是“情报局”“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

并于1985年4月对“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进行审讯、判刑。江南命案还打乱了蒋经国传位于子的部署。迫使蒋经国于1985年末和1986年初两次公开宣称其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并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以解内外疑虑。

正当江南命案的怒潮冲击台湾之时，1985年2月，又爆发了因“十信”弊案波及整个台湾的金融风暴。

“十信”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1985年初，因“十信”舞弊，“中央银行”决定予以处置。但风声走露，从而引发了“十信”前所未有的挤兑风潮。后全台凡与“十信”同名的金融机构先后刮起挤提风，导致社会一片混乱。“十信”弊案的发生，充分暴露了台湾财经界秩序混乱、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等种种难以想见的肮脏内幕。

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台湾当局感到“处境益艰”。1986年3月29日至31日，中国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蒋经国亲自主持会议，提出了以党的革新结合行政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的方针。三中全会之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在国民党中常会大讲：“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经蒋经国的全力推动与督促，确定“政治革新”6项议题：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调整政策。

政治革新案推出之后，蒋经国遂于1987年7月14日宣布解除台湾地区的戒严，同时宣布开放党禁。于是，各种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台，出现了竞相组党的局面。据统计，截止到1993年初，台湾弹丸之地竟神奇地出现了70余个政党。新组党的政党主要有：民主进步党、新党、工党等。事实表明：台湾国民党一党独裁时代即将结束，“一党优势多党分立的时代即将开始”。

正当国民党走向革新之路之际，又突发了“华航”货机飞赴大陆事件，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对大陆的政策。

1986年5月3日，一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简称“华航”）的波音747货机，从曼谷飞往香港途中，该机长王锡爵将机转航大陆，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同机还有驾驶员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2人及22万磅货物。王要求在大陆定居，董、邱2人均表示要回台湾。“华航”货机事件发生当日，中国民用航空公司（简称“中航”）致电“华航”，邀请他们“尽早派人来京”，商讨该事件处理方案。此一电文和货机事件传到台湾后，立即引起轰动。“华航”事件使台湾当局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害怕中共借“机”

统战和处理不好会失去民心，自毁形象，最初决定不与中共“正面”直接接触，经过一些曲折，“华航”突然改变态度，于13日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决定由该公司驻香港分公司代表在港与“中航”“洽谈”。5月17日至20日，两航经四次商谈达成协议。5月23日，双方完成交接手续。

两航谈判在国际社会与台湾岛内引起强烈反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打破了两岸敌对双方30多年来的官式沉默”和国民党的“三不政策”。尽管国民党中央宣称“三不政策”决不改变，“坚守反共立场”，但在事实上已迫使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政策上前进了一步。随着岛内外与国际社会压力的与日俱增，台湾当局于1987年7月宣布取消不许台湾民众以港澳地区为旅游观光“第一站”的禁令。10月14日，又正式宣布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此项政策实行时设限颇多，后来逐步放宽。台湾当局此举无疑是为缓和两岸关系所采取的带有历史性、突破性、阶段性的变革措施，受到普遍欢迎。

正当“政治革新”发展到关键之际，蒋经国突于1988年1月13日下午3时55分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台北。当晚7时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李登辉循“宪政体制”继任“总统”。李登辉继统，各方政治势力对此不以为然，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谁当国民党中央主席。按国民党体制是“以党领政”。因蒋经国生前未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又无副主席设置，故无法循序渐进，党章对此也无明文规定，这就为国民党内权力之争留下了真空地带。1月27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27名与会中常委经过争论，推举李登辉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1988年7月7日至13日，国民党十三大在台北召开。会议正式推举李登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从而标志着蒋经国时代的结束与李登辉时代的开始。

李登辉自主政至今，在内外政策上已发生明显变化：

(1) 在中国统一问题上，李登辉比蒋经国“灵活”、“务实”，更具主动性。他在宣称“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统一”的同时，又推展“一国两府”主张，以对抗中共的“一国两制”。这在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蒋经国“一个中国”的立场。

(2) 在大陆政策上，他主张用“新的观念”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和进一步放宽交流限制。但又主张对大陆进行“政治渗透”和谋求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主动权，还未真正放弃“三不政策”与反共立场。

(3) 在对待“台独”的立场上，一方面宣称反对“台独”，又对搞“台独”的人姑息纵容，导致“台独”势力猖獗，“统”、“独”之争白热化。

(4) 在“宪政改革”上，基本维持旧的“宪政架构”，但作适当修补，实现换届，以利“台人治台”。

(5) 在“外交”政策上，李登辉从“贼立汉也立”的观念出发，背离了“一个中国”的立场，与“无邦交”国家发展半官方或官方关系，来谋求台湾“独立的国际人格”，企图“重返联合国”。这就在实际上走与大陆“分而两立”的道路。

(6) 在党务革新政策上，李受其“一国两府”理念的影响，国民党体制转换将逐步走向台湾化，从而在推展“本土化”政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实现了以“台湾人为主轴，大陆人为辅”的权力架构。

从总体看，李登辉推展的内外政策与蒋经国时代相比较，既有传承、创

新与突破，又有相当部分背离了蒋经国秉持的某些正确立场与政策轨道。此一政策的推展，将给台湾未来社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使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所推进，两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会使台湾局势更趋动荡，给中国统一增加新的变数。

进入 80 年代之后，台湾经济一方面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自 1980—1987 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9%。另一方面也面临新的问题：外部遭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后进发展国家迅速崛起，以及大陆经济体制改革的竞争威胁，致使外贸出口困难，投资长期不振，金融形势严峻；内部传统劳力密集工业失去了优势，原有的经济法规与制度陈旧过时，导致“工业升级”步履艰难，农业继续滑坡。面对上述情况，台湾当局确定了“稳定经济为主”，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发展策略。具体措施是：

其一，提出经济革新的“三化”（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方针。即扩大经济活动空间，开放内部市场，促进内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增强对外活动的实质能力；尊重市场价格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化环境；制订一整套的合理的法规，用法制调节，控制经济金融的运行。“三化”方针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全面转型，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其二，进一步推展“工业升级”、“科技导向”政策，将台湾现有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将台湾初级的、简单的、低层次的、附加价值小而能源消耗大的加工装配工业，升级到高级的、复杂的、多层次的、附加价值大而能源消耗小的高级加工装配工业。通过工业升级，改变台湾的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机制，使其工业赶上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水平。为了实现工业升级，台湾当局采取以下若干措施：积极扶植高科技工业发展；继续改善投资环境，放宽投资限制；积极开发新竹科学园区；积极改进中小企业；加紧培养和延揽高级人才。

其三，开展第二次“土地改革”。继 50 年代初期的台湾农村“土地改革”之后，台湾当局又于 70 年代至 80 年代展开第二次“土地改革”。此次“土地改革”与第一次“土地改革”目的不同，是解决农业经营管理问题，将土地化零为整，造成“小地主大佃农”的局面，其实质是淡化小农经济，扶植农营资本主义。此举一方面使一小部分小自耕农丧失原有小块土地所有权，而转为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使大自耕农扩大耕地面积和经营规模，促进农业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为发展台湾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

其四，1991 年 2 月，推出了第二期 6 年经建计划，目标是：重建经济社会秩序，谋求全面平衡发展，以解决社会脱序和经济失衡问题。在这个总的奋斗目标之下，还提出四个具体政策目标：发展经济，提高国民所得；“厚植产业发展潜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升国民生活品质”。第二期 6 年计划是 90 年代台湾当局的一项重点工程，已经和正在引起岛内各界的关注与评论。

五、教育、科技的迅猛发展

进入 60 年代之后，台湾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重要原因在于台湾当局高度重视教育与科技的发展。

台湾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历经 40 年不断修正、补充而逐步形成的。

第一阶段（从 1949 年末至 1959 年）：是台湾教育的“改造”阶段。国民党退台后，出于偏安台湾的需要，台湾当局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教育，但在 50 年代初期是将教育重点放在配合“反共需要”上面。随着台湾社会秩序的初步稳定，台湾当局开始推广普及教育。具体措施是：抓适龄儿童的就学率；抓师资素质的提高；抓课程标准的设置。三项措施的推展，大大推进了普及教育。其后又将成人补习教育纳入教育改造之中，并作出规定：凡失学的成人均需接受补习教育。

第二阶段（1960—1974 年）：是台湾教育的“革新”阶段。进入 60 年代之后，台湾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教育普及率明显增高，据统计：1950 年度至 1970 年度儿童入学率由 79.8% 上升到 97.5%。随着教育普及与台湾经济的发展，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与社会需求，台湾当局决定自 1968 年始，正式实施 9 年“国民义务教育”，颁布了《9 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法规。9 年“国民义务教育”的实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从适龄儿童入学率看，从 1968 年的 97.5% 增至 1989 年的 99.9%。从小学生入学率看，从 1968 年的 74.66% 增至 1989 年的 99.09%。与此同时，台湾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第三阶段（1975—1985 年）：是台湾教育的“发展”阶段。此一时期教育发展的具体表现是：其一，课程建设得到加强。1977 年台湾教育部门颁布了《大学必须科目表施行要点》，使课程设置实现了重大转变——即以坚持必修科目为主演变为较有弹性的选修科目为主。其二，师资配置日趋合理与高质化。具体措施是：严格办理教师资格审查、职称评定、督导延聘合格教师；加强延揽海外学人及外国专家、学者来台执教。大学教育得到推广。国民党接收台湾时，仅有 5 所大学，到 1985 年时已达 28 所。大专院校还设立夜间部；成人高等教育还开辟了“空中教学”活动，以立体教学方式达到大学教育大众化的目的。

第四阶段（1986 年至今）：是台湾教育的“调整”阶段。进入 80 年代之后，台湾经济结构进入转型期。为适应经济转型需要，全力发展大学及研究所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台湾教育部门做了如下调整：（1）增设大专院校。1985 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新设私立大专院校部分类科。截止到 1988 年公、私立大专院校已达 109 所之多。（2）大力发展研究生班。各校都创立研究所，开办研究生班。（3）推广“科技整合”的院系调整方案。

从台湾 40 年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台湾教育变迁中的几个特点：一是初期教育突出反共；二是教育注重实用；三是大兴私立学校；四是教育法规比较完备；五是循序渐进，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台湾教育的发展是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的。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工业升级，给教育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从而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同时，教育的发展也为社会提供了受各种教育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经济发展日益受到来自教育的智力因素影响，这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总之，40 年来台湾的教育与经济发展是逐步适应的。通过普及教育和积极发展中等以上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补习教育，台湾劳动力的素质大大提高，从而促进台湾经济迅速地恢复、起飞、发展。然而，台湾教育由于政治制度的弊端，还存在着升学主义盛行、私立学校教育质量低下、高等教育重实用轻学术、师资素质参差不齐的缺点。上述问题不及时纠正，将会给台湾教育与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隐忧。

台湾当局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台湾经济开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标和做法是：通过科技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机制建设，促进产业结构的改善，提高生产力。

50年代是台湾科技发展的起步时期。1954年，当台湾政局渐趋稳定之际，台湾“教育部”下设“科学教育委员会”，负责主持和策划全台科研推动工作。10月，又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并在台湾“清华大学”设立了原子能研究所。1959年，台湾一些有识之士胡适、梅贻琦与吴大猷等人受“行政院”委托，草拟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首次成立了科技发展的专责机构“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简称“长科会”）。根据《发展纲领》，“长科会”开展了以下工作：重点支持科研基础较强的科研机构，充实设施与设备；发给生活贫困的科研人员一定的科研补助费；举办学术讲座，延聘客座教授；资送科研人员到国外进修等。

随着台湾科学技术的起步，台湾当局于1967年春在“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之下设置了“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简称“科导会”），负责拟定科技政策计划。1968年“科导会”在主任委员吴大猷带领下，拟定了为期12年、分三期执行的《国家科学发展计划》。该项计划针对50年代末制订的《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存在的偏重基础研究、脱离加工出口工业发展实际的弊端，明确提出科技发展要以开发实用型应用技术为目标，不断增强对外来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从而从目标上将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进入70年代后，台湾当局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科技摆在迈向21世纪经济发展蓝图中的重要位置，并将其视为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本世纪末10年内，台湾力图在科技经费与人才培养方面做到“人增2倍，钱增4倍”，力求在科技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借以带动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和“现代化”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

总之，台湾科技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有局限：一是过于偏重应用科学技术而相对忽视基础理论研究；二是人才外流现象严重。此种现象不改变，势必会影响台湾科技的发展过程。

六、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潮

台湾的文学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是台湾劳动人民和文学艺术家们的智慧与结晶。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初，出于反共与“反攻复国”的需要，推动一部分反共文人大搞“战斗文艺”，致使“反共八股”泛滥成灾，成为5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最初风行的是“战斗诗”，如《保卫大台湾歌》、《反共进行曲》、《我们要回去》等。其后跟进的是赤裸裸的反共小说，如《女匪干》、《旋风》、《赤地之恋》等。由于这些作品与台湾原有的文学传统毫无共同之处，也缺少文学气息，被台湾文艺界称之为“只战斗，不文艺”，“令人失望”。

进入60—70年代之后，台湾乡土文学悄然滋长，逐渐取代了50年代的战斗文学，占据台湾文坛的盟主地位。台湾乡土文学的特点是：“写实的、

进步的、反抗的。”作家们摆脱过去书斋式的作品，深入基层，“写农民、渔民、妓女、小生意人、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工作面貌”。此类作品统称“乡土文学”和“工农兵文学”。主要作家与作品有：陈映真的《将军族》、《华盛顿大楼》、黄春明的《锣》、杨青矗的《成龙之后》、王拓的《金水婶》等。

进入 80 年代之后，台湾文学与台湾社会的转型相适应，出现了多样化现象。首先是都市文学在全岛蔓延开来。所谓都市文学，主旨在于揭示因城市人口激增所带来的住房、污染、交通等各种社会问题，主要代表人物与作品有七等生的《垃圾》、舒畅的《风筝玩偶垃圾车》、王世勋的《森林》、王幼华的《健康公寓》等。与都市文学兴起的的同时，女性文学也成为文坛一大主流。女性文学的特征是一批年轻女作家将笔墨集中于社会变迁中的女性角色上，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她们的创作里，不再以哭泣作为感情表达的主要方式，其作品境界已涵盖更为深广的世态和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众生相。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是琼瑶、三毛、华严、廖辉英、李昂、吕秀莲等人。

戏剧、电影也经历了与文学相同的历程，50 年代以反共为主题。

进入 60 年代之后，台湾当局调整文艺政策，在电影方面：限制外片进口，鼓励自身电影事业发展，设立了“金马奖”，使台湾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此一时期的电影拍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当时出现了《吴凤》、《汪洋中的一条船》等轰动全岛影片。在戏剧方面，受西方戏剧潮流的影响，出现了“荒谬剧场”、“残酷剧场”、“贫穷剧场”与“环境剧场”。

70 年代，台湾电影拍摄多以战争为题材，如描写张自忠抗战事件《英烈千秋》、《八百壮士》和《梅花》等。还有一些乡土电影及武侠影片，有些影片还打入国际市场，在国际影展中也曾多次受到肯定。在戏剧方面，随着 80 年代台湾政治上的解严，台湾戏剧也更为开放、活跃，出现了千奇百怪的剧作，如 1988 年上演的《开放配偶——非常开放》、《毛尸》、《夜浪拍岸》等。

与台湾文学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台湾社会不断出现新的文化思潮。50 年代，台湾当局主导的反共思潮占据台湾的思想文化阵地。当时蒋介石撰写了《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苏俄在中国》等书，这三部书被台湾人称为反共的“三大论著”。在这些著作中，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地攻击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反共思想体系指导下，狂烈的反共宣传，一时遍及台湾全岛。

进入 60 年代之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岛内出现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挑起这场论战的是台湾一个自称有“宗教狂热”的青年人李敖。李敖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思想特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力反抗和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他崇拜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从 1961 年起，李敖大量投书《文星》杂志，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发泄自己的“愤世嫉俗”和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满。此后，《文星》杂志又刊出了介绍西方存在主义的哲学、文学思想文章，如《反对挑战的哲学——存在主义》、《永恒的超越者——亚斯培》等。这些文章与当时在台湾文坛崭露头角的现代派文学创作交相呼应，形成了与传统文化相对抗的现代主义潮流。李敖后来的文章则指名道姓地对国民党要人进行抨击，从而引发了轰动岛内外的“中西文化论战”。

与李敖论战的主要对手是胡秋原、任卓宣和郑学稼等人。他们一方面抨击李的“全盘西化论”，一边控告李敖与《文星》杂志有“诬陷、诽谤罪”。李敖则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怒，1965年12月封闭《文星》杂志，1971年3月将李敖逮捕，1972年2月以“叛乱罪”将李判刑10年。至此，长达10年之久的“中西文化论战”以国民党当局强力介入宣告失败。

为了彻底批判李敖的“全盘西化论”，也为了借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机攻击中国共产党，台湾当局于1965年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一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蒋介石鼓吹的中国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论。1967年7月，台湾当局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此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全岛展开，并持续数年之久。

进入70—80年代之后，台湾社会出现两股文化思潮：一股是“革新”思潮，一股是“台独”思潮。

所谓“革新”思潮是指70年代初在保钓运动中及其以后在台湾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政治革新热与政治参与热。保钓运动使过去不问政治的台湾知识青年和学生觉醒了，他们开始关心时局。台湾当局在保钓运动中畏首畏尾，使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了“革除弊政”的呼声，代表这一呼声的，是以《大学杂志》为中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革新活动。这种革新思潮发展到后来为台湾当局所接受，成为70—80年代台湾政坛的主流。这股思潮之所以在70年代初出现并发展为主流，重要原因在于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在保钓运动影响与“外交”危机的刺激下，对政治现状不满，因而发出变革的呼声。同时由于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要求政治上获得权力，进而使革新思潮愈演愈烈。加之，台湾当局为摆脱困境，维持国民党在台的偏安局面，遂大量起用“革新保台派”，致使革新思潮成为台湾政坛的主流。

“台湾独立”作为一种主张，最早产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但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反动派扶植下逐渐形成的。早年“台独”活动的中心在日本，由于台湾当局对“台独”分子实行瓦解政策，“台独”活动陷入沉寂。60年代后期，“台独”中心由日本移向美国，相继成立了“全美台湾独立联盟”、“欧洲台湾独立联盟”等“台独”组织。“台独”组织在美受到了朝野反动势力的支持，活动极为频繁，气焰嚣张。进入70年代，海外“台独”分子与岛内“台独”分子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破坏事件，诸如枪击蒋经国、破坏台南电厂、邮炸弹包炸伤谢东闵等，活动十分猖獗。进入80年代之后，特别是蒋经国病逝李登辉主政后，由于李登辉一面声称反对“台独”，一面对“台独”势力姑息纵容，致使“台独”势力更为猖獗，由海外走向岛内，由言论走向行动，公开打出了“台独”的旗号。台湾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公然将“台独”主张写进了党纲。但是，“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台独”的膨胀，其结果不仅会毁掉“台独”自身，而且会毁掉整个台湾。台湾前途不在于“台湾独立”，而在于中国的统一。

七、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早在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上述设想未能付诸实践。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1992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再次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有以下基本点：

（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拥护国家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

（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这种考虑，主要是基于照顾现状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这将是统一后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创造。

（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它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两岸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和平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然而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在采取任何方式处理本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并无义务对任何外国或图谋分裂中国者作出承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相信，在维护自己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中，一定能够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

理解和支持。

